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3 1223 08080 4595

內蒙 文華風雷

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

高樹華 程鐵軍 合著



作者 高樹華

1941年1月19日出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鐵路工人家庭

1958年9月考入內蒙師院中文系

1966年6月任外語系教師，團總支工作

1966年6月3日寫第一張大字報，被工作組關押近兩個月

1966年10月參加師院東縱並成為負責人

1967年2月參加中央四方會談

1967年6月內蒙革委籌備小組成員兼辦事組組長

1967年11月1日參加內蒙革委會，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文藝辦主任

1969年1月-4月參加中共九大

1970年3月-1971年5月唐山學習班

1972年6月任內蒙教育局普教組組長

1973年3月任土左旗旗委副書記、革委副主任

1975年12月參加全國第四屆人大

1976年3月任呼市市委書記、革委副主任

1977年12月被隔離審查

1979年12月以幫派骨幹分子名義被逮捕

1983年7月25日以“不予起訴”獲釋

1983年-1993年在國內各省市教書、經商、當編輯

1993年-1998年在蒙古、俄國、歐洲等地經商，自由撰稿

1998年-2001年回國內經商，謀生之餘，抱病撰寫口述史提綱

2003年6月12日心臟病突發，在呼市逝世

INTERNATIONAL CENTER

DEC 13 2007



CHINESE 951.056 G1597n
Gao, Shuhua, 1941-2003.
Nei Meng wen ge feng lei
: yi wei zao fan pai ling
xiu de kou shu shi
Carle Place, N.Y. : Ming
jing chu ban she, 2007.

3 1223 08080 4595

《真相》系列(四十一)

內蒙文革風雷

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

高樹華 程鐵軍 著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Oral History of A Rebel Leader

By Gao Shuhua & Cheng Tiejun

Published in 2007 by Mirror Books
©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1-932138-56-0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Yi Hua

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 .S. A.
TEL:(516)338-6976 FAX: (516)338-6982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轉載，複印，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請寄回更換



韓桐 遺像

韓桐：內蒙古托縣人，內蒙師範學院外語系英語四年級造反派學生，於1967年2月5日被內蒙軍區校級軍官柳青槍殺在軍區大門外，成為軍人介入文革之後開槍屠殺造反派第一例



歐陽儒忱 遺像

歐陽儒忱：內蒙古赤峰人，內蒙師範學院外語系俄語四年級造反派學生，於1967年5月21日被保守派抓入工會大樓內，斷水斷食，毒打數日，致死不屈

紀念文化革命四十周年

謹以此書敬獻給

韓桐 歐陽儒忱 同學

以及千千萬萬

在文化革命中遭受過痛苦和冤屈

犧牲了青春和生命的

不幸同胞



紅色燎原長征隊
部分隊員，有高樹華
(左二)、韓桐(左
三)、黃志高(右
一)等(1966年冬)。



1967年春，在韓
桐家鄉舉行的追悼大
會上，韓桐老父泣不
成聲(1967年春)。



韓桐被槍殺之
後，在內務部長曾山
監督下，內蒙醫學院
的驗屍現場(1967年
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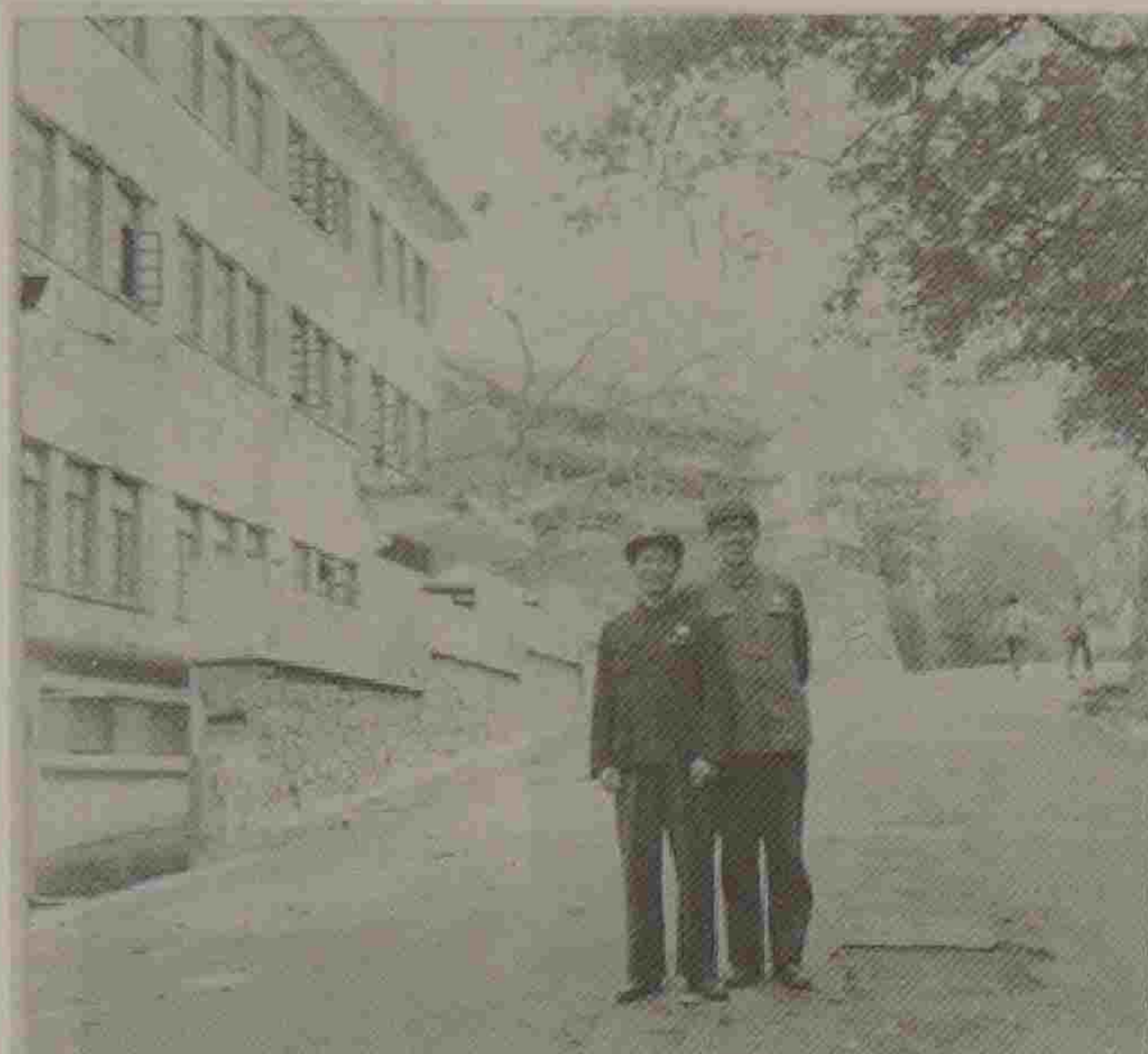
受周恩來委託，
內政部長曾山（右）
慰問韓桐家屬，中
間為韓桐的父親
（1967年春）。



內蒙托克托縣家
鄉父老，為韓桐追
悼大會設立的靈堂
（1967年春）。



高樹華（右二）和
他的造反派戰友岳
志棟（左一）、薛桂元
（左二）、郭是海（右
一）（1968年冬）。



高樹華(右)和烏蘭夫前秘書沃寶田(左)在一起(1967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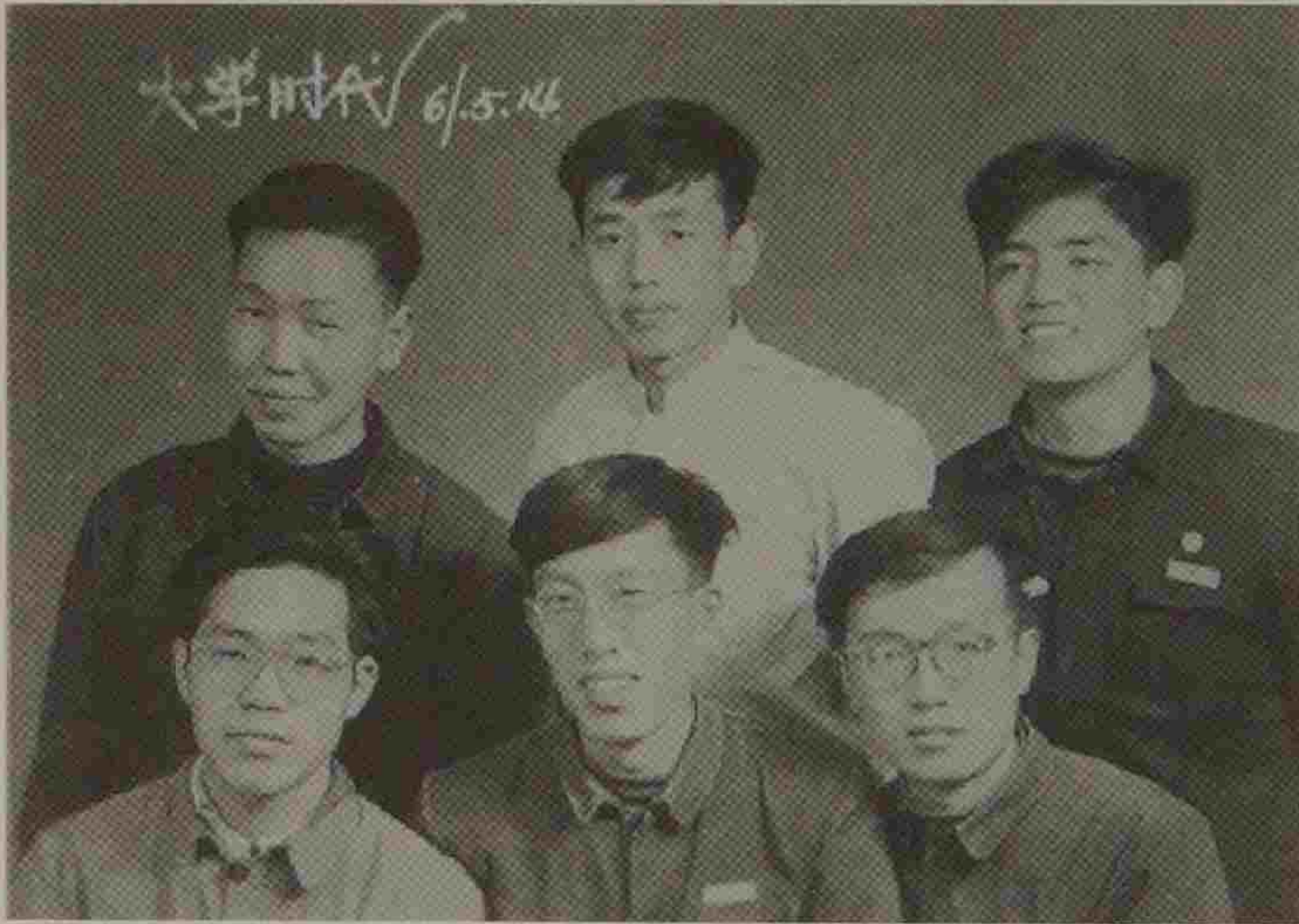
高樹華(後排右四)於展覽之前同內蒙核心小組成員談話。前排左二為滕海青，對面為高錦明(1968年夏)，前左二穿軍服者為吳濤。



高樹華(右一)在向滕海青(背手者)和高錦明(提包者)等領導人介紹“毛澤東思想萬歲”展覽館的籌備情況(1968年夏)，前左一穿軍服者為吳濤。



高樹華(中)出任內蒙革委會常委之後，再次和戰友岳志棟(左)、薛桂元(右)相聚於內蒙師院。(1967年冬)



文革之前，高中時代的高樹華(後排中)和他的同學們。



大學同學表示“永遠在一起”，但文革使他們各奔東西，後排中為高樹華，前排左一為譚培禎。



1961年俄語進修班畢業的高樹華（後排左一），劉樸（中排右一），宗馥華（前排左二）等同學。



高樹華父母親和高的大兒子（前）攝於七十年代。



高樹華等人下鄉慰問貧下中農，送去羊毛氈和毛澤東畫像等物品。



七十年代的
高樹華（後排右
二）與同學和朋
友...後排左二為
王履安



韓桐追悼會之
後，家屬答謝來
賓，前排左二為
韓桐之父，左三
為韓桐之弟韓
梓，從表情可知
，他已經精神
失常。



1968年夏，
高樹華（中間舉
手者）向滕海青
（光頭坐者）等
領導人介紹“毛
澤東思想萬歲”
展覽籌備情況。

慰問當地駐軍。

高樹華（中）代表自治區革委會



原內蒙師院外語系教師力沙克，後恢復原名烏傑，曾任包頭市長，山西副省長，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等職。



五十年代中期獲頒中將軍銜的滕海青。



1969年春，參加中共九大的內蒙代表團，在呼市新城賓館集中學習，後排右二為高樹華。

通知被捕人家属书

字第 38 号

1979年 11月 2日

李树军

因犯有 帮助逃匿

罪行经

呼市

人民检察院批准，已于 1979年 11月 2日，由

本

依法逮捕，现羁押于 呼市监狱五大队五中队。

特此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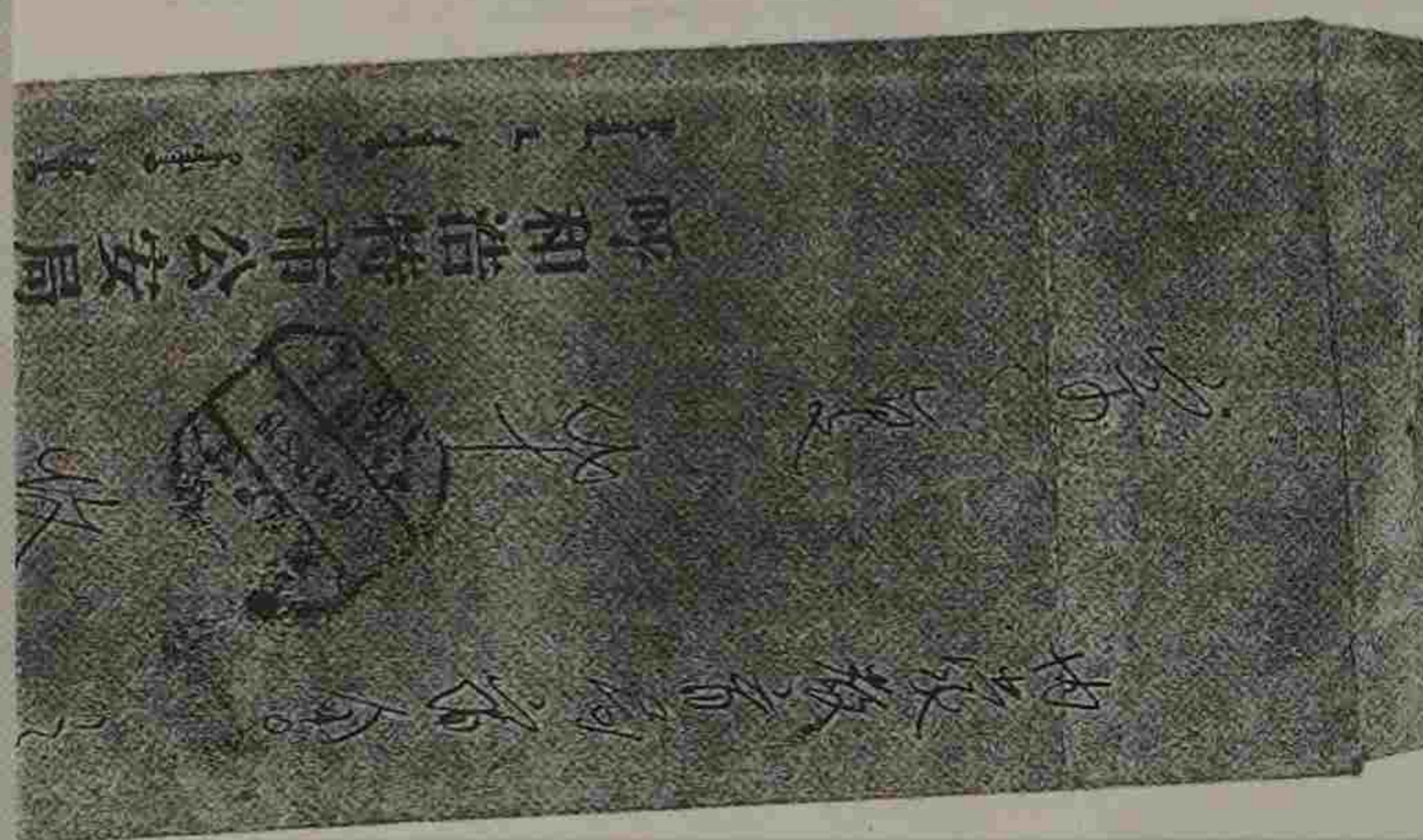
李树军

家属

住址

内蒙教育书店

内蒙古自治区



逮捕書

毕业文凭

67143

学生程铁军

是河北省

饶阳县人，

现年二十五岁，于

一九六三年九月入本院外语

系英语专业学习，四年期满，

经考核合格，准予毕业。

内蒙古师范学院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最高指示

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反对对反社会主义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内蒙古呼三司红卫兵证明书

程铁军 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正式加入内蒙古师范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第三司令部）红卫兵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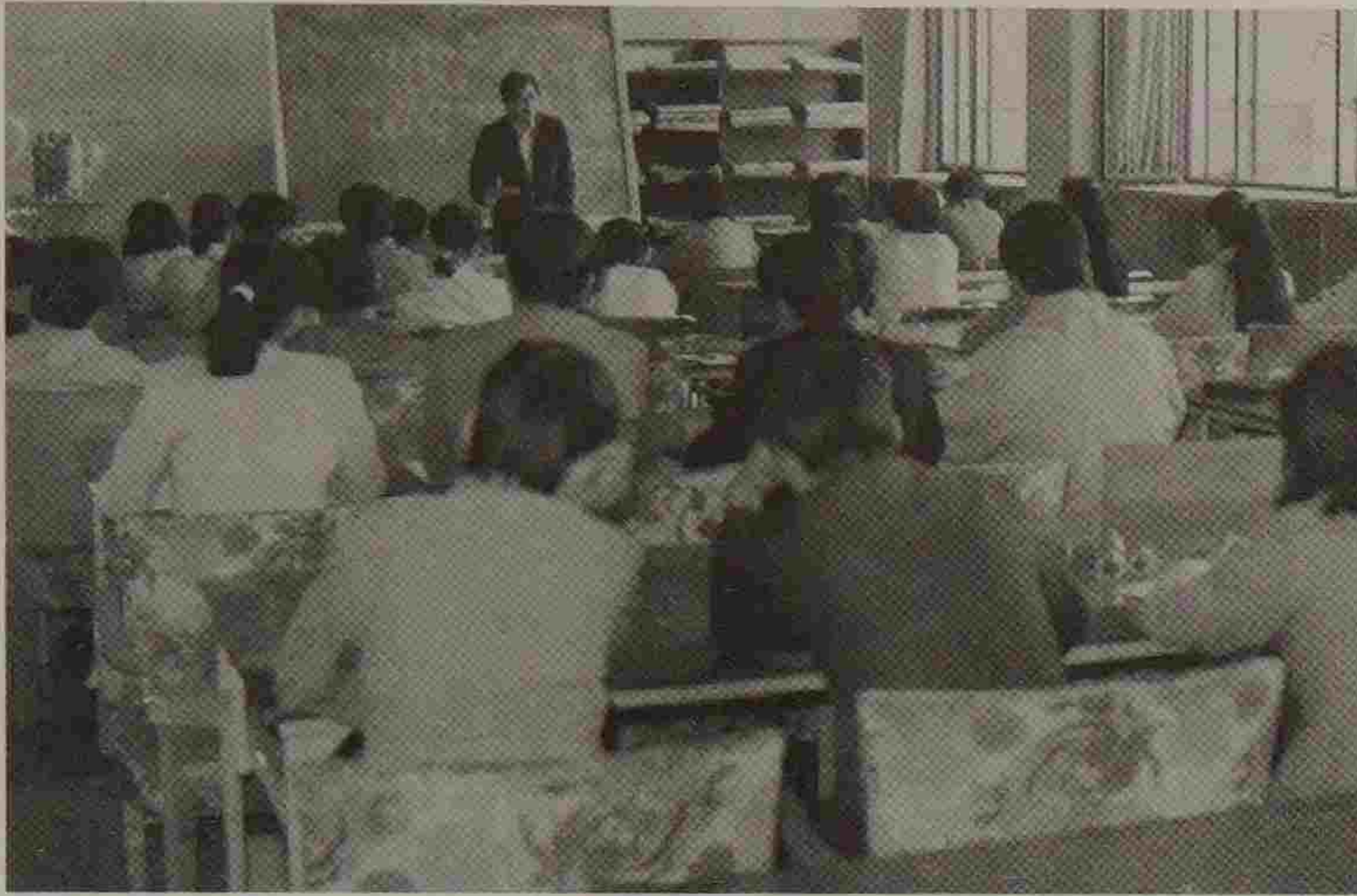
内蒙古呼三司

内蒙古师范学院

东方红红卫兵指挥部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紅衛兵證明書



八十年代後期，恢復自由後的高樹華，在給學員們上美學課。



做為自由職業者，高樹華在兒童智力開發諮詢方面，頗有建樹。



九十年代的高樹華，在俄國經商訪問期間，特意憑弔了赫魯雪夫的陵墓。

鳴謝

本書在策劃和寫作過程中，曾經得到許多朋友的熱心關懷和切實幫助，其中既有原文革造反派領袖，也有退休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還有曾經與我們對立過的保守派人士。經多年反思，大家早已走出派性，捐棄前嫌，大夢方覺，不勝唏噓。朋友們的共同願望，是趁當事人還在，要儘快搶救歷史資料，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避免文革悲劇在中國重演。他們甘冒風險，衝破禁忌，向作者提了許多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和寫作建議。但很遺憾，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目前尚無法一一披露他們的姓名。

世界著名文革史權威宋永毅教授，不但給作者提供內蒙文革史料，而且向出版社推薦書稿；另一位文革史家劉國凱先生，百忙之中通讀初稿，給作者回信，不但推薦出版，而且答應為本書做序。另有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兩位研究生，犧牲週末為書稿輸入圖片，改進版面。沒有他們的協助，本書的完稿可能還會繼續遙遙無期。最後，明鏡出版社的何頻先生，獨具慧眼，願為出版本書而承擔商業風險。我謹代表兩位作者和所有期待本書的讀者，對以上朋友的無私奉獻與同心協力表示衷心感謝。

程鐵軍

2007年2月25日星期日

於澳門大學

目 錄

代序言：歷史不可變造，公理豈容踐踏(●劉國凱).....	17
前言：我的遺願(●高樹華).....	25
第 1 章 走出牢獄大門.....	29
第 2 章 跟著毛澤東造反——命運的轉折點.....	37
第 3 章 我是什麼人？.....	45
第 4 章 高樹華是什麼人？.....	51
第 5 章 毛主席派來了工作組	59
第 6 章 工作組自己打垮了自己	67
第 7 章 工作組的尚方寶劍	77
第 8 章 權勢者與無權者的論戰	85
第 9 章 政治原子彈——夏日神話	95
第 10 章 狼和小羊	107
第 11 章 北京告御狀	117
第 12 章 工作隊的外圍戰	126
第 13 章 工作隊的核心戰.....	134
第 14 章 瘋狂扭曲的暑夏.....	144
第 15 章 十六條在我心中.....	152
第 16 章 文化革命籌委會——失敗的嘗試.....	162
第 17 章 小鬼們自己解放自己	170
第 18 章 從校園走向社會	180

第 19 章	行進在千山萬水中	190
第 20 章	奪權的日子	202
第 21 章	帶槍的資反路線	211
第 22 章	全國文革第一聲槍響	220
第 23 章	中央召喚迷途的羔羊	230
第 24 章	周總理派我回內蒙	240
第 25 章	中共中央處理內蒙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249
第 26 章	籌備內蒙古革命委員會	259
第 27 章	伊克昭盟的冷兵器	269
第 28 章	昭烏達盟的槍聲	279
第 29 章	江青講話點燃內蒙“挖黑線”之火	289
第 30 章	“第五縱隊”和三個包圍圈	299
第 31 章	打倒假洋鬼子	309
第 32 章	四月常委擴大會上的火藥味	319
第 33 章	三股勢力與兩套班子	329
第 34 章	又一個不平靜的夏天	339
第 35 章	內蒙高層權力之爭	349
第 36 章	挖“內人黨”冤案（上）	359
第 37 章	挖“內人黨”冤案（下）	369
第 38 章	參加中共九大	379
第 39 章	九大後的內蒙政局	389
第 40 章	空軍學院學習班	399
第 41 章	唐山學習班	409

第 42 章	教育局普教組組長	421
第 43 章	“天蒼蒼，野茫茫”——我的新任地.....	431
第 44 章	土旗的知識青年們.....	443
第 45 章	批林批孔——權力再拼殺.....	453
第 46 章	周總理逝世.....	463
第 47 章	造反派的末日——清查運動.....	471
第 48 章	專案人物寫真.....	481
第 49 章	呼市地區批鬥會.....	491
第 50 章	專案射出“隱私彈”.....	501
第 51 章	再“巡”大青山下沖積平原.....	513
第 52 章	選擇“寧折不曲”之路.....	523
第 53 章	走進牢獄大門.....	533
第 54 章	獄室畫像	541
第 55 章	生存新軌跡	551
第 56 章	形形色色的人生（上）.....	561
第 57 章	形形色色的人生（下）.....	571
後記：	英雄何須論成敗，自古公道在人心(●程鐵軍).....	581
高樹華	年譜.....	591

代序言

歷史不可變造，公理豈容踐踏¹

劉國凱

文革之發動已過去了四十年，這是一代多將近兩代人的時間。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沉澱，許多事實應該明朗，許多道理應該辨清。然而，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正如文革史專家宋永毅教授所指出的：“某些歷史的真相不是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水落石出，相反是越來越雲山霧罩，撲朔迷離，甚至在人們的記憶中面目全非。”

爲什麼會這樣呢？

一、官方對文革的處置術——變造歷史和禁止研究

檢視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編造的謊言連續劇中，規模最大且至今仍上演不衰的是對文化革命的評判。

共產黨說文化革命是一場大災難，這個定論表面來看當然沒錯。但問題是這災難是誰造成的？誰是這些災難的主要承受者？造成這些災難的人有沒有受到懲罰和譴責？這場災難中有沒有民眾對災難的反抗？對這些問號，共產黨採取了兩個手段，一是變造歷史，二是禁止研究。變造了歷史後再不許研究，這就可使文革記憶以適合中共需要的尺度存留下來。這樣一來共產黨的政治需要當然得到滿足，但歷史就被篡改，公理就被踐踏了。

作爲大災難罪魁禍首的毛澤東就這麼輕描淡寫地帶過，是因爲共產黨擔心對毛澤東的徹底批判會導致“非毛化”，而非毛化會導致對共產黨政權的

¹ 原文為劉國凱在美國洛杉磯文革40周年演講會上的講話，於2006年8月13日在《網路文摘》第2937期首發，此處引用時做了刪節，特此致謝，並作說明。

批判和否定。

把罪責推到林彪、“四人幫”及其走狗“造反派”身上，是爲了使眾多的在文革中鎮壓屠殺民眾的共產黨官僚和軍頭，逃脫社會公理的審判和譴責。否定文革中有民眾正義的反抗鬥爭，是爲了不讓這種鬥爭有再生的淵源和土壤。

然而，若要實現這些目的，最重要的是對文革說詞要掌握火候、點到爲止，厲行控制不允許再深究下去。金春明、王念一等很能體會“聖上”心思，他們以個人行爲寫了適合當局需要的文革簡史，其中略去了許多重要的歷史進程和內容。然而，儘管如此，他們仍不受當局的鼓勵，因爲在當局看來最好的辦法還是根本免談文革。

爲匡正歷史、留下一部真實的文革記錄給後代；爲伸張社會正義、譴責災難的製造者、褒揚正義的反抗者；爲取得當今民眾鬥爭的借鑒，一切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們都應衝破共產黨編織的思想羅網，去深刻地研究文革、評判文革。

二、為什麼緘默失語

1972年，筆者暗中完成了十三萬字的“文化革命簡析”，時隔八年後，才有機會把它登載於油印民刊《人民之聲》上，首次從一個基層單位的視角來詮釋文革運動。

文革初期筆者身不由己地參加了保皇派組織，後來雖恢復自己的真實面目參加了造反派，但也只是一個普通成員。文革期間筆者的活動基本沒有超出本單位。對社會上文革運動的走勢、狀況固然也瞭解，但終歸不像一些頭頭人物那樣對其中許多細節，對權勢人物之間的互動和各種微妙的、變幻莫測的關係有切身的瞭解。從這個角度去考量，文革史輪不到筆者來寫，換言之，筆者不具備爲文革寫史的條件和底蘊。

爲什麼文革中有影響的人們不出來寫文革史、或詳細的回憶錄？首先明顯的問題是處境。文革中保共產黨統治秩序的人們(即文革保皇派)明白，自己

當年的保皇行動固然給自己帶來許多封賞利益，但他們那種以被鎮壓民眾作墊腳石而摘下官方賞賜的行爲，是拿不出台面的，故他們不會去回憶什麼。文革中採取衝擊共產黨統治秩序的人們(即文革造反派)，大多被壓在社會底層、受到監控。其中許多在遭受長期監禁後都去世了。僥倖存活者，大多掙紮在衣食無著的困境中，失去了以語言文字爭道理的心理追求和實際能力。要他們去研究文革，實在是強人所難。

但願筆者鍥而不捨的努力能觸動比筆者更有資格、更有能力陳述文革的親歷者們，出來抓緊生命已不富餘的歲月，爲這段歷史畫卷落下筆墨。我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挺身而出，奮力拂去掩蓋在事實真相上的歷史灰塵，就一定能使官方變造歷史、踐踏公理的卑劣目的無以得逞。

三、文革內容之解析

如何評價人民文革，須先弄清什麼是文革。

從 1964 年到 1966 年 5 月之前，文革全稱起先是“文化革命”，其內容是共產黨對文藝界實行文化專制主義。這段期間，文革這個名稱與其內容是有關聯的。

1966 年 5 月 16 號以後，毛澤東把它升格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從那時到 1976 年底的十年裏，文革這個名稱與其內容就不相關聯了。固然，1966 年 6、7 月間，發生了以中學生爲主的“破四舊”胡搞，其中無疑有對民族文化遺產的摧殘，也可以說是“革”了文化的命。但它終歸在十年裏只占很少一段。在十年中的絕大多數時間裏，這個以文化革命稱之的社會運動，其實與文化並不相關。

“文革”作爲那個歷史年代的一個名稱，它的最大特殊性是它的名稱與內容的嚴重背離。

那麼，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簡明的答案是，那是一場內容極爲龐雜的、各種勢力互相糾合、互相衝突的社會大運動。這場社會大運動由下列三部分內容組成。

內容之一是毛澤東的政治清洗，即把他所不滿意的中共省部級以上高官清除出權力體系，從 1966 年 5 月一直延續到 1976 年十月事變。爲便於敘述，茲將毛澤東的這場政治大清洗簡稱爲“文革清洗”。

內容之二是人民群眾乘回應毛澤東“批判資反路線”和“批判走資派”之機，起來衝擊共產黨的統治秩序、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爭取自己應有權益的運動。這個運動從 1966 年秋天發端到 1968 年 7 月戛然而止，其存在時間爲一年又九個月左右(三個年頭，66、67、68。從前筆者持文革三年論就是以此爲據)。這場運動可稱之爲“文革反抗”。在 1996 年文革 30 周年時，筆者將這個運動概括爲文革中的人民線索。今天，在文革 40 周年之際，筆者採用了王希哲、鄭義分別創立的一個政治名詞：“人民文革”。

內容之三是毛澤東和各地官僚、軍方對起來反抗的人民群眾實行鎮壓、清算。這一內容可簡稱爲“文革鎮壓”。其起止時間是從 1966 年 6 月到 1972 年底，甚至以後。

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鎮壓構成了文革的主體內容。文革清洗和文革鎮壓合起來可稱之爲官方文革。換言之，官方文革包括文革清洗和文革鎮壓兩方面的內容。文革反抗就是人民文革。那麼，官方文革與人民文革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認爲應該是這樣的。

首先，是毛搞的這場政治清洗，不同於以往的政治清洗(如清洗王明集團、高饒集團等)。不是通過黨內鬥爭、不是通過黨內的投票機制來清除高級官員，而是發動群眾批判他欲清洗的大員。並發動“奪權”運動，完成政治清洗的牌局。

其次，毛的這一牌局引發了民眾的乘機造反。即使屬於“奉旨”造反的，後來也走向“越旨”造反和“抗旨”造反。人民群眾的文革反抗運動引起中共地方官僚和軍方的鎮壓。毛澤東在感到民眾運動還有利用價值時，曾一再否定地方官僚和軍方的鎮壓，這使民眾的反抗運動得以消沉後又重新振作，乃至擴張到非常大的程度。在毛澤東盤算自己的政治清洗大體完成，感到應讓各地受夠了民眾衝擊的復職官僚和軍方出出氣，並通過讓他們出氣來重拾他們的擁戴時，毛澤東便允許、縱容，甚至主導了 1968 年夏季的全面打壓；

並在其後的三年中，對積極參與過文革反抗運動的群眾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反復清算、報復、鎮壓和屠殺。

這就是“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鎮壓”三者之間的關係。

四、官方否定的是哪個文革？

由於文革這個政治化合物可以分解成爲“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共產黨多年來叫嚷的“全面否定文革”其實是假的。它根本沒有全面否定文革。它否定的只是“人民文革”和“官方文革”中“文革清洗”的那部分。至於“官方文革”中的“文革鎮壓”，共產黨則把它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

“人民文革”當然是最爲共產黨所切齒痛恨的。共產黨怨恨毛澤東搞“文革清洗”，但將這怨恨藏在心間。它公開講的標準文字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那幾句話，僅僅是“錯誤發動”而已。由於有這種壓抑憋氣效應，共產黨把怒火加倍發洩在“人民文革”身上。

除了由宣傳機器發出大量誣陷抹黑咒罵“造反派”的文章外，(據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考證，從1976年10月到1983年這類文章達1229篇之多)，還對造反民眾進行瘋狂的清算報復。

“人民文革”只存在了一年另九個月，共產黨對造反民眾的清算報復則持續了20年以上。早在1968年8月全面壓制和鎮壓後，共產黨就開始了三年的瘋狂報復清算：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1976年十月事變後，僥倖從前幾輪清算中倖存下來者，無論如何也躲不過這次徹底的清算。從此他們都開始了漫長的鐵窗生涯，有的出獄不久也都死於貧病交迫之中。除了對文革造反頭頭判以重刑外，共產黨還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不停頓地進行“清理三種人”運動。大量的前造反派成員遭到無休止的迫害歧視，對“三種人”的政治甄別和迫害持續到八九前夕。(個別地方如雲南，這種迫害一直持續到如今。)只是由於八九之後，共產黨有了更新的仇敵，才稍微放鬆了對前造反派人物的監控。

爲什麼共產黨對文革造反如此仇恨？因爲文革造反揭露了中共官僚們的種種劣跡醜聞，使人民大眾有所醒悟，中共在文革前 17 年中依靠謊言欺騙和政治強力爲自己營造的神聖光環暗淡下來，民眾從此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對中共官僚肅然起敬，對中共政權絕對馴服了。對此，中共幹部，尤其是高幹，近 30 年來一直疾首痛心。

共產黨在內心否定毛的“文革清洗”和持續報復清算民眾的“文革反抗”時，又是怎麼對待共產黨的“文革鎮壓”呢？明白無誤的事實是，共產黨在表面“全盤否定文革”的旗號下，實質上對“文革鎮壓”進行全面繼承。中共當局什麼時候反省過 66 年“資反路線”搞的第二次反右？什麼時候對 67 年的早春鎮反表示過自責？什麼時候對 68 年夏秋大鎮壓、69 年“清隊”表示過懊悔？……沒有，都沒有。非但沒有，還在繼續。信誓旦旦要“徹底否定文革”的鄧小平，在 1989 年搞了比昔日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更大規模的大屠殺。同樣聲稱“絕不再搞文革”的當今中共領導人，也在汕尾開槍屠殺集會示威的民眾。無怪乎，首開“文革鎮壓”第一槍，殺害正在和平集會上演講的大學生韓桐的共產黨軍官柳青，和屠夫趙永夫之流，都在共產黨極其優厚的待遇中享樂其罪惡的、本應受到嚴懲的餘生。

五、正面評價人民文革的意義

由於文革可解析爲官方文革(文革清洗和文革鎮壓)和人民文革(文革中民眾反抗運動)，故我們不應隨著共產黨的指揮棒起舞，去附和共產黨虛假的、連共產黨自己都並未去做的“全面否定文革”。我們應該要做的是徹底否定並抨擊毛澤東共產黨的官方文革，而堅持正面評價人民文革。

正面評價人民文革，目的在於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給子孫後代留下一部完整的、真實的歷史。從現實意義來看，它還有值得當今維權鬥爭、

運動——人民文革。只有文革造反中的那部分屬於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爭取應有權益的活動才應納入人民文革的範疇。

全版文革猶如一大盆污水。人民文革是這一大盆污水中的嬰兒。我們當然要把這盆污水潑掉，但在潑掉之時應把嬰兒抱出來。

人民文革有兩大特點，一是它的策略性，二是它的非暴力性。

策略性是它運行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之內。人民文革的主體部分雖衝擊了共產黨的統治秩序，卻沒有衝擊它的根本體制。這是它的歷史局限性，也是它的策略性，和得以擴張到很大規模的重要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有意或無意地利用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嫌隙，利用了毛和地方官僚的矛盾；利用了毛和各地軍方的不配合去反政治迫害，去爭取平反。這種策略是值得今日民主鬥爭、維權鬥爭所借鑒的。

人民文革鬥爭形式是集會、遊行示威、集體絕食、在軍區大院外靜坐，要求對話等等。這些非暴力抗爭的鬥爭形式也是非常有借鑒價值的。它甚至就是當今維權鬥爭的主要形式，也會是今後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主要形式。

總之，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發生在上一世紀 60 年代的人民文革，無論是其策略性，還是鬥爭形式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參考價值。

附：

劉國凱就“口述史”初稿回程鐵軍的信

鐵軍兄：你好！

熬了幾夜，已把你和高先生合撰的巨著基本讀完。其激動萬分的心情難以用文字來描繪。這本橫空出世的書必將對中國史學界、社會學界乃至文學界產生深遠的巨大影響。

它不單是文革史書，還是人性之剖析、人格之昇華、人道之覺悟的巨卷。請接受我對你們的欽佩和敬意。可是高樹華先生，再也聽不到我對他由衷的感佩之言了。為此我不由得悲從心來。高先生雖與我素昧平生，但僅這本巨書，就足以使我將其視為摯友和兄長。

楊曦光去世，我傷感不已。高先生是曦光第二。我真深恨上天之有眼無珠。傷感之陣痛過後，是緊迫感的巨大壓力。文革40周年將至。當年20歲的小青年將屆花甲，30歲的大青年將屆古稀，40歲以上的中年人已大多辭世。我們的時間已很有限了。鐵軍兄，讓我們攜起手來，“作一次最後的鬥爭”吧！

大凡書之序言，都請大名家為之，以壯書之行色。此屬人之常情的功利主義，無可厚非。但兄與高先生之巨著竟以拙文²為序，想來當是以理念為首取，而置功利於不顧。實令我感佩再三。

我擬再寫一篇題為“搶救瀕於湮沒的歷史、伸張幾近泯滅的正義——讀高樹華、程鐵軍……”作為書評，如你感合適則取之。只是做這個工地主管弄得我時間極缺，不知何時能交卷。

謹此問好！再敘。

國凱 謹致

2005年6月15日於紐約

² 本擬以劉國凱先生的舊作“三年文革，兩條線索”一文為代序言，現改由劉先生的最新講話稿取代之，特此說明，再致謝忱。

前言

我的遺願

構思這部回憶內蒙文革的口述史，萌發於 1983 年夏我走出監獄的那一天。但真正坐下來動筆，是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且斷斷續續。一次，在北京購得一套《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的新著，僅讀幾章，便打破我原有的寫作構想，終於決定拋棄傳統寫法，轉以描述真實，保持原汁原味為基點。1998 年，因生計暫居北京，利用打工之餘，正式進入主題，最後在全民抗擊非典時期，大致完成了一部草稿，不過十分粗糙。

之後，已感身心疲憊，力有不逮，憂慮是否有能力完成本書的修改、定稿和最終出版。幸好關鍵時刻，巧遇我當年的學生和文革好友，如今的美籍社會學教授程鐵軍。他探親期間與我相聚，談起寫作計劃和出版願望，我希望他能與我合作，經慎重考慮後，他接受我的邀請，為口述史提供諮詢意見，包括修改架構、豐富主題、查證資料、修飾文字，聯繫出版等等。他的加盟，增強了我對本書的信心。

口述史的價值在於真實。頓悟之年，大夢方覺，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貶毀譽，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作為這段歷史的參與者，在那個年代，不論我辦了多少錯事，也不論我出於“高尚的”還是“卑劣的”動機，我是從不推卸責任的人。這段民族悲劇過去了，我和大家一樣不希望它重演。但若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過去，把這段歷史留做空白，是不負責任的。那不但愧對前人和後世，更對不起久經磨難、傷疤未愈的勞苦大眾。

文革結束已 20 多年，其間對文革的定論和詮釋，是設定的統一調門，並用固定模式和話語系統，培養出幾代人文工作者，不僅滲透到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而且紮根於後幾代人的頭腦深處。有的地方誌，用寥寥數語，流說

中國，真真切切地存在過這段延續了十幾年的歷史。這十年不是空白¹，億萬民眾捲入的歷史，不可能像魔術那樣被一口氣吹光，或者以權勢者的好惡任意剪裁。

本書的宗旨，是要用親身經歷和真實資料，向無知者和盲從者述說文革的真實場景，讓後人從這些場景去感知感悟：文革何以發生和如何發生？為什麼全黨全民會“集體瘋狂”？它對我們民族的影響何在？總之，讓我們拋棄感情色彩，直面人類良知，使遭到扭曲的歷史過程回歸自我。我相信，“立體”歷史比“平面”歷史更加生動，不做結論比預設結論更富啟發。

我感到，文革是一段特殊歷史，形象說，它是一個變態怪物：一方面，它貌似一場改造黨的試驗，是最高領袖帶動億萬群眾，清除異化的偉大創舉；另一方面，它又是傳統官場與民眾角鬥的現代翻版，是共產黨人幾代恩怨和派鬥的歷史延續，是毛領袖利用專制鑄就神權，對不同政見者發動的總圍剿；第三方面，它同時也是遭受禁錮的工農大眾、知識份子，對專制暴政的間接反抗，是共產黨對失去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地盤的無奈爭奪（此說來自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革前夕的一次對話）。

法國社會學教授安薩爾認為，世界近代史是“政治激情張揚的歷史”²。文化大革命正是類似大背景的產物，同時又蘊含了中國文化的所有特徵。如果說，戊戌變法、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歷史事件，都曾被史家垂注，那麼，像文革這樣的大運動，大事件，沒有理由不成為一門顯學。

它涵蓋了多層次、多角度的歷史內容和學術價值，絕非官方文革版本，只用“否定”二字，便可一筆抹殺；更非“錯與對”、“是與非”的簡單邏輯所能概括，其中包含了對惡人的懲罰，對善良的褻瀆；有專制者的權謀，有正義者的吶喊；有青年的狂熱，也有暴君的昏庸；有追求民主的如饑似渴，也有維權嘗試的斑斑血跡；更有暴民意識和病態心理的急性發作。

1949年之後，共產黨“解放中國”的勝利，很快被官僚專制的新危機所吞

¹ 關於文革的分期問題，有官方的“十年論”和民間的“三年說”（例如澳洲國立大學教授陳佩華、廣州造反派領袖劉國凱等人）。這裡姑且沿用官方的十年論，但嚴格說來，我們感到三年說或許更有說服力。詳細分析請閱劉國凱專文：「三年文革和十年浩劫」。

噬，三年大饑荒與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推動暴民意識的死灰復燃。如果說，毛領袖的專政偏好和繼續革命理論，是文革暴力的直接動力，那麼，普遍滋長的暴民意識，便成為文革的肥沃土壤。

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一度動搖共產黨的官僚體制，文革後期又恢復了它的合法正統，甚至變本加厲。所謂的“毛式太極”剛柔並濟，把全部黨政機構、整個中華民族，玩弄於股掌之上，揉捏了 20 餘年。如此豐富的內涵，難道不值得每一位中華兒女去反復思索，去感知感悟嗎？

這部口述史，不僅羅列出一連串當年發生在內蒙古的事件和人物，更注重人物的“故事”，即符號互動，血脈相連。整整一代人，學生、士兵、工人、農民、將軍、知識份子、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的言行、心態、煩惱、需求等等，構架出一幅文革歷程的真實圖畫，有血有肉，耐人尋味。

事實已經發生，無法改變，無法勾銷。受過冤屈的人們，受過迫害的人們，受過牽連的人們，有的健在，有的辭世。他們都把痛苦藏在心中，獨自承受不幸。然而，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捍衛良知的傳統精神，秉筆直書的“太史公”信條，不會泯滅，也不能泯滅。如果文革研究作為一門學問，最終能在中國成為一門顯學的話，那麼當事人的這種自我陳述，也許能夠成為新時代新學科的搜索引擎。為此添磚加瓦，亦屬幸運，吾願足矣。

我堅信，讓當事人開口說話，文革的全貌會抹去塵封，漸趨清晰。歷史會再現其本來面目。一個能獨立判斷，不受政客蠱惑和誤導，不被錙銖小利所左右的民族，定會成熟起來。

只有這樣的民族，才能知彼知己，回歸主流文明。對內，能團結和諧，寬容而進取；對外，能不卑不亢，平等以待人。果如此，我們才能昂然挺拔於世界民族之林，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本書所描述的場景，涉及許多人。他們的音容笑貌、舉手投足，仍留在我心中，揮之不去。有的像神明，有的像魔鬼……但他們都有普通人的生活，有選擇生存方式的權利。我無意褒貶任何人，只想把他們真實地放在歷史網頁上，變做後人審視人性的知識財富。其中，若無意中傷及哪一位，那絕非我的初衷，還望寬厚與諒解。另外，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需要保護一

些仍然健在的當事人及其家屬，不得不做某些技術性處理，或隱去姓名，或以化名取代，亦望讀者體諒。

本書曾引用《岳村政治》、《大動亂的年代》、《康生與“內人黨”冤案》等書籍和出版物片段，就此向作者致謝。

此書後一段的任務，恐怕主要得靠我的合作夥伴程鐵軍來完成了。好在我們相處多年，有許多共同教育背景和社會認知，在社會學領域和口述史研究上，他比我受過更系統的專業訓練。儘管我們合作著述，但分工明確。他對我提供的素材，只負責文字加工、注釋補遺、和體例的規範化等。因他對書中的某些人物場景，並不完全知情，也不可能一一核實，故對內容不負法律責任。如因書中具體人物和事件細節出現爭議，一切責任蓋由我獨自承擔，望讀者明察。

當我們這本目前尚無法出版的“黑書”得見天日之時，我會在天堂感謝那些指點我，支持我“一定要寫出來”的朋友。也感謝家人能對我的行為事後給以寬恕、容忍和諒解。嚴酷的現實，迫使我們的策劃和寫作過程，必須在暗中進行，除了兩位作者之外，其他人只能被蒙在鼓裏。我相信終有一天，會在遙遠的天際，凝視大地，看到“還我公道”之日的姍姍來遲。

作者 高樹華

2003年6月初 於內蒙呼和浩特市

第一章

走出牢獄大門

1993年8月4日，我乘坐的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班機，俯衝過雲層，顫抖地降落在蒙古國的烏蘭巴托機場。當我獨自提著行李，跨出機場大門時，發現一頭奶牛正在門口悠閒地吃草。異國風情令我新奇，也讓我傷感，陣陣酸楚湧上心頭。十年前的往事歷歷在目，刻骨銘心。那也是這樣一個酷熱的夏日，我，一個文革政治犯，結束了近六年與世隔絕的囚禁生活，步履蹣跚地跨出監獄大門，等待另一種懲罰。

十年後的今天，我走出國門，渴望在別樣的環境裏，在較為自由的空間，得以從不同角度去思索人生價值。激動之下，我習慣地拿出日記本，寫下“1983年7月25日”幾個字。

一，免於起訴

1983年7月25日，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簡稱“呼市”）看守所，一個拘審未決犯人的地方。

三筒三號的九名犯人剛剛睡醒午覺。號內悶熱無比，我和兩名年輕刑事犯光著上身，坐在地板上，往一本舊雜誌上粘貼報紙上剪下的資料。當我們剛把一張馬克思威嚴的印刷像貼好，號道裏傳來犯人最敏感的鑰匙鏈的撞擊聲，今天不知打開哪間號門。

腳步聲在我們的號門前停住，小門打開，一張熟悉的臉從小門閃進號內，是看守員小謝。他呲著牙對我說：“真稀罕，提審你啦！”小謝是土默特左旗¹兵州亥公社的下鄉知青。1979年秋，我被拉到那個公社批鬥時，他站在會

¹ “旗”是內蒙古自治區的一級行政單位，相當於內地的縣。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在

場一角把全過程盡收眼底。“你那天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沒把主持批鬥會那些人放在眼裏。老鄉們說，看人家高樹華，真是條漢子，不稀²正眼瞧公社那群土鼈。”我成了他管轄的犯人後，他常向我提起當年的事。

我心裏明白將發生什麼——一個多月前，6月15日，內蒙黨委常委會決定釋放我，因為我的事驚動了胡耀邦、鄧穎超兩位大人物，否則我終將會成為獄中之鬼。

久居幽暗潮濕的牢房，乍見陽光感到十分刺眼，雙腿沉甸甸的。看守所圍牆邊的灰色大門，愈來愈近了，我心裏默讀著提審要通過的程序。我記不清有多少次被勒令站在灰色大門內三米線上。滿臉敵意的武警會冷面怒問：“多少號？”

“99號。”

“大聲點，你是不是沒吃飯？”

“99號。”我加大聲音。

“站好！”幾秒鐘後放話：“走吧！”此時，我才能跨過白色油漆塗的警戒線。

今天，守門戰士滿臉笑容，沒問囚號，揮手讓我出門。走出大門，便是看守所外院——人間自由天地。

燦爛的陽光下停著幾輛閃光的小轎車。員警們停下手中工作，坐在蔭涼處像乘涼又像等待著什麼，我看到一片充滿笑意的熱臉。五位市檢察官陪我進入一間審訊室，開始宣讀呼市中級人民檢察院判決書。判決書中列舉了我在文革中曾寫過若干張大字報等輕微“犯罪”事實，筆鋒一轉說因認罪態度好，免於起訴云云。

原本，我的案件經檢察院反復調查後認定為“不予起訴”，但當政者為了“平衡”，大筆一揮把我的級別高抬一格為“免於起訴”。我在以往數次提審中，由於拒不認罪被指責為態度最惡劣，今天反以認罪好而被釋放。我實難接受如此露骨的文字遊戲，我還是我，我沒有罪，我不能簽字。五位檢察

北部邊疆實行的“盟旗制度”，名稱一直沿用到今天。

² “不稀”為當地土語，含有“不稀罕”，“不待要”“不把”“根本不”等意思。

官中有幾位與我打過交道，其中一位較年輕的，似乎看出我的心思。他直率地對我說，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去治病，接著他指了一下窗外。

透過打開的窗戶，我看見一個穿著白色短衫的十四、五歲的少年正把籃球架橫檔當作單杠，上下翻捲，那正是我五年多未見的已長大的兒子。球架旁小塊遮蔭下站著我的妻子。她太瘦弱了，隨時可能被風吹倒，她凝視著我這個方向。我無法看清她那企盼的目光，卻能感到她此時此刻的心情。

我的心立刻充滿了淚水，全身熱血沸騰。當我已被剝奪得一無所有時，我的人格猶存，正如我當初拒絕在逮捕證上簽字一樣，我同樣不願在這樣的判決書上簽字。但是，當我看見妻子、兒子後，我的身心癱軟了，與親人儘快見面的強烈願望催動我違心地在“免於起訴”的判決書上簽了字。簽字時，心裏掠過一個意念——向人們講述真實的一切。

放下簽字筆，我直奔籃球架，在藍天白雲下，我雙手緊緊摟住親人。身後響起鼓掌聲，那是關心我命運的員警們發自內心的人性關懷。他們的職業是對我們秉公辦案，他們是些好心人。

人們擁過來和我握手，其中一位不穿警服的人搶著拉住我的手說：“快走，那邊雲書記正等著和你談話。”我認出他是呼和浩特市委副秘書長王林。

二，市委書記一揮手

從宣讀判決書到簽字，僅瞬間，我從敵人回到了人民的行列。在樹蔭掩映的一間辦公室，我有幸被市委書記雲治安接見。

1975年我任市委書記時，雲治安為市委副書記。今天，雲治安已升任市委書記，成為內蒙古首府命運的主宰。我倆勉強碰了一下手，他單刀直入地說：“這次審查時間長了些，但搞清楚了還是好事。組織上沒給你刑事處分，決定給你行政處分——開除留用一年。這算是正式通知你。”

他望了一眼窗外，稍停幾秒後接著說：“當然，這個開除留用的本意不是

了。

我至今不知，把我清除出黨的手續是誰爲我辦理的，又是誰代我在開除黨籍的文件上簽的字。此時，我還沒料到，當局對我懲罰後，仍把我視爲最可怕的敵人。出獄後20年，我一直在公安機關的監視中，這是20年中，我聽到、看到、感覺到的事實。當然這是後話。

雲治安接著以安慰的口吻說：“你有學問，又年輕，能幹好多事，當官也沒毬意思。毬，你已經當過大官了，還不是那麼回事。我馬上要退休了，該回家了，和你一樣沒官職了。幹了幾十年，最後還得回家，毬！”³

我感到他談自己退離官職的幾句話還是真實的。像他這種靠資格，熬年頭當了共產黨大官，一旦失去官位和權力是非常痛苦的，他不斷用“毬”字來宣洩無奈和遺憾。“毬”是中國北方農民常用之詞，意指男性生殖器。在雲治安這代官吏中，該詞可用來表達多種情緒，可罵人，亦可抒情，有萬能之用。我們的談話就是以這個內涵極廣的感歎詞結束的。

三，員警在我家上班

下午五時，我乘著市委的一輛北京吉普回到闊別五年八個月的家——呼市新城南街，內蒙教育學院內的三間平房。迎接我的是長我9歲的大哥和9歲的小兒子。

這五年多的最大痛苦不是自己的遭遇，市委書記的一揮手也在預料之中，我並不太在意，我最大的痛苦是失去了母親。1981年1月8日，她永遠離開了我。全家人清楚，我的遭遇讓母親長期心郁不舒，最終引發亞急性肝壞死而早逝。我跪在母親遺像前，除了自責，還能怨誰呢？我對正義和公正早已失去信心，但願今後能平安過日子，讓老父頤養天年，讓年幼的兒子長大成人。

³ “毬”字，是中國西北地方（包括內蒙古中西部蒙漢族聚居處）男性居民常用的粗話之一，相當於其他地區的“屌、鳥、雞巴”等罵人粗話。經常把“毬”字當成口頭語，被視爲粗魯、野蠻和缺乏教養。

由於長期監禁，很少見陽光，我的身體十分虛弱，一時無法適應外面的生活。出監後第二天，我病倒了。被捕以來，全家靠妻子微薄的工資勉強維生，有時要靠岳母和朋友周濟。眼下囊中羞澀，醫院是去不得的。幸虧幾位醫生朋友診斷我是一般性的腸胃感冒，給幾副小藥也漸漸好了。

兩天後，一位自稱姓蘇的派出所員警開始在我家“上班”。早八時剛過，他必來；下午二時剛過，來值下午班，準時到晚上六時下班。蘇坐在牆邊的椅子上看我小兒子的連環畫冊，一本接一本，看過一遍後，再翻第二遍、第三遍……。蘇員警顯然是上門“釣魚”的。妻子第二天上班後，立即電話告知朋友，家中有“情況”，大家勿來探望，並讓朋友互相轉告。此舉起到立竿見影效果，蘇在我家上班三天，未釣到一條魚，沉不住氣了，自言自語：“哎，怎麼沒人來看你？”我裝作沒聽到，不予理睬。

第四天下午，蘇有了第一次收穫，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在看守所時，認識了原呼市交通局政治部主任田明（化名）。他因“內人黨”案件被捕，關押一年多釋放。這天，他頭戴草帽，頂著烈日，滿臉通紅地突然進了屋。田的來訪，讓我驚愕片刻，之後，迅速想好應急方案。我請他坐下，自己有意背對蘇，先入為主地對田明說：“老李，這麼熱天，你來做什麼？”老田一聽我這樣稱呼他，十分詫異，我忙用眼光示意身後，田立刻反應過來。我又問：“你們建築公司現在有活幹嗎？你身體好嗎？家裏人還好？”我連珠炮地問話，為的是堵住田的嘴。田連連說好，並解釋：“我是跟著拉水泥的車出來的，順便看看你。外面車還等著，過後再談吧，今天看你還好，我放心了。”田說完，快步離去。

田剛出門，蘇便問我：“他是哪個建築公司的？叫什麼？你和他什麼關係？他住在什麼地方？”

我與蘇周旋：“是華建的，還是市建的記不清了，叫李什麼也忘了。我從來沒去過他家，不知住在哪兒。我和他好像在朋友家認識的，這個朋友是誰，忘了！”

蘇問幾遍，我就如此回答幾遍。我暗暗告誡自己，需要小心，更要耐心，決不能殃及池魚。為此事，蘇所在的派出所、新城公安分局及呼市公安局，

不知投入了多少警力，查了多少天，仍無答案。當蘇再次盤問我時，我拒絕回答。

頂牛這天，我初中一位同學，在回民區公安局任職的宛清來看我。他和蘇很熟，看到蘇正在座，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宛和我寒暄幾句，就拉蘇站在院內嘀咕了幾分鐘，隨後一同離去。

從此，蘇員警不再來家“上班”。我們全家仍很小心，對公安機關的現代偵察手段有防不勝防的感覺。

八月中旬，我的大兒子因病住進內蒙醫學院附屬醫院。那時，我妻子上班，我擔負全部家務，除買菜、做飯，還要給兒子送飯。一天中午，我騎車去醫院送飯，路經新華廣場時，遇到呼市二中教師楊永俊。楊原是內蒙師院（現在的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文革時是四年級，井岡山兵團負責人之一。畢業後分配到二中任教，1976年清查中，被列入呼市教育界重點人物。

楊對我以老師相稱。我怕飯涼了，只和他簡單聊了兩三分鐘話，便匆匆告辭。當晚十點，一位有資格參加呼市常委會的朋友，急慌慌敲開我家的門，問我：“你今天一共出去兩次，有兩次路過新華廣場，還和二中楊永俊說了話，對不對？”

我一算，很準確，急忙問他：“怎麼啦？”

“市委那幫人認為你出監後很活躍，市委書記發脾氣了，說準備再把你送回看守所。你要好好安排一下，儘量少出門，避避風頭。”朋友走後，全家人商量，只能讓兒子出院，回家治療。今後外出買東西之類的事，由父親代勞。平時，老父親在門口擋駕一切來訪者，我縮在家中，儘量不出院。

幾天後，那位朋友電話告訴我妻子：“有人天天向市委報告你的情況，說這幾天不活動了。看來危險過去了。”

至今，對現代監視技術一無所知的我，仍在愚鈍中，當局如此準確記錄一個已被釋放的人的日常起居，有什麼意義呢？

四，離勃列日涅夫那麼近

1994年7月，我從莫斯科來到烏克蘭的基輔，代表美國一家公司洽談特種鋼“18 鎢錳鈦”的生意。

經一位中國留學生介紹，我認識了伊戈爾夫婦，並住宿在他家。他有三房一廳，我包租一大室，月租金 35 美元。伊戈爾和我同齡，讀過博士學位，在烏克蘭一個工業研究所任主任工程師。他妻子熱尼亞是會計專業碩士，在一家旅館任會計師。

七月的一個晚上，我和伊戈爾游泳歸來，路上他突然向我提出一個問題：“我 22 歲時在達曼斯基島（珍寶島）當過兵，那時中國人沒有肉、奶，都穿藍灰色或綠色服裝。那時，你們中國正搞文化大革命，你當過紅衛兵嗎？”

“是的，我當時是紅衛兵。”

聽到我肯定的答覆，他驚呆呆地站在原地審視我，好像在用目光解剖一個怪物。我問：“你印象裏紅衛兵是什麼樣的？”

“紅衛兵殺人放火，把知識份子驅趕到農村勞動，隨便闖入民宅抄家，剪掉女人的頭髮，啊，上帝，他們比魔鬼還可怕。”

伊戈爾滿臉肅然，眼神裏流露出恐懼，我不由得哈哈大笑。

“伊戈爾，我的確是個紅衛兵，而且是紅衛兵領袖人物，你看我像殺人越貨的強盜嗎？”

“不像，可這是怎麼回事？”他聳聳肩表示不解。

我說：“你告訴過我，這個捷列姆卡，原是勃列日涅夫營建的共產主義社區。每戶人家有寬敞的住房，24 小時提供熱水，免費用電，住宅區還配有幼稚園、學校、現代化商城、餐館、體育館、圖書館和影院等。熱尼亞說過，那時你們上班都有一輛拉達車，每星期在餐館吃兩次飯，每年可到黑海或別的國家去休假。她說你們口袋裏的錢多得花不了，銀行存款能買兩座別墅……”

“是的，是這樣。”伊戈爾連連點頭，我的話把伊帶回那個物質豐富的年代。“可是你知道中國人對你們的勃列日涅夫時代怎麼認定嗎？稱之為蘇聯修正主義，是對共產主義的背叛。這就是紅衛兵出現的大背景。”

我，從懵懂的少年時代，就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偉大人物

無比崇敬，對蘇聯老大哥美好的社會主義無比嚮往。中蘇論戰開始後，蘇聯轉瞬間成了修正主義的敵國，已成長為青年的我們，一夜間變作反修鬥士，那熟悉的、倍感溫馨的音樂、詩歌淹沒在“九評”⁴的錚錚討伐聲中。

文革的戰鬥打響後，青年們把舉向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的拳頭毫不猶豫地指向“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⁵。

1993年10月一個風和日麗的清晨，我和妻子來到莫斯科新聖母公墓，拜謁了許多俄國名人，但始終未找到赫魯曉夫。時間已晚，兩個六十年代的反修鬥士樂此不疲，執著地在園中流連，最後在一處不顯眼的方寸之地發現了赫氏的墓碑。是偶然還是必然，無須探究，到此一拜足見個中戲劇性。

九十年代的俄羅斯和烏克蘭，共產主義已不再是普遍信仰，共產黨的信譽更為糟糕。我曾在一張大看板上，看到一位議員的競選口號是：“如果我任議員後不履行對選民的承諾，你們就罵我是共產黨員。”

⁴ 指20世紀六十年代發生在中共和蘇共之間的大論戰。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這場論戰的是非曲直，如今已經被人遺忘，但它確實導致了所謂“國際共運”和許多國家共產黨的分裂，甚至觸發了整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深刻危機。其後在中國發生的“文革”，也和這場論戰有密切關係。

⁵ 《5.16通知》中的毛澤東語錄，載《人民日報》1967年5月17日頭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

第二章

跟著毛澤東造反——命運的轉折點

我的命運轉折、身世沉浮，都是從 1966 年 6 月 3 日那一天開始的。那天早自習時，內蒙古師範學院（簡稱“師院”）外語系四名年輕教師高樹華、劉樸、樓基立、劉真具名的大字報，貼在外語系辦公室門口的牆上。

一，內蒙古第一張大字報

下早自習的鈴聲一響，這張大字報立刻被外語系學生圍得水泄不通。其他系學生吃早飯時，聽說外語系貼出批判院黨委書記紀之的大字報，便急急趕來觀看。有的學生早飯後立即寫大字報。外語系年輕教師張貴祥、劉慶榮等人的大字報，貼在了外語系團總支辦公室門旁的牆上，與我們的大字報遙相呼應。上午的課自動終止，支持外語系師生的大字報，蓋滿全院。這張大字報一下子使我們四人在師院名聲大噪，同時在內蒙黨委和華北局掛了號。此時，北京正召開由華北局書記李雪峰主持的揭發烏蘭夫“反黨罪行”的會議，自治區主要領導都在北京前門飯店。

這是我用一張 32 開發黃的粗紋紙，在膝頭寫成的幾百字的大字報，題目是《評紀之五月十八日的“動員報告”》¹：

評紀之五月十八日的“動員報告”

¹¹ 本書所引內蒙師院內張貼的大字報，除特別說明者外，均引自內蒙古師範學院東方紅紅衛兵指揮部、東方紅戰鬥縱隊總部於 1966 年冬季編印的《大字報選編》（共 6 卷，以時間順序排列）。

五月十八日紀之對全院師生做了文化大革命“動員報告”。這個報告是動員還是向革命群眾潑冷水？大有研究的必要。

紀之的報告分兩部分。前一部分談文化大革命的意義，第二部分談什麼“我們工作很忙，又要搞三查，又要搞政治與業務關係的大辯論……不能把文化大革命擺在第一位。”紀之明知這樣說群眾絕不會通過。於是，他解釋說：“任務繁重，不要抓這個放那個。顧此失彼是形而上學，必須學會彈鋼琴。如果把幾件事都納入中心，就沒了中心，那就成了亂彈琴。”“亂彈琴”指什麼？非常明顯，這是紀之對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和污蔑，這裏紀之已經露出自己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馬腳，也證明他前面說的什麼“要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統統都是騙人的話。

紀之又解釋說：“社會主義革命是多方向的”，“文化大革命是長期的，戰略性的，又是分階段的，絕不是突擊十天半月能解決問題的”。這是射向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支毒箭，難道我們搗毀“三家村”黑店的鬥爭是十天半月的事嗎？難道我們搞文化革命是搞突擊？完成什麼指定的任務嗎？紀之這樣說，實際是阻礙革命群眾向“三家村”黑幫開火！

紀之最後的一條理由是“不能看北京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這是什麼話？紀之究竟在代表誰講話？北京有黨中央和毛主席，我們不聽北京的，聽誰的？這是十足的修正主義論調！

身為黨委書記的紀之，在全國文化大革命掀起後，不站在革命群眾面前去領導，遲遲不做動員，革命群眾起來戰鬥後，又以“動員”為名，向群眾潑冷水，這幹的是什麼勾當？！全國革命形勢洶湧澎湃，而我們師院卻冷冷清清，連聲討大會也不開，廣大師生的革命的積極性被壓制，這究竟是貫徹誰的路線？！

直至5月26日方將文化大革命轉入第一中心，而紀之馬上下令讓全院師生把已組織好的文化大革命的戰鬥專業隊伍，改名為“理論隊伍”。顯然這裏有鬼，他要把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引向歧途。

以上大量的事實雄辯地證明：在文化大革命中，紀之所貫徹的是一條修正主義路線，是與黨中央、毛主席對抗的路線。我們堅決反對！

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地站出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

同時要百倍地警惕身邊的妖魔鬼怪的陰謀活動，不讓他們乘機混水摸魚。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外語系：高樹華、劉樸

樓基立、劉真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5.16通知）已經通過兩天。但是，我們當時不知道。5月18日下午二時，在學生大飯廳兼禮堂，師院黨委書記紀之作了一個“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紀之代表院黨委講述了文化革命的意義，但具體工作安排是，先批三家村²，解決認識問題，同時部署院內開展“三查”——查倉庫、查賬目、查經濟。我們疑惑：貧窮的師院有多少家底可查？又與師生何干？

接連幾天，在系內教師討論會上，我和幾位教師對紀之報告提出不理解，覺得未跟上中央步伐。會後，外語系一教師上書院黨委，發表對紀之報告的不同意見。這本無可非議，紀之等卻責令院保衛科調查該教師的歷史，派人監視，認為此人的行動、觀點完全錯誤。這當然是我們事後才知道的。此舉

² 指文革初期對鄧拓、吳晗、廖沫沙的批判。鄧拓曾經是抗戰時期的青年史學家，1949年之後任《人民日報》副社長等職。1958年8月，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兼《前線》半月刊主編。1961年3月19日，開始在《北京晚報》的“五色土”副刊上發表雜文，即為《燕山夜話》的由來。吳晗，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從1961年10月起，三人在《前線》上開闢《三家村札記》專欄，發表時評雜文，成為毛江文革派首批打擊目標。詳情參見龐暘著：《鄧拓和他的一家》，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7月版。

說明，當時黨組織對任何不同意見，都用如此駭人的辦法解決。

1966年5月，院團委建議我暫代理系團總支書記，負責學生思想工作，於是，領導批判三家村的事由我擔綱。

我真誠地當成一件大事去做，組織學生學習文件，逐字逐句批三家村“黑文”，絲毫不知5月18日凌晨，鄧拓以死抗爭，寧為玉碎，離開人世。25歲的我，在資訊不對稱年代，完全相信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文章：黨和國家生死存亡之秋，作為熱血青年，“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³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社論號召人們“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⁴ 文章讓人感到驚魂動魄，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我感到一場大的變革即將到來。那麼，牛鬼蛇神在哪裏？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並配有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文章調門極高：“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部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那麼對內蒙師院及紀之書記該怎樣認識，這是我和外語系許多教師，受到啓發後考慮的問題。

我自幼對黨從無二心。對每個能稱之為“書記”的人，幾乎信奉為潔璧無瑕的完人。怎麼一下子出現了假共產黨、修正主義的黨？這不僅讓我震驚，而且感到事態嚴重。中央發動文革的號角一聲緊似一聲。6月2日下午，學校規定是政治學習時間。外語系電化教室⁵裏，十多名年輕教師懷著憂黨憂國之情，共同感到政治形勢急迫，對師院死氣沉沉的氣氛不滿，公開質疑：內蒙師院是否是另一個北大？我與其他年輕教師沒有兩樣，發言激烈，情緒衝動，對紀之代表院黨委的報告再次否定，並希望系黨總支迅速把我們的意見轉告院黨委。

³ 此語引自毛澤東早年文章：“論民眾的大聯合”，參見官方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也刊登在當年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語錄》上，成為當時青年人常常引用的口頭禪。

⁴ 這裡所說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簡稱“四舊”），便成為後來所謂紅衛兵“破四舊”的聖旨，及其精神來源。

⁵ 指為外語系學生特設的語音教室，配有收錄、播放器材和其他教學設備。

二，院黨委的兩張面孔

外語系黨總支書記王履安，集黨政權力於一身。他僅比我們大幾歲，卻顯得政治成熟、處事老道。6月2日下午討論時，他和年輕教師語氣一致，抒發爲黨分憂之情。討論中間休息時，他迅速上報院黨委，用了“極爲偏激”一詞，並把我點爲具有危險性的代表。下半時討論開始不久，系值班人員通知我，讓我迅速到辦公樓的紀書記辦公室。

緊挨師院東門的院辦公二層小樓，在師生員工心裏有著神秘的權威性，它是全院的神經中樞。我極少踏入這座聖殿。被黨委書記召見，走入樓上拐角鋪著棕色木地板的辦公室時，一時不知所措。稍稍定神後，方看清是師院兩位炙手可熱的人物，一位是院政治部主任張學堯，另一位是院黨委書記紀之。

我長到25歲，從沒單獨與如此高大的領導人促膝談心。兩位和善的老人對我笑臉相迎，我面前如同升起一片燦爛的朝霞。張主任先開口：“你17歲進入師院，是我們看著長大的年輕人，你在學生時又紅又專⁶，大二入了黨，留校後一直努力學習、工作，是院裏的學毛著模範，又是院優秀學生輔導員，這些我們心裏全有數。”我的優點成績流暢地從這位長輩口裏飄飛出來，輕柔的河北口音舒舒服服地慰貼著我的心扉。

紀之老人溫和地問我：“你看我像不像陸平、彭佩雲，我們是不是假共產黨？”我的內心一陣慌亂，實在無法把修正主義與兩位長輩的和藹可親形象連在一起。下午討論時那種慷慨激昂頓時從我身上散盡，我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

事後多次想，如果兩位領導的談話就此而止，我是決不會寫那張大字報的，也不會出現“高樹華等四人”這一特殊稱呼。張主任也許感到談話不夠盡興，以稍爲嚴肅的口吻又說：“我們不想看你犯錯誤。1957年反右時，本來很好的青年，因一時衝動寫大字報，把矛頭對準黨，一生命運由此轉折。

⁶ 指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要求，既要政治思想先進（紅），又要專業知識學得好（專）。

你要站穩立場，三思而後行，別爲表面現象所迷惑。”

告誡後口氣再度轉折：“你現在做系團總支工作，應及時向我們報告師生的思想動向。運動過後，我們會提拔你到院團委當書記，作爲接班人培養你，希望你別放過這次機會。”聽到院黨委常委、政治部主任的許願，我的頭似乎變大。院團委書記是受年輕人羨慕的職位，我會由一個布衣百姓直升到處級幹部。談話結束後，我站在辦公樓外的丁香樹叢中，大口大口呼吸新鮮空氣，讓自己冷靜下來。剛才在樓內的談話，在我腦海中迅速過濾：讓我監視青年師生——這頗有告密的味道；提拔我做院團委書記——這許願太突然、太勉強，似乎有收買嫌疑。

兩位和善的長者，爲什麼早不許願晚不許願，恰在今天，是不是爲了讓我閉嘴，並通過我讓外語系師生沉默？《人民日報》說的話再次提醒我，我從舊社會一個撿煤渣的窮孩子，到今天當上大學教師，這一切是黨給的，我的熱血和生命是屬於黨的，只有黨中央能代表黨。此時沉默是一萬分對不起黨，我若接受他們的許願而置黨中央的號召於不顧，我無顏面對支持我的外語系師生，我無法對他們解釋爲什麼要 180 度大轉彎。

現在，黨中央的聲音與紀之的動員報告是兩個調門，黨中央不會錯，錯必在師院黨委。我站在哪一邊？我不能爲一碗紅豆粥而出賣耶穌。走進王履安的辦公室，王履安和三名年輕黨員教師正等著我。他們打聽誰找我談的話，談了些什麼。我只說了院領導希望我們慎重、沉默，接受 1957 年反右教訓，未說他們對我的許願。我寧可相信兩位長者，對我是真誠的信任而非收買。我無權惡意揣度兩位領導的用意，這不合乎我的人品和風格。

劉樸、樓基立、劉真激烈地反對沉默，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辯著。我從王履安辦公桌上拿起一張紙，靠著椅子，用十幾分鐘寫完了《評紀之五月十八日的“動員報告”》這張大字報的草稿。我把草稿向在場的四個人讀了一遍，他們一致同意，王履安只是提醒我注意策略，在兩處用詞上有所改動，我接受了。接著，我在大字報稿上簽了我的名字，然後交給劉樸，樓基立、劉真一一簽了名。王履安看了一遍，對我們說：“我支持你們的觀點，但我的身份還是不簽名好。”我理解他所處的系領導地位，況且，革命無須勉強。

我們四人相隨到了我辦公的團總支辦公室，逐字推敲大字報內容，然後抄寫在一張黃色大字報紙上（這些紙發下來批三家村用）。王履安鎖上辦公室門後，立馬奔向辦公樓。張學堯聽了王的報告，感到事態嚴重，立即召集院黨委會，由紀之主持，聽取王的匯報，連夜研究對策。

三，接班人淪為右派分子

當我們四人手捧玉米麵發糕和鹹菜，無憂無慮修改、抄寫大字報時，卻不知黨委書記辦公室燈火通明，正研究我們大字報出籠後，黨委將實施的策略。據事後揭發，院黨委緊急會議上，紀之、張學堯已收起笑面，張在介紹我時變了腔調：“這個高樹華從入大學就不安分，實屬漏網小右派，而且偽裝進步，實際是極左分子。”紀之插話說：“極左分子表面左，實質是右派的另一種面孔。”這個表面平靜的夜晚，我們同樣沒想到，院黨委會授意院團委負責人張曉然、李漢良等，連夜準備反擊高樹華等人的大字報，要公開打出“反擊右派對黨進攻”的口號。6月3日下午起，院團委李漢良帶領數學系部分師生開始貼反擊大字報。“堅決保衛院黨委”，“保衛紀之同志”，“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對黨的進攻”等標語，斗大的字塊掛滿全院。各系傳達院黨委決定：為防止階級敵人破壞革命大字報，由院團委挑選革命師生組成管理大字報小組，今後貼大字報必須通過管理小組。

此時，“打倒右派分子高樹華”的大標語越來越多，師院一片殺氣。各系、各班出現兩種不同觀點，有的班內保衛院黨委觀點的人居多數，便圍剿支持外語系觀點的學生。

外語系 80%以上的師生堅決對抗院黨委組織的圍剿。俄三、英三、英二等班級把保衛院黨委的學生趕出教室，把外系被趕出來的反院黨委觀點的同學迎進外語系。

6月4日上午，文史樓一層共同課大教室召開文革形勢演講會，我對幾百名師生說：“我們是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投入文化大革命，我們沒有錯誤，更無私心，只以滿腔熱血保衛黨和國家永不變色。”樓外，院團委召開

了另一個形勢演講會，會後在院內遊行，高呼“保衛院黨委”，“打倒高樹華”等口號。

6月3日前，我未曾料到師院局勢會變得如此錯綜複雜，感到自己坐在了火山口上，運動的下一步會怎樣發展，事情會以何種方式收尾，我心裏一點數也沒有。但是，我身後有上千名師生，他們和我一樣困惑不安，他們希望我能解答他們的問題。

我審視自己的思想過程，反復校對我們向院黨委的質疑是否明智，我自以為沒有錯，說真話的師生沒錯。我以極大勇氣說：“革命不會風平浪靜，我們要相信毛主席黨中央，相信自己，不要怕困難。”在壓力下，我連續幾天幾夜睡不著覺，一下子病倒。

這時，北京前門飯店會議已揭出烏蘭夫“反黨叛國”問題，“烏蘭夫黑幫”的稱謂，正展開一張看不到邊的大網，誰的名字觸到網上，無疑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6月5日，由王履安、譚培禎具名，在外語系貼出一張大字報，質问我與烏蘭夫家族的關係；院黨委辦公室陳漢楚也貼出一張大字報，懷疑我與烏蘭夫黑幫骨幹潮洛蒙⁷有關係。

師院立時大嘩。保院黨委的人明言，要把我推到“烏蘭夫集團”這張網上，時隔二日，我從右派分子榮升為烏蘭夫黑幫分子。靠師院北門有個鍋爐房，從聳入雲霄的大煙囪頂端垂下一條巨幅標語——打倒黑幫分子高樹華，據說用了上千張報紙。

七、八十年代，當烏蘭夫出任國家副主席，內蒙古為文革中被打成烏蘭夫黑幫的人平反昭雪時，從來沒有人為我平過反，反而把我以“四人幫幫派骨幹分子”的罪名投入牢獄。

⁷ 潮洛蒙，男，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蒙古族，文革前任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副部長。

第三章

我是什麼人

從 1966 年 6 月 3 日寫出那張大字報，我便給自己、家庭和親朋好友闖了“大禍”。幾十年來不斷有各種人在不同時間和地點向我提出類似問題：是誰指使你寫出那張大字報？你寫大字報時的後台老闆是誰？你是否急於搶班奪權才寫大字報的？你們四人背後有什麼陰謀活動？……

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一切

我的回答始終只有一個：“如果非交待一位後台老闆，那就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時，我們只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風險，無法料到兩年後會成立什麼革委會，更無奪權的非分之想。”

我的祖籍可考為山東益都（現青州），先輩逃荒到天津靜海。曾祖父的前人由靜海移居天津。高氏家族人填寫籍貫一欄時，靜海及天津均有之。曾祖父年輕時，在天津碼頭賣苦力。祖父讀過幾天書，為一家小店鋪當過記賬先生，後店破失業，祖父母學會了紮紙花，遂以賣紙花為生。父親高中畢業，正值京包鐵路招工，全家到了塞外。祖父母在歸綏市（現呼和浩特）毛紡廠應招入廠，當了工人。按照共產黨的階級成分標準，我們家算清白的勞動人民，當屬工人階級。

我，大名高樹華，小名二林，屬龍。小時候常流鼻涕，嗜書，好運動，喜聽古典音樂。我出生在 1941 年 1 月 19 日，農曆臘月 22 日，一個大雪飄飛的黃昏。自幼常聽我祖父母講述我出生時的故事：我出生後第二天下午，雪停了，家門口出現一位化緣道人。道人說我家出生貴子，日後必有大福。為報答吉言，祖母給道人一大碗小米，那可是我們全家人半日的口糧。

儘管祖父母很相信道人吉言，其實那不過是出家人化齋的口頭禪而已。

我無福無貴，在貧窮中長大。因長期吃不飽，營養不良而多病。七八歲前，儘管塞北冬寒，我沒穿過棉衣。家中子女多（一兄、二姐、一妹），父母無暇顧及我，由長我六歲的大姐負責看管。我像路邊的野草，任憑踩擠，照長不誤。五歲那年，被帶入學校，成為不合格的插班生。直到九歲綏遠省¹和平解放，我才有了“福”和“貴”。

我的出生地是呼市鐵路車站北一個叫“中山里”的居民點，這裏 80%以上的居民是鐵路工人及家屬。走出居民點便是一片荒野，西邊的鐵路三角叉處是居民墓地。再西邊有一條小河，那是中山里孩子們的樂園，可摸魚蝦，游泳。河邊有座不大的大仙廟，終日香火不斷，繚繞的煙霧中充滿周圍百姓的寄託。

1945 年日本投降時，我剛四歲，我家和許多工人都住進了日本人的公寓。這一片有幾百間紅磚平房的地段，被鐵路人習慣稱為“紅房子街”。我家住 81 號，一直到升大學，才離開這裏。

抗戰勝利後，大仙廟西埋葬了許多在傅作義將軍領導的百靈廟戰鬥中犧牲的將士。墓園區種滿了楊柳樹，建有水池、靈牌堂，還有一座高高的白塔。這座白塔成了我與少年夥伴讀書討論的地方。今天，這裏已被國家列為公園，白塔猶在，但似乎比我少年時看到的低了許多²。抗戰將士的英靈自幼就深深印在我心中，我有了粗淺的“國家”和“民眾”的概念。

解放後，我一家的生活發生極大變化，有白麵吃，有棉衣穿，失業的姐妹們進鐵路當了工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未來”，這對我曾經是絕對真理。1955 年，我在呼市第二中學讀初三時加入共青團，時年 14 歲。初中三年，我讀書如饑似渴，喜歡與同學論說國內外大事。熱愛黨，熱愛毛主席是我堅定的信念，長大後忠心報國是我的最大志願。

¹ 綏遠省，當時轄區為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彥淖爾盟東部及呼和浩特和包頭等地。1949 年 9 月 19 日，在傅作義將軍和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的命令下，宣佈同國民黨及國民政府脫離，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改編，和平起義。1954 年，該省撤銷，併入範圍擴大之後的內蒙古自治區。

² 這個國軍抗日烈士陵園，在階級鬥爭年代也難逃噩運，曾被破壞得面目全非，許多墓碑被偷挖，有傅作義題詞的白塔，百孔千瘡。直到改革開放年代才重新撥款修整了這個墓園。

二，風霜勵志

讀高中二年級時，反右派鬥爭開始³。當時中學生內不抓右派，但安排了“整頓共青團”活動，即每個團員要向團組織交心，組織根據每人的交心情況和其他團員的評定，劃分左中右。

這是我出生後第一次參加的“真刀真槍”的政治鬥爭，鬥爭就發生在我身邊，我得到了歷練。我所在的高八班的團支部委員中，高幹（指共產黨中高級幹部，簡稱高幹）子弟占多數，支部書記是解放軍團長的兒子，政治上自然十分可靠。可惜此人不長進，學業差勁不說，整日抽煙，喝酒，在學生中並無威信。

高幹子弟們對整團有備而來，一開始就在平民子弟出身的團員中抓重點。高八班班長和我一樣是鐵路子弟，幼年在中山里長大。只是他的父親當過國民黨小頭目正在服刑。爲此，他被抓住不放，雖然他在入團時對組織並沒有隱瞞這一家庭問題。

平民子弟的團員連續幾人受到警告和留團察看處分。待輪到支書本人交心時，他便成了出氣筒，大家群起而攻之，力陳他違反學校幾不准規定：不准談戀愛；不准抽煙酗酒；不准夜不歸宿等。他自愧無言。儘管我未被劃入整團重點，但我出於義憤，憑藉出身清貧，成爲攻擊支部書記的重炮手。事情鬧大，班支書回家求援，團長大人盛怒，把狀告到市團委。市團委幹部親臨我班，名爲蹲點，實際是爲支書解圍。整團快結束時，該支書實施手段，非要給我一個警告處分。我自幼在中山里桀驁不馴、敢於抗爭，自然不服，幸好校團委比較公允，否定了班支部意見。但我班整團最終以平民子弟受處分而結束，致使他們無緣進入大學校門。

³ 雖然學生沒有直接參加反右鬥爭，但作為高二學生，對校園內大鳴大放的大字報，在老師當中公開批鬥右派分子，還是看到聽到了。很可惜，我當時根本沒有懷疑過，這場鬥爭居然包藏那麼多的陰謀和迫害，犧牲了那麼多優秀的知識份子。後來我閱歷增長，才開始慢慢覺悟。

這一惱人事件，給我和許多同學的心靈抹上了陰影。

高中入學時，新同學中有一位小個子、沉默寡言的男孩兒，姓趙，由於其父當過國民黨軍醫，所以他還不是團員，他的學業也極一般。高二寒假，小趙隨父進京。開學後，學校收到一封來自解放軍總政的公函，言其單位有趙姓大校是首長，其弟在校內高八班讀書，該生的出身和家庭今後應以其兄的標準確定。從校領導到班主任突然對小趙極為關心，批准他入了團。小趙也一改常態，有說有笑，加入高幹子弟圈。高中畢業後，他們大部分被保送⁴到北京、天津等地的大學。小趙境遇的巨大反差，撞擊著每個同學的心扉，亦在我的心中落下點點灰塵。

1958年夏臨近高中畢業時，同年級的高九班團支書、平民子弟溫庭美同學，經學校一再動員，帶頭到內蒙師院讀大學，為未來的教育事業添磚加瓦。學校發出號召：“學庭美，趕庭美，師範學院見庭美”。我們一群傻得可愛的工農子弟以赤誠之心回應，進入了最被世人看不起的師範學院。我的高考成績在當年內蒙文科中名列前茅，入學後班主任老師、作家宋肖平⁵曾不解地問我：“你為什麼不報北大中文系，你的成績到那裏沒問題。如果交學費困難，起碼要在北京師範大學⁶讀書。”

進入師院的高中同學星期日聚會時評論說，平時學習好，對黨從無二心的差不多都進了內蒙師院，而高幹子弟，大多數進入名牌大學，讓人感到不公平，大有上當受騙之感。我心中也全不是滋味，為此失落了幾天。

大學的第一課，不是在課堂聽講，而是投入全民大煉鋼鐵和政治運動。高考入學帶來的一絲不快，被狂熱化得無影無蹤。

⁴ 保送，指部分高中畢業生由於表現“優異”（常常是政治可靠的代名詞），不必參加高考，只要經中學推薦，大學同意，即可直接進入大學就讀。所謂“保送”制度，也是為給學業成績不好的幹部子弟，提供上大學的“綠色通道”。

⁵ 宋肖平，筆名肖平，中國當代知名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三月雪》等。

⁶ 如今好像除了軍隊院校不收費，其他什麼學校都收費，而且往往貴得讓窮人念不起。而當時，凡屬師範類院校，學生一律免費入讀，而且享受伙食津貼。毛澤東年代的免費和低費高教，使許多窮人子弟，可以通過公平考試接受高等教育。

三，最年輕的中共黨員

1958 年冬季，本科一年級正式開課。上課不久，我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我不僅力爭學業上最佳，而且努力做好黨、團組織交給的工作，很快，我在中文系內脫穎而出，成為又紅又專的好學生。大學二年級末，我被批准加入共產黨。19 歲的大學生入黨，在當時院內上千名學生中屬鳳毛麟角。入黨後，我從不忘是無產階級先進組織的成員，對黨組織的決定總是忠實執行，當時的我，可以說從裏到外都是紅的。

根據教育部指示，院裏決定在各系本科二年級抽調外語成績好的 12 名同學，轉入外語系成立的外語進修班，由外籍教師強化一年後留校，補充短缺的外語教師隊伍。我是最早被確定的轉系學生。儘管我不願意放棄中文專業，但我是黨員，我服從了。只是附了一個要求：准許我修完中文系三、四年級的專業課。

入黨後，直到畢業留校，我一直兼職做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定時給他們講團課、黨課，被評為院系學毛著積極分子。這段時間，雖然經歷了令人難忘的大饑荒，但我當時完全相信了官方的一面說辭，認為那是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加給中國的“暫時困難”，尚沒懷疑到毛領袖製造的“人禍”。

1962 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後，抓階級鬥爭成為最重大的政治任務，作為年輕黨員，不敢有半點怠慢。1964 年中蘇論戰的“九評”指明，中國存在著改變顏色的問題。

這一讓人觸目驚心的告誡，是偉大領袖發出的警示，他沒有錯，他從來沒有錯。我對他只有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此時，《中國青年報》每日的報頭上角，總刊有一條毛語錄，對毛的“四個無限”以排比形式醒目地登在這一位位置。)只要是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我必記於心，融會貫通，付之行動。我當時一心以為，這才是“最革命、最光明磊落的共產黨人”。

1964 年全國開展的“四清”運動⁷，始於農村，城市也隨後進行。毛領袖

⁷ 四清運動，指 1963 年至 1966 年在中國農村和部分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城鄉四清運動”或“社教運動”。

發出的新的告誡：要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們可能就睡在你身邊。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出於黨性，我不能隨便與人討論，但我必須思考，卻猜測不出什麼來。中國上層的政治從來嚴格保密。這時期，在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烏蘭夫親自過問下，內蒙師院內開展了一次“民族教育運動”。鬥爭目標是原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特木爾巴根，他的罪名是搞“民族分裂”。

爲上好階級鬥爭這門主課，全院停課兩周。特的知情者們揭發的問題，從政治到生活有上百條。特屬於共產黨內升遷極快的民族幹部。1958年前，他從內蒙教育廳一般幹部升爲辦公室副主任、主任。1958年升任內蒙師院黨委副書記兼副院長。僅幾年功夫，成了內蒙資格最老的大學的第一把手——書記兼院長。

僅幾年，特的“廬山真面目”讓人驚異，讓崇拜者大失所望。他算不算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呢？我不得要領。

1966年前，共產黨對我的鍛造及政治環境的潛移默化，把我漸漸鑄就爲政治化的動物。是毛指示和共產黨政策把我澆灌長大。當毛領袖發出搞文革的號召，我不可能無動於衷，即使我不站在造反一邊，也會站在保守的一面，成爲外語系運動的領袖人物。

1963年2月的中央會議，決定在農村進行“四清”，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從1964年底到65年初，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此規定要求，城鄉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律稱“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說：“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四章

高樹華是什麼人

正當我們一夥不諳世故的年輕人，全心投入學院內文革時，北京正進行著一場關乎內蒙前途命運的大決戰——北京前門飯店會議。前門飯店雲集了內蒙大部分高層人物，會議形成兩軍對壘態勢。一方以中共內蒙第一書記、自治區主席兼內蒙軍區第一政委烏蘭夫（他的另外頭銜包括：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華北局第二書記、中央民委主任、內蒙大學校長等）為首，包括內蒙頭面人物奎壁¹、吉雅泰²等（背後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支持）。

一，左派書記們的臆斷

與之對立的一方，是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支持的內蒙黨委書記高錦明、權星垣、李質及代常委郭以青等（背後有毛澤東、周恩來、江青等人支持）。會議由華北局常務書記解學恭主持，雙方“真刀真槍”短兵相接³。李雪峰一方盡占上風。烏蘭夫一方除少數人堅持立場，大部分倒戈投降，紛紛把矛頭對準烏蘭夫⁴。

¹ 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蒙族，歷任綏遠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

² 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蒙族，歷任內蒙古自治區統戰部長、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協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³ 這個長達兩月有餘的馬拉松式中共中央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常常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或者預演。

⁴ 烏在內蒙工作幾十年，論起來，他本人少年造反，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他多重用蒙族。其中一些被重用者並不給烏蘭夫長臉，四處撒下的劣跡不少，內蒙各族人民早有強烈的反映。尤其在1964“四清”運動中，烏蘭夫擔任內蒙四清總團團長，土默特旗蒙漢民族之間

華北局和內蒙黨委在首都鑒戰之際，內蒙古後院起火，自然大驚其駕。留守內蒙的兩位書記王逸倫和畢力格巴圖爾向北京的高錦明電話告急，北京斷定師院燃起火與前門飯店會議有關，可能有黑手在內蒙攪起波瀾，轉移前門飯店大方向。警惕性極高的左派書記們，果斷抓住戰機，下達指示：立即抽得力幹部組成工作組，進駐內蒙師院。爲此，授命在醫學院搞四清的古東、陳覺生爲工作組正、副組長，指示他們進入師院首先要抓領導權，穩定局勢；並儘快查清領頭寫大字報的高樹華是什麼人。

大人物的決策，對於高某人的一生命運必有重大影響。事後幾年，我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詢問過幾位知情者。

被詢問者之一

權星垣，河北人，文革發生時任內蒙黨委書記，與烏蘭夫共事多年。因身高 1.90 米，群眾昵稱“權大個子”。

1968 年冬，由於康生懷疑權星垣是特務分子，內蒙革委會主任滕海清又認爲權和高錦明聯合起來拆他的台，權自感處境不妙，藉故躲入內蒙醫院高幹病房養病。這是中國高級幹部消災避禍的常用手法。人在政治上被冷落時拜訪者很少，因此，我以革委會常委身份看望權時，有機會和他長談。提起前門飯店會議期間內蒙師院文革的話題，他說：“當時在黨委值班的書記是畢力格巴圖爾，他打電話到北京匯報你們師院的事情。接電話的是我，我問他師院有多少人貼大字報，他說很多很多，反的和保的分不清楚。領頭的是外語系一個教師叫高樹華。我問此人多大年紀，什麼背景，是男是女。畢說不清楚。第二天，畢又打來電話，是高錦明接的。畢說，帶頭鬧事的教師是個男的，共產黨員，聽工作組反映，和烏蘭夫兒子力沙克關係好。我們就憑工作組這個‘反映’，懷疑你有可能受力沙克指使，干擾前門飯店會議。這才決定正式派工作組進駐，先抓領導權，穩定局勢。”

我問權：“你們僅憑‘反映’就懷疑我參加文革有反革命背景，黨委的懷疑可置百姓於死地，你們習慣這樣決定問題？”

權說：“是不是習慣，我真沒考慮過。當時政治鬥爭太尖銳，不允許我們先認真調查，再下結論。”

權星垣 1970 年初內蒙軍管後入唐山學習班。學習班結束，仍被留下審查歷史問題。七十年代中期，中央調權到甘肅省任革委會副主任。烏蘭夫復職後，向中央狀告權，權隨即被撤職。清查運動中他重遭審查。耄耋之年，閒居在蘭州市。

被詢問者之二

張魯，山西人，1966 年 6 月任內蒙黨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他緊跟高、權、李等人反烏蘭夫。張魯身體較胖，待人和藹，一口原汁原味的山西腔。內蒙革委會成立後，任辦公室副主任。1968 年下半年，高錦明被滕海清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停職檢查，張魯受到牽連亦被停職。1971 年底，張魯和其他內蒙幹部一樣，經唐山學習班的洗禮，分配至內蒙大學任副校長。1977 年，內蒙清查期間，張被撤職再次審查，八十年代審查結束，提前退休。

1968 年春，我任革委會政治部副主任。一次，因辦理“毛澤東思想萬歲展覽”到北京出差，在東方賓館巧遇張魯，他正領著革委會辦公室幾個秘書在京辦事。張魯不善言辭，卻喜歡和大家一起熱鬧。一次飯後，他興致極好，拉我到 he 住的房間喝茶，說有事問我：“樹華，你認識劉盡臣吧？”

“是不是原來在包頭工作，後調北京，他愛人姓李的？”

“對，對，你怎麼認識的？”

“我在師院有個數學系同學李勇，劉是李勇的親姑父。我被打成反革命，來北京告狀，就住在他們家。”

“啊，對，對，我今天就是要和你說這件事。昨天，我在老劉家吃飯時，他談到你和他侄子上京告狀的事，看看，看看，這是咋搞的，自己人打了自己人。”

他滿臉開心而誠懇的笑意，像發現了新大陸，興致濃濃地說：“老劉可是好人，我們一起工作過 20 多年，他和錦明、老權、李質幾位很熟很熟。如果當初老劉引薦你找找我，也不至於讓我們犯反動路線的錯誤。你在師院貼出

大字報後，我們正在北京開前門飯店會議，知道後挺焦心，當然要問問高樹華是什麼人。不只我們問，華北局解學恭和李雪峰書記也問過。開始，在家值班的畢力格巴圖爾，那個老糊塗，連是男是女也不清楚，回到內蒙才知道你是什麼人了。那時要是劉盡臣能通個氣兒就清楚了，他們夫妻倆挺誇獎你。”

我問張：“你們在分不清男女的情況下，就敢確定是烏蘭夫黑手在干擾前門飯店會議，這種分析也太離譜了吧？”

張答：“從結果上看是離譜的，但分析方法沒什麼錯誤。”

“沒錯誤？你們為什麼不這樣分析——這夥年輕人，是響應毛主席、黨中央號召寫大字報。”

“我們就盯著烏蘭夫一夥，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過緊了，認為內蒙的事就是烏蘭夫的事，就把你硬拉到烏蘭夫線上了。”

被詢問者之三

沃寶田，內蒙達斡爾族，文革前是烏蘭夫的貼身秘書，很受烏重用。但烏蘭夫的夫人視沃寶田是“機靈鬼”，將沃逐出烏門，並加一頂“對烏蘭夫不忠”的帽子，沃被逼到反烏行列。沃在文革時沒任何官職，仍在高、權等左右當秘書。清查四人幫時，沃在清查之列。講清楚後，提前退休，入私人公司。沃寶田第二次婚姻娶劉少奇之女劉愛琴為妻。

1968年初，我與沃赴廣州參觀“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一路相隨間，他對我講述了發生在當年的事實真相。

“我在前門飯店會務組聽說過這事，後來你寫的大字報電文傳到北京，我們這些秘書都看了，認為大字報內容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不久，不知道通過什麼管道傳到會上一個消息，說你是女的，和烏蘭夫三兒子力沙克在一個教學組，兩人關係不清不白。大家一聽是這麼回事，便肯定了書記們的分析：這是烏蘭夫的黑手在轉移前門飯店會議方向，認為整高樹華沒錯。我回內蒙才知道你是個男的。”

我問他：“他們就靠道聽途說判斷大是大非，就敢派上百人工作組進入大學裏鎮壓，是不是這些大官們平時就這樣辦事？”

沃說：“這幫人可比烏蘭夫那幫人高明多了。烏蘭夫當政時，土左旗跑來一個社員，只要與他們沾親就能衝進烏蘭夫小院大喊大叫，說自己受了多大委屈。正因為領導班子問題太多，許多地方被走資派把持，毛主席才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沃寶田當年這段話幾乎眾口一詞，至今難從記憶中抹去⁵。

二，千把字觸動了一張網

1966年6月3日，我們的大字報立即在師院引起八級地震：院、系各級領導和積極分子如臨大敵，平時受到壓制的教職工和學生倍感振奮。實際上，如此截然相悖的反應決非偶然，它是文革前積累的種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在教師中拔白旗，反右傾；在學生中抓反動學生，批白專分子⁶。院黨委、院團委的一項經常性政治任務是劃分左、中、右，把學生搞得惶恐不安，人人自危。最致命的是劃分左、中、右與畢業鑒定、畢業分配連在一起，這是大多數學生的一塊心病。更有甚者，有的所謂“反動學生”，乾脆被踢出校門，壓到社會地層。

當權派和師生中的黨團幹部，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領導者、執行者，是當然的左派。他們隨時窺測下層群眾的動向，決不允許任何人撼動他們的政治特權和既得利益。

1966年6月，在那漫長、艱難的日子裏，我還無力作出上述分析，也遠遠沒意識到，我們的大字報區區千把字，恰恰順應了時勢的發展需求，深深地觸動了這張既得利益的關係網。權勢者必然拼死壓制，撲滅反抗之火。他們啓動盤根錯節的指揮系統，動員一些學生幹部和教師骨幹，對參與造反的黨、團員勸降，對家庭歷史有把柄的造反師生跟蹤、監視、恐嚇。

⁵ 這是1968年初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普遍認識，我亦有同感，故難以從記憶中抹去。至於今天沃寶田對此觀點有無改變，我不得而知。不過我相信，當歷史漸漸顯出本來面目時，無論當事人還是後來者，都會看清真相，相信真理，摒棄謬誤。

⁶ 指政治思想落後（即對共產黨空洞說教不感興趣），只重視專業知識學習的學生。

然而，正義之火是壓制不住的。我至今認為，甚至永遠認為，運動初期我和師生寫大字報，是對當時教育制度的壓抑，對當權者實施的人性摧殘的合理不滿，是一次必要的反抗和衝擊，抒發久被壓制的不同觀點，呼喚一種有限度自由的自發行爲。具體寫大字報的每個人的行爲動機不盡相同，但都表示支持我們四個人的大字報，抗拒院內黨、團組織發動的反撲。

學校文史一樓成爲最主要、最熱鬧的戰場。造反師生貼出一批“打倒紀之”，“打倒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大標語，對立方常以黨、團員名義貼出“打倒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打倒右派分子高樹華”之類的標語蓋在上面。你來我往的文字戰，竟連貼大字報的位置也要激烈爭鬥。

英三學生白鶴齡，內蒙通遼人，出身三代貧農，團員。平時少言少語，此時出任保院黨委的糾察隊隊長，常遊串在大字報前。如造反之徒敢把大字報貼在他守護的區域，他會橫眉立目，大聲呵斥。造反師生們利用毛領袖賜予的四大（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作爲唯一的武器，靠事實說理，大字報寫得引人入勝。

俄三共有學生48人，我任該班政治輔導員兩年，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⁷。學生與我年齡相近，處如兄弟。文革開始，班內40名學生（以團支部、班委會爲首）堅決不同意把我打成反革命，被視爲頑固堡壘。教室牆外貼滿恐嚇標語和勸降大字報，俄三學生聲明，實在沒興趣一一回應，只在對方大字報和標語的空隙處，用粗筆題數行小字，文字優雅，詼諧動人，成爲當時一景。因字小人多，只好由一個人大聲朗讀，眾人靜聽，每讀一段，便引起哄堂大笑。如：“朋友來了有好酒，敵人來了有獵槍。”“儘管狗在叫，駱駝隊照樣前進。”“真理的顏色不是權勢之筆能任意塗抹出來的。”“恐嚇不是戰鬥，污蔑造謠算無能。”

三， 院黨委退一步、進兩步的策略

⁷ 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簡稱三同），是黨組織對政治輔導員的工作要求。當年毛領袖對下鄉鍛煉的幹部和知識份子也有同類指示，即與農民實行“三同”。

大字報大標語的混戰局面一直在持續。期間，留守的內蒙黨委書記畢力格巴圖爾、代理秘書長浩帆、文委主任布赫和副主任趙戈銳先後來師院視察。他們於夜間靜悄悄地來，在院黨委書記辦公室一頓密談後，靜悄悄地去。6月4日晚十時，院黨委書記紀之召開全院大會，傳達畢力格巴圖爾書記關於在大學內開展文革的指示，要求黨員遵守黨的紀律，區分黨內、黨外界限，不能以公開形式反對任何一級黨組織等。

紀之爲首的院黨委得到內蒙書記的支持，也得到了浩帆、趙戈銳的鼓勵。浩帆對紀之說：“要沉住氣，不要大驚小怪。自古秀才造反，還不是鬧那麼幾天，怕什麼！”趙戈銳囑咐：“要壓住陣腳，準備應急措施，必要時反攻。”院保衛科長陳孟平派人搜集、整理兩種人名單：帶頭寫反院黨委大字報的，準備秋後算帳；帶頭保衛院黨委的，準備提拔重用。紀之、張學堯組織系級負責人謝春明（藝術系）、王履安（外語系）等，由陳漢楚等人協助拼湊一份檢查，準備退一步、進兩步，穩住師院局勢。

6月4日，紀之在師院教職員工大會上檢查說，“自己因跟不上形勢，犯了認識上的錯誤。”他語調低沉，稍有哽咽，並未贏得多少掌聲。會後，班級內勒令反院黨委的同學檢查，公開寫悔過書。凡在壓力下表態“打倒高樹華”，就過了關。不屈服的少數學生拒絕檢查，寫大字報公開他們被壓制的事實。

中文漢四學生李福生反抗最激烈，堅持要與紀之的院黨委血戰到底，被打成“反動學生”，成爲新升起的政治明星。爲制止李的反抗，中文系總支書記李寒威下令將李關押在學生宿舍，不准下樓，不准外出，不准寫大字報，剝奪了他的全部自由。

在中文系、數學系和物理系等一些保派占絕對優勢的班級無法存身，甚至無法生活的造反學生，不約而同地到了造反者占大多數的外語系各班級內，戰鬥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們僅靠當時不斷發表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社論來解讀文革的含義。這是力量不對等，級別反差甚大的對立。

幾百名造反學生深信自己是正確的，是壓不服的，但在惡劣的校內連立

足都感到艱難，更沒有可能搞文化大革命。他們有的衝出校外，到內蒙黨委、人委⁸上訪，告狀，有七十多位大學生咬破手指，書寫了一份血書，呈送內蒙黨委負責人。數十名跑到校外的造反學生，把大字報貼到了街上，引起極為轟動的社會效應。幾百名無法衝出學校大門的學生在院內結隊遊行。

許多年來，不少人對文化革命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視為造反者的專利。從上述畫面顯示，造反者只是一方，他們並不掌握運動的主動權。領導一切的是黨，是手握權力的各級黨組織。對弱者的反抗，評價者可以不予同情，但對於歷史事實，卻難肆意歪曲。

⁸ 等同自治區人民政府。

第五章

毛主席派來了工作組

“內蒙不能亂，趕快派工作組進駐內蒙師院”，左派書記們的決策如同發出軍令，留守呼和浩特的執行者忙成一片。

6月7日上午，首先進入師院的是以工作組長古東爲首的四個人。他們與院黨委書記紀之、政治部主任張學堯等人開會，研究對付造反師生的良策。上級黨組織支援下級黨組織（不論是非），這叫組織原則，無可厚非。

一，工作組吐出了第一個“卒子”

當晚，在各系總支書記會議上，古東正式宣佈：“工作組是內蒙文委派來的，只起協助、監督、檢查作用，運動仍由紀之同志爲首的院黨委領導。”院辦公樓內正在緊張策劃之際，這邊文史樓的大字報區，化學系辦公室主任貼出一張大字報，揭發紀之謾罵偉大領袖毛主席。這是中國最敏感的政治問題，當然在全院引起軒然大波。辦公樓的會議未散，“打倒紀之”的大標語已貼滿院牆。戲劇性變化，打亂了古東與紀之策劃好的工作步驟。

中國人十分警覺，劃清階級界限——這個解放初期的政治辭匯，在鎮反¹、三反²、反右³、四清等政治運動中被反復使用，從未衰敗，文革不過沿襲了以

¹ 毛澤東說：“鎮反是一次偉大的運動，這件事做好了，政權才能鞏固。鎮反包括：（一）社會上的反革命；（二）隱藏在軍政系統舊人員和新知識份子中的反革命；（三）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117 頁“關於鎮壓反革命”（1950 年 12 月—1951 年 10 月）毛澤東系列講話之六。

² 毛澤東說：“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 摘自《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190 頁《關於“三反”、“五反”》（1951 年 11 月—1952 年 5 月）毛澤東系列講話之三。當年也稱三反為“打老虎”。

往的全部內涵。沒人敢於保護罵了毛主席的人，堅持造反的師生自然以為抓住了紀之的把柄，幾天前被強壓而倒戈的人，紛紛改口繼續喊“打倒紀之”的口號，重歸造反隊伍。保衛派中許多師生，後知後覺，當眾說穿院黨委、院團委佈置的圍剿計劃，悔恨自己保了一個不該保的人。

中文漢三有學生 30 餘人，最早的造反者僅三、四位，後又反正。6 月 7 日後，該班有 30 多位學生，揭發系黨團支書玩弄的“將來入團入黨”的拉攏手腕，重新站回“打倒紀之”的造反者一邊。這些學生中產生了郭是海、張全棟等有名的紅衛兵運動領袖，組建了師院著名的長纓戰鬥隊，一度與滕海清在內蒙搞的“挖肅運動”唱對台戲，此是後話。

失控局面很快報告到北京，左派書記們十分焦急，急令內蒙文委全力組成“消防隊”代替紀之，儘快撲滅內蒙師院越燒越旺的文革烈火。可憐的紀之，如上級黨委手中的抹布，失去效用後被宣佈停職，甩在一邊。至今回憶，我的老院長紀之，在歷任師院院長、書記中，是水準高、工作有辦法的一位。他本人愛讀書，除了染有官僚習氣（幹部普遍都有）外，沒有吃喝嫖賭劣跡。運動後期，我出面保紀之，支援他站出來工作。

1992 年，內蒙師範大學（原內蒙師院）建校 40 周年，已在河北退休的紀之，回來參加校慶，我有幸與他見面。老人抓住我的手唏噓感歎，我亦熱淚滿面。我當面向老人家再次賠禮道歉，並以揶揄的口吻告知：“我的‘免於起訴’書上開列的第一條罪狀就是給您寫大字報，把您掛在修正主義路線上，這是我罪有應得。”老人卻一臉嚴肅：“唉，過去的事怎能算到你一個人頭上？運動後期，不是你出面保護我，處處維護我，我得被另一些人整死，難有今天。那份‘起訴書’只寫前段不寫後段是不公平的。”

“紀老，有您這句話，我什麼也不說了，我早已對公平二字失去信心。那是寫給老百姓看的。”

我和老人交談了一個多小時，這是最後一次見到他老人家。

³ 指 1957 年 5 月至 1958 年 6 月開展的名為“反對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政治迫害運動。到 1958 年 6 月以後，全國計劃定“……”

二，含淚迎來工作組

內蒙文委由主任布赫、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趙戈銳親自出面，在內蒙醫學院的四清工作隊員中，用他們行之有效的拆東牆、補西牆辦法，拼湊成一隊人馬開赴師院。同樣是“緊急命令”，凡被抽調的人員立即集合出發。請看師院工作組成員的自我描述。

外語系工作組人員張淑月⁴說：“8日中午，我們正在午休，突然有人急衝衝地敲門，把門拍得山響，我急忙拖著鞋開門，怕出什麼急事。來人傳達‘領導命令趕快集合，師院出事了’。我連鞋帶都沒來得及系，一口氣跑到集合地點，還是晚了。一位領導批評我，‘你們的戰備觀念哪兒去了？’”

化學系工作組人員汪宏才⁵對學生說：“我們被急忙抽調到師院時，領導告訴我們，師院亂得很，要發生政變了。”

數學系工作組組長姜仲原⁶說：“我們接到內蒙文委的命令，連中午覺也沒來得及睡，緊急趕到師院，就是來救火的。”

工作組一進院，立即通過廣播喇叭，召集全院師生迅速到大操場集合。古東站在體操台上，介紹自己任工作組組長，陳覺生為副組長。之後，古東宣佈了各系工作組組長名單。古東說：“工作組是黨中央、毛主席派來的，是受內蒙黨委、內蒙文委黨委雙重領導到師院來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從今天起，內蒙師院一切工作由工作組全權指揮。”參與造反的師生歡呼雀躍，操場上頓時變成自由的海洋。古東接著說：“現在我宣佈：自治區黨委鑒於紀之同志有嚴重問題，從今天起停止其一切職務。”

⁴ 張淑月，內蒙衛生廳幹部，時任外語系工作組秘書。對政治鬥爭頗有經驗和魄力。她回到衛生廳參加本單位文化大革命時，成為造反派中積極的一員。

⁵ 汪宏才，內蒙教育廳幹部，時任化學系工作組組員。當年9月，學生起來批資反路線時，汪被揪回化學系批鬥。汪回教育廳參加文革後，站在保守派一邊。打“內人黨”時，汪因參與挖“內人黨”，於粉碎“四人幫”後，被判刑15年。

⁶ 姜仲原，內蒙文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3級幹部，任數學系工作組組長。在批判工作組時，被學生批判數次。工作組解散後，姜到內蒙教育廳參加文化革命，站在保守派一邊。挖“內人黨”時，姜作為高級幹部參與。“內人黨”平反後，姜的教育廳副廳長被撤職，審查一段後，勒令提前退休。現回故鄉煙臺定居。

要紀之停職檢查，是造反師生向內蒙黨委的請求。如今，這個請求被接受了，許多人熱淚漣漣，大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這是從心底發出的真摯聲音。這種聲音，現在已經聽不到了，永遠也聽不到了。儘管古東用手勢讓大家靜下來，口號聲還是持續了幾分鐘。接著副組長陳覺生講話。這位高個子、灰白頭髮的大幹部一開口，就用河北腔質問：“你們師院是不是開大會從來就這麼亂，這麼亂呼口號！你們知道這屬於什麼性質嗎？屬於無組織、無紀律行爲！我告訴你們，不要亂呼口號，呼也可以，要有組織有秩序。我這些話可能讓你們不高興。我問你們，聽不聽黨的話？聽不聽工作組的話？聽不聽我的話？”

台下一片靜悄悄。陳覺生又說：“我們今天來，看到有些人在校園裏遊行。我問爲什麼遊行，他們說，是在校園內，又不上街，怕什麼。我現在反問一句，你說‘怕’，指什麼？你吃飽喝足地向誰遊行？向誰示威？你說沒上街，你敢！你試試上街遊行，非讓工人、農民拿大棒子把你們打回來。我現在正告你們，不准再遊行！共產黨不准！工作組不准！”

古東在一邊幫腔：“你們遊行，我們一反對，二不怕！”

這顯然是引用毛領袖對待帝國主義戰爭的用語。大會一散，工作組要求全院師生，返回所在班級和單位點名。造反師生雖被陳副組長當眾刮了顏面，他們還是以赤誠之心歡迎工作組的到來。藝術系幾位青年教師，用紅筆寫出一張大字報，題目是“感謝毛主席給我們派來了工作組”。

塞外的夏風吹得楊樹婆娑起舞，許多年輕人在樹蔭下歡聲笑語。大多數造反師生和我一樣天真，內蒙黨委終於派來了工作組，紀之被停了職，這回可以在黨的領導下搞文化大革命了。一些有經驗的年長教工，則觀著眼睛在旁觀看，工作組下一步要幹什麼。

三，一切行動聽工作組“指揮”

表面看，師院整個校園一下子進入有序狀態。從6月9日起，雖然又貼出一批揭發紀之問題的大字報，但很快被工作組的種種規定限制了。古東、陳覺生在大小會議上反復強調，要保守黨、團組織的機密；要求黨、團員內

外有別。各班在工作組員的領導下學習文件，不允許班與班、系與系之間串聯，不允許師生之間往來，不允許離開教室，一切行動服從工作組指揮，即便去廁所也要請假。工作組還宣佈，已經成立的學習小組、大字報小組和大批判小組通通解散，否則以非法活動問罪。

但形勢比人強，全國政治氣候變化極快，工作組這隻小手難遮整個天。《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在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等極有影響的文章後，又發表了一篇《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守派》的極具煽動性的力作，讓年輕的師生熱血沸騰。此時，學院像一座湧動著熔岩的火山，有誰能擋得住岩漿噴發呢。工作組卻頗為自信，他們認為站在講台上多嚇唬幾句，年輕的大學生還是聽話的。

6月7日這天，留守的內蒙黨委代理秘書長浩帆，戴著烏蘭夫反黨黑幫的帽子被揪出。幾天後，內蒙文委主任布赫（烏蘭夫大兒子）、文委政治部主任趙戈銳，同樣以烏蘭夫黑幫罪名，被內蒙黨委宣佈打倒。這些前幾天還對師院黨委面授機宜，派出工作組並發佈指令的人，頃刻間成了反黨黑幫。有經驗的工作組，對此只能封鎖消息，嚴防學生外出。他們估計得不錯，學生一旦知道真相，會質問工作組到底是誰派的，那工作組肯定難逃厄運。

6月9日下午，外語系工作組組長楊慶魁⁷與我們四人（劉樸、劉真、樓

⁸ 楊慶魁，1966年任內蒙教育廳計財處處長。工作組期間，他在執行古東、陳覺生的指示上有折扣，因此外語系的政治空氣比較寬鬆。楊明智地採用不予對立的策略。他並在外語系教師中，成立了以劉真為首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與工作組配合行動。在批判工作組的資反路線中，楊比較順利地過關。

楊回到教育廳後，站在造反派一邊。而且，楊與我的關係一直比較好。文革後期，楊慶魁先後任師範學校革委會主任、呼市教育局局長。粉碎四人幫後，楊升任內蒙教育廳副廳長，在這個位置上退休。

楊慶魁認為，文革初期學生起來造反沒錯誤。要說有錯誤，是毛主席、黨中央決策不對，年輕師生算受害者。現在清算文革錯誤，不說上面決策如何，一古腦拿運動初期年輕人是問，隔離，關押，逮捕。“全國一下子抓了1000多萬人啊，政治報復也不能這麼離譜啊！我看不慣！”

1998年夏，我與楊慶魁相遇街頭，兩個人談了一個多小時。年已古稀的楊慶魁說：“我這把年紀什麼也不怕，我只是說，對待你們這些人不公平。鄧小平打著共產黨的旗號，整毛澤東的共產黨，還不是整了自己？要不你乾脆換個旗號，鄧小平又沒那份勇氣。現在他

基立）談話。楊詢問了我的身體狀況，關切地讓我繼續看病。楊講了他自己對文革的認識（只是重複社論的話），接著問我們的意見。我們四人中，劉真年齡最大。他有兩個特點：耳背，嘴直。因他本人耳背，常怕別人聽不清自己的話，開口便高音大嗓。說平常的話也顯得多幾分激昂。他對楊說：“我們寫大字報，不管是師院內第一張還是第幾張，僅僅是響應黨中央號召寫出來，貼出去，沒覺得有什麼了不起，萬萬沒想到會給我們扣上陰謀家、反黨之類的大帽子。工作組代表黨的領導，我個人向黨組織提出請求，能儘快還我們清白，我們決不戴反黨這個帽子。”

我接著劉真的話題：“反黨分子的稱呼主要是給我加上的，說沒精神壓力是假話。我是被黨一手培養出來的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今天，我為什麼反黨？就憑這麼一張大字報？我僅希望工作組能儘快給我們的大字報做政治結論。這些天，是我有生第一次參加這麼大的政治運動，起草大字報時，根本沒料到會這麼複雜，會驚動全院。我們歡迎工作組來師院領導文化大革命。”

劉樸、樓基立都做了歡迎、支持、服從工作組的表態。

相信、擁護工作組，願服從工作組領導，是我們四人，也是當時師生的共同心願和真實情感。可是工作組對我們是不相信的，我們對此並不知情。楊慶魁笑咪咪地聽著我們的講述，不急不慌，極有城府地聽完後，才說：“你們的態度很好，很正確，我會把你們的態度匯報給古東、陳覺生同志。你們什麼也別多想，安心搞好文化大革命，要配合好工作組的工作。”

談話結束後，楊單獨對我說：“根據工作組規定，師生之間不能搞串聯，你還是從學生宿舍搬回來好。我們調查了，過去你是按黨委的決定與學生三同（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這很好，全院只有你一個政治輔導員做到了這點。今後你參加教師的活動，我們已讓系秘書安排好了，你和張貴祥住

死了，儘管人民生活富裕多了，精神和信仰呢？亂糟糟的！到處是貪官污吏，欺壓和剝削。過去老百姓手裏有‘四大’武器，可以給貪官貼大字報，公開曝光。現在可好，群眾的武器被剝奪了，貪官肆無忌憚。鄧大人改革開放有功，但他也有個小心眼兒。”

楊說，他經常和老部長特古斯交談，他們的看法完全一致。特古斯，文革前為內蒙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一位留學日本，極有才學的老幹部、老共產黨員。但一直被黨組織懷疑有民族分裂之嫌，故一生未受重用。

一個屋。”隨後，我搬出了學生二樓宿舍，結束了我班主任的工作。

6月15日，工作組召開師生員工大會，古東代表工作組作報告，題目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師院文化大革命推向一個新高潮》。會前，院、系工作組要求會上三不准：不准喊口號，不准遞紙條，不准唱歌。工作組小心翼翼，惟恐學生們一個過激行為碰出火星，再燃起大火。他們害怕師生，更害怕群眾運動。

工作組的報告，既沒有給紀之的問題下結論，也沒有肯定造反師生的行為是革命的。與會者最關心的兩個問題，工作組都迴避了。古東的報告，沒有贏得多少掌聲。

16日，工作組又召開團員大會，古、陳兩人輪流講話，要求加強黨的領導，要求團員站穩立場，要警惕不被壞人利用。壞人是誰？在哪裏？沒有明說，似乎不是指紀之。

全院大會前數天，古東專門把我們四人叫到小會議室談話。古東除了噓寒問暖，就是囑咐我們支持工作組工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我們四人納悶，古東滿嘴廢話，絕口不提我們寫的大字報，仿佛沒有發生過這件事，那為什麼專門召見我們四人？

劉真不耐煩，還是直言叫板，古東立時顯得吞吞吐吐，只說了一句這樣的話：“我個人認為你們的大字報是好的。”如此勉強的答覆，我們能聽出話音。四人有同感，我們的事沒完，要小心，工作組隨時可能劍指我們。但我們心中有本帳：文化大革命是繼“四清”後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黨中央通過兩報一刊不斷點火，毛主席是點火人，有毛主席作總後台，怕個鳥！

四，藩籬被衝破

誰也不曾料到，廣播電台播送了一條新聞，南京大學造反師生揪出了阻撓文革的黨委書記匡亞明。《人民日報》為此發表《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垮反革命黑幫》的社論。社論還歡呼中央改組了阻撓文革的共青團北京市委，並鼓動人們“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把他們鬥臭，鬥垮，鬥倒”。

這一事件，再次把工作組想熄滅的革命火種點燃起來。受階級鬥爭教育

多年的師生一聽便明白，紀之不就是另一個匡亞明嗎！於是，全院師生不再顧及工作組規定的紀律，聲討紀之、擁護中央決定、支持南京大學造反的大標語又鋪滿全院。工作組轉頭迎合造反師生，於6月17日，再次召開全院師生大會，勉強對造反的大字報表態，“這些大字報貼得好”，“劉真、高樹華等同志的行動也是好的”，並宣佈三項決定：1，撤銷師院團委副書記張曉然一切職務；2，外語系黨總支書記王履安、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李寒威停職；3，勒令藝術系黨總支書記謝春明檢查。

這幾位被勒令停職檢查的領導幹部，都是鎮壓造反者最起勁的人。例如謝春明，幾次因撕下看不慣的大字報，與學生發生口角，並口出粗言。既然工作組的統治被撼動，造反師生與工作組的矛盾早晚要爆發。果然，6月19日，師院文革又開始新一輪的角鬥。

第六章

工作組自己打垮了自己

6月19日上午，師院黨委政治部五位幹部李志文、秦維憲等，在文史樓北側貼出一張大字報，題目是《陳覺生，你搞什麼鬼？》。這張大字報，力舉陳以工作組副組長身份到師院後，對群眾指手畫腳，是非顛倒。大字報建議撤銷陳的副組長職務。

一，工作組不是毛主席派來的

出乎全院師生和工作組員的意料，一向當眾大罵群眾的陳覺生，竟然極為識相，當天把他回應的大字報貼在李志文等五人大字報旁，表示誠心接受批評，請全院師生幫他改正錯誤。兩張大字報一來一往，本可劃出圓滿的句號。偏偏有瞭解內幕的人貼大字報檢舉，說陳覺生的認錯是假，他貼出大字報後，大罵李志文等五人的建議，是否定黨的領導，一定有野心。

此時，工作組也一反常態，不再讓師生按上課鈴聲活動，取消“政治學習不准走動”的禁令，而是讓大家全天寫大字報，想寫什麼寫什麼。工作組從什麼都管到什麼也不管，令人費解，運動似乎失去了方向。外語系一位教師，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受過嚴重傷害，這次由於極度恐懼，幾乎挨個兒把同事的雞毛小事，像寫小說一樣，幾千字地寫在大字報上。於是乎，受傷害的教師再給他寫大字報，互相“殘殺”。

6月21日，李志文、秦維憲等五人，又寫出一張給陳覺生的大字報，比前一張言詞厲害了許多，題目是《“浩家店”黑幫之一：陳覺生》¹。大字報直搗陳覺生是“什麼人”這樣一個嚴重問題。指出陳是內蒙黨委宣傳部副部

¹ 所謂“浩家店”，是運動之初人們對烏蘭夫親信浩帆及其同夥（特別是文教系統當權派）的總稱，常常出現在大字報和大批判文章當中。

長潮洛蒙的親信，而潮洛蒙與浩帆，同為烏蘭夫死黨成員。實際上，工作組不可能把如此嚴重的問題捂住。此時，內蒙黨委、政府一級自治區最高機關，及下設廳、局各辦公大樓內，揭批“烏蘭夫集團”的大字報成千上萬。這是全區城市四清的繼續，也是內蒙文革的真正開始。

陳覺生的原單位內蒙教育廳，和陳工作過的內蒙醫學院四清工作團內，正揭發陳覺生和“黑幫分子”的密切關係。李志文等人大字報的內容和消息來源，正是出自教育廳和醫學院。

古東頓覺惶惶然，為防不測爭取主動，馬上寫張大字報，貼在文史樓北端，題目是《我們的態度和決心》。大字報表示：“我們堅決支持革命師生員工的每一個革命行爲。”話說得很原則，怎麼理解都好。工作組也拿起筆寫大字報，與師生平等對話，雖自掃顏面，卻又不得已而為之。²

² 口述至此，不能不對大字報本身，發一通感慨。我們難以考察大字報的歷史起因，大概同中國古人的“告示”或者“招貼”有某種淵源。在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恐怕大字報在延安整風中就曾廣泛使用過。就我們的記憶所及，1957年的“大鳴大放”（先動員知識份子給共產黨提意見）和隨之而來的“反右鬥爭”（再把提意見者打成資產階級右派）等政治運動，都曾經用過大字報這種工具。

上文已經提及，文化大革命也是以大字報為開頭，連毛澤東也寫過一張。起碼在毛澤東眼裏，大字報是個可以利用的工具。對於老百姓來說，作為無權無勢的小人物，在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出版廣播條件的情況下，能通過寫大字報，出出氣、喊喊冤，也算有個宣洩的管道吧。至於說，大字報上的內容，是不是字字有理，句句真實，那根本無關緊要。就算冠冕堂皇的正式出版物，甚至官方的喉舌，難道能保證絕對正確？沒有欺騙和水分？

然而，對於這個共產黨得心應手、老百姓也喜聞樂見的表達工具，受過文革衝擊的當權派們，卻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鄧小平復出之前，尚且允許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存在了一陣子。天真幼稚的人們，通過那座百餘米長的矮牆，表達他們對華國鋒等“凡是派”的反感，對鄧大人東山再起的希望。可是鄧小平一朝權在手，就下令封殺民主牆和大字報。從此以後，寫大字報成了罪過。自從沒有了大字報，老百姓再也沒有表達意見的任何管道。如今貪官汙吏的肆無忌憚，整個社會的加速腐敗，難道同缺乏大字報，同缺乏言論監督，沒有關係嗎？這和消滅了天敵，害蟲的滋生必定加速，乃是同一個道理。

³ 站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回頭再看當初發生的一切時，似乎每個人在運動初期的觀點、態度決定了他們一生的命運。造反的政治部幹部、共產黨員李志文、秦維憲等五人，於1969年內蒙軍管時，進入中央學習班受審查；新黨委成立後的整黨中，李、秦再次受審，五人中的另一位，被發配到離中蒙邊境數百里的蘇尼特左旗，再沒回來。粉碎四人幫後，李、秦仍未倖免，秦被判勞教一年，釋放後提前退休。李調出師院，在內蒙建委當了一段時間處長，由於告狀者不斷，離開處職，在建委下的一家建築公司任負責人。而物理系的五個人，在1967-1969兩年內受到造反派壓制，70年代軍管期間，培養為黨的接班人，後來均

當陳覺生被點名，古東寫出大字報後，多少天來師生們對工作組的不滿、怨恨，如洪水般沖溢出來。

藝術系幾位年輕教師，於6月23日寫出他們第二張給工作組的大字報，題目是《師院工作組不是毛主席派來的》。人們怎能忘記幾日前，他們滿含熱淚用紅字書寫的，也貼在此處的那張《感謝毛主席給我們派來了工作組》的大字報。

第二天，校園出現了一批保衛工作組的大字報。最引人注意的，是以蒙文林爲首的物理系五名黨員教師的大字報《一論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副標題是“駁師院工作組不是毛主席派來的”³。

師院的運動到了這一地步，許多問題引起人們的思考：陳覺生是不是黑幫分子？工作組到底是誰派來的？內蒙黨委和人委發生了什麼事？前幾天浩帆還坐著小臥車到師院視察，幾天後聽說掛了牌子挨批鬥。我和許多師生一樣，有個急切的願望，就是進入內蒙黨委或人委機關去看看大字報。孰知，進政府機關大院要單位證明信，一般師生是不可能辦到的。相比較，進內蒙文委機關稍容易些，可在午飯後，趁值班人員午休時溜進去。

一天中午，我頭頂烈日，忐忑地躲過文委看門人的視線，偷偷進了這座神秘的大院。這是我第一次進入高層機關，如同劉姥姥進大觀園，陌生又有幾分恍惚。一張張大字報上曝光的人和事，聞所未聞，讓我無比震驚。共產黨高等官邸，能幹出這麼多污七八糟的事！我心目中那個“偉大”光環頓時減色。

之後幾天，我連連去了市委機關、內蒙醫學院和文化局大樓看大字報。吃驚的事情越看越多，心中的迷霧隨之散去，大有茅塞頓開之感，我終於明白，1964年四清以來，毛主席、黨中央爲什麼提出重點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毛爲什麼要發動文革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

二，工作組吐出第二個“卒子”

工作組副組長出了問題，組員們不能不認真思考，謀求對策。受工作組訓斥的學生抓住這一時機，主動與工作組員對話。

物理系學生在辦公樓前遇到古東，當面請教陳覺生到底是什麼人。古東答：“現在下不了結論，有事實就揭發嘛。”

政教系工作組長吳鳳德，在回答學生提問時說：“我想，如果陳覺生是黑幫分子，黨委一定不會派他來工作組的。”⁴

外出看大字報的人，把所見所聞作為重型炮彈“貼”回師院，讓呆在院內的師生大開眼界。一段時間，師院的大字報內容極廣，上及內蒙黨委大人物，下到各系工作組組員。王賢敏是內蒙文化局一位女處長，此時為藝術系工作組組長。她管理藝術系的女同學，如同婆婆管兒媳婦。藝術系的學生何時受過這份窩囊，與王賢敏嚴重對立。當內蒙文化局送來給王寫的大字報時，藝術系師生主動配合張貼。於是，王最早被“請”回原單位。

解放後，還沒有哪次政治運動，實行過像文革這樣的“大民主”，群眾可無視頂頭上司，除了毛本人以外，不必看任何領導的眼色，自由發表見解。以往享受特供的有勢有權者，紛紛受到審查；以往被踩在腳下的小人物、最為權勢者看不起眼的芸芸眾生，終於揚眉吐氣了⁵。

內蒙師院主幹道的兩側，用木桿架起竹席做大字報欄，上方裝有電燈。大字報時常更換，引來一批批觀眾，連家屬院的老頭、老太太和小學生，也

⁴ 吳鳳德文革後在共產黨體制下官運亨通，從處長升任廳長和內蒙人大、政協的秘書長等職務。

⁵ 從中國的歷史進程看，或者說站在人民大眾政治覺醒的高度看，多數老百姓破除對共產黨官僚的迷信，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58年的大瘋狂到三年饑荒餓死人，暴露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治國無能，從體制上失去了對中共政策的信任；第二個階段便是文化革命，通過近距離同當權派的較量，又破除了對各級官僚的個人迷信，意識到他們並非由什麼“特殊材料”製成，其中一些人，原來也不過是些廢物草包，平常顛預無能、養尊處優，一旦喪失權力，則平庸得可憐，往往連一個普通群眾的智慧和能力也不如。

雖然文革之後的改革年代，中共一再強調什麼“幹部四化”，試圖扭轉老百姓對官僚的印象，重塑其權威，無奈幹部制度不變，等級授權制不變，人才的“逆向淘汰”機制仍在，“四化”之後的新一代領導人，儘管年紀輕、文化高、學歷高，但執政能力和人格魅力，反而一代不如一代。

在晚飯後一群一夥地在燈下看大字報，邊看邊議論，饒有興味。

工作組終歸保不住陳覺生了，既保不住便採取踢出去的办法，以便能夠摘清自己。6月24日，工作組12人以原醫學院四清工作團名義，寫出一張大字報，題名《初揭內蒙黑幫的分號內幕》，把陳覺生列入第四名，確認陳為“黑幫幹將”。大字報署名者以古東領銜，包括幾天前反問學生“黨委會把一個黑幫分子派到師院工作組嗎？”的吳鳳德、汪宏才等。

同一天，另一張以工作組名義寫的大字報“堅決和全院革命師生員工大幹革命”面世。大字報承認，6月3日以後，趙戈銳、浩帆等到過師院，給紀之面授機宜，讓他“趕快行動，採取措施，並跟上去”。大字報揭發：“陳覺生死保紀之，在群眾會上用‘反黨’和‘開除黨籍’恫嚇手段，打擊革命的左派，使師院的文化革命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6月24日，工作組又出台第三張大字報“陳覺生的補充講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署名是以古東為首的22位工作組員。公開聲明要“向一切牛鬼蛇神展開堅決鬥爭”。

工作組在6月24日這一天之內，接二連三貼出大字報，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只有陳覺生是反對文革的。外語系俄四八名學生，稱工作組是師院文革的絆腳石，必須立即改組。中文漢四的大字報指出，“決不是陳覺生一個人的問題”。

有人問：“工作組裏，除陳覺生掛在了黑幫線上，王賢敏被文化局揪回去，揭發出XXX，還有XXX，工作組內到底有多少牛鬼蛇神？”“你們半個月前，說自己是毛主席派來的，偉大領袖就派出你們這樣幾位，蔥不像蔥，蒜不像蒜！”

師院師生含熱淚歡迎的工作組，僅僅過了十多天，成了全院師生的靶標，質問、揭發、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越來越多，保工作組的大字報越來越少。工作組進院後重用的積極分子也不敢公開表態了。無奈之下，他們與工作組暗中策劃，另尋出路。在院辦公室工作的陳漢楚，外語系黨總支負責人王履安，開始在高樹華與烏蘭夫三兒子力沙克的關係上尋找瑕疵，秘密策劃，想搞出點什麼名堂來。

三，工作組內相互“殘殺”

被工作組拋出來的陳覺生豈能咽下這口氣，他當仁不讓，於6月30日寫出三張回擊的大字報。陳的大字報標題是“古東，請你不要再做投機買賣”。文中寫道：“在醫學院四清工作團時，本來是一塊兒幹的事，如今，古東出爾反爾。”另外兩張題目為，“古東，你究竟想幹什麼？”“古東，你不要血口噴人！”以題目的措辭和標點，不難看出陳覺生的不平和憤怒。

我和劉樸、劉真、樓基立看了陳覺生大字報後有同感：陳覺生剛到師院時那樣跋扈，如今卻落得如此下場，他肯定有千言萬語要說，要為自己成了犧牲品鳴不平。

憤怒的陳覺生繼三張大字報後，轉而給韓明下一道戰書——“質問韓明”，個中緣由因韓明而起。

陳覺生情急之下，曾打電話給工作組的直接上司、新任（在烏蘭夫之子布赫被揪出後）內蒙文委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組長韓明。當初是韓明親口點將，把他塞進師院工作組當副組長的，如今為何成了反黨分子？陳要求，由內蒙文委向師院送大字報，肯定自己是革命左派。韓在電話中百般安慰陳，向陳保證，他會想辦法從領導角度支持他。

陳覺生眼巴巴等到6月28日韓明到院，他哪裏料到，韓明不但未給陳解套，反雪上加霜，把陳與紀之均列入“壞人壞事”。韓明在大會上說：“我認為師院的革命形勢一派大好。在20多天時間裏，貼出上萬張大字報，揭出紀之、陳覺生等許多壞人壞事，這是任何一次運動都比不了的。”針對此言，陳覺生在大字報中質問韓明：

去年9月份，我到醫學院檢查工作，不是經你（當時的黨組成員、教育廳長）和潮洛蒙（黨組書記）把我抽去的嗎？開始檢查工作階段，你和潮洛蒙親自參加並直接指揮。……我作為工作隊一員，參加了開會討論、提意見，怎麼現在從你嘴裏說我是壞人，而你們反而又成了紅人呢？你們這樣說不感舌根發軟嗎？你們怎麼跟誰都是紅人

呢？

陳覺生 6.30

陳覺生的強硬態度，令韓明、古東和工作組驚恐不安。若陳把老底翻出來，那他們豈不是與陳同樣下場！於是乎，古東的 17 個工作組成員寫出大字報“陳覺生爲什麼造謠？”。

工作組古東、汪宏才、袁俊芳在另一張大字報中，只有怒斥，扣大帽子（可見，上綱上線不是造反派的專利），欲把陳置於死地。工作組長古東在內蒙文委負責人韓明的支持下，依仗手中的權勢，使出一套政治功夫：怕陳反咬一口，一棍子將其打垮。

1966 年我還很幼稚，仍認爲陳覺生壞，古東滑。我把工作組相互殘殺，前後言行的極大反差，看作是工作組內個人之間的政治遊戲，根本看不到變故的直接操縱者韓明和他背後的支持者，更看不到這是文革中，各種政治勢力的微妙關係導致的必然現象。無論我多幼稚，有一點我不願看到——工作組自己打垮了自己，我真心希望工作組執行毛的革命路線，把師院文革領導好。

事態瞬息萬變。古東、韓明爲代表的領導集團，並不從自身執行的路線找緣由。反而認爲，工作組所以在師生心目中變得臭不可聞，是有壞人把工作組整垮了，爲首的壞人就是高樹華。所以，他們緊鑼密鼓地組織人，給我編造“過硬”材料。我和許多造反師生實屬政治幼兒，絲毫沒感到大禍將至，仍然事事請示工作組，直接給韓明和左派書記寫信，以示自己對黨組織的忠誠和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四，起死回生的時機

工作組內自我混戰，無暇它顧，乾脆放棄了對師院的領導。工作組進院後重用的革命骨幹、積極分子不敢公開表態，遂與工作組暗中商討起死回生的良策。紀之時代那幾位把我推向“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的人物，計劃再

次起用這張王牌，利用我與烏蘭夫三兒子力沙克的關係，擒賊先擒王，挽救工作組，也挽救他們自己。

這時，中文系漢語三年級幾個同學，提出由革命師生組成“左派學生委員會”，領導師院文化革命。師院學生會副主席趙玉娥，是外語系英語三年級學生。她出於好意，組織一些學生會幹部討論這一倡議。工作組對此事十分敏感，懷疑高樹華在背後操縱。所以，“左派學生委員會”的倡議剛一露頭，就被工作組定為反黨篡權的大毒草。工作組立即指揮人馬圍攻趙玉娥，這位 20 多歲的姑娘，一看不好，趕快檢查，承認錯誤，卻得不到赦免。趙哭哭啼啼，精神緊張，呈半瘋癲狀態。多虧校醫室醫生出面呼籲，保護趙避開運動，及時治療，方轉危為安。

無獨有偶。外語系俄語三年級學生任作霖，建議成立“師院文化大革命臨時指揮部”，結果工作組再次組織圍攻，稱任是個“反動學生”。

因趙玉娥和任作霖均為外語系學生，圍攻者斷言，這些人背後的真正奪權陰謀家是高樹華。

雖然我並不知道任的建議，趙確實問過我，我無權阻攔院學生會研究什麼問題。為澄清事實，避免工作組找藉口作文章，我們寫了一張大字報《我們的態度——答某些同志的大字報》。現引證如下：

6 月 8 日前後，我們曾聽到或看到有的同學有如下說法：“跟著高樹華鬧革命”，“向高樹華同志致敬”，“外語系文化大革命由高樹華、劉樸同志來領導”等等。對於這些極其錯誤的言論，我們當時就表示堅決反對。六月九日晚，我們又以口頭和書面形式，向工作組長古東同志表明了我們的態度，並建議工作組制止這種不良現象。後來，我們還取下了類似的大字報。

關於數四(一)XX(姓名略——作者)同學的大字報中所提到的“高樹華革命精神萬歲！”“高樹華萬歲！”“以高樹華為首領導外語系和全院文化大革命！”“高樹華等同志是堅定的革命派，誰攻擊他們，懷疑他們，誰就是反動派”等等言論，原來我們根本沒有聽到見

到。如果上述說法屬實，也是極其錯誤的（不論主觀動機如何），我們堅決反對。

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認為：黨的領導是革命事業的根本保證，離開黨的領導，離開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一切。……任何忽視甚至否定黨的絕對領導，抹殺廣大革命群眾的作用，誇大個人成績的言行都是極其錯誤的，反動的，都應堅決反對。

爲了澄清事實的真相，並根據一些同志的建議，我們特作以上說明。如果有人企圖利用上述錯誤言論來攻擊我們，這是徒勞的。

外語系 高樹華 劉 樸

劉 真 樓基立

六六年七月一日⁶

儘管事發幾日內，我們鄭重聲明了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可是，本與我毫不相干的事卻跟隨我許多年。中共內蒙黨委左派書記高錦明在反掉烏蘭夫後，一直是內蒙古地區炙手可熱的人物。他一直認為，師院運動初期的事，包括成立“左派學生委員會”，說明“高樹華的政治品德不純”。粉碎四人幫後，專案組對我審查時，又舊話重提，認定我參加文化大革命，開始就懷有篡黨奪權的野心。

外語系俄語專業三年級學生任作霖，1968年畢業時，任班內畢業學生分配小組長。他雖第一次掌握如此實權，卻把留在呼和浩特、包頭等大城市的機會留給了別人，和相愛的同班女同學牛志舒（牛的家在呼市，本可留在市內）一起回到任的家鄉哲里木盟奈曼旗大沁塔拉鎮中學當教員。任與牛回家途經北戴河下車，在海邊撮土一抔燃香三柱，雙雙對大海跪拜，作爲結婚儀

⁶ “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在當年是一條不可動搖、不可逾越的政治界限，像我這樣領頭造反的人，同樣對此信條誠惶誠恐，唯恐被人懷疑在取代黨的領導，這是絕對大逆不道的。當時黨在人們心目中是光輝萬象、至聖至明又神秘莫測的。三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對此表現出含蓄的譏笑或不屑一顧，公開的怨怒和嘲諷並不少見，時乎，勢乎？時間老人將給我們最後的答案。

式。

後來，兩人均成為校中教學骨幹。牛教英語、俄語，任主動充任校內最缺的體育教師，並抓全校學生的體育鍛煉。一段時間，該校學生男女排球隊，在全盟中學排球聯賽中，保持數年冠軍。任以此為榮，認為是自己一生中最為光彩的一頁。

任在校的另一絕活是養豬。任與牛生有三個兒子，因家貧，任在自家院內養四口豬，早晚親自打理，故豬長得高大肥碩且皮毛發亮。任自嘲曰：“我養豬四口，每口為一個兒子頂學雜費，餘一口歲末殺掉，為三子增加營養。”同學常引為笑談，我卻以為任是大智若愚。

粉碎四人幫後，任被停職，檢查運動初期與高樹華的關係，特別是提出成立“指揮部”之事與高有何密謀。任堅持原則，數日後再也無人計較，繼續當體育教師。任作霖說：“1968年畢業時，我預測有人要秋後算帳，沒想過了十多年，平常小事一樁，無證無據，還揪住人不放。”⁷

⁷ 進入二十一世紀不久，六十剛剛出頭的任作霖，突然在家鄉因病早逝。據熟悉他的朋友私下透露，這和他長期受到精神壓抑不無關係。可歎人世間又少了一株棟樑之才。內蒙古原造反派成員中，其他英年早逝的例子還有許多。

第七章

工作組的尙方寶劍

當台前的工作組陷入僵局時，古東、陳覺生身後的內蒙文委負責人韓明，漸漸現身。韓明在烏蘭夫設五大委之前，曾任內蒙古教育廳廳長，之後任內蒙文委黨組副書記。當布赫、潮洛蒙及趙戈銳被作為“烏蘭夫黑幫分子”揪出來後，韓明得到左派書記王逸倫支持。幾十年體弱多病的韓明，不放棄被重用的機會而離開病榻，但又沒膽量站在第一線面對師院的造反群眾。

一，從幕後走到台前

眼看古東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在內蒙黨委值班的書記王逸倫，對師院的事極不放心。他對韓明說：“你去師院對師生說，工作組是內蒙黨委派的，怕什麼，這是對你的考驗。”話到這份上，於是韓明硬著頭皮於1966年6月28日下午，到內蒙師院作報告。

韓明讓古東給他準備一份講話稿，古東交待秘書袁俊芳抓緊起草。講話初稿成型後，6月27日，韓明乘夜幕偷偷到了師院辦公樓小會議室。古東召集系工作組頭頭楊慶魁、姜仲原等人就初稿進行討論。

韓明報告的出籠，在1966年9月5日後一張大字報上有記載，大字報署名為外語系《全無敵》戰鬥組東方曉、向陽、孫要武。這是英三幾個學生的化名¹。

9月5日我們到文委找楊慶魁同志說了幾個問題。楊慶魁說，6

¹ 以革命性辭彙取代原來不夠“革命”的名字，這在文革初曾經是一種時髦，甚至迫於壓力，不得不改。例如，劉富貴變劉奮鬥，張進財變張勤勞，陳學修變陳反修等等。除了人名之外，改街道、公園、地區名等，也成為風氣。例如北京外國使館比較集中的東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就曾改成反帝路和反修路。據作者所知，此處《全無敵》戰鬥組三位成員的名字，其中東方曉和向陽為筆名，孫要武則是新改的“革命化”名字。

月28日韓明的報告是袁俊芳（工作組組員，古東的秘書——作者）起草的，我們幾個也給修改過。在開會前，韓明當時很猶豫，我們告訴他，同學們已經集合好了，你就給講一講吧，他這才答應。在講話中，他講的與原稿不大一致。如戴高帽子一事，原稿根本沒有。再如“你是黑幫，你就站出來讓大家鬥臭、鬥垮、鬥倒”，原稿也沒有……

韓明的講話代表著上至內蒙古黨委、下到師院工作組這樣一個勢力集團。此時，內蒙古的其他高等院校也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與師院毗鄰的內蒙古農牧學院、林學院、內蒙古大學及城北的內蒙古工學院及市內多所中專、中學都有師生寫出了大字報。韓明在師院的報告記錄稿，從不同管道傳抄到各大學、學院，為那裏的工作組起了支撐作用。

二，混戰動員令

爲了清楚說明當時尚在掌權的某些官員的心態，我們稍微引證一點韓明的報告，它足以代表中國掌握省級教育大權的高級幹部，在當時的水準和心理狀態。

大家都轟轟烈烈鬧革命，你不亮明旗幟怎麼行呢？必須得亮明，就這樣，我來了。我就懷著這個心情和大家見面的。我瞭解情況不多，講錯了你們把我揪出來。醜媳婦不怕見人，哪兒難看就修修哪兒。我想講什麼問題，腦子裏雜亂無章。最近你們都看了我們文委的大字報了，文委裏的無產階級左派和資產階級當權派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

我認爲師院的革命形勢和全國、全區所有高等院校一樣，是一派大好形勢。在二十多天時間裏，貼出上萬張大字報，揭露出紀之、陳覺生等許多壞人壞事。這是任何一次運動都比不了的，是一個空前的運動，一點不假。……

這麼大的群眾運動出現一些小毛病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

的。恰恰在這一點上，我們工作組跟不上形勢，跟不上群眾。他們現在經過檢查，認識了這一點，表示堅決站出來和群眾一道來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你們從工作組裏揪出了陳覺生這個壞人，這是很大的成績，很了不起。我們派人時審查不嚴，壞人混了進來，這是工作組的問題。另一方面運動剛剛起來，很難分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等運動深入就辨清了，矛盾也就解決了。許多單位要求派工作組是可以理解的，但搞革命是靠群眾自己，是自己的事，自己揭發自己。我們派工作組有許多框框，也看不清誰是真革命，誰是假革命，那怎麼辦？你們問我，工作組裏是不是有壞人，工作組就是黑幫。看問題不能那麼看，工作組裏有壞人就是壞工作組，是誰派來的誰就是黑幫、黑店。……

這一次，你敢不敢站出來鬧革命，就是對你的實際考驗。如果你自己是黑幫，就歡迎大家把你揪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鬥臭、鬥倒，以後重新做人，這才是真正鬧革命，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迴避是迴避不了的。工作組出現壞人，要處理，撤陳覺生工作組副組長的職，大家繼續揭發批判。你們大字報不是揭發出來他是浩帆、潮洛蒙黑幫的一個打手，你們就揭，就批，使工作組進一步純潔起來。

上面一段是韓明講話的中心，明著也批評了工作組，實際給工作組打氣。按他的地位，他出來講話只能這樣，可是又通不過。這正是當時沒被打倒仍堅持工作的領導幹部普遍的難處，幾乎是無法克服的難處。連劉少奇、鄧小平派出的工作組後來也得認錯，以韓明一個地方上的廳級幹部，當時根本無法看清這步棋裏深藏的奧妙和殺機。

三，混戰的序幕

外語系教師在電化教室討論時，一致認為，韓明雙腳站在工作組一邊，貌似公正，實際上給工作組打氣，沒有真正肯定革命師生的具體行動，連外語系的第一張大字報都不提。而且，講話有數處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水準

比一般師生只低不高。主持會議的工作組員聽了這樣一些評價，自然不高興，卻沒有勇氣站出來反駁，只有加緊記錄，向上匯報，等待時機，秋後算帳。

第二天，院內出現一大批質問、反對韓明講話的大字報，有代表性的一張是外語系英語教師張貴祥²等人6月29日寫的，題目是《一篇違反毛主席思想的講話》。該文點出韓明講話三條錯誤：“一，把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當兒戲”，認為韓的講話“時而說笑話，時而胡扯，態度極不嚴肅”；“二，與毛澤東思想唱對台戲”，其中引韓說的“如果你是黑幫，你應該歡迎大家把你揪出來，把你放在光天化日之下，鬥臭，鬥倒，重新做人”。張貴祥等人質問：“按照韓明的邏輯，反動派是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黑幫會立地成佛的。照此辦理，修正主義根子就可剷除，何必要搞群眾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三，死心塌地地站在執行‘浩家店’修正主義路線的工作組的立場”。大字報緊抓住工作組是誰派來的這個問題，戳穿韓明“工作組是內蒙黨委派來的”提法是謊言。

有人還指出，韓明的報告是混戰一場的動員令。這是很深刻的見解，事後證明，韓明滿臉笑容手握尚方寶劍進入師院，導致了一場空前的混戰。

進駐師院的20多名工作組員中，李慶曉是有勇少謀、好出風頭的人。六月初，剛進入體育系，李便採用高壓政策，對體育系內幾名寫大字報反紀之的人打了一悶棍，悶棍重點打在了陳時光和劉孝信兩名學生頭上。陳是體育系二年級的班長，劉是三年級團支部書記，兩人是系內學生中出類拔萃的人物。李慶曉還在教師中抓了剛剛畢業留校不久的年輕老師張元。李把三名普通師生作為運動的大方向，逼迫三人連續檢查，鼓動師生批判他們。

劉、陳兩人在系內、班內有一批支持者，形成與工作組對立的態勢。李利用積極分子衝鋒陷陣，把體育系控制起來。李慶曉還動用公安手段，查了劉、陳的三代家譜，從劉孝信已死多年的祖父輩上抓到剝削人民的證據；發現陳的家庭歷史複雜。遭李慶曉壓制的少數師生在體育系無法待下去。

² 張貴祥，上海浦東人，安徽大學畢業，于六十年代初被分配到內蒙師院任教，深受學生好

六月底，工作組內部，除陳覺生外，古東懷疑外語系楊慶魁、數學系姜仲原等五、六個系級工作組長與他貌合神離，大有江山不穩之憂。韓明一再爲古東打氣：“甩開他們，我們幹。”

體育系受壓制的學生終於衝出包圍，與外語系部分造反學生串聯，訴說李慶曉一進院就把師院造反行爲定爲匈牙利反革命事件³，引起外語系學生不滿，立即與李慶曉當面辯論。李慶曉自知理虧，抱著死不認帳的態度與外語系學生周旋，後來乾脆蹲在地上不起來。

多少天來，被李慶曉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幾個體育系造反學生氣憤不已，其中一位把身上裝的報紙疊成一頂紙帽子⁴，被外語系來辯論的學生，順勢扣在了李的頭上說：“若再迫害體育系造反師生，再膽敢口出狂言，便砸爛你的狗頭！”隨之大家散去，只有狼狽不堪的李慶曉孤零零一個人蹲在原地。

這場辯論不過半個多小時，紙帽子在李頭上不過幾分鐘，體育系保工作組的人把這件事渲染全院，引起院內保工作組師生的反感，他們爲李慶曉鳴不平，用大字報討伐外語系，討伐紙帽子。也有人貼出大標語：“向李慶曉學習，向李慶曉致敬”，抗議“對革命左派李慶曉的迫害”。這場鬧劇像流星般過去了，它只是一齣即將上演的正戲的序幕。從幕後走到台前的韓明挑起的群眾混戰，權勢者與無權著的較量看來已不可避免。

四，大魚浮出水面

我們四人於 1966 年 6 月 28 日給工作組貼出一張大字報《工作組是“浩家店”黑幫的反革命別動隊》。“別動隊”這個詞在大字報上屢見不鮮，問題

³ 指 1956 年匈牙利發生的大規模群眾起義，最後導致蘇聯出兵鎮壓，總理納吉被捕並處死。毛澤東時代，蘇聯東歐集團和中國政府，都把匈牙利事件定爲反革命暴亂。柏林牆倒塌之後，歷史重寫，屬於人民起義的革命行動。參見學苑出版社《歷史詞典》有關條目（北京 1999 年 2 月版）。

⁴ 戴高帽之風，並非始自文革，更非始自體育系同學批判工作組。如果追根溯源，可以挖到中

的關鍵不在於用什麼辭匯，而在於這張大字報是誰寫的，尤其是我。工作組在古東率領下，由韓明指揮早已布下大網，只等待我浮出水面，即使我不寫這張大字報，工作組業已對我排下了圍獵的人馬。他們認定我是師院造反的禍根，只有整倒我，才能改變他們自己倒楣的處境。

下面摘引這張大字報⁵：

工作組是“浩家店”黑幫的反革命別動隊

.....

當師院革命師生的熊熊烈火怒燒以紀之爲首的牛鬼蛇神的時候，“浩家店”黑幫如臨大敵，下了一道“緊急動員令”，調兵遣將，糾集了一個以古東、陳覺生領頭的工作組，他們帶著“浩家店”黑幫“緊緊抓住領導權”，“穩住陣腳”等密令，火速趕到師院，忠實地執行了“浩家店”的反革命政治路線，企圖撲滅師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個打著“革命”旗號的工作組，十分害怕革命的大字報，並加以種種限制。

這個打著“革命”旗號的工作組，對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大潑冷水，動輒用“破壞組織紀律”，“反黨”，“反領導”，“不聽話”等等名義來打擊革命群眾。

這個打著“革命”旗號的工作組，對黨內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百般包庇，該罷官的不罷官，該撤職的不撤職，該鬥爭的不鬥爭，至今還有一批民憤極大的牛鬼蛇神逍遙法外，並受重用。

在這一系列反革命活動中，除黑幫陳覺生外，還有一批“出類拔萃”

⁵ 毋庸諱言，從內容、寫法到文字風格，這都是文革中一張典型的大字報。其中完全套用當時兩報一刊文章的語氣、觀點和分析方法；內容只蜻蜓點水，不過多重複事實，靠政治口吻的強硬壓倒對方，靠上綱上線置對方於死地，靠排比相連一氣呵成的寫作風格，增加文章的氣勢和殺傷力。結尾時，加一段“區別對待”的無產階級政策，以示大字報的正確性，與大字報開頭引用“社論”一樣顯得有根有據。最後以表革命決心方式結尾。

幸好，這一切都成過去。現在相對而言，人們能夠平心靜氣地相處，每個人有多元的選擇自由，那些政治上的恩恩怨怨不再象噩夢般纏人。

的人物，如王賢敏、王志田、姜仲原、李慶曉等。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

.....

他們的反革命行徑給師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工作組充當了“浩家店”反革命黑幫的別動隊。

我們相信工作組內的革命同志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徹底揭露這支別動隊的內幕，和全院革命師生一起清除黑線，打垮黑幫，徹底鬧革命。

我們再次重申，工作組必須徹底改組，只有這樣才能把師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外語系 高樹華 劉真 樓基立 劉樸

6·28

說明：

我們的大字報貼出後，一些同志對大字報題目提出意見。經過慎重的考慮，我們認為題目不確切，現改為《工作組充當了“浩家店”黑幫的反革命別動隊》，大字報內容不變。

外語系 高樹華等四人

6·30

這張大字報引起相當關注，被許多人看作一種政治動向進行分析，當然也成為工作組多日來虎視眈眈的獵物。

文革中，人們的政治表現既狂熱又十分慎重。我們貼出這張大字報當天，李志文、秦維憲主動與我商榷。他們是政治部和保衛科的幹部，政治經驗較多，消息比較靈通。他們在師院最早貼出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是我相信的幾位人士。在辦公樓政治部的一間辦公室，他倆和幾個同觀點的朋友，為我們分析了“別動隊”這張大字報，指出幾點在文字上容易引起歧義的地方。他們建議我儘快貼出一張詞句更改的說明，盡可能不授人以柄。李志文以頗

有經驗的口吻對我說：“其實大家都知道，你當學生時就是政治好、學習好、出身好、思想進步的人才。但現在你帶頭寫了大字報，工作組正四下搜集你的材料，你不能不小心。你要有思想準備。當然了，只要你做得對，我們永遠支持你。”⁶

我完全接受了李、秦兩位善意的提醒，於7月1日以四人的名義，再貼出一張大字報《我們的看法》，承認“別動隊”一詞有欠妥當，做了某些詞句修改。但我們堅持認為，工作組的錯誤是“根本指導思想和路線的錯誤”，這與半年後由上而下開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不謀而合。

⁶ 當事人對別人的許諾和表態，是以政治條件為前提的，如“只要你做得對”，“只要你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只要你的鬥爭大方向正確”等等。有此前提，可保證支持者不受牽連，既表態了，又有防備，不失為政治上的萬全之策。可以說，這是文革中流行全國上下的思維邏輯和表達方式。

第八章

權勢者與無權者的論戰

在官場闖蕩多年的韓明，善於利用手中實權來改變政治劣勢。他和工作組長古東一致分析：師院群眾敢如此造反，全不把工作組和他放在眼裏，源頭出在領頭造反的高樹華身上。如今，這條敢於把池水攪渾的大魚露了頭，工作組起死回生的時機已經成熟。工作組首先在外語系尋找敢於與高樹華抗衡的人。古東指示，要把目標鎖定在過去的黨團幹部和積極分子，要幫助他們寫好反擊的大字報。

一，外語系 16 人

外語系工作組員的動員能力不同尋常，外語系俄四原反工作組的 16 位同學終於改變了原來的選擇，書寫了一張支持工作組的大字報。這 16 位同學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王清良、王舉高、李玉亭三人。王清良是團支書，王舉高是班長，李玉亭是團支委。王清良、李玉亭是 66 年 5 月 4 日剛剛入黨的新黨員，十天前，他們寫過一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是師院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必須立即改組》。

現摘抄“絆腳石”大字報如下：

……現在的問題越來越清楚了：工作組不是黨中央、毛主席派來的，也不是內蒙黨委派來的，是“浩家店”黑幫分子派來的。工作組不負其主子的期望，充當了紀之黑幫分子鎮壓師生的別動隊。

工作組進院製造各種清規戒律，嚴密封鎖消息，水泄不通，黨中央和內蒙黨委關於文革的指示不給宣傳，更談不上貫徹執行。

工作組內部嚴重不純，除了兩個組長大有問題外，大多數系級領導人充當保皇派角色。

……他們已成為我院文革的絆腳石，因此我們建議內蒙黨委迅速派人來我院徹底改組現在的工作組，領導我院廣大師生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該大字報印刷稿未具寫作日期。1998年12月，我曾向作者之一的劉某查詢，他回憶說：“就在你們那張‘別動隊’大字報前幾天。”我分析，這張大字報寫於1966年6月24日到28日之間，離另一張觀點立場完全相反的大字報僅一個星期。文革中這不稀罕，對此不作評論。在此引證，只想提示一下，我們四個人在6月28日寫的大字報，與上述8人大字報在觀點語氣方面基本雷同，連“別動隊”這個詞也甚為巧合，應該說，我們四人的大字報有抄襲之嫌。

言歸正傳。在工作組的動員下，外語系俄四16名同學的大字報貼到文史樓前最顯眼的地方，題目是“高樹華等人《工作組是‘浩家店’黑幫的反革命別動隊》的大字報是射向內蒙黨委的一支毒箭”。

大字報第一段沿用了工作組員引導師生認清大是大非的政治指導語氣。第二段先承認“工作組在開始時，由於被‘浩家店’黑幫分子插了一腳，因而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第三、四段，邊引用邊駁斥了“別動隊”大字報對工作組是惡意中傷和對黨的污蔑。第五段為該大字報的主要論點：

工作組是內蒙黨委派來的，……高樹華等四人不但不相信內蒙黨委，反而進行惡毒攻擊。……你們[這裏有人稱轉換，原文如此——引者]把內蒙黨委和“浩家店”黑幫相提並論，把工作組來師院領導文化大革命污蔑為企圖撲滅師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明目張膽地與內蒙黨委唱反調，你們的目的無非是把工作組一棍子打倒，置其於死地，取消內蒙黨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我院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在黨中央和毛主席領導下的革命群眾燃起來的，這一功績絕不能記在你等四人的功勞簿上。你們妄圖借之攻擊黨的領導，否定和

取消黨的領導，這是白日做夢！黨的絕對領導是絲毫不能動搖的，誰要取消黨的領導，我們就和誰鬥爭到底！……

這第五段中，表達了工作組一進師院就想說但又無良機出口的話：“你等四人寫第一張大字報的動機不純，暗藏野心，始終沒機會抓你們，這回等於揪住了狐狸尾巴。”

俄四 16 人大字報在工作組和工作組培養起來的積極分子看來，如東方的曙光、雨後的彩虹般動人美麗。立時，這張大字報周圍貼上了數十張支持、聲援、鼓勵、致敬的大字報或標語。工作組長古東樂滋滋地說：“外語系終於有人殺出來了！”

師院最有名的保工作組積極分子，如數學系于金煥，政教系魏金光、陳鳳霞、傅元占，外語系教師劉漢明，數學系教師李漢良等都從暗處走了出來，大有“天晴了”之感。

這樣一呼百應必然引起造反師生的警覺：工作組及其積極分子們要幹什麼？

時光流轉，1998 年 12 月 26 日¹，按中國曆書算是個大吉大利的日子。20 幾位原師院外語系、中文系師生應邀出席一個結婚典禮。文革已過去 32 年，我輩有的退休或正準備退休，過去的一切如過眼雲煙。酒過三巡，自然說到學生生活，說到文革。我提起 1966 年 6 月底韓明講話後這一話題。

秦先生說：“你們四人寫了一張什麼‘別動隊’大字報，這下可把工作組打痛了。之後，俄四王清良、王舉高幾個人寫了一張口氣很硬的大字報，全院的積極分子和工作組都聲援這張大字報。這時，院部工作的陳漢楚幾個人在學生飯廳兩側貼出抓力沙克的大字報，王履安、譚培禎也寫了力沙克大字報。幾張大字報把力沙克連上了你，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工作組撒下了一張大網要捉你這條大魚了。現在看，你寫不寫‘別動隊’那張大字報一樣，早晚要抓你，

¹ 這天恰好也是毛領袖的生日。雖然按照官方的明文規定，中國不給領導人慶祝誕辰，但由於對毛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許多百姓仍然自覺或不自覺地搞些規模不一的慶祝活動，例如舉行婚禮等等。

這樣工作組才能把燒到自己的火引過去燒你，解脫他們自己。”

張先生接著說：“你（指秦）出身好，我出身富農，開始我跟你們造反，寫大字報我簽字，後來工作組員敲打我說，你這種出身的人也敢造反，我害怕了。我想，一個畢業生的最後政治鑒定，還得由黨組織定，出身不好已經是大不幸，再抓我現實表現，我這輩子怎麼活？我能看出工作組佈置積極分子抓住高老師不放，手段挺缺德，我還得站在他們一方面。我當時就這麼想的。”

宿女士說：“我當時動搖不定，想和你們一起造反，有點膽小，不敢。和工作組一塊幹，看他們行爲鬼鬼祟祟的。高老師這麼年輕有爲的共產黨員一下子變成反革命黑幫，我也想不通。我一直兩頭混，那時，沒人注意我，我比較輕鬆。”

劉先生說：“我們班王清良、王舉高等十幾個人的大字報是工作組幫助下寫的。當時，工作組員拿畢業分配嚇唬人，這十幾個人中，像王清良、李玉亭、王舉高本來是積極分子……工作組早已佈置好了，這裏一貼，全院各系的積極分子出動回應，形成一種聲勢把造反的人壓下去。”

談到此時，多數人已不耐煩，有幾個人主動舉杯說：“大家喝一杯慶祝那段傷心日子。過去了，管它什麼觀點，我們還是老同學，喝！喝！每個人都乾杯。”

二，未來的政治家們：A 角

政教專業是專門攻讀馬列主義的。這個專業在錄取學生時把家庭出身和政治鑒定看得更重要，要求學生有更高的政治覺悟，儘快成爲黨的心腹。文革中，這個專業的師生參加造反的少，緊跟院黨委、工作組的人多。其中四年級魏金光、陳鳳霞等人成爲全院師生中嶄露頭角的風雲人物。1966年7月1日，魏、陳等17人寫出一張立場鮮明、語勢強硬的大字報《戳穿高樹華等人的政治大陰謀》。

大字報前三段是駁斥我們四人“別動隊”大字報的。下邊摘抄第四到第六段：

韓明同志代表內蒙黨委在全院革命師生面前已經明確地宣佈了工作組是內蒙黨委派來的，那麼高樹華等人沒有聽見嗎？不，高樹華等人無視這個鐵的事實，故意宣佈對黨的不信任，製造思想混亂，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實上，外語系個別同學，早在韓明報告之前，就已經明目張膽地鼓吹要建立由“左派”組織起來的“文化大革命臨時指揮部”，並且指名這個“指揮部”要由高樹華、劉樸負責……

高樹華這些個野心家，原以為篡奪領導權的企圖指日可待，韓明同志的報告，給了他們當頭一棒，高樹華等人“聰明”地預見了形勢的發展可能對他們沒利，於是，急忙拋出了《工作組是“浩家店”黑幫的反革命別動隊》的反革命檄文，企圖擾亂陣腳……把工作組攆走，篡奪黨的領導權，實現他們全部的政治陰謀。

這張大字報洋洋灑灑一大篇，概括為一句話，不外是高樹華等人的政治大陰謀是篡黨奪權，有言論，有行動，而且有預謀。

幾米甚至十幾米長的“打倒反黨野心家、陰謀家高樹華”的大標語貼滿全院牆壁，鋪在大大小小的路徑上。由魏金光、陳鳳霞等人發起，院學生會主席、化四學生傅榮呼應，在文史樓前小空場上，鋪開數百張白紙，準備好十數支毛筆，前面豎起一面橫幅，上面書寫著“打倒野心家、陰謀家高樹華！同意者簽名！”

簽名運動由各系組織督促，對不肯簽名者形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工作組命令配電室安裝 500 瓦的大燈泡數隻，保證簽名晝夜不停。寫著密密麻麻名字的白紙一張連一張鋪了上百米遠。

塞外的夏天，在大、小暑節令前一般是少雨天氣，不知這一年為什麼，天公突降甘露，鋪在地上的紙和墨被雨水化為紙漿和黑水，近一天一夜的“打倒高樹華”簽名活動被不識眼色的老天爺泡了湯。第二天大早，篇篇諧文和藝術系學生的漫畫把這場天公不作美的鬧劇刻畫得惟妙惟肖。由該系學生以元代

雜劇體寫道：“天爺哦，你怎生了得，急煞了古東大人也麼哥！”

“惡作劇”一下子鬆懈了前一天的緊張氣氛。有些簽過名的人聲明作廢，並揭發被積極分子施壓的實情。積極分子寫大字報嚴正聲明，警告任何把嚴肅政治鬥爭當兒戲者“小心狗頭”。

魏金光、陳鳳霞、傅榮等人再次發起簽名時，應者已是寥寥。

三，未來的政治家們：B 角

魏金光、陳鳳霞等 17 人的大字報兩天後，他們的同班同學曹青海、李克林、陳福玉等六人寫了一張《到底誰是陰謀家？》的大字報。

7 月 2 日清晨，政教專業一些人貼出了《戳穿高樹華等人的政治大陰謀》的大字報後，什麼“個人野心家”、“陰謀家”諸如此類的大字報也接二連三地拋出……有些人被一時蒙蔽而隨聲附和，有些人不明真相而驚慌疑惑，那麼到底誰是陰謀家呢？對這樣一個令人深省的嚴重問題，我們不能不找一下答案，下面就幾個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

1，駁一個奇怪的“邏輯”

但我們發覺這些大字報有這樣一個奇怪的邏輯：工作組是內蒙黨委派來的——你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內蒙黨委——你就是反黨陰謀家。……

我們和你們不一樣，我們衡量工作組是否革命，是否體現了黨的領導，唯一的最高標準是毛澤東思想。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按毛澤東思想，按黨中央指示辦事的，那就是革命的工作組，他就體現了黨的正確領導。反之，不管他是哪裏來的，就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就根本談不上黨的領導。那麼我院工作組自 6 月 7 日以來是不是按照毛澤東思想、黨中央指示辦事呢？我們肯定地說，根本不是。他們執行的是一條壓制革命群眾，實質上就是壓制文化

大革命的反動路線……

這張大字報所以在全院產生極大反響，在於六位學生鞭闢入裏，與黨中央文件精神，與《人民日報》社論的論點是一致的。其他系的學生承認自己寫不出這樣水準的大字報，但他們能區分出哪些大字報是倚勢壓人、扣大帽子的，哪些大字報是真正中肯分析，令人信服的。

他們大字報的最後一個小標題是：“誰是陰謀家？”

十幾天來很少出面的古東爲什麼匆匆忙忙指示一些組員到一些系，對高樹華同志做“討伐動員”呢？爲什麼古東還嫌不足，而親自出面給我班同學“面授機宜”呢？爲什麼這幾天紀之、李漢良、王履安、譚培禎、李寒威等人都紛紛出籠呢？這一系列問題不能不使我們把他們聯繫起來深思一番。

綜上所述，我們申明：就目前來說高樹華是堅定的革命左派，任何人妄圖利用運動中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把他們“有機”地聯繫起來，並強加在高樹華等同志的頭上，妄圖一棒子把他打死，是絕對辦不到的。我們毫不崇拜高樹華同志，更不迷信古東，我們唯一崇拜的是毛澤東思想。誰要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堅決揪出他，鬥爭他，打倒他！

這張大字報得到許多師生的支持。工作組則組織政教四年同班的魏金光、陳鳳霞等人用大字報、大標語進行圍攻。他們翻閱了六個人，尤其是曹青海、李克林、陳福玉的政治檔案，調查了三人的三代家庭。工作組在三個人祖墳中未找到可疑的殘渣，便威脅利誘，使其屈服，改變觀點。結果三人把政教系工作組長吳鳳德等人的行爲公佈於眾，引起全院師生的議論，又有一些師生表態支持曹青海等人。

兩個多月後，當內蒙古師院的造反派組織東方紅戰鬥縱隊成立時，曹青海當選爲第一任總勤務員，陳福玉成爲師院另一支造反派群眾組織——井岡

山造反兵團的勤務員，並改名爲陳向前。

四，政治家們的未來

1967年，這個班畢業時，曹青海被留在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宣傳組工作，後提升爲處級幹部。粉碎四人幫後，曹的這張大字報和“東縱”勤務員身份問題被審查。審查無罪後，曹主動提出辭職，先闖深圳，後在北京辦公司。筆者曾在北京與曹青海偶遇，他說有時很想回內蒙看看，細想起來又感到很傷心，連捐一所希望小學的心思都沒有，只好回到自己故鄉實現內心的所願。

陳向前分配到包頭鐵路黨校任教。內蒙古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中，他因擔任過院級造反組織頭頭，被停職審查，內部確定爲“不可升遷，不可重用”之人。不久，他設法調到呼市，處境如一，仍做一般教學工作。

李克林畢業後參軍，任過縣武裝部副政委。等他升至一個地方野戰團副政委時，對曹、陳的審查追到李所在部隊的上級機關。雖然經過反復審查，沒什麼問題，但沒有哪位領導肯爲他說話。結果，李不情願地脫下軍裝，轉業到地方。從此，人和檔案到哪裏，“是造反派”的話傳到哪裏。李克林乾脆把檔案扔在安置機構，隻身闖到深圳、上海，在一個大公司找到一席之地。事後，李很感謝那些把他擠出軍隊的人。他說：“外面的世界想不到這麼精彩繽紛，現在拿八抬大轎抬我我也不回去了。人怎麼活不是一輩子！人家不讓你這樣活，你再換個活法兒。我蔑視那些靠相互關係混上廳長、省長官位的人。現在的官兒，有幾個乾淨的。我們活得富足，愜意，問心無愧，這就夠了。攆我們的那些人，永遠達不到我們的境界。”李克林這番達觀之言讓我由衷佩服²。

² 事後回想李克林這番話，豪壯歸豪壯，但仍有幾分苦澀。當然，如今中國已經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年代，能力強的人在政界混不下去，可以轉到學界或者商界，另謀一番發展。這總比過去只能吃公家飯，在一棵樹上吊死要好得多。但從另一方面看，中共一統天下的局面，並沒有根本改變。只要人事部門認爲你不可靠，不可重用，甚至完全不能使用的話，那麼，這個人的事業和前途，即使沒有完全被宣佈死刑，也會處處碰壁，困難重重，換地方換單位，憑自己的能力去打拼，仍然難以從根本上改變不利的處境。這方面的例證不勝枚舉。

與曹、陳、李等在同一個班的同學陳鳳霞、魏金光等，先保工作組，後保當時被打倒的黨委書記王逸倫、王鐸。粉碎四人幫後，王逸倫等恢復了原官職，把他們作為革命接班人安排。陳鳳霞先到內蒙黨委組織部任處長，後又外調雲南省組織部任副部長；魏金光任包頭市副市長，後升任內蒙衛生廳廳長、教育廳廳長。這批人還有：數學系教師于金煥，任內蒙審計局副局長；外語系教師劉漢明，調任內蒙古外辦副主任；師院團委幹部李漢良，任內蒙經貿廳副廳長，後調至河北省任經貿廳副廳長；俄四學生王清良官至內蒙烏海市副市長，市政協主席，等等。

五，新曲調

正當保守派和造反師生戰得難解難分之時，學生飯廳中又生事端，幾名保工作組的出名學生給食堂炊事員貼出一張抗議性大字報，說他們給學生盛飯菜時，凡是造反的，勺子向裏一掏，份量超標；凡是保工作組的，勺子向外一抖，份量不夠。“這種用勺頭子整治人的做法，太可惡，堅決予以抗議。難道我們連吃飯的權利也被打折扣嗎？”

工人大師傅們毫不相讓，反貼一張大字報說：“我們從不認識，也無法區別誰是反的、保的，也不存在勺頭子剋扣什麼人的問題。你自己當了保皇派，

³ 若干年後，1971年秋至1973年春，筆者在內蒙古教育局任普教組組長時（當時的廳稱局，處稱組），姜仲原是我的頂頭上司，趙利源（曾是院工作組成員之一）是本組一員，負責收發文件，管理財務賬目和日常雜事。當時我稱姜副局長為“姜頭”，稱趙為“小趙”。一次，在巴彥淖爾盟磴口的全區教育座談會期間，趁雨天夜晚的閒暇時刻，我向姜頭問起這張大字報。他說：“咳咳，那時候，你們給工作組戴黑幫帽子，我們當然要給你們戴反黨帽子，沒想那麼多。我從山東老家參加革命，好賴是黨的13級幹部，憑什麼要戴黑幫帽子！後來說，工作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是全國的事，我自己不是黑幫。”我說：“難道我們因為寫一張大字報，被你們打成反黨分子也算公平？”姜答：“公平不公平，每個人角度不同。文化大革命提倡‘子教三娘’，也沒辦法。”我說：“歷史終究還得按長官意志書寫，當官的總有理，歷史最後還得‘三娘教子’。當官的錯了不會真正認錯，檢查、處理一下是平民憤，老百姓最終要被官制服。因為中國歷史就寫著：當官的永遠有理。有時抬轎的哼哼，坐轎的也哼哼，但坐轎子的照坐不誤，抬轎子的哼哼著也得抬。古話說得好，官惱了打衙役，衙役惱了挨官打。”

心中有鬼，便疑心自己總跟著鬼，那是你們的事。你們不想吃我們做的飯，可以找古東要，你保了他一氣，他難道連頓飯也不管？”

工作組長古東和手下人聽說此事後，指令師院總務科科長高文良密查，是哪些大師傅如此作爲。不料暗查之事外露，抓住高文良搞小動作的大師傅，聯合院內其他工人一起質問工作組。古東一看出了事，藏匿不見，小科長成了工人發火的對象，古東的替罪羊。從此，院內工人絕大多數站在了反工作組一邊。

工作組支一派，打一派，挑動兩派師生員工無序混戰之際，院內出現了一些頭腦更清晰的人士，從另一角度觀察局勢，打出新的牌路，可稱爲混局中的新曲調。

中文系蒙語專業七名教師於66年7月4日貼出一張大字報，題目是《古東是按照內蒙黨委的指示來領導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嗎？》，篇幅較長，不涉及高樹華問題，其提法在師院演變成一個公式：堅決反對工作組，但高樹華也不算好人。此公式在師院文革乃至全區文革時期定格了很長一段時間。可以說，它讓我終生“受益匪淺”。

我至今都認爲，中文系蒙專業七位年輕教師的大字報是很講理的。但在當時，這張明顯不利於工作組的大字報被工作組及其積極分子定爲“貌似公允的反黨毒箭”，“不提高樹華問題而反工作組，更陰險”。這七名教師成爲工作組的打擊對象。

他們和我本人都有一定交往，我們是前後期的中文系同學，一塊交談過讀書問題，一塊打過籃球。這幾位，後來成爲蒙語專業文革帶頭人、領導小組成員。日後挖內人黨中，他們再次被傷害。從此，他們遠離政治，鑽研學問，文革之後成爲自治區蒙語文專業的專家、教授。

第九章

政治原子彈——夏日神話

1966年7月6日上午11時，以內蒙文委政治部孫培卿、車進才等幾位處長爲首的19名幹部，把策劃多日的大字報用一輛解放牌卡車敲鑼打鼓地送到師院。大字報題目是《高樹華的後台老闆是誰？》，貼在教師飯廳的東牆上。貼的位置是事先選好的，尺寸標準恰到好處，足可容納幾百人同時觀看，也不妨礙人車通行。

一，“原子彈”爆炸

大字報抄寫得很氣派，字大工整，貼滿整個山牆。護送大字報的是內蒙教育廳的幹部，一個身高馬大、胖實的人。他左手持一支木桿，大聲指讀大字報的每個字。這裏一向是人不多的地方，今天仿佛事先知道要發生什麼，大字報剛貼好，已經圍過來上百人。護送人反復讀了三遍，一顆政治原子彈在師院上空爆炸了。

何以稱它政治原子彈？是從它“可觀”的效果來衡量的。

1，大字報切中了黑幫、黑線這個文革時期最醒目的政治題目，最致命的政治死亡點。

2，大字報十分神秘。事情有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但無準確過程，或乾脆只有帽子，不陳述事實，給人留下猜測的空間。

3，大字報是文委政治部處級幹部參與，又敲鑼打鼓送來的。這樣的上級機關能公開製造謊言？文委政治部可是由黨組織中最可靠的人組成的，是掌握人政治命運的神秘部門，他們的話豈能有假？懷疑這張大字報，就是懷疑內蒙文委政治部，就是懷疑內蒙黨委，就是懷疑……如此聯想，後果不堪設想。階級鬥爭年代，立場動搖，可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4，送大字報的時間，選在工作組與造反師生殺得難解難分，工作組越來越趨劣勢之時。大字報猶如三個裝甲旅殺入戰場，造反師生先是一驚，驚慌中大部分人已中彈落馬，只有兩百多“頑固不化”者不相信這張大字報，堅定認為高樹華是革命左派。

這個“原子彈”立時讓工作組由弱變強，策劃者古東樂了，韓明樂了，韓明背後的王逸倫書記也鬆了口氣。“打倒黑幫分子高樹華”的口號和標語一夜之間刷在師院北鍋爐房的大煙囪上，成為工作組“革命行爲”的最佳記錄。

幾十年來，一想起這張大字報出籠時的恐怖氣氛，我便感到心驚膽寒。那張貼滿山牆的大字報，那隻握著木桿指讀大字報的胖手，那朗讀音調和周圍一片打倒的口號聲，常像噩夢樣伴隨著我。當年的我遠遠談不上政治成熟。在這種陣勢下，唯一保衛自己的武器，就是知道自己不是黑幫分子。

記得當天中午，我走進飯廳買飯時，人們像看到從未見過的野蠻人，質疑地打量，自動地迴避。只有賣飯的河北老師傅仍用往常的聲調問我吃什麼，並投來安慰目光。地理系林汝耕老師，平時大家住在一個集體宿舍樓內，見面常點頭或打招呼。這天中午，我剛端起飯碗，他突然站在我面前，滿臉怒氣地說：

“你也配在這裏吃飯？你這個黑幫分子，快走開！”

我只是像平常、像所有教師一樣，坐在一個凳子上吃飯，我沒擾誰，礙誰，但受到了這樣的呵斥。

三十年來，我被成千上萬次指責為“黑幫分子”、“野心家”、“打砸搶的紅衛兵”，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從這天開始，和我同樣年輕的幾百人經受了一生難忘的政治壓迫。至今，沒見文章重提這一悲劇，問問我們的受害傳奇。

二，奇文共賞

現將《高樹華的後台老闆是誰？》摘錄如下：

高樹華在他的後台老闆指使下，有組織有計劃地反對毛主席親自領導的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高樹華的後台老闆，就是反黨黑幫“雲家店”¹裏的一員大將潮洛蒙。6月2日，力沙克（烏蘭夫的兒子）突然從包頭回來，在潮洛蒙家，又急忙找了高樹華等人，就十分囂張地密謀起來，搞混戰。

6月4日，力沙克又去找了高樹華。從黑幫潮洛蒙那裏瞭解了有關人員的材料，要一個一個打倒，竊取領導權。6月5日，力沙克第三次到師院找高樹華等人開會，還找了一些學生參加他們的會議……

就在這一同時，還有一個“雲家店”的黑幫珠嵐²說：“把文委也要搞成師院式的對戰形勢，他們貼大字報，我們底下也聯絡人給他們貼，使他們下不了台。”……

革命左派同志們，高樹華的後台老闆一經揭露，也就明白黑幫們在幕後有組織、有計劃、有指揮、有先鋒地反對文化大革命，他們不但在師院、文委機關這樣做，他們在某些部門還這樣做。這是個最大最毒辣的陰謀。……

文委政治部 孫培卿 車進才等十九人

7.6

文委大字報貼出幾天，全院幾乎貼滿了擁護、支持的大標語、大字報，一些人比聽了《人民日報》社論還激動萬分。有一張大字報兼大標語表態痛快。它字少體大，寫滿文史樓前的大字報欄：“《高樹華的後台老闆是誰？》的大字報，一聲雷響徹師院，驚得黑幫分子高樹華及其走卒目瞪口呆，惶惶然如喪家之狗，他們用盡惡劣的手段，玩弄花招，施展伎倆，無所不用其極。”

¹ 雲家店為當年對“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的俗稱，亦有人稱其為“雲家村”。“雲”源自烏蘭夫家族的姓，烏蘭夫原名雲澤。雲也是內蒙中部土默特地區蒙古族常見的姓。

² 珠嵐，全名珠嵐其其格，是烏蘭夫長子布赫的夫人，時任內蒙古電影製片廠領導人，是內蒙古文化界著名人士。

把一位普通教師如此大張旗鼓地扯到黑幫黑線上，是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較量中掌權一方的地位受到動搖之際，必然使用的鐵腕手段。

三，編織神話

文化大革命進入批判工作組執行資反路線階段，“神話故事”的始作俑者，原師院黨委辦公室幹部陳漢楚開始現出原形。

陳漢楚，江蘇人，1953 年在呼和浩特二中高中畢業，考入內蒙古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後留校做行政工作。郭以青任院長時，調他到黨委辦公室工作，是個勤快、聽話，讓領導感到好使好用的幹部。郭以青調走後，從韓明、特木爾巴根到紀之，師院領導換了一茬又一茬，陳漢楚卻能數年不變。院辦公樓內多數人承認陳漢楚有極強的適應力，工作肯幹，勤政，卻普遍不看好其為人。

陳漢楚和我算起來應是呼和浩特二中的校友。1952 年，我初一時，他正讀高二。當時高中生在我們的眼裏，個個才華橫溢，是低年級學生的崇拜對象。陳漢楚長得又瘦、又小，籃球場、運動場上沒有他的身影。但週末的學生晚會或講演會上，他常穿梭於其間，成為活躍人物。

我不明白，陳漢楚何時對我開始感興趣，非把我往烏蘭夫反黨叛國黑幫線上拉。1966 年 9 月 5 日，陳漢楚被憤怒的群眾揪鬥後，主動交出兩封信，對此均有答案。現引證如下（個別地方略加說明）：

……關於‘六.三’前後力沙克來我院活動情況的材料來源：1）一次去內蒙黨委宿舍，返回時在內蒙黨委禮堂對面，見力沙克騎車進潮洛蒙的院，時間記得是 6 月 1 日晚 7 時半左右（日子可能記錯）；2）6 月 2 日上午開完黨委會後，臨時決定召開部分總支書記會議，我在文史樓大門口，時間記得是上午第三節課後，大約十點多，看見力沙克進文史樓是肯定的，時間也可能與 6 月 4 日混淆。【陳自己也記不清力沙克進文史樓是 6 月 2 日還是 4 日，孫培卿大字報竟一

口咬定是6月2日。力作為外語系教師進入大樓這不算什麼，和進廁所一樣平常，但是後來幾乎所有認定我是黑幫的大字報，都創造出，力進文史樓是找我，進而想像出，肯定兩人一起進行了預謀，誕生了第一張大字報。多麼高超的創造和想像力！——引者注】3) 王履安的幾次匯報和6月4日晚在原專案辦公室說的話。主要有：高樹華第一張大字報有人支持，力沙克曾來師院活動過；力和高的關係密切；6月4日，力又來找高樹華等，在備課室開會，力從潮那裏搞到材料給高等人。4) 6月5日上午9時多，中文系漢三賈國志同學在文化革命辦公室報告力沙克去他班活動的情況。內容有，力沙克從包頭回來，參加了漢三會議等。

作為公民，而且是共產黨員的陳漢楚，給黨組織寫信是正當的權利。儘管從他自己公佈的信中看到，不少是把偶然見到、聽到甚至是捕風捉影的猜測加以分析後，得出結論報告給黨組織，雖非正派人所為，仍屬於一個黨員的權利，受黨紀保護。

在韓明、古東慫恿下，陳漢楚寫出了揭發力沙克的大字報，交給院工作組員徵求意見，轉報古東後，古東給陳以堅決支持。

6月20日上午，韓明夫人鍾蘭英問陳漢楚：“聽說你寫了一張揭發力沙克的大字報，為什麼不貼出來？”陳答：“怕這張大字報轉移運動大方向。”鍾說：“怕啥，揭黑幫、黑線沒錯，貼！”

7月1日上午，韓明親自找陳漢楚談話，鼓勵陳漢楚不要怕。當天下午，白錫林（師院黨委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長）、鍾蘭英等，一馬當先貼出《大家起來揭發黑幫分子力沙克的陰謀活動》的大字報，文中寫道：“據我們所知，他在6月3日前後，曾來我院大肆活動，亦和高樹華同志談過話。”

這張大字報貼在學生飯廳處，為的是引起必須到飯廳吃飯的學生們注意。該文把力沙克定為黑幫分子，這在當時師院是第一例。此時力沙克正在內蒙第二毛紡廠參加城市四清。該文點到“6月3日前後”、“亦和高樹華同志談過話”兩個要害穴位，手法模糊含蓄，留下極大的想像空間。

白錫林等四人大字報剛剛貼出，藝術系黨總支書記謝春明、已被停職的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李寒威等，均很快在白的大字報周圍寫出了支持的大字報、大標語。

陳漢楚已寫好的大字報於當天下午出現在文史樓前。

當天晚上，古東在自己辦公室對工作組組員說，現在的形勢對我們有利了，一場大揭黑幫、黑線的活動馬上開始。

7月2日，幾位系級領導對文化大革命表現了少有的熱情，“再揭力沙克”的大字報貼出。大字報提到，已停職的外語系黨總支書記王履安曾向紀之匯報過，有懷疑力沙克是烏蘭夫黑幫派到師院一顆黑釘子這個意思。王履安看了這張大字報，立即書面聲明，他向紀之匯報的原話、原意與這張大字報寫的不同，建議工作組查找院務會記錄核實。

當晚，白錫林爲王打氣，並向王履安承諾：“只要你在揭發力沙克與高樹華黑幫黑線關係上立功，運動後期我出面保你過關，並以此作爲提拔你的依據”【此話是1973年3月王履安對我解釋時所說】。於是王履安丟掉思想包袱，大幹一場。

7月3日清晨，王履安在文史樓內一層，原外語系的走廊上貼出《力沙克究竟是什麼人》的大字報。大字報上半部分揭發力沙克平時說話霸道，行動散漫，1964年批特木爾巴根時，力沙克可以隨便見潮洛蒙。後半部分進入主題：力沙克在外語系教師中與高樹華關係最爲密切，高樹華藉故常去力沙克那裏，兩個人政治觀點十分一致。又說：“力在六月四日中午，曾來我院，在外語系備課室和高樹華、劉真二人談話（我和譚培禎因開會遇上）。……看來，力沙克是參與了高樹華等四人寫大字報的活動。”

顯然，這最後的幾句話才是王履安大字報的要害內容。儘管王不敢說自己是在猜測，仍用“看來”這個詞勉強支撐，這已經夠了，這正是韓明、古東多少天來想要的，終於通過王履安的嘴說出來了。

當天下午，王履安與外語系另一名黨總支委員譚培禎合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王履安清晨大字報的旁邊。這張大字報題目是《揭發黑幫分子力沙克在外語系的陰謀活動》。大字報第三、四段說，力沙克在外語系往來最密切

的當屬高樹華。兩個人不僅觀點一致，經常互相拜訪。大字報最後一段把主角力沙克置換成高樹華，說高樹華前一段書寫黑板報時，竟然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中的“偉大”兩字漏掉，“顯然，在高樹華這個人頭腦中，對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這個觀點是有質疑的。”

由力沙克置換出高樹華，比含蓄地影射更具攻擊力。王、譚兩人，立即受到許多人質問：“你們到底是揭發誰？是揭發力，還是打高，到底誰是黑幫分子？是力，還是高？”質疑實際上起到捅破一層窗戶紙的作用。

同時，古東連續派出陳漢楚去內蒙第二毛紡廠，即力沙克正在搞“四清”的地方去瞭解情況；派數學系教師于金煥去二毛抄有關力沙克的大字報。

讓他們感到失望的是，內蒙第二毛紡廠收集來的只能說明力沙克本人如何如何，與高樹華全無關係。外語系搜腸刮肚的東西又全拿出來了，也不能說明高樹華是什麼人。看來，工作組手頭的彈藥，尚不足以將高置於死地。韓明、古東這類參加了幾十年革命的老幹部畢竟技高一籌，準備自選炮彈，由內蒙文委政治部這支強大口徑的火炮來轟擊了。

正在此當口，7月4日，高樹華又貼出了《事情真相》的大字報，如不儘快爆炸一顆“原子彈”，剛剛轉好的革命形勢又會丟掉³。

四，我的《事情真相》

當院內力沙克、高樹華的大字報不斷增多，眼看要把我拴在黑線的時刻，我必須將事情真相公佈於眾。這一次涉及我個人，只能一個人具名。我明白

³ 以上分析的依據來自下列三個方面：

1，1968年，原內蒙文委政治部孫培卿寫給我一封信，言辭懇切，再示歉意。信中，他講述了1966年7月6日大字報出籠過程，韓明、古東如何指示，他倆背後內蒙黨委書記王逸倫如何支持。孫所講述的一切為依據一。

2，1968年，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我為常委之一，曾在一次會上遇到已結合進內蒙古工學院革委會領導班子的古東。他除了道歉外，也講述了這張大字報及他當時的想法。

3，與韓明本人的談話。1972年韓任內蒙古教育局局長後不久，我正任普教組組長，是他的下屬。在一次各組組長思想溝通時，兩人提到1966年發生的事，韓談了當時的想法。

工作組及背後的大人物把我向黑線上拉的目的是斷送師院的文化大革命，挽回走資派的天堂。

我也經常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對照《人民日報》社論精神一篇篇檢查，我找不到自己言行有不符合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的地方。反而是自稱內蒙黨委派來的工作組，所作所爲與中央指示不符。種種雜亂的心理活動主宰著我的內心世界，我顧不上吃、睡，顧不上回家，不知道新婚不久的妻子正在幹什麼。我苦苦地抗爭著。

1966 年 7 月 4 日，我的大字報《事情真相》貼在師院南茶爐房外的牆壁上，牆邊的白楊樹下擠滿了人，爭看這張很長的大字報。

現把大字報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一，我和力沙克的關係

我認識力沙克是 62 年他來我系工作之後，從 1962 年到到 1964 年 3 月，我和力沙克接觸與一般教師和力沙克的接觸是一樣的。從 1964 年 2 月起，我開始住一個房間（即教工一樓 266 室），三月份得知力沙克要搬到我的房間裏來（力沙克搬來的手續並不完全）。搬來後，力沙克一夜也沒留宿過。原來他才告訴我，他在學校要個床位是爲了以後夏天午休用的。事實上，力沙克除了上課開會來學校外，一般很少在學校，這是外語系教師知道的，當時他回宿舍時間一般在課前課後。從那時起我和力沙克接觸機會比一般教師與他接觸機會多了。7 月份前後，系裏調配房間時，力沙克搬回家了。我於 9 月份以後搬到附中（現 16 中）家屬院。這以後力沙克在上下班順路時，有時也去我院。這就是譚培禎所說的“互相登門拜訪”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我也去過力沙克家幾次（主要是替系辦公室送工資去的，因為力沙克在“四清”，送工資的也不只我一個人）。我在中文系讀過兩年，力沙克對文學感興趣，這方面也是經常談的內容之一。力沙克鼓勵我搞“創作”，也鼓勵系裏的某些老師。65年6月的一天，力沙克告訴我，他寫了一部20萬字的小說，叫《祖國》。

我看了第一章的幾段，我才知道是描寫學生生活的。以後小說送往何處，出版沒有，一概不知。從 64 年底，力沙克連著參加兩期“四清”（一次在達旗【指伊克昭盟達拉特旗——引者】，一次在二毛），此期間我和他很少見面。

我和力沙克接觸次數比一般教師和他的接觸多，這是事實。從這方面說，我是以共產黨員之間的關係來和他談一些問題的（從 7 月 2 日鍾蘭英等人的大字報中，我才知道力沙克是一個黑幫分子）。我和力沙克談話的內容，最主要的是系裏發生的一些事情，也談院內的事，這些事情也是一般黨員都知道的和可以談的。此外有時也談一些文學問題和其他生活瑣事。在前後接觸中，我與力沙克並不是“會上會下觀點一致的”。會上的情況也是外語系教師清楚的。

關於“雲家村”黑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力沙克從來沒有和我談過。除與力沙克的上述關係外，我與“雲家村”黑幫沒有任何聯繫。

譚培禎等人的大字報說我“曾經想找潮洛蒙”，或“找到潮洛蒙”，或“力沙克曾想找我去潮洛蒙的家”，或“系內安排工作和我有分歧時我也找潮”等種種說法，統統是別有用心的捏造，至於說什麼“潮洛蒙很讚賞高樹華”，我從不知道，也從來沒感到這點。

二，所謂“與潮洛蒙的關係”

我第一次聽到潮洛蒙的名字是潮來我院領導特木爾巴根專案運動時。在此期間，我向潮本人提過一次意見。還有潮洛蒙在給全院師生報告時講到他從蘇聯回來路過蒙古時，在列車上吃的食品太壞時說：“作爲一個蒙古人，我真爲他們感到害羞。”當時我認爲紀之和潮洛蒙的說法不合適（現在看他們這樣講，…絕不是簡單的問題）。，在一次全院黨員大會後，在會場上（在第一共同課教室）我向潮洛蒙提出兩個意見，時間大約三、五分鐘，潮對我的態度是冷漠的，對我提的意見沒做什麼表示，只是哼了兩聲，這是我和潮的唯一的一次談

話。

還有一件事與潮有關的是我向他交過一份材料。這材料是我在特木爾巴根專案運動結束時，因這次運動中我系的特木爾巴根親信人物王履安沒被揪出來，群眾意見很大，我也很有意見。便把王履安、譚培禎的情況寫成書面材料打算交給內蒙古黨委（因為我當時對紀之爲首的內蒙師院黨委有看法）。未交前，力沙克看了此材料（因為材料的主要內容以前和他大都談過）。力看過後說，材料由他交給潮洛蒙，我表示同意，因潮很少來師院。當時認爲潮洛蒙是代表內蒙黨委來領導特木爾巴根專案運動的，交給他一定會做處理的。但至今無下落（材料的底稿我還有）。不僅如此，據我所知，我給內蒙黨委的這份材料的一些內容，王履安、譚培禎後來知道了，其原因何在，我至今不明白。

這就是我和潮洛蒙的全部“關係”。

三，所謂“認識趙戈銳”

.....

四，“6月3日前後力沙克在外語系的活動”

.....

6月3日早七時我們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力沙克6月3日中午來過。力沙克說，他是聽說師院貼大字報了，才跑來看的。他一進備課室門，就似笑非笑地說：“你們四個捅了漏子”（當時他已經看過走廊內的一些大字報了，當時在室內的有劉真、樓基立和我等人）。然後他一本正經地問我們怎麼回事？我們簡單向他談了事情的前後和當時的形勢，他又出去看了我們的第一張大字報。回來後，他說：“如果真象你們說的那樣，你們就貼對了。即使有錯誤也是方法的問題，不過我還得瞭解一些漢三（我們的對立方）觀點。”當時因時間到了，他急忙走了。

五日（星期日）上午，我剛回家，力沙克找我，要我帶他去找漢三同學，並告訴我工作組可能來師院（在這之前，我們四人曾以書面形式要求內蒙黨委派工作組來師範學院）。我和他到了師院，我正要找一位俄三同學領他去漢三教室，他正好見到漢三的一個同學（力沙克給漢三教過公共俄語），他們並肩走了。以後情況如何，我一概不知。以上便是六月三日前後所謂“力沙克和高樹華等秘密活動”的真相。

五，黑板報問題

.....

關於我和力沙克、潮洛蒙、布赫、趙戈銳的關係問題，已經成為人們注意的中心。在這樣一個大是大非面前，如果你們自認為還有一點對黨的事業的責任感的話，應該把你們知道的全部事實統統拿出來，擺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也殷切地要求工作組嚴肅地對待這個大是大非問題。現在，布赫、趙戈銳、潮洛蒙、雲照光和力沙克這些人可能都在，請工作組以對黨負責的態度，迅速採取有力措施，進行實事求是的調查，並將結果公佈於眾，以利我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開展。

外語系 高樹華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

同一天，北茶爐牆上貼出我們四人寫的另一張大字報《我們的第一張大字報是怎樣醞釀寫成的》。

儘管我出於一種真誠，強烈要求工作組鄭重調查，自然，我的請求對工作組來說連耳旁風也算不上。

此時，古東指定工作組秘書袁俊芳等人把陳漢楚、王履安、譚培禎等人大字報揭發出的零部件系統加工一番，交給韓明。韓明委託內蒙文委幹部編

寫。初稿由文委政治部副主任孫培卿修改，定名為《高樹華是什麼人》。因題名不夠響亮，故改名為《高樹華的後台老闆是誰？》

古東拿著大字報稿四下徵求意見，參與過意見的人有姜仲原、楊慶魁等人。原師院許多院系幹部，為此也貢獻出了自己的聰明才智。隨後，古東把修改過的大字報稿移交回內蒙文委，確定了貼出的時間、地點。

爲了製造政治原子彈爆炸前的氣氛，7月5日，工作組組織各系積極分子四處張貼質問、揭露高樹華的大字報、大標語，集中火力把鬥爭矛頭對準了這個25歲的年輕教師。

7月6日上午，本章開頭那顆精心製作的“原子彈”爆炸後，全院鋪天蓋地地出現了無數巨幅標語：“打倒黑幫分子高樹華！”“打倒黑幫分子高樹華及其爪牙！”。我徵得劉樸、劉真、樓基立同意，以四人名義寫出一張大字報《告全院師生員工書》，誠懇告之，文委這張大字報是“捏造”，是“一個大陰謀、大騙局”。但一個無職無權、年輕的受害者的呼聲太微弱了。

從此，“高樹華是黑幫分子”由內蒙師院傳到全區各大院校，傳至全市、全自治區，反黨的罪名如同影子跟隨了我一生。當烏蘭夫被打成反黨叛國集團時，我被懷疑爲隱藏最深的烏蘭夫分子；當革委會成立後，我是埋藏在革命陣營內部的“第五縱隊”⁴；當烏蘭夫被解放，當上國家副主席後，我是審查對象，是“迫害烏蘭夫的罪魁禍首”，只不過“黑幫、黑線”幾個字根據敵情不斷變臉。

⁴ 指1936年西班牙內戰期間，佛郎哥派往首都馬德里的內應部隊。

第十章

狼和小羊

隨著7月6日政治原子彈的爆炸，師院圍繞工作組的兩派衝突驟然升級，從最初的書面和口頭爭論觸發了變相的武鬥。

這一天，原子彈的衝擊波幾乎把整個校園蕩平，但亦有上百名學生看破這張大字報沒有任何可靠的事實，只有大帽子。他們認為以上級黨委的名義送大字報，對運動定調子，定框框，支持工作組，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他們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到文委找孫培卿等人瞭解事情真相，去內蒙黨委上訪。

一，關閉校門，圍堵羔羊

平時，內蒙師院除了西北角的大門通往菜地屬工作門外，北門和東門是全天開放，人員可自由出入，從未要求誰出示任何證件。可是，當準備上訪的學生到達北門時，北門已緊緊關閉，守門人告知，工作組命令關閉北門，出入學校可走東門。來到東門後，這裏除了看傳達室的大爺外，工作組專門從數學系積極分子中調來一些師生做臨時門衛，出入校門必須戴校徽，出示學生證。等裝備齊全的學生要走出校門時，又要求登記，詳細說明外出理由。若買東西，工作組飭令：買東西者，填好清單，派人統一購買。這種出乎意料的刁難惹惱了要出門上訪的學生，雙方爭辯得大動干戈。

事情發生後，工作組方知他們辦了蠢事，惹下了麻煩。為開脫自己，急以工作組辦公室名義發出通知說：“不准某些人外出，這完全是無根據的謊言，望大家切勿置信。”古東又以裁判員身份把糾紛雙方召到辦公室開會，否認工作組有“不准外出”的命令，批評上訪的學生不按時午休，是破壞紀律，是目無組織和警衛人員。古東公然庇護當事一方，引起被阻出門的學生

的義憤，辯論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 6 點。第二天早上，院內出現這樣一批大字報：“聲討有人借外出名義給工作組造謠”，“圍攻古東同志”，“摧殘老革命的身體健康”。

現摘錄一張大字報如下：

鄭重聲明

昨天下午我們站崗由兩點到六點，除以往門崗的制度外，我們沒有接到工作組的任何新的指示精神。

如果我們的具體做法有錯誤由我們負責。在此我們嚴正警告那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你們無釁生事，妄想加罪工作組的卑鄙陰謀永不能得逞。

· 數學系 白音等 7 月 7 日

敢出面為工作組承擔責任，數學系白音等人自然被工作組及以後的工作隊看中，最終得到當權者的重用提拔¹。

儘管工作組想方設法阻攔，還是有一些學生翻牆跑出校外，在內蒙文委與孫培卿等人理論，追問他們所送大字報的事實依據。孫培卿支吾推諉，不敢正面回答學生的問題，只用一句話抵擋盤問：“革命大字報嘛——你一張，我一張，誰都能貼嘛！”這句話後來在師院流傳了很久。

學生們窮追不捨，一定要讓孫培卿拿出事實來，孫培卿回答：“我們有事實根據，沒有事實根據怎麼能寫大字報呢？他高樹華和潮洛蒙有關係，你們可能不知道，誰寫大字報你們就找誰，那誰還能寫大字報呢？現在應該讓

¹ 白音，內蒙翁牛特旗人，1958 年入內蒙師院數學系，畢業後留校。過去不引人注意。後因保工作組，先得工作組、工作隊重用，1970 年後被軍管會提拔，由院黨委辦公室秘書升任院黨委副書記。

無獨有偶，1989 年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時，在內蒙師院任黨委書記的白音再次使用關大門的辦法，禁止遊行師生出校門，並在校內與上街師生辯論。時任內蒙黨委書記的王群，極力推崇白音關校門的經驗，提拔白為內蒙教育廳廳長。不久，白繼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第一書記，中共內蒙黨委常委。

高樹華交待。”

跑出學校的另一部分學生，包括政教系曹青海等，到內蒙黨委要求面見權星垣書記。十幾名學生坐在內蒙黨委大門口等待期間，正逢上班的一批黨委幹部，便圍攏上去向他們講述師院發生的事情，深得多數內蒙黨委幹部同情。在這些人幫助下，中共內蒙黨委辦公廳負責人張魯接見了學生。他聽取匯報後，打電話給古東，讓他們不要激化矛盾。古東使出隱身計——否認。

工作組下一步棋如何走，是可想而知的。請看地理系宇紅同學寫的大字報：

午飯一過，我系工作組長袁俊芳同志火速召集我系各班負責領導文化革命的同学開會，會上他講道：“今天文委送來的大字報大快人心……現在還有人支持高樹華……，主要講四個問題：

- 1， 主要目標不要轉移，對高樹華窮追莫捨；
- 2， 寫大字報，進行大辯論後，給高樹華綜合罪狀；
- 3， 對外語系和中文系部分師生要運用主席思想，爭取他們，歡迎他們革命；
- 4， 提高警惕，防止敵人搞陰謀破壞團結。要注意安全，吃飯後，同學們把碗筷帶回宿舍，打水用具專人保管，做防火袋放在大字報附近。”

袁俊芳在地理系講的“大辯論”是指工作組準備召開的大型批鬥會。人們發現，操場上正在佈置批鬥台，糾察隊業已由體育系、數學系、物理系的積極分子組成。各系工作組要揪鬥的師生名單也擬定待審，只因被揪鬥的人數龐大，批鬥台放不下，古東指示再壓縮壓縮。正在這時，校園內發生了“七·八”事件。

當“打倒黑幫分子高樹華”的大標語在師院鋪天蓋地之際，當高樹華三個字上都打了紅叉和黑叉時，由藝術系同學發起，共有 245 名師生簽名的的大標語跳出龍門。大標語分兩聯：《支持高樹華等革命同志》，《識破迫害左派的

陰謀家》。在一片“打倒”聲中突然出現另類，立即引來眾多積極分子的圍攻。圍攻者以這兩條標語蓋住了“毛主席萬歲”的標語爲由，把藝術系師生發表不同意見的行爲扣上“反動行爲”的帽子。工作組員命令造反學生撕掉標語，交待動機，交出黑名單。站在圍攻者行列中的幾位系級領導，如外語系譚培禎及藝術系謝春明等人，高呼支持圍攻者的口號，煽起雙方的對立情緒。圍攻者開始向被圍在中間的造反學生韓桐、薛永長、潘桃霞（女）等推、拉、打、踢，外語系學生韓桐等二人被打傷。

眼看事態愈加嚴重，工作組直接出面把遭到武鬥的學生帶到辦公室，準備把他們交給師院保衛科長陳孟平處理。學生當場向古東提出強烈抗議，工作組絲毫不予理睬，勒令學生把大標語撕掉，擦乾淨，否則不給飯吃。並決定，當晚把全院造反師生拉出來批鬥。有幾個學生再次到內蒙黨委向張魯告狀，張魯給古東打電話，制止他這樣做，同時派出黨委辦公廳兩位幹部去師院當面制止了鬥爭會。

全院的批鬥會夭折了，各系的工作組卻不甘示弱，各自擺開陣勢，圍殲籠中的羔羊。在工作組的主持下，藝術系和中文系開始揪鬥造反派的學生，“反動學生”、“投機分子”、“黑幫爪牙”之類的標語口號，一時滿天飛。

二，回望扮狼的角色

1966年7月6日的夏日神話對於我，對許多師院師生都是難忘的。他們像《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小羊一樣，對橫豎都有理的狼記憶猶新。如今，我向扮演“狼”這一角色的人回頭望去，原來戲中人臉上的面具，乃是導演的傑作。

陳漢楚

陳漢楚憑藉“政治敏感性”，不僅對我，而且對他周圍不少人作過政治分析，寫成材料，發往上級黨組織，引來不少非議。這次，陳漢楚還沒來得及受到工作組嘉獎，便連同古東、韓明等人一起，被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的浪潮淹沒。陳雖被關押在師院“黑幫隊”內，他的革命積極性卻以另外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大揭、大批韓明、古東和鍾蘭英、白錫林等人，爲此，他最早從黑幫隊解放出來，回到群眾中參加文化革命。

內蒙革委會成立後，我成爲常委之一，還有個名聲顯赫的政治部副主任頭銜。陳以中學校友的名分幾次找我，我原諒了陳運動初期的所作所爲。陳坦誠相告：“我在師院不好呆了，各方面關係不好處，請你幫我調到內蒙黨校去教書。”我幫助了他；之後，他想上北京大學開辦的一期理論研究班學習，我又幫助了他。不久，他調到江蘇省委黨校，攜全家回到他的故鄉。事情到此本可爲陳在內蒙的事業畫上句號，開始他的新征途。

孰料，清查運動中，陳漢楚再次躁動起來，給內蒙清查辦提供了不少材料，其中有一份涉及我。專案組內的友好人士事後告訴我說：

“江蘇轉來一份材料，只記得寫材料的人姓陳，揭發的大多數事情都扯淡，只有一條很嚇人，說你和他一起吃飯時，很同情林彪之死，要爲林彪翻案。材料揭發你當時還得意地詠誦了《紅樓夢》中薛寶釵的一句詩‘好風借憑力，送我上青雲’”。

“專案組反復研究了這份材料，覺得陳寫得太玄乎，不大可信。運動初期有人說你罵過‘林副主席’，查了許多年，無法落實。現在陳又說你爲林彪翻案，沒其他證據。這份材料就放在一邊了。”

此時我才知道，陳又爲我製造了另一顆政治原子彈。

陳在清查中的活躍表現爲某政治人物看中，把他調入中央黨校。陳再次憑其政治敏感性，以極快速度進入準核心位置，參加過向新任中央黨校校長胡耀邦的匯報會。據說，政治經驗豐富的胡耀邦，把陳排除在接見人員名單之外。陳大感失望，爲挽回顏面，他加倍努力，終因心情不舒，肝病復發，後轉爲肝癌。

一次，呼和浩特二中校友聚會，我提議大家共同祭奠陳漢楚。無論他傷及了多少人，他終究是個被政治耍弄的玩偶。大家按當地風俗把酒敬撒在地上，願他能真正安息。

王履安、譚培禎

批判資反路線開始後，隨著工作組的垮台，王、譚二人被外語系憤怒的師生揪鬥，並投入“牛棚”²。

譚在外語系是系黨總支委員兼系團總支書記，是主管學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我是他的助手之一。文革前幾年，外語系各年級被開除、批判、處分的年輕學生有幾十名之多，罪名幾乎一致，如“政治反動”或“思想極端落後”之類。文革開始前一個月，譚因故被停職審查，我接任他的工作。

1958年，我和譚同時考入內蒙師院中文系本科班。剛入學時，系裏指定組成班委會，他是生活委員，我是學習委員。班團支部裏，他是組織委員，我是宣傳委員。我這位同窗，不大喜歡研究詩詞、寫作。大學二年級時，學校要補充一批年輕的黨、團專職工作人員，譚按大專生畢業，提前到外語系工作。

回顧文革前，不難從諸多基層黨團幹部們身上看到一種共同特質：唯官意識至上。這是中共教育體制的結果。在中國，投身政治有兩種不同解釋：一曰爲國爲民，爲民服務。這是官方教育的公開話本，其中不乏犯顏直諫而被迫害的有識之士；另一種投身政治者，則靠察言觀色和官場的關係網。緊跟工作組的積極分子們，在文革中保了一批老幹部而大獲收益，逐一被安排到一定級別的官位。譚培禎在退休前任內蒙農牧學院（現改稱農業大學）副院長之職，享受正廳級待遇。

論從政工作，王履安的才能和辛勞在同齡人中算是佼佼者。王出身於內蒙包頭市的一家大資產者。出身的不利，使王在從政的韜略及作風上與家庭出身好的幹部不同，更顯功力和成效，總能贏得頂頭上司的好感和庇護。批判資反路線時，身在黑幫隊的王，主動在外語系師生面前檢查，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悔改之意。當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後，王第一批得到解放，結合進外語系的領導班子。恢復工作後的王履安領導外語系積極嘗試教育革命的

² 統指當時關押專政對象的地點，不包括司法機關的正式拘留所和監獄。因為各單位普遍對專政對象搞所謂“隔離審查”，條件差但關押人多，堂堂在一間教室或辦公室裏。

新經驗，工作得有聲有色。

王履安曾多次和我交談文革前後發生的事情，相互間表示了理解和寬容。

八十年代初期，王履安競爭院教務長職務時，不幸因心臟病突發，英年早逝，年僅 49 歲。

孫培卿

文革中期批判資反路線的日子裏，我在一個批判會上看見了古東、韓明和孫培卿。孫胸前的紙牌上寫著和韓明一樣的罪名“政治扒手”，他身體和精神比韓明好，站得直，臉上帶著微笑。

批判會上，我專門和孫培卿有一段對話，那是 1966 年 11 月在師院學生大飯廳的講台幕後。

“你是孫培卿嗎？”

“是。”他哭了。

“你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我們不認識。”

“你說不認識是對的，但你知道我是誰，我就是高樹華。”

“啊，真對不起，我很想找你談談，當面向你道歉。”我相信他不是在玩弄辭令。

“你不必對我一人道歉，你應該向上百名師生道歉，他們無緣無故受到政治迫害，這個帳找誰算？”

“我有罪，我真的有罪，我應該站在這裏挨鬥。”孫此刻臉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不是裝出來的。

不久，我收到孫轉來的一封長長的信。他在信中詳細講了《高樹華的後台老闆是誰》這張大字報的出籠過程。他承認，他對師院的文化革命一無所知，爲了挽救古東爲首的工作組，他認真執行了韓明的指示，用工作組送來的材料，出了這張大字報。他在信中沒有上推下卸，只講自己的錯誤，並爲送了這張大字報而後悔惋惜。

讀完孫的信，我從心裏原諒了他。隨著自己年齡越來越大，我悟到了一

個真諦：在文革前後的政治運動中，我被人傷害過，也傷害過其他無辜者，我只能在自責中原諒那些傷害過我的人。這樣，自己的精神會輕鬆些。其實，孫培卿爲這張大字報多次被批鬥，付出的代價也不小。

1998 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我在呼和浩特市滿都海公園裏跑步時，遇上了原新城區一位幹部。多年未見，我們熱情地打招呼。他用低沉的聲音告訴我說：

“有一件事有人讓我一定轉告你，你記得孫培卿吧，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去年去世了。他去世前幾個月，與我說到你。孫讓我帶給你一個他的歉意，那張倒楣的大字報影響了你大半生，實在對不起。”

孫培卿去世的消息讓我感到突然，他轉來的致歉，讓我感動。

他接著說：“1977 年對你審查時，曾向老孫調查過。老孫很生氣，告訴來人，那是我們錯了，高樹華沒錯，是我們給人家編造了黑幫關係。工作組和古東、韓明通通不對，你們這樣對待高樹華不公平。” 這位幹部又說：“老孫是好人，他說他給你寫的那張大字報是一生中辦得最糟糕的一件事，到死也難以原諒自己。”

事情已過去 32 年了，我站在一株百年老榆樹下，面對上蒼，默默爲老孫祈禱，慢慢咀嚼和吞咽我們時而“狼”時而“羊”的可悲人生³。

三，有口難辨

我在自己的大字報《事情真相》中，真實地講述了與潮洛蒙的全部“關係”。

³ 2000 年《讀書》雜誌第八期上刊登的“平庸的邪惡”（作者徐貴）中的某些觀點，頗能激發我的共鳴。徐的文章介紹了德國女作家漢娜·阿倫特關於專制與邪惡問題的論說。徐在文中說：“邪惡的動機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點，邪惡的動機人人能懂……”文章還援引阿倫特的原話，即“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在她最後一篇著作《思想的生命》中，她所討論的正是不思想所造成的無判斷。實事也證明，專制暴政無一不是以愚民政策、思想鉗制為其存在條件。”

實在說，一個 23 級教師與一位副省級幹部根本無任何“關係”可言⁴。潮洛蒙到師院講話，我僅僅是少數聽講者之一。

1998 年夏天，我的朋友汪浙成來內蒙。浙成夫婦六十年代初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響應黨的號召到內蒙支邊。他和已故的夫人溫小鈺擅寫中篇小說，不止一次上過全國文學創作金榜。他們經歷了內蒙文革，八十年代後期雙雙調回家鄉——浙江杭州。浙成現任浙江省文聯副主席。見面交談中，他突然一轉話題：“樹華，我腦子裏有一個周旋了幾十年的問題，不好意思問你，我能不能問？”

“浙成，我們是多年朋友，你儘管問，我不會生氣，不會拒絕回答。”

“你究竟和烏蘭夫那夥人有沒有什麼關係，那個姓潮的是不是你的後台，或當過你的後台？”

我如實地向他說明了三十年前發生的一切。他感慨地說：“原來如此。我告訴你，和我一樣關心你的不少朋友，心裏都裝著我提的這個問題。你應該寫出來，僅從以正視聽上講也是必要的。”

我和潮洛蒙真正平起平坐地談話，只有一次。那是 1976 年春天，我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書記時。一天，我和另一位書記蘇和商量事情。蘇和站起來接完一個電話後，對我說：“走，和我去見一個很想和你見面的人。”於是，我們在呼市市委招待所二樓的一個套間內，見到一對頭髮半白的夫婦，可惜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蘇和介紹後，我方知，站在我對面的是潮洛蒙夫婦。

潮說：“我當了你這麼多年的後台老闆，卻認不得你。你在師院時的樣子我一點兒也想不起來了。運動中不知有多少人找我外調⁵你，有的硬逼我承認是你的後台老闆，看，這事！”

我無法對接壓在心底的沉重話題，只好把話鋒一轉，和他們談起他們的

⁴ 在中國當時的工資和行政級別體制下，23 級教師的薪水僅有 50 來元，而一個副省級領導幹部（行政八級或九級）的薪水，則高達兩三百元，相差好幾倍。除了薪水差別，還有政治、社會、心理和其他物質福利上的鴻溝。總之，在一個等級森嚴的封閉式社會，巨大的級別差異，使高幹和平民極少有交往機會。

⁵ 外調，即“外出調查”的簡稱，又分發函外調和派人外調兩種。指中國政治運動中，對相關事件和當事人進行官方調查的行政程序。調查方除了要求當事人寫有關情況介紹外，還要求書寫“證明”或“揭發”等材料。

外甥。他外甥屬革命烈士後代，一個返鄉知識青年，前年想入大學學習。作為中共土左旗副書記的我，按政策，把他送入內蒙師院學習。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第一次找我時，手拿兩封引薦信。其中一封出自一位懷疑我是烏蘭夫黑幫的反烏左派之手。這位造反戰友，以反烏出名，現在何以向我引薦烏蘭夫黑幫幹將的外甥？他與潮洛蒙什麼關係？我不得不向來者請教，他說：“他一直暗裏同情我舅舅（指潮洛蒙），還幫助我們，有不少年了。”

潮洛蒙夫婦承認這是事實。二十分鐘後，共同話題結束，我離開了招待所。

這是我與潮唯一一次平等地對話。幾年後，我被關押在呼市看守所。一次放風時撿到一張又髒又破的“內蒙古日報”，看到潮洛蒙已榮任內蒙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烏蘭夫長子布赫，成了中共內蒙黨委副書記。而烏的三子力沙克，此時正在赤峰市副市長任上。

第十一章

北京告御狀

面對逐漸升級的事態，我認爲，內蒙沒有什麼人能阻止韓明、古東的極端行徑，我必須去北京向黨中央，向毛主席告御狀。劉樸、劉真、樓基立支持我的意見，三人拿出 30 元錢資助我的行動。六十年代，劉真、樓基立兩人的月工資爲 56 元，我和劉樸月工資僅 49.5 元。平日，我輩月伙食費用約束在 15 元左右。劉樸說：“你走了，形勢正能頂住，一定要盡可能在京城把情況匯報給上面。”

一，皆為同路人

劉真、樓基立建議我再找一個人爲伴，遇事處理方便。俄三團支部書記雷善元願意與我同行。當天晚間，和我一塊留在系裏教書的同班女同學王桂貞，去師院附中把我妻子宗馥華秘密找來與我見面。我和妻子匆匆話別，臨走時她把我們家中的全部積蓄拿給我，約四、五十元錢。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三次去北京，下火車後仍不知落腳何處，只能按前兩次在北京小住的印象去摸。我和雷善元暫且住進前門一家老字號的中華旅社，一個古香古色的舊木製兩層樓，腳踏在樓板上會發出吱吱聲響。服務員是一位 40 多歲的中年男子，我們尊稱他叔叔，他很滿意。

住下後，我向他打聽黨中央設的文革接待站的地址，他象許多北京人一樣，對我們這樣的外地人，來北京做什麼，呆幾天，家居何處等有關事宜十分有興趣。我們也毫不設防，把他的一切詢問看作是對自己的關心，全告訴了他。我們倆稍做休整後，按照指點直奔府右街。

中午時分，那裏的人仍很多，從言談舉止不難看出，70%以上的上訪者是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大家坐在地上相互交談，等待接見。我們一問，原

來這些人和我們的命運相仿，不是被校方審查，就是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小爬蟲”、“野心家”之類。聽到這些我的心反而輕鬆了，起碼明白了一點：發生在內蒙師院的事情是全國性問題。這時，我和雷善元感到餓了。

我們挑選了最廉價的小飯攤上最廉價的食品：麻醬冷面。每人吃了三碗後，飯費已花了四角八分錢，兩人同時止住了再來一碗的欲望。回旅店的路，雷在一個菜店門外看到論堆處理的黃瓜，雖然黃瓜過粗過細且不新鮮，但一堆只要三分錢，若再花三角錢買十個小燒餅，無疑是一頓美餐。

服務員阿叔看見我們不雅的吃相，送來一紙包鹽，說了一句令人感動的話：“跑了一天，出了那麼多汗，不見鹽怎麼行！”並且關照我們樓下可以沖澡。

從牢籠裏跑出來的我們，感到北京真是個天堂，自由舒暢，條件這麼好。晚上，阿叔領來一位員警，說要找我們問問。我們剛剛把白天汗浸的衣服洗乾淨搭在木樓欄桿上，第二天還得穿它上訪，只穿一件褲頭的我，連忙解釋我們的不禮貌，實在出於無奈。和善的首都員警笑了笑說：“沒關係，我能理解”。我們想給他倒杯水，屋裏僅有一隻破口杯子是自用的，也只好罷了。

員警查看了我們的證件，例行問了幾個問題，關切地說：“上級有交待，對你們這樣來京上訪的師生，我們不僅歡迎還要保護。你們安心去辦自己的事，有什麼事情可以找我們。”說完，有禮貌地告辭了¹。

“北京真好，到底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愉快的心情，隨我進入來京上訪後的第一個夢鄉。

第二天上午，中央接待站的兩位同志聽我們講了半個多小時，之後交待說：“你們可以找華北局接待站，那裏專門有人解決華北地區上訪師生的事情。”他們給我們開了一封介紹信，詳細指點路線，勸說我們，可住在華北局的臨時接待處，不花住宿費。

¹ 在當年嚴密的戶口制度控制下，北京居民有外地親友來訪過夜，必須向派出所（基層員警機構）申報臨時戶口。同樣，員警夜訪我們住的小旅館，說明服務員有向警方彙報客人情況的義務。如果警方認為可疑，便隨時到場盤問，並查看證件。這同外國許多地方的員警，“不經過法庭授權，不得任意對私人進行盤查”的現代文明規定，的確有很大區別。

我們深感北京工作的細緻，回前門後馬上退掉床位，和阿叔告別。當天下午在華北局接待站見到了一個姓關的男處長和一位女辦事員。

關待人親切，極有耐心地聽我們陳述，而那位女士卻一臉不耐煩，不時發出有感情色彩的聲音，顯然不願再聽下去。我抑制著情緒把每件事講清楚，不單是爲自己，幾百名師生正等待著我的回音。

聽完後，關讓我們把情況的要點和要求寫一份材料第二天交給他，還爲我們聯繫好住的地方。

接待處實際是一個舊式的四合院，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區的白塔寺²附近，院子中間有個自來水管，是一天中最忙的地方。東西南北的屋內清一色是磚頭架著大木板，木板上鋪著席片的大通鋪。每到晚上，院子裏變得熱鬧非凡，河北、山西、內蒙、天津的各色口音充溢在天井，全部是各大專院校的師生。男生住偏房，女生住正房。餓了出去買燒餅啃，渴了喝自來水。院內的水龍頭響聲會延續到半夜。不排隊等水的人們，會三五一群坐在院內，交談各地文化革命的情況，時而相互爭論，時而唉聲歎氣，時而又慷慨激昂。有剛來的，也有住了十多天的，一批連一批，每天總有四、五十人在這裏過夜。讓大家心安的是，逃到北京告狀，總歸有了個歇身之處。儘管每個人頭下枕著自己的小包或鞋子，身蓋一件自己的衣服或什麼也不蓋。多虧北京夏天的炎熱，不難爲這群身無幾文的年輕人。

二，山大朋友的政治箴言

坐在院內可清楚看到白塔寺內白塔的上半身。每當黃昏，在斷續的蟬聲中，白塔的塔身變得越來越朦朧，只見塔尖挑起片片金色晚霞，把北京的上空襯托得一片吉祥平和。我能感到它，我祈求神靈能給我們帶來好運。

離我們住處不遠是魯迅先生故居，正在閉館整修，我只能站在門外向裏

² 位於北京阜城門內大街路北妙應寺（亦稱白塔寺）內的白塔，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大的藏傳佛教喇嘛塔之一。塔高 51 米，磚石結構，通體潔白。

窺視，用想像尋找哪裏是《百草堂與三味書屋》³裏所描寫的“老虎尾巴”，哪棵樹是棗樹。一次上訪回來，我們偷偷溜進了不遠處的徐悲鴻故居，雖然各門緊閉，沒看到徐大師的佳作，但仿佛感到了他筆下那匹奔騰駿馬震動大地的噠噠聲。

這次，我認識了山西大學一位姓夏的年輕教師。因為都是教師，我們兩個人很快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他到京已經一個禮拜，對我講的內蒙師院文革情況只用一句話概括：“山西大學的工作隊和你們學校的工作組一樣可惡。”根據他向華北局上訪的體會，中共華北局解決不了高校出現的這些問題，他甚至懷疑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是否真正擁護文化革命。他還告訴我，陝西西安的情況更嚴重，已經發生工作組整死學生事件⁴。

最後，他用自己的歷史觀分析說：“自古以來，造反的都沒有什麼好下場。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天下，應該不同。”他建議我在等待領導接見期間，可以去北京各高校看看，親自感受一下京城大學的文化革命氣氛。我接受了他的建議。

到京當天，我通過郵局向師院外語系工作組組長楊慶魁發去了請假電報，報告了我的去向和到京目的。同時用事先商量好的暗語，把瞭解的情況和住址通知了外語系劉樸等三位。幾天後，政教系學生李克林等，陸續到達北京。他們說，還有二百多名師生，繼續堅持和工作組鬥爭，大家感到艱難，希望能從北京得到鼓舞和力量。

我們每天去阜成門華北局大院門口的接待站，那裏總有數十、上百人等待某個領導接見，企盼著真正的支持。接待站天天會出現一批新面孔，來上訪的師生正在增加。每一位逃到北京的學生，會向關處長送去新的情況和材料。漸漸，我發現關處長能理解我們的訴說，同情我們的遭遇，常常安慰我們，並告知，上訪的材料已經轉到仍在北京開會的內蒙黨委左派書記手裏。

³ 《百草堂與三味書屋》是魯迅先生的一篇著名散文，描寫其故居的情況，收入當時的中學《語文》課本之中，因此許多學生都熟悉它，其寫作風格也影響了幾代人。

⁴ 後來我們才得知，蘭州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等地，都發生了工作組整死學生的慘案。這些人命案件和受壓學生發往全國的《緊急呼籲書》，迅速觸發各地造反派師生前往聲援的行動，也從此開始了學生可以免費乘火車的全國範圍的大串聯。

關處長的助手，那位開始對我們明顯不屑的女士，也變得熱情了。

夜晚，當我把華北局接待站的態度變化告訴山西大學的夏老師時，他只是笑笑，勸我不要過分激動，要保持冷靜的思考：接待員只是最普通的工作，他們的任務是上傳下達，並不能說明事情有什麼希望，上面領導說話才算數。

在等待中，我和幾位同學一起去了北大。1966年7月初的北大校園裏冷冷清清，貼在牆上的大字報七零八落，紙面上殘留著被雨水沖刷過的痕跡。學生像在按時上課，靜悄悄的。未名湖水邊雜草叢生，水面上平靜地長滿了一層綠色水藻，整個北大沒有一點兒活力。

我們來到北大哲學系系辦公室，要求與聶元梓見面，被拒絕了。我們堅持不走，北大工作人員只好妥協，但提出一個附加條件：見了聶元梓後要離去，不能纏住她提問題。趁工作人員不在，我對同學們說：“聶如果能來，也只能說幾句應付話，你們先走開，我和她單獨談幾句，也許會瞭解到什麼。”

一會兒，聶元梓穿著一身淺灰色的衣服，隨那位工作人員來了。她邊和我們握手邊說：“歡迎你們到北大來，讓我們一起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按我們商定好的，其他學生從另一邊門向外走，我站在聶元梓前面，直率地提出一個問題，我預想她不可能聽我全面陳述發生在內蒙的文革情況。

“我是個教師，是聽了中央電台廣播了你們大字報後受到鼓舞，向院黨委書記寫大字報的。工作組進院一個多月，鎮壓我們，現在仍有幾百名師生堅持反抗，不知你們是否也是這種情況？”

“你在北大校內看到的是什麼，就說明了什麼。”聶答。

“你認為我們該怎麼做？”

“只要自己的行為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就要堅持下去！”聶回答得很原則。

我和聶元梓邊走邊向她談起來京告狀的簡單情況，當聽到每天有幾百陌生面孔擠在府右街接待站時，她顯然心動了，吃驚地問：“有這麼多？”

在拐彎處，我們握手道別時，她放低聲音對我說：“毛主席已經回到北京，正準備召開一次重要會議，專門研究文化革命問題。我相信，毛主席會

支持我們的，前途光明。”

第二天，和我一起到過北大的學生，把和聶元梓見面的事用電報發向學校，造反師生受到了鼓舞。我不瞭解聶元梓在文革後期的所作所爲，但我當時見到的聶元梓是有氣度的。

我還去過北京工業學院（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校內更看不到搞文化大革命的痕跡。我的妻舅在該校工作，他告訴我，學校傳達的是“內外有別”和“貼大字報注意保密”這些注意事項。該校也進駐了工作組，不過沒整學生，只是組織師生學習。

當北京許多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一片蕭瑟時，內蒙古師院的造反師生仍在苦苦堅持。

三，不屈的羔羊

隨著“七·六”大字報在院內爆炒幾天後，連高樹華用什麼牌子的牙膏之類瑣事，也登上了大字報的殿堂。除此之外，工作組及其麾下的積極分子們，再也拿不出什麼足以打倒我的東西，只有那些把整個師院鋪了幾遍的“打倒黑幫分子高樹華”的大標語，仍顯示著神威。

工作組牢牢控制了對師院的領導權之後，有些承受不住壓力的同學，不得不表態支持工作組。外語系英四學生呂文通⁵，7月6日曾寫了一張有名的大字報《搬倒大樹⁶，倒戈起義》。7月11日，他聲明這張大字報作廢，“是自己出賣真理而寫成的”。“倒戈後我怎麼也揭不出高樹華的反黨言行，在大黑帽子底下做不成文章，我不能再昧著良心陷害自己的同志。”這張大字報引起積極分子的圍攻，說他是“文通理不通”，但在呂文通影響下，造反

⁵ 呂文通，漢族，內蒙古伊克昭盟人，為人樸實厚道。文革之後曾經到內蒙古大學任教。九十年代中期移居美國。

⁶ “大樹”在此一語雙關，其一說高樹華是造反派的領頭人；其二是對高本人的直接稱謂。因為高樹華人名中有“樹”字，外語系同學常常用“大樹”或者“高大樹”稱呼他。為此，藝術系美術專業的保工作組派，還曾經畫過一幅漫畫，形容高樹華及其支持者，在工作組的圍攻之下，“大樹已倒，小猴子們紛紛逃命”，漫畫的標題就是“樹倒猢猻散”。

者人數有所增加。

在師院北牆外郵局工作的小張“揭發”我：河北邢台發生大地震（1966年3月）第二天，第一個到郵局給河北災區寄去20元人民幣。小張為此挨了批判；師院鍋爐房工人“揭發”我：1965年春天，師院南鍋爐房發生爆炸，第一批衝進去救人，弄得滿身是血。總務處工作組質問寫大字報的工人：“立場在何方？”俄三學生“揭發”我：帶領學生到農村勞動時，不准摘農民菜地的黃瓜，不准隨便拿走教職工用的排球。工作組向寫大字報的學生發出警告：“不要你的黃瓜和排球！”

7月14日，困獸猶鬥的外語系196名師生簽字，寫了一封最後通牒式的信，題目是《給孫培卿、車進才的一封信》，現摘錄如下：

你們7月6日給師院送來一張題目為《高樹華的後台老闆是誰》的大字報，斷言“高樹華在潮洛蒙的支持下，有組織、有計劃地反對文化大革命”……云云。

你們說：“我們是有事實的，到一定的時候就把事實公佈出去”。我們已經等了一周，然而你們的“事實”仍然杳無音信。為此，我們強烈要求，如果你們在15日晨6時之前不把能說明高是黑幫分子，他的後台老闆是潮洛蒙的充分事實送來，我們則認為你們是“企圖把文化大革命攪亂、攪混，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製造混亂，是蓄意破壞文化大革命”。你們曾說，“不能說貼一張大字報就負責任”。沒見《人民日報》社論說的：“你貼一張大字報，就得對大字報的後果完全負責，要不是這樣的話，誰還敢寫大字報”？在這裏，我們鄭重指出：你們必須對你們寫的大字報，及其所引起的後果負責任。”⁷

⁷ 我至今感謝1966年夏日師生們對我的信任，我至今為此而自豪。那時那種無私向上的精神財富，現在已無處可尋，它來自於人性的純真，來自人類共有的精神寶庫。可惜，今天這個寶庫正在毀滅，取而代之的是爾虞我詐、欺騙、冷酷、貪汙和腐敗。

在北京，來上訪的師生凝聚成一個小團體，大家四處瞭解全國文化大革命情況，等待著華北局首長的接見。華北局接待站關處長和他的女助手已經完全站在我們一邊，幫助我們向上反映情況。可是，我們十幾個人的生活成了問題。開始，大家吃飯，我掏錢。幾天後，每天兩頓的最廉價的食物，已讓我囊中羞澀，為減輕負擔，有幾個同學提前回校。

7月15日下午，我們終於盼來了領導接見。

四，接待站的油臉

接見人是中共華北局一位姓楊的副秘書長。此人低矮的個子，一張油光放亮的胖臉，說話時不停地“啊，啊”，像在作報告。在中國官吏中，這種面相和語氣的人太多太多。

正如山西大學夏老師所預料的，楊秘書長開口講話便給我來了個下馬威，他指著我說：“你是個共產黨員，家庭出身很好，是共產黨把你培養大的，怎麼反共產黨？”一聽此說，我吃了一驚，立即轉驚為怒，頂撞他說：

“我沒有反共產黨，永遠也不會反共產黨。如果你沒聽我們一句匯報，抱著這種態度接見我們，我寧願不見你，我可以馬上就走，我還有離開這裏的權利。”

楊見我絲毫不畏懼，立即改用緩慢、溫和的語調說：

“我不是說你反黨，我只是不太理解你們反對工作組的行爲。當然了，工作組也辦了不少錯事，你們反對他們的錯誤也是應該的，可以的。但是，黨內、黨外還要有區別嘛。不能用大字報公佈工作組的事，上網為黑幫、黑線嘛。”

楊的話自然引起當場師生的反對，接見成了一場辯論會。儘管楊遭到學生們駁斥，仍能保持滿臉微笑、不急不惱的神態。被接見的師生見此情景，已心灰意冷，共同認為，和這樣一位十級大官談話，真不如對牛彈琴。楊告訴我們唯一有用的話是，“我在見你們之前和內蒙黨委權星垣通了電話，他轉告你們，內蒙黨委很快派工作隊再次到師院，有事情找他們。過幾天，權

星垣就回內蒙了，找他也行，不要在北京多停留了。”

關處長和他的助手送我們出門時一再安慰我們，但大家心裏已然明白，決定乘當晚火車立即返校，我一人留下殿後。

當晚我和山西大學夏老師一直談到下半夜三點，他反復勸說我不要回去。“你回去後必被工作組抓起來，工作隊不會比工作組好到哪裏。歷史上從來官官相護，百姓遭殃，你們那裏能不一樣！”

他還說：“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見，我也不回太原，我已打聽好了，北京郊區有挖沙子⁸的地方，正要工人，憑我們倆的身體，準能養活我們自己，還可以靜觀變化。如果真如聶元梓說的，中央準備開會研究文革，等中央下了決定不遲，那時再選良策。”

夏是一片好心，但我此時想到的是留在學校的幾百名師生，我不回去，豈不令他們失望？我沒什麼錯誤，更不是黑幫，怕什麼，爲什麼不敢回去？我這個主要角色不回去，誰承擔責任？

7月17日早晨，我毅然回到內蒙師院。不錯，那裏等待我的是失去自由和囚禁，一切均被夏料中了。

我也曾假設過，如果我和夏真的去挖沙子，等到8月8日中央公佈了16條⁹後再回校，這一切就躲過去了。但生活沒有“如果”，人更不能靠追憶過去的“如果”找慰藉。眼下，現實的每一天、每個小時的人生過程最重要，也最實際。

⁸ 作為建築材料的沙石，在北京是永遠有需求的物資。由於挖沙地點偏遠，苦累而又低報酬，因此沙石場的勞動力主要由勞改犯或臨時工充任，不需要什麼介紹信或正式雇傭手續，而且是計件工資，憑立方米付給現金。以我的體力，一天可以掙到兩三塊錢，夠在北京的吃飯開銷。

⁹ 即《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因共有十六條規定，故簡稱“十六條”，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正式檔和總動員令。詳細內容，參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刊登的全文，以及1966年8月13日配發的社論：“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這些文件，還被收入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學習十六條手冊》（增訂本）中。

第十二章

工作隊的外圍戰

我回校當天，新來的工作隊悄悄進院了。最初，造反師生以為，工作隊會避免工作組的錯誤。僅僅過了一天，工作隊的面目已被師生看破。工作隊員一副救世主姿態進入各自崗位後，不避嫌地公開宣稱，他們來師院就是要解決高樹華問題的。外語系隊員許金重說：“高樹華是黑線上的人物。”

一，以高樹華為界

1966年7月19日，在批判陳覺生的大會上，內蒙文教工作團團長蔣毅，副團長兼師院工作隊隊長全家福（又名全鋒），以及韓明，分別講話。他們承認工作組對文化大革命不適應，有缺點錯誤。之後，韓明介紹全家福是北京來的，是革命左派；全家福說韓明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接著，全家福在會上痛斥師院一小撮人，陰謀篡黨奪權，指出今後運動的大方向就是要收拾這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人。台上台下，都知道這指的是誰。

後來搶出來的黑材料證實，全院1000多名師生員工，點名批判的有443名；外語系共有300多師生，準備打成右派的有249名。有一篇大字報，是東縱八一戰鬥隊1966年11月3日寫的“兩條路線、兩種命運的大決戰”，副標題為“內蒙師院文革五個月的歷史回顧”。該文第7部分專門敘述工作隊進院的問題，小標題是“對革命群眾實行全面資產階級專政”，摘錄如下：

以全家福為首的工作隊，與古東為首的工作組合二而一，隊員由20餘人增加到40餘人。工作組想幹而沒來得及幹的，工作組不敢幹的，他們幹了。這個工作隊比古東的工作組更壞，執行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更加賣力。……

他們採用分化原則，挑撥離間，威脅利誘。他們的口號是：“先過來的是認識問題，後過來的是立場問題”。7月23日，全家福對革命師生下了最後通牒，完全暴露出他的劊子手凶相¹。

在全家福的黑暗統治下，過去與高樹華有過一線聯繫的群眾，或者反對工作組的人統統被扣上“反黨分子”、“右派”、“黑幫幹將”的帽子。……

二，農村包圍城市

拿下政教系、藝術系

政教系一位教師，在1966年9月6日大字報中這樣寫道：

[工作隊]指定XXX重新檢查，說他與外語系某些人串聯，不是認識問題。因而，一連檢查了三次，已經檢查到“自己的言行，在客觀上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但還是通不過。工作隊員老王說：“你左一個遇到，右一個碰見，為什麼這麼多偶然巧合？”言外之意就是要他承認就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

僥倖未列入右派名單，但被注入另冊的，在師院至少有一半人。政四有六個學生，即曹青海、李克林、陳向前等，只是寫了一張不同意工作組觀點的大字報，為此，工作隊給他們戴上了“反黨”帽子，組織積極分子對他們批判、圍攻，逼迫他們作出痛哭流涕的檢查。

師院藝術系工作組組長王賢敏被原單位揪走後，全系文革處於停頓狀態。三位青年教師向系內工作組請示，是否成立一個大字報編委會，起碼可

¹ 全家福為首的工作隊在全院下令，7月19日後仍與高樹華等人有聯繫的要檢查交待；7月23日以後與高等人有聯繫的是立場問題，要加重處分。他們顯然要用政治權力，來解決政治認識的分歧。

管理貼大字報事宜。在工作組員的認可下，大字報編委會成立起來。全家福爲首的工作隊進駐後，該工作組員轉換口風：“大字報編委會是大是大非問題，是要不要黨的領導問題。”工作隊確定藝術系文革重點是這三位教師。

其中有位女性，哲里木盟人，音樂專業畢業後留校任教，是院內最受歡迎的歌手。她被迫承認“反對了黨的具體領導，是反黨，是敵我矛盾”。工作隊還嫌不夠，要她交代“原始思想”。這位女教師被逼得沒出路，只好選擇自殺，幸虧搶救及時，沒出人命。工作隊不依不饒，稱她是：“反動本性根深蒂固，至死不改。先放一放，身體好轉接著清算。”另兩位，一位是民樂老師，內蒙人。另一位是教小提琴的華僑，兩人也是檢查幾次不能通過。

正如“東縱”²藝術系教師分隊9月3日大字報所說，“若不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報告，若不是撤銷工作組，工作組的錯誤將更加不可收拾，一些革命同志不知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³

19 歲的王璞

物理系一年級學生王璞等二十幾名同學，曾給古東寫過大字報。工作隊進院後，工作隊長徐某直接抓物理一年級，她說：“你們班有人不要黨的領導，有計劃地爭奪領導權。這是大是大非問題。”逼迫王璞第二天上午作檢查。

下面摘引王璞1966年9月7日寫的大字報：

我上午談了兩個小時，下午談了三個小時。在檢查中，我說：“我在黨和人民前面犯了罪，我喪失了無產階級立場，被階級敵人利用

² “東縱”的全名是“東方紅戰鬥縱隊”，是師院造反派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自發建立的紅衛兵組織。

³ 1966年8月1日晚，全校師生員工收聽由中央錄製的報告會錄音。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講話，承認他們派工作隊和工作組進駐高校的決定是錯誤的，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議宣佈立即撤出工作組（隊），支援“群眾運動”，讓“革命師生

了，客觀上起了對抗黨的領導……”

在我五個小時檢查中，根本沒承認什麼黑會，當然不會滿意了，所以他們提出所謂的意見：“你的檢查遠遠不夠，是避重就輕，躲躲閃閃，應好好檢查，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你們要把 20 多人引導到什麼道路上去？”

王璞僅僅 19 歲，在父母心裏算是個大孩子，工作隊卻讓他交待有反黨之心。在威逼下，他已經承認“客觀上反對了黨”，還要他交待主觀上有意識地反黨。

20 世紀八十年代，陳雲等大人物，主張對文革中班級戰鬥隊隊長立案登記在冊，要永不提拔。這顯然給王璞等人戴上了緊箍咒，直到他們年老體衰時，仍背著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⁴。

以下繼續摘引王璞的自我陳述：

於是在 30 日上午，我又做了一次檢查。

有些問題我說記不清了，這時全家福勃然大怒說：“你年紀輕輕的，剛剛一個月的事你就忘了，那才奇怪啦！……你的後台是誰，你談出來，是誰不讓你談出來的，啊！你要說出來。非讓同學們鬥一鬥你，你才談？……你要是願意跟黨走，你就起來揭，揭高樹華的問題……至今，有許多人還被你蒙蔽著，沒有轉過彎來。”

三，積極分子的直言

⁴ 打擊報復文革中敢於造反的正直青年，對於某些受過運動衝擊的共產黨高官，自然難免攙雜個人動機，要“出口鳥氣”，這完全可以理解。但作為執政黨和政治家，其決策不能不說愚蠢至極。有論者將它比喻為“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其實就等於共產黨在“自掘墳墓”。正由於當權者缺乏遠見，過分自私，不惜把敢言者，有膽識有理想的青年人一批批打倒，一批批淘汰，最後存活下來、能夠爬上去的，夠得上正人君子的忠貞之士，能有幾個？繼續沿人才“倒篩選”、“逆淘汰”的規律往下走，恐怕共產黨難以“永葆青春”，更何談千秋萬代。

師院工作隊到底是什麼人，若只聽王璞本人陳述有失公允。下面摘引一張大字報，6位作者全是運動初期保紀之，保陳覺生，再保古東爲首的工作組，又是工作隊重用的積極分子。大字報寫作日期是1966年8月30日。

全鋒的出爾反爾

一，對工作組的看法

工作隊剛進院時，全鋒對我們說過：“工作組和古東的問題是錯誤、缺點和毛病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在聽了中央首長報告後，全鋒說：“我以前不是對你們說過嗎？工作組的問題是嚴重的，意思就包括是方向性、路線性問題了。”……

二，群眾搞群眾

7月27日，工作隊佈置了兩項任務：一是揭發批判高樹華；二是組織整頓階級隊伍。工作隊撤銷後，全鋒否認有第二項任務。

全鋒親自參加物理一年一班王璞同學的班團幹部會議，並對王璞說：“你要革命，你就站出來，首先揭發高樹華的問題，交出你的指使者。我相信你背後一定有指使者。”

聽了中央首長報告後，全鋒對人說：“物一年級一班的問題是徐XX硬要搞的，蒙文林也有責任……，聽說王璞貼了大字報後，我就對徐說，這種做法不對頭，要趕快扭轉……”

僅就以上情況，不難看出全鋒執行了一條群眾搞群眾的錯誤路線。

物理系 蒙文林 等六人

8.30

說句公道話，1966年8月以前，全家福讓王璞等人交待與我的關係時，

我根本不知道有王璞這個人。

工作組在體育系組織師生批鬥兩個學生劉孝信、陳時光，逼迫青年教師張元一次次檢查，一次次不讓通過；在中文系關押漢四學生李福生上百個小時後，持續批鬥他，定他是“反動學生”。工作隊始終把秦維憲和李志文作為鬥爭重點，李志文此時和秦維憲等人被整得死去活來，已處半隔離狀態。

高壓之下，絕大多數人在7月19日後不敢再與我說話，有的躲避惟恐不及。

四，堅固的堡壘

工作隊攻破幾座主陣地後，開始收拾最頑固的外語系。外語系英、俄兩專業共計8個班。造反學生在外語系是絕大多數，是工作隊最難啃的骨頭之一。全家福丟棄了大將風度，氣急敗壞地大罵8個班：“都是高樹華這些人把學生帶壞了！”

細細思量，此話有些道理。這8個班中，我先後給俄三、英四、英二當過班主任（又稱政治輔導員），劉樸給俄四、俄一，樓基立給俄二，劉慶榮給英三均當過班主任。

俄三共47人，其中有40名造反學生，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大字報只簽“俄三40名”，是讓工作組心驚膽寒的稱謂。積極分子們為40人個個繪出漫畫頭像，懸掛牆上，命名為“高家軍點將台”，總稱俄三是“黑幫分子的頑固堡壘”⁵。

從6月3日始，俄三始終站在反院黨委、反工作組鬥爭前列。俄三教室成為全院造反學生的棲息地，直到工作隊進院。全家福與外語系工作隊長劉東明親自抓俄三問題。他們在外語系成立專案組，在俄三成立挖根隊，逼迫所有學生把日記交出來。工作隊從學生日記中找線索，在日記本上留下骯髒的筆痕。

全家福裝出一副寬容豁達的樣子，與俄三同學對話。以下是俄三大字報

⁵ 這些漫畫作品中，包括上文提到過的那幅藝術系傑作：“樹倒猢猻散”。

披露的部分對話記錄：

有同學問全家福：“您看過高樹華寫的大字報嗎？您知道他寫過幾張大字報？寫了些什麼？”

全答：“我沒看過，他能寫什麼，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

同學們又一陣哄笑，問：“如果高公開寫這些，不是早揪出來了！”

全得意地講：“他字面上寫擁護黨，字面下反黨。”又一同學問：“全家福同志，您看過內蒙文委送來的那張大字報嗎？”

全說：“沒看過，是革命大字報，還用看，還用說嗎？”

同學追問：“你沒看過，怎麼就知道他們的大字報是革命的，高樹華是反革命的？”

全說：“大字報是內蒙文委送來的，當然是革命的。”

同學接著問：“按照你這種邏輯，烏蘭夫還是中共內蒙黨委第一書記，烏蘭夫應該是最革命的嘍！”

全不滿意地說：“你們怎麼扯到這個問題了？”

同學們說：“全家福同志，你為什麼怕說烏蘭夫問題？你在民委工作，烏蘭夫是你的上級，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全家福大怒：“我放下架子和你們對話，你們倒反問起我了，難道我是烏蘭夫黑幫嗎？”

當全家福大怒時，同學們哄然大笑，全家福更為惱火。這時劉東明上台訓斥同學：“俄三學生的毛澤東思想水準最低，今天為難全家福就是水準低的表現。”

俄三同學不吃劉東明這一套。一個同學站起來問：“劉東明，你的毛澤東思想水準高，你能背誦幾條毛主席語錄，你敢不敢和我比？”

在俄三同學的起哄下，劉東明一時下不了台。同學們就勢全體鼓掌，歡迎劉東明背語錄，“背三條，我們也服了”。劉不得已，結結

巴巴背了兩條，背第三條“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時，慌亂中說成“不是繡花鞋”，這自然成爲天大笑話，台下一片譁然。有的同學笑得前傾後仰，有的笑出了眼淚。之後便是一片質問聲、抗議聲，“劉東明狗膽包天，篡改毛主席語錄！”⁶

到此，全家福、劉東明對俄三班的勸降只好收場。

工作隊最終用他們的絕招——翻學生的家庭和個人檔案，找毛病，各個擊破，瓦解了學生們的反抗。不僅俄三，外語系和全院造反師生在強大的壓力下，心裏滿懷著委曲和不平，不得不寫大字報與高樹華劃清界限，承認自己錯了。

工作隊終於攻破外語系，對造反師生的討伐達到空前一致。“高家軍點將台”、“高家店黑幫黑線譜”，林林總總的名稱大同小異，全冠以“高”和“黑”兩個字。總計一千多名師生的內蒙師院，工作隊抓出了三、四成反革命，成績可謂大矣⁷

⁶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朋友，或許對這一幕情節無法理解，但它卻非常真實。背頌毛語錄（又稱最高指示），當時不僅是風氣，是時髦，而且也常常能用背語錄保護自己，進攻他人。由於毛語錄（洋人稱之為“小紅書”）本身的雜亂無章、模稜兩可和自相矛盾，論戰雙方往往可以各取所需，尋找對自己有利、對對方不利的語句，或大聲背誦，或貼上牆頭，或引亢高歌（唱語錄歌），從而實現政治目的。

⁷ 當然，工作隊的“勝利”極為表面和短暫。就在全院似乎異口同聲聲討“黑幫份子高樹華”的時候，外語系仍然有許多“鐵杆造反派”拒絕投降。例如在英三全班四十幾個同學中，拒絕批判高樹華的人，起碼有畢武卿、王景林、張達仁、劉東升、翟希民和程鐵軍等六人。後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我們才從工作組紅人那裏得知：這些拒絕向工作組投降的“頑固份子”，都被工作組和工作隊一一打入了“另冊”，即到運動後期要“秋後算帳”，輕則開除學籍，重則勞教判刑。

回想這段歷史，在如此兇險的政治鬥爭中，毛能夠及時制止劉鄧導演的另一場“反右鬥爭”，把這些即將有難的青年人解救出來，無論其個人動機如何卑鄙，其手段之高超是毋庸置疑的。這也正是毛領袖能夠煽動狂熱、動員青年學生去癱瘓各級黨組織的秘密所在。

第十三章

工作組的核心戰

工作隊的外圍戰初戰告捷，又馬不停蹄進入了第二階段戰役——核心戰。和我一起共同寫大字報的劉樸、劉真、樓基立自然是突擊重點。工作隊採用分而治之手法，對三人進行非法審訊。

一，攻打“總統府”

1966年7月26日，工作隊先審樓基立。樓如實講了從6月3日到7月的主要事件經過，工作隊員以威脅的口吻說：“你們要與高樹華劃清界限，要有實際行動，否則嚴加懲處。”

7月27日下午，由三個工作隊員審劉樸，三名學生記錄，他們輪流打劉樸的態度。劉樸剛剛動過頭部手術，屬病癒恢復期，刀口處仍有炎症。劉樸提出給點休息時間，邊休息邊想問題。工作隊不允許，其中一人挖苦地說：“問題交待出來就不疼了。”

工作隊同時審劉真。全家福親自出面，系工作隊隊長劉東明和院工作隊另一負責人“三堂會審”。劉真不想對抗，剛掏出兩個工作簿準備談問題，工作隊長馬上讓學生把劉真的本子收繳（直到審訊結束，在劉真強烈要求下，只還給一個本子）。

除了以上三人，外語系教師王桂貞、張貴祥、劉慶榮、梅青田、徐羨貞、黃友宏、金龍琚、張淩雲等，都被工作隊傳審過。張淩雲對審她的隊員許金重說：“王桂貞這幾天情緒不好，希望注意一下。”許金重說：“她死了才好呢，沒人爲她負責。”

福爲首的工作隊。但他們沒有一個人面對面訓斥、辱罵那些曾經大打出手，現已失勢落魄的工作隊員，更沒有動過他們一個指頭。

幾十年過去，師院外語系造反教師飄散四方。他們中有些人數經磨礪，清醒許多，不再“革命”；有的可能到死也沒明白，他們所做的一切，究竟是正義行動，還是被當權者愚弄。

劉樸的病越來越重，臥床不起十餘年，他仍關心政治，每天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必看。他多次住院搶救，又從死亡線上返回，國家的命運如同生命一樣重要。劉真在軍管時再次受審。七十年代，滿心酸痛的他隨北京籍的妻子調到燕山石化公司。

張貴祥、黃友宏等經歷了幾次沉浮後，紛紛調回原籍。他們在原籍人的善待下，在平靜的書桌前，一步步走到教授的位置上。

金龍琚，四十年代的老黨員。1970 年軍管時，從上海轉來一份材料，涉及金龍琚。外語系軍宣隊兩次去上海外調，均無法證明她是叛徒。即便如此，她還是被迫提前退休¹。

劉慶榮等幾位教師，仍留在師院外語系。他們對新的鬥爭不屑一顧，躲在書齋內搞學問，後來獲得副教授和教授職稱。

樓基立，這位 1961 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的優秀生，在挨了幾次整之後，不幸患肝病身亡。他默默地工作，又默默地離去了。我深深懷念這位完美的好人。

上面提到的或未提到的朋友們，如今均選擇了不同的生存方式。我們談起文革，沒有激動，也沒有懊悔，我們不曾惡意迫害過誰，要自責的是我們過去太年輕、太迷信。當我們真正醒悟時，歲月悠忽，青春已逝²。

¹ 在政治掛帥年代，一份官方的“證明材料”或“外調材料”，只要涉及所謂“重大問題”，輕者，也要讓當事人長期受到懷疑和歧視；重者，往往可以毀掉一個人的前途甚至家庭。而“材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往往並非當權者的考慮重點。因此才有所謂“一張郵票八分錢，辛辛苦苦查半年”的笑話。意思是說，你要想“揭發”誰，只要寫封匿名信，貼八分錢的郵票寄出去，就得讓那個人所在的單位忙得不亦樂乎。

² 行文至此，不免要涉及“自責”還是“它責”的問題。細細想來，後悔是難免的，但自責卻是不必要的，因為以歷史眼光看待當年，我們無罪無責，當然也就無怨無悔。如果說責怪，主要是它責。首先西青叔毛澤東的愚民政策，他不讓我們獨立思考，我們又如何分清

二，大魚入網

上訪無效，工作隊來幹什麼也初露端倪。我約三教師在劉樸宿舍最後一次會面。我主動提出：“你們三人要儘快寫大字報與我劃清界限，對我的北京之行，主動揭發。”三位同伴不同意，覺得這樣太卑劣。我力勸他們：“工作隊主要是來抓我的，你們儘早與我拉開距離，保存自己，我左右已如此，你們早解脫，我也輕鬆了。”三人於是決定第二天貼出與我劃清界限的大字報。

從劉樸屋裏出來，天完全黑了。我該去哪裏？想回家的念頭一時十分強烈，我必須安排好與我相濡以沫的妻子。學校北門一向大開，人們可自由出入，此時卻戒備森嚴。我從黑暗處突然出現，讓守衛大門的三個學生大吃一驚。他們問我去哪裏，可能想攔住我，我大聲告之：“回家！”便昂首走出校門。

從北門去師院附中（當時稱呼和 16 中）要穿過十幾棟師院家屬平房，再穿過一片菜地和農田。安靜的夜晚是美好的，但我自己卻美好不起來，我的心像壓上了幾噸重的石塊。

運動開始一個多月來，我天天在工作組、工作隊的眼皮底下生活，各式各樣的目光，各種不同的態度，是我 25 年歲月裏從未經歷過的。北京接待站的見聞起碼讓我看清一點，這不是我個人的事，也不限於師院幾百人，這肯定是全國的事。那爲什麼毛主席不管這種事，讓成千上萬忠於他的年輕師生被專政？

我走在通往家裏的小路上，一個個疑問掠過心頭，亂糟糟的，一時無法

是非曲直？第二，要責怪共產黨的專制制度，是它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政治的荒誕；第三，還要責怪五六十年代的一整套教育制度，包括知識教育和思想教育，把有血有肉的青年個性，侏儒化爲一黨專政的工具和螺絲釘。這套制度，要麼把青年人引向法西斯狂熱；要麼把他們造就成利慾薰心和不擇手段的世儉；要麼就是培養成馴服工具型的庸人。而那些真正有見地、有個性的青少年，未等成什麼氣候，即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成爲專制制度的犧牲品。

理清。我們眼下怎麼辦？我自己該怎麼辦？我停步在盛開的大片向日葵旁，挺立的植物如密集的兵陣排在我身邊。

我不能不想到我的妻子，我知道她在這所中學裏是孤立無援的。我周圍畢竟有一批師生，她周圍沒有誰，由我而涉及到她的大字報已經貼到 16 中的校園裏。師院數學系有人仿照內蒙文委，敲鑼打鼓給她送去大字報。工作組員讓她站在院內接大字報，讓體重不足 80 斤的年輕女子面對上百人的圍觀。出乎所有人意料，她那麼平靜，指著大字報說：“我姓宗，不姓宋。”返身從屋內找到一支毛筆，讓送大字報的人自己改過來。

這一招讓數學系的人始料不及，當然事後引來更多的大字報，“黑幫分子的臭老婆，態度不老實。”想到此，我心中上下翻滾，酸楚不已，不由得掉下眼淚。白天，在眾目睽睽下，我必須挺立，只能在這樣的黑夜掉淚，淚水一旦流下來，難以抑制，積壓在心中的鬱悶，極力抗爭的艱難，仿佛都變成了淚水。

幾分鐘後，我的痛苦得到釋放。這時，我發現不遠處有幾個身影，是工作隊派來的“保鏢”到了，我不能在此久留。我完全從悲痛中清醒過來，起步向前跑，再突然拐彎鑽入牆邊一塊高粱地。這是我經常走的路，我知道南牆有一處大豁口，可直通附中蒙生班學生宿舍³。我甩掉了“尾巴”。

回到家後，家門口立時多了幾個“遊動哨”，不斷向屋內窺測，我和妻子只好滅燈悄語。面對比大山還沉重的壓力，妻子十分冷靜。她說：“學生給老師都寫了大字報，年齡大的老教師處境更艱難。關鍵是你自己。工作隊不會輕易放過你。咱們不是黑幫，沒反黨，說到底也不承認。我不信毛主席對全國大專院校發生的這些事不管。”

多少年過去了，我忘記不了 1966 年 7 月 20 日那個夜晚。高大向日葵的身影如同武士的方陣，能激發人的勇氣；妻子的話讓我冰冷的心由寒變暖。我一生有過多次險阻，妻子總是剛強地直面困苦和艱難，不迴避，不氣餒，

³ 師院附中（文革中一段時間改為市屬第十六中學）是呼和浩特市唯一一所同設漢生班和蒙生班的中學，即初、高中每個年級 4 個班當中，有兩個蒙生班，其中之一招收城市蒙族學生（會講漢語），另一個招收牧區蒙族學生。因牧區蒙生不會漢語，故老師完全用蒙語授課，並全部住校。

和我並肩抗擊身前身後的風風雨雨，她身軀瘦弱，卻有一身鐵骨。

在沉重的壓力下，我發燒病倒，在家躺了兩天。7月23日晚，外語系劉東明等強制我起床，到校檢查，不准回家，住在集體宿舍，只許同室張貴祥適當照顧我，禁止我與他人說話、來往。

人在沉默中，能找到冷靜，以理清心靈深處。幾天靜臥後，身體略有恢復，心理上漸漸找回自信。我不得不佩服山西大學夏姓朋友的遠見，他料定我從京返回的境況全發生了。

我不顧工作隊員的訓斥、阻攔，接連幾天晚飯後，在教工一樓南門的小道上來回散步以恢復體力。小道兩邊各有幾個崗哨警戒，是工作隊臨時安排的。晚上7點，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裏，傳出的黨中央聲音和各地文革報導，證實師院工作隊的行爲與之相悖，這是我唯一能得到的精神力量。幽黑的天空中只有繁星眨著眼，陣風吹過，道旁三排高大的箭桿楊發出瑟瑟響聲，如同綠色長矛直插雲天。我主意已定，還要跑，要找到山西大學姓夏的朋友，想再和他徹夜長談。再次見面，我的幼稚會減少幾分。

7月26日凌晨，我的逃亡計劃失敗，被工作隊員從車站截獲。他們“請”我上車，遭我拒絕。一個臉色鐵青的瘦削青年，身後緊隨一輛徐徐爬行的灰色華沙車的情景，引起周圍人的好奇。行走間，我猛然覺得這輛車如此眼熟，那不是院長們的專車嗎，我為何不能享用一次。於是，我有了第一次坐小汽車的體會。

工作隊一頓批鬥後，我被關押在師院招待所陰面靠外的一間屋內。該招待所佔據著走廊西邊的8個房間。以後，這裏成為造反派經常聚會的地方，人稱“八大家”，曾做出過多次重要決策。

三，籠中鬥士

持續264小時的監禁生活開始了。工作隊安排8個人站崗，防止我再次逃跑。一晝夜三班下來，竟要用24人次，高某可謂重犯了。工作組還安排每天審訊，突然檢查和搜身。

搜身的侮辱是不堪忍受的。我剛被監禁時，工作隊員搜去我的藥品、書籍，然後指著我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讓我摘下來。我問爲什麼，他們蠻橫地說：“別問爲什麼，讓你摘，你就摘！”其中一位滿臉兇氣的工作隊員進而訓斥道：“告訴你，現在讓你趴下，你就別想坐下。”我哈哈一笑說：“我倒小瞧你們幾位了，你們不信，誰敢挨近我，我就打倒誰。誰敢動我胸前的東西，我就撞死在牆上給你們看看！”氣勢洶洶的3名工作隊員膽怯了，靜悄悄地退出了房間。

他們爲我定了十幾條規矩，不准這不准那。我也給他們定了幾條規矩：不論工作隊員或看押人，進我的屋必須敲門，被允許方可進入；另外，我願意什麼時候在樹下散步，是我的事。

我用自己的強硬換取了些許慰藉，我的堅持，使我得到了有限的自由。我要求讀報，工作隊答覆我，沒有多餘的報紙給我。我提出反駁：“我自己訂的幾份報紙，我有權看吧！如果不讓我看，我就絕食。”我終於看到了自己訂的三份報紙，這是我時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

囚禁中的我最喜歡的事是每天去飯廳買三次飯，去南鍋爐房打三次開水。去飯廳買飯，可以從種種跡象猜度工作隊正在幹什麼，同事們的身體如何。去買飯還是一種短暫的享受，因爲食堂老師傅同情我，他們給我盛的飯菜質高量大，眼神特別柔和。

一天中午，還是那位地理系教師林汝耕，再次向我挑釁。我買完飯，正向門口走（後面跟著一位“保鏢”），林迎面攔住我的去路，開口嘲弄：“這回你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了吧！”

“請你走開，別不識趣！”我奉勸他，我不想在這種不利於我的時間與他爭吵，但我也願公開受辱。

“誰不識趣，你這個黑幫分子！”

“我告訴你，林汝耕，我不欠你什麼。我是不是黑幫，反不反黨，你決定不了，工作隊也決定不了。這可是你主動挑釁！”說著，我把手中飯菜塞給“保鏢”，周圍已圍了一群人。

“人民已經判決了你，工作隊就代表黨，代表人民。”林汝耕兩手拿兩

個碗，一碗菜，一個碗內有個饅頭和半個玉米麵蒸糕。他說話時，頭伸到我臉前幾公分處，有意激我發火。

“姓林的，你別激我，你別在這種時候欺負人，我是什麼人，只有歷史才能判決，你這個跳樑小丑，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說著，我從他碗裏拿起那半塊蒸糕，用力塞進他嘴裏。由於他臉左右晃動，玉米沫掛在鼻子、臉和下巴上，形象自然滑稽，立時引起滿堂大笑。我對“保鏢”大喝一聲：“我們走！”

圍觀的人自動給我閃開一條路，身後傳來叫好聲，也傳來林汝耕的怒罵聲。我並不感到高興與惱怒，只感到人性可卑。

走到囚室門口，我從“保鏢”手裏接過飯菜，他笑著對我說：“今天的事不怪你，我可以作證。”我對他說：“謝謝。”也許是這位“保鏢”極力為我說話，工作隊沒有為此事找我麻煩。我卻再沒見到“證人”來值班。

1966年10月，工作隊和工作組員們被拉回師院批鬥時，有學生問過我，是否把林汝耕揪上台，我堅決反對，我為林開脫說，那是林汝耕和我個人之間的事，與工作隊無關，不要揪鬥他。據知情人講，因文革中的上佳表現，林汝耕受到王逸倫書記賞識，粉碎四人幫後，林升為自治區計委副主任。之後，他競爭自治區副主席一職，未能如願，反遭奚落。林十分生氣，不久病故。林汝耕老師，真遺憾沒有機會解開你我之間的碰撞。

去南鍋爐房打開水，一路上要經過大字報區。工作隊嚴禁我看大字報。但我走得很慢，眼觀四方。剛囚禁我時，還能看見幾張揭發我的大字報。沒幾天，我能見到的，是變形的大字報殘痕。偶遇外語系造反師生，多驚奇地一怔，之後趕快避開。

8月2日早晨，我在打開水時，碰到外語系英四韓桐正在貼大字報。他遠遠看見了我，先是笑，後問我身體如何，我點頭微笑示意。身後跟隨的“保鏢”禁止韓桐說話，後面傳來韓桐的不忿聲：“你們還能凶幾天，早晚要放人！”

由於我極不老實，工作隊決定8月2日批鬥我。他們加緊佈置和審查發言稿，發言人中一半是積極分子，另一半是悔罪較好的人。可惜天公沒幫助

工作隊圓這個夢，1966年8月1日晚傳達的中央首長講話，改變了內蒙師院的一切。

四，走出監室，自我解放

這天晚飯後，值班警衛讓我扛上椅子，去學生第二食堂外的樹蔭下聽錄音，命令我不許和其他人講話。

飯廳內外擠滿了人。通知說是中央首長講話錄音，要求師生員工不得請假。學生二食堂外，長長的兩排槭樹是我們入學時種的，雖然不高，卻很茂盛。樹蔭下，夜晚的涼爽輕鬆愜意。

播放開始，儘管有雜音干擾，加上劉少奇、鄧小平的濃重鄉音人們不熟悉，但基本內容清楚了。中央首長親口講，向各大專院校派出工作組是不對的，工作組壓制了學生，必須撤出。飯廳內立即響起“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

不管當今怎樣評價這段歷史，我永遠難忘1966年8月1日那祥和的夜晚。儘管並不瞭解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之間發生了什麼，但領導人所講的“工作隊該撤，絕大多數犯了錯誤”這幾句話讓我對幾位偉人感激涕零，是他們的講話解放了我，讓我又能呼吸新鮮空氣。

中央首長講話改變著周圍的一切，值班的崗哨容忍我在夜光下踱到半夜。第二天，我發現來值班的同學開始對我執弟子禮，口稱“高老師”，臉上有了笑容，主動要為我打水、買飯。8月4日，內蒙黨委決定撤銷工作隊，就是其中一位悄悄告訴我的。

經過一夜考慮，8月5日大早，我隻身闖進辦公樓找全家福。當我見到這位最高首長時，他正滿臉塗著肥皂，對著鏡子刮臉。我對著鏡子裏的人影問：“你是不是全家福？”他一驚，他來師院可能還沒人直呼他的大名，語氣又那麼不客氣。只見他右手一抖，嘴角刮破，立時顯出血點。

“哎，你是不是工作隊長全家福？”我又高聲追問一句。

“我就是，你是誰？”

“我是被你定爲黑幫分子的高樹華。今天我來通知你，從即刻起，我不再服從你們的管教，你們無權讓我做什麼，我自由了。我僅出於君子禮儀給你一個招呼，再見！”

我轉身走了。鏡子裏的全家福呆若木雞。

我快速走進外語系備課室，那裏有我一張辦公桌。走廊上，外語系幾個師生見我突然出現，驚呆在原地。我找到一把鎖，把囚室鎖起來，一溜煙回了家。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囚室時，門前已站了三個工作隊員，看樣子已經等了我很久。工作隊長劉東明依舊滿臉殺氣地質問我：“誰鎖的門？”“我。”“誰讓你把門鎖上？”

“我的屋子自然我鎖，無須問誰。”

“我來通知你，從今天起你搬回自己宿舍。”我指著劉東明說：“劉東明，你聽著，到這裏來由不得我，什麼時候不想住了由不得你。現在我正式通知你，立即從我的屋裏出去，我不歡迎你，見了你們我感到噁心。”說著，我把他往門外推。

劉東明氣急敗壞：“你敢動手打人？”

我冷靜地對他說：“我不會打人，也不想打人。你別耍賴，你要敢動手，我就自衛。”他不肯放棄往日的蠻橫，伸出胳膊向我揮來。學生時期，我就喜歡武術，曾向體育系教授劉恩授學過幾招，沒想到這個時候用上了。我利用劉東明的衝擊力抓住他的手腕，向右後方一扭，他立時倒在地上，滾落到走廊的台階下。

我哈哈一笑，指著他說：“我可練過武術，我只用半招，你就這麼不經打，你倆敢來試試嗎？”三人並不摸我的底，狼狽逃跑。劉東明摸著摔痛的右臂說：“你等著，你等著！”

不用我等。沒幾天，劉東明被外語系師生拉回去批鬥，處境十分難堪。我無意步入那種場合，無意以“勝利者”的姿態面對那張黑紅瘦臉。他是文革的另一種受害者。

1966年11月，全家福已被他的單位——北京民族文化宮⁴從內蒙揪回，他是這個單位的當權派。我隨外調人員一同前往。

全家福被叫到我們面前時，已失去往昔盛氣凌人的派頭。當外調人員與民族宮的人去另一個房間時，我走到全面前，問他認不認識我。他仔細辨認後，只說了聲：“好像見過，面熟。”

我請他坐下，我要和他面對面平等對話。我問他：“你在定我黑幫分子時，看沒看過我寫的東西，瞭解不瞭解我？”

“我們是帶著任務去的，內蒙黨委就是讓我們去搞清你的問題，我沒看你寫的大字報，也不瞭解你。”

“那你何以那麼兇暴地對待全院造反師生呢？”

他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只輕輕地說了聲：“我錯了。”

全家福象被抽去了筋骨。他是那種順勢時張揚，一遇變故就軟成一攤泥的幹部⁵。民族宮走廊上掛著群眾給全家福寫的大字報，方知全家福是內蒙烏蘭浩特人，被烏蘭夫提拔到國家民委，又重任到民族宮。群眾給全家福定的罪名也是烏蘭夫黑幫分子。

我在大字報前佇立良久，感慨萬千。他這個真正伺候過烏蘭夫的黑幫，到內蒙去鬥我這個從未見過烏蘭夫的“黑幫”，其中奧妙可想而知。20世紀80年代，烏蘭夫重新上台後，全家福恢復了司局級職務。而我仍在監獄裏被審查，罪行之一是，曾反過工作隊，“迫害”過烏蘭夫。

如果有人以為這是玩笑，可以當作玩笑，因為聽起來太離譜太滑稽。但略通歷史的人，可從故紙堆中，找出同類怪例。

⁴ 北京民族文化宮是位於西長安街北側的一幢大型建築，屬於1958年大躍進年代在首都樹立的十大樣板建築（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等）之一。它的功能集辦公、飯店、會展於一身，曾經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和中央民委直接管轄的司局級單位。

⁵ 這樣的黨官到處都是，有些恐怕連全家福還不如。常聽中國官員抱怨說“老百姓的素質太低”，他們何曾自問過：“中國官員的素質又如何？”這個問題的要害，主要不在於個人品德，而由中共的幹部制度所造成。在“倒篩選”和“逆淘汰”的人才選拔機制下，好人上不去，壞人下不來，我們又能指望什麼樣的官員品德呢？

第十四章

瘋狂扭曲的暑夏

“洞中方數日，世上已千年。”當我自我解放回到家中，我這個簡陋、貧窮的小家，早已面目全非。妻子告訴我，來抄我家的是一批附中的初二男生。他們大都是高幹和軍幹子弟，趁家中無人破窗而入，亂砸一頓。當妻子午間回家後，發現一片狼藉。

一，家宅被抄

我們家幾乎沒有什麼財產，唯一視若生命的是兩書架中外書籍，其中三格線裝書我尤為珍視。妻子的外祖父是上世紀 30 年代的文人，留下部分書存在一個舊櫃子裏。我去她家挖“寶”時發現，欣喜若狂。岳父是畜牧獸醫專家，看我這個學文科的女婿如此喜歡這些書，便大方地送給了我。其中有李白、杜甫全集、《說文解字》、插圖本《千家詩》、《韓文公全集》等。

可是，如今再也見不到它們的身影了，他們已被中學生投入火堆。付之一炬的還有我自己省吃儉用花錢買的書。

書桌上的台燈支離破碎，它被當作“四舊”砸了，好似把製作者的深情碾碎了一樣。那是當鐵路工人的大姐夫在北戴河療養時，模仿其他療養員，用泥巴捏了一個台燈座，把海灘上撿的五顏六色貝殼用膠粘到座壁上，當作結婚禮品送給我們，它與我們相伴了近兩年，成為家裏唯一一件炫目的裝飾物。

妻子的兩件衣服扣子多些，也被抄走，大概學生們認為是奇裝異服。她安慰我說：“這個院內好多老師的家都被抄了，三個剛剛提拔為副教導主任的女老師，被當作當權派剃了陰陽頭¹，每天站在籃球場上示眾。”

¹ “陰陽頭”，指頭髮被強行剃光一半，留下一半。這是文革初期（即 1966 年 8 月份）所謂

我默然了，與被剃成陰陽頭相比，與侮辱人格、毫無人性的行爲相比，我們的確是 1966 年瘋狂暑夏的幸運者。我作爲 7 尺高的熱血男兒，保不住自己這可憐的家宅，我的自責在一些人的瘋狂面前，顯得那麼渺小。

我岳父家遭遇就更慘了。岳父宗漢民，祖籍山東曹縣，7 歲和母親從老家步行到塞北，與從未見過面的父親團聚。不久，生母早逝，岳父終因家庭變故和不滿媒妁之姻，離家開始自食其力，臨終也未與家庭和解。他背著小黑板，在課餘時間教夜校，勉強讀完高中，後考入不交學費、可供衣食的北京軍政獸醫大學（後遷南京）。畢業後，不願在軍界服務，借腿傷退伍，主要以教書爲生。綏遠和平解放後，他正在當地一所職業學校供職。50 年代末，該校與內蒙農牧學院合併，岳父進入學院獸醫系教書。岳母出身大家，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也隨同併入農牧學院圖書館當管理員。岳父大人喜下棋，讀詩，聽京劇，擅長運動，尤其網球。雖長於西、中獸醫學，操英、日語，但與當權者不投機。1962 年，精簡下放時，獸醫系寧可課程閒置，也要把不識眼色的宗大人攆走，下放到獸醫幹校。

岳父性格倔強，從不諂媚取寵，加上歷史與“國軍”沾親帶故，因此，他又成爲新單位政工幹部眼裏的“隱性”目標。抄鬥趕之風剛剛刮起，岳父便成爲獵物。由學生組成的抄家隊“光臨”了岳父母寒舍，把岳父趕到街上示眾，然後衝進家中，亂抄亂砸，稍值錢的東西一概捲走，岳父一生的積蓄——幾張存摺，還有悉數現金均難倖免。不久，家人發現，被抄走的手錶，已經戴在一個學生的手腕上。

讓岳父一家心驚肉跳的是，藏在雞窩內²的幾塊銀元該如何處置。情急之下，深更半夜從雞窩掏出銀元，放入爐中用旺火燒之，才逃過了搜尋者的眼睛。那年夏天，岳父家被趕出學校宿舍，蜷縮到舊城西河沿一間陋室，勉強

“紅八月”的“紅色恐怖”浪潮中，常常用來侮辱人格的一種手段。我當初以爲這是紅色紅衛兵自己的發明創造，後來聽河北農村的老人講，在共產黨領導的“土改平分”運動中，八路軍和貧民團的積極份子們，也給地主富農，連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老少，一塊兒剃陰陽頭。看來，如同戴高帽、掛黑牌、坐“飛機”、遊街示眾、公開槍決等等，這些迫害人的花樣，無一不是從“老革命”“老前輩”那裏承襲下來的。

² 由於物資匱乏，當時住平房的城市居民，幾乎家家養幾隻家禽、家兔等，有條件的，還在門前屋後開一小塊兒地，種點蔬菜，聊補家用。

安身。

內蒙師院的保守派“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除參與社會上的抄鬥趕行動外，還在院內多次遊鬥“牛棚”關押者。工作組（隊）的積極分子，想把我拉入其中，但多次被造反師生阻止。

岳父進了牛棚，但仍留在呼市。那些沾“地、富、反、壞、右”一字者，更為遭殃。師院外語系劉慶榮老師的岳父，被“街道”³懷疑是山西逃亡地主。沒經任何調查，也不與本人核實，不分青紅皂白，將其全家掃地出門，趕回原籍。原籍政府證明他家不是地主，又返回呼市，不幸原住房已被他人佔據。兩三年後，在朋友幫助下，才慢慢安置下來。

1967年6月，內蒙籌備小組成立後，我曾一度負責此類安置。僅呼市落實政策的就有幾千戶，全區幾萬戶，頗費一番周折。

二，老師們的遭遇

中央三令五申，文革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我所見所聞，卻多是向普通老百姓開刀，尤其是當教師的遭遇更慘。區內、市內的中學裏到處有我的校友，大家前後畢業，都是有志於獻身教育的青年，現在卻成了文化革命的對象。

16中（原師院附中）廣播喇叭傳出的刺耳命令聲，“黑崽子”長，“黑崽子”短的咒罵聲，天天撞擊著我的耳鼓，讓我這個剛剛有點自由的人在校園內親眼目睹了抄鬥趕的鏡頭，可謂眼見為實。一天，穿軍裝的糾察隊（多由高幹子女組成）讓老師們去參觀破四舊展覽，我也進去了一次。若以今天普通人的眼光看，展覽室裏的衣物算不了什麼。但在1966年，裘皮大衣和透亮的絲綢連衣裙等，件件都是罪過，令參觀者發出嘖嘖聲。

16中破四舊展覽室，絕大多數衣物的主人是語文組的陳鳳老師。陳老師畢業於燕京大學生，是位有修養的大家閨秀。1955年，她響應黨的號召支援邊疆，落戶內蒙。她的家就在我們前排。陳老師在教學中十分敬業，要求學

³ “街道”為“街道辦事處”的簡稱。在中共體制下，是城市最基層的行政管理機構，其下還有若干“居民委員會”（簡稱“委員會”或“居委會”）。

生嚴格且耐心。儘管如此，她仍難逃厄運，首當其衝被抄家、批鬥。抄她、鬥她的恰恰是她曾精心培養的初三（4）班學生（女生班，高級幹部子女多）。當孩子們長大成人，明白事理後，才真正發現陳老師的人品。她們常常去探望陳老師，與她成了忘年交。

作為鄰居，我的妻子並不瞭解陳老師是如何忍受羞辱的，我們都自顧不暇。此時她業已陷入自己班內（也是女生班）學生和工作組的監控之中，特別是其中幾個幹部子女，穿一身軍服，在工作組蠱惑下，用大字報對她發起攻擊。她們打打殺殺，忙個不停：隔幾日去北京天安門見毛主席；隔幾日又回校折騰老師，上街“玩玩”牛鬼蛇神。聽說有一位竟然拿皮帶抽打過人。大多數百姓子女都隨從她們，半點不敢得罪。其中出身貧下中農、工人階級的女孩子還理直氣壯些；家庭背景複雜一點的，在班內是小批鬥對象，常被“黑崽子”長、“黑崽子”短地呼來喚去。

三位女教導主任則被剃了陰陽頭，作為走資派爪牙陪鬥。出身牧主的優秀教師斯琴照日格圖待遇更慘，聽說被學生關起來，遭到毒打。“摘帽右派”裴老師，被圍在學生中間，任人把墨水往他身上潑，漿糊往他身上抹。每次批鬥，必有一件重物掛在脖頸上，壓得他彎腰低頭，像龍捲風中的俘虜失去了自我，只在模糊一片的顏色中露出死魚樣的雙眼。

16 中的“紅色紅衛兵”⁴們在抄鬥趕間歇，多次坐火車去見毛主席，令人眼羨。當學校幾乎走空時，十幾位出身灰色的老師（妻子在內）也背起行李，拿著紅寶書（紅皮毛語錄），舉著紅旗，步行 21 天，於 11 月 24 日走進北京，趕上了一次毛主席檢閱，親身領悟到紅色紅衛兵狂熱的原動力。據妻子後來說，25 號天未亮，她們就跑步出發，從豐盛胡同趕到月壇公園門口坐待。直到下午五時，毛的車隊從面前一晃而過，瞬間消失。

⁴ 此處加上“紅色”兩個字，是為了把他們與反對黨委和工作組（隊）的造反派紅衛兵加以區別。前者也常常自稱或者被別人稱為“老紅衛兵”或“早期紅衛兵”。而後者，在紅衛兵運動早期，往往被排斥在紅衛兵之外，自己也沒有資格和能力組織起來。只是到 1966 年秋季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這些受壓的造反派才組織起自己的紅衛兵，而且往往冠以“第三司令部”的稱號，以區別於那些迫害他們的“老紅衛兵”。

三，頭罩光環的紅色紅衛兵

1966 年夏初，這場抄鬥趕浪潮，是從北京開始，然後遍及全國的。北京的革幹和軍幹子弟們，扛著“紅五類”⁵大旗，頭戴軍帽，身著軍裝（沒有領章帽徽），斜挎軍包（這身裝扮深為普通孩子羨慕），手持各種各樣的“武器”（包括袖珍版毛語錄），在毛領袖“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下，雄赳赳、氣昂昂地在學校，在社會各個角落剷除幾千年來遺留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對於這個特殊群體，筆者簡稱其為紅色紅衛兵。這些人自稱為“老紅衛兵”，以區別於那些自發造反、受到工作組壓制、直到批資反路線後才陸續成立的新紅衛兵組織，例如首都三司、師院《東縱》、呼三司等等。

他們把長安街改名“東方紅大街”，把東、西交民巷改為“反帝路”、“反修路”。連青年人的瘦褲腿、婦女的長辮子、燙髮頭等等也未能倖免。《人民日報》和全國輿論一致為這些“敢想、敢幹”的年輕人喝彩。戰鼓敲得響，戰士更英勇，災難也在漸漸加深。紅色紅衛兵們，如同共產黨廚房裏用紅酒泡過的醉蝦，入戶抄家，把私人藏品、書籍、金錢、衣物等都當作資產階級的東西抄走（送到固定地點）；把每家的“牛鬼蛇神”拉出遊行，批鬥或送進“牛棚”關押……當時人把這一短暫的風暴稱為“抄、鬥、趕”。醉蝦們把人折騰完，開始拆廟，砸佛，連神仙也不饒過。據說，全國大小文物古跡，除國務院明令保護者外，極少倖免於難。⁶

中央文革辦事組 1967 年 5 月 26 日編印的《要事匯報》（二）上說，據雲南省公安廳報告，本月 22 日，17 個自稱紅衛兵的人，抄了雲南省副省長王少岩的家，抄走手錶、照相機和現款、存摺，在取款時被抓獲。參與者都是中

⁵ 紅五類，指當年家庭出身於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下中農和城市貧民的人群。

⁶ 有感於全國文物古跡的嚴重破壞，以周恩來為首的務實派，連忙發佈文件，張貼告示，將中央和省級文物古跡關門上鎖，並貼上國務院蓋章的封條，聲稱“正在進行內部清理”，以此阻止這些專門搞打砸搶的老紅衛兵們，這樣才勉強保護了一些國家重點文物，例如洛陽白馬寺、西湖靈隱寺、五臺山的大顯通寺等等。

學生，其中六個是北京學生，其餘 11 人，除二人外，都是高幹子弟。⁷

內蒙師院與全國大專院校開展的運動，模式幾乎如出一轍，即圍繞黨委、工作組執行的路線開展批判和辯論，其中，不乏圍攻、謾罵、訓斥、批鬥、關押等手段，但多以大字報、大標語、漫畫、小字報、口頭辯論為武器，書齋味較濃，可歸為“文鬥”類。其中，無論何派，均以觀點為界建立自己的組織，胳膊上戴著紅袖章，統稱自己是紅衛兵。抄、鬥、趕和關押“牛鬼蛇神”的牛棚僅屬副戰場，而且歷時很短。

在此要特別說明一個現象，它與歷次政治運動無可比擬，那就是革命派與反革命派，造反派與保守派，紅五類與黑五類，紅衛兵與牛鬼蛇神之間的身份，往往象陀螺一樣，隨政治風向不停轉換，可形象地比喻為“川劇變臉”。

中學裏的文革內容稍有不同，除少數“走資派”外，教師就是革命打擊對象，出身不好的教師和有“劣跡”的教師更甚。中學的紅衛兵以紅五類為主體，特別是革幹、軍幹出身的師生，主宰著本校大權。他們少有大學紅衛兵的書齋氣，多的是衝殺，故而這一類紅衛兵的行為權且列入“皮肉革命”類。

社會上，除大專院校和中小學，其他層面的文革形態大同小異，但越到基層，地方特色越濃。參與者與學校一樣，也有組織和戰鬥隊，也寫大字報，但不稱為紅衛兵。他們的政治框架、人員成分更複雜，不可一概稱造反派或保皇派，有的在單位是保守派，在社會上是造反派，反之亦然。但是，無論何種形態，文化大革命掃蕩之面甚廣，群眾鬥群眾十分普遍，且有特色。

普遍之意，指人人都可能是革命派，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誰也無法掙脫這個怪圈。而且革命派和受害者不是固定不變的，今天是革命左派，明天可能就被打入地獄；今天如此觀點，明天則那般立場，何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常常是上半天河東，下半天就河西了。

特色中最核心的要素是家庭成份，這是劃定革命營壘的基本標桿。記得從京城殺到內蒙來的一群青年，經內蒙黨委同意，在黨委禮堂門外搭起高台

⁷ 節錄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 358 頁，毛澤東關於對一些高幹子弟參與抄家一事的批語的注釋。

演講，宣傳文化大革命。他們個個一身綠軍裝，腰繫皮帶。每個人上台先自報家門，宣佈其父或其母是哪年參加革命的，以顯示是正宗革命後代，之後才高談闊論一番。內蒙本地登台演講者，也出示革軍或革幹後代身份。

其中一位中農子弟上台要求發言，被強行推下。主持會議的小女孩解釋說：“只有革幹、革軍出身的人才最紅，工人、貧下中農出身的同學，我們也歡迎，這個中農子弟算什麼東西，所以把他趕下台。”他們頭上罩著光環，依仗“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身份，持有“先天就是紅的，就是革命的”心態，在階級鬥爭的戰場上，表現更大膽，更激烈，也容易偏激。

對於“紅色紅衛兵”現象背後的推動因素，不同人有不同解釋。一種流行說法認為，它是毛江文革左派有意推波助瀾，例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受宋彬彬朝貢的紅衛兵袖章，並且御賜她“宋要武”新名，無異於鼓勵她們繼續抄家殺人，以便為中國大亂和癱瘓政府製造恐怖氣氛。另一種說法則認為，“紅色風暴”的鼓動者，與“派工作組”的支持者，都是劉鄧走資派和他們的代理人，其目的在於轉移文革大方向，抵制向走資派開刀的計劃。究竟誰是誰非，恐怕需要更多史料和深入研究慢慢證明。

隨著暑熱消退，這個族群開始裂變。他們頭頂上的光環一個個消失，如曇花一現。一個個消息同時傳入人們耳中，XXX 被打成走資派，XXX 劃入反黨集團，XXX 掛到黑線上。老革命們一倒台，自然株連九族，“紅五類”立時變為“黑崽子”，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到革委會成立之後，發生在呼市的新一輪橫掃牛鬼蛇神行動，已易角色。此時的主力軍，已由革命後代轉換為複雜的社會群體——群眾專政。心灰意冷的紅後代們，已被掃地出門，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不久，當權派們逐一解放，恢復官職，子孫們也隨之獲得新生。他們雖然大多上山下鄉，但立刻通過“揭皮飛”【農村土語，指名到人不到——作者】走上招工、上學、參軍、出國之路。如今，有的步入政壇，有的成為大亨，其勢不減當年，真正是“老子英雄兒好漢”。

當今中國輿論的統一調門，把運動初期這段抄鬥趕的“光榮史績”，一股腦推到造反派頭上，進而通稱“造反派行徑”，故意製造一個模糊而曖昧

的概念，讓它成爲永遠也叫不開這段歷史大門的假“阿里巴巴咒語”。其中的奧秘何在，確實值得“文革學家”們，認真研究⁸。我相信，這段帶給人類恥辱和恐怖的歲月，終將由那些真正的罪人，去向上帝一一懺悔。

⁸ 我們瀏覽過一些海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比較而言，對此問題的研究，要數流亡美國的劉國凱和宋永毅二位先生的觀點，比較客觀和接近真實情況。我們也比較傾向於相信，文革初期的“破四舊”行動，多數是老紅衛兵所為。他們在先保黨委後保工作組的鬥爭中，節節敗退，於是以極左面目出現，轉移鬥爭大方向，把矛頭指向那些多年來受到迫害的四類分子（死老虎），一來要顯示他們比造反派更革命，同時也有向造反派反攻倒算的味道，因為他們早就認定，造反派出身多有問題，屬於“牛鬼蛇神翻天”。中學生的行為，多數屬於狂熱和盲從，其內涵比較單一。由於各地的運動千差萬別，很難用一個模式套用。具體哪種因素發揮多大的作用，恐怕還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第十五章

十六條在我心中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它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千千萬萬的年輕造反者。

中央台播音員以渾厚、激越的聲調，把決議的每字每句灌輸到人們心中。我無比激動，感到自己有一種責任，那就是需要獻身，把自己的命運與文化革命連結在一起。

一，大學辯論會

自我解放後，我獲知內蒙農牧學院、林學院（現在兩校合併為內蒙古農業大學）、內蒙大學、工學院、醫學院等幾所大學，均發生了年輕師生與院黨委和工作組的激烈衝突。

8月7日晚，我和妻子坐在附中操場北側，靜聽由內蒙黨委主持的內大學生辯論會。會址設在主樓前廣場，校門上掛著一個高音喇叭，離我坐的地方幾十米遠，傳遞過來的聲音嘹亮、清晰。

會議由內大校長郭以青主持。文革前，郭以青身兼內蒙黨委宣傳部部長，黨委臨時代常委之一。前門飯店會議上，他揭批烏蘭夫異常活躍，贏得左派身份。從京歸來，他自然具有一種高屋建瓴的氣勢。辯論會上，他常常打斷他人發言，滔滔不絕的河南口音不斷從喇叭裏傳出來。他極聰明地站在被內大副書記、副校長于北辰、田心打成反革命的物理系學生賈國泰、苗秀英一邊。

內大辯論會開始不久，很快呈一邊倒態勢，真正唇槍舌劍的辯論沒有展開。

在我和妻子不遠處，散坐著不少聽眾。人們關心內大文革局勢，是爲了給自己尋求答案。我和妻子並肩坐在一起，天宇的星光溫柔地包裹著我們，夏夜的涼風遊來蕩去，似入仙境，又非仙境，殘酷的現實不允許些許浪漫。不過此時，在動盪擾攘的廝鬥間歇，片刻的輕鬆對我已很珍貴。

我聽到賈國泰在發言。從口音上猜測，這是位來自內蒙古東部的漢子。他只因給內大校黨委寫了張大字報¹，被定爲“反黨分子”，“反動學生”。他在發言中一再聲明，要堅決摧垮黑牆，踏平黑浪，不戴黑帽子。對賈國泰使用的圍攻、扣帽子、非法隔離等手段和師院工作組（隊）如出一轍。苗秀英是物理系三年級學生，因爲支持賈國泰大字報被打成賈家黑店的“女老闆”，嚴肅的鬥爭中夾雜了點男女之情。從喇叭裏的聲音可猜度出這是位伶牙俐齒、頭腦清楚的姑娘。她與台下的質問者對答如流，很快控制了演講局面，不斷贏得喝彩。兩位青年，最終結爲夫妻。

多少年後，我認識了把賈國泰打成反革命的內大副校長于北辰。這位四川口音的老人，由前團中央書記調到內大任第一副校長。他說話直言快語：

“我在內大任的是副職。我打電話請示參加前門飯店會議的郭以青，他是校長兼黨委書記，他怎麼說我們怎麼辦。他先讓我們找賈國泰，我們找了，談不通。怎麼辦，郭以青讓我和田心出面強制隔離賈國泰，讓苗秀英等人檢查。內大發生的一切，不論對錯，都是由他郭以青在北京遙控指揮幹的呀。可是，郭從北京回來，裝成對內大的事一無所知，一頭站在賈、苗一邊，把我和田心打成鎮壓學生運動的劊子手、走資派。郭以青剝奪我們說話的權利，不敢讓我們講出事情真相。”

“人的政治品德不好，什麼壞事也能辦出來啊！”于北辰的感慨我至今難忘。

十六條激發起師院造反師生的熱情，外語系部分學生到內蒙古黨委求見領導。高錦明剛從北京回來，以左派書記身份執政。高放下架子接待上訪學生。儘管他並未表態支持哪種觀點，但允許學生平等對話，學生們已相當滿

¹ 據內大的同學說，賈國泰的大字報於六月二日貼出，比我們的大字報早了一天，如此說來，內蒙第一張大字報的記錄應該屬於賈國泰才對。

意了。

第二天，高錦明親自到師院看大字報，並走進文史樓的俄四教室，與學生討論十六條。在這次討論中高錦明建議：由兩種觀點學生共同主持召開全院師生辯論會，通過辯論明確是非。但操作起來出現問題：辯論會尚未開始，選舉主席團成員就產生了歧義，最終少數派不得不讓步。主席團 24 名成員中，少數派只占 6 名。主席團主席是工作組（隊）的積極分子、化學系的傅榮，副主席由少數派代表、外語系英四韓桐擔任。

接著爭論以何種方式進會場：少數派認為應以觀點劃分，多數派堅持以系和班的形式。第一天，各系把少數派學生圍在中間，全院把外語系圍在中間。以後，少數派脫離所在班級，自動站在外語系行列，使會場以觀點分成兩大營壘。

辯論會 8 月 10 日晚正式開始。自治區主要領導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王逸倫、王再天和華北局財辦主任李樹德等都參加了辯論會。權星垣代表內蒙黨委講話，宣佈前一段強迫師生作的檢查一律作廢，收繳的材料一律退還受害者。但我的三本日記非但未歸還，政四女學生陳鳳霞在辯論會上，還引證我日記中被修剪過的詞句，繼續指認我是反革命。她發言時，黨委書記王逸倫在座，陳受到書記誇獎。文革後王逸倫點名，將陳鳳霞調到組織部任處長，此為後話。

辯論會到 8 月 27 日結束。開始時由自治區書記出席講話，場面不可謂不大；收攤卻是因為多數派與少數派劍拔弩張，實在無法坐在一處。半個多月的論戰起起伏伏，少數派人數從 1/5 增至 50%，到十月份轉為多數。造反師生堅持認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高樹華是革命同志；保守派認為工作組有嚴重錯誤，但高樹華無疑是黑幫分子，對高樹華批得還不夠堅決，不夠狠。

二，聚焦高樹華

高樹華何許人也？保派繼承了工作組（隊）衣鉢，還有所創造，抓住高三個問題：一是高的黑幫黑線問題，與文委大字報一致；二，高的反動日記

問題；三，高樹華辱罵副統帥林彪問題。

從中學始，我漸漸養成記日記習慣，或一兩日、或三五日，把自己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寫在日記裏。因為是寫給自己的，日記不設防，不虛假，只求酣暢淋漓地發揮。文革前，不少有寫日記習慣的人多已停筆，免得惹事生非。可能出於幼稚和過分自信，我認為對黨和領袖從無二心，對組織忠誠有加，於是日記照寫不誤，到文化革命開始時，已寫了三大本。

這三本日記，只有一個人看過——外語系黨總支書記王履安。1966年春天，我談到自己思想的變化時，告訴王，自己的日記裏有記載，黨組織負責人認為有必要，可以看我的日記。他竟然對我的日記有興趣，我毫不猶豫把三本日記交給他看過。

工作隊進院後，收繳學生日記時，工作隊員劉東明要求我也交出日記，我拒絕了。工作隊經一番盤查，估計我的日記會交給我祖父母收藏，便找了一位去過我祖父那裏的學生，由他出面謊稱我要日記，從我祖父手裏把三本日記騙到了手。

工作隊如獲至寶，在我的日記上任意塗抹，掐頭去尾地從中摘出若干小節，鉛印成冊，定名為“高樹華反動日記摘記”，準備批鬥我時散發。譬如，我在日記中把情緒低落的我比喻為“窗下那低頭的向日葵”作為批判我思想反動的證據。一次，祖父告訴我，我們高家祖輩曾出過兩位舉人，一位探花。工作隊在辯論會上質問：“高樹華稱家庭出身工人，難道工人階級家庭中有舉人、探花嗎？”眾所周知，中共定成份是按解放前三年的經濟地位劃分。發言人跨越時空的聯想，讓我稱奇。所謂辯論會，實質上成了對我的批判會。

三本日記，直到幾個月後，在我一再要求下，由黨委書記權星垣出面，陳鳳霞等人才勉強上交。到我手後，三個本子表皮腌臢，令人作嘔。裏面不知被多少人橫劃豎勾，慘不忍睹，我只能忍痛付之一炬。

我的另一大“罪狀”是辱罵林副主席。那是一天晚上，辯論會開到中間，外語系教師鄧誠代表陳錫林上台揭發我辱罵林副主席，由於辱罵太惡毒，不便在會上公開。全院立刻炸開了鍋。

鄧誠1957年被打成“右派”，陳錫林加入過國民黨，兩人都有歷史把柄，

肯定有很大難處。鄧誠走下台後立即被外語系學生圍住，讓他說明高樹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向誰罵的，在場者還有誰。同學又連夜去陳錫林家，向陳老師提出類似問題。

“罵了什麼？”兩人回答不好說，已向工作隊指派的外語系教師、文化革命小組負責人劉漢明老師談過。

“什麼時間、地點，誰在場？”鄧和陳均不承認自己在場，鄧說他是聽陳說的，陳說是鄧向他說的，兩人的證詞相左。

“爲什麼劉漢明知道此事呢？”鄧、陳兩人回答比較一致：是鄧首先向劉揭發。劉漢明啓發鄧回憶回憶，鄧說陳可能知道。劉漢明找到陳，陳說似乎有這事，但實在記不清是什麼時候，又是怎樣罵的了。在劉的導演下，鄧誠勉強上台發了言。

九十年代，鄧老師退休後，我專門看望過他，他解釋說：“實在記不清是誰向我說過林彪有男女關係的事，老陳說是你說的。劉漢明知道後，他和工作隊再三逼問我，只好把記不準的話向工作隊長劉東明反復申明。我根本不想在會上做什麼揭發，我明知道弄不好對自己不利，是劉漢明逼迫我上台的。”

劉漢明老師和他妻子張夢玲老師是爲我授過課的俄語老師，劉還當過我們的班主任。劉、張兩位一直稱我是他們的高徒。

文革開始，劉因有反右的“教訓”，因此堅決與黨站在一起，與工作組站在一起，受到工作組重用，是高樹華專案組的一員。設身處地從劉老師角度想，這也是他最佳的選擇，可以說，政治鬥爭無法顧及人情。當然劉老師夫婦爲此也吃了苦頭。

在外語系學生質問下，鄧、陳兩人都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兩人具名，由鄧誠出面，第二天再次登台聲明：前次的揭發是在工作隊及劉漢明逼迫下，把記不清的問題硬加到高樹華頭上。這自然再次引起轟動。劉漢明趕快聲明，自己不曾逼迫鄧誠，且與工作隊無關。工作隊本應按黨委決定撤走，已無權干預師院文革。鄧陳聲明無疑讓劉漢明脫不得干係，工作隊也露了馬腳。

這麼一顆臭彈，讓反對高樹華的人看到了個中蹊蹺，招致幾百人出面聲明，斥責原積極分子操縱辯論會，製造謠言的犯規舉動，紛紛表示改變觀點。造反師生的隊伍大增。

最糟糕的是，造反師生對鄧陳兩位老教師的輕率揭發不肯諒解，多數派群眾也不饒他們，劉漢明又不認帳，他們倆成了破壞文革的現行犯，幾天後，被扭送到牛鬼蛇神改造隊，強制勞動。

劉漢明、張夢玲二位，被外語系師生賜一綽號：製造“原子彈”的假居里夫婦，遭到嘲弄。運動中期，劉老師依然緊跟軍管和新師院黨委，後任宣傳部外事處長，繼升外辦副主任。

三，書記們的大拇指和寓言

師院辯論會每晚有內蒙黨委書記坐陣。他們名義上不介入爭論，卻頻頻向他們感興趣的人暗送秋波。主管財貿的王逸倫書記幾乎天天坐在台上，當端茶倒水的女大學生站在他跟前時，他悄悄問其是什麼觀點。大學生十分警覺，假稱是支持工作組的，王書記滿面笑容，一手抓住茶杯，另一隻手向她伸出大拇指。第二天，王書記大拇指的特寫公佈在大字報上。

還有一位康修民書記，從石家莊地委第一書記提拔到內蒙黨委。該公面黑體瘦，香煙不離口。辯論會上，他大講“如果獵人去打虎遇到狼怎麼辦”。表面看這似乎是個有趣的哲學命題，實則暗點工作組是打烏蘭夫黑幫的，但遇到了高樹華，自然該打。

1967年3月，在內蒙四方會談期間，我住在北京建工部招待所。當時，康修民代表內蒙黨委一方參加會議，住在二樓。康喜酒，晚間無事總要啜飲幾杯，微醉後就尋人聊天。一天，他推開會議室門，發現我一人在燈下閱讀列寧的《哲學筆記》，兩人重提“獵人打虎遇狼”的命題。

酒後吐真言，他堅持自己的說法沒錯。1967年初，乍到內蒙工作的康修民，經常代表內蒙黨委講話，惹惱了一些工廠的工人，還得罪了內蒙軍區領導人，曾被揪鬥。直到周總理發話要人，康修民才被軍區送到北京，臉上、

身上傷痕猶在。

我問他：“你被群眾和軍人揪鬥、毆打，應不應該？”

答：“當然不該，他們為什麼鬥我、打我？”

問：“對，你的遭遇我十分同情，也覺得你不該挨打。但，這與你的獵人打虎遇狼有矛盾。你想，如果從揪鬥你的群眾角度想，他們本是要揪鬥走資派這隻虎的，可是你四處講話，群眾一時分不清你是虎是狼，自然要把你鬥一通，揍幾下。群眾會想，打幾下狼也很解恨。就你的理解，你有什麼冤枉可言？”

於是，康和我在樓下會議室爭論到後半夜兩三點。開始，他與我句句爭論，後酒意去了大半，說了些明白話。

我說：“我並不強求你承認工作組錯了，你康修民承認不承認都沒關係。我是說，像你這樣的省級書記，如清朝的總督巡撫，手握生殺大權，竟如此糊塗。事關自己才明白，對百姓全無同情之心，文化大革命真是應該搞一搞的。”

康大度地一笑，反問：“你是說，我這類人只算糊塗混蛋官嘍！”

“是的，你們只能算這類人。按十六條衡量，共產黨的官，三、四類的不少。”

1968 年後，河北石家莊群眾強烈要求康修民回河北檢查，經中央批准，內蒙革委會派我陪康回石家莊。石市造反派十分厲害，我僅憑內蒙革委會常委身份敲不開門，無奈亮出呼三司負責人的招牌，造反派的頭頭才出面見我。我首先聲明，我不瞭解也不想介入石家莊問題，只向他們介紹康修民到內蒙後是支持左派群眾，並得到中央肯定的。雙方達成口頭協定，群眾批鬥康修民，讓康檢查都可以，但不能對康進行人格侮辱和肉體懲罰，康身體不好，內蒙造反派還等他回去工作。後來，據康的秘書徐勤訪說，協議真派上了用場。他同時轉來康給我的話，承認自己在師院“打虎遇到狼”的說法不妥，向我致歉，請予原諒，並鼓勵我讀好列寧的《哲學筆記》²。

² 後來，在 1970 年初的唐山學習班期間，我和康又見過幾次面，那時我們已經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不久，康修民患肝癌，在石家莊去世。與許多死不認錯的官員相比，康修民算是

師院少數派學生對“打虎遇到狼”充滿質疑，曾追問孫培卿文委大字報的事實根據，讓他交出自稱手中掌握的“子彈”時，孫無奈地交待：“哪有什麼屁子彈？”送大字報是韓明的主意，材料僅出自陳漢楚、王履安等人的揭發。這是8月12日晚孫站在辯論會台上親口承認的。

20 來天的辯論會，實質是另一種形式的群眾鬥爭。唯一可圈點的是，對於少數派而言，辯論會使他們由原來的 200 多人上升到 800 多人，在師院本院（當時尚有包頭分院）2100 多名師生中占了不可忽視的地位。

四，毛領袖也寫大字報

辯論會不久，一些師生曾去北京串聯，帶回北京開展文革的消息。辯論會主席團中的多數派成員力主暫停辯論會，去聽赴京師生的講話。令他們失望的是，從北京帶來的消息是批判工作組鎮壓師生的行徑，與師院發生的幾乎雷同。台下少數派的鼓掌聲一陣連一陣。

北京的消息證明，師院造反師生不僅大方向對，連某些細節也與北京高校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看來，全國都在批工作組，工作組有什麼值得保的呢？這次會後，聲明放棄多數派觀點的人極多，連大會主席團中也有倒戈者。

不久，從北京來內蒙串聯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和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聯合要求在師院辯論會上發言，內蒙黨委負責人同意了。他們說，通過對師院文化大革命情況的調查，堅決支援師生對工作組（隊）的批判，同時認為把高樹華打成黑幫、反革命是錯誤的，是轉移了革命大方向，高是革命的同志。他們講得越來越深透，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炮打司令部，火燒司令官，這才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方向。

那個夜晚，我獨自坐在大操場東邊的聯合體操器械³下（離主席台 100 餘米），北京學生的發言讓我大為驚詫。既然他們敢公開喊出炮打司令部，火燒司令官，那麼黨內一定有一個與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相對立的資產階級司令

敢於說出自己意見、磊落坦蕩的領導幹部。

³ 指一組鐵製的體育器械，由吊環、秋千、爬杆、爬繩、軟梯等組合而成。

部，那司令官是誰？這可是涉及天下安危的重大事情。

正當我疑惑不解時，台下多數派的一些師生當場打斷北京學生講話，指責他們是在宣揚反動觀點，是矛頭對準黨中央，是散佈反革命謠言。台下的騷動波及到主席台，台上也開始亂起來。此時，坐在台上的內蒙書記康修民走到話筒前，讓大家安靜，他說炮打司令部這個提法沒有錯誤，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他寫的一張大字報上提出來的⁴。

偉大領袖毛主席也寫大字報，他老人家要炮打司令部，肯定是中國眼下的政治形勢相當嚴峻，文化革命的任務十分艱巨，並非我們所能想像。我剛才的疑慮證明自己的思想意識不是過頭，恰恰落在了形勢發展的後面，應該趕上去。

時光荏苒，當我漸漸在神聖的光環黯淡之後看到某些破綻時，這個夜晚我的心靈是太過純潔了。我哪裏知道，毛領袖親手寫下大字報，目的是要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⁵劉少奇。

解放前和解放初，毛對劉是讚賞的。綏遠解放後，大批解放軍轉入地方工作時常講一句話，毛主席也說過，“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成了每個共產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的必修教材。

那麼，毛領袖從學習劉少奇變為到打倒劉少奇，是為什麼呢？這個問題，對於我們這些當年不諳世事的紅衛兵，對全國老百姓畢竟是個謎。毛領袖畢生追求是實現共產主義，讓中國富強起來。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陰暗面，黨內凌駕於社會之上的龐大的官僚階級和專制統治，似乎又是毛實現其最高理想的極大障礙，他認為“黨非動大手術不可”⁶。

⁴ 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標題是《炮打司令部》，副題是：“我的一張大字報”，時間是1966年8月5日。

⁵ 原內蒙古黨委紅旗聯合總部編印的《紅旗內參》第216期所刊“毛主席最新指示”，1968年7月12日。

⁶ 要知道毛所憧憬的未來中國社會什麼樣，看看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便知一二。紅色高棉的殺人魔王波爾布特，是毛的忠實信徒。他曾多次秘訪北京，當面向毛請教如何治理奪取政權後的柬埔寨。四人幫成員姚文元等紅朝高官，也前往金邊面授機宜，指揮紅色高棉消滅商品貨幣，消滅城市和知識份子，以便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從而超越中國，

1967年2月8日，毛在接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時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揭發我們的黑暗面。”⁷現在，他終於在有生之年揮動巨手，提前打響了挖掘滋生修正主義政治溫床的戰鬥——文革。

然而，回過頭來看當初，毛總歸不是神。毛是中共七大之後由劉少奇為首的共產黨人塑造的一個精神皇帝，一個為理想犧牲了諸多親人的無私皇帝，同時又是一個不容異己、皇權至上、因個人崇拜而失去清醒頭腦的封建皇帝。他對自己的戰友、開國功臣們疑心重重，不斷啟動皇權，逐個收拾得服服貼貼。到六十年代中期，他終於把中國變成了沒有雜音的一言堂，家天下，從而把國家推向絕路。

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紅色高棉所犯種種滅絕人類的罪行，究竟和毛澤東本人及其烏托邦思想有多大關係，目前尚無人做深入研究。相信中東兩國民主化之後，許多內幕資料才能大白於天下。所幸，毛的理想主義實驗，僅僅在紅色高棉小試牛刀，未能來得及在中國暢通無阻地大展拳腳，我們真該謝天謝地。

⁷ 見《人民日報》1969年4月28日第一版的相關報導。

第十六章

文革籌委會——失敗的嘗試

1966年8月18日，毛領袖及中央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全國紅衛兵，林彪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發表了鼓動人心的演說。毛主席身著軍衣，臂戴紅衛兵袖章¹就是鮮明的、有巨大威力的信號：文化大革命僅僅是開始，後面的任務還很多。

一，組織起來的信號

內蒙師院沒有人參加8月18日的接見，但我們感到毛主席和黨中央這次行動異乎尋常。我當時仍住在工作隊隔離過我的“囚室”內，那裏聚集著堅決與工作隊鬥爭的數十位師生。我們對毛主席8月18日接見和林的講話一起學習和分析。幾天幾夜後，我們得出幾點結論：

- 1，我們與工作隊的鬥爭只是小戰役，大戰役應屬炮打司令部；
- 2，從清華附中開始的紅衛兵，是學校搞文革的群眾性組織。我們必須有自己的組織，才能把主張真正落實在行動上；
- 3，除建立組織外，還要及時瞭解北京的動態，緊跟形勢；
- 4，大家認為，此類討論極好，對提高認識有很大作用，以後要不定期召開，召集人爲高樹華。

¹ 1966年8月18日，是毛首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還有多次接見，一直持續到10月1日的國慶日。首次接見中，革命元老宋任窮之女宋彬彬，代表最早成立的老紅衛兵，給毛領袖戴上紅袖章。毛還御賜給她一個新名“宋要武”，以取代她的“文質彬彬”。改名和打人之風，從此而起。許多書中提到，就是這個北師大附中高三學生宋要武，在毛領袖的感召之下，衝上街頭，手揮皮帶，大打出手，連自己的老師也不放過。師大附中副校長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女老師。後來宋要武遠走高飛，移居美國。詳細情況，請參閱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難者實錄》一書，由香港開放雜誌社出版。

討論會引起工作隊及多數派的非議，旋即“黑會”、“陰謀”之類謠言四起。爲了避免不必要的內部猜忌，我們用大字報把會議宗旨、會議情況及我們的幾點結論公開。不久，多數派首先成立了內蒙師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少數派由行政幹部發起，於1966年8月31日宣佈成立了東方紅戰鬥縱隊及東方紅紅衛兵。各系、各班，兩種觀點的師生都隨之成立了冠以時髦名字的大、小戰鬥隊²。

二，三天成立籌委會

1966年8月18日，內蒙黨委發出通知，要求全區各大專院校在三天之內，迅速成立各院校的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顯然，這是執行十六條中的第九條。

不過，要求三天成立文革籌委會，顯然性急了些，決策上對問題的複雜性估計不足，說明他們仍然沒有轉變老式的工作方法和官僚作風。隨著時間推移，各級黨委陷入一步步被動是必然的。

習慣於按正常程序工作的共產黨幹部們，希望別再有大的亂子，又無法預計文化革命怎麼發展，會搞成什麼樣子。應該說這是當時的實況。就連發動文化革命的毛領袖本人，對未來事態也沒有具體規劃，他沒料到，一搞就是十年，一發不可收拾³。

² 同以往歷次政治運動相比，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允許學生和其他社會階層的民眾，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第一次享受有限度的“結社自由”。在1957至1958年的整風和反右運動中，只有少數右派學生，在校內組織過小型的讀書會等。而這一次毛領袖開放“四大自由”，甚至允許建立某些形式的群眾組織，的確讓青年人增長不少見識。當然，一旦組織發展壯大到威脅當局的程度，則立刻宣佈為非法，大肆鎮壓，毫不手軟。比如在1966至1967年的冬春之交，中央一口氣宣佈八個大型的跨區域性組織為非法，勒令立刻解散，並抓捕其領導人，其中包括：全國臨時工合同工組織、全國復員轉業軍人組織、全國國營農場職工、全國山上下鄉知青、鐵路和煤礦工人組織等等。

³ 這裡涉及文化革命的分期問題。目前流行官方定調的“十年文革”論，似乎國內外學術界也沒有提出太多疑義。然而，按照廣州造反派領袖劉國凱（目前旅居紐約）先生的觀點，文革只有三年（1966-1969），即到各省成立革委會，中共九大召開，劉鄧路線失敗，毛林江等文革左派佔據上風而結束。我們認為，他的分期有一定道理。

內蒙師院文革籌委會從醞釀、成立到解散歷經 48 天，有一定代表性，值得詳述。

1966 年 8 月中旬內蒙師院的事態，就是神仙再世，也不可能把情緒完全對立的兩部分人，捏合在一個文革籌委會中。最終還是由掌握著各系、各單位實際權力、人數稍多的多數派，單獨成立籌委會。

第一步，各系、各單位（外語系等系除外）首先成立基層籌委會。爾後，由系級籌委會推舉院籌委會候選人。在工作隊積極分子們主持下，不論選系級籌委會成員，還是推舉院的候選人，所規定的各項政治標準可歸結為一點：支持高樹華的一律不選；堅決與高血戰到底者，就能進院籌委會。所以，政教四年的陳鳳霞、魏金光，外語系王清良，數學系于金煥等是最佳人選。原院學生會主席、化四學生傅榮，運動中反高態度堅定，處事有方，進入院籌委會順理成章。

三，書記們欣賞的選舉

像權星垣、康修民這樣的省級領導，喜歡聽話不頂撞又順從的年輕人，這是多數派人士的長處。相比之下，造反師生每每與這些幹部見面時，會提出各種各樣尖銳的問題，讓當權者解答，常常使其尷尬難堪。因此，在聽取選舉院文革籌委會的對立意見上，書記大人覺得依靠黨、團組織一級級選舉，更合乎共產黨的體制。這種默許，不經意間便使他們站在了多數派一邊。

師院多數派得到內蒙黨委書記的許諾，可以選出十多名學生代表，到北

理由在於，1969 年之後的鬥爭，已經同紅衛兵和學生運動無關，乃是文革之後上層權力鬥爭的繼續和深延。先是毛林之間的鬥爭，以 1971 年 9.13 林彪事件為結束；接著又是毛江同周恩來之間的新一輪權鬥，以周恩來逝世和鄧小平被二次罷官為標誌。但此時的毛江已是強弩之末，舉國上下對周鄧的同情猶如地火運行，終因毛的及時病故而引發宮廷政變，四人幫被抓，華國鋒失勢，鄧小平復出。

鄧主政下的中共中央，之所以堅持“十年文革”論，原因之一是，十年文革才能顯示毛江極左派錯誤路線的失敗，劉鄧正確路線的徹底勝利。這樣一來，可把共產黨內錯綜複雜的歷史恩怨及內訌，一股腦推給四人幫，也好博取民心。但歷史的簡單化將損害其真實性，不利於我們反思並汲取歷史的慘痛教訓。

京學習和參觀文化大革命，動身時間是9月1日晚。9月1日上午，多數派在全院貼出大字報、大標語，歡呼院文革籌委會成立。各系、班已發下選票，準備中午在大操場進行投票。儘管剛剛成立的東方紅戰鬥縱隊及下屬各系分隊堅決拒選，表示抗議，多數派仍按自己的意志精心策劃和組織，共選出12名成員，組成院文革籌委會。

院籌委會成立後，立刻進入院辦公樓發號施令。除“茲定星期日休假”、“更改開飯時間”外，9月7日發出的“通令”，要求儘快“對工作組的問題進行徹底的揭發與批判，形成第一個高潮”，又提出“工作組問題不宜拖得太長，有些問題在對敵鬥爭過程中隨著矛盾的暴露，認識不斷提高，可以逐步得到解決”。

這一方以掌權者身份連連部署，那一方（東方紅縱隊）則發表《鄭重聲明》堅決反對：“我們再次鄭重聲明：我們不承認你們的院籌委會，它只能代表你們一部分人的意見，它是偽院籌委會，你們硬要違背近千人的意志，一意孤行搞下去，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院籌委會照章行事，召開以全院為名義的批判工作組（隊）會議，讓古東、全家福上台檢查，有群眾代表批判發言。古、全兩位的“檢查”贏得響亮掌聲，大會主持人代表院籌委會宣佈工作組（隊）的檢查是深刻的，態度是誠懇的，基本通過。今後一段時間對工作組（隊）有意見仍可批判，但鬥爭重點將轉到批判院黨委方面云云。大會在其樂融融的氣氛中結束。

少數派師生一眼看穿，這種批判會純粹是一種保護工作組（隊）的過關會，與文化大革命的原旨是違背的。中文系造反派有人為這次大會編了一副對聯，貼在院籌委會的門口。上聯：你好我好大家好；下聯：大哥二哥麻子哥；橫批：本是一家。

院籌委會剛成立幾天，東方紅紅衛兵即發表了《特急通告》，宣佈選舉無效，不予承認。院籌委會發表了《告各單位革籌會、籌委會及全體同志書》，為籌委會40多天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

該書指明，東方紅紅衛兵散發的《特急通告》傳單是“謬種流傳，誤人不淺”，“提出最強烈抗議，予以迎頭痛擊”。

師院兩派紅衛兵成立之前，在社會極左思潮影響下，1966年8月17日晚，各系、各單位群眾把胸前掛著紙牌子的“牛鬼蛇神”，從家裏揪到院內遊鬥，每個紙牌子上寫著種種不雅的稱號，之後，通通押入原教師俱樂部的十幾間房子裏，俗稱“牛棚”。自從籌委會接管“牛棚”之後，陸續送到那裏關押的人越來越多，曾達到百餘名。後來，烏蘭夫三兒子力沙克，也在此關押過。

11月份我去俱樂部找人，看見“牛鬼蛇神”們正坐在大廳椅子上糊紙盒。他們都是師院各級黨政領導、教學和科研帶頭人。按當時的慣例，人犯是公安機關收審的對象；而“牛”們是在群眾監管之下，要通過勞動，進行思想改造。

籌委會的另一項工作是橫掃“四舊”，並取得了很大成績。我在紅衛兵步行串聯階段，偶然在院辦公樓發現其中某些“成績”，那些被抄來的私人珍品、文物、鈔票、銀元、日用品堆積如山。

四，老子英雄兒好漢

師院籌委會《告各單位革籌會、籌委會及全體同志書》的最後一部分是結束語，其中有一段奇文是必須留念的，因其最具時代特色。

在這裏我們對一些黑崽子們提出最強烈的抗議！他們近日瘋狂地叫囂什麼“煽風點火”呀，等“時機一到就搞垮籌委會”呀等等。好大的狗膽，好狠的黑心！老實告訴你們，造籌委會的反，就是造全院廣大革命群眾的反！黑崽子們，好樣的站出來，不把你們狗頭砸個稀巴爛，就不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只許左派造反，不許你們黑崽子翻天！你們要老實點！我們紅五類的子弟，不但好惹的，

這最後一段內容是共產黨階級鬥爭哲學的特有產物，尤其到文革時期更加精粹，它不屬一般文章的寫作風格，也不屬常見的過激文字，因為通篇貫穿反動的血統論和唯成份論。

唯成份論的源頭，據說來自 1966 年 8 月初北京一幅著名對聯“鬼見愁”——“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為這副對聯作出注解的是譚力夫講話。譚是北京工業大學三年級學生，是北工大籌委會成員之一，具有高幹子弟常見的特質。北工大的造反師生批判工作組，批判校黨委，本是文化革命中正常現象。但他依仗出身及社會地位的優勢，罵不同觀點的人是“右派翻天”，“黑崽子造反”。

譚力夫講話很快成為全國各地保工作組，保校籌委會者手中對付不同觀點師生的極具殺傷力的武器。內蒙師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搞了一份傳單，題目是《階級分析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把少數派成員的家庭出身進行階級分析，把其中黑崽子所占比例加以統計，將工農兵群眾、知識份子家庭的子弟劃入中和中右，僅作為團結對象。

大學辯論會時，上台發言或參與辯論者，必須先報出身和父母官銜，或幹什麼工作。若是地富反壞右家庭出身，馬上被驅逐台下；中農、教師家庭出身的人，雖能講話，也不那麼理直氣壯。最能大喊大叫，當眾罵娘的是“革幹、革軍”出身的紅衛兵，那是“兒好漢”一輩，自然盛氣凌人，君臨天下。我親眼見一位紅衛兵要求上台發言，剛剛自報家庭出身為城市小手工業者，即被掌握會場的紅衛兵推下台。擴音喇叭裏傳出咒罵聲：“什麼小市民、小商販、小手工業者出身的小崽子們，你們就別上台找不愉快了。”

我讀過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大動亂的年代》一書，書中說譚力夫“憑著對黨的忠誠，講出了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它是對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抵制，今天無疑應該高度評價。”我至今愚昧，譚力夫的講話為什麼要“高度評價”？如何高度評價？此“高度評價”不知代表了那些大人們的心聲⁴。

⁴ 其實譚力夫所講的“血統論”或者“優種論”，並非什麼新發明，希特勒在《我的奮鬥》

五，砸爛“臭味會”

院籌委會依仗多數人出身較好，有黨、團員身份，在施政綱領中多效仿譚式理論，自詡為治理天下的主子，黑崽子們只配做奴才。豈料，時世艱難，無論院籌委會依據的理論再風行，靠山再堅挺，始終難以在全院發揮領導作用。隨著全國形勢的變化，人數逐漸增多的東方紅紅衛兵，乾脆把籌委會改叫“臭味會”，於10月3日一夜之間在全院砸門、撬櫃，奪走工作組（隊）整人的材料，把籌委會也砸垮了。籌委會很識時務，18日貼出一張公告，宣佈自己壽終正寢。

公 告

我院由1400多人選舉產生的籌委會，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對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很不理解，因此從9月1日產生到10月18日經47天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嚴重違背了十六條，犯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

隨著形勢的發展及群眾的普遍要求，經籌委會會議研究，認為院籌委會已不適應新的形勢，已不能、也不該繼續工作，因此決

的工作該怎樣評價，公告坦誠、公正，頗有些自我批評的感人態度。當今很難讀到這種誠懇、真實的東西了。在那個年代，講真話的人遠比現在多得多。

多少年過去了，不論當時是多數派還是少數派，他們都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熱愛共產黨而參與文化大革命的。筆者無意論說短長，只想把當時的場景描述出來。如果當初大家能在辨明觀點時，坦誠相待，握手言和，相互寬容及相互諒解，並非不能做到。師院籌委會消失了，全內蒙地區的許許多多剛剛成立的文革籌委會的命運，基本如此。沒成立起來的地方和單位，再沒人把這件事看得多麼重要。

以保院黨委、保工作組，堅決打倒黑幫分子高樹華為基本觀點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在社會上參加了“呼和浩特市大專院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臨時總部”（設立於呼市新華廣場原呼市醫院內），後被社會稱之為呼市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簡稱“一司”。師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負責人、化學系四年級學生傅榮，是該臨時總部主要負責人。

9月中旬，呼和浩特市內開始大串聯，每天有數千人來內蒙師院看大字報，索要傳單，師院文革又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第十七章

小鬼們自己解放自己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領袖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全國紅衛兵代表後，傳聞，黨中央發了一個組織外地革命師生到京串聯的通知，這是讓人激動的消息，我們終於有機會去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了。

一，參加全國批判資反路線大會

進京的渴望在我心中變得越來越強烈。我回憶被迫進京告狀的艱難，想起第二次進京被工作組從月台上抓回的遭遇。現在，我是自由身，我不必讓誰批准，受哪方的制約，我有權進京見毛主席了¹。

內蒙師院東方紅紅衛兵，是爲了共和國成立 17 周年時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到北京的。絕大多數人是第一次去祖國首都，心中滿懷激情。第一次到京就能聽到首長講話，能聽到中央的英明決定，等於是中央首長親自爲師生平了反，削掉了頭上沉重的政治黑帽子，這些紅衛兵，不可能不興奮異常²。

參加完毛領袖在天安門城樓的接見之後，1966 年 10 月 6 日下午，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捍衛毛主席思想、捍衛十六條聯絡委員會，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內蒙師

¹ 內蒙古各高校學生（無論造反還是保守），被中央安排去北京參加毛領袖對紅衛兵的接見，是 1966 年 10 月 1 日國慶日的事。此後毛沒有再上天安門接見過紅衛兵，果如此，則內蒙學生屬於最後一次接見。從 8 月 18 日到 10 月 1 日，毛領袖前後共有十來次這樣的接見活動。

² 宗馥華她們 11 月份那次“接見”，是毛的車隊從眼前開過，如果眼神跟得快，或許能看到老人家一瞬間的身影。而我們被“接見”的人實在太多，只能沿長安街十人一排，由東往西，快步行進，路過天安門廣場時，往右扭頭，遠看幾百米外的城樓高處，上面人影晃動，至於男女面目，完全看不清楚。大家猜測，應該有毛老人家，權當已經看到他了吧，於是拼命高呼“萬歲”，剛喊了兩三聲，便有糾察過來干涉，催促大家不可停頓。

院東縱絕大多數成員參加了這次大會，並有兩名紅衛兵代表進入大會主席團。出席大會的中央及中央文革負責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關鋒、謝富治、姚文元、戚本禹、劉志堅、楊成武、吳德、林傑等27位。

江青受到熱烈歡迎，她首先發表講話如下：（按當時傳達紀錄稿摘抄）

同志們，同學們：

你們好！我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委託問你們好！向你們致以崇高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敬禮！

我們支持你們這種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英雄行爲！

我們堅決和你們站在一起，捍衛和執行黨中央十一中全會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則，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們在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掌握穩政策，學會善於運用鬥爭的策略。最重要是：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在鬥爭的考驗過程中發展，壯大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願意革命的人，團結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擊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黨中央在十月五日批准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緊急指示》，現在請張春橋向同志們宣讀，好不好？（全體：好！）

3

接著，由張春橋宣讀《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緊急指示》

各軍區、軍種、兵種、院校、總參、總後黨委、總政治部：

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院校作為重點之一，總

的來說形勢是好的。但是，有些領導機關和院校的領導，過分強調了軍隊院校的特殊性，至今還有壓制民主的現象，不許班、系、校串聯，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動學生鬥學生，打擊左派，嚴重地違背了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因此，根據林彪同志的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方面，軍隊院校要做出好的榜樣。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

凡是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或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所謂反黨分子，所謂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個別人整理他們的材料，應該同群眾商量處理的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要充分相信群眾，不要怕群眾，要“敢”字當頭，要相信院校的學生和教職員的絕大多數是要革命的、好的，他們是聽毛主席話的，聽黨的話的。他們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也要看到軍隊院校和教職員中確有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東風，把他們揪出來，徹底鬥，徹底批，同時要確實掌握林副主席對領導幹部所提出的三條標準：一，高舉不高舉毛主席思想偉大紅旗，擁護不擁護毛主席；二，是不是突出政治；三，是不是有革命幹勁，進行檢查，還要注意要文鬥不要武鬥。

.....

這個指示應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原原本本地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軍委、總政治部

1966年10月5日

中央批示

各中央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各人民團體黨委、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軍委、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工原原本本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中共中央

1966年10月5日⁴

江青講話，張春橋宣讀文件在一片熱烈掌聲和狂熱的口號聲中結束。之後，熱烈歡迎周總理登台。周恩來以略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說道：

同學們，革命的紅衛兵戰士們：

我首先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我完全同意剛才江青同志講的這段話，她講的這段話，我們大家都看過，都同意的。

張春橋同志講的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總政治部的一個批示，那麼對全軍指示也同樣適用於對我們的大、中學校。江青同志的講話和對於中央批轉的軍委、總政治部的指示，我們全文錄音，我們把它製成錄音片子向全國的大、中專學校播放，這樣子，就不僅使今天到會的同學、紅衛兵戰士聽到，而且使全國的大、中學校的同學和紅衛兵戰士們，也能原原本本地聽到。所以，我們應該說，今天這個會開得很好！如今，不僅在這個地方，我們把中央的聲音宣佈了，過去各級領導和工作組對於一些革命的同學加以壓制的、圍攻的、鬥爭的，甚至搜查，壓迫的這類的嚴重事件，宣告一律平反！所以不僅僅對你們說，而且對全國的大、中院校、中學各級黨委，各級負責機關都要說。我現在回答幾個問題，你們提了好多問題，有的要

⁴ 資料來源同上。

研究，我回去以後一定負責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來回答你們。

【總理回答的六個具體問題略——引者】⁵

自身得到了解放，而且有了新的鬥爭武器，可以理直氣壯地批判工作組、工作隊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了。10月6日大會結束當晚，東方紅紅衛兵立即乘火車回校。

三天後，全院出現了空前的大字報高潮。去京的人把他們串聯時帶回的傳單、抄回的大字報、中央首長的講話紛紛公之於眾。內蒙大學、農牧學院、林學院，北部的工學院、醫學院師生也成群結隊來爭閱、轉抄。內蒙各大機關的幹部、呼市地區的機關、企業、商店職工從市內各個方位匯集師院。爲了便於夜間閱讀，參與造反的電工師傅們自動加班，在各大字報區安裝電燈。每天夜間，師院校園內總是人來人往，燈火通明。

許多原來緊跟工作組的師生，通過全院大辯論，通過學習十六條，對原來的觀點、立場本已發生動搖。當他們得知，東縱去京參加了黨中央首長親臨的會議，又聽到了東縱戰士帶來的北京各大專院校情況，都表示放棄原來觀點，貼出聲明加入東縱。到10月中旬，東縱人數已由成立時的幾百人，形成上千人的隊伍。各系仍然堅持工作組觀點的人只剩下原來工作組（隊）重用的骨幹。其實，這些人也明知自己的尷尬處境，只是礙於臉面，或礙於整同學太多太狠，而不好轉彎。他們雖成爲少數，仍不甘寂寞，時而寫幾條標語警告東縱，“不要張狂，不要跳得太歡”。

內蒙、呼市地區各單位的人，有的來看大字報，有的開始與東縱戰士串聯。少數遭受迫害的人，偷偷跑到師院，被熱心的學生安排住在宿舍內，讓他們去學生食堂吃飯。一時，內蒙師院成爲全市、全區的關注重點，成爲文革初期受迫害者的大本營。哪個地方因反對單位領導或工作組被打成反革命，就到師院東縱尋求支援，使師院東縱在弱勢群體中的聲望日漸高升。

二，第三次見蒯大富

⁵ 資料來源同上。

1966 年九月份的師院，是院籌委會和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一統天下。到十月份，東縱的人數一天天增多，10 月 18 日，院籌委會宣佈解散後，東縱成爲院辦公樓的新主人。

1966 年 8 月 31 日，師院東縱成立時，在批判工作組（隊）上態度十分堅決；對另一熱點“高樹華問題”的觀點則相對曖昧。被推舉出的幾位勤務員的觀點莫衷一是：有的說，高在文革中的表現應算是革命左派，但其烏蘭夫黑線問題的背景仍有待查清。這樣，被打成“高家軍”重要人物的近百名堅決造反者，被排除在東縱之外，我首當其衝。剛成立的東縱有 300 名成員，其中我所在的外語系有 200 餘人。他們對剛推舉的幾位勤務員頗有微詞。不久，總部又增加幾名學生勤務員，是堅決支持給高樹華平反的，從而把東縱內部漾起的漣漪暫且抹平。

1966 年 10 月初，我在北京清華大學第三次見到蒯大富。此時老蒯已成爲清華井岡山造反兵團頭頭。

我第一次見蒯大富是 1966 年 8 月，我剛剛從工作隊關押下自己走出來。那時，蒯大富處境同樣不好，他身邊有幾個保護他的人。我找到他的宿舍時，開始有一男一女，追問我和同去的兩個師院紅衛兵：

“你們爲什麼找蒯大富？是怎麼找到這裏的？” “是誰指派你們來的？”

我耐著性子回答了他們前兩個問題，聽了對方第三問後，我勃然大怒，站起來指著這兩個人的鼻子說：

“我怎麼覺得你們這很像工作組的審問！我們剛剛從工作組的牢籠裏跑出來，你們這種問法就是對我們的侮辱！誰也沒有指派我們來找老蒯。我們認爲老蒯和我們是一類人，是我們的同志，是真正的革命者，是真正左派，才來找他。”

說到這裏，老蒯推門進來，立時握住我的雙手自我介紹，並賠禮道歉，“因爲經常有對立派的人來糾纏，這是不得已的防衛措施。”我們與這位戴一副黑邊眼鏡，一口濃重江浙口音的小個子蒯大富談了近一個小時。他把自

己寫的大字報送給我們，我們相互鼓勵後告別。臨別時，蒯大富隨手撕了幾張黃色的、用於抄寫大字報的單面有光紙給北大聶元梓、北航韓愛晶、北師大譚厚蘭分別寫了三個字條，作為引薦我的介紹信。上面寫著：“內蒙來的朋友和我們的處境遭遇一樣，他是一位有頭腦有思想的人，望能坦誠交談。”

我只找到了聶元梓、譚厚蘭。在北京師範大學校園內，我看見北師大井岡山的造反派戰友們高唱“巍巍井岡山，八一戰旗紅，開天闢地第一代，人民有了子弟兵……”的歌曲，列隊行進，很為他們的勃勃英姿，一派革命青春形象激動。

1966年九月，我第二次見到蒯大富時，他特別講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找他、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幾人談話的情況，其內容和以後發佈的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是一致的。

十月上旬第三次見到蒯大富時，他催促我儘快把自己的政治努力落實在組織上。當時，清華井岡山在北京、在整個中國頗有名氣，他們正在謀劃把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拉回清華批鬥（文革初期，王光美曾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重要成員）。

三，師院井岡山紅衛兵

在北京，我得知，留在內蒙師院又未被東縱吸收的造反師生，準備成立“井岡山”革命兵團，與東縱之間產生了一些不愉快，我第二天急忙趕回了學校。

當我踏進學校大門時，便被守候在校門口的幾個外語系師生，簇擁到外語系電化教室報告情況。由於人越來越多，隨即轉到一樓的公共大教室，主持人是英語專業四年級學生韓桐。韓桐在全院造反派師生中威信很高。他說：“今天的會是外語系造反師生推舉我來主持的，我們請了東縱幾位勤務員出席，也邀請了其他各系造反師生自由參加。首先聲明，我們外語系的人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戰友之間發生不愉快的爭論。別忘了，我們每個人頭上還頂著工作組、工作隊強加的反革命帽子，我們有什麼分歧不能坐在一起通過討論

協商解決呢？”

他接著話鋒一轉，繼續說：“我先向東縱幾位勤務員說幾句話：大家推選你們出來，是爲了組織更強的革命力量。你們中有的人比大辯論時態度退了一步，連高老師是不是革命左派也不敢肯定，這種態度不能代表我們外語系師生，也不能代表東縱廣大戰士，誰要堅持不改，只有把他從勤務員位子上拉下來。”

“前一段，東縱沒有請大家參加和聽取你們的意見，是我這個召集人辦事急了、草了。你們最有資格參加東縱，卻至今仍在東縱門外，也不是各位的責任。但，我對於你們要成立井岡山造反兵團實在不理解，這個井岡山與東方紅是什麼關係。我們現在還沒有大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自己先起矛盾，這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我希望你們今天就參加東縱，我們一起幹革命。”

接著，韓桐對我說：“這個會議之所以要等到今天召開，就是等高老師你從北京回來。過去，你是我們班主任，外語系師生尊重你。文革造反後，你是我們外語系的一面旗幟，你打到哪裏，外語系 200 多師生跟著你。東縱成立初始不吸收高老師參加，有個策略問題，可以理解。現在，形勢已經明朗，我提議東縱吸收高老師參加，並且參與總部，成爲主要勤務員。我這個提議請在座的東縱戰士們表決，如果同意，請大家鼓掌通過。”（掌聲）

之後，造反師生一個個自由上台抒發自己的情緒，講自己的意見，有不少人當場提出加入東縱。有些人講起過去艱苦的日子流下淚水，台下跟著落淚。座椅早無位置，過道也坐滿了人，窗外走廊裏也擠滿了人。韓桐的講話和大家的發言常被掌聲打斷，伴著掌聲和淚水，發言人與台下聽眾相互插話，氣氛活躍、民主，酣暢淋漓。

我看出來了，仍有一些堅定造反派沒有表態加入東縱，我瞭解這些同學、老師，我知道他們的願望。

韓桐提議讓我發言，我講了自己的想法：“我感謝外語系師生對我的關心，同時借此機會向全院師生、幹部、工人師傅中對我支持的人表示感謝和致敬。”

“我和同學們、老師們一起走過了幾個月不同尋常的路。我們每個人頭上的黑幫、反革命帽子，隨著批判的深入自然會解決。實際上，毛主席革命路線已經宣佈我們無罪。有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的支持，我們不在乎誰來給我們平反或不平反。”

“我這次去北京見到蒯大富、聶元梓兩位，他們向我透露，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的、決定的（聽眾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如果有什麼人還懷疑批判資反路線的正確性，讓他們在一邊懷疑、觀望吧，我們將一批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我認為，前一段東縱的鬥爭大方向是正確的，東縱在師院的出現推動了師院文化大革命。我沒參加東縱，這裏沒有什麼人的責任問題，因為我本人沒提出申請。希望大家不要在這件事上相互懷疑，影響我們批判資反路線。現在，我正式提出加入師院東縱紅衛兵，請求全體東縱戰士批准我的申請。”

“在這裏，我特別要說明一個問題。籌辦師院井岡山革命造反兵團的事，我是始作俑者，我一直參與策劃。我和參與者多次研究，即使井岡山成立了，與東縱也是並肩戰鬥的兄弟關係，不可能對立。不要懷疑他們會如何如何。讓今後的行動來證實我們每個人是什麼樣的革命者，才是最真實可靠的。……”

絕大多數人表示理解井岡山的成立和存在，並希望我能站出來協調井岡山與東縱的關係。

這次會後，師院井岡山革命造反戰鬥團、井岡山革命造反紅衛兵成立了。在他們貼出的戰鬥宣言旁邊，有東縱的支持信，也有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寫的嘲笑和指責的大字報。最引人注目的一條標語寫著：“井岡山戰鬥團不過是反革命高家軍的變種，是黑幫分子高樹華的御用工具”。

造反派忙著批判資反路線，沒有時間玩味這類古董。

井岡山成立初約 30 多人，成立於 1966 年 10 月上旬，最多時人數 100 多。1967 年 1 月宣佈解散，其成員全部加入東縱。

井岡山成立時，通過自由平等方式，推舉中文系漢語四年級李福生與政教系四年級陳福玉任勤務員，其骨幹人員有：體育系陳時光、物理系楊永俊、

外語系趙蘭科、程鐵軍、翟希民、趙淑芬、中文系薛永長、曹俊等。由於成員個人活動能量大，幾乎全是當時院內外的知名人士。他們所佩戴的紅衛兵袖章，是他們帶著我寫給清華蒯大富的信，爲清華贈送的。多少年後，在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中，這成爲一個被深究的題目。

李福生畢業後被內蒙軍區錄用，在四川一支工程兵部隊鍛煉，後回內蒙部隊。復員轉業時，分到包頭拖拉機廠，任教育科長。20世紀80年代初的清查運動中，李福生被解除科長職務，交待問題。他本人說自己曾是內蒙師院造反派第一號人物，“連高樹華也得聽我指揮”。包頭市清查辦公室以爲抓住了四人幫線上的大人物，找我核查，我反問來調查的專案組成員：

“你們不覺得李福生有些瘋瘋癲癲，說話顛三倒四？”

“是有這種感覺，但不知道爲什麼？”

“李福生當年在師院是有名的李瘋子，他的話也能信？成立井岡山自始是我謀劃的，雖然我沒參加井岡山，但井岡山初期的一切活動都徵求我的意見，和東縱配合。別看李福生是井岡山勤務員，只是個小人物。”

不久，李福生被停止審查，提前退休，在家養病。

陳福玉愛讀書，理論能力強。陳畢業後，分到呼市鐵路局宣傳組工作。呼鐵局黨委成立時，把陳排除在外，分配到包頭鐵路分局黨校任教。清查時，勒令他交待問題，退休前仍爲呼鐵局黨校一般教師。

第十八章

從校園走向社會

1966 年 10 月 7 日，主持工作的自治區書記王鐸，代表內蒙黨委在直屬機關大會上講話，承認自治區黨委對前一段文革認識不力，工作不認真，不細緻，犯了一定錯誤。之後，對下一階段如何確定重點，如何調整黨組織，如何整改等提出了意見。

一，評書記的報告

王鐸的報告，在各大專院校得到原工作組（隊）和支持工作組師生的擁護，他們爭先按抄來的報告內容寫大字報。被工作組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師生則認為，王鐸報告拋開了 10 月初中央要求各地平反的決定，違背了十六條精神。因此，他們逐段逐句批判王鐸的報告。綜合大字報要點如下：

王鐸報告說：“對於那些已經陷入癱瘓的黨組織要按黨章規定，通過改造或調整，儘快恢復、健全起來。在做法上可以自上而下，分兩步走。第一步要儘快恢復和健全基層黨的支部，然後再逐步恢復和健全各黨委和黨組。”

大字報表示不同意見：運動剛剛開始，還沒有發動群眾大揭大批，有許多單位是黨內走資派把持著。他們拼命捂蓋子，鬥群眾，壓制文化大革命。王鐸報告不分青紅皂白，“要儘快恢復和健全”，是有意捂蓋子，保護沒被觸動的走資派。

王鐸報告說：“如果群眾發動基本充分了，確定沒有揭發出重點

人，現在可以轉入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爲主的階段。例如，把前一階段揭發的問題和本單位揭發的問題歸納整理，梳成辮子，提出幾個問題，進行討論和辯論，以便適時地轉入以改爲中心的下一步。比如說，精簡機構，改革制度，改革不適合於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

大字報批評：當前運動是進一步發動群眾大揭大批，還是可以收兵轉入整改了？王鐸的報告明顯與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唱反調。走資派還在搗亂，對工作隊未揭、未批，資反路線未被觸動。王鐸的報告對上不符合黨中央指示，對下企圖壓制群眾。王鐸爲代表的內蒙黨委是不是要草率結束這場運動了？

二，列隊進入黨委大院

王鐸的報告始終沒有下發，各院校均有師生到內蒙黨委要求聽取報告錄音，都被值勤的解放軍擋在門外。爲此，我們組織東縱和井岡山紅衛兵六、七百人，列隊到內蒙黨委上訪，要求王鐸接見並當面回答問題。

我們以三路縱隊行進，不少群眾趕來觀看。這天黨委大門的崗哨增到四個，加上兩位軍官共六人。他們手持小紅旗阻攔，我們的隊伍停下來。只見十幾名井岡山紅衛兵跑出隊伍，與站在門口的值班軍人講道理，請求通過。當井岡山隊伍行進到門前時，正在交涉的紅衛兵每人拖住一個軍人，把他們拉向兩邊，紅衛兵隊伍借機魚貫而入黨委大院，整齊地列隊站在黨委北樓門前。

接到門衛通報，黨委辦公廳負責人張魯領幾個秘書匆忙佔領北樓門口的台階，防止我們衝進樓內。張秘書長指責我們說：

“你們這些學生這麼無組織無紀律，衝擊內蒙黨委機關，干擾辦公，屬於嚴重政治錯誤。”

話一出口便激怒了紅衛兵。我讓大家安靜，問張魯秘書長：“毛主席說，爲人民服務是黨辦一切事情的出發點。請問張秘書長，內蒙黨委是爲人民服

務的機關，還是當官做老爺的衙門！”

“我們當然是爲人民服務的，這還用你說？”

“既然爲人民群眾辦事，爲什麼還怕見群眾，爲什麼我們要求聽王鐸書記的報告，要錄音帶不予答覆？爲什麼，請回答！”

“你們有人上訪，我不知道，要求王鐸書記接見也不知道，不知道不能算錯誤吧！”

“那好，今天，我作爲師院東縱、井岡山紅衛兵的代表正式通知你，要求王鐸書記迅速出來見群眾，要求把他的報告錄音交給我們。現在你知道了吧，請王書記馬上出來見群眾。”

對前兩問，張魯還回答，第三問他已難招架。隨著我的每一問，紅衛兵鼓掌叫好；張魯的每一答，紅衛兵噓聲四起。第三個問題後，張魯額頭已冒汗。幾百名紅衛兵列隊衝進黨委機關，尙屬首次，早已驚動近千名工作人員。有的打開窗戶向下觀看，有的乾脆近前圍觀。紅衛兵立即喊口號：“歡迎黨委工作人員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感謝黨委工作人員對我們的支持！”

張魯尷尬地走到我跟前提議：“我們能不能個別談談，你們找幾個代表進樓協商一下，怎麼樣？”

我轉達了張魯的要求，與東縱兩名勤務員、井岡山的李福生隨張魯走進一間辦公室。樓外紅衛兵列隊等待，高唱革命歌曲。

行動前，我們分析，王鐸等領導人不會見我們，他們是害怕群眾的，只要能拿到錄音帶就算勝利。因此，與張魯的談判中，我們堅決要求王鐸出來見群眾，寸步不讓。張魯說：“王鐸書記不在，不能見你們。”我們提出去王書記辦公室看一看，張魯有些慌亂，不讓我們上樓。相持中，張魯很快派人取來錄音帶。我們答應今天可以不見王書記，但必須有人出來代表黨委回答我們的問題。張秘書長無奈地表示，由他出面向同學們講話。

張魯站在隊伍前說：“我一定把同學們的要求轉達給黨委書記們，用適當的方式回答你們的問題。現在，我把王鐸書記講話的錄音帶交給你們。我們歡迎紅衛兵小將幫助我們糾正錯誤，改正缺點，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張魯講完，我大聲說：“請張魯同志代表內蒙黨委表態，對我們今天的行動如何評價，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張魯很爲難地對我說：“我無權代表內蒙黨委，我無權，無權。”

“那你能代表誰？”

“我只能代表黨委辦公廳，代表我自己。”

“那你就以這樣的代表身份向大家說。”

紅衛兵的口號聲後，張魯再次对大家說：“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也可以代表辦公廳說，同學們今天的行動是正確的，沒有什麼錯誤。有錯的是我們。”

列隊走出黨委大院時，我和幾個紅衛兵主動向站崗的軍人握手致歉。軍人只是對我們一味地笑。當我離去時，內蒙黨委幾位工作人員主動找我握手，並介紹自己。就是這次，我匆忙中見到了李楓，他當時是黨委宣傳部的幹事，不久，他成爲內蒙黨委紅旗總部第一勤務員。

東縱、井岡山衝進黨委大院的傳聞不脛而走，孰對孰錯，眾說紛紜。師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留下一條標語：“黑幫分子高樹華領著黑幫隊伍衝進黨委是地地道道的現行反革命行爲。”

三，呼三司應運而生

10月17日，呼市地區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臨時總部（又稱呼一司）在大馬路體育場召開全市各院校師生批判資反路線大會，並請黨委書記王鐸參加，主持大會的是呼一司負責人傅榮。傅榮在師院是支持工作組（隊）的，現以批判者身份出現，耐人尋味。

此時的師院東縱也是呼一司成員。大會主持人的開幕詞和前兩個發言名義是批判資反路線，卻申明工作組（隊）的路線錯誤已經認識和改正，斥責“有人反工作組別有用心”等等。東縱紅衛兵起身質問發言者，和東縱有同感的還有二中和黨校的紅衛兵，他們要求發言，遭傅榮拒絕，台上一片混亂，只好提前散會。

第二天，內蒙工學院、農牧學院、內大有人送來大字報，批評師院東縱

破壞昨天大會的惡劣做法，要求東縱做出解釋。

我們認為，這恰是一次相互串聯、溝通的機會。於是，我們向各個學校派出一個紅衛兵小組，目的是控訴師院工作組（隊）對我們的迫害，以使用事實打動他們，讓他們理解我們。

效果很好，許多院校來我們這裏串聯，支持我們 10 月 17 日的造反行爲。在交談中，東縱發起從呼一司撤出並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倡議。幾經磋商，於 1966 年 10 月 29 日，呼市幾大院校及中專中學師生成立了“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紅衛兵司令部”。之前，以呼市二中爲基地成立過一個以革幹子女爲首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第二司令部”。故而，“呼三司”很快成爲我們組織的簡稱。

四，搶出黑材料

1966 年十月份以後的文革局面是兩頭熱中間冷。革命群眾，尤其是被打反革命的人，行動積極，熱烈回應中央號召，起來批判資反路線。各級黨組織普遍充當閻王爺，不主動給受害者平反。小鬼們爲解放自己，被迫再度造反，搶奪被整的黑材料。

開始時，年輕造反者的思考極爲簡單：既然是偉大領袖和黨中央已明確指令，下級黨組織應毫不猶豫地聽從上級旨意。

於是，師生紛紛與領導面談，要求平反。他們得到的答覆幾乎一致——婉言拒絕，甚至被拒之門外，斥爲無理取鬧。

1966 年 10 月 10 日，工學院 13 名學生要求退還黑材料被拒後，不得不進行絕食鬥爭。訊息傳到各院校，師院東縱進入工學院支援絕食，參加了工學院召開的“向資反路線猛烈開火”大會。

師院工作組（隊）撤出後，黑材料仍留在各系原文革籌委會手中。少數派師生要求退還，被拒絕。10 月 13 日晚，中文系少數派同學發現系籌委會要轉移黑材料，立即上前阻攔，雙方發生爭執。原少數派師生推開籌委會幾個人，搶走了他們準備轉移的材料。接著，又把存在櫃內的黑材料一搶而空。

中文系搶黑材料的消息傳開，各系少數派師生都如法炮製。當院籌委會存的黑材料正在轉移時，東縱、井岡山紅衛兵趕到，截留了一部分，大部分被轉移。1967年1月，內蒙黨校的造反派報告，一間教室內發現大量紙灰，從未燒盡的紙片中推測是師院的材料。師院東縱立即派人保護現場，並報告內蒙公安廳。據公安廳透露，從紙灰數量分析，燒的材料有上千公斤；對殘片分析的結論是師院工作組（隊）整的材料，最多的人名是高樹華。

師院籌委會解散的同日，部分人員組成“內蒙師院毛澤東思想抗大兵團”，成員不足300人，在師院難以立足，被稱為“流亡在外的院籌委會”。他們和呼一司一些人只好聚集在內蒙黨校一座樓內，被燒的材料正是在這裏發現的。到1967年4月中央處理內蒙決議公佈時，抗大兵團不得不宣佈解散。

然而，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許多造反派被華國鋒和鄧小平整肅；堅持到最後的二、三十名保守派，終於迎來另一方天日。據統計，內蒙廳級幹部中有二、三十名來自抗大兵團的頭頭¹。

1966年10月13日以後的幾天內，從原院、系籌委會負責人口中傳出，革命造反派砸的不是黑材料，而是系內的黨、團材料、人事檔案等等。爲了證實所得材料的性質，東縱各系的分隊分別把整師生的材料部分公佈於眾。如外語系，學生總數爲314名，被內定爲右派的有204名。僅從公佈的部分材料，人們就充分領教了工作組（隊）的厲害。

¹ 後來被提拔重用的部分“抗大兵團”保守派頭頭如下：

陳鳳霞（政教系四年級學生）任內蒙古黨委組織幹部處處長，雲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

于金煥（數學系教師）內蒙統計局副局長；

林汝耕（地理系教師）內蒙計委副主任；

劉漢明（外語系教師）內蒙外事辦副主任；

魏金光（政教系四年級學生）包頭市副市長，後任內蒙衛生廳廳長；

李漢良（師院團委幹部）內蒙經貿廳副廳長，後調任河北省經貿廳副廳長；

譚培禎（外語系幹部）內蒙行政幹部管理學院副院長，後任內蒙農業大學副校長、副書記；

王清良（外語系四年級學生）內蒙烏海市副市長等職。。

五，內蒙黨委的“平反”

內蒙黨委於11月4日匆匆撤走了工作隊，名義上集中學習和整頓，對學校只起聯絡作用，實際上一些工作隊員仍在幫助他們的積極分子整材料，出謀劃策。內蒙黨委對工作組（隊）的行爲過失非但不阻止，反替他們開脫。以蹲點爲名來師院的內蒙黨委書記康修民，態度尤爲直白：“抓壞人的大方向沒有錯誤。”

文革之前，已經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某個單位的支部書記就是黨的化身，大家都順從他，服從他，按他的旨意辦事。因此，文革剛開始，“右派翻天”的政治口號、標語滿天飛。

盼望上級黨委來拯救自己的師生，漸漸對書記們失去了信心。開始依靠自己的紅衛兵組織。各系造反派把本系鎮壓革命師生的工作組（隊）員拉回批鬥，如體育系李慶曉、數學系姜仲原等民憤極大者。也有的只請回來回答師生的問題，如外語系原工作組長楊慶魁，雖執行了工作組路線，但對師生態度溫和，他本人被古東內定爲工作組中的右派。外語系對楊批判後，宣佈楊可回本單位參加文革。之後，楊慶魁成爲堅定的造反派。

東縱聯合井岡山，在系級活動基礎上，召開了幾次全院批判資反路線大會。會前總部與各戰鬥隊達成三點共識：一是被批鬥的人只允許掛紙牌子，不搞噴氣式彎腰等體罰；二是大會發言只批內蒙黨委、文委及工作組（隊）執行的錯誤路線，決不把矛頭對準原積極分子，也不對準抗大兵團及其頭頭；三是統一呼口號，不許臨時揪鬥什麼人，即使民憤很大的也不能揪鬥。

物理系屬下電子廠有位工人，當年36歲，自稱舊社會苦大仇深。他在工作組支持下，大罵造反師生，且十分粗野、難聽，成爲當時師院一大熱點。挨過他罵的學生說：“村裏人稱牲口嘴的，也罵不出他那種話，純粹是流氓、野漢。”

如何對待這位工人，爭論很大，我主張不能轉移鬥爭大方向。他只是個工人，他的問題由電子廠的人自己解決，建議物理系造反派不要揪鬥他。抗大總把矛頭對準群眾，我們決不能這麼幹。

院內召開的批鬥會基本按三項統一認識進行。事後，連被鬥的工作組長古東都很服氣。

1967 年，內蒙工學院成立革委會時，就古東能否結合一事，他們徵求我的意見，我表示同意。一次，開會與古東相遇，他說：“師院拉回去批鬥我，並沒體罰，批我，鬥我，應該。”

解放後的中國，從來沒有一次政治運動，為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公開平反。而文化大革命，黨中央下令給打錯的“反革命”們平反，讓黨委和工作組檢查，開歷次政治運動之先河。

在強烈要求下，內蒙黨委決定給師院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師生平反。平反大會前，黨委書記康修民與抗大兵團一方座談，權星垣則找師院東縱、井岡山一方座談。但是，兩方的態度截然對立。實際上，兩書記是想尋找一條中間路線，不要挑起亂子，不要重新引起群眾鬥群眾，以免他們自己再犯錯誤。

1966 年 10 月 23 日下午，黨委安排了兩個會場。學生大飯廳內是權星垣召集師院東縱、井岡山、8.31 等成員開會。體育館由康修民給抗大兵團的成員開會。兩個書記使用同樣講稿，抽象、空洞地承認內蒙黨委在師院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宣佈為被打成反黨分子、反動學生的人平反。對高樹華的結論是這樣的：高樹華同志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是屬於 95%以內的²，高樹華同志的有關問題留在運動後期處理。

黨委領導深知師院兩派分歧的焦點所在。果然，兩個會場都引起爭論。體育館內，抗大堅決反對給高樹華平反，即使歸於 95%以內，也不同意，他們纏住康修民，讓他具體解釋。大飯廳內，許多人反對黨委的這種平反，質問 95%是什麼意思。東縱、井岡山、8.31 幾位勤務員集體退出會場，把講話人孤身留在台上。

六，三幹會開成訴苦會

² 按毛澤東的劃分標準，筆者的政治身份被劃歸到“人民內部”（即占人口總數的 95%）。

黨委書記權星垣在 10 月底向我們講述了中央工作會議的意義和目的，傳達了周總理講話，並告內蒙要根據中央精神，在 11 月初召開全區三幹會³，希望與呼三司、師院東縱、井岡山等造反組織溝通，給參加會議的幹部學習機會，不要隨便把人揪走。

11 月 4 日，自治區三幹會開幕。11 月 10 日，呼三司在新城東風體育場召開向資反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

參加內蒙古三幹會的當權者們，把會議開成了串聯會，對文化大革命的控訴會，未達到毛領袖的預期設想，未接受黨領袖的教導。一些執行了資反路線的當權派，經過三幹會的“洗禮”，反而滋長了對抗情緒。據與會者反映，韓明的態度最爲惡劣。

鑒於韓明拒不檢查，內蒙教育廳多數幹部要求批鬥韓明。教育廳“革命造反隊”聯合師院東縱，決定從三幹會上揪出韓明。

我們與教育廳同志商量好，只把韓明拉出來掃掃他的顏面，之後讓他回去繼續開會。這天，韓表情木然，面帶羞慚又有幾分懼怕的表情。坐在廣播車裏的是教育廳一位年輕幹部，蒙族，1965 年畢業於內蒙大學數學系。文革後，她離開教育廳回到內大數學系教書。20 世紀 80 年代，韓明的“手”跟隨著她，直到退休，高級職稱對她來說仍是遙不可及之物。

批判資反路線從 1966 年 10 月初算起直到 12 月底才結束，前後持續了兩個月。鄧小平的官方文革版則認爲：

“如果說發動紅衛兵運動和支持大串聯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第一個關係全局的重大錯誤，那麼，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第二個關係全局的重大錯誤。”⁴

由於書報檢查制度，目前中國對文革的研究仍屬“禁區”。儘管如此，

³ 三幹會是“三級幹部會”的簡稱，此處即指自治區、盟市、旗縣三級領導幹部的會議。如果是在縣裏召開“三幹會”，則指縣、鄉鎮（公社）、行政村（大隊）這三級幹部。

⁴ 《大動亂的年代》王念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8 月，鄭州，第 99 頁。

偶然有零星作品，多少透露一點當年觸目驚心的政治迫害浪潮。例如：

僅在首都 24 所高等學校裏，就有 10, 211 個造反學生被定為右派分子，2,591 名教師被定為反革命。⁵

7 月 22 日，劉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負責同志的匯報會。劉少奇在會上總結說：“這麼大的運動，來勢又很猛，依靠誰來抓呢？黨的領導總是通過一定形式去實現。這個形式就是工作組。有了工作組就比較主動，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⁶

可見，當時的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認為鎮壓了近百萬年輕師生的工作組是好的，而反對工作組是錯的。對此，毛領袖並沒說錯：“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⁷

不論後來發生了什麼，我至今感謝毛領袖，是他解救了和我一樣的上百萬青年，使小鬼們從閻王的黑帽子裏掙脫出來。儘管，我們中的許多人在毛身後受到更為嚴重的懲罰，此為後話。

1966 年 11 月下旬以後，紅衛兵大串聯開始，另一個更大、更精彩的世界吸引著青年學生。他們背起行裝，擠上車船，或徒步行進，成為“經風雨，見世面”的聖徒。

⁵ 《青春的浩劫》，陳義風、方正等著，中國社會出版社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275、276 頁。

⁶ 同上，第 281 頁。

⁷ 劉鄧派工作組鎮壓青年學生，之所以理直氣壯，除了官僚心態之外，恐怕也有 1957 年殘酷鎮壓“右派份子”的“成功經驗”。那時候是毛領袖耍了“陽謀”，讓劉鄧具體執行。因此，許許多多地方黨政軍幹部，都以為文革是第二次“反右”，所以鎮壓起來才格外理直氣壯、得心應手、毫無顧忌。

然而多數當權派未曾料到，毛領袖這次的矛頭是對準他們，是跟他們耍了一次“陽謀”。假如沒有毛放手讓劉鄧派工作組，放手讓他們去“打右派”，然後再發動學生批判劉鄧的“資反路線”，恐怕紅衛兵也難以真正發動起來，那末以劉鄧為代表的“走資派”（即毛的政治對手）也不可能那麼快被毛澤東打垮。因此，不搞清楚“反右”和“文革”之間的內在聯繫和區別，難以真正認識文革初期各派政治勢力的反復較量。

第十九章

行進在千山萬水中

文革中的串聯，除部分沿襲四清時的功能¹外，主要指紅衛兵在全國促進文化大革命的行動。運動初期，北京紅衛兵到邊疆省市串聯，確實起到一定作用。而本地區、本城市的串聯，對當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更重要，意義更長遠。

一，關於“串聯”

1966年8月—9月份，清華、北大、北航、北農大等大學紅衛兵及北京部分中學紅衛兵，相繼來呼和浩特，找人座談，調查感興趣的事件，發表各種聲明，參加或主持各種會議，效果各不相同。

文革中的串聯除了在跨省、市的大範圍進行外，本地各單位間都有串聯。像師院這樣的熱點，更引起全市許多單位和群眾的關注。到內蒙師院看大字報，到師院串聯，聽聽那裏的紅衛兵怎麼說，一時成為公眾大事。開始每天數十人，不久增加到數百人、上千人。來訪者的自行車沿大門兩側擺放有幾十米長。有的人看看大字報或抄寫一番就走了；有的則進入教室向學生詢問師院情況；還有的邀請紅衛兵小將到他們單位看看，希望得到支援。我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瞭解大社會的。

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紅軍不怕遠征難》的社論，稱讚大連海運學院學生不坐車，步行串聯。11月17日，周恩來、陶鑄等中央領導在京接見十幾支步行長征隊，表揚他們，並宣佈：“今冬試行，

¹ “串聯”一詞，或許來源於敵後抗日時期，以及四清時期常說的“紮根串聯”，意思是窮苦老百姓在黨和工作組的支援下，通過聯絡感情，逐步建立革命組織。

明春推廣全程步行。”²

自內蒙黨委給師生平反後，造反的紅衛兵們壓力減輕了許多，因此，學校內的師生源源不斷外出串聯。十天內，離去了一半。

二，金佛像與明代花瓶

校園內，一隊隊即將出發的長征隊伍，站在文史樓前向毛主席宣誓。個個嚴肅認真，人人興高采烈。

一天上午，外語系俄語二年級女生張純華走進東縱總部辦公室，淚水嘩嘩往下流，我一時摸不著頭腦。那時，每天來總部辦公室辦理徒步串聯手續的紅衛兵很多，與張純華同班的一個學生告訴我，張想參加徒步串聯，但她負責看管著原文革籌委會在“破四舊”時查抄的物品，不知交給誰，也沒人願意接她手上的事，所以急得直哭。

我隨張純華來到原黨委書記紀之的辦公室，只見門上掛著一把旅行包用的小鎖。屋內滿地灰塵。窗台前擺著一張桌子，一個殘缺的大花瓶赫然豎立在上面，旁邊散落著一些花瓶的碎片。桌下有三個大麻袋歪歪扭扭堆在一起。一個麻袋裏面全是印有袁世凱、孫中山頭像的銀元。另一個麻袋裝著翡翠、瑪瑙首飾及其它珠寶。忽然，我的腳被硌了一下，低頭一看，是一小塊黃澄

² 步行串聯還有另一個幕後原因，值得一提。那就是日益增加的乘車串聯大軍，開始給全國的交通運輸，造成難以承受的負荷。由於全國學校長期停課，學生串聯又全部免費，不僅火車，也有汽車、輪船，甚至航空。例如西藏書記張國華，曾在成都廣發傳單，歡迎紅衛兵去拉薩串聯，由政府提供免費機票。再加上免費住宿，絕大多數情況下，還包括免費吃飯，帶給國民經濟的影響，可想而知。如火車經常晚點，交通事故頻繁，少數地方還因群眾騷亂而導致癱瘓，貨物運輸和生產都蒙受巨大損失。在如此背景下，周恩來同毛協商結果，才發動輿論，號召“徒步串聯”，以減輕交通壓力。

然而，周恩來所謂“今冬試點，明春推行”的承諾並未兌現，因為到1967年春節前後，中央就下令停止串聯，要求青年學生儘快“返校鬧革命”。因此，大規模的“步行串聯”高潮，其實也就持續了三、四個月左右。包括乘車在內的全國“大串聯”，到1967年春夏之交，就基本停止了。雖然在局部地區（例如京包線、蘭新線等），學生（包括下鄉知青）免費乘車，持續了兩三年之久，而交通秩序的完全正常化，大約到70年代中期，萬里任鐵道部長時，才逐漸恢復。

澄的東西，張告訴我那是金磚。啊，原來金磚這麼小，我原以為金磚會和普通磚頭一樣大小。那邊，一尊佛像進入我的視線，張隨著我的目光，指著窗台上的佛爺說：“這是金的，很重。”

我跟隨張純華邊看邊想，這麼多貴重的物品，需要找一個靠實的，對文物有一定鑒賞力的人來代管。很快，一個合適的人選，中文系教美學的馬白老師登場亮相。馬白進來後，我們向張索要登記冊。她說她接班時就沒有任何手續，就這個模樣，只給了她一把鑰匙。

她接著介紹，這些東西都是夏天抄來的，聽人說，抄家的有師院保守派，有社會上的紅衛兵，交來堆放在這裏，抄多少，堆多少，並未登記和造冊。她拉開一個抽屜讓我們看，裏面平碼著十元人民幣的鈔票，把抽屜塞得滿滿的。我對馬白老師說：“就交給你保管了。”馬憨厚地一笑：“只能這樣了。”三人開始交接³。

馬老師看見花瓶碎片，問誰打的，張說，抄來的時候就碎了。馬老師是教美學的，惋惜地說：“太可惜了！”他仔細打量一番，斷定是明代的花瓶，說：“我試著對對，把它粘好。”

張純華高興地走了，我與馬老師走進裏屋。這裏依然很亂，堆滿衣物、被褥和書籍。我對書看得更仔細一些，發現有《金瓶梅》等。其中唯一一本讓我感興趣的書是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用發黃的麻紙印成。我非常好奇這個戰爭販子是怎樣發跡的，所以對馬老師說：“我借這本書看看。”那個年代的我，總隨身背著一個綠色軍用書包，裏面裝著幾本書和洗漱用具，還有幾包餅乾。《我的奮鬥》還沒讀完，就被同樣的好奇者偷拿走了。

1967年初，全市發生武鬥，東縱被圍攻了一段時間。當造反派被迫退守到教學主樓二樓時，圍攻者曾衝進師院大院，佔領了辦公樓和教學一樓。這

³ 當年多數人對待“金銀財寶”的無所謂態度，是當代中國人絕對無法理解，也難以置信的。據媒體報導，各地情況大同小異。在破四舊中還發現“拉雜”以濟世財寶，金銀財寶。

批財寶不翼而飛。

三，“紅色燎原”在太行山區

11 月中旬，內蒙黨委書記權星垣與我商量，內蒙黨委研究了一下，認為步行串聯很重要，決定推舉一支試點隊全程步行，我當即答應當試點隊的隊長。

回去後，我邀請了師院幾個師生，組成 17 個人的徒步長征隊，其中有三名女生，包括英四的韓桐、秦殿才、徐子惠、王秀蘭，俄三的雷善元、任作霖、黃志高、張仲仁，中文三的郭是海，以及英語老師劉慶榮等。經過討論，給長征隊起了一個響亮的名字“紅色燎原”。

我們拿著黨委介紹信，在新華書店高高興興地領取了 300 張毛像和 100 本語錄。除此之外，自帶油印機、乾糧袋、行軍鍋、蒙古刀等，選定有革命傳統的太行山區為第一站，從山西省會太原上路。

太原市紅衛兵接待站，指定我們住在山西工學院內。徒步出發當天的早晨，按規矩，我們在院內的毛塑像前宣誓。當晚在晉祠休息，一天行走不到 50 里，第二天 40 里，第三天還不到 40 里。長期讀書，現在背幾十斤重物步行，要有個適應過程。

我讓旗手把大旗卷起，可省些力氣。劉慶榮老師背一口鍋，我建議扔掉，劉不同意，他說自己的任務就類似小爐匠這行。大家索性都叫他小爐匠，他一律答應。

幾天後，隊伍到達文水縣雲周西村⁴。大家爭相瞻仰劉胡蘭烈士紀念碑，參拜劉胡蘭紀念館，而後分頭串聯。由於這個村子不大，大批人湧入，社會秩序和環境頗亂。我們主動串聯一些外地紅衛兵和當地派出所聯絡，發佈了一個整頓紅衛兵串聯秩序的公告，主要有三條，包括不准挑動群眾鬥群眾；不准武鬥，不准打砸搶；維護環境衛生，嚴禁隨地大小便等。

⁴ 山西省文水縣雲周西村，是劉胡蘭的家鄉。她在國共內戰時期，作為年僅 15 歲的共產黨員，被國民黨軍隊胡宗南部逮捕並殺害。毛澤東為她的塑像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我們每天照例與公安人員巡邏兩次。我們身上均佩帶一把蒙古刀，多數人沒見過帶刀的紅衛兵，秩序和衛生立即好起來。幾天後，我們走入了古老貧窮的太行山老區⁵。

我們的步行速度越來越快，從每天走 50 里到 80 里，一路散發毛主席語錄，宣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鄉民們以好奇的眼光看著這十幾個背行李的學生，不少人對紅衛兵袖章有幾分敬畏⁶。

沿途，當地鄉親領我們參觀了八路軍抗日時期的兵工廠遺址黃洋洞，也聆聽到老八路講當年抗日的故事。

串聯隊所有成員都深感老區人民生活太貧窮，我們在老鄉家吃的玉米麵、高粱麵、小米稀粥在當地就算是美食了。從走入太行山，我們沒吃過肉，很少見到菜，吃到了菜也沒多少油。

一天，串聯隊內發生爭執。那是下午兩點多，大家陸續走到一個村口，不遠處有家小飯鋪，先到幾分鐘的四、五個紅衛兵走進去，每人要了兩碗素麵和燒餅、鹹菜，並招呼後到的人進去。店面太小，根本坐不下 17 人，要分兩撥。隊內的郭是海堅決不同意吃這頓飯，秦殿才支持郭的觀點。他們認為，下飯館有違徒步串聯艱苦鍛煉的宗旨，其他人不管，埋頭吃了。

當晚住下後，長征隊召開會議，討論白天的事。以下是當時的會議記錄摘要：

紅色燎原紅衛兵例會

時間：1966 年 12 月 12 日

地址：小李村李大爺家

主持人：高老師

⁵ 太行山區，從北往南綿延分佈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廣大地區，是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期，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根據地之一。

⁶ 據我們後來的觀察和訪談，鄉村民眾對紅袖章和紅衛兵的敬畏情緒，背後有幾層原因：一是對城市紅衛兵運動的茫然無知；二是道聽塗說紅衛兵“破四舊”的恐怖和血腥；三是老一輩人對暴力革命年代赤衛隊員紅袖章的模糊回憶。總之，紅袖章和殺人流血有不解之緣。這或許是鄉下人敬畏它的主要原因。

記錄：一橋（郭是海）

高：這次會是一橋和秦鬼（秦殿才）提議召開的。我看大家把今天的事情說明白也好，不求統一看法，暫時保留意見以後再議也行。先讓秦鬼談他和一橋兩人的看法。

秦：我們出發時，宣誓要敢於吃苦，不怕吃苦。我們不就是這兩天出發時帶不上乾糧，一天不吃飯也不至於餓死吧。在飯館買些燒餅，喝點開水也不壞了，老鄉們吃的是什麼，也該知足了，何以要坐在飯館裏吃一頓，這和我們自己的誓詞有矛盾，是口是心非，我們兩人反對。

張仲仁：我不同意秦鬼兩人的看法，現在不同意，永遠也不會同意。大家行軍已經5個小時，個個人困馬乏，這是事實。人是鐵，飯是鋼，正好碰上這個小飯攤，吃碗素麵、幾個燒餅，再走路，這也是爲了更好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有什麼不對？我是第一個進去坐下來的。如果我們刻意找飯館，找不到就賴著不走，或者擺了七個碟八大碗，也稱貪圖享受。吃了碗素麵就算怕吃苦，我不同意。

黃狗（黃志高）：我也不同意秦鬼兩個人的意見。我是積極要吃飯的，即便所有人不吃，我也非吃不可。今天早上出發前，我忙著把昨天印的宣傳品發出去，早飯沒吃多少，以爲路上還有乾糧。我餓得早走不動了，多虧了這個飯館。如果把這件極一般的事也上綱到不吃苦不革命，你們兩個人是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你們不也吃了燒餅，喝了開水嗎？

黑狗（任作霖）：如果今天的事情是你們兩個（指秦、郭）什麼也不吃走下來，我什麼話也不說，願聽二位批評。你們也吃了，我們就多吃了一碗素面，多花了八分錢，就買了一頂不吃苦的帽子，我認爲不合適，你們頂多算五十步笑百步。你們兩人不吃，害得高老師也得跟你們吃燒餅、喝開水（大家笑），其實我私下問過高老師，他也挺想吃那碗麵（笑聲）。我看咱們各自保留吧，反正你倆的話說不服我。

韓桐：那間小屋，屁股大一塊地方，也能叫飯館？我在農村長大的，那只能叫小食攤，就是爲過路往來的勞動人民準備的，勞動人民能去的地方，我們紅衛兵怎麼不能呆。我不信吃碗素麵就會滋生出修正主義（笑聲）。

最後表決：15 個人不同意秦、郭兩人觀點。耗子（王振明）在表決時提議，這個話題今後不再上紅衛兵例會。15 人同意，郭、秦二人反對。

有天晚間走到一個山溝小村。村支書說：“多虧河北一隊紅衛兵走了兩天，要不留不下你們，特別是三個女娃不好安排。”

原來這是個光棍⁷村，只有三戶是夫妻成家的。我們 5 個人住的這個家裏，有兩個大炕，住著兄弟四人。長兄已經 50 多，是個村幹部。他說，兄弟四個幹活，是爲給老四（28 歲）能娶上一房媳婦，傳宗接代。村裏人只有一半人家捨得花錢買毛主席像，我們把隨身帶的毛像每戶發一張。送主席像這天，村裏給我們專門做了一頓好飯，是小米、玉米渣一起煮的飯，一點油和辣椒炒的土豆絲、酸菜絲。許久沒見油花的我們吃得十分高興。臨走結算伙食費時，大家同意多留點錢，這裏老鄉活得太不易了。

出村不久，大家你言我語爲老區人民鳴不平，同情農民的苦難。王秀蘭說：“過去，這裏的人爲革命做了那麼多貢獻，解放後，卻享受不到更多幸福。23 戶人家，才有 3 戶娶親，將來這個村可能就消失了。”有人說，政府應該從人口稠密地方引人來這裏，四川人最多，開進一支婦女大軍就解決了。也有人說，那要看願意不願意了，這又不是強迫的事情。

黑狗說：“這其實也是一種革命，革命應從自己身邊做起，我建議讓咱們隊的三位婦女留下一位。”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全隊人的反對。

孟憲塏是個抗日英雄村，村裏有十幾戶人家是抗戰、解放戰爭的英雄家庭。當年，日本人兩次火燒這個村子。村口有個高丈餘、十幾米長的大影壁，是先祖用石頭壘砌的。日軍燒了兩次，它依舊巍然不動。這裏的英雄故事很多，每個上年紀的鄉民都能講一兩個晚上。我們白天黑夜找人搜集英雄故事，準備回學校後鉛印出來，發給紅衛兵。

晚間，我們和社員一塊演節目。韓桐能唱一口內蒙西部小調，曲調和山西地方曲目相似。他與村內一個姑娘合演對唱、聯唱，悅耳動聽。幾天內，每晚都從寂靜的山村傳出開懷的笑聲。鄉親們喜歡我們這支長征隊，一再挽留我們多住幾天。

四，大寨的山山水水

下一站去昔陽縣，並決定 90 多里山路夜行軍。孟憲塏的年輕人打著火把送出我們十幾里遠，才依依惜別。我們興奮、歡樂，又唱又說地直走到後半夜，才感到又困又乏。山林間忽而傳來狼叫，遠處又傳來狗吠。當雞鳴聲起時，我們終於看到了燈火闌珊處的昔陽縣城，大家的勞累和困倦頓然消失。

天將朦朧亮時，隊伍住進昔陽縣政府招待所。這裏的食堂 24 小時供應飯菜和熱水。顛簸了一夜的我們，喝著漂油花的白菜湯，吃著噴香撲鼻、酥脆可口的烤玉米餅，簡直像進了天堂。洗過澡，天已大亮。除幾位體弱的和女紅衛兵，我和幾個自願參與者急匆匆奔向大寨。

我和同伴懷著朝聖的心情走遍了大寨的山山水水。第二天，我又和留在招待所的幾個人再訪大寨。這次，我們在村口碰到大寨老英雄賈進才，便一起合影留念。我們能見到他，倍感榮耀。

當時昔陽城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昔陽縣為此辦了個聯歡晚會。晚會的多數節目是臨時編練的，內容全是歌頌黨和領袖，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晚會快收場時，河南一個戲曲學校的師生，用舊河南梆子曲調填上歌頌黨的新詞，身穿從昔陽縣晉劇團借來的傳統服裝和道具，上台演出。演到一半，便有人在台下喊起來，說是封建帝王將相復辟了，跟著一片口號聲，還有幾十個人

乾脆湧上台，把衣服、道具搶走，晚會一片混亂。

第二天，有幾個外地的戰鬥隊貼出海報，準備在縣委禮堂批判昨晚的封資修演出，批判縣裏的主持人和封資修穿一條褲子。昔陽人慌了神，來招待所找我們，請求支持。我讓黃狗，即黃志高代表我們出面協調。他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等幾家紅衛兵一起研究，統一了認識後，作為代表，他參加了當天的批判大會，並被推舉為大會主持人。

大學期間，連小組長也沒當過的黃志高，在這裏將才幹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僅讓批判者說完了話，感到舒暢；也給河南戲曲學校和昔陽紅衛兵接待站負責人解釋、檢討的機會，消除了他們的恐懼，幫助河南的紅衛兵找回了服裝道具，總之，皆大歡喜。

最後，黃志高提議，為了消除誤會，再搞一次聯歡晚會。大家就勢推舉黃志高為晚會的組織者和主持人。晚會上，各地紅衛兵不塗彩，不扮裝，盡情高歌，上台台下一齊歡動，十分盡情。當晚會宣佈由內蒙師院紅色燎原代表演出時，我們幾個在台下當觀眾的一時發了懵，因為大家誰也不曾準備。

正迷惑時，只見黃志高不慌不忙走上台，頭戴著一頂不知從何處搞到的形似蒙古帽的東西，自報家門，要唱一首“從草原來到天安門”，而且身旁還有人為他伴奏。樂曲過門之後，只見黃狗用灑灑亮亮的嗓音，唱出一段悅耳的蒙古長調。全場一片掌聲，許多紅衛兵第一次現場聽到蒙古長調，以為黃狗是行家裏手。

黃的獨唱贏得整場晚會的頭彩，與他同班、同室三年的張仲仁不斷感歎：“這個黃狗，他什麼時候練出這麼一招兒？這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啊。”我給黃當過兩年班主任，只有這幾天，才領略到一個平時少言寡語，文革前被定為落後學生的人，竟有如此高超的組織才幹和歌唱技藝。

昔陽縣紅衛兵接待站負責人，在晚會後對我們表示感謝說：“如果沒有黃志高同學的卓越組織和領導，我們就闖禍了，現在一切都好了。”

第二天，他通知我們，晚上大寨支部書記梁便良來見大家，陳永貴不在昔陽，梁便良也是大寨英雄譜上有名的鐵肩膀。我提議，把大寨黨支部派人來的消息通知所有參加昨天晚會的紅衛兵，讓每個人分享這份榮幸。一切事

宜當然仍由黃狗出面辦，由他代表我們串聯隊歡迎大寨英雄。

又是一個充滿革命激情的夜晚，梁便良講得好，大家聽得激動。

黃志高在昔陽的卓越表現也引來一段麻煩。河南戲曲學校的一個女紅衛兵一天三次找黃。開始，大家都以為在研究晚會一類事。在離開昔陽前的紅衛兵全體會議上，黃志高平平靜靜地向大家提出一個難題。他說：“我在這裏結識了一個女朋友，她是河南戲曲學校的，她提出要參加我們串聯隊，和我們一塊走，我無權答應，請大家討論一下這件事。”

與黃同班的黑狗任作霖和張仲仁問黃：“你和她到底什麼關係？為什麼你稱呼她是女朋友？”黃坦然地說：“我們已經開始談戀愛了。儘管有點閃電戰，她說很愛我，我也喜歡她，這就是戀愛。事情就是這樣。”大家開始發表意見。

最後我總結了大家的意見：黃志高和那個女生交往是自由的，可以互相通信，可以進一步瞭解，長征隊暫時不能參加。我們串聯隊繼續往南走，必經河南鄭州，再聯繫也不晚，請黃志高留清地址。

第二天，我們離開昔陽時，她來送行，大家發現她是一個清秀、聰明的女孩子。後來黃志高與這個女學生通過信，瞭解過情況。由於局勢有變，我們串聯隊只走到山西左權就返回了內蒙，黃志高與這個女同學就此中斷了聯繫。黃志高最終娶了一位女工為妻，生有一兒一女。改革開放後，黃志高遠赴俄羅斯，從事貿易，成績可觀。

我們從昔陽出發走九十里地到了和順，第二天翻過大蔡嶺到達左權縣。一天，在左權街上，得到幾份傳單，上面簡單幾十個字，改變了我們的行程。傳單說，內蒙文化大革命發生變故，保守派組成紅衛軍向呼三司反攻倒算。當晚我們通過郵局給師院總部打電話，總部留守人員一聽是我們特別高興，激動地說：“內蒙現在很亂，總部幾次找你們沒找到。”他們讓我們立即返回，不要再搞什麼徒步串聯。由於消息不太清晰，大家決定兵分兩路，郭是海、韓桐、雷善元等人先行，得到準確消息後，大隊人馬再行動。

這之前，我正發高燒，後被接待站的人送入左權醫院。在住院的七天中，回去的人不斷傳來消息，要我們趕緊返回。

我病好後，大家一同坐火車返回呼和浩特。那時，內蒙進入了一個激烈的動盪時期。長征隊的重要資料和印章，原都保存在文史樓第一層。二月逆流期間，白色恐怖襲擾師院，躲在東縱的造反派退守文史二樓，院辦公樓與文史樓一層被圍攻者佔領，所有東西被虜掠一空，我們長征途中收集的資料和我的行李也未能倖免。

五，清華朋友的驚人之見

長征隊剩餘幾個人，返呼前先途經北京，住在內蒙駐京辦事處（位於東城區什錦花園），順便瞭解北京的情況。

我又到了清華大學。清華園內稀稀落落，串聯的人都沒回來，蒯大富也沒在。我不死心，又去水利系找趙寶康和趙炎，兩人都到過內蒙。他們是一般群眾，不像老蒯那樣忙，我找到他們時，他們正在讀書。我們一邊去食堂吃飯，一邊說了許多消息。其中讓我吃驚的是他們對紅衛兵運動的看法。

他們認為，紅衛兵運動的高潮時間很短，大概已經過去了，參加奪權不是紅衛兵運動的初衷。他們說紅衛兵運動與農民運動有很多相似之處，很可能被當作工具。“別看老蒯跑得歡，他走順後很張狂，下場如何，不好說。”二人勸我要與蒯保持距離，“這家伙幹事也能幹出大事，栽跟頭就是大跟頭。”

我問他們持這種觀點的人多不多，他們說開始不多，現在越來越多。“你這個人比較謹慎，今後頭腦千萬別發熱。”過去，我沒想過紅衛兵的命運問題，更不會有紅衛兵“是為人利用的工具”這樣的驚人見解。這段談話，隨著時間的延伸，在我沉浮的經歷中，漸漸主宰了我的許多行為和觀點。

在北京的一天晚上，幾個人一起聊天，談到烏蘭夫。內蒙要打倒烏蘭夫，會不會得到中央的真正支持，會不會打一打，鬥一鬥，最後又把烏蘭夫扶起來。

有人提議問問中央。但具體到問誰，信怎麼寫，都沒了主意。討論結果，信寫給中央文革並江青同志。內容只問：究竟怎麼看烏蘭夫問題，請中央文

革給一個指示。大家讓姜振華執筆。姜問我怎麼署名，要把我的名字寫在前面。我說：“我最好不要署名，署上名字會把事情搞複雜。就寫紅衛兵的名好。”

這件事僅僅議了議，信是怎麼寫的，如何署名，再也沒去過問，我也沒看到這封信。直到 1968 年，方知確有此事，落款是“姜振華等七人”。1968 年，這封被尊稱為“七人黑信”的普通信件，是當年當權派和他們在造反派中的追隨者手上所掌握的一件獨門暗器，其威力不亞於 1966 年文委製造的“原子彈”。

第二十章

奪權的日子

1967年1月中旬，我們回到師院。師院東縱總部正在整風，整頓臨時總部與老總部的關係。師院東縱成立後，總部由曹青海等幾名學生和秦維憲等幾位教職工組成，後又陸陸續續吸收了一些學生，並未嚴格分工，也未劃清權力界限。總部勤務員在“高樹華是什麼人”等問題上，雖有意見分歧，但並未激起大浪。

一，小道理皈依大道理

1966年秋冬，紅衛兵大多外出串聯。爲了應付局面，總部以留守人員爲主，又擴編一些教工代表，自稱臨時總部。他們在一、二月做了許多工作，鞏固東縱戰鬥組織，維持和發展東縱的社會交流。現在，老總部的成員回來了，與臨時總部必然發生矛盾。其焦點，不外是誰掌權問題。

在總部整風第一次會議上，我建議召集師院東縱戰鬥隊隊長會議，然後再召集全體紅衛兵大會，由全體紅衛兵決定怎麼辦。我的建議得到雙方支持，決定由我主持這兩次會議。

在大會上，我講了兩個觀點：第一，根據中央精神，全國進入向走資派奪權的關鍵時刻，不能讓這種內部整風擋住我們的眼睛，我們應緊跟毛主席、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用大道理管小道理。第二，我提議，以正式選舉的老總部爲主，吸收臨時總部的成員，參加總部工作。全體紅衛兵支持我的建議，但爲此我得罪了臨時總部教職工代表，爲日後師院造反派內兩派的演變埋下了伏筆。

毛領袖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回憶起來，許多事果然是虎頭蛇尾，剛剛部署的一件事還沒做徹底，毛領袖的最新指示已下達，兩報一刊社論又

吹響新的進軍號角。各地造反派以這些社論爲指針，指到哪裏，打到哪裏。有時理解不了，也只從自己“覺悟不高”找原因，何況還有個“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原則。¹

事實上，在疾風暴雨般的節奏中，整個社會被巨大的力量轉動起來，不允許回過頭去思考。《青春的浩劫》一書有段話令人印象深刻：

十年動亂之後，舉國上下萬眾一辭，齊聲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在 1966 年，那如火如荼的年月，那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那震動江河的遊行集會，那驚先祖泣鬼神的破四舊，哪一件不是天翻地覆、席捲神州？又有哪一件是一小撮跳樑小丑能夠當此大任的？……²

這段話很真實。現在，許多大學生不知道“文革”是什麼，可當年，從白髮蒼蒼的老人到戴紅領巾的小學生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家庭主婦也組織了戰鬥隊，出外串聯，上街辯論。可以說，歷史掃把從未觸動的社會角落，也讓文化革命觸摸到了。

二，社會騷動的產物——紅衛軍

1966 年末和 1967 年初，呼和浩特地區出現了全社會的大騷動。1966 年 12 月 7 日，呼三司發起“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動攻擊大會”，把行動面涵蓋至全內蒙。工廠、機關內一貫受黨組織壓制的群眾紛紛成立戰鬥隊，宣佈造反。因家庭出身不好，平時總是老老實實任人欺壓的群眾，多數跟在本單位出身好的造反派後面助威，社會上稱這些人爲“呼三司觀點”。當然，其中政治反抗和個人報復是混雜在一起的，很難分清。從整個社會而言，參與

¹ 此語來自毛澤東本人。毛說：“現在有一種說法：要抵制錯誤的領導。這樣在群眾中是可以的，但在軍隊中不能這樣。如果個人按個人的意見辦，軍隊怎能打仗？……還是你（林彪）說的，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摘自內蒙古黨委紅旗聯合總部編印的《紅旗內參》第 212 期：“毛主席重要指示”。

² 《青春的浩劫》，陳義風、方正等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 年 6 月，第 22 頁。

造反，支援造反的人仍是少數。

12月12日，全區各地一些造反派組織聚集呼和浩特市，由呼三司出面組織召開“全區革命造反者控訴內蒙黨委執行的資反路線大會”。1967年1月1日，呼三司爲首的呼市地區革命造反派組織數萬人遊行，批判內蒙黨委執行資反路線。

當批判資反路線的浪潮從學校推到社會之後，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出現了，那就是視黨組織高於一切，與黨組織有各種共同利益的老黨員、老模範、老先進。他們從樸實的階級覺悟和歷次運動的經驗中得出“誰反對共產黨決不會有好下場”的結論。他們認爲，這些學生、知識份子比當年右派分子更猖狂，他們無法理解“呼三司觀點”的人爲何如此作亂。

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之當權派暗中操縱支持，社會上從基層漸漸醞釀出一些與呼三司觀點對立的反對派組織。1966年12月18日，王逸倫書記支持的“內蒙古自治區革命職工紅衛軍”（簡稱“紅衛軍”）成立。第一負責人爲呼和浩特市橡膠廠工人張三林。隨張三林同時成爲紅衛軍總部決策人物的還有橡膠廠其他幾位工人，其中之一是我中學同學趙樹勳。

這之前，我與張三林有過一次交往。1966年10月底的一個傍晚，我去院辦公樓一層的東縱總部辦公室時，見走廊裏靠牆蹲著幾位工人。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是呼市橡膠廠的，非要見高樹華不可，不見就不走。我趕忙把幾位迎入辦公室，燈光下，我認出了中學同班同學趙樹勳。他向我介紹了其他人，其中的一位叫張三林。聽說他們還餓著肚子，我掏出自己的飯票讓學生去教師食堂買飯菜。可惜，開飯時間過了，只買到五個玉米麵發糕招待幾位。當時人交往實在，沒覺得不好意思，充饑而已。

張三林自我介紹說，他們是廠內造反派，對立派讓內蒙師院數學系學生把廠內的材料搶走，帶回了師院，因此請我幫忙。我表示，沒調查無發言權，明天派總部的人去廠內調查之後再詳談。

三天後，我根據調查報告再次與張三林、趙樹勳等會面，談了我的意見，拒絕了老同學的不合理請求。我說，橡膠廠“四清”中整了工人群眾不少材料，不論怎樣，誰也不應把矛頭對準群眾，不能整群眾的材料，群眾要求退

還又得不到答覆，他們有權用自己的辦法拿到整他們的材料。

我勸他們要學習中央文件，看看中央在這些問題上是怎麼說的，他們同意。此刻，雙方都感到有一份同志式的真情，表示今後要加強聯繫。

張三林在文革中經歷一番坎坷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被破格提拔到內蒙古總工會任一名處級幹部，直至退休。此為後話。

紅衛軍聯合以師院抗大兵團為首的呼一司，也召開批判資反路線大會，批判內蒙黨委書記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等人，說他們縱容呼三司，給呼三司的牛鬼蛇神平反。

1966年12月18日，師院抗大兵團貼出一份引人注目的大字報《二十二問》。其中一問是：“運動中大多數保衛黨組織的師生反而錯了，那些出身黑五類，平時遠離黨團組織的人反而成了正確的革命派。請問：究竟是我們錯了，還是你們站錯了立場，把事情看反了？”

立即有數十張大字報質問：“你們”是指誰？有膽子的明說明指，何必躲躲藏藏？很快，大字報滾滾而來：“抗大兵團把矛頭對準黨中央、中央文革，罪該萬死！”抗大兵團的人知道自己惹了大禍，把貼出幾天的大字報趁黑夜撕掉，但沒有逃過照相機的鏡頭。

三，紅衛兵身亡，紅衛軍武鬥

當整個社會力量都參與較量時，一波接一波的對立鬥爭發展極為迅速。12月22日，又發生了更為引人注目的事件。

內蒙人委禮堂由內蒙人委辦公廳管理，誰在該禮堂開會，必須事先向辦公廳申請登記，批准後方可使用。呼三司和呼一司同時選擇12月22日上午在人委禮堂開會，雙方均向辦公廳登記過。此時，人委辦公廳也分成兩派，各自支持呼三司和呼一司。到12月22日，雙方紅衛兵各自佔據禮堂一部分座位，但無法共用主席台。這時，屬呼一司觀點的呼和浩特第一師範學校紅衛兵趙利忠，手提擴音器站在二樓高處為全場呼一司紅衛兵加油鼓勁。當他腳踏二樓護欄向一側行走時，失足從樓上掉下，送到醫院搶救無效身亡。不

論怎麼說，這麼年輕的一個學生，遭遇不幸總是令人惋惜的。人死了，就是大事，雙方各自撤出會場。

12月24日，呼一司、紅衛軍在王逸倫主持下，召開全市追悼趙利忠的大會，會後，組織了遊行。大會上，發言者統一口徑說，是呼三司紅衛兵預謀把趙推到樓下或用什麼方式殺害的。顯然是利用一位年輕學生的死，把仇恨引向呼三司。第二天，呼三司用傳單和廣播向社會公佈了趙利忠死亡的真相。

紅衛軍總部在分析1967年的策略會上，眾口一詞：“搞大會發言、寫傳單、刷標語這些文化人的事，我們比不過呼三司，要採取另外一種鬥爭形式（即武鬥）。”

1967年1月9日上午，紅衛軍出動上千人把呼三司總部（位於火車站南的原錫林旅社樓上）團團圍住，衝上樓去，將值班的呼三司人員痛打後趕出，把總部的文件抄走。當天，紅衛軍下屬組織，在市內砸了呼三司觀點的呼和浩特手工業系統東方紅造反組織，毆打、綁架了該組織兩名負責人。這是呼市地區出現的第一次綁架事件，造成停工停產。

1966年12月30日，呼市地區出現一個新組織，名曰“內蒙古自治區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簡稱工農兵），負責人叫樊俊智，以復員、轉業軍人為主體，吸收工人、農民參加。該組織為全國紅旗軍下屬組織第四縱隊。

1967年1月11日，紅衛軍、工農兵出動幾路人馬，乘汽車襲擊了呼三司的新址——內蒙古工會大樓，再次搗毀呼三司辦公地點，同時襲擊了持呼三司觀點的“呼市革命職工造反總部”及內蒙古日報社。

內蒙古日報社由編輯、記者、幹部、工人組成的東方紅造反隊為了採取主動，在被襲擊的當天晚上宣佈奪取內蒙日報社的領導權，主持今後《內蒙古日報》的出版發行工作。此舉與報社內另一派支持紅衛軍觀點的組織發生衝突。

呼三司辦公地址兩次被搗毀後，移到內蒙古黨校院內，並於1月15日和其他造反派共同組織了示威遊行，抗議紅衛軍和工農兵等組織的暴行。1月18和20日，呼三司分別與內蒙黨委造反派“紅旗”總部、革命職工造反總部、中小學教師造反司令部及新文藝造反聯合總部等召開大會，批判資反路線，

也批判紅衛軍的打砸搶行徑。然而，造反派的和平抗議，終究無法制止保守派有組織的暴力行爲。呼和浩特地區矛盾衝突愈演愈烈，打砸搶事件逐步升級。

1月20日晚，師院東縱得到紅衛軍將去砸呼市革命職工總部的消息，急派紅衛兵前去職工總部所在的中山西路民族旅社守衛。紅衛軍看到造反派已有準備，只用廣播車大罵一頓，砸了十幾塊玻璃後揚長而去。在場的造反派因屢遭砸搶，十分憤怒。現場決定，去砸紅衛軍總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勇敢者們自願結隊前往，當夜把位於新華街的紅衛軍總部砸了，綁架了正在值班的張三林的兩個高參，帶到內蒙黨委“紅旗”總部，連夜令其交待紅衛軍、工農兵的活動內幕，兩人如實做了交待並當場錄了音。這是呼市地區造反派搞的最大一次打砸搶活動。

四，吹響奪權的號角

1967年1月的上海，因奪權風暴而成爲全國矚目的地方。在一本描寫文革奪權的著作中，有對下列情節的記述：

1月8日，毛澤東召開了一個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對上海的奪權活動予以高度評價。他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這次談話，實際上成爲在全國進行全面奪權的號召。《人民日報》負責人唐平鑄和《解放軍報》負責人胡癡，當場據毛澤東的談話，寫成《人民日報》1月9日轉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編者按，經毛澤東當場審定。³

地處祖國北疆的內蒙古，不可能脫離全國運動發展的軌道，只不過當地運動的節奏總要慢一些。

1月19日、20日，內蒙古人委辦公廳“東方紅聯合總部”宣佈奪權，內

³ 《大動亂的年代》，王念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80—185頁。

蒙農業廳“東方紅革命造反縱隊”奪權。呼三司等十幾個組織發表聲明支援。

進入一月下旬的呼和浩特到處是“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之類的標語，讓人感到一種臨戰前的緊張氣氛，似乎在空氣中飄飛著一股血腥味。

1967年1月22日，經毛領袖審定，《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社論中明確指出要奪兩種人的權，即頑固不化的黨內走資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

社論發表後，師院東縱多次與內蒙黨委“紅旗”負責人、內蒙黨委宣傳部幹部李楓，內蒙直屬機關東方紅總部負責人、內蒙輕工業廳幹部張志蓬，華建井岡山霍道餘、鐵路火車頭劉立堂等三劉、呼市工總司、工人公社、內大井岡山賈國泰、林學院紅旗陳曉林、農牧學院井岡山石磊等座談。

大家認為，中央的奪權號召說明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一個決戰階段，進入誰勝誰負的關鍵時刻。座談者分析了內蒙黨委書記的情況：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李樹德、李質等幾名領導人，需要進一步幫助並支持其工作，他們正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王鐸書記雖然猶豫，應該爭取他。與會者決定各組織均成立一個小而精的“運動情報部”，師院東縱為情報的匯集點。

座談中，有一點引起各方關注，即工農兵頭頭樊俊智，曾經是內蒙軍區副司令黃厚的警衛員，這個以復轉軍人為主要成員的組織是得到黃厚支持的。大家一致認為，在軍隊問題上要極為慎重。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的鬥爭大方向正確，相信內蒙軍區領導會支持我們。不過，要設法打通關係，努力向他們靠近，向他們匯報我們造反派的情況，力爭贏得理解。

1967年1月24日，部分保守派宣佈成立“內蒙古自治區無產者革命總部”（簡稱無產者）。當天，無產者與紅衛軍、工農兵一起，在呼和浩特市郊區人民公墓的辦公室開會，討論內蒙形勢，決心與同情呼三司觀點的內蒙黨委書記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李質及郭以青、雷代夫（任內蒙黨委農牧部主任）等人鬥爭到底；拉住王鐸書記，堅決支持書記王逸倫、劉景平，及沈新發（自治區副主席）、張鵬圖（自治區副主席）、朋斯克（自治區副主席）等。要向他們和內蒙軍區首長們及時通報情況，以得到支援。會上組建了“內蒙古自治區工農兵學商聯合總部”。

總之，1967 年伊始，社會派別壁壘分明，在毛領袖的奪權號召下，各樹旗幟，各施韜略，展開激烈的奪權較量。此時，軍隊的態度和立場，成了決定雙方勝負的最重要籌碼。

五，軍人介入 1.22 事件

1967 年 1 月 14 日，中央發出《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⁴，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做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革命群眾的決定》。《決定》說：

“最近，毛主席指示：解放軍應派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革命左派。”⁵

爲此，1 月 28 日，發佈《中央軍委命令》八條⁶。這樣，人民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均有了依據，關鍵在於各地如何執行了。解放十幾年來，軍隊對地方情況的瞭解較爲膚淺，其決策多來自指揮軍隊和解決軍隊問題的思維方式，決策人若主觀、片面、簡單、武斷，極容易出現錯誤，把“支持左派”的事情辦砸。⁷

⁴ 參見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秘書組 1967 年 9 月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選編》(一)(1966 年 5 月—1967 年 2 月)第 99 頁。

⁵ 同上，第 102 頁。

⁶ 同上，第 106 頁。

⁷ 如果僅僅由於不瞭解情況而出現判斷失誤，那問題就簡單多了。複雜之處在於，軍隊更講究下級服從上級，其領導人和地方黨政幹部一樣，多半對文化革命並不理解，甚至反感。其思維方式更喜歡馴服，更討厭造反。他們支持保守派，乃是輕車熟路、順理成章的事。反之，要讓他們改變立場，轉而支持造反派，縱有毛林的明確表態，也會非常困難。更何況，軍隊鎮壓造反派，其根源在軍方上層，即那些“二月逆流”中，曾經大鬧中南海懷仁

1967年1月22日上午，紅衛軍、無產者、工農兵千餘人圍住內蒙古日報社準備重新奪權，把報社內造反派清除乾淨。市內造反組織上千人前去支援，雙方圍住報社形成對峙。廣播車大喇叭的對罵聲，數千圍觀群眾的吵嚷聲，亂成一團。不久即發生肢體衝撞，進而開始拳打腳踢，大規模火拼一觸即發。

軍區參謀長下令派一連士兵到達現場，帶隊的指導員當場宣佈雙方人馬退回，報社問題由軍隊主持解決。實際上，他們動身之前已接到軍區領導王良太的密令，到報社去是支持紅衛軍觀點。事後，4931部隊一個戰士透露：

“……出發前指導員給我們講，這次去是支持紅衛軍奪權的，但是去了報社要是有人問我們支持誰，我們不要表態，就說是來保護國家財產的。”⁸

軍隊組成的人牆名義上要把兩派群眾隔開，實際上是把呼三司觀點的人分割包圍開來。紅衛軍對被包圍的呼三司成員拳腳相加，介入的軍人並不阻攔。更奇怪的是，軍隊的幹部、戰士，許多都戴著大口罩，把自己的半個臉遮起來，似乎有意掩蓋。

4931部隊這個戰士又補充說：“到了報社，我們就組成了幾道人牆，把三司群眾圍在裏面，紅衛軍一見有我們撐腰，就越發起勁，大打造反派……當時把大批造反派同志打壞了，在我們面前倒下去，從我們面前抬出去。我也感到解放軍支左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心裏彆扭。怕當場遇見熟人、同學，特地戴上了一個大口罩。……”⁹

1.22 事件以軍隊進入報社暫時收場，但事態還在繼續發展。此後，內蒙古的文革形勢，開始邁入一個更加險惡的腥風血雨階段。

堂，對中央文革和周恩來拍桌子的老師們。

⁸ 引自《挺進報》第35期，1967年7月11日第三版。《挺進報》是呼三司屬下內蒙古工學院“井岡山革命造反委員會”所編印的一份紅衛兵小報。

⁹ 同上。

第二十一章

帶槍的資反路線

1月22日晚，呼市地區很多造反派負責人不約而同來到師院東縱。進門後，每人都來不及相互打招呼便開始訴苦。粗略統計，被打的人數超過200多，有輕重傷患50餘人。“內蒙軍區一出兵就支一派，壓一派，明顯地把我們的人圍住，支持紅衛軍的人打我們，這叫什麼支左？”

一，與軍區“交火”

當晚，內蒙日報社又傳出消息，介入報社的軍人勒令報社的造反派負責人檢查。他們正在鬥爭，要求支援。

我在發言前，先給大家讀了一遍1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我說：“我們的人挨了打，受了氣，我建議各單位頭頭回去穩住大家情緒。肯定說，內蒙軍區領導對我們要採取壓的政策，但他們現在手裏有這個中央文件，我們不能急著與軍隊去衝突。那正是對方希望看到的。”

“我們應講清真相，利用一切可能向內蒙軍區領導匯報情況，打動他們，爭取他們支持。如果這一切均無效，我們也要選擇中央允許的方式進行反抗。”

參與討論者多數情緒激動，有的主張與軍隊硬抗，也採用紅衛軍的辦法，你砸，我也砸。對此，我解釋說：“我們只圖一時痛快，會把大家引上死路。文化大革命是反對武鬥的，難道對方不執行十六條，我們也把十六條拋在一邊，那成了什麼革命派？我們革命派與紅衛軍的區別在哪裏？我們必須有勇有謀，不能當二杆子¹。”

¹ 二杆子，意思相當於“傻瓜”，是呼和浩特當地人對智力發育不全者的一種戲稱，也常用於朋友間開玩笑，並非含有明顯的歧視色彩。

會開到近天亮，決定各單位宣傳車分片廣播。討論過程中，東縱幾個寫作快手，把“1.22”事件真相寫成傳單，寫、刻、印連續操作。散會時，一氣呵成的傳單及時交給每個組織，以便統一口徑、更有宣傳效果。

1月23日，由首都三司、清華井岡山駐內蒙聯絡站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造反派組織駐內蒙聯絡站的人，共同發起在人委禮堂召開大會，揭露“1.22”事件真相，在呼市地區引起的反響很大。他們從外地人角度看問題，一方面毫無顧忌地揭露紅衛軍的打砸搶，同時把矛頭對準了內蒙軍區。他們講話言辭激烈，當場喊出“打倒軍閥！”的口號，從而煽起了造反派內的過激情緒。

1月23日下午，東縱情報部人員報告，有幾位身份、舉止不同尋常的人在院內看大字報。我讓剛來總部辦事的化學系的兩個女學生去當嚮導，一再囑咐她們要態度和藹、耐心，要機靈，多察言觀色，弄清來者身份。兩個女孩子回來後只說其中一個官架子拿得很大，其餘三個像保鏢，說話還和氣，她們盡可能回答了客人提出的問題。

之後不久，傳出內蒙軍區首長王良太來師院看大字報遭到學生圍攻的消息。我們對“圍攻”一詞實在不解，兩個女孩子何以能圍攻四個男子大漢？兩個女孩子被迫寫出當時的過程與雙方交談的情況，以明是非。

1967年1月25日這天，呼市地區的造反派與內蒙軍區負責人正式“交火”了。25日下午，首都三司、清華井岡山駐內蒙聯絡站的紅衛兵借用師院的廣播車到軍區南門口廣播了“1.22”事件真相，求見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劉昌。這時，從軍區院內衝出20幾名戰士，圍住宣傳車，不問青紅皂白，把車上的人拉入軍區院內，把廣播器材砸壞。司機甩開圍攻的戰士，開車衝出包圍，回去報告。清華大學紅衛兵陳鼎，被幾名戰士掀翻在地，拖來拖去。陳極力反抗，戰士邊喊“紅衛兵打人”，邊撲上來將陳毒打一頓，然後關押。有個戰士搶下陳鼎的紅衛兵袖章，搖晃著拋向空中，對著幾個紅衛兵喊：“這就是你們的下場！”

此事一傳出，立即引起造反派的極大義憤，從各方面集中到軍區南門口要人。

25 日下午 6 點 20 分左右，內蒙工學院井岡山造反兵團的 39 名紅衛兵，從學院出發，步行到軍區北大門，由兩名代表與門衛交涉，請求見軍區副政委劉昌。當再三請求遭到拒絕後，39 名紅衛兵推開門衛，列隊行進到軍區主樓門口停下，繼續要求見劉昌副政委。值班負責人命令警衛營封鎖主樓大門，並把 39 名紅衛兵包圍。一個多小時後，軍區一位負責人讓 39 名紅衛兵進入軍區小禮堂內，軍區四名幹部對紅衛兵進行說服、動員，勸大家離開。紅衛兵們決意要見劉昌反映情況，表示見不到就決不離開。

幾位內蒙軍區文工團員找到劉昌政委，向他反映了剛剛發生的情況，力勸首長出面見學生，劉昌才來到小禮堂。

開始，相互間的談話很平和，互相尊重。井岡山紅衛兵反映了呼市地區文化大革命情況，介紹了“1.22”報社事件的真相，並代表內蒙革命造反派，請求軍區首長對事件進行調查，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劉昌認真地聽著，同意深入調查。此時，突然有二三百名軍人擁進小禮堂（事後得知是政治部副主任張德貴和參謀長王良太組織的），高喊著“把反革命分子抓起來”，“別和他們費嘴，先捆起來再說。”等等。會場氣氛急轉直下，激烈的辯論驟起。內蒙軍區兩位文工團員，當場表示反對這樣對待學生，當即被扭送出去，關押起來。劉昌並未阻止眼前發生的這些不正常現象，只在一邊微笑著觀望，不久被軍區幹部護送出去。

小禮堂的圍攻持續到第二天。參與圍攻的軍區幹部輪流吃飯休息，對呆在小禮堂的學生實施疲勞戰術。軍區幹部逼迫在場的紅衛兵承認“衝擊了軍事機關”，並做出書面檢查，方可放行。

1 月 26 日下午，聞訊趕來的內蒙黨委書記高錦明，內蒙黨委常委、人委副主席李質和軍區黨委進行座談。高、李向他們介紹了內蒙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勸解軍區領導支持呼三司等群眾組織，要求立即放出小禮堂的紅衛兵，遭到軍區拒絕。

高、李離去後，王良太對在座的軍區負責人說：“內蒙黨委一直抱住三司不放，高錦明和李質剛才的話，也說明他們把其他組織都當成保守派，我們不能聽高錦明的。”

1月28日，中央軍委來電話批評說：“內蒙軍區竟敢違背中央指示，出動武裝部隊壓制革命派。”被圍的幾十位紅衛兵才被放出。

二，洞門大開，等待“武士”

從1月26到28日，紅衛軍、工農兵、無產者等組織，在呼市貼大字報，說呼三司衝擊內蒙軍區，揪鬥了軍區副政委劉昌。有的甚至說劉昌的領章被撕掉，並被紅衛兵毒打等等，抗議呼三司把鬥爭矛頭對準人民軍隊，斥罵呼三司紅衛兵是衝擊軍區的反革命，有的乾脆說呼三司準備奪軍權。

我從未經歷過如此尖銳殘酷的大規模群眾衝突。紅衛軍、工農兵、無產者四處放風，要去砸某某單位，常常是聲東擊西、指南打北，讓我們防不勝防。一些在本單位處於少數的造反派，白天上班，夜間乾脆來師院東縱找地方借宿。幸好有一部分學生外出串聯未回，我們熱心地為他們安排。學生宿舍樓內出現越來越多的生面孔，但校園秩序井然，從未發生過失竊、鬥毆等事情。

1月25日後，紅衛軍四處傳言，要砸師院東縱。許多工人造反組織負責人與我聯繫，要派人來保衛東縱，我好言謝絕。工人們白天要堅守生產崗位，如何應付頻繁的、閃電式的打砸搶？東縱總部採取了一系列對策，以防不測。我們加大了東大門（正門）的夜間亮度，在門兩側牆上刷了兩幅新標語，一邊是“熱烈歡迎紅衛軍、工農兵兄弟組織來我校串聯”；另一邊是“東縱戰士心向毛主席，胸懷坦蕩，放眼全世界”。夜間，北門關閉，正門大開，留兩個紅衛兵輪流守衛。廣播室徹夜有人值班，各戰鬥隊時刻準備，只要聽到大喇叭廣播聲，全體東縱戰士立時集合，守衛在各自崗位。總部由我值班，我指揮廣播室，聯絡口號是：全體東縱戰士迅速起床，歡迎客人。播音室特地錄製了一盤歡迎鑼鼓的磁帶，大喇叭一放很有氣勢。

那幾天，白天我忙得雙腳離地，各地造反派有什麼事都會找東縱，最難處理的問題都轉到我這裏。夜間人靜了，我開始值班。為了應付特殊變故，

我請數學系兩位年輕教師，和我同年留校工作的同事²，三人一起，集體值班。因為這個崗位一旦發生事情，要靠有勇有謀的人來支撐。

和他們在一起的那些夜晚，我感到恢復了普通人的身份，因為同學之間可以隨便說東道西。

院內雖一片寂靜，但我們的內心十分緊張，時刻等待著“武士”的到來。我們在屋內談的話題實際也離不開文革，往往是，他們兩人把白天聽到的見聞帶給我，大家一起議論。當時，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前景會怎麼樣？談到下半夜時，三人會拿出白天準備的鹹菜、玉米麵窩頭之類的食物充饑，如果有點辣醬，便如同過節一樣愉快。

紅衛軍終究沒敢上門砸東縱，他們多次派人偵察，也瞭解到我們有所戒備。不知是什麼阻止了他們的計劃，是熱烈歡迎的標語？還是洞門大開、一片漆黑的神秘大院？當時外面流傳：東縱在院內設立了陷阱和殺人堂。

對於我，那些緊張而又安靜的夜晚隱隱難忘，同學之間的友誼比什麼都感人。

1月30日，紅衛軍襲擊了呼和浩特雲母廠的革命造反派組織。衝進廠內的紅衛軍、工農兵成員借機對一些女工不軌。雲母廠女工十分氣憤，上街遊行抗議。呼三司群眾利用這一事件揭露工農兵、紅衛軍的流氓行徑。雲母廠同時向市公安局、內蒙公安廳報案，但這兩處都是支持保守派的人掌權，無人受理。不過此事讓紅衛軍臉上無光，挑釁活動稍有收斂。

三，無視徐帥的電令

在圖們、祝東力著的《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一書中，有很長的一段是對1967年1月底呼和浩特地區的敘述描寫，現摘引如下：

² 一個是馬文卿，另一個是李勇。馬是我中學同學，他和李勇是大學同班，留校後住一間宿舍，十分要好。我和馬、李都是同年留校的。我雖在外語系，但我們宿舍相鄰，文革前常常來往，關係密切。馬、李在文革中是造反派。馬的母親在解放初受過管制，其兄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被打成右派。家庭的黑帽子一直壓著他。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內蒙黨委和政府近乎癱瘓的日子裏，呼三司號令一方，所向披靡，儼然是地方的一大勢力。

呼三司要求軍區領導出面。23日，軍區領導派出了副政委劉昌來到報社。

劉昌也是老紅軍，1955年授銜的少將，在軍區主管政治工作。他趕到報社，呼三司立即與之辯論。劉昌承認武裝出兵不對，並答應過後到呼三司所在地當眾檢討。

然而，軍區的其他領導卻不同意向呼三司低頭。

……

軍隊支左決定下達以後，自命左派的呼三司更加有恃無恐。他們不斷到軍區大院張貼大字報，要求劉昌公開檢查。

內蒙古軍區領導置之不理。

呼三司一聲令下，呼市全城大街小巷貼滿了炮轟劉昌的大小字報。……

一時間，軍區大院成了全自治區造反運動的漩渦中心。³

上述所言，把禍因歸結於“稱霸一方”的呼三司頭頭，內蒙軍區領導人是無奈又無辜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運動初期，按中央軍委命令，內蒙古軍區機關開展了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1966年7月，前門飯店會議結束，烏蘭夫留在北京檢查，內蒙軍區第一副政委吳濤從北京回內蒙軍區主持工作。實際上，吳政委在北京期間，張德貴、王良太兩個軍區常委在軍區黨委另一位副書記蕭應棠支持下，散佈吳濤與烏蘭夫有關係，把吳濤向烏蘭夫黑線上推。內蒙軍區沒有向中央軍委請示報告，便自行切斷吳濤家中電話，查封汽車，撤掉警衛員，

³ 圖們、祝東力著：《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頁。本書是目前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物中，關於內蒙文革比較詳細的一本權威性著作。雖然本書基本架構可信，資料也比較翔實。但由於種種原因，書中仍有許多地方，或未能忠於史實，或無法究根問底，留下不少值得商榷之處。

派哨兵監視。1967年1月，一向不動筆的劉昌副政委也急忙寫出“首長的第一張大字報”，稱吳濤是三反分子。此時的吳濤完全失去自由。

1967年2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周總理，這位中共元老，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聽到內蒙軍區所爲，嚴厲而氣憤地指著在場的蕭應棠、劉昌、黃厚、劉華香幾人說：“你們一不請示報告中央和中央軍委，二不事後檢查錯誤，封鎖消息至今，私自把一位主持軍區工作的副政委打成三反分子，你們想幹什麼？你們還有沒有起碼的組織性、紀律性！你們眼裏還有沒有中央和中央軍委！”蕭華也嚴厲地說：“你們就是無法無天，就是舊軍閥的做法。”

周總理轉頭批評吳濤說：“你就不能在發現他們的錯誤苗頭時向中央寫個報告？就是打個電話也好嘛，讓我們知道，早些採取補救措施。”我有幸參與這次接見，至今歷歷在目，音猶在耳。

然而，對內蒙軍區如此重大事件，在《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一書中，卻是這樣寫的：

內蒙軍區自前門飯店會議以來，揭批了司令員兼政委烏蘭夫，而後又揪鬥了在軍區黨委書記中排名僅次於烏蘭夫的第一副政委吳濤和孔、廷、鮑四位領導……。到“一月風暴”襲來的時候，全軍區停止工作、靠邊站和被揪鬥的幹部已多達235人。……

此時，實際主持軍區工作的是軍區黨委副書記、副司令員蕭應棠。⁴

該書作者把內蒙軍區內出現的非正常現象，輕描淡寫爲自發的事件。但已然從不同側面揭示出當年軍內確實存在激烈的派系鬥爭和政治清洗，文革大動盪之下，難免催化地方的混亂。

1967年1月22日之前，蕭應棠等人曾向中央軍委請示過，22日晚，徐向前元帥答覆三條：軍隊不得動武；對兩派群眾組織情況不明時，不要輕易表示支持任何一派；如群眾組織發生武鬥，派部隊徒手前去勸解。

⁴ 同上，第28頁。

徐帥的指令是十分正確的。如果當時的內蒙軍區負責人認真執行命令，便不會演變出更大的政治動盪。

1967年1月23日，即軍區向報社派出一連士兵的第二天上午，內蒙軍區黨委開會討論“支左”問題。副司令員黃厚講，要支持“工農兵革命委員會”這些組織。黃認為，該組織主要是由復轉軍人組成，就是不穿軍裝的戰士，不會有什麼問題。

1月26日，王良太命令某團兩個連待命，一個連進駐軍區大禮堂，一個連進駐後勤部門，並批准某師機關幹部的武器歸個人保管。

1月27日，內蒙軍區作戰部根據蕭應棠、王良太命令，向呼市秘密調進五個連，動用了駐呼部隊九個連，準備支持工農兵、紅衛軍、無產者奪權。

1月28日，中央軍委電報批評內蒙軍區領導違背中央指示，“出動武裝部隊壓制革命派”。王良太說：“電報沒有以中央名義發，中央不瞭解。”

“毛主席聽了一面之詞，不管他！”

當天，王良太在軍區黨委會上說：“中央軍委抓了我們典型，說明對我們情況不瞭解。”這位軍區參謀的話，當場得到其他黨委成員、副司令員、副政委的支持。

下午，王良太指示呼和浩特軍分區負責人宋發富迅速和紅衛軍、工農兵、無產者聯繫，正式把軍隊與紅衛軍拴在一起。無論呼三司造反派紅衛兵怎樣找軍區領導溝通，已無濟於事。呼三司在他們頭腦中已成為敵人。實際上，內蒙軍區任何部門和幹部從未對呼三司正式調查過，或要求呼三司向他們提供組成人員政治面貌等材料。我作為呼三司方面領導人之一，是多少年以後，才搞清內蒙軍區領導人的政治態度形成之緣由的。

1967年2月1日，內蒙軍區黨委會研究支持哪一方問題，由蕭應棠主持會議。

王良太發言說：“我從內心反對呼三司，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反革命的。應該支持紅衛軍。”“把呼三司砸了，犯錯誤，殺頭，我願意。”黃厚、張德貴連聲附和。王良太進一步提出建議：1，立即把呼三司頭頭抓一批；2，

對河西公司 818⁵採取鎮壓行動；3，把內蒙公安廳的保守派“紅革聯”扶植起來掌權；4，對內蒙黨委開刀，先把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三人抓起來。他催促蕭應棠快下命令，蕭感到事情重大，自己難負其責，不肯下令。

會後，王良太在自己管轄的司令部，命令下屬寫傳單《堅決打倒呼三司一小撮壞蛋及其幕後操縱者高錦明一夥，戳穿呼三司在 1.22、1.25 事件上散佈的謠言》，直接與群眾組織打起了傳單戰。

與此同時，內蒙軍區在所屬範圍內，開展了清潔內部，修理“吃裏扒外”的運動，開始鎮壓對軍區有不同意見的領導、幹部、戰士。調動 200 多名通訊兵，把軍區文工團新成立的“紅色造反團”搗毀，砸了他們的油印機、電話機，搶走了材料，並打傷了三人。機關幹部及家屬中，凡對造反派持同情、支持態度的，一律要檢查，甚至隔離關押起來。

呼三司等群眾組織十分關注內蒙軍區大院內的動向，在外面組織各種聲援、抗議活動，但卻不能對軍隊本身，有更多的行動和過火行爲。

1966 年到 1967 年 4 月前的內蒙軍區個別領導人，無視徐帥的命令，支一派，打一派，執行了一條帶槍的資反路線。⁶

⁵ 河西公司，是位於呼和浩特郊區的一家大型的國營公司，負責研製尖端武器，隸屬於北京的七機部，其職工幹部，大多來自復員轉業軍人。由於是高度保密企業，基本不與地方來往，因此文革之前，當地人並不知道這個企業的存在。文革開始以後，河西公司一方面要參加北京七機部的文革，同時也要參加呼市當地的文革。或許由於受北京方面影響較大，對全國文革的情況瞭解更多，該單位絕大多數幹部職工，都支援呼三司造反派的觀點。818 是該公司造反派組織的名稱。

⁶ 這裡談的僅是我當時的認識。現在回過頭來看，單純從黨軍關係角度，已經無法準確認識“二月逆流”中出現的軍隊對抗地方、基層對抗中央等複雜現象。由於毛的獨斷專行和中央文革極左派的極端行徑，黨中央事實上已經分裂為兩個司令部，同樣，軍隊系統也有不同派系，很難說當時的黨政軍各個系統，還有什麼統一的命令傳達管道。而僅僅依靠兩報一刊直接發表社論，傳達毛的所謂“最高指示”，尤其那些讓下層幹部難以理解的指示，執行起來無法避免障礙重重。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及其親信，非要重建新的組織體系（革委會），以取代原有官僚機構不可的動機所在。

第二十二章

全國文革第一聲槍響

1967年1月是個多事的月份。我們剛剛聲討完內蒙軍區圍剿軍隊文藝戰士的暴行，又從國外傳來蘇聯勃列日涅夫政權鎮壓中國留學生的消息。這件事在電台廣播後，全國人民義憤填膺。

一，軍區門口等待接見

1月29日，呼市地區剛剛下過一場大雪，地面白皚皚的一片，天氣極為寒冷。內蒙地區造反派召開大會，地點在新華廣場。大會由自治區直屬機關東方紅聯社負責人張志蓬主持，由我發言。會開得很短，接著開始遊行。我們大概有20多輛車，有解放牌，嘎斯69蘇聯老式車，有公共汽車，多數是卡車。我坐在師院一輛卡車的前座，東縱的紅衛兵坐在後面的車箱裏。遊行隊伍從新華廣場出發，穿過內蒙人民政府前的新華大街向東行進，途經內蒙日報社、新城百貨商場。當我們走到鼓樓時，看到前面出現一彪人馬，足有三、四十輛車。我讓隊伍停下來，等待他們走近。他們舉著三個橫幅：“堅決支持內蒙師院東縱的革命行動！”“支持以高樹華同志為首的革命左派！”“堅決要求內蒙軍區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從標語看出，這支隊伍和我們是同觀點的，立時感到很溫暖。

他們的隊伍也停下來，其中幾個人下車向我們走來，雙方互相通報。當他們得知，我就是師院的高樹華時，十分熱情，原來他們是河西公司的818造反兵團。河西公司屬於中央七機部管轄，是研製導彈的保密單位¹。當場雙

¹ 這是我們首次得知呼和浩特有“河西公司”這個單位。由於該公司直屬中央，又是保密的軍工企業，平常很少同地方往來。是文化大革命，才使相同觀點的革命戰友走到一起。該公司的數萬名工人幹部，多數來自轉業軍人，許多是保密專業的大學畢業生，有很強的紀律性和較高的組織動員能力。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如果沒有他們對形勢發展的準確判斷，

方約定，兩隊並作一隊，向北到軍區去請願，要求他們支持革命左派。行進的隊伍不呼口號，只舉著標語。818 走在前面，我們隨後，形成一股很大的人流，總共有六、七十輛車。車隊沿內蒙軍區繞了兩圈後，解散撤離。

河西公司造反派負責人王志有向我提議，趁這個機會開個串聯會，大家交換一下意見，研究下一步的行動。我認為這個提議很好，在場的張志蓬也同意。於是，眾人齊聚師院文史樓西側一個公共課大教室，共有一二百人，沒有座位的人站在後面。我推薦張志蓬主持會議，王志有首先發言。他介紹了北京的形勢後，繼續分析內蒙的運動發展趨勢。他認為內蒙目前處於造反派與保守派奪權與反奪權最激烈的時候，造反派應該聯合起來，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王志有、張志蓬建議當場組成指揮部，請大家表態。張代表東方紅聯社，我代表內蒙師院東縱表示支持。之後呼三司、鐵路局火車頭、華建井岡山、黨委紅旗和市裏一些院校造反派組織代表，也紛紛表了態。我代表師院東縱，推舉河西公司 818 擔任指揮部總指揮，大家鼓掌通過。我說，爲了加快進度，應擬定一個行動方案，儘快實施。

1 月 31 日晚，來內蒙串聯的上海第二軍醫大學 16 名穿軍服的學生，在內蒙軍區招待所被圍攻，這是內蒙軍區負責人命令受蒙蔽的戰士幹的。第二天，呼三司觀點的群眾組織舉行聲援，軍區才解除了對二醫大學生的圍攻。當時，王志有和我商量，趁大家都在場，繼續開會。

會議由王志有主持，河西 818、呼三司、東方紅聯社三家負責人擬定了一個意見，意見稱，當前內蒙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問題是內蒙軍區。現在內蒙軍區一味袒護、支持保守派，若轉向支持我們，肯定下一步的運動發展會順利。會議還討論了未來的運動鬥爭大方向，對內蒙黨委應該怎麼分析等問題，當務之急是爭取軍區對我們的支持。一致的意見迅速產生了一封送交內蒙軍區首長的信，內容是請他們接見我們，允許我們與軍區支左辦公室坦率交談，以理解我們，支持我們。有了信就必須火速呈上，那麼信使當然由院校群眾組織紅衛兵來充當爲妥。

王志有提議，由我和師院、工學院、林學院、呼三司的紅衛兵來擔當此

任。我接受了指揮部的命令，領著十幾個紅衛兵立即出發，時間是2月1日下半夜3點多。我把信交給軍區南門的衛兵時，再三囑咐他，請他把值班代表請出來，我要親手把信交給值班代表。衛兵拒絕了，他只答應我，把信交給值班同志後通知我們。半小時後，我得到了衛兵的答覆，他說，信已交給值班負責人，負責人正打電話聯繫，把你們的信交給軍區首長。我再次讓衛兵轉告，我們不走，要在門口等下去，今夜等不到，到明天、後天，要一直等下去。這位衛兵聽出話音不尋常，便再次跑步到大樓親自報告去了。

塞外的一月，後半夜氣溫降到了零下20多度，夾著北風，一般人很難抵禦刺骨的寒氣。我讓體弱的、衣服單薄的紅衛兵先回去，有幾個同學回去又坐車回來，帶來了厚的棉衣。我和紅衛兵們一直等到天亮，什麼也沒等到。

第二天一早，王志有領著河西818的造反派到達軍區南門現場，他們的大轎車臨時作為指揮車。與他同行到達現場的各群眾組織的代表議定，繼續等待答覆，要一直等到答覆後再撤。消息很快傳遍了呼市的大街小巷，社會上幾乎所有造反派組織都派人到了軍區門口，軍區南門逐漸擠滿了人。從送信到等待，僅幾個小時的一般性事件，迅速演變成史稱“軍區門口靜坐”的政治事件。

指揮部為了防止節外生枝，開始維持秩序，要求靜坐的隊伍離開大門警戒線5米遠，嚴守現場紀律，並給人行道留下出入口。自然形成的隊伍，按指揮部要求靜靜地坐在地上，每人手拿毛主席語錄本。不久，廣場上架起了大喇叭，用高音把請求軍區首長接見我們的要求直接傳送到軍區大院裏。

靜坐和廣播干擾了內蒙軍區的正常工作，作為軍事指揮官，必然十分惱火和反感。

二，韓桐倒在槍口下

軍區南門口的人越聚越多，指揮部決定分批靜坐，按單位輪換，晝夜不停。對峙僵持了四天，到2月4日中午，一位軍官上了我們的指揮車，代表內蒙軍區首長正式通知我們，可選派各組織的代表100人，有組織，有紀律

地進去，與首長見面。

在場的人十分興奮，馬上選好 100 人，由我組成一個代表團。下午四時許，我們一行人，舉著“見劉昌代表團”的紅旗，雙排列隊，來到軍區門口。我問值班士兵：“你接到沒接到讓我們 100 人進去見軍區首長的通知？”衛兵說：“知道，我接到了這個命令。”我說：“那好，請你開始點數。”

由於這兩天軍區南門口不安寧，軍區大門兩側橫向停著兩輛卡車，恰好把門堵死。我們進去之前卡車把門讓開了，當我們 100 人全部走進大門時，身後的兩輛車重新把門堵死。正當我們不知所措時，從南門內兩側竄出來數百名解放軍戰士，把我們 100 人一個個分割開，舉手便打。戴著眼鏡的我走在前面，還未弄清怎麼回事，就被一個戰士一拳打倒，身後的背包被撕開。

“背包不能丟”，我下意識地回身往牆邊跑，隔牆把書包仍在了牆外，邊扔邊喊東縱學生的名字，讓他們把我的書包接過去。

此時軍區院裏亂作一團，一些身強力壯的紅衛兵開始反擊。外面的大喇叭高聲呼應：“反對毒打紅衛兵，反對殘暴行兇。”有些紅衛兵從大門外翻過來參戰。一見進來的人越來越多，打人的解放軍在一聲口令下迅速撤走，哨兵也離開了崗位。

河西公司 818 許多人在部隊工作過，有軍事經驗。他們立即命令紅衛兵退出大院，不要再往裏走，不要超過警戒線。如果超過警戒線，會為軍隊進一步下毒手提供藉口。天黑以後，院內的造反派逐漸撤出軍區大門。

軍區門口死一樣寂靜，剛剛發生的激烈場面，給大家造成太深的刺激和傷害。連夜，每家造反派小報、《內蒙古日報》改版的“東方紅電訊”等媒體，都報導了當天軍區發生的事件。

夜色中，軍區南門大開，沒有任何遮攔。造反派在指揮部的號令下，靜靜地在警戒線外坐等。

我被送回學校，在醫務室簡單治療一下，便在辦公室沙發上睡了一會兒。第二天出門時，正碰上英四學生韓桐也要去軍區。我當過他的班主任，又在紅色燎原戰鬥團一起串聯過，彼此非常熟悉。這兩天，韓桐手裏拿著一個喇叭，在靜坐隊伍前面維持秩序。今天，他穿著一身用綠棉布做的軍服，外面

套著一件舊軍大衣，手裏仍提著那個喇叭。我們倆人沒顧上吃早飯，搭上門口一輛去軍區的車，來到了現場。

王志有的指揮車內，人頭攢動，忙忙碌碌。有人把買來的燒餅遞給我，我順手給了韓桐，讓他趕緊吃。韓桐喝了幾口水，吃了一個燒餅。這時，我並不知道，也未曾料到，這竟是他這一生最後的食物。韓桐和我打了個招呼：“我到前面去看看，今天更不能亂，今天很可能出事。”他留給我的遺言，我至今銘刻於心。

中午 12 點 15 分，我正和指揮部的幾個人商量下一步對策，突然聽到兩下像鞭炮似的響聲。我沒在部隊工作過，沒有槍戰經驗，但車內一些復轉軍人立即異口同聲地說：“槍聲！”有人來報告，說一個年輕同志被打傷了，要趕快搶救。我跑過去一看，是韓桐。當場，醫學院的一些學生和在場的醫生把韓桐抬到一輛吉普車上，呼三司負責人郝廣德陪同，急送內蒙醫學院搶救。

慌亂中，我們儘量壓抑住緊張心情，初步分析槍是從軍區大院內打出來的。找來事發地點的學生詢問，當時韓桐正給靜坐的群眾喊話，告訴大家要堅持下來，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要遵守紀律，不要超越警戒線，等待軍區首長接見。說到這裏，槍聲響了，只見韓桐一趔趄，接著又一聲槍響，韓桐倒在了地上。²

指揮部緊急開會分析，軍區既然開了槍，那麼問題的性質就變了，靜坐不會達到目的。會議決定，隊伍要有秩序地撤離，天黑前全部撤完。內蒙黨委紅旗總部一些成年人，是有政治經驗的幹部，自告奮勇要求最後撤。人委東方紅、火車頭工人也要求最後撤。晚上六點鐘前，靜坐結束。

我心裏一直惦記著韓桐的傷情，令人悲憤的消息傳來，韓桐已經身亡，

² 此處敘述的情況，建立在幾個同學對現場的回憶上。由於當時情況混亂，大家一時摸不準子彈射自什麼方向，更不清楚開槍者的相貌，因此只好大概猜測是遠距離射擊。但據另外的說法，其實是近距離射擊，而且在開槍之前，兇手柳青曾經試圖用馬刀砍殺韓桐，只因韓桐躲開了馬刀，柳青才用手槍連發兩彈，將韓桐擊倒在地。後一種說法，比較接近事實情況。詳見圖們、祝東力合著：《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5 年。

指揮部的人都難過地流下了眼淚。回到師院，我召開總部臨時會議，讓大家把瞭解到的情況綜合一下。與會者共同認為，我們和軍區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我們必須守住師院這塊陣地。會後，我代表總部，在廣播室的喇叭上對師院全體紅衛兵講話，並代表總部宣佈由東方紅縱隊對全院實行無產階級戒嚴令，各個戰鬥隊開始值班。據我所知，河西公司 818 王志有回去後，在河西也發出了同樣的戒嚴令。一時呼市和整個內蒙地區，進入非常恐怖的時期。

三，掩蓋殺人真相，指揮毀屍滅證

1967 年 4 月 13 日，中央解決內蒙問題的八條決定下達後，一直不明真相的造反派方面，從內蒙軍區內部獲知，1967 年 2 月 5 日發生在軍區南門口槍殺韓桐案件，是一場預謀殺人。

參謀長王良太在其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當時提出三種方案供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員蕭應棠、黃厚選擇。第一套方案是：撤回到軍區司令部大樓內，放棄大院；第二套方案是：不守全攻，放群眾進院，然後形成包圍圈，實施抓捕；第三套方案就是 2 月 5 日的殺人行動。

2 月 5 日上午 10 時，部署開始。王良太站在大樓平台上，蕭應棠坐鎮值班室，肖向作戰部下達了“聽候命令，準備戰鬥”的指令。

內蒙軍區司令部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挎著馬刀，提著手槍，及另外兩名幹部，出現在南門。12 時 15 分，柳青首先開槍，兩槍把站在南門警戒線外，正在領讀毛主席語錄的紅衛兵韓桐擊倒，子彈穿破動脈血管，韓桐被送到醫院不久即死亡。

韓桐倒下後，堵在南門口的大卡車立即開走，門內出現一片開闊地，院內道路兩旁佈置了四挺機槍，院內人員已準備了 50 副擔架和大量的繩子，準備捆人。

韓桐倒下後，他身邊的師院東縱、林學院紅旗的大學生紅衛兵就要衝進大院，富有經驗的河西 818 成員全力阻止，並立即在警戒線外手拉手築成人

牆，用韓桐使用過的手提喇叭大聲告誡氣憤的群眾，千萬不要衝動上當。站在樓頂的王良太，見群眾並沒有像他預料的那樣衝進大院，當時便對身邊的人說：“他媽的，這回我們可輸定了。”

柳青在光天化日之下開槍殺人，難以掩人耳目。內蒙軍區文工團紅色造反團的戰士，向軍區首長報告殺人者是柳青。軍隊內一些富有正義感的幹部戰士，以自己當場所見向領導報告，都指向劊子手柳青。張德貴、王良太等人嚴令不准胡說，並煞有介事地成立了“2.5”事件專門調查組。2月6日，由王良太批准，把敢於揭發柳青問題的11名軍人實行軍事管制，沒收了槍支。與此同時，紅衛軍、無產者向社會上散播“有人想陷害軍區，韓桐根本就沒死沒傷”，“韓桐是818王志有佈置自己人打死的，818的人有槍”等謠言。

2月5日晚，蕭應棠向值班的內蒙黨委書記王鐸說：“韓桐是在軍區門口打死的，單從這一點我們有責任追查。我們現在掌握，很可能是反革命混在群眾中打死的。”殺人犯柳青一直被內蒙軍區負責人包庇著，直到4月14日，周恩來直接下命令，柳青才被逮捕歸案。

2月5日晚，師院東縱打電話給內蒙公安廳正式報案，報告韓桐之死的情況，並要求公安廳派出法醫立即驗屍，以明真相。

內蒙公安廳此時分兩派，紅革聯為多數，該組織在2月4日下午加入無產者。2月5日晚接師院報案電話的高姓員警，屬紅革聯成員，他以找不到領導，找不到法醫百般推託。高將此事報告了公安廳值班的治安處副處長、紅革聯常委戴寶文，戴拒絕派法醫。

2月5日晚，公安廳紅革聯把東縱要求驗屍被拒絕一事，報告了內蒙軍區王良太等人。王良太立即發火，大罵公安廳的值班人員是一群蠢豬，下達了他的指令：立即“驗屍”。公安廳紅革聯於2月6日晚，乘一輛蘇製嘎斯69吉普車，停在師院北門口，要求驗屍。我一邊派人接待，同時通過電話向公安廳造反派查詢原因。原來，紅革聯主動上門是接到王良太指令，偵查屍體所在，準備搶屍，毀屍，滅掉罪證。

紅革聯打著公安人員牌子，連續兩次來師院，索要屍體未果。2月9日，突然衝進內蒙醫學院附屬醫院停屍房，搜查屍體，審問停屍房工作人員，仍

未達到目的，遂向師院東縱發出書面的最後通牒，限期交出屍體，否則予以嚴懲。

3月2日，公安廳紅革聯的人在無證據、無手續情況下，非法拘捕內蒙醫學院附屬醫院一名大夫和化驗員田光，這兩位醫務人員曾參加韓桐的搶救手術。田光入獄後，被逼迫寫“韓桐之死是三司幹的”之類的供詞，田光拒絕，因此給她戴上背銬近一個月之久，直到3月31日這天，周總理點名要田光到北京參加會議，紅革聯才被迫釋放了她。

韓桐的屍體藏到2月10日，周總理親自派內務部長曾山³到呼和浩特市主持驗屍時，才從隱藏處交出。

1967年2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周總理在接見內蒙四方代表時問我：“內蒙公安廳的人是否找過你們驗屍？”

我說：“是。”

“你們為什麼不讓他們驗屍？”

“我們2月5日晚向內蒙公安廳報案時，他們拒絕派法醫，第二天晚上卻主動上門。我們從公安廳造反派同志那裏得知，他們180度大轉彎不是來驗屍，而是偵查屍體所在，然後毀滅罪證。因此，我們請求周總理派北京的法醫去驗，以明事情真相。”

周總理當場派曾山部長帶領法醫去呼市。驗屍結果證明，子彈就是從軍區方面射出，並從屍體內的彈頭查明了手槍型號。

四，60輛軍車架槍巡邏

2月5日事件後，張德貴、王良太在軍區院內加緊清理內部，控制輿論。王良太命令出動60多輛武裝車隊，滿載頭頂鋼盔、手執武器的軍人，車頭上架著機關槍，日夜在市區遊行示威。

2月8日，內蒙軍區派人，把向黨中央報告2月5日事件的《紅旗》雜誌

³ 內務部長曾山，是長征老幹部，建國後出任多項要職，據說為現任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之父。

記者于順昌、《解放軍報》記者宋協孔的住處圍住，切斷電話線，衝進屋內把兩名記者毒打後捆綁而去，把屋內材料搶劫一空。

內蒙軍區個別領導人的一系列行徑，引起軍區部分幹部的不滿。有的通過他們在地方工作的家屬向中央反映情況；有的通過熟人，把消息送到師院東縱。2月16日夜間，內蒙軍區政治部一名幹部，寫出具名大字報《我在審判》，把內蒙軍區個別負責人的一系列行為公佈於眾。第二天，軍區去逮捕他時，他已逃到北京，被我藏在清華大學水利系樓內。

2月2日，紅衛軍、工農兵、無產者衝進內蒙黨委大院，把正在開會的內蒙黨委負責人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郭以青等人綁架而去，單獨扣押，直到周總理親自點名讓這幾位到京開會，才通過內蒙軍區負責人把他們要出來。

2月8日至12日，工農兵、無產者組織了呼市地區5000名農民進城，高呼“打倒呼三司！”“打死高小三！”⁴等口號。2月8日，無產者、紅衛軍支援呼鐵局保守派紅鐵戰士在鐵路局奪權。2月10日，紅衛軍支持呼市郵電局保守派奪權。

2月12日，內蒙軍區派出兩個連的兵力，到內蒙日報社再次奪權，把造反派人員全部趕走，無產者從旁配合。同時，內蒙軍區對河西公司實行軍管，把818造反團負責人王志有等上百名造反骨幹關押起來。

2月5日後，呼市地區造反派組織無法繼續在本單位生存。造反派面臨極大壓力，除幾所大專院校外，社會上呼三司觀點的人數驟減，造反派呈現弱勢。

內蒙軍區事件，是解放軍介入文革以來，全國第一聲槍響。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各地造反派組織紛紛來電、來函、來人對呼三司為代表的內蒙造反派予以支持。

2月7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14個單位來電聲援；8日，北

⁴ “高小三”是無產者給呼三司起的綽號，意為保高錦明，屬於小丑類的角色，既沒有什麼實力，也成不了什麼氣候。當時對立派的群眾組織，為了給對方抹黑，常常使用起外號的方法，造反派和保守派皆然。今天的我們，可以將之看成是共產黨文化的影響之一。

京地質學院東方紅來電聲援；14日，湘、鄂、川、穗、豫等駐京20多家造反組織來電聲援呼三司；同日，清華井岡山駐呼聯絡站在師院貼出大字報《十四個爲什麼？》

全國文化大革命第一聲槍響，不僅驚動了全國。幾天後，蘇聯、蒙古國電台都報導了這個消息，由此傳遍了世界。

二月份，內蒙地區一片白色恐怖。

第二十三章

中央召喚迷途的羔羊

1967年2月7日下午，師院值班人員向我報告，門口來了三名全副武裝的軍人，說有中央通知向東縱和呼三司送達。我在師院辦公樓下的會議室接待了他們，三人拒絕落座。站在中間的一位是軍官打扮，頭戴傘兵帽，皮帶上插著手槍，還別著手榴彈。兩邊各有一名戰士，均頭戴鋼盔，一個端著衝鋒槍，一個懷抱機關槍。看著他們三人幾乎武裝到牙齒，我暗自好笑。我說：“請不必緊張，你們是我們的客人，我們不會虧待你們。”

一，四方代表進京

軍官向我宣讀中共中央決定：讓各方組織各派5人，其中包括呼三司，到北京參加談判。我要求留一份書面通知，他當即交給我一份複印件，我在他出示的正文上簽了字。他認真地問我是誰，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是師院東縱的勤務員，可以代表東縱，也可以代表呼三司接受這個通知。他說，好像聽說過這個名字。他放下通知書便匆匆告辭。我讓紅衛兵把他們客氣地送走。

事後數月，一個偶然的機會和那個軍官相遇，他主動和我打招呼，問我還認不認識他。我一時僵在那裏。他說：“你忘了，有三個全副武裝的人給你們送一份中央通知？”我說：“這件事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你是中間那位。”他哈哈大笑，說軍區安排他來時，首長一再囑咐注意安全，派兩個特等射手保護他，他也帶了手榴彈和自動手槍防身。“沒想到你們那麼客氣，那麼講理。紅衛兵把我們送上車後，還說‘謝謝你們送來消息’。我感到你們很文明，根本不像宣傳的巨齒獠牙，是殺人放火的強盜。”

呼三司接到通知後，立刻召開緊急會議，研究中央這份通知。參加會議的有河西818、鐵路火車頭、呼三司、林學院、內大、農牧學院、黨委“紅旗”

等。會議決定，呼三司派郝廣德；師院東縱是焦點之一，所以高樹華也必須去。我和郝廣德又推薦了劉文研。劉當時是政教系教師，熟讀馬列，對社會問題的見解比我們厚實。工學院內部商定陳永華、周建民參加。

中央接見內蒙各方代表，是件重大事情。我作為呼三司首席代表，意識到責任重大，所以去北京之前，晝夜加班，準備各種材料，走訪各方人士，許多老幹部也是我討教的目標。

韓桐的死對我影響很大。我派紅衛兵四方打探，到底誰是開槍殺害韓桐的兇手，始終找不到答案。直到臨上飛機前，終於從軍區內部得到消息，殺害韓桐的是個叫柳青的軍官。

出發當天，中央派專機來呼和浩特接我們。這是我第一次乘飛機。在藍天上，看到飛機在白雲中穿行，心情反而十分沉重，到底前途怎樣，中央怎麼決定全是未知數。我們有信心向中央反映情況，我們相信中央對內蒙問題會做出正確判斷，但幾方代表都有闡述自己觀點的機會，都有勝算的可能。隨著飛機的顛簸，忐忑中感到自己正要去完成一項重大使命。

接我們出機場的是總理辦公室的兩個秘書——趙剛和朱光明。他們把我們安排在西直門附近的建工部招待所，後來這裏改為國務院第一招待所。到達當晚，在食堂吃飯時，發現人很多，飯菜十分豐富，我問工學院陳永華為什麼，他說：“今天是除夕，明天就過春節了。”我竟然忘了這個最傳統、最重要的節日。

晚飯後，在京的造反派不約而同聚在我的房間，雙人標準間一下子擠了十幾個人。大家一起悼念韓桐，為韓桐的死流下眼淚。有人透露，內蒙軍區準備私下成立革委會，準備結合王逸倫幾個領導幹部，群眾代表由無產者、紅衛軍組成。打算用幾個人頭進行慶祝。說話人指著我說：“你的人頭是少不了的。”¹

到京當天，總理秘書趙剛打來電話，問我怎麼能找到高錦明同志。原來，高錦明被列為內蒙黨委一方首席代表，至今仍被無產者、紅衛軍扣留。趙剛

¹ 幾個月後，中央在解決內蒙軍區內部問題時，這位消息靈通人士的話得到證實，軍區擬定的鎮壓名單中，我排在第一號。

說他已問過無產者、紅衛軍多次，都說不知道。我說：“你不要找他們，找內蒙軍區代表，要嚴厲些。軍區和他們是一家人，如果軍區下命令讓他們交出高錦明，說是中央意圖，他們不敢扣留。”趙剛無奈地說：“試試吧！”

果不其然，趙剛採用我的方法促成高錦明獲釋，由軍區負責送到北京。爲此，中央首長接見一直拖到2月10日。

二，中央首長接見四方代表

那天下午，大轎車把我們接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廳內，第一排坐著幾位很胖的穿軍裝的老者，原來他們是內蒙軍區的負責人蕭應棠、吳濤、黃厚、劉昌等。第二排坐著高錦明、王鐸、李樹德、郭以青等內蒙黨委代表。我們幾乎和紅衛軍同時到達。

中央首長進來了，他們是周總理、康生、陳伯達、葉群、楊成武、張春橋、姚文元、關鋒、王力、戚本禹等。兩個旁座上坐著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和內蒙軍區副司令員劉華香。

總理穿一身軍衣，顯得非常精神。這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見中央領導，見總理，自然很興奮。這時，周總理開始點名，他先從軍區點起，當點到劉昌、蕭應棠時，周總理問：“有人說你們開的槍。”

二人矢口否認：“沒開槍。”

問：“前面有人帶槍沒有？”

答：“帶著槍呢。”

“事後檢查槍管沒有？開槍沒開槍槍膛是不一樣的。”

“沒檢查。”

周總理說：“你們工作做得不細，你們可能就有漏洞。”

在周總理與軍區代表交談時，我已知道兇手是誰。因此，我事前寫好一封信，內容是：據我們瞭解，開槍的人名叫柳青，是軍區司令部的二級部長。但我們無法找到本人核實，又無法獲得更多的旁證，如實匯報，請中央首長

給周總理。我坐在後面看到他把信交給了總理。總理看了一下，繼續問內蒙軍區領導：“你們是不是打過一個報告，讓中央批准你們成立革委會。你們知道不知道，各省市成立革委會的批准權是在誰手裏嗎？是在毛主席手裏，是要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意的。你們未得到中央任何指示，不經中央批准，擅自成立革委會，這是違反紀律的大事。”

周總理還質問：“你們不經過批准，有什麼權力把內蒙軍區副政委吳濤同志打成反革命，暗中關押起來這麼長時間。這件事我們是得到《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記者反映，才知道的。”

康生插話指出：“要注意軍隊的傳統，我軍的傳統中，歷來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這樣的批評是很嚴厲的。對於這些批評，在座的黃厚、蕭應棠都想不通。後來，當我和蕭應棠將軍成為好朋友後，我曾經問他：“當時周總理、康生批評你們時，你們服不服氣？”蕭大方地說：“我在紅軍當過斷後團的團長，那時總理就認識我。心裏是不服，嘴上還得執行命令啊。”他說其他人的情緒還要大一些。

總理接著問第二排的黨委書記高錦明和王鐸。當問到高錦明時，周總理說：“你被群眾抓走，他們打你沒有？”高錦明說：“群眾無非是提了很多問題，我應該實事求是地回答，不管哪派，他們沒打過我。”之後，周總理開始點群眾組織代表的名。第一個點的是呼三司的高樹華。我站起來回答總理的問題。總理問：“你們為什麼叫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叫三司，是否套北京的三司？”我說不是。我告訴總理：“內蒙原來有兩個紅衛兵司令部，第一個是1966年8月成立的，叫第一司令部。因為人員複雜，觀點分歧大，後來很快就名存實亡。於是，內蒙軍區和黨委一些幹部子女成立了革命造反第二司令部，設在二中，不久自動解散。我們是1966年9月醞釀，10月成立的，我們也叫革命造反司令部，因為屬於第三號，人們叫做呼三司。”

總理笑了笑說：“你說清楚了。”接著他又問我哪年入的黨。得知我是60年的黨員時，總理一點頭：“啊，當時你正讀大學二年級，看來你在大學表現不錯。”我說：“是黨的培養。”總理笑了。接著康生（當時叫康老）問我：“你瞭解韓桐的情況嗎？”我說：“韓桐是內蒙托縣格爾圖營村人，

是內蒙師院英語四年級學生，家庭出身貧農。他家有父親、母親、兩個哥哥、一個姐姐，還有一個弟弟。弟弟正在部隊服役，叫韓梓。”康老問：“韓桐平時在學校表現怎麼樣？”我說：“他在學校表現很好。我以黨性保證，韓桐是位老實、積極要求進步的學生。在大學四年中，韓桐曾被評為學毛著積極分子，系三好學生。”他又接著問：“你怎麼瞭解這麼多情況？”我說：“我和韓桐一個系，韓桐一入學，我就是他的班主任，又當過他的輔導員，教過他課，所以對他的情況比較瞭解。”之後，中央首長又一一問了郝廣德、劉文研、陳永華和周建民的情況。

另一邊群眾代表有張三林、漠南、杜凡、張啓生，還有一位包頭鐵路的代表曹文生。點完名，他們五位也反映了自己的觀點和對文革的看法。中心一點，呼三司是反軍的，誰反對解放軍，我們就反對誰。五個人反復講這個觀點，幾次被張春橋、關鋒、戚本禹打斷，說講你們自己的觀點，不要說別人如何。看來他們準備不充分，沒有講出多少自己的東西來。

最後總理宣佈：“你們要打回電話去，勸告各方冷靜沉著，要勸你們的部下，保持現狀，脫離接觸。中央準備派人下去調查，由內務部長曾山同志帶隊組成調查團，直接到內蒙去看看，考察你們匯報的情況，希望予以配合。”第一次接見到此結束。

三，周總理派曾山到內蒙

曾山到呼市後，和內蒙軍區、黨委、紅衛軍、無產者幾方面都進行了接觸，還到內蒙師院瞭解情況。因為部隊日夜巡邏，時有任意捕人的現象，造反派群眾很多集中在師院大樓內，曾山受到被圍困群眾的歡迎²。曾山此行帶著法醫，由師院化二學生、東縱總部成員董玉華陪同，對韓桐的屍體進行檢

² 據目擊者介紹，曾山一行到達師院東縱大樓（即文史樓）那天，擠住在樓內的幾百名造反派流亡者，情緒激動，欣喜若狂。雖因長期被封鎖在樓內（守衛東縱大樓），無法洗浴，顯得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但見到中央調查組，就像見到了大救星。無論男女老少，個個熱淚盈眶，口號震天，使調查人員頗為動容。

驗，證實了我方的匯報。曾山把董玉華帶到北京，由董直接向總理匯報。

在內蒙，曾山專門看望了韓桐的父母和家人。接見時，韓桐的父親介紹了他們的出身，韓桐的品德，並向曾山同志提出一個請求：韓桐有個弟弟韓梓，現正在內蒙一個部隊當汽車兵，因哥哥的問題被團裏關押起來審查，受到很大刺激，精神有些失常。要求軍隊領導把兒子交給他們照顧。曾山就此事出面干預，不久韓梓回到父母身邊。

曾山從內蒙回京後，專門請我、郝廣德、董玉華到中南海核實問題。那一天下午，天黑後一輛黑色伏爾加轎車把我們三人帶進中南海。中南海肅穆、堂皇，因為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住的地方，他好像就在我們身邊。

工作人員把我們領到內務部，提醒我們不要亂動，這裏是分區辦公。我們不懂他的意思，趁曾山還沒來，在大廳裏坐了幾分鐘，便走到院門外。冬日裏，樹葉已經凋零，花池留著殘草。我們沿一條栽著松樹的小路信步前行，後來便高興地跑起來，以為小路可以通到很遠的地方。不料，跑出不遠，胡同旁兩個衛兵喊住我們，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說明來意，兩個衛兵很客氣：“你們第一次來中南海吧，內務部的位置到此為止，沒有通行證不能出去。”原來在中南海，到其他部門必須有通行證。

接見中，曾山很和氣地與我們核對事實，問我們整個組織的成立和活動情況。其間，主要跟我們核對 1967 年 2 月 4 日那天下午，見劉昌代表團進軍區大院的過程。我如實把那天情況講完後，對曾山說：“軍區是派人正式通知我們，組成代表團去會見的。事情發生後，反誣告紅衛兵搶劫了值班室，打傷了衛兵。”曾山和藹可親，他安慰我們要聽中央的話，他會把瞭解的情況真實地反映給中央領導。他一再囑咐我們，多做團結工作，要教育自己，不要把錯誤都推給別人，要協助中央把內蒙局勢穩定下來。他特別強調，內蒙處於反修前線，要提高警惕，要保持軍隊的穩定和國防安全。我們對這些意見都接受了。

四，內蒙軍區到北京捕人

1967年2月中旬，內蒙軍區參謀長王良太，以中央軍委命令和加強軍隊紀律爲名，針對軍區持不同意見的幹部，開展整頓。

那時，內蒙軍區內已把一些同情或支持呼三司觀點的幹部停職關押，有十幾人受不了折磨，逃離呼市地區。王良太、張德貴讓軍區保衛部組織人，在北京衛戍區秘密偵察。王良太下命令說：“要把外逃人員全抓回，即便逃到廣州也抓，一個不留。”

一天下午，我送上訪同志走出建工部招待所大門，被站在門口的兩個持槍士兵攔住，一位軍官生硬地問我：“你是哪個單位的？爲什麼住在這裏？”我舉目望去，停著三輛軍車，從車牌看出是內蒙軍區的車輛。我沒好氣地回答：“你管我是哪個單位的！我是周總理的客人，是中央指示來京參加會談的。你是哪個單位的？竟敢堵在門口盤查，難道還想在首都抓人嗎？”

軍官毫不示弱：“我們就是要抓人，就抓你這樣的壞人！”我和軍官爭吵起來，驚動了樓內人。我方代表出來幫我，紅衛軍代表幫軍人。有經驗的內蒙黨委書記，打電話給總理辦公室，報告內蒙軍區到代表駐地抓人一事。

內蒙軍區人多勢大，很快衝進樓內，挨門搜查。他們搜查時，我方代表跟在後面大聲抗議，院內、樓內一片混亂。正在此時，趙剛、朱光明到了，隨後，北京衛戍區執勤人員，把內蒙軍區的人領走。內蒙工會一名攝影愛好者，及時把現場情況攝入鏡頭，第二天，我們按趙剛的佈置寫好材料，附上照片送交總理辦公室。

在一次接見中，周總理氣憤地質問蕭應棠、黃厚、劉昌：“你們是部隊的高級幹部，應該知道，地方部隊進入首都是要經北京衛戍區同意的。你們開著車，帶著槍，在北京隨便抓人，這是什麼問題？如果各軍區都這麼做，北京人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安全還有沒有保證？”

康生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非常生氣：“你們不是一般的無組織無紀律，你們眼裏根本就沒有黨中央，沒有中央軍委。你們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你們到首都尚且如此，在內蒙，你們會更加無法無天。”那天，我和內蒙軍區的人爭執時，明白他們是來搜誰的。貼在軍區內的《我的審判》的大字報作者，此時住在清華大學，是他們無法搜到的。而另一位軍區政治部幹部，當時正

在樓內寫一份要送交總理辦公室的材料。他們全是從呼市逃出來的，我們必須保護他們。混亂中，我們把這位幹部藏在三樓一個角落。三樓住著紅衛軍方面的人，估計內蒙軍區不會搜查他們的樓層。果然，當張三林、杜凡等人向帶隊軍官解釋三層是他們的住處後，軍人即刻撤離三樓。此時，趙剛、朱光明已趕到。

五，軍人指揮圍攻師院

內蒙軍區派往外地的軍人戰果輝煌。外逃幹部被抓回後，掛牌示眾近三個小時，均遭到毒打，連女兵也不得倖免。

儘管中央對軍區個別領導人一再批評，耐心幫助，卻收效甚微。67年3月2日，王良太在軍區工作會議上講話說：“我們正準備大奪權，奪大的，呼市市委也準備奪權。現在牽涉到北京談判，我們認為這與奪權不相干，該奪的，條件成熟就奪，談判僅僅是緩和一下矛盾，便於中央瞭解內蒙形勢和黨委情況。”³

在軍區支援下，呼市地區的白色恐怖越演越烈。3月5日，鐵路局的保守派“紅鐵戰士”，追捕造反派，參加火車頭的工人被迫到鐵路沿線躲避。火車司機張孝遭到毒打，雙臂脫臼。

公安廳大院內，支左部隊對東方紅造反組織的人員進行清理，連同情者也不放過。有一半幹部被強令在大院內罰站，對造反骨幹懲罰更甚，逼他們站在一個用木棍畫的圈內，畫地為牢，不准動彈。三月初，獨立二師在工學院北視察地形，準備時機到時，對700多名造反師生動手。這一期間，師院、工學院、內大、林學院的牆外，每夜都有爆炸聲，軍區毫不隱諱進行軍事演習的事實，試圖以武力威脅。周圍居民區的老百姓十分反感。紅衛軍、無產者、工農兵的宣傳車配合軍車行動，不停地廣播，叫罵挑釁。

³ 有一些自恃對革命有功，對全國百姓有恩的人，常常把“沒有老子犧牲流血，能有你們今天？”之類的話掛在嘴邊，時時露出不可一世，老子天下第一的面目。他們即使做錯了事，也往往“刑不上大夫”。

3月11日，軍區政治部公開發佈《致師院東方紅戰鬥縱隊的一封信》，信中宣佈：師院東縱是牛鬼蛇神的大本營，是一貫作惡多端的反革命組織。這封信發佈後，紅衛軍上千人堂而皇之湧進師院大院。東縱總部決定撤出辦公樓及文史樓第一層，進入文史樓二樓以上，去往二樓的通道，用鋼筋鐵門封鎖。從此，師院東縱成了一座孤島。

沖進師院辦公樓及文史樓一樓的紅衛軍人員，肆無忌憚地破壞學校器材，不少物品被搶掠一空。武裝軍車把守大門，車上的軍官，隨時準備指揮攻樓。

六，槍要指揮黨

此時，內蒙軍區處於壓倒優勢，他們開始組織黨政幹部，籌畫成立呼市革委會（不報中央批准），準備於1967年3月18日宣佈市革委成立的消息，同時槍殺一批造反者，以示慶賀。

軍區的重要同盟者，是黨委書記兼人委副主席王逸倫。1964年，王在中央黨校進修期間，與天津某工廠會計有曖昧關係。因這個女人和多個外國使館有聯繫，引起中央注意。烏蘭夫把王的問題帶回內蒙，讓王坐了一段冷板凳。1966年初，在北京前門飯店會議上，王逸倫以受害者身份得到一個左派書記頭銜。

1967年，王逸倫支持成立紅衛軍、工農兵、無產者及紅色造反者聯合委員會等組織⁴，與內蒙軍區領導人黃厚、劉昌、張德貴、王良太一起，共同對呼三司實施圍剿。

中央第一次和第二次接見時，王鐸曾明確表示支持呼三司，批評內蒙軍區的武力政策。3月16日，王鐸避開眾人，突然搬到王逸倫在京的住所，並於3月15日寫信給中央表示改變觀點，反對呼三司，與軍區站在一起。1967

⁴ 紅色造反者聯合委員會，是於1967年在呼市成立的保守組織，組成人員主要是自治區機關幹部及高校教師，其中有120總部、紅聯總會、銀鋤縱隊、內蒙古大學紅野鶴、內蒙古日報社職工造反總部等等。

年3月18日，中央接見四方代表時，周總理批評王鐸：“你的信我們收到了。我很驚訝你的態度改變得這麼快。你把革命原則視同兒戲，你的事先放放。”

4月13日中央下達對內蒙的決定後，內蒙軍區領導人離京時，把王鐸一人丟棄在招待所內，陪伴他的是滿地紙灰。

內蒙軍區和王逸倫等人成立革委會一事，被中央發現後，周總理嚴厲批評他們說：“只有毛主席有權批准成立革委會。你們好大膽子，竟然不把毛主席、林副主席放在眼裏，你們想幹什麼？你們要立刻下令停止一切活動，會後寫一份詳細檢查交來，要寫清事情的經過，中央必須追查當事人責任。”

我當時在場，沒見過周總理如此氣憤和動容。

在中央的干預下，內蒙軍區一些人苦苦籌畫的“登基大典”成了一場黃粱美夢。

毛領袖有句名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戴著革命光環的“軍爺”們，對武力的迷信習慣早已根深蒂固⁵。

⁵ “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這個問題好像在理論上已有定論，但現實中仍然沒有解決。也許在小範圍內，一個小軍頭，並不能以個人意志代替黨的集體決策。但在最高層，真正有實權的黨和國家領袖，總不想放棄（也不敢放棄）軍委主席這個位子，原因何在？還不是要把黨軍兩權合一嗎？既然兩權始終都要合一，甚至非合一不可，哪還說誰指揮誰幹什麼？從這個意義上講，恐怕只有“國防軍”和“軍人不干政”等觀念的樹立，才有可能真正解決軍隊現代化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問題。

第二十四章

周總理派我回內蒙

1967年2月18日，周總理等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四方代表時，狠狠批評了內蒙造反派和呼三司。話題是由呼三司反映的一件事引起的，即內蒙日報社造反派出版的《東方紅電訊》，在火車發往北京的途中，被截留在大同車站。

總理立即打斷說：“這是我下命令截留的。”接著，總理說：“你看你們的報紙究竟都說了些什麼？”總理站在椅子後面，雙手扶著椅背，疲憊的臉上，炯炯有神的目光盯著我和郝廣德。我站起來，接受總理批評。

一，火車上宣講周總理四點指示

總理說：“你們的報紙純粹是給解放軍抹黑。解放軍支左中可能會犯這樣和那樣的錯誤，但那是內部的問題，是不能公開的。你們想過沒有，你們北面就是蒙修、蘇修¹，你們能保證沒有蘇修、蒙修的特務在你們身旁活動，把我們的內部情況暴露出去？你們這種不顧大局，只顧自己私利的行為是完全錯誤的，你們要檢查，一定要檢查，把這件事檢查深刻，一次不深刻，兩次，這個檢查就由高樹華自己做，不要推給別人。回去要討論，把討論情況書面匯報給我們，根據你們認識的情況，我們對你們的問題進行定奪。”

回去後，我立即執筆寫檢查，一邊檢查，一邊和幾個代表討論，同時把討論的內容與內蒙方面通氣，告訴他們不要做任何反軍的事，稍有反軍傾向的話也不能說。諸如“油炸王良太”，“火燒劉昌”之類的標語一律不准再寫。提意見不准用刺激性的詞語。我執筆的檢查第一次沒通過，又寫了第二

¹ “蒙修、蘇修”是當時中國朝野對蒙古和蘇聯的通稱和蔑稱。由於六十年代中蘇關係破裂，中國視兩個以前的盟邦為寇仇，雙方在邊界地區陳兵百萬，準備隨時爆發武裝衝突。

次，第二次總算通過了。總理說檢查寫得不錯，很深刻。

再次接見時，總理對雙方提出了四點指示。人們習慣稱呼的“四方會談”，實際四方所持的觀點只有兩種：以高錦明爲首的內蒙黨委領導人基本同情我們，內蒙軍區的幹部同情無產者、紅衛軍。周總理的四點指示是：1，不能做對立宣傳和攻擊；2，要避免接觸性的、對立性的遊行示威和當面呼口號；3，不能武鬥，不能打砸搶和任意關押；4，任何人不得擴大事態。

周總理講完後，讓我們各自回去落實。由於呼三司的處境困難，回內蒙很不安全，總理特意在會上交待：“我們考慮還是派高樹華回去親自落實。”他提醒內蒙軍區：“你們注意，不能對他進行綁架、圍攻，他可是我的客人啊！”

正因為有了這句話，我才有了安全保證。爲了落實總理的四點指示，我返回內蒙前，開過幾次會，我特意向高錦明等內蒙黨委代表請教，他們提供了很好的意見，並囑咐我回去一定要找到權星垣，他可能就在師院住著。讓我給權帶去口信，問候他辛苦了，一定要堅持住。

在京的造反派朋友把我送到火車上。那天，我是戴著袖章上車的，因爲我是總理的客人，我不怕他們把我抓走。當夜，列車員沒有注意到我戴著什麼袖章。第二天早晨，列車員發現一個戴呼三司袖章的人，大爲驚訝。當時在內蒙，凡是呼三司觀點的人不能公開暴露，更沒有人敢公開戴呼三司袖章，否則會被人抓起來，輕者圍攻，重者遭打，甚至被捕。開往內蒙的火車基本由無產者、紅衛軍觀點的人控制，另有幾個軍人管理列車治安。

我剛起床，列車長帶著兩個戰士來到我的鋪位。車長態度還比較和藹，戰士很凶，問我是幹什麼的，我的態度也很強硬：“你管我是幹什麼的？”“你戴著什麼袖章？”我告訴他：“呼三司袖章。”“你知道不知道，呼三司是反革命組織。”我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呼三司是革命組織，是毛主席支持的組織。”車長和兩個戰士查問旅客，已引人注目。

我的高聲回答，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保守派觀點的人立即要求把我關起來，當然還有好多人投來同情、敬佩的目光。列車長笑嘻嘻地說：“那好吧，我請你上餐車去。”我開玩笑地說：“請我吃早飯嗎？十分感謝。”他說：

“吃早餐可以，那兒有人等著你，你去那兒看看。”我說：“那怕什麼，我哪兒都敢去。”我被列車長和兩個戰士推搡著進了餐車。餐車裏坐了多半車廂人，加上跟在我後面的人，把整個餐車都擠滿了。

車長開始像審問犯人一樣問我：“你說說，你是幹什麼的，到什麼地方去，你的身份？”我告訴他：“我是高樹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師院東縱和呼三司的負責人高樹華。我是作為周總理的客人到北京參加中央首長接見的。今天，周總理又把我派回來落實總理的四點指示。”於是，我把周總理的指示和中央首長接見的情況，詳詳細細地向他們作了介紹。我說：“這是真正的中央精神，我不欺騙群眾，各位有什麼問題，我願回答。”

原本要在列車上開的批鬥會，經我一番宣傳，變成了問答會。有人問：“你們呼三司到底是幹什麼的？”於是，我把東縱、呼三司起家的情況向他們做了說明。他們繼續問：“呼三司內部是牛鬼蛇神嗎？”我現身說法，道明自己的出身，共產黨員，做什麼工作。“像我這樣的人在呼三司到處都是，你說這樣的人是牛鬼蛇神嗎？”“聽說你們呼三司殺人放火，打砸搶抄抓。”我說：“我們打誰了？抓誰了？你看，到底誰在抓人？誰在打人？文化大革命本來是群眾受教育，是大民主的運動。有什麼意見，要講道理，不能訴諸武力。我們現在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

很快，問答會變成思考會。有些人低下了頭，有些人輕輕念叨：“這和我們頭兒說的不一樣，人家說的有道理啊。”這時，我注意到一個工人模樣的人總站在我身後，火車到達呼和浩特時，他還站在我身後，直到送我下車。他說他也是造反派，“怕你吃虧，我是集寧車輛段的，我姓陳。”我很感謝這位姓陳的師傅，他無私地保護著我。遺憾的是，我們只見過這一面。

二，獨特的歡迎儀式

呼三司和東縱的造反派，以一種特殊的形式歡迎我。沒有廣播，沒有講話，幾個同學把我接出站外，東縱的紅旗亮豔豔地樹立在站前廣場。這些日子，造反派一直躲在師院東縱大院裏，很少露面。一桿造反派的大旗出現在

火車站，令人驚愕。

由 100 輛自行車組成的隊伍，在大旗的引導下接我回校。外語系的一個學生用車帶著我，邊走邊聽他述說：這 100 輛自行車都是由專門挑選的、五大三粗、身強力壯的紅衛兵騎著，前面扛大旗的是外語系英四的同學。當隊伍到達新華廣場時，呼三司也組織了 100 輛自行車，為第二梯隊，呼三司和各院校的大旗迎風飄舞。前後 200 輛自行車行進到二中附近，眼前出現了第三梯隊的 100 輛自行車，是市內各造反派組織的人馬。連同一路加入到我們行列中的熱心人，當我們回到師範學院時，自行車隊已達 500 輛之多。我感謝東縱和其他造反派組織對我的尊重和信任，我驚歎人在特殊時期的非凡創造，我被如此精緻、如此文明的設計所感動。

為了貫徹周總理的四點指示，防止武鬥，一路上，不論有人罵什麼，我們都不予理睬。呼三司袖章上有一個黨旗，造反派常呼“青松不老，三司不倒。”對立面群眾則罵道：“鐮刀斧頭，砸爛三司狗頭²”。我們的車隊在各種人聲中，風馳電掣般回到師範學院。

當天晚上，在師院圖書館二樓的大會議室，召開了呼市和內蒙造反派領導人會議，我詳細傳達了中央首長的講話，特別傳達了總理的四點指示，要求每個部門、每個戰鬥隊、每個隊員要不折不扣地執行，因為這是總理和中央對我們的考驗。我說，中央接見時，總理點名讓我回來，對我說，這是對我們的考驗，是革命與不革命的考驗。過去的不說，這點非常重要。

在傳達間隙，我探望了東縱樓內的受傷人員，拜訪了留在內蒙的自治區黨委書記權星垣同志。權星垣同志從黨委的角度表示，要堅決貫徹總理的指示。

東縱勤務員報告說，來師院避難的人很多，不知道該怎麼應付。我說不管來的什麼人，都是客人。當然，吃飯要交飯錢，最起碼也要交基本的伙食費。如果有人實在困難，先登記名字，以後再補交。我向管後勤的陳文全詢

² “青松不老，三司不倒”是造反派常喊的口號。而保守派的群眾，也編寫了許多有創造性的口號，除了“鐮刀斧頭，砸爛三司狗頭”之外，還有“青松不老用火燒，三司不倒用鎬刨”；“爆炒三司，油炸東縱”等等。

問，還有多少糧食，我們還能支持多長時間。然後我特地去伙房看望大師傅。老師傅們非常仗義，他們說，爲了革命，現在什麼價錢也別講³。當時經常是晝夜有人在廚房吃飯，他們一天幾乎工作 12 個小時以上。除了做飯，形勢緊張時，要把飯菜和開水送到守樓的同志手裏。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單位、一個組織的人心這樣齊、這樣純淨。

被革命淨化了心靈的人們，沒有人要求私利。那時，師院內放著不少自行車，不用上鎖，無論誰騎後，仍放回原處。沒油的汽車和摩托車也停了不少，是各單位支持三司的司機，來師院避難開來的⁴。如今油燒完了，無以爲繼，因爲汽油都掌握在各單位的保守派手中。

三，尊神護佑我脫險

我的傳達任務完成後，準備返京。動身前，專門負責保衛的人員替我分析，返京不會順利，他們主張多派幾個人送我。我很清醒，護送的人再多，對方會更多，把大家抓起來，不如我單獨去闖。我有“周總理的客人”的身份，我相信他們不敢把我怎麼樣。就這樣，我戴著紅衛兵袖章又上路了。

那天晚上，我乘師院的一輛吉普車獨自出發。車一出門，司機就發現有人跟蹤，好像是軍車。司機沒有直接到車站，而是沿車站附近的路轉圈。繞了一圈後，又沿新華大街向北拐，到現在的立交橋處，順電廠向西，到車站附近後，順大街南行。

³ 這裡涉及兩個有趣的現象：一個是貌似共產主義的“吃飯不要錢”。這一方面歸功於經濟形勢已從大饑荒年代走向好轉，糧食定量足夠吃飽肚子；另一方面歸功於師院原本就實行的“公費吃飯制”。這期間，尚有許多師院學生外出串聯未歸，因此有餘糧可供外單位造反派吃飯。另一個現象是學校食堂的大師傅們，清一色支援造反派，使我們從來沒有斷糧之虞。這大概同工作組進駐總務處期間，對幹部和大師傅整得太凶有關。因此到批判資反路線階段，炊事員全部加入了造反派組織“東縱”。

⁴ 據模糊記憶，當時有數十輛大小汽車和上百台摩托車，胡亂停放在大操場上，許多車連鑰匙也不拔，誰有汽油誰就開。許多原本不會開車的人，就在操場上練會了開車。漢四張培仁和英三程鐵軍等人，從呼市運輸公司要到一桶汽油，輪流開摩托車去市內其他單位串聯。由於全市處於無政府狀態，也沒有交通警察，不需要什麼駕駛執照。

我從小在車站附近上學玩耍，對地形特別熟悉。我讓司機再折回新華大街東行，然後突然往北加速，在一個拐彎處，我閃出車門，躲進黑暗中。車加大油門，繼續前行。我藏在小樹林，見三輛軍用吉普，尾追我們的車而去。

隨後，我深一腳淺一腳地摸到車廂附近，正好趕上剛剛放行。當時紅衛兵坐車不買票，硬臥改成了硬座，但硬臥車最高一層有鋪位，可以躺下睡覺⁵，也非常隱蔽。我找到硬臥車廂，挑了中間位置的一個上鋪爬上去，蓋上大衣，枕著小包靜等開車。

出乎意料的是，到了開車時間列車沒動，車站上人頭攢動，估計是有人在搜查我。我注意車廂兩側，果然人來人往地一個一個查看，但他們沒注意到上面還躺著一個人。不久，我發現一個人專門搜查上鋪，當他走到我的鋪位跟前時，我一眼認出，來人恰是我的一個老鄰居，排行老三，小名虎子。他參加了保守派組織，是車輛段的幹事。當他看見我時，立即驚呆了。

我悄聲對他說：“三兒，你大概是來抓我的吧？你想想，我可是總理的客人。告訴你，我不怕被你抓走，只是希望你不要犯這種錯誤。”他似乎在考慮著什麼，站在我的鋪位前停了片刻，就往車廂另一端走去。車廂門口一個聲音問：“找到沒有？”他答：“沒有。”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又折回來對我說：“小心點，就躺在這裏別動。集寧還要搜，不過搜得沒那麼細，因為車不會停很長。你就在這兒待著，不要暴露。”

幾個月過後，我又見到了虎子，我感謝他對我的幫助。他說：“我們倆畢竟是自幼長大的兄弟，別人不瞭解你，我還不瞭解？你怎麼能是反革命呢？”其實真正讓虎子認清真相，是他姐姐的遭遇。他姐夫是軍區幹部。軍區事件後，姐夫逼著他姐姐退出了造反派組織，但姐夫仍被調離原崗位。全家為此很傷心。他說他身在保守派，心是同情造反派的，所以他幫助了我。

當和朋友談起在白色恐怖中從呼返京時，仍感到一陣陣心悸。我知道，

⁵ “紅衛兵坐車不買票”，原本屬於紅衛兵自發串聯開始時的一種造反行動，含有挑戰“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味道，後來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表態承認。於是，只要有學生證或者佩帶紅衛兵袖章，就可以合法上車，無人阻攔，上車以後也很少查票。奇怪的是，那些非紅衛兵普通乘客，照樣老老實實買票，並且排隊剪票上車。其實，他們完全可以戴個袖章，免費乘車，可是卻很少有人那麼做。這種情況若放在今天，確實難以理解，也無法想像。

自己仍是草民一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要說神奇，是當時我背後確有一位尊神在護佑。

回到北京後，我把落實周總理四點指示的情況做了詳細報告，並做出保證。事實證明，造反派確實執行了四點指示，沒有越軌。只有一件意外出自內蒙工學院。當軍區的士兵外出操練時，臨近軍區的內蒙工學院紅衛兵，在他們身後燒紙，高喊毛主席《送瘟神》的詩句“紙船明燭照天燒”。這一事件，被軍區黨委寫入報告送給中央。

總理看到這份簡報後非常生氣，做了批示，立即讓秘書打電話通知我，到中南海去接這個指示。那是一天下午，黑色伏爾加車把我拉到中南海，秘書趙剛在中南海北門（舊北京圖書館對面）接我。他說：“這是總理的指示，本來讓你來這兒接的。後來總理又來電話，讓你進去。”總理住處非常簡單，在一個大殿裏。周圍環境沒看清楚，因為我非常緊張，不知犯了多大錯誤，心中七上八下。

總理苦口婆心地對我說：“我只能跟你談三分鐘。你是懂得道理的，通過幾次交往，你懂得大局，你要做做呼三司紅衛兵的工作，不能這樣做。幹嘛搞有刺激性的活動？你自己看看軍區這個簡報，上面有我的批示，你們回去研究研究，要求把這事解決一下，我希望以後不要出現這樣的問題。”

趙剛送我出來時說總理非常忙，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我非常內疚，覺得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干擾了總理，佔用了總理的時間。回去後，我立即召開北京全體代表會議，要求每位代表當晚就給家裏打電話，要嚴格執行總理四點指示，要通報工學院的事件。我親自給工學院的負責人打電話，對方很不服氣。

我嚴厲地說：“你們要不服氣，我讓呼三司立即把你們清除出去，我有權這樣做。”我當即通知呼三司，馬上派一個小組進駐工學院，監督、檢查他們的行為。由於我們的態度強硬堅決，處理果斷，工學院接受了批評，從此再沒發生類似事件。

四，楊植霖老人的左右口袋

不久，我們搬入甘家口七機部招待所。青海省的四方代表也住在這院內。據說青海省文化大革命同樣發生了開槍事件，是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指揮開槍鎮壓革命造反派 818 紅衛兵。楊植霖是青海省黨委代表之一。

楊老是內蒙人，他的家鄉在土默特左旗保什氣村。楊於 1930 年參加共產黨，1931 年被綏遠國民黨當局逮捕，與共產黨著名領袖王若飛關押在一起。出獄後，參與了黨的晉綏抗日根據地的開闢工作，並在綏蒙政府當過職。解放後曾就任綏遠省及內蒙古的領導要職，六十年代初調到青海。

楊植林的名字，廣為當時青年所熟知，因為他在六十年代寫了一本書《王若飛在獄中》。這本書當時被視為革命傳統教材。作為團幹部，我把書中內容揉進黨課、團課，講給學生聽，因此，楊老在我心目中非常高大。高錦明、權星垣、李質、王鐸等都是楊老過去的同事，他們之間非常熟悉。在等待接見時，楊老經常去我們代表處聊天。當談到他的女兒和女婿，我倆從剛剛相識很快就到無話不談了。他女兒在內蒙古醫學院教課，呼三司觀點；女婿是內蒙輕工廳的幹部，姓汪，是造反派負責人。因為觀點相同，我和他女婿關係很好。

青海省的事件解決得非常快，中央接見了三次，認定“818”為革命群眾組織。趙永夫鎮壓革命是錯誤的，中央令其停職檢查。一天，楊老來到內蒙古幾位書記的住房，非常高興地對幾位老同志說：“接見這幾天來，我也不知道哪派對，作為領導你不能輕易表態，必須見機行事。”

李質開玩笑說：“怎麼見機行事？”楊得意地說：“我準備了兩份發言稿，一份支持‘818’，放在左兜；一份譴責‘818’，放在右兜。我看接見的差不多了，‘818’勝了，正巧總理讓我表態，我就說堅決支持‘818’。本來我和‘818’關係也不錯，這次我就成了革命領導幹部。這次算站對了，如果站錯了，要吃很多苦頭的。”他說得詼諧、有趣，大家哈哈大笑，對他的直率稱讚不已。

我和楊老熟悉後，便問他：“你不是中央文革的成員嗎？為什麼不參加中央文革的會議呢？”他吐了一口唾沫：“那可能只是開玩笑。是，報上公

佈的中央文革成員名單中有我的名字，但我一次會議都沒參加過，人家也沒通知我。純粹是玩笑，湊熱鬧！”我對上層的政治脈絡不清楚，現在感到楊老的話是很真實的。

文革後楊老仍然擔任青海省要職，對內蒙懷有很深厚的感情。楊老晚年愛寫詩，他在內蒙有幾個詩友是我的朋友，其中著名詩人張之濤是我同學，他和楊老之間的來往比較多。張之濤對我說，楊老 1992 年去世前，唯一的願望是讓內蒙撥幾萬元錢出版他的詩作。楊老的夫人曾到內蒙找過當時的自治區主席布赫（烏蘭夫的儿子），布赫答應籌劃籌劃。

按理說，楊植霖既是革命前輩，烏蘭夫的老戰友和多年同事，又是中國文壇宿老，其六十年代有關王若飛的作品無人不曉⁶，出版楊老詩作，況所費不多。本屬小事一樁，於公而言，對於革命傳統教育，保護內蒙歷史文化遺產，甚至開發紅色旅遊資源等等，都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結果布赫答應歸答應，始終未見行動。其中原因，難以瞭解，所以，楊老的詩至今未能出版。

爲此，我深深爲他老人家感到遺憾，但願楊老安息。

⁶ 此處指楊植霖所著的《王若飛在獄中》，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 年。另外，還有《青山兒女》（上）（1982 年，甘肅人民出版社）等著作，在老一輩領導幹部中，楊植霖老人屬於文采出眾者。

第二十五章

中共中央處理內蒙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第二次接見時，中央批准我方增加代表名額。爲了全面反映內蒙文革情況，增加的人員有農民代表周文孝，呼市郊區查漢板公社（現改爲鄉）人；工人代表楊萬祥，呼市糖廠工人，屬工人公社；華建井岡山霍道餘。霍道餘曾帶領華建井岡山參加報社奪權，被打傷，是帶傷進京。還有那順巴雅爾，內蒙文委教育廳幹部；邵仲康，內蒙軍區政治部幹部。

四月初，我方代表又陸續增多，有近 60 人。其中一些人比較有名氣：如河西公司 818 負責人王志有、內蒙林學院紅旗負責人陳曉林、農牧學院井岡山學生石磊、呼市機床廠工人劉樹立、火車司機劉立堂（屬火車頭組織）等。

一，葉群斥罵“子孫輩”

1967 年 3 月 18 日，是黨中央處理內蒙文化大革命問題最關鍵的一次接見。郝廣德剛從內蒙返回，他目睹了內蒙軍區個別人，組織不明真相的群眾，圍攻師院大院、東縱大樓，製造緊張局勢的實況。他聽到的多爲斷水、斷電、抓人、關人，一片白色恐怖的消息。儘管軍區首長否認是他們在背後指使，但郝出示的照片中有內蒙軍區的軍官，乘坐架著機槍的摩托車，在指揮士兵圍攻的鏡頭。照片是實證，軍區一方很被動。

郝廣德匯報完後，一位內蒙軍區幹部家屬，控訴內蒙軍區在部隊家屬內，搞政治觀點清理的情況。她說，她是小學教師，參加了革命造反組織，支援呼三司觀點。爲此，由軍區直接出面，組織家屬批判她和另外一些支持呼三司觀點的家屬。她和丈夫同時被關押，孩子沒人管。談到最痛處，她痛哭流涕。這時，葉群下來安慰她：“你不要哭，慢慢說，中央會給你做主的。”

農民周文孝匯報了呼市郊區農村文革情況。他講道，凡是呼三司觀點的

人不僅被關押，還不讓出門。有的軍代表，把全村幹部、群眾集合在一起，地上畫一個圈，令呼三司觀點的站在圈內，不准出圈一步，誰出圈一步就痛打誰。也不允許家屬探望，不允許送食物，不允許大小便。有的女同志實在熬不住，又不願出醜，當場昏倒在地上，軍隊代表見此，仍是不允許上廁所。內蒙冬天很冷，這種刑法是極不人道的。

聽到這兒，康生火了，說中國古代有種刑法叫“畫地爲牢”，這種刑法很多年沒見了，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內蒙軍區的領導人把它搬出來對待農民群眾。我們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天下？爲什麼把封建帝王那套搬出來？他說得很氣憤，周總理也很氣憤。

關鋒質問內蒙軍區代表，究竟是中央聽內蒙軍區的，還是內蒙軍區聽中央的，這是個大是大非問題。王力也講了話。最後葉群發言：“內蒙軍區走得很遠了，前幾次會議的情況，我已向林副主席匯報了，林副主席很生氣。我可以告訴你們，你們不是一般的無組織、無紀律的問題，而是無視中央，想搞獨立王國的嚴重軍閥作風。你們已走到叛黨叛軍的邊緣。”我在現場觀察，幾位軍區老將並不把陳伯達、關鋒、王力、戚本禹幾個文人看在眼裏，但對葉群的發言卻很重視。葉群發言後，他們軟了。

我報告說，七機部在內蒙有個河西公司，河西公司造反派組織 818 的負責人叫王志有。軍隊進入河西公司後，王志有和所有的負責人被關進辦公大樓，對他們進行長時間捆綁、毒打。我請求總理把他們放出來。聽完後，總理讓軍區放人。四月份中央接見時，王志有終於來到北京向總理親口報告了自己被關押的情況。軍區內被關押的人也很多，比較突出的是軍區文工團文藝戰士王建平。她不僅被鬥，還遭到人身侮辱，精神有些失常。這次接見她也參加了。她哭訴自己的遭遇：她僅是在一般性討論時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爲不要輕易否定呼三司。就因這些言論，軍區沒有放過她。聽到這兒，王力氣憤地說：“你們內蒙軍區這些人是不是共產黨員，你們比軍閥還糟糕，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你們走得太遠了。”

這次接見中，紅衛軍、無產者也扔出了重磅“炸彈”，說呼三司保護牛鬼蛇神。他們報告，在內蒙到北京的公路上，截獲了幾輛小轎車，是呼三司把

被打倒的烏蘭夫黑幫分子送往北京。其中有奎壁、吉雅泰、潮洛蒙等幾十個人。總理問我們，對他們講的怎麼看。我代表造反派組織回答，對這些情況，我們不知道，故他們反映的情況和我們無關。康生同志問：“你們有證據沒有，這些黑幫到北京後，授意呼三司代表和指揮呼三司代表的行動。”對方拿不出證據。

3月18日這次會議決定，中央軍委派出副總參謀長李天佑上將，組成以李天佑為團長，內蒙軍區副政委吳濤為副團長的中央調查組再到內蒙，解決問題。李天佑到內蒙後，首先找內蒙軍區調查，讓他們立即解除對師院大院的包圍，撤回散佈於街上的武裝遊行，停止呼市地區、全區各盟市的白色恐怖，釋放全部被關押的人。

3月20日，師院東縱召開大會，熱烈歡迎被無理扣押的領導幹部權星垣、康修民、雷代夫，歡迎被內蒙軍區釋放的同志。李天佑在新城賓館召開各派代表大會，造反派代表匯報了被關押、被揪打的情況。李天佑帶著調查結果回到北京，奠定了4月13日中共中央處理內蒙問題決定的基礎。

二，“紅八條”下達，海運倉接王鐸

1967年4月6日、4月8日、4月13日，周總理為首的中央首長又連續三次接見內蒙四方代表。會上，中央核對各項事實。鑒於內蒙軍區部隊在呼鐵局管段的錯誤做法不利於鐵路暢通，影響生產和戰備，4月13日，周總理下令由北京軍區直接派部隊軍管呼鐵局全程路段，下令呼鐵局公安處釋放非法逮捕的幾十個人。

4月1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周總理向內蒙四方代表宣讀了經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又稱4.13決定，造反派親切地稱之為“紅八條”（決定共有八項條款）¹。“紅八條”的主要內容，包括肯定了呼三司等群眾組織是革命的，指出內蒙軍區個別領導人犯了方向路線錯

¹ “中央八條”的全文，收集於1967年9月由內蒙造反派群眾組織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選編》（內部文件）（二）（1967年3月—1967年9月）。

誤，決定王逸倫隔離反省，王鐸停職檢查，交給群眾鬥爭批判，等等。

陳伯達、康生、蕭華講了話。蕭華警告內蒙軍區個別領導人，要認清自己的錯誤，“不能把中央對你們個人的寬容和給予的改正錯誤機會視為軟弱。”康生講話談到王逸倫，說此人歷史不清，文化大革命中表現惡劣，中央決定對他隔離審查。

中央的決定，再次解放了內蒙古廣大革命群眾，受到各族民眾的熱烈歡迎。

這時，我的壓力也減輕了許多。趁在京的空餘，我再次去清華、北大會見蒯大富和聶元梓。談話間，我發現他們對內蒙的事情很瞭解，尤其是蒯大富，我倆接觸的次數較多，交談起來更能直言不諱。他向我透露了發生在懷仁堂幾位老師頂撞周總理的事件。雖然寥寥數語，已讓我如五雷轟頂，震驚異常。他還告訴我，內蒙軍區發生的槍擊事件有老師在後面撐腰，否則軍區態度不會那樣強硬。後來，在黨的“九大”期間，我從大會簡報上，證實了蒯的小道消息。內蒙軍區在支左問題上的所作所為，有兩位老師的簽字。

聶元梓告誡我，今後還是要小心，事情還沒完，不定還會出什麼事，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暗暗佩服聶元梓的遠見卓識，她說得對，紅八條解救了內蒙的造反派，承認呼三司是革命的，但懷仁堂事件的陰影在我心中揮之不去，結果會怎樣，仍是個未知數。事情確實沒有完，原自治區黨委書記王鐸的兩難處境，是政治變數的真實寫照。

初來北京，王鐸與我們一起住在建工部招待所。不久王鐸悄悄離開了，原因在王鐸的夫人周吉。周吉文革前擔任內蒙人事局局長，她是典型的保守派觀點。她多次勸說王鐸站在無產者一邊，王搖擺不定。高錦明對王鐸的動搖性有過判斷，主張拉拉王書記。我與王鐸談過兩、三次，王鐸對運動初期把我打成反革命很內疚，說他有責任，希望我諒解。我說：“運動初期主要問題不在你們身上，主要是工作組。我一點也不怪你，紅衛兵也未必會對你怎麼樣，而是要看發展，現在更重要。”我希望他不要動搖，希望他和我們站在一起。當時王鐸很愉快。

有時我們也幫助他，比如洗澡的時候，總是我們過去攙扶他。沒想到，

他還是動搖了，走時只留下一張字條：“我去海運倉²住了，對不起！”

八條下達後第二天，我從內蒙黨委得知，內蒙軍區的頭頭已離開海運倉，臨走時燒掉大批文件，並把王鐸獨自留在那裏。我和楊萬祥等人，找了一輛吉普車去了海運倉，進了內蒙軍區代表住的幾個房間。果然滿地是紙屑和紙灰，有些人好奇地翻看紙灰，我去尋找王鐸。

王鐸孤零零地坐在一間房的板凳上，臉色灰暗，眼光淒然。他看到我沒說話，我說：“王書記，怎麼樣，你是跟我們走呢，還是待在這裏？”他答應跟我們一塊走，我讓他把東西收拾好，攙扶他上了吉普車，回到代表駐地——西苑旅社。

造反派一看王鐸到了，都很氣憤，一定讓他在外面亮相，對此我無法阻攔。我把王鐸帶到一棵樹下，站在那裏，讓群眾有什麼意見，和他當面說，但不准侮辱人格，不准謾罵和諷刺，更不准武鬥。我安排兩個人守衛著他。一個多小時的對話結束，我讓人給他搬個凳子坐在大樹下。

就王鐸的安置問題，內蒙黨委的人和參加談判的代表，一致同意我提出的意見，儘快把他送回內蒙，在這裏是不妥當的。

三，反八條鬧劇系列展

內蒙軍區領導人中，軍區黨委副書記、副司令員蕭應棠將軍，以軍人服從命令爲天職，回到內蒙立即按中央指示整頓軍區內部。4月16日，蕭應棠在師院東縱組織的慶祝中央決定大會上發言，表示堅決支持中央決定，支持

² 海運倉是解放軍總參謀部招待所的地址，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內蒙四方談判期間，支持保守派的幾位內蒙軍區領導人曾住在那裏。王鐸改換住處，顯示他的政治立場，明確改變為支持保守派，及其背後的軍方實力派。

我們目前尚無法知道，是王鐸偶然押錯了寶，還是他確實從內心裏反感毛的文革。換句話說，如果他明知毛林支持呼三司造反派，但仍然要反其道而行之，那就說明，他確有可能，是把賭注押在了反對毛林文革派的劉鄧勢力和軍方老帥身上。從毛澤東身後的歷史發展軌跡來看，王鐸的寶沒有押錯。如果捨棄是非與道德原則不談，只談對歷史變局的預測能力，王鐸畢竟老謀深算、技高一籌，比起我們這些緊跟毛林又遭拋棄的造反派們，他的歷史眼光或許更具前瞻性。

呼三司，承認自己有錯誤。當場，東縱紅衛兵把袖章戴在他胳膊上，表示對他的諒解。由於他和新到內蒙工作的滕海清將軍是老戰友，他對滕的工作很支持。蕭還配合吳濤政委，在內蒙軍區幹部中進行教育工作，使司、政、後機關漸漸恢復正常。

劉昌、張德貴則對八條持消極態度，對抗情緒最大的是黃厚和王良太。黃厚拍著胸脯說：“內蒙五個第一也罷，十個第一也罷，說我是無產者後台老闆也罷，讓他們去說吧。”他表示，還要“上大青山打遊擊”。王良太暗中支持受蒙蔽的部分群眾、戰士，大鬧內蒙、大鬧北京，直至在人民大會堂大打出手。

紅衛軍、工農兵、無產者的代表，對中央的決定也不服氣，他們認為是呼三司能說會道欺騙了中央，是中央聽了呼三司的一面之詞。一時間，紅衛軍、工農兵、無產者上訪的人逐漸增多。曾參加過中央接見的無產者代表杜凡，跟我關係很熟，多少年後他回憶說：“內蒙軍區那些將軍驕傲蠻橫，還十分愚蠢。他們拍著胸脯對我們說，你們什麼也別管，我們會把問題解決的。我們相信槍桿子是最好用的，全把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既沒組織群眾，也沒準備多少材料。中央接見時，就是去聽聽，去看看。沒想到，你們組織得那麼好，來的人和反映的情況那麼豐富，終於把上帝感動了，使天平傾向於你們那方面。”

我說：“不是天平傾向哪一方面，事實就是事實。如果哪個國家的軍隊失去準則，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把老百姓的生命視若草芥，這個國家肯定治理不好，老百姓的生活不會安定。”

4月13日後，鑒於中央要求解散跨行業組織，按單位歸口的規則，紅衛軍、無產者、工農兵改頭換面，成立了紅色工人、紅色戰士和無產者。

4月15、16日，紅色工人數萬人在呼市大街遊行，高呼“與高錦明血戰到底”，“堅決打倒呼三司”的口號，公開反對中央八條，並沿路攔截轎車，準備到中南海去鬧事。

4月17日，中央文革、全軍文革給呼市各群眾組織及駐軍下達一封公開

人在呼和浩特賓館開會，共同憶苦思甜³，發誓“與呼三司的牛鬼蛇神血戰到底”。

4月18日，無產者組織上萬名郊區農民進城，與紅色工人匯成遊行大軍，動用汽車130輛。

這天，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等和呼三司部分談判代表乘飛機回呼。我本人同機到達，參加在師院組織的全市造反派歡迎大會。

4月19日，紅色工人（原紅衛軍）組織負責人張三林，在呼和浩特橡膠廠做秘密報告，提出要最廣泛地動員群眾參加遊行示威，到北京請願，到中南海靜坐，迫使中央改變八條決定。

4月20日，蕭應棠副司令員對內蒙部隊發佈兩條命令：幹部戰士一律歸隊；不得自行外出。

4月21日、22日，紅色工人繼續在市內遊行。22日那天，內蒙軍區步兵學校造反派的宣傳車，在市內和紅色工人遊行隊伍相遇，步校的宣傳車被砸，車上的師生被打並遭綁架。

4月23日，紅色工人等出動上百輛汽車圍攻內蒙黨委，綁架了黨委紅旗總部工作人員兩名。

4月25日，呼市地區5萬餘名造反派，召開批判王鐸大會。同時被批的還有“偽革委會”擬名結合的廳局級幹部20餘人。紅色工人等百餘輛卡車在內蒙師院、農牧學院牆外遊行謾罵，抓走79名學生，毒打後放回。

4月27日，紅色工人萬餘人包圍並非法佔據內蒙工會大樓，開始構築據點。前去與之辯論的造反派被打傷百餘人。

4月28日，解放軍總政對內蒙軍區各部隊發佈了《關於堅決徹底執行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的指示》，首都各大專院校紅衛兵，配合北京衛戍區執勤部隊，找出分散在京城各處的紅色工人、紅色戰士、無產者的人，

³ 所謂“憶苦思甜”，是共產黨對老百姓政治教育的一種形式，包括報告會，吃憶苦飯，參觀村史、廠史展覽等等，其宗旨是回憶舊社會（1949年前）的苦難，述說新社會生活的甜美，以激勵人們的革命意志。但是，這種形式主義的教育活動，也常常鬧出政治笑話。例如，有些老實淳樸的農民，在講完舊社會的苦之後，難免也順便聯繫到六十年代的大饑荒，而且說“三年困難受的苦，比舊社會的苦更難忍受”，讓地方官員十分尷尬。

強制其離京。

5月6日，紅色工人等組織的呼市夜襲隊，開始在夜間進行襲擊活動。第一次行動得手，襲擊了滕海清將軍的汽車，其中兩位秘書傷勢較重，送進醫院治療。

5月7日，上萬名紅色工人、紅色戰士強佔呼和浩特新華書店大樓，呼市居民人心惶惶。當天，紅色工人圍攻內蒙黨委，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改變中央八條。同時有幾百人在呼市火車站臥軌攔車，開往北京的第90次列車，為此延誤8個小時。

5月10日，在紅色工人頭頭張三林、曹文生帶領下，數千人圍攻內蒙黨委大院。他們手持兇器，衝進辦公大樓，砸爛門窗，竊走檔案，焚燒文件，打傷工作人員100名，其中重傷20餘人。5月11日下午，在內蒙軍區副司令員劉華香指揮下，軍區派出部隊，用武力收回了內蒙黨委大院，活捉了張三林和曹文生等人。

同日，由呼市公安局軍管小組收審了非法佔據新華書店大樓、嚴重破壞設施和樓內財產的40多名保守派成員。

5月12日，中央軍委下令內蒙軍區暫停四大，轉入正面教育。之後不久，中央軍委批准調動內蒙軍區警衛營⁴，離開內蒙進行整訓。王良太卻打電話給警衛營“要堅守崗位”。

5月12日，呼和浩特糖廠井岡山造反組織工人許克燈，在呼市工會樓下，遭到樓內扔下的亂石襲擊，身受重傷，次日死亡。

5月21日，內蒙師範學院東縱紅衛兵，外語系俄語四年級學生歐陽儒忱，在工會大樓外對圍觀群眾講解中央八條決定時，幾名紅色工人成員衝到樓外，強力劫持歐陽到工會樓內，將他毒打數日，斷水斷食，逼迫他承認呼三司是反革命。歐陽斷然拒絕，致死不屈。

四，哄鬧大會堂，毆打兩將軍

⁴ 該部是當時內蒙軍區各部隊中，曾經堅決支持保守派的主要力量之一。

進入 1967 年 5 月份，反對八條的鬧劇持續上演。5 月 6 日，中央軍委決定在北京召開內蒙軍區幹部會議，通過思想工作教育一批幹部。王良太借機對違反紀律到北京上訪的幹部、戰士給予鼓勵，支持他們在北京開會時鬧事。他說：“要給中央施加壓力，如果吳濤也參加，就把他攆出會場。”

5 月 16 日，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內蒙軍區幹部、戰士和來京上訪人員，其中有一部分人無理取鬧，不聽周總理講話，並高呼打倒中央的口號。

5 月 19 日，周總理和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接見在京的部分內蒙軍區幹部戰士，教育他們認清真理，按中央八條辦事。

5 月 25 日，總政治部在政協禮堂舉行歡送內蒙軍區赴京人員回呼大會。在王良太策劃下，少數幹部戰士在會場上拍桌子、跺腳、搶奪擴音器，衝上主席台，毒打在主席台就座的吳濤將軍，毆打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陸楊將軍，並宣讀事先準備好的反對中央的五條要求。當晚王良太回到住處，邊喝茅台酒，邊喊：“好，好！”

5 月 26 日，中央終於對內蒙軍區個別人採取了斷然措施。中央軍委決定對黃厚、王良太隔離反省，劉昌、張德貴停職檢查。從此，軍人上街鬧事、毆打將軍等罕見行為結束了。內蒙地區反八條的活動也隨之得以平息。

進入六月，內蒙古地區一片蔥綠，是花香鳥語的季節。從 4 月 13 日中央八條下達，內蒙造反派當時最醒目的口號是“打倒地下黑司令部，揪出黑司令官”。被定為黃、王、劉、張反黨集團的四個人在內蒙軍區被批鬥時，他們所交待的問題遠比外界知道的還可怕，諸如準備上山打遊擊，武裝對抗中央等。多虧黨中央英明，多虧廣大幹部、戰士有良知，最終也沒有幾個人跟著他們走絕路。

內蒙師院抗大兵團比較識時務，在校內貼出大字報宣佈解散，東縱紅衛兵大為歡迎，稱為“革命不分先後，造反不分早晚。”“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除個別人外，原抗大成員均表態，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在毛主席身後的鄧小平年代，對於內蒙軍區個別領導人掀起的這場鬧

劇，作為內蒙“三大冤案”之一宣佈平反。已被判處徒刑的殺人犯柳青，從監獄中被迎接出來，恢復黨籍、軍籍和原職，送到河北軍人高級幹部休養所頤養天年。

那些受到傷害的成千上萬的百姓，那些死去的紅衛兵，尤其是讓我無法忘記的學生韓桐、歐陽儒忱，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們？

哪裏有公道，哪裏有正義！

第二十六章

籌備內蒙古革命委員會

八條下達後，按中央部署，開始籌備成立革委會¹的工作。中央先讓我們去天津學習經驗。學習團由權星垣領隊，團員有李樹德、康修民、我、邵仲康、霍道餘。我們一行，在天津受到革委會主任解學恭的接待。烏蘭夫停職後，中央原意由解接任內蒙黨委第一書記，因他對內蒙的情況比較瞭解，但他始終沒到任。

一，清理廢墟

我們下榻原河北大廈，與解學恭一起同我們談經驗的還有胡昭衡的夫人。胡昭衡曾任內蒙黨委書記，文革前被調到天津，擔任一段天津市長，後任國家藥品管理局局長。在津期間，我去過天津大學。天大的紅衛兵懶懶散散，毫無生氣，看不出文革的情況，只知道這裏正打派仗，一派支持李雪峰，一派打倒李雪峰。

回內蒙前，初步擬定了內蒙革委會籌備小組的名單。幾位老同志曾找我談話，讓我提提對下一步的看法。我講了四點意見：

第一，我們的策略是不接受對立派的挑釁。紅衛兵不准上街，呼三司要

¹ 文革中第一個成立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的地方是上海。對於這個所謂“新生權力機構”的名稱叫什麼，曾經有過一番爭議。據說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幫，主張叫“上海人民公社”或者“上海公社”，目的在於模仿“巴黎公社”，以區別文革前的舊市委和舊政府。後將方案報給毛澤東本人，毛批示道：“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載《紅旗》雜誌1967年第5期）。於是，繼上海之後，其他各省市自治區也紛紛奪權，建立起“老中青三結合”，黨、政、軍、工、農、學“合而為一”的革委會。省市之下的地、市、縣、直到人民公社（相當於如今的鄉鎮），也都相繼建立起同樣名稱的政權機構，一直沿用到文革之後。

維護大局。第二，要整頓師院，首先從造反派內部開始整頓。第三，要儘快把各地駐內蒙聯絡站撤走。他們都問爲什麼，我說根據天津經驗，這些紅衛兵熱情高，但對各單位瞭解不深，常常各支持一派，引起當地混亂。當然策略要慎重，讓客人高高興興走。第四，召開造反派政治工作會議，加強紀律性。

對上面諸條意見，幾位老同志都非常讚賞。

1967年4月18日，我回到師院。東縱幾名勤務員，在宿舍樓挨房間對外單位的同志一個個訊問，把需要繼續留在師院的登記在冊，經批准發放通行證。本單位已恢復正常的，就勸說他們返回。這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卻引來不少非議。有人認爲，造反派勝利了，師院東縱卻翻臉不認人，要趕走老朋友。

師院牆外，每天有對立面的汽車遊行，用大喇叭不停地謾罵。我們的策略是以靜制動，廣播站唯讀毛主席語錄，院內人員禁止出院。對方看無人理睬，轉幾圈，罵一頓，就無趣地開走了。

最後一次衝突發生在深夜。對方出動幾十輛車圍攻師院，學生們忍無可忍，衝出去和他們辯論，有人乾脆把他們的氣門芯拔了，讓圍攻的汽車動不了，車胎修到天亮。第二天早晨，師院一位老師在現場拾到一把手槍，我轉交給滕辦（滕海清在新城賓館的辦公室），滕辦人員判斷，軍區的幹部到過現場。

各項事務中最棘手的，是歡送各地造反派駐內蒙聯絡站的人員。這些人曾在最艱苦的歲月裏和我們同甘共苦，給予我們很大支持。我通過個人關係，首先說服了清華、北大和首都三司。我和他們探討說：“你們畢竟對內蒙各單位不瞭解。如果你們支持一方，其他聯絡站支持另一方，就只好辦了。”上海二醫大²的朋友們，在二月逆流中每人幾乎都被打、被關過，所以他們不理解，是最晚一批離開呼和浩特的。

造反派政治工作會議，在5月底如期召開。很多組織的負責人，對此大

² 全稱是“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隸屬於解放軍總後勤部，其學員均為現役軍人。

爲不解，把政工會稱作“烏會”³。會議上的牢騷很多，什麼“現在根本輪不到整自己”，“應該出口氣，整整對方”。滕海清、吳濤抓軍隊，忙得焦頭爛額；內蒙黨委的領導們，抓各地黨政工作，無暇顧及這種會議，所以會議的效果並不顯著。

二，可愛的騎五師官兵

五月初的一天，滕海清司令員告訴我，集寧地區駐紮著一個騎兵五師，如果部隊出現騷動，對整個局勢不利。我明白，集寧處於反修最前線，是戰略要地。司令員說，該師師長和參謀長來了，他們說很難做部下的工作，請求派一個瞭解文革的人去講一講。滕辦的人問我：“去是有風險的，你敢不敢去？”我說：“爲啥不敢去？我隨時待命。”

第二天，我帶著兩位紅衛兵，簡單準備一下就出發了。按照師部安排，我先給團以上幹部講。這些幹部很不客氣，提了很多問題。我預先有準備，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幾次交談後，態度趨於平和。接著給排以上幹部和戰士講。那一天，我正給戰士講課，從大門外突然衝進一輛汽車，車上是烏盟軍分區警衛連的戰士。他們在院裏大吵大鬧，說我做反動宣傳，要把我揪出去，我被迫停止宣講。參謀長虎日樂巴根上台，命令警衛排戰士出列，把軍分區的人一個個扔回車上，逼他們離開會場。半路殺出程咬金，教育了在場戰士。戰士們說：“人家是來講理的，你們還不讓聽，你們本來就沒道理。”經過宣傳，騎五師的情緒穩定下來。

意想不到的效果增強了滕辦的信心，他們便派我繼續講下去。這一做法啓發了造反派師生，他們分成多個宣傳小組，到巴盟、伊盟甚至更遠的赤峰、通遼和海拉爾地區，宣傳文化大革命，宣講八條，對穩定內蒙局勢起了一定作用。

四月底五月初，內蒙頻頻發生武鬥和傷亡現象，社會秩序極度混亂。據

³ “烏”字，等同或者接近於罵人的“屌”字，在章回小說《水滸傳》中，黑旋風李逵，是最愛罵這個字的人物之一。

此，中央發佈整頓內蒙軍區的命令，派北京軍區 69 軍 28 師進駐內蒙。手拿新式武器，戴著臂章的 28 師戰士沿街巡邏，待人和氣，有事先立正敬禮，呼市地區變得秩序井然了。

三，拒絕批判李立三

隨著八條下達，呼三司身價陡然上升，幾乎每天都有外地人來找總部。一天，華北局局機關東方紅造反派負責人元一民（化名）找我。他是包頭人，對內蒙很關心，北京四方談判期間，我們凡有事打電話去，一般都能得到他的幫助。因此，他來師院後，我熱情接待，用自己的飯票在教工食堂打飯，和他邊吃邊談。

他讓我們看在他面子上，參加一個“揪鬥李立三叛徒集團”的大型組織。我說：“李立三不就是有歷史問題嗎？”他說：“不對，我們發現他有現行活動，懷疑他是隱藏最深的蘇修間諜。”

我和總部商量後，拒絕他說：“我們的事情太多，不可能派人參加，能否讓我們緩一緩？”元大發脾氣：“你們勝利後，忘恩負義。”儘管我們再三解釋，他還是悻悻地去了包頭。

沒想到，元幾天後又從包頭返回，神色慌張，請求我們允許他在師院住幾天。我安排他住下，並派專人陪他。不久得知，李立三被那個大型組織揪走後死了，中央要追查責任。我找到元一民，問他怎麼辦。他以爲我會送他去公安局，我對他說：“你千萬別誤解，你究竟做了什麼，我不想知道。你只要在我們這裏呆一天，就是我們的客人。我們不會攆你，更不允許抓你。”元是聰明人，幾天後想通了，早晚要面對現實，躲也躲不過，決定回京。我和幾位朋友爲他辦了歡送會，把他送到火車上。

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漢事件⁴發生，周恩來親自去武漢處理。不久武漢又吹來“打倒陳再道”和“揪軍內一小撮”之風。林學院、工學院紅衛兵聞

⁴ 即武漢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在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下，扣押並毆打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事件。其鬥爭矛頭，明顯指向毛澤東和江青等文革左派。

風而動，要揪內蒙軍區副司令員蕭應棠。那時，蕭正協助滕海清主持內蒙軍區的工作。

紅軍長征時，蕭應棠是團長，給紅軍徵集物資，打先鋒，是一員戰將，令我佩服。他讓我有什麼事，打電話找他。我只是偶爾想要套軍衣穿⁵，蕭總能滿足我。林學院的人和我串聯，拿出材料給我看，說蕭應該打倒。我看到沒有新問題，便說：“二月逆流的事蕭應棠檢查過，中央也知道，不能老揪著不放。”

不久，中央決定，“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毛領袖點了王力、關鋒、戚本禹⁶的名字，三人即刻從中央文革的領袖淪為階下囚。幸虧內蒙沒掀起大風浪，林學院、工學院只是開著車在街上喊了幾聲口號。聽說“揪軍內一小撮”錯了，他們又沉不住氣，問我怎麼辦，我說你們也沒幹什麼，不必心虛。

七月底八月初，北京傳來中南海批鬥劉少奇的小道消息。很多紅衛兵跑回來，要求總部帶隊去中南海。我主張動腦筋想想：中南海住著劉少奇，還住著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首長。揪鬥劉少奇，很可能被誤認為衝擊中南海，怎麼說得清？為此，十幾個人在師院給我刷大字報，“高樹華已成為新任務的絆腳石”。我說：“這樣吧，誰願意去，可以先去看看。”幾個紅衛兵去了北京，過幾天又灰溜溜地回來了。多年後，專案組審查時，堅持“東縱有人去就等於你去了”的荒唐推理，幾乎置我於死地。

回首往事，當時的許多突兀事件猶如過眼雲煙，我僅憑著個人理智和無私心境去應對世態炎涼。八十年代初，清查辦把我第一張大字報之後的每件事，都翻出來查個徹底。雖然上述幾例都在其中，但卻無人提及。

⁵ 文革期間，曾經在青年人中流行穿軍裝熱潮。原因可能有多種，一是上行下效，既然毛、周、江青等人都穿軍裝，那肯定說明穿軍裝代表革命；二是“全國學解放軍”的口號效應；三是追求時髦的心理因素。對於這個有趣的“軍裝熱”現象，迄今沒人做過研究。

⁶ 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員文革派幹將的突然倒臺，是文革中期的重要事件。1967年武漢7.20事件後，王、關起草的“揪軍內一小撮”文章（原擬在《人民日報》刊登），被毛領袖定為大毒草。不久，他們又策劃一系列涉外衝突事件，故而被分別隔離審查，從此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銷聲匿跡。

四，受到中央領導的讚揚

五月中旬，中央來電報，要接見 15 名造反派頭頭。中央點名要見的除了我，還有王志有、郝廣德、霍道餘、劉立堂、陳曉林、石磊、賈國泰、周文孝、李楓等。我們到了北京，住在崇文門一座灰色的舊建築內，對外稱解放飯店，實際是北京軍區招待所。飯店大門緊閉，院內有崗哨。

我們等了大約一星期，這是我文革以來最清閒的日子。我約了清華、北大等院校的造反派朋友聊天，討論各地文革情況，還拜訪了原駐呼聯絡站的紅衛兵。空閒時，我還光顧北大附近一個舊書店。一天，我在書店發現了黑格爾的《美學》，還找到了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在等待接見的幾天中，眾人難得清閒，逛頤和園，逛北海，我獨自坐在院內一棵大樹下讀黑格爾和康德。有人發現我埋頭讀書，十分奇怪，拿起書翻了翻，連說看不懂。王志有、霍道餘戲稱我為“教授”，“教授”名號由此傳開。

五月下旬，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等中央領導接見我們。康生、周總理提了一個問題：“你們知道不知道大學解放軍究竟應該學什麼？”在場的人一下子被問住了，叫了兩位均回答不出來。總理說：“問問高樹華，看看知道不知道。”我有每天讀報的習慣，如實回答了。康老高興地說：“你怎麼知道的，背得這樣熟？”我說：“昨天剛看過報，記得清楚。”在場的中央首長都笑了，總理說：“你真是個老實人，很實在。”

總理又問我：“聽說你們把各地聯絡站的人都請走了，怎麼回事，這裏有反映。”我坦率地說：“這是我的主意。由於內蒙本身很亂，各單位有不同情況，政治問題夾雜民族關係和歷史舊帳。尤其八條下達後，派鬥尤為激烈，如留下聯絡站，可能河南的支一派，北京的又支另一派，會引起混亂，影響八條的落實。”

總理說：“你這招挺高明，是很有道理的。”其他首長也認為我們的做法是一條好經驗，鼓勵大家不要驕傲自滿。總理說：“看來內蒙這些苗子很好，就是嫩了點。”突然總理又問：“好像有人去你們那兒串聯揪鬥李立三，你們接待過沒有？”我趕忙回答：“這件事其他人不清楚，是我接待的，我

們拒絕參加。”

聽說在揪去批鬥的路上，李立三心臟病發作死亡。這事驚動了毛主席，毛和周很生氣。我慶幸沒參與這件事。總理聽我解釋後點點頭：“沒參加就好，這種事要謹慎。”

八條下達後，保守派中的極少數人購買武器，準備長期據守工會大樓，反對中央決定。爲此，滕海清和吳濤下令用軍事手段，把工會大樓攻下，把盤踞在大樓內的少數人押到師院，逮捕了打死歐陽儒忱的兇手。5月31日，我回到內蒙時，工會大樓已被收復，保守組織紅衛軍、無產者都已瓦解。

五，東縱內部的嫌隙

內蒙地區的明爭暫時謝幕，但師範學院的暗鬥又粉墨登場。

東縱內部的嫌隙，早已在成立初期，就因我是什麼人以及總部的分歧而埋下伏筆。八條下達後，首先一個敏感問題是，如何對待站錯隊的師生。不外乎兩種態度：和平懇談還是以牙還牙。

師院文革中，有一部分師生緊跟工作組，批鬥造反派同學，有一定民憤。八條下達後，有些被整過的師生要求批鬥他們，把他們定爲壞頭頭，加以審判。師院外語系是造反派最集中的系。可抗大兵團的中堅也多出自外語系。1967年6月，我回到外語系與其中五、六位交談，記得有英三王玉敏、李秀，俄四王清良、王舉高，俄三劉文俊等。儘管我態度真誠，他們只是沉默，後來罵我是黑幫分子。

21年後的1988年，我在包頭任課期間，包頭的學生去看我，包括以上幾位。此時，同學之間已無嫌隙，好像我們之間什麼也沒發生過。是時光泯滅了這一切，還是我們的心胸坦蕩，怎麼解釋都不爲怪，畢竟大家都近花甲之年了⁷。

⁷ 並非人人都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幸運。與王玉敏、李秀同屬英三的造反派成員程鐵軍，於1995年去包頭旅遊，曾經邀請同學聚餐。李秀不記前嫌，欣然赴邀。獨有王玉敏、孟殿賢等兩三人，藉故回避。不知其中原因，是文革前後的芥蒂，還是因為程已入美籍，又多

然而當時，我的主張終歸未被接受。一些受害很深的師生，把抗大的頭頭關起來武鬥，我們曾制止過，但未能全部禁絕⁸。

東縱面臨的另一問題是：誰是叛徒。在造反派壓力最大時，傳聞有人暗中與軍區聯繫準備倒戈。八條一下達，有人主張“調查叛徒問題”。我的看法是：反對打內戰，不同意調查什麼“叛徒”問題。我建議大家學曹孟德的大度，把“告密信”之類的材料當眾毀掉。我的提議被大會通過，並當場產生新總部名單。原勤務員中，主張派鬥方落選者較多。叛徒問題雖被暫時壓下，但雙方裂痕愈演愈大，最終一發不可收拾。至1968年春，東縱終於分裂為高（樹華）派和秦（維憲）派或稱郝（廣德）派⁹。

了一道政治上的國別障礙。無論如何，年屆退休的老同學，仍不能相聚言歡，確屬人性悲哀，夫復何言？

⁸ 從外語系英三的情況看，當時抗大頭頭王玉敏的民憤確實很大。班上幾位造反派骨幹，也曾想教訓她一頓。但看到她失魂落魄、狼狽不堪的模樣，大家的火氣頃刻頓消。看在同學面上，人性的憐憫占了上風，誰也無法下手整她。至於其他班級的情況，個別體罰行為，肯定有過。

然而，此處應該說明，造反派“勝利”之後，針對保守派頭頭的報復性過火行為，固然野蠻，究其根源，與毛澤東的“階級仇恨”論一脈相承，值得反思。然而，同保守派在文革初期對造反派的整肅和打擊相比，它們畢竟有許多不同之處，不可簡單類比。第一，從性質看，它只是個別人的非法行為，只能偷偷摸摸，難以理直氣壯。而保守派之打擊造反派，則是有組織有領導的官方行為，明目張膽，大張旗鼓；第二，從人數看，挨整的造反派，成百上千，人數眾多。而遭到報復的保守派，充其量數以十計。無論同造反派挨整的數量相比，還是同保守派的總數相比，所占比例都微乎其微；第三，從後果看，對造反派的整肅要入檔案，要做結論，最後造成受害者人前途上的災難。而對保守派的個別報復，就師院的情況來看，並未造成他們個人前途上的任何障礙，有的或許成為日後升官進爵的資本。

⁹ 所謂“秦派”或“郝派”，即以總部成員秦維憲、郝廣德為首的一派。綜觀文革中各地造反派的情況，內部分裂似乎是個通病，例如首都三司中的“天派”、“地派”之爭，清華井岡山內部的“蒯派”和“414”之爭，等等。相比之下，保守派好像更加注重內部團結。其中原因何在，頗有研究必要。

對此問題，我們的一種看法是，保守派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其實是共產黨長期形成的“權威文化”，即注重服從，同時培養了奴性和投機心理。而造反派的行為倫理，卻是向權威挑戰，以不服從為榮，標榜特立獨行。如果再深究一層，我們還可以發現，這兩種看似相反的特徵，卻恰恰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矛盾人格的一種複製。

共產黨作為傳統社會道德的反叛者，在造反奪權過程中，看重甚至鼓勵“痞子精神”、流寇行為，不遵守任何政治規範和社會倫理。然而一旦掌權，便崇尚極端專制和絕對服從，將最高領導人和頂頭上司的個人意志，作為下級服從的唯一準則。至於其他價值和規則，

1967年6月初，發生了一件震驚全院的事：20多位老造反事先策劃，把十幾個原抗大兵團的頭頭拉到文史樓六樓審訊，幾位骨幹被綁起來，遭到毒打。待駐師院的軍訓團發現時，打人的老造反們拒絕開門。盧政委找到我，我叫開門，武鬥才停下。我吩咐把被打的人送到醫務室醫治，宣佈參與此事的人作出檢查，等待處理。

我提議此事在全院公開討論，反對軍訓的總部成員秦維憲等人不同意，認為老造反們內部檢查就行了，要給他們面子。最後並沒有具體處理哪一個人，但東縱內部是老造反們，對我主張嚴辦的態度，很有意見，由此他們開始疏遠我。秦維憲、郝廣德趁此機會，拉他們充當反對高樹華的急先鋒，不料被他們斷然拒絕。拒絕的方式也很特殊：他們把秦、郝派去的說客狠揍一頓，警告他們不許再搞這一套。從此，老造反們消沉下來，“不再死保高樹華，但也不反高”，直至畢業離校。

六，籌備小組誕生

6月18日下午5時，在新華廣場召開內蒙革委會籌備小組成立大會。籌備小組成員有：組長滕海清，副組長吳濤，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李樹德等領導幹部；造反派包括郝廣德、高樹華、霍道餘、劉立堂、周文孝、王志有、楊萬祥、那順巴雅爾、邵仲康等，共19人。

原來內蒙黨委和政府兩大攤子幾千人的辦事機構，由現在的幾百人承擔，運轉卻有條不紊。辦事人員的組成是按照軍（隊）、幹（部）、群（眾代表）三結合原則。那時候，不講請客送禮，也沒人敢把上訪群眾拒之門外。

籌備小組成立不久，滕、吳、高找我談話。他們說，現在來往電文很多，原辦事組人員都上了年紀，準備讓我兼任辦事組副組長。“你年輕，黑夜的

包括黨章和憲法，都不過是表面文章，從來不當一回事。每一任新領導上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修憲修章，舉世聞名。

以上兩種政治人格的極端表現，或許說明中華文化有其先天缺陷，展現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劣根性。在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中國面臨社會震盪和政治轉型時刻，重新思考這一嚴肅問題，對於後共產中國社會秩序的重建，或許有其重要意義。

公文你處理，把你安排在烏蘭夫小院¹⁰，保密室旁邊，每夜來電報後你可簽發。規矩不懂，找張魯¹¹同志學習，張魯也是辦事組副組長。”張魯隨即告訴我工作原則和保密重要性，又動員我把關係轉到籌備小組。

之後，我便把工作關係從師院辦出來，以為可以一走了之。實際上，我從未摘掉一派頭頭的帽子。

上任之初，我對辦事組的工作非常陌生，很難分清中央電文應該送給誰審批，籌備組內部的分工也不明確。若給滕、吳，不給高、權、李也不行，所以乾脆每一份電報上都簽上“速轉滕、吳、高、權、李”。老同志很快發現了這一點，但也無可奈何。

¹⁰ “烏蘭夫小院”，是指烏蘭夫文革前的官邸，修建在內蒙黨委大院最深處，靠近原新城城牆的一個角落。記得在批判烏蘭夫運動初期，師院學生還被組織到這裡參觀，其建築風格為中西合璧的兩層小樓，門前有花壇和噴水池。1966年“前門飯店”會議之後，烏蘭夫一家被毛澤東軟禁在北京海軍大院，其在內蒙的官邸長期間置不用。直到革委會建立，才陸續有單位在這裡辦公。

¹¹ 張魯原來是內蒙黨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一年前，我們列隊去內蒙黨委索要王鐸錄音帶時，曾經同他打過交道。

第二十七章

伊克昭盟的冷兵器

1967年6月下旬，籌備小組召開全體會議，研究全區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其他地方比較清楚，處於中西部的伊克昭盟（簡稱伊盟）的情況基本不明，一時難以決策，大家不知道怎麼辦。我提議走下去親自瞭解，不能坐在會議室裏推測，無非辛苦一點，用二十天、一個月，情況就會搞清楚。與會者問我：“既然你提議，你願意去嗎？”“願意去。”我爽快地應答。

一，古老的石頭戰

籌備小組指定兩位原內蒙黨委熟悉情況的幹部，其中有烏蘭夫前秘書沃寶田，另由我在師院挑選幾名紅衛兵，共同組成赴伊盟調查組，開始向沙漠腹地進發。一行人先乘火車到包頭，在車站小店住一夜，再轉公共汽車到東勝（盟府所在地）。

沃寶田用揶揄的口吻譏諷我：“我和自治區任何一個處級幹部下來，都是車水馬龍地招待。你大小也是革籌會成員，也算是地方大員了，不坐小車，坐火車、公車，住大車店。老實和你說，這地方我剛參加工作時住過。”我說：“這不一樣到了嗎？”

在東勝，我們與當地軍區聯絡，住進伊盟招待所。這個招待所的食譜幾乎每日不變：肥羊肉燉土豆和小米飯，我們的人吃得哇哇叫苦。有什麼辦法呢，逐漸去習慣，以工作為第一位吧。大家分頭到各處調查，幾天後已知大概。

伊盟基本分兩派：一是聯委，二是鄂爾多斯。聯委縮居在伊盟中學內，他們保盟委書記寶彥巴圖；鄂派佔據著盟委大院，保盟委副書記郝文廣。聯委指責鄂爾多斯保了烏蘭夫的人，而寶彥巴圖在前門飯店會議上是反烏蘭夫

的。他們對鄂派說：“你們在內蒙保烏，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錯了。所以你們是保守派，我們是造反派。”

鄂爾多斯派反詰：“郝文廣儘管是烏蘭夫提拔起來的，誰能拿出證據說郝是烏蘭夫線上的？二月逆流中，我們支援呼三司，反對內蒙軍區。而你們聯委和軍區站在一起，鎮壓呼三司，所以你是保守派，我是造反派。”兩派誰也不服誰，無法坐到一起。我們撮合了幾次，始終不成功。我們這次來的任務是瞭解情況，不是解決問題，故而沒有強行讓他們團結起來。

當時的東勝市非常小，只有幾條土路。土路兩邊有一條明溝，明溝外側豎立著大字報欄，上上下下貼了許多大字報。伊盟的大字報很有特色，多用方言寫就，我們抄了一張，上寫：“日球怪，聯委反烏成了保守派；日球怪，鄂爾多斯保烏成了造反派；日球怪，軍區開槍殺韓桐，三大紀律丟腦外；日球怪，天上呼呼響，大塊石頭往下拽。”¹

最後一句指當時東勝武鬥的方式，所用武器酷似曹操官渡之戰中對付袁紹的木製發石車，當地人戲稱“甩流星”。

調查中，我們先與寶彥巴圖交談。他講起話來口若懸河，有氣勢有條理。他是偽滿洲建國大學的學生，精通日語，知識面廣，文革前出任伊盟黨委書記。他承認在軍區事件上站錯了隊。他說：“內蒙最大的原則問題是烏蘭夫問題，我們始終是反烏蘭夫的。我相信，不會把與烏蘭夫有密切牽連的人物封為左派。”

與郝文廣談話，則是另一番風景。郝農民出身，文化水準較低，講話吞吞吐吐，許多事講不清楚。我問他：“聯委群眾反映你是烏蘭夫黑幫，你自己認為，你和烏蘭夫有沒有聯繫？”他說：“有啊，沒聯繫人家能提拔我？就這些聯繫，還有甚聯繫？”我說：“你能不能說得詳細些，有條理些。”

“就是這事嘛，還要甚詳細！”他梗梗地回答。當問到他對伊盟文革發展怎麼看時，他不屑地說：“我咋知道？我又不管球你們的事。”

伊盟兩派分別據守兩個大院，之間相距千八百米。武鬥時，冷兵器把石頭呼呼地甩到對方院子裏，十分危險。制止武鬥是我們調查組的核心使命。

¹ “日球怪”或寫“日毬怪”，是當地罵人常用的口語，此處表示不理解的感歎詞。

爲此，我們分別到兩個大院談話。那天，我們一進盟委的院門，迎面就見幾部石頭發射器，黑乎乎豎立在院中。我們正與郝文廣談話，聯委甩過來的石頭正落在屋頂上，一聲炸響，很是嚇人，幸好沒傷到人，假若落在人身上，肯定會把人當場砸死。與寶彥巴圖談話時，同樣嘗到了鄂派冷兵器的厲害。我們與兩方商量，傷了人誰也負不起責任，鬥嘴可以，動手、動石頭都不允許。經多方勸說，雙方的武鬥少多了。

伊盟地處邊遠地帶，文化革命極具地方特色。兩派除骨幹人員縮在各自大院內，一般人員如常上班，準時進入崗位。中午、晚間都按時回家吃飯、休息。據調查，雙方並沒有類似協議，而是沿襲當地多年的生活習慣。可見，即便文革這樣大的事，也難以根本上改變世代相傳的習慣，脫離舊有的軌跡。

調查時，我們向不少人問過如下的問題，答案極其相似。

問：“你們在回家路上如果遇到親友，屬不同觀點，雙方會怎樣？”

答：“親的近的(指血緣)還得打招呼，遇到長輩人，即便是不同觀點，也要下自行車問候；要是一般朋友，頂多點個頭。”

問：“不同觀點不影響親戚朋友的來往嗎？”

答：“怎麼不影響。過去見了親的、近的什麼話都說，現在就撿不甜不淡的話、家族內的話聊。觀點的事都避開，一般朋友因觀點不同也不親近了。相反，過去不認識的人，因觀點一致，倒是挺親的。”

我們的調查工作進入尾聲時，又生枝節，鄂爾多斯觀點的人在軍分區門口靜坐，索要“二月逆流”時整過他們的材料。我們聞訊來到軍分區門口，一看大門緊閉，立時感到事情不妙，若這樣僵下去會出亂子。我便好言勸說田司令員：“群眾要與你田軍見面，直接對話，你應該見面，群眾又不會吃了你，不見是不對的。”

伊盟的春天一般多風少雨，這時卻偏偏下起了雨，群眾照樣在外面坐著。田軍仍然無動於衷，我生氣地說：“這麼個大司令員，老資格的軍人，看著外面群眾挨雨淋，你不心疼？你要這樣做的話，我給滕海清司令員打電話，你看怎麼辦？”

他態度也很強硬，說：“你打，我給你掛。”電話很快掛通了，直接接

到滕辦。秘書陳曉莊接完電話，去請示滕司令員。在電話裏，滕海清批評田軍怕見群眾，讓田軍按我的意思辦。“高樹華雖然年輕，他是代表內蒙籌備小組去工作的。”

這樣，田軍才同意馬上見群眾。他要警衛員找雨衣，我急忙說：“群眾淋著，你披雨衣，不是找挨罵嗎？”

我陪著他在雨中和群眾見面。人坐了一天一夜，生理上需要補充東西。軍隊其他人也覺得司令員做得有些過分，經我示意，他們煮了熱麵湯，燒了熱茶，把群眾請進樓。原本也沒多大問題，幾經說和，喝了熱茶，吃了熱飯，群眾的對立情緒很快緩解。雙方最後達成協議，田司令員負責查找這些材料，並全部交給群眾；群眾也推舉出代表，有事由代表找司令員。

我們在軍分區忙活了兩天，當我們離開時，田司令員對我的態度變得非常和藹，他說沒想到事情這麼簡單就能解決了，“我以為這事要鬧大了，所以硬頂著不見，看他們能怎麼樣！”我開玩笑說：“我們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共產黨應該是最不怕群眾的。”

他說：“你別給我講道理了，你們還有什麼要求。”我趁機說：“伊盟東勝地區的調查差不多了，我們準備去周圍幾個旗縣看看，能不能支持輛車？”他說：“給你們最好的嘎斯 69²，再派最好的司機，他們很熟悉路。你們最好先去伊金霍洛旗、烏審旗，再去鄂托克旗。從鄂托克旗，經烏拉特前旗到包頭，這樣快些。”我感謝他的指點，並向軍區借了十幾個軍用水壺。

二，解放醫生，護衛成陵

兩天後，我們離開東勝，進入一望無際的茫茫原野。鄂爾多斯高原古老、荒涼，黃沙地上長著一叢叢雜草和灌木，不時可望到遠處的羊群和蒙古包。在兩位有經驗的司機建議下，我們在一處蒙古包前停下來買了些酸乳，再放入東勝街上買的白糖，經汽車顛簸的充分攪拌，喝起來酸甜可口，果然又充

² 嘎斯 69 為蘇製軍用越野吉普車，在內蒙交通不便的草原和沙漠地區，當地駐軍普遍配備這種車輛，由於四輪驅動，適合土路行走。

饑又解渴。

沙漠中，綿延的沙丘像金字塔一樣高大，汽車蹣跚地在其間穿梭，有時只能沿沙丘邊緣滑行。輪胎不時陷入沙堆，人要下來推車，彷彿在與沙漠進行搏鬥。大家高興極了，叫喊著，歡笑著，從高大的沙堆上往下滑。這時的我們，把滿腦子煩惱、渾身的疲憊，甚至把文化革命和鬥爭大方向，都通通拋灑在茫茫沙原中。

伊金霍洛旗好像沒發生過文化大革命，除了街道上稀稀落落幾張大字報殘跡外，什麼也看不出來。當地老鄉告訴我們，旗醫院文化革命搞得激烈，其他地方無非是你這觀點，他那觀點，誰也搞不清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們問：“你們破過四舊嗎？”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四舊。“有紅衛兵嗎？”“噢，旗裏娃娃戴著紅袖章。旗醫院有，你們到旗醫院吧，到那裏就都知道了。”於是，我們直奔旗醫院調查。

旗醫院掌權的主任是一位姓劉的女幹部，說話霸道，又非常尖刻。我們問她醫院是怎麼搞文化大革命的，她說抓了一批黑幫，當問她黑幫的標準是什麼時，她根本說不清。向她瞭解完情況後，我們要求與抓起來的人談話，她堅決拒絕。

這一下激怒了我帶來的紅衛兵：“我們有權找對立面談話，你為什麼這麼霸道？”她也很硬，說：“不管你們是哪裏來的，你們只能瞭解真理，不能瞭解謬誤。”我們感到非常奇怪，我生氣地說：“你想讓瞭解也得瞭解，不想讓瞭解也得瞭解。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是經過盟裏同意的。你不是認識田司令員嗎？我們現在和田司令員通電話。”

田司令員得知後很幫忙，把那個蠻橫的女人批評了一頓，我們才得以和“黑幫醫生”談話。醫生們非常恐慌，不敢說什麼，紅衛兵氣得罵他們窩囊廢。當天晚上，我們正睡到半夜，被輕輕的敲門聲敲醒，來的是兩個醫生，其中一個姓楊。他們不讓開燈，躲在黑暗中向我們哭訴自己的遭遇。原來，醫院文化大革命劃線以劉主任為準，擁護她的是左派，反對她的是右派。

文革前，劉是新提拔的醫院政治部主任，沒什麼文化，更不懂醫術，醫生們都看不起她，所以大部分被她打成反革命。我們問：“你們怎麼看病

呢？”他倆說：“白天監視我們看病，晚上把我們關起來。”原來旗縣的文化大革命是這樣搞法，真讓我們聞所未聞。我們請他們悄悄回去，裝作什麼也不知道。

根據田司令員的指示，第二天，我們找到縣武裝部。縣武裝部部長原是支持這位劉主任的，聽完我們的介紹，也覺得旗醫院太離譜。我們建議先把醫生們放回家，讓他們去看病，讓他們有自由。“無論誰有道理，應該面對面講，不應該壓制。把人關半年之久，本身就是錯誤的。”那個女主任堅決反對放人，又哭又鬧。我們只好撇開她，強行宣佈解除關押醫生的命令，宣佈他們有回家的自由，有看病的自由，有享受“四大”的自由。

我們在伊金霍洛旗工作了一周，旗武裝部越來越配合，保證我們走後不再關押這些醫生，讓他們發表意見。醫生經我們鼓勵，開始揭發醫院的真相，包括過去擁護劉的也反戈一擊，好像文革這時才剛剛開始。我們和劉主任談話，希望她能理解文革，與醫生們一起平等地講述自己的觀點，誰也不能壓制誰。

權力欲很強的人，很難領會平等待人的快樂。這位劉主任始終沒理解，很快離開伊旗，到呼市告我們的狀。我們的人還沒有回到呼和，滕辦的秘書便在電話裏和我們開玩笑：“告狀的人先到了。”滕辦向旗武裝部瞭解情況後，認為我們做得對。後來，姓楊的醫生不時來看望我，我們一度成為好朋友。

伊旗有座著名的成吉思汗陵墓。我們到達時，陵墓旁有兩匹白馬在悠閒地吃草，像兩尊神像護衛著廟宇和聖地。管理人員不在，只有一個老漢，顫巍巍地打開大門，讓我們進去看看。陵堂裏空空的，什麼也沒有。

解決醫院問題時，有當地人問，成吉思汗陵怎麼辦，算不算四舊。我說，成吉思汗是個歷史人物，不是神鬼，所以陵墓不能算封建迷信。又問：“究竟怎麼看待這個人？”我說：“蒙族認為他是英雄，別的民族怎麼看，歷史學家有定論，我不是歷史學家，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他們又問怎麼理解毛主席詩詞中“只識彎弓射大雕”這句話³，有人說，是主席看不起成吉思汗。

³ 此為毛澤東 43 歲創作的詞《沁園春·雪》中的一句。1936 年 2 月 5 日，毛率部東征，見陝

我說：“成吉思汗是軍事家，軍事家也是偉大的。我的意見陵廟不要動，看上級的正式意見。”伊金霍洛旗人視成吉思汗陵爲神廟，頗引以爲豪。我作爲上級派來的大員，不讓動陵廟，很符合當地人的心願，雙方達成了默契。

三，烏審召——草原大寨⁴

我們到烏審召公社後，公社幹部簡單地介紹了公社情況，重點介紹烏審召大隊。幹部們大部分擁戴草原大寨的創始人寶日勒岱，認爲她作風正派，埋頭實幹，領著烏審召人植樹造林，改造沙漠，是名副其實的勞動模範。第二天，寶日勒岱做嚮導，帶我們直奔烏審召大隊。一行人穿過幾個大沙丘後，真看到了綠色。寶日勒岱說，這就是我們當年種的樹，長了好幾年了。在烈日和沙丘下，看到綠色，像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大家興奮異常。真正到達烏審召，天已到了下午。

牧民們知道我們來了，都從夏盤營騎馬趕到這個村。所謂村，只是一個大廟⁵而已。當時牧民仍過著游牧生活，夏天到四處找牧場，叫夏盤營。收拾完牲口後，晚間聚到這個地方休息。落日的餘暉中，不時有三、五人騎在馬背上，悠閒地前行；有的則飛馬馳騁。在沙漠的映襯下，畫面十分動人。

當晚，寶日勒岱領著幾個婦女，煮大米牛肉乾粥，她說沒什麼好吃的，但粥裏加上沙漠裏長的野沙蔥，份外有味道，我們吃得很香甜。眾人圍在篝火旁，叫我們談文化革命。這一情景，似乎不像在搞運動，更像是旅遊度假。有幾個牧民直率地說，寶日勒岱領著大夥學大寨，是帶頭人，這沒說的。主

北普降瑞雪，遂寫了這首吟雪詞。詞中有：“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等句。也有分析認爲，這首詞其實表露了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

⁴ 六七十年代，中國農村的公社化運動發展到高潮，其標誌之一，便是學習山西省昔陽縣農民陳永貴所領導的大寨大隊。除了大寨之外，其他地方也培養和樹立了一批當地學大寨的先進典型。寶日勒岱所領導的烏審召大隊，被稱爲內蒙古的“草原大寨”。

⁵ 在內蒙古草原牧區，許多地方以喇嘛黃教的召廟命名，例如烏審召，百靈廟等等。“召”亦稱“昭”，爲藏傳佛教所修建的寺院，除了拜佛頌經，也舉辦季節性的慶典和廟會。寺廟周圍，開始有人定居，漸漸形成村落或鄉鎮，因此便沿用寺廟名稱，爲當地的地名。

要意見是，寶工作主觀、武斷，聽不得不同意見。

有個婦女說，寶有重大問題，要向我們個別反映。她說寶正和一個縣裏來的電影放映員談戀愛，當地人叫搞男女關係。我們從公社得知，寶已離婚，前夫就在這個大隊。這天夜裏，我後半夜醒來，沙漠上日照的熱氣已散盡，透出些涼意，我不由地走向一個火堆。火堆旁還坐著一個人，和我們同行的翻譯交談得正歡。翻譯是內蒙師院蒙語專業學生莫日根，他向我介紹：“這位就是寶日勒岱的前夫。”

沒料到，這位蒙古漢子一談起寶，滿口誇獎，說寶作風正派，不會有其他問題。我提出電影放映員的事，他說：“那是一個優秀的小夥子，他比我有文化，寶日勒岱愛他是應該的，我還希望他們結婚呢。”我們被少數民族感情的純樸所震撼。我再次找那個婦女，解釋說革命大方向是鬥走資派，這種小事不應該與革命問題糾纏在一起，她聽後似懂非懂。

對寶日勒岱的調查，我們的結論是肯定的，烏審召學大寨的成績是突出的。

寶日勒岱在1967年成為內蒙革委會委員，不久成為烏審旗革委會副主任兼烏審召公社革委會主任；1969年當選為中共九屆中央委員，後延續為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1969年12月，內蒙軍管後，寶日勒岱作為蒙古牧民的優秀代表，被結合為內蒙革委會副主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常委、副書記，全家隨之遷到呼和浩特。八十年代，寶日勒岱擔任內蒙古政協常委，享受國家幹部退休待遇⁶。

四，遙遠的鄂托克

從烏審召、烏審旗到鄂托克旗行程很遠，為了緩解疲勞，司機讓我們每

⁶ 在嚴格實行戶口和勞動人事的二元體制之後，由農民變成國家幹部的途徑幾乎堵死，只留下當兵提幹、轉業和高考升大學這兩個通道。由農村幹部直接升為國家幹部的情況，極為罕見。在陳永貴、寶日勒岱等人高升的同時，全國各級都選拔了一批農村幹部，直接轉變為國家幹部。其數量和選拔程序，以及對中國政治版圖的影響，目前尚無人研究。

個人在漫天的荒野中學習駕駛汽車。天上烈日炎炎，遠處的沙丘時而可見到野兔、狼和狐狸。臨近鄂托克旗時，還看到了野驢、野駱駝，引起我們極大的興趣。

鄂托克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圍繞伊盟盟委書記田萬生是不是走資派的問題展開。

田家在當地是大戶，革命資格老，土地革命時期就參加了共產黨，後參加抗日，全家曾遭到國民黨燒殺。解放後，田家人在旗裏、盟裏爲官，文革前，家長田萬生任盟委主要負責人。

當地多數人站在田家一方，連武裝部頭頭也是保守派。而解放後陸續從外地分配來的工作人員，特別是一些大、中專畢業生，多數與當地人觀點不同，認爲田是走資派。鄂托克文化大革命形成當地人一派，外地人一派，但對立情緒不大。人們該怎麼工作，就怎麼工作，並不耽誤公務和生產，僅僅在觀點、思想、感情上有隔閡。

調查組住在旗氣象局大院。每天早晨，只見氣象局的人忙忙碌碌，把氣球放到空中，測量風向和其他氣象資料。他們手中還拿著各種儀器，反復測量，與圖表認真核對。這些人中有一對年輕夫妻，畢業於北京氣象學校，來旗裏工作幾年了。他們在前一晚曾激烈地向我們反映情況。如今態度平和地工作，與昨晚談話時判若兩人。

我驚異文化大革命中，下層人對政治生活的態度如此冷靜，相比之下，我們反而狂躁了許多。氣球慢慢地向上升起，在草原湛藍的天空漸漸化作一個白點。夫妻二人測著、數著，一個當地人在旁邊記錄，合作得很和諧，很難看出他們有什麼分歧，有什麼對立，這就是鄂托克旗文革的特色。對此，我們不能過多地干預，只能沒有結論地離開遙遠的鄂托克。

晚上，當地人回家了，只留下外地人和我們在一起。他們這些人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到這裏來鍛煉的⁷。我問她們苦不苦，他們說時間久了，一切都

⁷ 此處所說的“鍛煉”，有吃苦耐勞的意思。不過他們來內蒙的性質是分配工作，安家落戶，不同於後來上山下鄉的知青。多數下放知青，帶有“鍛煉一陣子”，然後再選調回城的性質。而這些畢業分配到邊疆工作的人員，除非找關係走後門尋求調動，否則一輩子都難有進城市工作的機會，回到北京的希望就更加渺茫。

習慣了。只是春天風太大，冬天太冷，夏天又太乾太熱，幸好只有少數當地人欺負外地人，多數很和善，所以他們還能待下來。

中國遼闊的疆土上，這麼多年輕人，爲了祖國的事業，離開北京，離開大城市，來到如此遙遠、荒涼的地方默默地工作，令人敬佩。

第二十八章

昭烏達盟的槍聲

1967年8月18日，是毛領袖檢閱紅衛兵一周年。呼三司組織了慶祝大會。會議進行中，高錦明把我叫到旁邊說，內蒙東部昭烏達盟（簡稱昭盟）紅衛兵在軍分區門口絕食，情況危急，要求支援。他說：“盟委書記周明點名你去，你有沒有意見？”我說：“去可以，解決這麼大問題，我擔當不起。”王志有，王金保主動請纓。在場的籌備小組成員，決定由我任赴昭盟調查組組長，王志有、王金保任副組長，成員由12人組成。

一，紅衛兵在軍區門口靜坐

十月初是我妻子的預產期，我放心不下，但面對人命關天的絕食，她平靜地接受了現實。因飛機早晨起飛，頭天晚上必須住在呼市賓館。夜色中，夫妻二人從家中出來，我騎著自行車，她坐在後架上。把我送到賓館後，她再騎車回去。望著她在黑森森的街道上漸漸消失的身影，我的心又酸又痛。

第二天大早，雙翅膀的安-2型¹飛機升空。飛機起飛後很不平穩，有人開始嘔吐。因為是貨機，大家只能坐在簡易座位上。駕駛員說：“你們乾脆躺下算了。”於是十幾條漢子直挺挺躺在地板上靜臥。開始僅有一人嘔吐，接著第二、第三人。工作人員穿梭接送紙袋，忙得團團轉。

飛機終於磕磕絆絆地降落在赤峰機場，不良反應隨之停止。走出艙口，在陽光照射下，每人臉上一片灰色，像從死人堆裏爬出來。來接機的是軍分區司令員李景富、政治部主任巴圖、盟委書記周明和助手。其他人先到賓館休息，我和王志有直奔現場。

¹ 安-2型飛機，全稱是“安東諾夫2型”，為蘇聯製造的運輸機，也可作為農用飛機。以其飛行速度，從呼和浩特到赤峰，大約一小時二十分鐘。

絕食者是群中學生，爲首的是赤峰二中的于洛泉。我和王志有勸導他們，苦口婆心說了一個小時，他們反沒了主意，問我們該怎麼辦。我說：“你們先住進軍分區醫院，檢查身體，有病先治，沒病的休整一下，喝水，吃飯。我們也休息，晚上再談。”軍分區戰士把他們扶上汽車，送進醫院。絕食警報解除，我們立即報告滕、吳、高。他們吃驚地問：“一個多小時就解決了？”

孰料，這只是昭盟問題的開端，後來的事件可謂險象環生。當時，昭盟地區和赤峰市各系統都分成紅司和中聯兩派，分歧主要在對待盟委書記周明的態度上。軍分區和周明觀點、立場一致，沒有分歧。于洛泉和紅司對周明和軍隊都不滿，尤其反對分區副司令員杜長貴。杜支持保守派，比較強硬。

于洛泉信任巴圖。巴圖是軍分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個儒雅的軍隊幹部，年輕時是偽滿洲建國大學的學生，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巴圖因支持呼三司觀點的紅司，被內蒙軍區劉昌、王良太停職檢查，八條下達後恢復工作。

杜長貴是河北人，參加過晉察冀抗日，一級級提拔上來，在軍分區只佩服司令員李景富，看不起巴圖。李是老紅軍，五十多歲，1955年授銜時是大校。到內蒙後，不被烏蘭夫重用，任昭盟軍分區司令員。正直、熱情，有大將威嚴。

經過調查，我們得出結論：昭盟的問題在下層，但須從上層抓起。我便按程序向滕司令員請示，司令員說：“你可以代表我下達命令，或者我下達命令你執行。”李司令員說：“根據滕司令員的指示和蕭應棠的命令，部隊支左聽從你的指揮。”

我在會上對分區幹部說：“不能任群眾你砸我，我砸你。領導要團結一致。滕司令員跟我說過，這次能不能行動一致，是作爲考核軍分區的重要內容。而且考核要由我簽字。”這最後一句雖是半開玩笑，但與會者聽得十分認真。

這次會後，部隊領導開始轉向。軍隊支左辦、地方文革辦和我們組成一個小組，分頭與紅司和中聯接觸。中聯不反周明，不把矛頭指向解放軍，主張大聯合。相比之下，紅司複雜一些。我便改變身份，以紅衛兵方式和于洛

泉周旋。

一天後半夜，巡邏戰士報告，盟公安處被砸。我們趕到現場發現，是敵僞檔案被搶。值班人員被綁著，據他的線索，作案人的聲音像孩子。我們順逃離者的方向查找，發現材料一路丟丟撒撒，一直搜到赤峰二中一間辦公室，裏面的材料堆得亂七八糟。由於事關重大，于洛泉被傳喚到二中，讓他看看紅司幹的好事。他很慌張，因為東西是從他的管轄處搜出的。我們又把他周圍的骨幹叫來觀看，強迫他們把材料裝好，親自送回公安處。天亮前，丟失的材料完璧歸趙。

公安處當場開審，我們旁聽。四個小時後，有人告發是麻老師和其他幾個紅司的參謀在幕後操縱。根據口供，公安拘留了姓麻的老師。麻供認不諱，把策劃的詳細經過一一作了交代。

調查組考慮昭盟聯合的大方向，認為最好掃掃麻的顏面即剎車。但必須讓他公開檢查，認罪，再放回家。從此，麻等人老實了許多，紅司與中聯依據中央的精神，漸漸有了聯合的意向。

二，炸紅山水庫，驚動中央

一天，收到滕司令員情報，說紅山水庫上有人在埋炸藥，要炸大壩。庫裏有幾億立方水，若爆炸，水會沖向承德，淹了瀋陽。

我讓王金保在赤峰守攤，立即與王志有連夜趕往翁牛特旗紅山水庫。到水庫後，我和滕司令員接通電話。滕說：“有人和你說話。”我聽見電話裏的聲音是總理秘書張作文。他說周總理對這件事很關心，很焦急，命令你冷靜，要有耐心，千萬不能出事；要隨時報告。我立時感到肩上的責任千斤重。

我們草草吃了早飯，撇開杜長貴，帶著兩個工作人員，向大壩走去。剛接近大壩，聽見對面鳴槍示警，讓停住。我們用手提喇叭自我介紹，講明來意。對方說：“不要前進，等待命令。”20分鐘後，來了兩個騎車人查看我們的證件。我出示呼三司證，王志有拿818的證件交給來人，一會兒返回說：“頭頭查過了，讓高樹華一個人過去，他認識你。”

我獨自走上大壩，只見擺著一些炸藥、雷管和導火索，大壩安然無恙。我暗想，這點炸藥很難炸塌大壩，但不可大意。他們大約有二、三十人，亂哄哄擠作一團，估計一夜挨餓受凍很不舒服。我勸說他們離開大壩，不要開這種玩笑。

天亮了，看清這些人大約只有十幾歲。我問：“你們爲什麼躲在這兒，採取這種行動？”他們說，杜長貴說過，抓住他們要通通槍斃。我說：“這不可能，他沒這個權力。”一個學生問：“你能管住杜長貴嗎？”我說：“滕司令員可以管住他，可以讓他脫軍裝，讓他坐監獄。”又有一個問：“滕司令員知道我們的事嗎？”我答：“不僅滕司令員知道，周總理也知道了。”又問“你見過總理嗎，什麼樣子？”這都是些小孩子話，最重要的是把緊張的空氣緩和了。我說：“我們坐下好好談行嗎？有什麼事我替你們解決。”對峙鬆動了，但孩子們仍不離開，“杜長貴在，就不回去。”我說：“我以人格擔保，安排杜首長離開，讓工兵留下來清除這些爆炸品。你們和我一起回烏丹（旗府所在地）。”“你們餓了吧，我讓紅衛兵來和你們認識認識，給你們送點吃的。”他們終於同意了。

我們當場給滕司令員匯報，滕命令杜長貴領加強班撤回赤峰，把通訊班和通訊工具交我們。壩上的人親眼看到杜長貴領著軍人離去，他們才同意讓工兵上壩，拆除炸藥、雷管、導火索。

當晚，我們把孩子們送到家長手裏，同時，召開全旗廣播大會，向當地百姓通告這件事，讓大家不要追究學生的責任，並要求旗內居民，勿到大壩上“玩火”。

一切妥當後，我們向滕司令員做了匯報，滕立即報告總理，秘書張作文說，總理很滿意，很高興，表示感謝。

炸紅山水庫，是昭盟地區典型的武鬥事件之一。除此之外，林林總總的小型武鬥不斷發生，其中不乏諧趣性的，很有地方色彩。昭盟婦女，一般性格潑辣。文革中，當與不同觀點的男人辯論，一時占不了上風，就從下三路入手，抓住對方褲襠，直到男人討饒方罷，民間稱之“掏襠隊”，多由30多歲的已婚婦女組成。翁牛特旗旗府所在地烏丹也有。

我們解決水庫事件後，順便來到此地。這裏的掏襠隊隊長姓孫，矮小、黑胖，她爽快地承認，掏了十幾個男人，個個手到擒來，很是得意。我們告訴她，這是侵犯人權的行爲，很容易致人傷殘。她不服氣，認爲結過婚，知道怎麼回事。話不投機，我們只好勸她去問問醫生，以後禁止做這類蠢事。

三，平莊煤礦武鬥

紅山水庫事件後沒幾天，又傳來驚人消息：平莊武裝部的槍支彈藥被搶。當晚平莊響起槍聲，李景富司令員派杜副司令帶領一個加強班²，先行到達平莊，他邀請我們隨他後行。

晚飯後，李安排了兩輛蘇式嘎斯車，這種車關鍵時刻不出事。天色漆黑，出赤峰城不久，間或聽到遠處的槍聲。路況很壞，說是“路”，實際上根本沒路，前幾天又下過雨，路面坑坑窪窪。我透過小視窗向外張望，暗暗的天空，只有被秋雨洗刷過的星星在閃爍。黑漆漆的大地上，遙有一兩處燈火。

突然槍響了，同時傳來喝令聲：“什麼人，站住！”李司令員命令：“別管它，往前衝！”後邊那輛緊隨其後，一串子彈嗖嗖尾隨過來。衝過兩、三道哨卡後，前面一片燈火，平莊到了。車直接開到鍋爐房澡堂子，杜副司令和一班戰士正等在那裏。下車後，杜介紹了平莊的局勢和兩派情況。

第二天，按研究好的計劃，通過廣播站，由我代表內蒙革籌小組和駐赤峰調查組講話。王志有分別給兩派頭頭打電話，約好當天下午與多數派談，明天上午和南邊少數派外地人談。雙方頭頭在電話中都同意，地點在鍋爐房。按約定，多數派的頭頭來了。此人姓張，小個子，他的助手也姓張。從談話傾向判斷，他們對對方姓郭的頭頭意見大，說郭是 1958 年來的盲流³，生性急

² 當時，超過一個加強班的兵力調配，必須經中央軍委批准。超過一個連的兵力調動，則要由林彪和毛澤東親自批准。一個加強班的人數，大約在 15 至 20 之間。

³ “盲流”是“盲目流動人口”的簡稱。在中國實行二元分割的城鄉戶口制度初期，特別是 1958、1959 兩年，許多內地農村人口，為逃避饑荒，自發遷居到人口稀少的內蒙古，被當地政府和居民稱爲“盲流”。其中許多人被遣回原籍，但也有一部分定居下來，逐漸融入本地社會。“盲流”二字倒過來是“流盲”，與“流氓”諧音，故含有歧視味道。

躁、野蠻，到處跟人打架，“他能當礦區的頭頭？”張悻悻地說。第二天約定和另一派頭頭談，九點已到，不見動靜。我打電話給姓郭的頭頭，他態度蠻橫，但很直率：“想了一夜，怕你們使計抓我，現在請你過來，一個人來！”我回答“可以”，但要求他保證解放軍司機的安全，他答應了。李、杜兩位司令很擔心。我說：“我與他一無冤，二無仇，沒感到有什麼危險。”

當我們的車開到對方地界第一道崗前，就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只見十幾個人，個個手中持一把扎槍，一種鋼管上帶血槽的武器，十分犀利。其中一人道：“郭頭說了，進去吧。”到達第二道崗前，命令我們下車，讓司機和車留下。

小頭目領著我走過很長一段土路，來到一個大院門口。我們一進去，院內的人呼拉擁過來。無論男女，手中都拿著武器。領路人一邊罵，一邊清路。我上了台階，回頭一看，他拿扎槍在地上畫一個半圓，嚷道：“誰進來，扎死誰。”

屋內，除了郭之外，還有兩人在座。他們大罵礦黨委，罵對立面姓張的頭頭，訴說外地人受盡欺負和凌辱：幹活不給錢；過年節發魚、肉，當地人發好的，外地人發臭的；當地女人可以洗澡，禁止外地女人洗澡，等等。

我說：“即使這樣，沒有其他解決方法嗎？”他們固執地說：“沒退路。”我講了我在文革的冤屈，說：“不公正到處都有，就是用槍把當地人都打死了，公安也不會饒你們。”

對方的口氣軟下來，說要想想，找人商量一下，明天答覆。告別時我再提醒他們：“不能開槍，要維持現狀。”

四，鴻門宴

不料，第二天一大早，槍聲驟起。我急急跳上礦區的廣播車，開到交戰雙方的中間地帶喊話，子彈嗖嗖地從耳旁擦過，我繼續喊。不久，槍聲稀疏下來。正在停火的剎那，正面平房屋脊後一個人探出半個身子，一聲槍響，他順著屋頂咕嚕嚕滾下來，卡在房頂邊的煙囪上，血呼一下順著牆流下來。

我想壞了，死人了，最不願看到的事發生了。

槍聲戛然而止，周圍一片寂靜。我坐著宣傳車退回來，立刻給姓郭的頭頭打電話：“我看見你的人死了，你不要激動，要妥善處理。”姓郭的非常暴躁：“那個姓杜的司令，支一派打一派。從來沒被壓死的，我們要流盡最後一滴血，為我們的戰友報仇。中央有規定，不平則鳴，文攻武衛。我們是正義的、合法的。”

聽對方用詞，好像有人給出了什麼招兒。我急問平莊幹部，是不是有人來了平莊。“是來了些人，有內蒙地質局的，支持郭，他們經常在一起。”潛意識告訴我，問題的癥結找到了。

我和王志有馬上去拜訪這幾個神秘的外來人。我們由當地人帶領，在靠近鎮子南邊的幾棟平房外，見幾個人正在修築工事。走近一看，原來是內蒙地質局造反派頭頭小古和他的女朋友小張（兩人均為化名），還有四五個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在這裏突然邂逅，他們先一愣，繼而說：“知道你來了，沒想到來拜會我們。”

我問：“你怎麼來這裏了？”他慷慨地說：“我是來支持受壓迫的群眾，解放全人類的。”我和王志有心照不宣，姓郭的後台就是他倆。王志有不動聲色地說：“晚上請你們各位吃飯，我們那兒有好飯。”我很奇怪，王志有為什麼邀請他們，還說有好飯，我們每天吃土豆和窩頭呵。原來王志有給他們設了一道“鴻門宴”。王志有說：“必須把他們綁架走，把姓郭的腦瓜砍掉。有他們在，事情永遠解決不了。”王志有說的有道理，李司令員、杜副司令員也同意這樣做。

晚上，客人如約而來。杜副司令員下了些功夫，有雞蛋、番茄、白麵大餅，還有半瓶白酒。說到正題，王志有開始講：“為了把這裏的文革搞好，建議你們幾個人退出去，你們在這裏不會起什麼好作用。”王志有說得比較客氣，但語氣很重。

一聽這話，幾個人火冒三丈，指著王志有的鼻子罵：“這是陰謀，是鴻門宴。”王志有承認是鴻門宴。他說：“你們必須走！我們已打發人收拾你們的東西，一件不少都放到車上。”

小古鬧得最凶。我說：“小古，咱倆可不是因爲私事鬧翻的。我們是爲了平莊幾萬人著想，才攆你的。你還是到別處搞世界革命吧，這兒實在留不住你這位大爺。”

我們派人強行把他們送到北京地質部造反派手中。調查組還沒回去，兩人在呼市給我和王志有貼大字報，聲言我們迫害他們。

五，武鬥平息，恢復生產

因爲死了人，局勢嚴峻起來。開槍方自知理虧，基本處於守勢。死人這方大造聲勢，要抬屍遊行。我向郭頭分析：“本來你們講的一些事是有理的，要是你帶頭把武鬥擴大，什麼理也說不過去了。”說到此，屋內閃進一個人與他耳語一番，我隱約聽見“古司令不見了”。郭自言自語地說：“不對呀，說好晚上一塊吃飯的，怎麼撤了？”那人說：“屋子也打掃了，沒留紙條。”郭在瞬間好像失去了主心骨。我抓住戰機，繼續攻心說：“外地人也是人，想求得平等待遇，應尊重當地人，不能對著幹。”

此時，不知是因失去後台，還是我的分析有理，他再不那麼蠻橫。郭說：“按你說，死者怎麼辦？”我告訴他，按政策辦，發放撫恤金，該給多少錢給多少錢。工人死了，不能平白無故地死，要找來家屬。郭說：“沒成家，父母在哪，正在查。”我趁熱打鐵：“買口好棺材，帳單交給我。天熱，屍體容易壞，你們好好開個追悼會，我和調查組來送行，搞隆重點，歡迎李司令員，不歡迎杜副司令，杜可以不來。”郭要研究研究。我看火候已到，便告辭出來，郭挽留我們：“留下吃點飯吧，下麵條。一天了！”

郭的這頓麵條吃得很香，看來問題有希望了。幾天後，召開了追悼會。姓張的本地派主動與對方握手，公開賠禮道歉，並對死者表示哀悼。武鬥平息了，槍支、彈藥順利上繳。夜間，軍人和礦警聯合巡邏，社會秩序趨於平靜。下一步任務是復工問題。

兩個月武鬥，生產停頓，銀行關閉，財務封門，一直沒發工資。收槍那天，調查組到礦上看了看。諾大一座露天煤礦，只有一根槌在咚咚作響，震

撼著人心。我們循聲走到工作面，發現是位老工人在獨自幹活。他不善言談，連連說：“與其打仗，還不如在這兒幹活。”我們打算就這件事作點文章。

當武鬥雙方簽署聯合協定時，王志有代表調查組在會上講話。他把老工人帶上台，表揚了他的事蹟，當場給他補發了兩個月工資，還發了當月的工資。同時公佈：明天不上班，不發工資，也不補發。這招挺靈驗。第二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上班了。

九月的塞外，秋風瑟瑟，寒氣襲人。離開平莊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王志有坐在礦區的高處，望著平莊萬家燈火，心中酣暢淋漓，溫暖如春。能為百姓辦點事，真是一種幸福。

王志有說：“那天杜副司令員說你真是傻小子，槍響成那樣，你就站在中間不害怕！你有什麼感受？”

我說：“也沒顧得想那麼多。”“你聽到槍聲了嗎？”

“聽到了，好像子彈嗖嗖從耳旁過。我只是對死亡的年輕人惋惜，太年輕了，沒享受什麼人間生活，就稀裏糊塗死了。”

六，科爾沁人

九月底，我們返回赤峰正要作工作總結，滕司令員打來電話，讓我們去哲盟（哲里木盟的簡稱），調解一下哲盟軍分區和造反派的衝突。

我們分乘兩輛嘎斯 69 吉普，從赤峰出發。靜靜的科爾沁草原上，偶爾傳來幾聲狼叫。困倦的我們，在車輪撞擊坑窪路面的顛簸聲中，左搖右晃地打起瞌睡。

李景富司令員挑了兩名特等射手，帶著半自動步槍護送我們。半路方便⁴時，王志有拿過射手的槍，說了一聲“太靜了”，推上膛向天打了一梭子彈。我也掏出李司令員借給我的五四式手槍，向天放了個連發。大家在清新的空

⁴ 那時草原上沒有高速公路，更沒有加油站和帶公廁的休息處，行車人內急時，就在路邊靜僻處，下來解手方便。如果車上乘客男女都有，就自動男左女右，分別在汽車兩側解決問題。

氣中輕鬆一下，繼續趕路。

到哲盟後，軍分區司令員趙玉溫神秘兮兮地對我和王志有說：“這裏敵情嚴重，前幾天半夜響過兩梭子槍聲，是蘇修特務在用槍聲聯繫。”我和王志有偷偷直樂。

哲盟造反派分不同觀點：通遼師院中文系學生趙明湖爲首的哲盟三司，對軍分區的態度比較溫和。另一派態度激烈，頭頭是一個十七、八歲左右的中學生，叫霍鳳林。和他搭伴的工人造反派頭頭顧傑，是個態度和藹的人。霍、顧在二月逆流中，被軍分區司令員趙玉溫關到監獄。紅八條後，雖然放出來，平了反，但氣沒出盡，領著人每天去軍分區門口，要求趙玉溫賠禮道歉，讓軍分區很被動。按分工，王志有、王金保與顧傑談，我找霍鳳林。

王志有、王金保和顧傑談過一、二次已取得了一致。我和霍鳳林的交談卻難以深入。他本人不修邊幅，被人戲稱“霍大褲襠”。但霍鳳林喜歡讀書，也喜歡和人討論。霍書讀得太濫，知道黑格爾、康德、費爾巴哈，但搞不清主要觀點是什麼。於是，我告訴他，誰是老師，誰是學生，誰繼承誰，哪一點上馬克思怎麼說。一席話，把他給震住了。他說，我到底是老師，還沒有人對他講得這樣清楚。

趙玉溫和哲盟三司的關係較好，從心眼兒裏厭煩霍鳳林、顧傑，不肯做自我批評。無計可施時，我們只好打電話向滕海清將軍報告，讓他和趙玉溫談。滕司令員來電話後，趙玉溫不再和我們頂牛，但思想並未通。顧、霍等人到軍分區座談，趙玉溫當面講了一些對不起之類的話，事情暫時平息。

十月初，我回到呼和浩特第三天，即十月八日，我的大兒子高桐出生。高桐之名，取自韓桐的桐。我心裏始終惦著一個過早離世的朋友和學生。他值得我敬重和懷念。

第二十九章

江青講話點燃內蒙“挖黑線”之火

1967年11月1日，內蒙革命委員會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吳濤、高錦明、霍道餘任副主任，常委除上面四人外，還有權星垣、李質、李樹德、謝振華（69軍軍長）、楊德松（內蒙獨立二師師長）、郭以青、郝廣德、高樹華、王金保、王志有、劉立堂、楊萬祥、那順巴雅爾、李楓、周文孝，以及張廣有（69軍副軍長）。

一，特古斯被抓，魯迅兵團垮台

內蒙革委會甫成立，便通過兩個決議：一是《內蒙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決議》；二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其中特別強調江青關於“群眾專政¹”的講話。

江青的講話，是指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江青向文藝界的兩次講話²。江青講道，文藝界“要重新大亂”，打破“死水一潭”的局面。11月27日，她又把這個攻勢，命名為“清理階級隊伍”³，並很快出現在毛的批語中，成為文革另一重要階段。

在江青點燃的階級鬥爭之火和新生政權第二號決議的召喚下，內蒙一批階級鬥爭急先鋒，以不凡的政治嗅覺，發起突然攻擊。1967年11月24日夜

¹ 如果列舉文革中最為百姓所痛恨的事情，除了“抄家破四舊”，恐怕就數所謂“群眾專政”了。恐怕“群眾專政”更勝一籌，呼市地區有民謠說：“不怕判刑坐監，就怕送到群專”。因為在“群專”名義下，可以任意逮捕、關押、刑訊，甚至秘密殺害，無須法律依據。

² 講話全文，見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辦公室秘書組1968年1月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選編》（三）（1967年10月-1968年1月）第36頁。

³ 江青1967年11月27日在《北京工人座談會上講話》，見原內蒙古黨委紅旗聯合總部編印的《紅旗內參》第176期，1968年6月6日。

間，呼市體委造反派負責人金永紅，帶領十幾人，把剛結合進內蒙革委會的老幹部特古斯，綁架到呼市北郊賽馬場一間辦公室，連夜審訊。

特古斯文革前任宣傳部副部長，文革中反烏蘭夫，支持造反派。中央八條決定後，特古斯被聘為宣傳口造反組織“魯迅兵團”顧問，還是經毛批准的內蒙革委會委員。這位不足一個月的委員突然成了敵人，成為全自治區第一個挖黑線對象。

綁架行為震驚了內蒙，造反派組織一時不知所措。體委造反派之舉，代表著一個叫“專揪黑手聯絡站”的組織（簡稱“揪黑手”），這些人均與內蒙革委常委、人保部副主任郝廣德有聯繫。至於郝廣德背後是高錦明、郭以青等老幹部，已不是什麼秘密。許多人相信揪黑手有來頭。所以，為占政治名份，紛紛寫大字報，支持揪特古斯的“革命行動”。當然也有不信邪的，就是魯迅兵團的頭頭，其中內蒙革委會委員白彥太、常委那順巴雅爾最突出。他們質問：“有什麼證據說明特古斯是壞人，是黑線？如此重大事件為什麼不和常委打招呼？揪新生政權的委員、常委有沒有批准手續？”遺憾的是，沒人理會這些正常而理性的發問⁴。關於特古斯“罪行”的材料，小報上越發越多，越炒越熱。

魯迅兵團是內蒙宣傳口最大的造反派組織，統管教育、衛生、文藝、出版、文化等基層組織，該總部出版《魯迅兵團戰報》。他們未料到，揪黑手已暗中鼓動魯迅兵團下屬組織“殺出來”。不久，許多下屬組織相繼宣佈，與兵團總部脫離關係，自行革命，總部隨之成為空殼。連《魯迅兵團戰報》也發生政變，更名為《新文化》，發表編輯部文章，指責“魯迅兵團向何處去？”：

⁴ 日後想來，我們這種書生之見，還是太迂腐。想想看，如果毛連中國的憲法都不顧，可以隨意把國家主席置於死地，他又何必顧忌什麼“革命委員會”呢！別說一個省級委員特古斯，就是欽定為接班人的林副統帥，為他鞠躬盡瘁的總理周恩來，到用不著的時候，不也一樣棄之如敝屣嗎？毛之所以要建立革委會，就是嫌原來那個黨政體系不好為所欲為。說到底，集權體制和帝王專政，只能奉行這種邏輯，什麼法制觀念，只是說說而已，不會當真。

……他們沒有認識到烏蘭夫、哈豐阿⁵ 集團的殘黨餘孽大量鑽在文化界這一事實。他們更不可能正確估計內蒙文藝界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尖銳性，對文藝界有些屬於捂著的單位出現的“亂”，錯誤地強調要“頂住”，或者不加分析地認為這種“亂”統統是“極左思潮”或老保翻天。⁶

1968年1月6日至18日召開的內蒙革委會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上，白彥太、那順巴雅爾作為右傾代表受到批判，兩個人再不敢追問“為什麼揪特古斯”，而是自我檢查，再檢查。

1969年，隨著“批烏”運動深入，白彥太、那順巴雅爾的境遇進一步升級，被懷疑與烏蘭夫、哈豐阿黑線有關，成為挖肅運動的“準對象”。不久前從迫害下衝出來的許多造反派，對挖黑線和揪黑手的舉動十分不解，故而行動遲緩，先後被扣上“右傾”帽子，再次陷入被批判的境地。

二，挖黑線的先鋒軍

誰是內蒙挖黑線的先鋒軍？許多答案只用一個籠統的革命造反派稱謂。真正稱得上挖黑線先鋒的，應是“揪黑手聯絡站”及其並肩戰鬥的一些組

⁵ 哈豐阿，文革前為中共內蒙黨委委員，自治區副主席。1943年前，曾參與組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即“老內人黨”）。

⁶ 見《新文化》1968年1月8日發表的編輯部文章：《魯迅兵團向何處去？》。請讀者注意，這篇文章，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找到的，在內蒙革委會成立之後，最早開始觸動民族問題和歷史問題的一篇叫陣文章，或者叫捅馬蜂窩的戰書。從此開始，發展到後來一發不可收拾的民族大迫害浪潮，若追究其始做俑者，很可能就是這篇文章。其特徵之一是向造反派開火。

當然，文章背後的政治角力是怎麼回事，在內蒙和中央上層，還有哪些人在暗中策劃等等，直到今天也不甚了了。這種混沌狀態，和中央上層對某些事情的刻意隱瞞，對某些人物的精心保護有關。

總之，經過兩年“挖肅”，滕海清等人把內蒙古搞得腥風血雨、鬼哭狼嚎、冤魂遍地。到七十年代初，平黑肅保糾幹死了太多營士人，感到大事不妙，趕緊下令糾偏，毀贓滅證，

織。他們是造反派中爲數極少的一些人，屬於造反派中嗅覺靈敏、觀點激進的政治高手。他們在1967年11月1日內蒙革委會成立之初，便先後進入各級革委會。此時的所謂“造反派”，陣線早已模糊不清，遠遠沒有一年前（中央八條之前）那麼壁壘分明。原來立場堅定的造反派（所謂老造反），多數已經“看破紅塵”，變爲逍遙派，對政治失去興趣。而許多原保守派、投機者，又重新打扮，再登舞台，甚至明確喊出“就是要老保翻天”的口號。

1967年11月底，揪黑手、揪叛等45個群眾組織聯合召開批鬥特古斯大會，拉出王逸倫、王鐸、哈豐阿、布赫、珠嵐⁷等陪鬥。此舉告訴人們，特古斯之後，還要揪更大的人物，即原內蒙黨委書記、人委副主席王再天。王再天同樣是內蒙革委會委員。

“揪黑手”聯絡著數十個大大小小的組織，他們的共同觀點是：內蒙文革的正確路線代表是高錦明，並以此劃線，既要揪出烏蘭夫、哈豐阿線上的人，又要排除異己，建造高（錦明）氏王國⁸。揪黑手並非一般造反組織。他們消息靈通，動作之快無人可比，一成立便佔據了呼市廳、局長小樓區中幾座空宅；他們有汽車，有出版物，有充足的經費，可以揪走新成立的內蒙革委會委員；可插手文藝、政法和黨委機關的運動⁹。一切說明，他們有堅實的權力支柱。待1968年1月15日呼市“群眾專政指揮部”成立，揪黑手等組

⁷ 當時布赫為內蒙古文化局局長，烏蘭夫長子。珠嵐（全名為珠嵐其其格）為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廠長，布赫之妻。

⁸ 當然，如果我們把“揪黑手”的背後之手，僅僅鎖定在高錦明身上，似乎有欠公允。高錦明背後還有推手，那就是前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及其背後的毛江康生等文革極左派，包括陳錫聯、鄭維山等北京軍區高層。高在解放戰爭時期，曾是謝富治的部下，在內蒙工作期間，也經常同謝來往。

高錦明發現“挖肅”走火入魔，及時剎車，既避開本人被挖，又巧妙地把火引向自己的政敵，可謂一舉兩得。如今，我們拋開派別觀點看高錦明，他終究做了一件好事。對於這一點，我們另有分析。

反過來看，高雖然也是運動的犧牲品，但比起郭以青，總算沒受牢獄之災。到目前為止，我們尚無法對“黑手內幕”深入追蹤，而官方所定的調子，無非是把髒水往幾個替罪羊身上潑。把如此規模的一場政治大迫害，僅僅歸咎於地方領導人的失誤和判斷力低下，不僅難令人信服，也讓受害者無法滿意。

⁹ 以上事實，說明這個組織背後，有更大來頭。如果僅僅是高錦明，他決不敢、也不可能背著滕海清和中央，做如此重大決定。這進一步證實了我們上面的推論。

織如虎添翼，抓人、抄家變得合理合法，他們用來關人的呼市賽馬場，成了群專使用最頻繁的刑訊地點。

三，文藝革命辦公室——“老右”

1967年11月中、下旬，江青講話後，滕、吳、高、權、李幾位認為，爲了落實江青講話，揭開內蒙文藝界的鬥爭蓋子，應該成立一個內蒙文藝革命辦公室，設在政治部之下，由我任主任，內蒙革委會委員、藝校紅衛兵負責人阿拉塔（女）任副主任。

此時，我已稍有閱歷，加之朋友點撥，我去新城賓館，向正在開會的幾位領導請示：“現在文藝界的工作很緊，昭盟那攤事還放不下，我到底先完成哪項工作？”

“你一定要集中精力把昭盟學習班搞好，爭取年底前成立革委會。文藝辦那頭的事先讓阿拉塔去辦。”這是滕、吳、高、權、李的一致回答。我半開玩笑地加一句話：“你們的答覆可要算數，別批評我對文藝辦領導不力，懷疑我在捂蓋子。”

“唉，你這個年輕人也學會囉嗦了，怎麼還不相信我們！”我在眾人的嘻嘻哈哈聲中離去。

1967年12月，內蒙文藝辦正式辦公，重點調查歌舞團和電影公司。從十一月份開始，呼市又出現“大亂公檢法¹⁰”“大亂文藝界”的口號，無數眼睛盯著內蒙文藝界的蓋子要怎樣揭開。內蒙師院的造反派伸出援助之手，以外語系俄三學生爲首，在內蒙文聯樓上建立了“鬥批改聯絡站”，開始在文藝界調查摸底。聽說“鬥批改”是師院外語系造反派組成，聯絡站的一間小屋立時熱鬧起來。學生們索性住在辦公室，來訪者半夜敲門也接待。

¹⁰ “公檢法”即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的簡稱。如同“砸爛中宣部閻王殿”這個口號的提出一樣，“砸爛公檢法”的口號，也是先由江青提出，又得到毛澤東支持。其目的，是爲了打倒同情劉鄧的前中宣部長陸定一和前公安部長羅瑞卿，從而奪回這兩個要害部門的控制權。

烏蘭巴幹當時是內蒙作家，他的“揪叛聯絡站”和“鬥批改聯絡站”在同一座樓內。烏蘭巴幹不僅透露了他對內蒙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的見解，還指責文聯另一個造反組織“翻江倒海”。爲此，烏蘭巴幹聯絡揪黑手的人，抄了“翻江倒海”幾個負責人的家。鬥批改聯絡站雖然對文化大院沒公開表過態，但傾向很明顯。他們在歌舞團支持多數派的紅旗造反團，不支持烏蘭巴幹和以“小人物”爲名的掃殘雲戰鬥隊。而烏蘭巴幹和“掃殘雲”的領軍人物孫玲玲，1967年冬至1968年春是內蒙挖黑線的明星。這兩位和內蒙報社一位編輯，人稱“挖黑線三大左派”。

在內蒙文藝辦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以工學院和藝校爲首的幾名成員，堅決主張文藝辦公開表態，支持烏蘭巴幹和孫玲玲，支持揪黑手、揪叛，歡迎他們進駐文化大院。多數人員不同意草率行事，理由是：我們不是群眾組織，是政權機構，不能隨意支持或反對誰，更不能無依據地抓人。雙方互不讓步。其中一人指著我說，“你當年是造反派中受尊敬的人物，現在右成這種樣子，真讓人想不到！”說完，摔門而去。

1968年1月6日至18日，內蒙革委會召開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自此，“挖肅”作爲今後的政治任務，從決議中正式下達。可是，文藝辦仍未找到揭開蓋子的支點。我們曾拿著內蒙歌舞團全體名單一一核對，發現該團大、小當權派均已被定爲反動分子，名演員、名導演和享受高薪的人不是停職檢查，就是進了“牛棚”。難道剩下這些20歲左右的小學員，不是小人物，是隱藏的大人物！我和文藝辦的同伴們真的左右爲難了。

社會上的挖肅一浪高過一浪，但內蒙革委會的指揮不如人意，滕海清辦公室（簡稱“滕辦”）成了風雲人物的朝聖地。內蒙二全會議期間，滕辦秘書和我有一次較長時間的談話。他們善意地提醒我：“你們文藝辦右了，起碼沒有站在鬥爭前列領導運動。”他們建議我找烏蘭巴幹、孫玲玲談談，或許受到啓發，我接受了建議。

與孫玲玲談了整整一天，她當時的丈夫在旁陪同。孫玲玲17歲從青島到內蒙歌舞團，被一些人欺辱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她的控訴內容每次都有差別。如，特古斯被揪出前，孫玲玲說特古斯是同情她的。特古斯被揪出

後，反而成了孫的控訴對象。即便是同情孫玲玲的人，也認為孫的控訴摻有假貨。

烏蘭巴幹要求只和我一個人談，但我按辦公室紀律，和張全棟聽取了烏蘭巴幹一整套“揪叛”的行動和方案。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四個演變”的理論，即內蒙共產黨是由內人黨演變的；內蒙的共青團是由內人團演變的；內蒙的解放軍是由偽蒙自治軍演變的；內蒙的幹部是由王公、貴族演變的。

我無法判斷這麼可怕的敵情之真假，反引起我的疑慮。我問他：“既然你把敵情說得這麼清楚，而且有根有據，只要辦個手續把這些人抓起來就行了，為什麼還要這麼費事去發動群眾？”

與烏蘭巴幹談話後，我對滕辦道明，儘管他提供的材料詳盡，我們也不能輕舉妄動，因為烏的證據太虛妄，只能表明兩種可能性：一是小說家的杜撰；二是烏本人起碼是個內人黨知情分子，與秘密組織不相干的人，不可能說得這麼逼真。

為此，我與滕辦人員爭辯。我說：“如果懷疑一個人就扣反革命帽子，先揪出來鬥著看，是反革命就打倒，不是反革命再放人，這和工作組的資反路線有什麼區別？我是從惡夢中走出來的，讓我無憑無證傷害人，我不幹。”

到1968年1月底，“內蒙文藝辦右傾”的說法，在革委會領導人、滕辦和挖肅積極分子中已成定論。

四，讓文藝辦“右”到底吧

自稱小人物造反的掃殘雲戰鬥隊，在無人可抓的形勢下，便把目光轉向樂隊，宣導“揭開歌舞團的蓋子，首先要砸開樂隊的大門”。據我們對樂隊逐人調查，其成員幾乎全為解放後音樂學院培養出的一代人，他們既沒歷史問題，也沒什麼現行行爲。他們的思想意識即便有問題，可通過大批判，提高自身認識來解決。我們的結論是，這個樂隊是紅色的。

我們文藝辦的觀點與歌舞團紅旗造反團的觀點是一致的，“掃殘雲”的“小人物”感到有壓力。自然成了我們一大罪過。

內蒙電影公司在1968年初存留著兩個組織。占多數的一個叫三·一八造反隊，曾是呼三司風雨同舟的戰友。隊長蔡桂芳為放映員，對公司瞭若指掌。本隊的婭茹和滿達兩人，已經被烏蘭巴幹盯上。李蘇君的問題，於文革前立過案，審查過，無疑也是烏氏的囊中物。婭茹是電影公司小幹部，蒙族，自稱三·一八戰鬥隊副隊長。有些材料，揭發婭茹在文革初期，曾掩護過昭盟軍分區副參謀長雲成烈。雲在前門飯店會議期間，公開揚言“上山打遊擊”，引起中央注意¹¹。又有人反映，二月逆流時，婭茹曾幫烏蘭夫黑幫骨幹轉移北京。滿達是電影公司一個科長，有偽蒙工作歷史，袒護李蘇君。

在對電影公司調查後，公安廳的馬娟等三個內行提出：沒有可靠證據，單憑“有人反映”就把人抓起來，將來自己被動。群眾組織可以先抓人，我們是政權機關，不能等同群眾組織。這個意見代表文藝辦所有人的看法。

與三·一八對立的組織，叫“韶山戰鬥隊”。很快，韶山派的材料到了滕辦，狀告我們在電影公司支一派，壓一派。當滕辦秘書向我出示告狀信時，我反問道：“你相信這份告狀材料嗎？”，對方不語。我更為惱火：“你沒說不信，就是相信。我真不明白，沒人相信革委會機關的日夜核實，反而相信群眾組織的誣告信！如果重證據反為右傾，我情願戴這頂右傾帽子。”

滕辦秘書並不氣惱，極力說明只是與我通個氣，他還說：“要抓緊時間，你們不搞，有人就伸手了。到那時，你們可真被動了。”

第三天下午剛上班，蔡桂芳急忙來報，當日中午，揪叛的人揪走了李蘇君，並抄了三·一八的辦公室，現在，李蘇君就在烏蘭巴幹手裏。蔡說：“今後李蘇君出了什麼事，我們概不負責。”文藝辦與烏蘭巴幹聯繫，烏蘭巴幹連同李蘇君已不知去向。

束手無策之時，我不得不動用呼三司糾察隊，讓他們去抓烏蘭巴幹，以揪對揪，以不合法對不合法。這一招果然奏效，晚飯前，我和文藝辦的人，終於在人委大院見到烏蘭巴幹。我對烏蘭巴幹說：“李蘇君是我們蹲點單位的人，你私自抓走，今後出了什麼問題全由你負責。現在你寫一份書面證明。”

¹¹ 關於雲成烈聲言“上大青山打遊擊”的事情，其他書籍也有提及。參見圖們、祝東力合著：《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116頁。

烏蘭巴幹正在火頭上，斷然拒絕我的要求。我警告他說：“烏蘭巴幹，別以為你可以想抓誰抓誰，我們隨時可以把你揪走，你還是懂點規矩好！”看到我十分強硬，烏蘭巴幹按我的話辦了。

這時，在內蒙文藝辦，和我一起工作的只有公安廳的馬娟、老金，還有內蒙軍區董福華、詩人黃河和師院的馬白、張全棟，連阿拉塔也認為我太右，離開了文藝辦。政治鬥爭中，多數人站在上風一方，正像《拿破崙傳》描寫他遭遇暴民時的一段話：“拿破崙神情嚴肅地看著暴民，聽他們嘶聲咒罵。這難道就是當年飛奔車旁，爭睹皇帝風采的人嗎？正是這些人！”¹²

從烏蘭巴幹處出來，隨行幾位一同返回辦公室。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靜，眼睜睜看著一些挖肅左派為所欲為而無力制止，繼而不解：官方既然放手聯絡站各行其事，何必要冠冕堂皇地設個文藝辦在這裏活受罪！在場的人明白：文藝辦不該存在下去了。

五，預感成真，姪茹失蹤

文藝辦的最後一件事，是分別找蔡桂芳、姪茹等直接對話，完成對電影公司的調查。蔡桂芳的話不無道理，她說：“傳說姪茹有這個那個問題，誰能擺出證據？1966年10月，烏蘭夫在《人民日報》上出現過，中央讓他參加了什麼會見。姪茹議論過這件事，但那是事實，不能說姪茹有什麼問題。”

最後，我們與姪茹面談。我問她：“你聽說過人們對你的議論嗎？”姪茹答：“知道，說我掩護藏匿過什麼雲成烈，說我把烏蘭夫手下的廳局長送到北京，說我為烏蘭夫翻案。可是，我至今不認識雲成烈，他怎麼可能藏在我家裏。如果我藏個生人，為什麼沒人出來證明？其實，我早想找你們談談，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歪，還是你們問吧。”

我們與姪茹一一核對，她很爽快地答覆了每個問題，不慌不忙，在場的三人用眼光交換看法：沒理由對姪茹立案審查。

¹² 德國著名傳記作家艾米爾·路恩維希 1929 年著：《拿破崙傳》，廣州花城出版社中文版，2003 年 3 月第三版。

雖然如此，潛意識告訴我，姪茹已經面臨險境。李蘇君抓走了，滿達被烏蘭巴幹隔離，姪茹還能自由幾天！與姪茹談完，她要返回單位。隨後，我和張全棟陪姪茹一塊兒下樓。

我問姪茹呼市有什麼親朋好友，建議她先不要回家。她反問我爲什麼，讓我一時語塞，難以說破心中的感覺。我望著她騎車漸漸離開大院，心中七上八下。下午，蔡桂芳來電話，急告姪茹沒回去，派人四下尋找，至今不見蹤影。第二天，滕辦問我姪茹去向，似乎懷疑我們文藝辦把她藏起來了。四、五天後，師院的人告訴我，長纓戰鬥隊抓了一個女黑幫，是內蒙電影公司的。

1968年3月初，新成立的內蒙核心小組成員滕、高、權找我談話，準備撤銷內蒙古文藝辦，讓我回政治部工作，暫管毛澤東思想萬歲展覽，兼管毛紀念章的製作（後來，被朋友戲稱孫悟空當過的“弼馬溫”），原文藝辦的工作移交政治部文教組王金保，人員全部回原機關。當場，沒人批評我右傾或什麼錯誤，但也沒有肯定文藝辦的工作，連一份書面總結也沒讓我交。

兩個多月來，文藝辦全體人員，認真地調查研究，嚴謹地核實材料，以科學的、人性的態度工作，竟如此輕率地被揮之一去。那麼，調查報告是否依慣例上交？有經驗的公安廳兩位提醒我，書面調查最好不交，文字落在誰手裏都是“證據”。他們感到危險已逼近我。事後證明，馬娟和老金的預見極準。

文藝辦朋友同感欣慰的是，忙碌了幾個月，我們從未支持過任何組織、任何人去揪鬥誰；遺憾的是，辛苦換來的是無疾而終。大家懷著迷惘心緒，悄聲離散，互道珍重。

第三十章

“第五縱隊”和三個包圍圈

1968 年充滿變數。突發事件、形形色色的組織和聯絡站、令人迷惑的口號、各種獨特理論接踵而至，讓人目不暇接。

1968 年又是失控的一年，局部武鬥逐漸演變成全面內戰。這年夏季，大專院校紅衛兵中，許多人患了“武鬥病”，蔓延全國，一直驚動了毛領袖。

一，“群眾專政”煞是了得

1968 年 3 月 22 日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¹，掀起了反三右一風（即右傾保守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及右傾翻案風）的巨大鬥爭波²。人們手中揮舞的全是反右，只有反右才能襯托出左派的革命堅定性。此時，文革旗手江青頻頻點火，繼續發出“群眾專政”、“文攻武衛”的號令，遂演化出許許多多非常事件。

內蒙乘全國反右傾的東風，把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簡稱“挖肅”）的鬥爭之火越燒越旺，繼特古斯之後，另一個“隱藏得更深的敵人”王再天於 1 月 28 日被揪出來，挖肅的新高潮隨之湧起。1968 年 1 月 15 日，“呼和浩特市群眾專政指揮部”（簡稱“呼市群專”）成立。總部負責人叫戈志盛，是師院的政工幹部。這個組織在軍區圍攻東縱大樓時，曾以造反派前線指揮部名義行動。17 日夜，群專在呼市廠礦、學校、機關、居民點搞了

¹ 中共中央“中發”（68）52 號命令（1968 年 3 月 22 日）中稱，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撤銷他們各自的職務。轉引自上述《紅旗內參》第 107 期，1968 年 3 月 29 日。

² 毛澤東當時發表的“最高指示”是：“1，要繼續打擊二月逆流翻案；2，要三反，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轉引自上述《紅旗內參》第 216 期，1968 年 7 月 12 日。

一次大搜捕，“範圍之廣、規模之大、深入程度、組織紀律性都出乎意料之外……從而狠狠打擊了階級敵人。”³

之後的一個月，呼市群專連續幾次出擊，抓了一大批國民黨殘餘勢力、地、富、反、壞、右及烏蘭夫、哈豐阿黑幫分子。

這個群專指揮部直屬內蒙革委會、呼市革委會兩級領導。因抓人太多，原揪黑手佔據的賽馬場已人滿為患，便在呼市西區的呼市鋼鐵廠（簡稱呼鋼）、四合興開闢新址，從各單位抽調工人和解放軍組成審查小組。當時，大部分革委會常委，起碼像我這種群眾代表身份的常委，並不知道它是怎麼策劃，怎麼出籠的，是哪一級政權機構批准的。當這些“偉大成績”展示於世，誰還敢問其如何出籠的問題！誰還敢當唱反調的角色！

呼市群專的成立，很快帶動全區，基層群專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效法，頌揚群專豐功偉績的講話和文章如雷貫耳。內蒙革委會政法委員會主任李樹德說，群眾專政真正發動了群眾，教育了群眾，“出現了妻子檢舉丈夫，兒子檢舉老子”的生動場面。⁴

當然，人們未曾料到，群專組織在後來的“內人黨”慘案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1968年一、二月份，內蒙古的挖肅及群專工作，均得到了黨中央的肯定。1968年2月4日，中央首長在接見赴京匯報的滕海清、李樹德時，對內蒙的工作很是讚賞。誰再公開反對挖肅，無異於反革命；誰跟進的腳步遲疑緩慢，必遭圍攻和討伐。看來，造反派隊伍的大亂，終將成為事實。

二，“第五縱隊”的故事和左派檄文

剛剛成立的中共內蒙核心小組，感到心急的不是群眾，而是各級領導機構（首先是內蒙革委會常委）挖肅不得力，大大落後於“廣大群眾”。故內

³ 引自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委李樹德，於1968年6月14日在呼市群眾專政總指揮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上的講話。

⁴ 資料來源同上。

蒙革委連續召開常委會，解決常委們的認識問題，成了當務之急。

在常委會上推波助瀾的是兩位領導的發言。一位是高錦明，幾次重複“第五縱隊”的故事⁵；另一位是郭以青，以撼人肺腑的講話，號召人們爲革命甘灑熱血。

高錦明作爲主持內蒙常務工作的重要負責人，在常委會上反復講這樣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不會是無所指的，他希望在常委內部發生激烈碰撞，或者讓常委班子大亂。

郭以青的職務在核心小組成立後，已由政治部副主任升爲主任，是常委之一。但他與核心小組成員高、權、李等人的關係，可算是老班底、老夥伴，郭與誰走得最近，他的話即能代表誰，這在常委、委員與許多造反組織中不是秘密。下面摘要引述郭在常委會上一次發言：

現在的階級敵人遭到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打擊後，變得越來越狡猾，狡猾到革命者要識別他們已經十分困難的地步。因此，革命的複雜性和艱巨性，讓我們革命陣線內的同志不得不付出必要的犧牲和極大的忍耐。

如一個烏蘭夫死黨分子就隱藏在我們中間，隱藏得很巧妙，讓我們無法抓到他們任何把柄和證據證明他就是敵人，即便我們已經感覺到了，分析到了某種可能性。我們面前只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不敢去挖，讓他隱藏下去好了；第二種是不管敵人多麼狡猾、難辨，不必等證據非要搞到十有八、九，我們要冒著可能傷害自己同志的可能，不手軟，堅決把挖肅鬥爭進行下去。我是贊成第二種辦法、第二種態度的。

……可是，如果我們決心去挖敵人時誤傷了自己的同志怎麼辦？我會真心去賠禮道歉，下跪叩頭也行（說著，他做了一個示意動作，

我敢肯定地說，被誤傷的同志階級鬥爭覺悟是高的，他會理解革命的複雜性。他們會理解被誤傷實際上也是一種對革命的貢獻，是另外一種更加偉大、光榮的貢獻。沒有他們這種偉大的犧牲精神，隱藏的敵人會繼續得逞，被誤傷的同志終究會諒解我們的。

如果是這樣的，我們不應該怕犯誤傷的錯誤而放棄已發現的挖肅線索。我的意見是，只要有線索就挖下去，邊挖邊找證據，再定性。……

我個人最不怕犯因為打擊敵人而失去準頭兒，誤傷自己同志這種錯誤。犯這種錯誤，起碼在我心裏可以自慰的是，我沒有放過敵人，我主觀上是積極革命，勇於戰鬥的，我起碼對得起共產黨員這個稱號⁶。

未經政治運動反復顛簸的人，是講不出郭以青這套十分有特色的話的，真可謂是一篇出色的左派檄文。滕海清聽後讚不絕口，高錦明滿臉笑容。也有人能聽出弦外之音，王志有一散會便悄悄對我說：“不怕誤傷好人，不要證據，郭以青瘋了。”

得到黨中央首長肯定了的挖肅，在此類故事和檄文的號喚下，一步步進入癡狂狀態，類似郭以青這樣的左派瘋子不止一個。

三，滕海清講話包圍文化大院

揪叛、揪烏、揪哈等挖肅左派的聯絡站，除了對文藝界（稱文化大院）虎視眈眈，同時也把目光盯住內蒙黨委大院和師範學院大院。他們提出要真正揭開內蒙古的階級鬥爭蓋子，必須首先撬開三個大院的門檻。這一論調儘管受到一些人的抵制，但高錦明、郭以青十分欣賞，支持者還有滕辦主任李德臣。領導的態度回饋到社會，各聯絡站、群專立即行動，對三個大院進行政治包圍，當時稱之“三個包圍圈”。

⁶ 郭以青講話是根據作者的會議記錄整理而成，此記錄曾與數位參加會議的其他常委核對過，主要內容沒有出入。

文化大院首先被攻克。內蒙文藝革命辦公室撤銷後第二天，內蒙革委會常委、文教組組長王金保帶領工學院井岡山進駐文化大院，宣佈支持烏蘭巴幹爲首的揪叛聯絡站和內蒙歌舞團孫玲玲的掃殘雲戰鬥隊。沒用幾天功夫，文藝界各單位的所有懷疑目標，均進入學習班，蹲了牛棚，有的則送交群專審查。歌舞團還設立了兩個專案組，其中二號專案組借審查歌舞團造反派組織“紅旗”的頭頭和骨幹，秘密調查內蒙文藝革命辦公室如何捂蓋子，調查重點顯然集中在高某人身上。

內蒙歌劇團、內蒙文化館等單位的造反派組織，也紛紛被原來站錯隊的“小人物”造了反，奪了權，或被審查或靠邊站。只有內蒙古京劇團基本保持原來局面，因爲江青支持的現代京劇《草原英雄小姐妹》要繼續排演，沒人敢在江青頭上動土。

文化大院的大動盪使領導們十分滿意，他們稱讚“階級鬥爭蓋子揭開了”，“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1968年3月27日上午，內蒙挖肅最高司令官滕海清將軍，在革委會禮堂對內蒙古文藝界作了一次有影響的報告，會議主持人是內蒙革委會常委王金保。這個3.27講話後來被許多人褒貶爲“文藝界挖肅鬥爭轉折點”。

滕指出，從1967年江青講話後，“一潭死水的文藝界活躍起來”，前後經歷了三起、三落的反復。

“文藝界這場鬥爭的三起、三落說明了什麼呢？……文藝界的烏、哈反革命勢力，有比較強大的社會基礎，……同時還說明我們的隊伍、組織裏邊有嚴重的不純，混進了一些壞人，某些組織受了壞人、變色龍的操縱……”

滕海清最後說：“內蒙古文聯的重點主要是叛國文學，可能存在叛國集團。”“文聯也可能是裏通外國的一個基地。”之後，滕又把話題轉回內蒙歌舞團。“這隻黑母雞，最黑的部分是樂隊，樂隊出壞人最多，現在還有壞人在幕後操縱，控制群眾，控制群眾實權……。”

滕海清大開殺戒，幾十句話便把內蒙歌舞團100多人中的70%以上打入被審查之列，幾十年的內蒙古文學被判了死刑。

這個報告的另一個影響是可以想像的。一時間，內蒙文藝界多數單位的

造反派頭頭陷入四面楚歌之中，造反骨幹忙於檢查右傾，被迫殺頭頭的回馬槍，群眾再次重新站隊，孫玲玲、烏蘭巴幹等挖肅左派成了最大贏家。

內蒙古文聯的大部分作家，仍團結在“翻江倒海”這個造反組織周圍，與烏蘭巴幹的揪叛聯絡站拼命抗爭，他們不解散也拒絕檢查，不承認“叛國文學”的結論，一直堅持到下一輪挖“內人黨”高潮時，才全軍覆沒。即使如此，他們也始終未認可烏蘭巴幹“革命左派”的稱號。

四，黨委“紅旗”抵抗包圍

在內蒙古黨委大院，紅旗總部是最大的一支造反派隊伍，其全稱為內蒙古黨委機關紅旗總部，下屬有內蒙團委、監委、宣傳部、行政處、組織部、人事局等幾十個造反派組織。

紅旗總部在挖肅中處於戰略核心位置。他們在1968年2月10日發出《關於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全面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倡議》。在倡議書中，除了分析形勢，紅旗總部也做了自我批評，他們說：“我們紅旗總部從揪特古斯以來有比較嚴重的右傾，領導不力，跟不上形勢，跟不上群眾，運動開展得冷冷清清。”倡議書最後表示，按照文化大革命十六條中“群眾自我教育”的精神，紅旗總部定會引領黨委機關幾千名幹部、工人把挖肅鬥爭開展起來。

當時，內蒙黨委直屬機關的幹部，多是解放後畢業的二、三十歲的大學生，其中北大、清華、人大、南開、復旦等名校的畢業生很多，他們的政治能力本不應受到質疑。

別有意味的是，“三個包圍圈”的導演並不理會紅旗的倡議和自白，對黨委大院的包圍圈迅速形成。從“揭開舊內蒙黨委階級鬥爭蓋子”等大標語上，紅旗總部的頭頭們真實看到，揪派要逼迫“紅旗”成為魯迅兵團第二。於是，他們一方面公開申明對挖肅的積極態度，及時部署各戰鬥隊貼出一批批揭發材料，其中有指向烏蘭夫、哈豐阿線上的，有針對國民黨人員的。

引起新一輪衝突的是揭發原組織部負責人的大字報，特別是寫給雷代

夫、張魯、郭以青的大字報，及與高錦明商榷的大字報。上述這些人是前門飯店會議的反烏蘭夫左派，在內蒙文化大革命中始終與高錦明、權星垣保持一致，在揪黑線時，把這些人揭出來亮相，必然會觸動不少人的神經。

揪派認為，“紅旗”的大字報是在轉移鬥爭大方向，攪混水，是在開闢第二戰場。紅旗總部反唇相譏道：“你們歷來不是主張先揭出來看，是好人就不怕揭發，是壞人就跑不掉。爲什麼我們剛剛揭發，你們就開始畫框框，究竟你們有一個可揭、可不揭的標準嗎？”造反派與造反派之間的混戰就此拉開序幕。

“紅旗”的大字報確實觸動了一些人敏感的政治神經。張魯，內蒙革委會成立後爲內蒙革委會委員、辦公室主任，列席常委會。極少張口的他，看了給自己貼的大字報後，在常委會上說：“我們多少年和烏蘭夫一起工作這是事實，如果這就算他的老班底，那就把我們也揪出來算了，還分什麼革命的、反革命的！”他的話立時得到另一位列席常委會的雷代夫的回應。

群眾鬥群眾及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混戰，引起滕海清和滕辦人員的注意，他們認為這很不正常。經過一番調查後，滕海清產生了新的疑問：爲什麼不允許內蒙黨委大院的幹部和群眾揭發有問題的人和事，非要劃定框框？是誰在背後搖羽扇，是誰在指揮對黨委紅旗總部的圍攻？是誰給他們扣上了“開闢第二戰場”的帽子？有人提出“高錦明是內蒙文革正確路線的代表”，又是怎麼一回事？

1968年初，滕海清派人阻止了這場群眾鬥群眾的鬧劇，對內蒙黨委大院的圍攻暫且停歇下來。

五，東縱派系演變始末

不論從哪個方面說，內蒙師院這個大院，是無法與文化大院、黨委大院相提並論的。在內蒙古高等學府中，師院是次於內蒙古大學的二流學院，在內蒙古教育界也算不上重點關照的地方。人們心知肚明，包圍師院大院是衝著師院的高派來的。

內蒙師院東縱內部的派系問題，正像李德臣在 1968 年 3 月接見呼市群專《聯合戰報》部分人員談話中所說，師院的派性是由來已久的，而且一直沒有解決。

前文提及，1967 年 1 月，東縱內部有過一次總部整風，爭議“老總部”和“臨時總部”問題。經全體紅衛兵大會表決，臨時總部自動解散，但該總部的成員及其圈內人，本對我的背景疑慮重重，這次由我主持的紅衛兵大會所作的決議，讓這些人耿耿於懷。劉文研（政教系教師）、戈志盛（人事處幹部）等，加上老總部勤務員秦維憲（保衛處幹部），逐漸聚攏為師院東縱另外一個核心，一個“影子內閣”，大多數教師、職工是他們的支持者，秦維憲是領軍人物。

1968 年 4 月，中央八條下達前後，師院東縱總部再次發生衝突，一位臨時總部成員和一位老總部成員互相指責在二月逆流中向軍區登記投誠，是“叛徒”，為此，總部分為兩派爭論不休。當時局勢不允許東縱發生分裂，滕、吳、高、權、李等領導出面干預，這件事被壓下來。

我在總部內總結此事時說，沒有材料和事實可證明 XXX 去過軍區，而中文系六位老師也證明 XX 沒離開過大樓”。我認為自己的意見是公正的，但 XXX 認為不公正，由此對我更為不滿。秦維憲等人站在 X 一邊，當然對我也多有微詞，在許多事情上總部內常有分歧，比如：如何對待站錯隊的師生，東縱軍訓問題，特別是解放師院原黨委書記紀之等問題。運動初，我是校內給紀之第一個寫大字報的人。通過這位老人幾年的表現，1968 年我極力主張解放紀之，遭到秦維憲等人的堅決反對，所謂高派與秦派的矛盾逐漸深化。

1968 年，高派人數愈來愈少。以教師和幹部為骨幹的秦派，無論在校內或社會的大組合上，始終是呼風喚雨，遊刃有餘。

隨著學生畢業分配，高派只在呼三司這個學生組織內留有一席之地。沒有多少人馬的高派很難稱之為派了。高派這個“高”字源自我的姓，但從我被迫接受這個事實起，我從未在這面空鏡子上鑲嵌過什麼。我無力為任何人的政治命運負責，更無意拉一支隊伍加入社會的角鬥，我勉強應付著從革委會到社會派系間的襲擾。至今，我仍搞不清師院兩派的演變細末，但我又不

能無視其存在過的事實，不能無視內蒙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扉頁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師院東縱。

六，七人黑信與 3.18 專案組

師院揪烏聯隊成立後不久，在校內造輿論，“師院有一個年輕的反革命小集團”。在反革命小集團前特冠以“年輕的”三個字，校內人知道這支箭是射向哪裏的。但師院高派，以留校學生郭是海、董玉華等人爲首成立的紅星聯絡站，未予應戰。十多天後，揪烏聯隊火上澆油，稱“師院年輕的反革命小集團，是爲烏蘭夫翻案的”，紅星仍無動靜。又過十餘天，揪烏聯隊在輿論戰後，將暗器拿將出來，“這個爲烏蘭夫翻案的反革命小集團，曾寫過一封黑信，參與此事的共 7 個人。”配合揪烏聯隊行動的揪黑手、揪叛及不少組織在師院院內貼支持揪烏聯隊的大標語，“堅決查清七人黑信的後台”。圍剿師院紅星的三陣戰鼓，一陣緊似一陣。

事情到了這步，紅星被迫應戰，開始追蹤七人黑信問題。只有幾百名師生的紅星並不畏懼圍剿，他們明白，師院內部問題的解決只能靠師院的人，外單位的標語只不過是臨時湊來的“熱鬧”。當揪烏聯隊亮出“七人黑信”的具名是“姜振華等七人”時，紅星的應戰艱巨起來。

姜振華是外語系英語四年級學生，當時剛剛畢業留校，曾在文革中任師院東縱保衛部部長。就私人關係，姜振華與秦維憲走得很近，因爲姜振華夫婦與秦維憲的新婚妻子同爲伊克昭盟人，姜與秦妻過去認識。以此推斷，姜是秦派的人並無不可。

但姜振華是外語系的人，師院外語系除個別學生暗中參與秦派某些活動，幾乎都是紅星聯絡站的中堅。姜振華被點名，讓紅星陷入窘境。

1968 年 3 月 18 日，師院揪烏聯隊在內蒙革委會領導人高錦明、李樹德、郭以青等人支持下，在位於呼市南郊大台村的內蒙農業學校成立了 3.18 專案組。他們花費大量資金，把當時能找到的烏蘭夫家族成員全揪到這裏，主要有：烏雲其其格，烏的女兒，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學生；烏蘭托婭，烏

的女兒，呼市第十四中學生；蘇尼特，烏的兒子，北京 101 中學學生；楊珍雲，烏的兒媳婦，力沙克之妻，中央民族歌舞團演員；青戈，烏的孫子，布赫與珠嵐之子，呼市十四中學生；石林，又名鐵旦，烏的外孫，石光華、雲曙碧的兒子，哈爾濱軍工學院學生；石小紅，烏的外孫女，內蒙古藝校學生；塞小燕，烏的侄女，雲曙芬的女兒，北京政法學院學生；雲瑞庭（又名蘇力），烏妻雲麗文的弟弟，內蒙醫院中醫大夫等等。

該專案組的目的，主要是讓烏家人編造爲烏蘭夫翻案的事實材料，要他們把翻案活動，與師院姜振華連在一起，讓他們提供姜振華後面的神秘人物是高樹華的證據，隨之把用口供編好的材料一份份上報中共內蒙核心小組的領導。1968 年 5 月 21 日的一份上報材料中，點出師院外語系教師劉慶榮、梅青田等人的名字，並以不容質疑的口吻做出結論曰：“這裏邊提到的人，通通是力沙克的親信，或烏蘭夫安排在師院的嫡系班底的親信，通通是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又說，“力沙克就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這個集團中有力沙克的代理人，還有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座山雕。”3.18 專案意在揪出高樹華已不容置疑。他們甚至把與師院外語系完全無關的我的妻子宗馥華，也列在反革命集團之內。她當時不過是一個剛剛畢業的 20 多歲的中學教師。

第三十一章

打倒假洋鬼子

魯迅名著《阿 Q 正傳》明示一個真理：中國的造反者歷來無好命運，即便是當了皇帝的乞丐朱元璋，也把貧苦農民踩在腳下，與歷代皇帝老兒毫無差別。

一，誰是假洋鬼子

1968 年 2 月 26 日，《內蒙古日報》頭版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打倒假洋鬼子》，引起極大反響。文章指出，文革初站錯隊的群眾要起來挖黑線，積極參加挖肅，受到趙太爺一類假洋鬼子的壓制。要想真正發動群眾，必須解放受壓制的小人物，必須允許過去站錯隊、受過蒙蔽的人起來革命，因此必須“打倒假洋鬼子”。

人們自然產生疑問，誰是假洋鬼子？雖然文章未明指是造反派，然而字裏行間影射的明明白白。造反派都不理解，自己從來是一介百姓，何時成了壓制別人的大人物！造反派剛剛被解放不到一年，怎麼又成了打倒對象？於是，“造反派受壓”的怨氣很快瀰漫，有的乾脆稱之為“帶鋤的資反路線”。

1

滕辦主任、核心小組辦事組組長李德臣接見呼市群專《聯合戰報》記者時說：“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造反派已經發展到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地步。……現在已經到了觸動老造反派靈魂的時候了。”當時全國各省市，幾乎念著同

¹ “帶鋤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由“帶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演繹而來。本來是指 1967 年春天的“二月逆流”，即奉命“支左”的解放軍，站在保守立場上鎮壓造反派。這次是革委會成立之後，利用“挖肅”，對造反派的再次打擊。鋤指鐵鋤，形象比喻“挖肅”鬥爭挖到了自己頭上。

一本經。²

呼三司、河西 818、鐵路火車頭、華建井岡山等，是內蒙最大的幾家造反派組織，他們在挖肅中的尷尬和無奈最具代表性。

呼三司從挖肅開始，在輿論上毫不示弱，給人以緊跟的印象，實際行動卻是另一回事。《呼三司》報於 1967 年 11 月始連發三篇本報編輯部文章：《徹底摧毀內蒙古文藝黑線》，《把文藝界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橫掃烏蘭夫在文藝界的反動勢力》，並在全區大、小報上轉載。這些文章口號響亮，也算振振有詞，但文中沒有目標和內容。一些聞風而動的行家裏手，趁亂脫穎而出，成為挖肅左派。造反派中的大多數是有理性的，他們之所以在運動初期有膽量造反，乃是因為他們有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如今，無法摸清運動脈絡，寧可戴上右傾帽子，充當假洋鬼子角色。

二，滕海清剖析呼三司

1968 年 4 月 14 日，一把手滕海清接見呼三司常委及工作人員，對呼三司挖肅以來的表現做了一番剖析。滕海清直言不諱：

“在挖肅鬥爭中，三司中有些單位起了先鋒作用，但是整個三司來說，我感到是不滿意的。”……

“文化革命從始到終都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三司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還是站在十字路口上，三司領導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立場問題沒解決，思想上就不可能解決。”

² 為什麼到各地相繼成立革委會之後，毛江文革派要把矛頭再次對準造反派，對這個問題，目前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說明。大體有三種流行說法：一是毛的繼續革命論，不停地深挖階級敵人。這種解釋流於表面，難以服人；二是“卸磨殺驢論”，即毛江文革派已經實現了他們打垮劉鄧的目的，青年學生已經沒用了。這種解釋有一定道理，但仍然流於片面。即使沒用，也不一定非要打擊，因為製造新的社會緊張，未必有利於毛江穩坐江山；三是說造反派的繼續存在，已經開始衝擊毛的權威，威脅到政局穩定。極左思潮抬頭，校園武鬥擴大等等，超出毛的預料，逼迫毛江把打擊矛頭轉向造反派，以維護自身權力。我們認為，第三種解釋比較令人信服。

作為內蒙最高指揮官，把話說到這份上，足見問題的嚴重性。

他還說：“呼三司主動的也有，醫學院、工學院就比較主動。”在座的人全明白，是社會上揪出了王再天，拔出蘿蔔帶出泥，醫學院問題（書記、王的夫人張暉被揪出）就是這根大蘿蔔的泥，才落得個“主動”。自從工學院井岡山把孫玲玲、烏蘭巴幹等挖肅左派扶起來，從此烏蘭巴幹、孫玲玲找到了“娘家”。工學院井岡山與滕辦始終保持熱線聯繫。“工學院井岡山是滕辦御林軍”的說法不脛而走。接下來，滕海清的批評開始具體了，他說：

現在，你們呼三司有些大學那麼被動，搖擺性那麼大，什麼原因？已經搖擺到敵我不分，顛倒是非了！烏盟報社一個月放了那麼多毒，可你們沒有反映，我們驚訝。沒有抵制，抵制不力，已到了是非不分，敵我不分，很危險……我想起來很痛心。

《烏蘭察布盟日報》於1968年3月26日公開撰文向挖肅挑戰之後，烏盟盟府所在地集寧市的造反派組織“紅炮兵”，派十餘名紅衛兵到呼市刷大標語，直指挖肅運動和滕海清，如“內蒙日報的《打倒假洋鬼子》是大毒草，必須作出檢查！”“報告滕司令員：革命造反派又開始受壓了！”標語驚動了滕辦，他們立即下令呼市群專派人撕掉。滕海清未曾料到，集寧紅炮兵到呼市是赤手空拳，他們張貼大標語的紙、墨、筆及交通工具全來自呼三司。可惜滕海清蒙在鼓裏，否則他會更加暴跳如雷。

接下來，滕海清講話結尾說得更具體了：“雷善元怎麼那麼搖擺？你們‘三元’不要搖擺了。三司要反對兩面派，說到就做到，搞兩面派我就要找你。過去搞了，不要算舊帳了。”“長纓戰鬥隊總是跟我們唱對台戲，名為戰鬥隊，實為消防隊，這樣搞下去會垮台。”

雷善元，內蒙商都縣人，外語系俄三學生，班團支部書記，文革開始便參與造反。1967年1月抽到呼三司後，一直負責領導工作，協助他的還有辦公室主任薛貴元（師院化一學生）、宋福元（師院俄三學生）等。滕點的“三

元”即雷、薛、宋三人，在師院均是高派觀點。“長纓”的主要成員是師院漢三紅衛兵，他們最早介入內蒙文化大院的事，在內蒙文聯支援“翻江倒海”，反對烏蘭巴幹的揪叛；支持歌舞團“紅旗”，質問誰是假洋鬼子，令挖肅派非常惱火，滕海清更不舒服。

當滕海清點“長纓”大名時，他們正處境窘困。長纓戰鬥隊抓走婭茹後，在師院文史樓一間教室審問。婭茹回答了所有問題後不再開口，雙方對峙幾天幾夜。婭茹不堪忍受，趁看守不注意吞下隨身的鑰匙鏈。幸虧發現及時，沒出人命，長纓隨即把婭茹交給她的家人。從此，長纓再無鬥志。1968年夏開始畢業，他們希望早日離開是非太多的內蒙師院。

幾十年後，原長纓的紅衛兵，差不多都從內蒙各地中學退休，官職最大的是副市長和電視廣播局長。我曾與退休後的他們會過面，談起這段事，他們感慨萬千，一個小戰鬥隊竟惹得滕海清火冒三丈。只是覺著愧對婭茹這個人。她應該算英雄，始終沒隨便咬誰，人格很正。說話時是2002年夏，滕海清已離世五年多。

三，三大組織陷入困境

河西公司、呼和鐵路局、華建公司是當時呼市地區三個較大的國家企業。河西818、鐵路火車頭、華建井岡山所以一度成為內蒙產業工人造反代表。

河西公司地處呼市東郊，隸屬國防科委下的七機部，擔負航天器研製。最早是軍隊編制，絕大多數人有過軍職。河西公司818成員，幾乎個個穿黃綠色軍服，只是沒有帽徽領章。該單位的造反與保守分野特殊：818幾乎全部是科技人員，而保守派“紅色聯合會”（簡稱紅聯）幾乎全部是服務人員，如商店、郵局、車隊、食堂等，自稱是“八大員戰鬥隊”，科技人員很少。³

³ 在河西公司，“八大員”基本上站在保守派一邊，而在內蒙師院，“八大員”基本站在造反派一邊，原因何在？值得分析。這恐怕和本單位內部的社會分層有關。在內蒙師院，八大員和學生一樣，都受到黨委和工作組的壓制，因此一塊起來造反。而在河西公司，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科研人員，多數為大學生，在單位內部的社會地位，高於後勤服務人員，當他們在七機部影響下，起來造反的時候，其內部的底層人物，很容易在呼市保守派（多

中央八條下達後，河西公司也曾有過激烈武鬥，經過大聯合過程，河西公司很快成立了革委會。挖肅運動潮起，讓河西公司再生事端。由於內蒙支持小人物造反和打倒假洋鬼子，河西公司冒出一個叫“新紅聯”的組織。新紅聯得到國防科委領導支持，矛頭對準 818，成為河西公司革委會之外的第二中心。

1968 年 5 月 4 日凌晨，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接見國防科委軍管會代表及群眾組織代表時，王志有告訴總理，國防科委支持新紅聯，科委副主任、軍代表劉華清公開反對河西公司革委會。818 一統天下時，河西公司的革命與生產在七機部各單位是最好的。1968 年，新紅聯冒出來後，818 再沒安穩日子。王志有無力改變內蒙“挖肅”和鼓勵小人物造反的決策，無法左右河西公司的局面。直到 1969 年九大後，內蒙掀起批滕狂潮時，王志有及 818 奮起批判滕海清。他們認為，滕是支持新紅聯，壓制 818 的罪魁。1970 年，內蒙軍管後，軍管扶植新紅聯，並趁恢復黨組織之際，取締 818 造反團。原 818 的頭頭多隔離審查。其中，嚴桐林被判刑；孫景山以破壞設備罪被處死刑（後查實屬冤案）。

呼和浩特鐵路局（簡稱呼鐵局）“火車頭”起源於機務段。火車司機劉立堂、劉國慶等，運動初期因給當權派貼大字報而遭到鎮壓。批判資反路線時，他們成立了火車頭造反隊，發展為火車頭造反總部。二月逆流時，“火車頭”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原呼鐵局書記胡長倫、局長馬林，公開站在“紅鐵戰士”一邊，參與圍攻內大和師院。在局機關，火車頭觀點的幹部屬少數。1968 年初，呼鐵局革委會成立，接著成立路局黨委，胡長倫重新上台，任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書記和主任由軍管會主任夏一超擔任。火車頭本以工人居多，因此，發號施令的黨委多數幹部仍是原來的局機關幹部。挖肅開始，全局上下挖肅班子很快建立，火車頭組織層層告急，許多單位發生內亂：一方是手握實權的新生政權，另一方是被中央肯定過的造反組織。1969 年批滕時，劉立堂為首的火車頭，曾揪住滕海清不放，主要原因在此。

內蒙華建原是建工部下屬較大公司。二月逆流中，華建井岡山是人多勢

眾的造反派隊伍，而華建井岡山的對立方在紅衛軍、無產者中也是生力軍。霍道餘是華建的汽車司機，他以工人代表資格，被結合為內蒙革委會副主任，在建工部系統名噪一時。

內蒙挖肅伊始，原保守派中堅分子，借鼓勵小人物造反之名，重新造勢，在華建內成為霍道餘的一塊“心病”。

河西公司、呼鐵局、華建均是國家部屬單位，烏、哈黑線在這幾個單位中存在的機率太小，黑線怎麼挖法？華建井岡山也曾組織過挖肅現場會，勉強作秀，只不過濫竽充數，裝裝門面。

挖肅帶來的混亂，已不可遏制。但發動與領導挖肅的內蒙主要領導人滕、吳、高、權、李等人，一味批評各造反派組織右傾，使多數造反派組織陷入困境。呼三司、818、火車頭、華建井岡山等組織，在內蒙文革中的砥柱作用已經動搖，正在被飛速轉動的階級鬥爭車輪甩在一邊。

四，《烏蘭察布盟日報》事件

內蒙革委會把反右傾與挖黑線連在一起，而且反右傾主要指向革委會與造反派領導人，使結合進革委會的一些幹部、群眾代表及各地造反派頭頭，十分尷尬且惶惶不安。

烏盟革委會所在地集寧市，當年駐有三方部隊：京字 411 部隊政委周發言，內蒙軍區騎五師師長武尚志，烏盟軍分區司令員賀壽其。三方溝通較少，並不十分合作。組建烏盟革委會時，周發言被結合為主任，領導幹部有原盟委書記趙軍、副書記許集山、秘書長孔祥瑞等人。群眾代表中，最有影響的是工人賈成元和中學紅衛兵朱志明，紅炮兵是朱的嫡系部隊。賈、朱同為革委會副主任。集寧造反派對挖肅以來的再次壓制不服氣，便利用手裏的《烏蘭察布盟日報》抒發怨氣。

1968 年 3 月 26 日，這張報紙轉載了兩篇《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加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編者按”，摘錄如下：

這兩篇《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寫得何等好啊！……每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看到，現在有人在爲二月逆流翻案，在用種種手段搞垮革命造反派。……二月逆流被擊垮後，還有一定的社會基礎，表現在當前的各種翻案風，明目張膽地否定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有些同志也反右傾，但是，請問，什麼是右傾？忘記了路線鬥爭，忌諱提路線鬥爭這就是根本的右傾，絕頂的右傾！

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都要站穩立場，……保衛內蒙地區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決定中央八條，給種種翻案風以迎頭痛擊！

隨著編者按，十幾天內，集寧市區貼滿了大標語：“堅決捍衛中央紅八條！”“堅決反擊爲二月逆流翻案妖風！”“革命造反派要堅決戰鬥到底！”烏盟革委會機關報向內蒙革委會主要領導人挑戰了。最惱火的當屬第一把手滕海清。這位征戰多年的老紅軍，未料到小小的集寧紅衛兵要與他過招。

在上層的強大壓力下，烏盟革委會開始內部整頓，烏盟日報的兩個編輯被停職。1968年4月13日，《內蒙古日報》編輯部文章《向階級敵人發動全線總攻擊》中，點了烏盟日報3.26編者按，認爲是“煽陰風，點鬼火，製造流言蜚語，把矛頭指向自治區革委會主要負責人”，是“爲烏蘭夫翻案的反革命事件”。文章經內蒙核心小組核發，烏盟造反派的政治厄運已是板上釘釘。

1968年8月1日，滕海清親自到集寧，把烏盟日報社的兩位編輯定成“小爬蟲”，指令必須揪出背後黑手。不久，剛剛結合的許集山、孔祥瑞被揪出來，此事算告一段落。許、孔二位在文革中是最早支援造反派的。另一位副主任趙軍是原烏盟第一書記，山西人，在前門飯店會議上與高錦明同一營壘，因此平安無事。許、孔被解職，批鬥，很快又被打成內人黨魁，受盡折磨。

事件處理完畢，聲討並未停止，而且調子越來越高。滕海清在集寧市對“三支”、“兩軍”⁴人員的重要講話中說：

⁴ “三支”（軍隊支左，支農，支工）、“兩軍”（軍管、軍訓）是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

烏盟小報 3.26 事件，就是敵人公開的、有計劃的、有綱領的、有步驟地和我們幹，……不是什麼造反派犯錯誤的問題，而是敵人經過長期準備向我們宣戰，向我們進攻，進攻的目的，就是要搞資本主義復辟……⁵

對 3.26 事件的處理，使烏盟的“右傾”問題確實解決得徹底。烏盟位處內蒙中部，北部有很長的中蒙邊境線。著名的 206 案件（詳見下文）正發生在盟府集寧，這裏從來是階級鬥爭的敏感區。在之後的挖內人黨運動中，烏盟一改挖肅初期的右傾，走在全區最前列。什麼“共產黨支部就是內人黨支部”，“共產黨邊防站是內人黨邊防站”之類荒謬斷言多出自這裏，誰能說這不是處理 3.26 事件的後遺症，或者“政治成果”呢？

五，斬除“極左思潮”

與 3.26 事件如出一轍的是，內蒙直屬機關的“東聯”現象，東聯的全稱是內蒙直屬機關東方紅聯絡總部，成立於 1966 年 11 月，是內蒙機關中成立最早的造反派組織。二月逆流中，該組織不斷擴大，具有跨行業性質，按中央精神必須歸口大聯合。東聯負責人張志蓬，是輕化工廳井岡山主要負責人。

運動初期，輕化工廳被打成反革命的是郝夢枚。張志蓬支援郝夢枚，但郝個性軟弱，為張所不齒，終於引發對立。郝夢枚在廳內成立 318 戰鬥隊，壓倒了井岡山，張志蓬由多數變為少數。

內蒙革委會成立前，張志蓬於 1967 年 8 月 22 日發表了《對當前呼市文化大革命的十點看法》，對剛剛成立的內蒙革委會籌備小組說：“難道籌備小

命之後，中央要求部隊執行的具體任務。其中支農、支工和軍訓都比較單純，留下後遺症比較多、爭議也比較大的，是所謂支左和軍管這兩項。首先，在確定“誰左誰右”的問題上，往往爭議很大；其次，軍管所造成的負面後果，往往大於其正面成績。全國其他地區，情況大同小異。

⁵ 引自原內蒙古黨委紅旗聯絡總部編印的《紅旗內參》第 243 期，1968 年 8 月 12 日。

組不應該警惕自己嗎？不是有的同志又恢復了他們的老作風嗎？逐漸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當起‘官’了嗎？……如果發展下去，就會顛倒是非，顛倒敵我……”

這本是一種忠告，偏偏郝夢枚的 318 戰鬥隊抓住這件事，把十點看法打成“東聯思潮”，一度成為極“左”的代名詞。

1967 年 11 月 1 日內蒙革委會成立，張志蓬主辦的工人公社《工人東方紅》在頭版發表社論，“熱烈歡呼內蒙革命委員會成立”，下半部則掉轉方向，“打倒康修民”，通篇講“康修民是石家莊地區頭號走資派”，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

康修民是在北京前門飯店會議後，由河北調來加強內蒙工作的。內蒙革委會籌備小組中，康修民的名字列在高、權之後。但，1967 年 2 月，中共核心小組的名單上未有康修民，因為中央認為康修民在石家莊的問題是嚴重的。核心小組在高錦明的示意下，幾次向中央報告，請求在內蒙審查康的問題，並部署造反派組織不准與石家莊串聯。

《工人東方紅》炮打康修民，遭到呼和浩特媒體的討伐，遣責它“是指向革命領導幹部的極左思潮”。康修民最終沒保住。1968 年 5 月 14 日，中央首長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軍區的報告中作了批示⁶，讓康回石家莊檢查。康一回到石市，便被淹沒在群眾運動的汪洋大海中，再沒能浮出水面。

1967 年 12 月 5 日，張志蓬等人又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內蒙古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聯絡站”（後簡稱“決聯站”）。它成立時的宣言——告內蒙革命人民書，言辭和氣勢誇張，讓當權者極為反感。

決聯站在 1968 年 1 月 15 日發表了第二個關於呼市地區文化大革命的聲明《要徹底革命，不要機會主義》，話語棉裏藏針，影射滕海清是內蒙古右傾翻案的罪魁禍首。

⁶ 據文革小報披露，北京軍區的報告說：“康修民在軍區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態度不好，石家莊造反派要求讓康回石檢查。康的問題複雜，學習告一段後，請允許讓康回石檢查。”引自原內蒙古黨委紅旗聯絡總部編印的《紅旗內參》第 165 期，頭版，1968 年 5 月 28 日。

文革只有在初期較短的一段時間，群眾真正享受到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幾乎不允許“四大”存在，或者說，不允許反對自己的“四大”存在。能享受到“四大”的，是官方的支持者，是按當權者的指揮舞動的人。文革產物——造反派正走向消亡。像決聯站和烏盟日報的行爲當屬異類，哪裏能逃脫厄運。1968年1月18日夜，呼市群專的第一次大搜捕行動中，即把決聯站、工人公社和內蒙東聯作爲重要的專政對象，查抄了他們的全部材料，把能抓到的人送往群專集訓隊。

1969年1月，內蒙革命委員會發的（內革）[69]4號文件，宣佈取締工人公社、決聯站、東聯三個組織。1月11日，由呼市地區群專指揮部主持，以內蒙革委會禮堂爲主會場，下設17個分會場，宣讀文件，逮捕張志蓬、張玉謹，通緝在逃的李悅。

這是內蒙文革史上，群眾組織被當局宣佈處以政治極刑影響最大的一次。

20世紀80年代，張志蓬更名張乙飛，最早在呼市地區辦起商貿公司，而且越辦越大。後來，由於內部糾紛，被呼市工商局查封。三年後，當查封物資交還張志蓬時，汽車、摩托車成了破銅爛鐵。張乙飛轉作港商“大成行”在內地的投資代表。

李悅是呼和浩特市供電局普通幹部。逃過決聯站一劫後，於“四人幫”粉碎前夕被捕。1983年春被釋放，後成爲呼市地區一位小有名氣的書商。掘了第一桶金的他，在煙台海邊購一所住房，帶著新婚妻子移居山東。臨走前，他向筆者說：“我在內蒙幾十年，留下的感受只有六個字：傷心、傷心，還是傷心。”我問他今後幹什麼，他說：“繼續當書商，同時開始寫書，寫寫自己多難的一生。”

第三十二章

四月常委擴大會上的火藥味

內蒙第二次全委擴大會之後，在革委會的指引下，挖肅鬥爭有過幾段插曲，四月常委擴大會便是其中之一。敘述該會之前，要先介紹一下背景。

一，郭以青點火

1968年1月24日，內蒙革委會主要領導人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李樹德，並吸收郭以青參加，在新城賓館四號樓開了一次形勢座談會。郭以青的發言是最引人注意的一段，他說：“我懷疑師院有個年輕的反革命小集團。高樹華曾經說過，師院的權被人奪了，要進行二次革命，大家想想，他說的‘被人奪了’指什麼，他代表誰？據揭發，力沙克運動初期從牛棚偷逃出來到上海是有人支持的。師院看起來很穩定，實際上很緊張，不知誰緊張了誰。可能有種組織嚴密的地下活動，說不定是個年輕的反革命小集團，他們的活動很像我們解放前的地下工作。師院不出事則已，要出事就是大事。”

高錦明在郭以青發言後說：“對老郭的發言，大家應予相當的重視。我不希望師院出事，但這由不得我們。師院的一些事情，我們現在還不清楚。”

這次座談會極為機密，多數常委絲毫不知，直到後來的唐山學習班才公佈於眾。

郭以青靠想像描繪出來的景象¹，被滕、吳、高、權、李等負責人接受了。

¹ 以後的章節中我會提及，1966年秋天，力沙克從牛棚逃往上海避難的事，的確是我幫了忙。但那和烏蘭夫勢力無關，和政治利益更無關。當時僅僅出於同事和同室一場的私人情誼，一息尚存的個人義氣和點滴同情心而已。這也許是我的人性弱點，或者政治立場不堅定、難對朋友絕情寡義的表現。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它也許是我的一個長處。長處也罷，短處也罷，人性使然，無可奈何。

郭以青當時與郝廣德來往密切，郝提出的“三個大院”理論，把師院列入之內的依據，主要來自郭以青的推測。所謂師院問題，所謂“年輕的反革命小集團”，所謂“七人黑信”，繞來繞去就是高樹華問題，就是高錦明說的“還不清楚”的問題。高樹華究竟是什麼人，再次被提出來。看來，這個問題總要展開一次廝殺，方見分曉，內蒙的挖肅才算徹底。

1968年3月，我被解除文藝革命辦公室主任職務，只管“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及毛主席像章製作。此事被呼三司編成“弼馬溫²”的笑話，揶揄高某人當了個閑差。師院藝術系還畫出一幅現代弼馬溫的漫畫，孫大聖頭像變為高某人。

我當時並不在意“溫不溫”。既然政治部要抓“萬歲館”，我就不能閑著。我上任不久，高錦明建議我領兩個人去廣州、上海，看看那裏的展覽怎麼搞法，學點兒經驗。1968年3月中旬，我帶兩個人去了廣州和上海。到上海後，我向革委辦公室通知了行程。幾天後，在上海南京路延安旅館，我接到高錦明親自打來的電話。他不冷不熱地說：“家裏正在開常委擴大會議，需要你參加，你把上海未定的事留給另兩位，你立即趕回來。”

我感覺高錦明話中有話，便向師院方面詢問。家裏的人已急成一團，在電話中說：“你還有閒工夫逛上海，內蒙常委會上已經開始‘刺刀見紅’，郝廣德、劉文研和秦維憲一夥天天開會研究，他們後邊是幾個老頭子，最壞的是高錦明、郭以青，準備在常委擴大會議上揪出你，整垮高派。”師院工作組時期的暗流，工作隊時期湍急大河，如今終於像洪水般湧向常委擴大會的桌上。我匆匆趕到北京，與秘密到京的人會面。

從消息判斷，一把犀利的刀已架在我們脖子上。縱觀全國形勢，紅衛兵似乎都患了“武鬥病”，北京各校的武鬥更甚，毛領袖不得不親自出馬收拾殘局³。這場戰火是否會在內蒙燃起，難以預料。如何選擇脫險之徑，我只把

² “弼馬溫”是古典小說《西遊記》中，玉皇大帝封賞給孫悟空的一個小官職。一頂管理天宮馬匹的烏紗帽，招致孫猴子勃然大怒，遂自封“齊天大聖”，大鬧天宮，最後驚動如來佛出面，才將他制服。

³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林彪及其他中央領導人，接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黃衛、陳永貴、王光美。

希望寄託在中央首長身上。

我試著打通總理秘書張作文的電話，簡單告之內蒙的情況，並讓他轉告總理，“我們不到不得已不會搞文攻武衛”。我說回去核實一份書面材料報來，希望張能轉交。張從我的語氣裏聽出不測，急忙答應轉交材料，我相信，對於內蒙某些人的無理和危險玩火，周總理不會袖手旁觀。我帶著這種信念走進常委擴大會。

二，公開叫陣

會議在新城賓館會議室召開，與會者擴大到呼市、包頭等地革委會委員，人滿滿地坐了一屋子。滕海清、吳濤正在參加北京軍區黨委會，解決“楊、余、傅”案件後的北京軍區問題。會議由高錦明主持，開場白直接對我而來。他說：“這次常委擴大會議，仍是落實內蒙二全會議精神，事情牽扯到誰，涉及多大範圍，就在多大範圍內解決，都不定性，只是討論。樹華同志，你剛回來，對前一段會議不瞭解。主要是一些發言中涉及到你，你應如實回答這些事情。”然後，又把口氣轉向與會者：“現在，樹華同志已經到會，誰有什麼話可以當面說清楚，這樣好。”

革委會委員，列席常委會的劉文研，用極為親切，稍顯不情願的口吻首先發言（這樣的細節肯定是事前研究好的）。他說：

“本來，我是不願重提運動初期那些事，我們那時是親密的戰友。但運動深入後，歷史偏偏不允許我們迴避。樹華同志，我想你是深明大義的人，哪怕個人暫時想不通也應服從革命的需要。那我就不客氣提出十個問題，請樹華同志回答。第一個問題是，你在師院的第一張大字報究竟是怎麼出籠的，這個大字報是烏蘭夫集團裏什麼人指使你寫的？第二個問題，你在運動初期極為革命的行為，與北京前門飯店什麼關係，在開闢第二戰場上起到了什麼

作用？”問題一個接一個，與力沙克什麼關係，XX是什麼人等。最後扔出暗器說：“1967年，你們在北京曾給中央寫過一封信，我們有真憑實據，這封信是地地道道爲烏蘭夫翻案的，你是怎麼參與的，同謀者還有誰？”

劉文研的發言爲會議、爲我的問題嚴重性定了基調。如果以往高錦明屢屢講過的“第五縱隊”的故事是一種隱示，那麼今天一切真相大白：烏蘭夫集團在新生紅色政權的第五縱隊不是別人，就是高樹華。令人生奇的是，如此嚴重的問題，並未在會議當場引起情緒波動，參與者沒有吃驚，沒有仇恨和口號。

郝廣德緊跟劉文研發言，口吻也相當一致：“樹華同志是我的老師，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請樹華老師原諒我的唐突。”他重複了劉文研的問題，不同的內容在發言下半部：“你在北京會談時期是動搖的。你的動搖表現在高錦明同志問題。你當時利用呼三司首席代表地位，極力動員我們和你一致反對高錦明同志，要繼續批判高錦明爲代表的資反路線。”

“大家知道，前門飯店已經劃出了一條界線。以高錦明同志爲代表的一些老同志，在內蒙執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只有烏蘭夫死黨才最恨高錦明爲代表的這些同志。你在關鍵時期懷疑、反對高錦明，到底內心是怎麼想的，在與什麼人呼應，請講清楚。”

郝的發言，正式提出高錦明是內蒙文革正確路線的代表。在場的任何人，尤其是高錦明本人未置可否。文化大革命中，以一個人物劃線極其普遍。

態度兇狠的發言從郝夢枚開始。他同意劉文研提出的問題，認爲，內蒙革委會內部確有烏蘭夫的第五縱隊，只能是高樹華。內蒙文藝辦充當了壞人的保護傘，不是什麼右傾的認識問題。

接連有幾個委員跟著表態，支持把高某人揪出來。

當時的會議開半天，工作半天，這給了我們一個研究對策的機會。我沒有找任何一個參加會議的委員串聯，爭取支持。我深信，會議提的問題不值一駁。我真沒想到，他們竟然拾起師院工作組的牙慧當重炮。我和朋友們的對策是硬著頭皮聽下去，不到火候不揭鍋，以靜制動，同時抓緊準備交給周總理的材料。

第二天的發言顯得稀稀落落。在內蒙二次全委會上被定爲右傾的魯迅兵團頭頭那順巴雅爾和白彥太首先發言。這次，他們不能過晚表態。那順說：“我也很右傾，抓內蒙文藝革命不利，同時對魯迅兵團垮台惋惜過等等。”白彥太敦促我要端正態度，交待問題，頑抗到底無出路。

呼市郊區農民代表盧林元，私人關係與郊區府興營村人劉文研較好。盧林元說：“我是個農民，有話直說。過去我們造反，高樹華支持過我們，我們到師院東縱找過高樹華，覺得爲人挺熱情，能幫助人。這兩天聽了大家發言，我認爲高樹華就屬於烏蘭夫第五縱隊的人。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現在搞對敵鬥爭，高樹華如果說不清自己，就把他揪出來，挖出這顆定時炸彈。”

在場的人沒料到，盧林元發言後不久，不知何故，被呼市郊區農民揪出來。1968年6月10日，高錦明在昭盟講話時提到此事：“呼市郊區革委會副主任，呼市革委會常委盧林元，是階級敵人混進造反派組織，混進紅色政權裏來的代理人。”

會議很快又沉默下來，加之吸煙人太多，室內煙氣騰騰，讓會議主持者焦躁不安。此時，郭以青發言了：“我的發言不是針對樹華同志，是對大家說的。我們現在面對的是烏蘭夫殘餘勢力，已經到了發動總攻的時候，不能猶豫，動搖。誰猶豫，誰就像逃兵、叛徒一樣。衝不衝是個態度問題，現在已經有了目標，不敢衝上去拼刺刀，那就不是右傾問題了。”

郭以青煽風的技巧再高，衝鋒號吹得再響，第二天的會議仍未達到預期效果。後來，李樹德發言，講他運動初期領著華北調查組到師院調查時，兩派人對高樹華的不同認識。顯然，他對劉文研的發言也感意外，但他講得比較公平，沒跟著郭以青的調門走。權星垣始終一言不發地坐在那裏，煙一根接一根地吸。常委中，霍道餘、王志有、劉立堂、楊萬祥、李楓始終沒說一句話。

這樣的會並不保密，呼三司紅衛兵很快知道了新城賓館的內訌。呼和浩特二中（賓館對門）紅衛兵，率先在新城賓館門口兩側貼出標語：“報告毛主席、黨中央：高錦明、郭以青的工作組又回來算舊帳了！”“呼三司紅衛

兵支持高樹華同志，誰整我戰友，決不輕饒”。呼三司辦公室的電話鈴聲不絕，值班的紅衛兵如實相告常委會真相，非常事件隨時會一觸即發。

第三天會議開始，王金保第一個發言。他雖與劉文研、郝廣德不同派系，但發言內容基本同調。他認為革委會內確有烏蘭夫的第五縱隊，是誰，揪著看。之後，只有幾位不痛不癢地表表態，會議再次陷入沉默。沉不住氣的高錦明說：“問題提了一大堆，沒人回答，沒有反應，這個會怎麼個開法，要不現在休會，要不回答問題。大家都挺忙，老這麼耗下去也不是個事兒。”

高錦明是想讓我應戰，但我穩坐釣魚台，堅持隱忍不發。我不管他如何催陣，那是他們的事。

三，自衛反擊

內大井岡山紅衛兵負責人賈國泰要求發言，他是革委會委員。他說：“我不發言，是我不明白咱們革委會內部發生了什麼，我說出來請明白人給解釋一下。我首先不明白，會議好像開得很客氣，是研究問題，但又感到問題很嚴重，內部出現了烏蘭夫第五縱隊，就是高樹華，高樹華成了敵人。

既然高樹華是第五縱隊，劉文研、郝廣德等人舉證的材料全是文革初期工作組整的那些問題。我回家把劉、郝的發言和師院工作組搞的高樹華材料對比，沒有太大差別。我這裏問郝廣德、劉文研一句，你們還有沒有新的材料，如果有，趕快拋出來，把高樹華打倒。

第三個不明白，我感到文革初期的工作組又回來了，工作組整人的方式，我堅決反對。那時，我在內大當反革命，當然我的名聲沒高樹華大。你們現在搞高樹華，下一步會不會搞我賈國泰？我現在請郝廣德、劉文研亮出底牌，很明顯你們的後台是高錦明和郭以青，請高、郭兩位亮出你們的底牌……”

賈國泰開始講話時口氣還比較平穩，之後，越講越激動。特別是請高錦明等人亮底牌時，態度更爲不平。

郝廣德諷刺賈國泰說：“你想發言就發，幹嗎要我亮什麼底牌，我有沒有底牌和你有什麼關係，你別來這一套。”

郝的話音剛落，內蒙革委會委員、醫學院東方紅負責人李秉文（四年級學生）立即回應：“郝廣德，你不要以勢壓人，你以為現在是你的天下了嗎？有一天，我們會對你算總帳的。我這裏表態，我不同意開這樣的會，以這種形式整高樹華。請問高錦明、郭以青，你們想幹什麼？你們想把內蒙形勢搞亂。我可以代表呼三司，從一開始我們就不同意結合郭以青進革委會，是高錦明把他拉進去的。我不想參加這種骯髒、可怕的會議。我宣佈退場！”

說著，李秉文退出會場，會議一下子陷入僵局，這是高錦明、郭以青無法料到的事態發展。高錦明只好宣佈休會一天。

復會後，第一個發言的是劉立堂。劉是常委中的工人代表，呼鐵局成立革委會後任副主任。他說：“我們鐵路上的老人是看著高樹華長大的，從他光屁股到上大學，說他是反革命，我們不信。當年工作組去鐵路查他家三代，說他家歷史有什麼問題，沒人相信。我感到現在的內蒙革委會很不正常，幾個人串聯起來整一個人。我要問一句：我們的鬥爭大方向到底是什麼，要是揪高樹華，我不同意。郝廣德、劉文研手裏沒材料，我看有材料早就迫不及待拋出來了。你們就憑工作組過去造謠那套整人，你們差不差！我這裏代表呼鐵局工人向滕辦在場人員聲明一下，內蒙革委會出現這麼大的事，滕、吳兩個主要負責人不在場，出了事誰負責？請滕辦同志轉告。”

霍道餘、楊萬祥、王志有同意劉立堂的意見，請滕辦人員轉告滕、吳，現在太不正常了。王志有說：“高錦明、郭以青同志是否昏了頭，要整高樹華，我不相信高是烏蘭夫第五縱隊，你們拿不出確實材料，就是誣陷，我們要反問你們是否犯了誣陷罪。”

黨委紅旗負責人、常委李楓的發言最為嚴厲，他說：“請允許我站起來講話，因為我無法平靜下來。我沒想到，運動初期搞資反路線的高錦明，此時又昏了頭，重新想當祖師爺，想當內蒙正確路線的代表，便開始公開整人。郝廣德、劉文研等人拋出來的材料，不過是工作組材料的重複，沒有任何新東西，你們幾個當時也曾反過工作組，現在竟好意思拾工作組的牙慧當炮彈打人。郝夢枚，你算什麼東西！你和劉文研有什麼資格列席常委會，是誰養了這麼兩隻狗，利用他們在常委會上咬人。”

說到此，李楓走到高錦明座位後，用手指著高的後腦勺說：

“高錦明，你想幹什麼？郝廣德在會上公然宣佈你是內蒙正確路線代表，你不僅不否認，還洋洋得意，你已經利令智昏。當年，我不過在會上爲高樹華講幾句公道話，你和郭以青就把我打成反革命。今天你們倆個又跳出來表演，你們想幹什麼？”

李楓越說越激動，聲音很高，氣勢很壯：“高錦明、郭以青正在充當當年工作組的角色，還有幾個應聲附合的小爬蟲，你們都算什麼東西？我告訴你們，你們正在幹著分裂內蒙革委會的勾當。我知道，呼三司紅衛兵就在新城賓館外等著揪你們遊街，到時候我們會全力支持。內蒙革委會發生分裂，你高錦明、郭以青是罪魁禍首。”

說到此，屋內一下子鼓起掌來，掌聲越來越大。高錦明、郭以青很聰明，趕快宣佈散會，我站起來說：“不行，你們把我抹得那麼黑，提出了那麼多問題，我還沒回答，怎麼能散會。我要求明天繼續開會，允許我做出回答。現在不是你們幹不幹，你們問問院外的呼三司紅衛兵幹不幹？”

第二天，我說了整整一個上午。我講清楚了高樹華是什麼人，講清楚了自己與烏蘭夫集團沒有任何關係。我要求高錦明必須對這次會議的一切後果負責，要求必須對我的誣陷調查，並在內蒙公佈結果。

四，周總理的電話

我們給周總理的材料順利送到北京。呼三司辦公室主任薛貴元到京後，先與總理秘書聯繫好，把材料按時送交到周總理手中。總理閱後，給在京開會的滕海清親自打電話，提醒他應迅速回內蒙，問他知道不知道內蒙的常委會上正在整高樹華，“你們整他幹什麼，他是一個懂道理，守紀律，有才幹的紅衛兵。”

滕海清此時已得到參加會議的滕辦工作人員報告，便打電話給高錦明，讓他中止這次會議。火藥味濃濃的擴大會戛然而止。

1968年4月上旬，滕海清、吳濤從北京返回。在他們召集的常委會上，

二人隻字不提曾發生了什麼，會議室內瀰漫著詭異、猜忌、令人窒息的東西。我感覺高錦明、郭以青沒那麼大的膽子，整個事件的部署，滕、吳是知情的。

4月13日，為紀念中央八條下達一周年，揪黑手、揪叛、揪哈、揪烏等組織準備召開全區有線廣播大會，進一步挖肅。聯絡總部的幾個人，恰在此時到常委會向高錦明匯報大會準備情況，高說：“向大家匯報，向大家匯報。”當說到有幾個人發言時，李樹德很敏感，問有沒有師院揪烏聯隊發言，是不是有點名的事，來人說大會上準備點高樹華的名。

這時，只見滕海清站起來，猛地把“毛選”往桌上一拍，由於用勁太大，旁邊的水杯一震，水溢在桌上。滕突然發火，說：“我不是傻瓜。我到底是不是核心小組成員、革委會主任？你們為什麼搞高樹華，為什麼從來不報告，你們是不是想把內蒙搞亂？你們搞亂，讓我擔責任，我擔不起。從北京回來時，總理打電話問我，幹什麼搞高樹華，高樹華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搞小動作。你們還要這麼搞，你們搞去，我不管。”說完憤憤而去。

警衛員趕緊收拾他的東西。滕發過脾氣後，吳濤站起來生氣地說：“唉，好，好，好，誰讓你們這樣幹的？直勸你們不要這樣幹，不要這樣幹，非這樣幹，捅漏子了吧？讓我收拾，我不收拾，誰捅的漏子誰收拾。”

尷尬的高錦明，很下不來台，就指著來人說：“你們出去吧，會不開了，這叫什麼事！”這個“什麼事”，不知是指他挨批評；還是原來一切的佈置都是滕、吳支持的，現在一翻臉，把他們扔在一邊。究竟是什麼事？至今我也不得要領⁴。王志有站起來說風涼話：“好啊，終於見著太陽了。搞陰謀就見不得陽光，歷史就是這樣結論的。”

1968年4月13日，慶祝大會在新華廣場如期召開。高錦明和聯絡總部的策劃被迫夭折，大會由滕海清發表長篇講話。當天《內蒙古日報》發表一篇評論員文章《向階級敵人發動全線總攻擊》，氣勢咄咄逼人。

⁴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年革委會內的權力架構和運轉機制，儘管存在不合理不正常狀態，但在透明度和讓人講話這兩點上，可能比如今的黨政架構更為合理。那時候的一個普通學生或者工人代表，敢於在常委會上同黨政軍高級首長當面頂撞，雖然看起來不尊重領導，但卻能講出他們認為正確的個人見解，從維護權力平衡和黨內民主的意義上說，這難道不是一種進步嗎？

這天，在主席台上，滕把我叫到跟前說：“你們給總理寫的信，總理收到了，打電話給我。你們那時怎麼不向我反映？”我的眼濕潤了，我心中默念：敬愛的周總理，謝謝您！

4月13日大會後不久，革委會要對駐內蒙部隊開展擁軍活動。權星垣對我說：“你去吧，到外面轉轉。”權是好意，讓我在外排解排解，我答應了。擁軍小組由生產建設部副主任石穎負責，我代表政治部參加。整個行程很長，直到6月才返回。這時，呼市已是一片挖“內人黨⁵”的浩大聲勢。

⁵ “內人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簡稱。此案件為文化革命中在內蒙歷時較長，死人最多的一場冤假錯案。詳情可參閱圖們、祝東力合著的《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一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不過我們認為，把“內人黨”冤案的責任完全推給康生一個人，既不真實，也不公正。

第三十三章

三股勢力與兩套班子

文革中的所謂“清理階級隊伍”，是江青於1967年11月27日在北京工人座談會上首倡的。1968年3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簡稱楊余傅事件）後，全國普遍進行反“三右一風”¹的同時，中央要求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

一，論“三股勢力”，挖洞擒蛇

從1968年春天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含義複雜的辭匯，不斷出現在中央文件和兩報一刊社論及文章中。1968年5月19日，毛領袖批復《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²，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此件，要求全國各地“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³。

爲什麼要清理階級隊伍，中央首長講話及各種報刊中，講了許多籠統的道理。至於要清理什麼人，怎麼清理，政策標準是什麼，中央從未發過一次明示。於是，各地執行情況均不相同。

例如天津革委主任解學恭，1968年3月27日在總結清隊工作時提出，要堅持“一批三查”。“一批”是革命大批判，“三查”是查叛徒、特務和地富反壞右⁴。

¹ “三右一風”，此處指“右傾保守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和“右傾翻案風”，是1968年春天自上而下發起的新一輪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浪潮，可以視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正式開始。

² 收集於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辦公室秘書組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選編》（四）（1968年2月—1968年9月）第59—77頁。

³ 引文同上。

⁴ 引自原內蒙古黨委紅旗聯合總部編印的《紅旗內參》1968年第130期。

江西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在江西搞“三查”：一查走資派；二查地富反壞右；三查帝修反在國內的代理人⁵。

山東革委會主任王效禹於1968年6月5日講：“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清理黨的隊伍，清查隱藏在黨內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社會上也要清理，這是兩個意思。”⁶

貴州革委會主任李再含說：“一小撮階級敵人，就是我們過去講的四種人：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和反革命，而且重點是在黨內，在幹部隊伍。”⁷

浙江省革委會主任張永勝，在1968年6月下旬說：“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叛徒、地、富、反、壞、右分子，這批人就是跟我們幹的。……在暗處的階級敵人要發動群眾來清理。”⁸

內蒙革委會提出“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是在1968年1月的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上。會議把黑線具體化爲三股勢力，即烏蘭夫勢力、哈豐阿勢力、原國民黨傅作義、董其武勢力⁹。

以傅（作義）、董（其武）勢力爲例。經過歷次運動，特別是解放初的鎮

⁵ 引文同上，1968年第218期。

⁶ 引文同上。

⁷ 引文同上。

⁸ 引文同上。從以上各個省市清理階級隊伍的內容看，雖然有些地方突出和強調了黨政軍內部，但實施起來，往往把打擊重點指向範圍極廣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即那些已經貼上標籤的階級敵人。在這五類分子中，地主富農和右派分子，儘管冤枉和錯整了許多好人，但無論如何，當時對這三種人是有明確標準的。相比之下，“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其定義就更加模糊，更為隨意使用，對於那些無權無勢的弱勢階層和個人，常常是可以隨便扣的兩頂帽子。

⁹ 傅作義（1895—1974），山西省榮河縣安昌村人。國民黨著名抗日將領，原任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等職。1949年1月，率部接受解放軍的和平改編，使北平和綏遠省免遭內戰破壞。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水電部部長等職。

董其武（1899—1989），山西河津人。傅作義的副手，原任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1949年5月28日，派代表與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簽訂《綏遠和平協議》。9月19日，率軍政各界和蒙漢各族代表在歸綏（今呼和浩特市）通電起義。引自《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同綏遠負責人的談話”一文注釋2。

壓反革命，不僅土匪、警、憲鎮壓的鎮壓，連參加綏遠和平起義的一些國民黨軍官，在鎮反中又經再次審查，從嚴懲處。這本已違背了當年共產黨的承諾，實屬不義。如果文革仍把傅、董人員“高抬”成一股勢力，豈不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否定！實際上，當時國民黨舊人員的狀況是清楚的。高錦明曾說：“在我區，國民黨將級軍官 55 人，現在用的 36 人，其中處長級以上的幹部 32 人；校級軍官 858 人，科長以上 232 人。鑽進黨內很多。現在有沒有現行活動？”¹⁰ 這類問題，充其量搞一次調查便能說清楚，何闊論為“勢力”。

同樣，烏蘭夫勢力還有多少沒有挖出？每個單位凡與烏蘭夫有工作聯繫、親緣瓜葛的均列為審查對象。黨委大院只剩下高錦明幾位曾長期與烏蘭夫共事的人。內蒙挖肅中，把挖烏蘭夫勢力首先對準師院“年輕的反革命小集團”和“土旗聯社”（下文詳述），指向大學生和普通農民，荒唐可笑，動機狠毒。

真正“碩果累累”的在第二股勢力。1967 年 11 月 24 日，揪出哈豐阿線上的特古斯，1968 年 1 月 28 日揪出王再天。接著，開設挖內人黨。

1968 年 1 月 23 日，成立了一個由李樹德負責的調查內人黨工作小組。小組中還有兩位重量級人物——政法委副主任、滕辦主任李德臣和政法委副主任郝廣德，世稱“三德”。

1968 年 2 月 6 日，革委會負責人滕、吳、高、權、康、李、郝等人研究，認為內人黨在 1946 年 4 月 3 日河北承德會議¹¹後仍有活動。1968 年 7 月 16 日，在內蒙第三次全委擴大會議上，李樹德說：“1925 年白雲梯¹²組成的‘內

¹⁰ 引自內蒙古黨委紅旗聯合總部編印《紅旗內參》1968 年，第 106 期。

¹¹ 指 1946 年 4 月 3 日，以烏蘭夫、奎璧等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與東蒙領導人在承德共同召開的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史稱四三會議）。該會作出決定，解散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參見《蒙古通史》（下卷），民族出版社，1990 年 10 月，北京。

¹² 白雲梯（又名布延泰、色楞東魯布），蒙族，原卓索圖盟喀喇沁中旗人。二十世紀初曾經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1920 年，被孫中山委任為國民黨內蒙古（熱、察、綏）黨務特派員。1921 年 1 月，參加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國民黨一大曾“鄭重宣言，承認中國各民族之自治權”，為推動自治權的實現，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於 1925 年 10 月成立，選舉白雲梯為主席。1947 年 7 月，任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1948 年 12 月任委

蒙古人民革命黨’與1945年哈豐阿組成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雖是一個名稱，卻是兩回事。而在1947年5月1日大會後，哈豐阿及其轉入地下的內人黨又是另一回事。”

問題在於，1947年5月1日已經公開宣佈解散的內人黨，後來有沒有地下活動？真憑實據是什麼？這對挖內人黨的積極分子及其領導人來說是真正難題。1968年2月18日，高錦明在紅代會第二次全委會上說：

烏蘭夫的三股勢力，都有特務、間諜，而且主要頭頭很多就是通蔣、通美、通蘇、通日、通蒙的，還有叛徒，長期被烏蘭夫包庇重用。

……內蒙也有中美合作所嘛！設在陝壩¹³，訓了多少人，各單位有多少，現在都在哪兒，改邪歸正的有多少？……這些我們心裏都沒有底，德王¹⁴失敗後在巴彥浩特【今阿拉善盟府所在地——引者】，美國派特務與其聯繫。內蒙人不多，黨很多。內人黨……以後地下一段如何，正在摸。

高錦明關鍵的話是“我們心裏都沒有底”。陣勢擺開了，炮彈已上膛，隊伍進入陣地，但不知有沒有敵人，炮口應瞄向哪裏。

1968年3月25日，滕海清在全區學代會上有這樣一段話：“主要還是挖烏蘭夫黑線。現在有人把這三股勢力孤立起來，對立起來是不對的，有人是認識問題，有人是故意製造混亂。”¹⁵

1968年6月14日，李樹德在呼市群專學習班上講話說：

員長。1949年去臺灣，歷任國民黨第八、九、十、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

¹³ 陝壩，隸屬巴彥淖爾盟杭錦後旗，為內蒙古河套地區歷史悠久的商貿重鎮。抗戰期間，傅作義將軍曾經在此屯墾戍邊，抗擊日寇。

¹⁴ 德王（1901—1966），全名德穆楚克棟魯布，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人。民國初年任察哈爾省政府委員，錫林郭勒盟副盟長，蘇尼特右旗劉薩克（親王）（清朝時期為郡王）。日寇侵華期間，曾出任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主席。中共建國初期，德王出逃過程中被捕，後以戰犯名義獲釋，於1966年病逝於呼和浩特。

¹⁵ 引自《內蒙十年當否》紅旗聯編部。

烏蘭夫的三股勢力，一明一暗二個班子，這個不要把它分割開來。……從政治上講這三股勢力不能分，一明、一暗不能分。……不論哪一個翻案，這都與烏蘭夫有聯繫，他是一個總代表。¹⁶

1968 年四月以後，革委會負責人開始提出明、暗兩套班子問題。但細究起來，和高、滕兩位講的，一樣不明不白，沒有具體限定。但其日後產生的後果，所付出的代價讓世人震驚，並載入歷史的恥辱冊。“三股勢力”和之後現形的“明暗兩套班子”論調，成了挖內人黨的綱領，一場血腥慘案，蓄勢待發……

二，摧垮“土旗聯社”

在挖肅和清理三股勢力中，遇到一個特殊的農民組織——土旗聯社，它由於公開為烏蘭夫請命而被打成反動組織，而且因大部分人是蒙族（西部蒙族），多數成員被打成內人黨，故筆者要將其作為一段插曲，重點提及。

“土旗聯社”全名為內蒙古東方紅革命造反聯社，成立於 1966 年 12 月 23 日。聯社成員自稱曾有五、六千人，活動範圍主要在呼市地區，以土默特左、右兩旗為主，絕大多數為農民。

聯社組織一經亮相，立即引起廣泛注意。他們把矛頭指向北京前門飯店會議，認為前門飯店會議是李雪峰背著毛主席搞的，毛不同意。他們印製了傳單“也談野牛”和“八問六不知”。

“也談野牛”出自文化水準不高之手，寓言式地把人群分為奴隸主、奴才和野牛，自比“好鬥的野牛”，準備向奴隸主的統治發動衝擊。“八問六不知”具有農民特點，簡單明瞭，一讀就懂，傳達了這樣的資訊：烏蘭夫是前門飯店資反路線受害者。

1968 年 1 月，在滕、吳、高、權、李、郭等人決定的幾件事中，有兩件

二是對土旗聯社開展大規模圍剿。

1968年2月對師院高派的圍攻，在周總理干預下，於四月常委擴大會上暫告一段。從三月份起，由呼市聯絡總部掛帥，全市上百個組織對聯社發起攻擊。一段時期，大街小巷貼滿揭發聯社罪行，打倒土旗聯社的大字報、大標語。

聯社的組織過程頗具農民特色：結社方式呈秘密、半秘密狀態（張三拉李四，李四保舉王五）；旗號直率、誇張、詼諧，如“聯社總部設在北京中南海，分部設在內蒙黨委大樓內。”“中央支持咱農民成立自己的組織，總理和江青給咱開了介紹信。”

農民成員實際並不瞭解自己參加了什麼組織，真正掌握聯社大權的是在內蒙呼市工作的少數幹部、教師和工人。他們後面有一些廳、局長或縣、旗級當權派支持，主要有民委辦公室副主任雲善祥，水利廳副廳長李永年、趙維新等。他們一直與高錦明、權星垣及原烏盟盟委書記趙軍對著幹。其緣由，不僅延續四清留下的怨恨，更因高、權、趙是前門飯店會議反烏蘭夫的左派。

聯社活躍期是1968年2至4月。二月逆流時，他們與軍區黃、王、劉、張目標一致，參與了紅衛軍“與高錦明血戰到底”的隊伍。但，他們又有秘密方案，即利用內蒙激烈鬥爭時刻，進京為烏蘭夫申冤，暗中得到王逸倫支援。

這些人有的坐火車到京，一些人乘小汽車。不巧，呼鋼司機雲和小等，在護送雲獻龍、潮洛蒙、雲繼光等人時，吉普車在距呼市69公里處拋錨。雲和小是紅衛軍總部人員，立即打電話向總部呼救。來修吉普車的人發現了車內秘密，送黑幫分子到京的消息隨即傳出，一直傳到周總理那裏。紅衛軍乾脆把此事栽贓給呼三司。如前所述，總理接見時問我此事，我答應查尋後再報告。

聯社把一些人送到北京，並沒做成什麼事，因這多是內蒙、呼市當權派，又很快被單位的人揪回。

1967年3月18日，四方會議形勢急轉，呼三司被中央肯定，聯社立刻轉換身份，變為呼三司戰友。紅衛軍方面則抓住這一“證據”，宣揚呼三司是

保烏蘭夫的，並俘獲聯社幾個頭面人物遊街示眾，在他們胸前掛上呼三司臂章。

1968年3月對土旗聯社的圍殲，揪出示眾的均為一般群眾，如：李占標，北什軸公社農民，參與製作“八問六不知”傳單；梁恒德，畢克齊公社農民；張福栓，土左旗北什軸農民等。

1974年，我作為土左旗副書記到了北什軸公社前合理大隊，當晚宿在土旗聯社司令李占標家。李在村裏敢說敢為，有威信。因又瘦又高，村民叫他“李大桿子”。我和李徹夜長談，他承認聯社就是要為烏蘭夫翻案。“文革漢人整了蒙古人，其實村裏的漢民、蒙民有甚區別？現在有漢民女人來找我，我也要。”李是鰥夫，無妻無子，時年40多歲。我勸他不要當職業革命者，還是娶妻生子，有個和美的家庭，好好過日子。他對“職業革命者”的稱呼很好奇，一直反復念叨，品味，最後說：“我這個人不準備結婚，就當個職業革命者算毬了。”

1975年，我去鐵帽公社前朱堡大隊落實內人黨政策，全村被打成內人黨的全是蒙族，只有一戶漢族，這些人多數參加過聯社組織。1968年末到1969年初，在土左旗領著打內人黨的，是從豐鎮調來的一位武裝部政委，後調任他處（山西或河北？）¹⁷。

三，明暗兩套班子——挖內人黨的利器

現在難以查清，誰是“明暗兩套班子”的發明人。

我在1995年8月31號的日記中，記載了與滕辦原秘書陳曉莊、李良會面時的談話：“曉莊離去時，在走廊裏說，他1992年在蘭州見到權星垣。權問他，這個挖‘新內人黨’¹⁸怎麼搞起來的，連他也不清楚。他甚至不知道許

¹⁷ 凡在挖肅運動中罪大惡極的積極分子，特別是軍隊幹部，無論漢族還是蒙族，都在後來被中央安排調動到河北或者山西省。具體情況下文還會提及。有趣的是，許多受害的黨政軍幹部，也被調離內蒙，分配到內地去工作，大約是防範他們在內蒙恢復職權以後，會報復那些迫害過他們的人。

¹⁸ 所謂“新內人黨”，統指1946年“四三”會議宣佈解散，1947年“五一”大會明令取締

多對新內人黨的定性標準，如明暗兩套班子是怎麼定的，誰定的。”

我在日記中寫道：“陳、李不知道籌備小組時期，郭以青、高錦明專門批經費讓烏蘭巴幹去調查新內人黨的事¹⁹。陳說，烏曾找過他，帶去一大堆材料。這些材料寫得很嚴重，也很誇張。陳當即轉給高錦明、康修民一人一份，滕辦留下兩份，未敢再擴散，也沒正式轉發核心小組成員。”

可以肯定，1968年3月底之前，沒有一明一暗兩套班子的提法，在烏、哈兩條線關係上僅有“嫡系”和“旁系”之說。

滕海清聽到“明暗兩套班子”這個提法時，已是1968年4月。滕辦主任李德臣向滕匯報時，喜悅地說：“現在我們又突破了內人黨的一個重大新問題。內人黨是隱藏在共產黨組織內部的，明裏是共產黨，實際是內人黨組織，這是一明一暗兩套班子，這對我們打開內人黨深藏隱蔽這個環節非常有用。”高錦明也說過這樣的話：“發現這個暗班子是內蒙文革的一個重大收穫，挖出它來，又消除了一個隱患。這是郭以青向我提供的。”²⁰

1968年4月13日，滕海清發動總攻擊後，首先在軍隊的挖肅中突破了內人黨問題。一個是集寧的騎五師，由師長武尚志掛帥，拿到關於新內人黨的“口供”。另一處是，內蒙高級步兵學校未經批准，揪走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鮑音扎布，對鮑進行了長時間的刑訊和逼供，也搞到關於新內人黨的“口供”。

同一時期，郭以青親自抓內大副書記巴圖的專案。巴圖過去也是軍隊幹部，與鮑音扎布來往較多。郭以青用鮑音扎布的“口供”攻巴圖，反之亦然。郭以青四月份向高錦明報功說：“巴圖被突破了，他承認是新內人黨常委，還交待出了其他人。”高錦明為此誇獎了郭以青。

這一時期挖內人黨還僅僅圍繞著內蒙集寧的206案件這條線索。206案件是指寄往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一封信。收信人為蒙古國烏蘭巴托市建築處敖依

以後，但據說仍在地下偷偷活動的“內人黨”。

¹⁹ 這裡指在革籌小組辦公室財會人員處，有人見到過郭以青在烏蘭巴幹報銷的調查費單據上簽的字。

²⁰ 引自圖們、祝東力著：《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北京，第142頁。

德佈道爾吉，寄信人是烏盟集寧市民族中學趙金海。信內裝有梅蘭芳戲劇條屏，背後是一封用蒙文密寫的長信，說內蒙人民革命黨於1961年11月26日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堅持內外蒙合併的政治主張等。信件是1963年2月6日被發現的，因此稱206案件。當時的烏蘭夫親自掛帥組織精兵強將破案，公安部立為大案要案進行指導，連續偵察三年多，並無進展。文革初始，對206案的結論180度大轉彎，認為是烏蘭夫包庇了此案，烏蘭夫重用王再天破案本身就是大疑點。

不難看出，206案件是內人黨問題的中心議題，巴圖和鮑音扎布的“口供”也與此案相關。那麼，所謂“明暗兩套班子”到底是空穴來風，還是從“口供”中分析推斷出來？都不得而知。不論如何考據，明暗兩套班子之說猶如魔鬼的咒語，在內蒙播撒了數不盡的災難。

明暗兩套班子的論斷一出籠，很快納入第三次全委擴大會議紀要中。李樹德在第三次全委擴大會議上，《關於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團的性質及處理的說明》（1968年7月16日）中有這樣一段話：“烏蘭夫……就是利用這些反革命勢力，湊成他的明、暗兩套班子。以哈豐阿的內人黨骨幹分子為主的暗班子，就是烏蘭夫裏通外國，搞民族分裂、叛國活動的重要勢力，是打入我們革命陣營內部，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特務組織。”講話不僅把兩股勢力合為一體，而且把哈豐阿為首的“暗班子”突出為重點，從此，全區挖肅的大方向發生轉移，挖內人黨成了主戰場。

在提出明暗兩套班子前，各地挖內人黨專案都是先從歷史上的老內人黨開始挖線索，所以挖肅的面較小。1968年4月，逼出巴圖、鮑音扎布的“口供”後，李樹德、李德臣根據這些材料確定了鮑音扎布、巴圖、特古斯、木倫（內蒙古醫學院院長）、額爾敦陶克陶（烏盟）等十個重點專案。烏盟兩個專案重點是偵察206案件。這些專案名為官辦，實際上仍是靠嚴刑逼供後的“口供”代替證據，使本已扭曲的挖肅運動完全走上邪路²¹。

²¹ 關於挖內人黨運動中曾經使用過的逼供信花樣，請參閱圖們、祝東力著：《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一書的有關章節，特別是第八章第二節：“逼供信”和第九章第二節：“大刑罰，慘絕人寰”。另請參考阿拉騰德力海所編著的書稿：《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特別是第三編：“‘挖肅’所造成的民族災難”，1999年9月印刷，第85—116頁。

從此，根據兩套班子理論，通過明線去挖暗班子。所以，原本以專案形式挖內人黨的設計被衝破，全區蔓延出形形色色的拘押所、刑訊室和學習班，其範圍從各盟市、旗縣，到公社生產隊和廠礦、車間，到處挖聲不絕於耳。當時風傳的“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內人黨，內人黨比大青山的石頭還多”一類民諺，形象地描繪出可怖的敵情。據不完全統計，1968年4月，全區挖出各種“敵人”約5萬，10月已達十幾萬人。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滕海清聽說江西挖出30多萬，原本有些忐忑不安的心不僅安靜下來，懷疑自己是不是“右”了。於是乎，滕的跑車又加大了油門。

當發現形勢不妙時，剎車已來不及了，物體運動的慣性原理，讓滕吃盡了苦頭。

據知情人透露，實際情況，比書中所描寫的還要令人恐怖。難怪有血氣的蒙古人，在30多年後的21世紀，真的冒險成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內蒙古人民黨”（簡稱內人黨），並且在海外建立了一個網站——“南蒙古觀察（SMHRIC）”。其內情如何？究竟屬於“弄假成真”？還是屬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將由未來的歷史作證。

第三十四章

又一個不平靜的夏天

1968年2月，中共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成立，原革委會政治部主任權星垣進入核心組。康修民於北京軍區學習班後，交石家莊群眾審查。4月，郭以青升任政治部主任，由內蒙軍區幹部戴逸和張世文任副主任。我仍是政治部副主任，排名最後。

一，姜振華逃逸，郭以青失蹤

1968年6月，我擁軍完畢回到呼市得知，政治部新班子以核心小組名義，把師院外語系姜振華隔離，解決七人黑信問題。師院“紅星”感到事關重大，姜振華落在挖派手裏，後果不堪設想（具體原因下文詳述），遂決定把姜偷出來。

他們與關押地內蒙步兵學校做內應的朋友約好，趁值班人員去用餐時，兩位身穿軍服（借的）的師院紅衛兵，順利進入關押室。姜振華剛要吃飯，抬頭認出來人，不顧一切，隨兩人翻過院牆，鑽入等待的吉普車急速離去。¹

革委會懷疑是師院高派和剛回呼市的我所為，高錦明、郭以青在新城賓館與我談話，讓我說服師院“紅星”把姜振華送回來。我說自己剛回來，允

¹ 姜振華的被抓和隨後的逃逸，反映了當時兩方面的不正常狀態：一方面，作為內蒙最高機構的核心小組，對於一個人的所謂“隔離審查”決定，並非嚴肅認真，而是十分草率和隨意，帶有明顯的派別傾向，更無法律程序可言，反正各單位都私設牢房，隨便往哪里一關都可以。最高領導層都如此，那麼下層單位的無法無天狀態，自然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作為造反派的師院紅星聯絡站，也沒把政府放在眼裏，而把派系利益看得更為重要。加上自己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和人際關係，因此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姜振華從軍隊內的關押地點解救出來。更有甚者，還能把積極挖肅的高官郭以青設法綁架，痛痛教訓一頓，使其有所收斂。拋開事情的對錯和是非，單看程序的合法性，兩邊都談不到。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時的政府有權無力，造反派是有力無權。

許本人瞭解一下再答覆。郭以青轉彎抹角地斷定我就是策劃者之一。那時，我已深信不疑，一心把我打成烏蘭夫第五縱隊的，是師院郝廣德、秦維憲、劉文研一些人，背後是高、郭在支持。對於郭的提問，我無耐心答曰：“你願怎麼想就怎麼想，反正你是編故事能手。我剛才已回答了你們的問題，沒必要再重複。”說完，起身離開。

對於姜的失蹤，開始幾天追得很緊，後來漸漸松下來。一天，在呼三司的形勢會上，在座的紅衛兵負責人，都覺得郭以青最壞，他正仿效蔣介石“寧可枉殺千人，不放走一個”的鑕共哲學，不知多少人吃他的啞巴虧，必須殺殺他的威風。

一天，郭以青正在家中午休。其夫人插手內大派鬥，午飯後離開了家。一個紅衛兵戴內大井岡山臂章敲開郭家大門，向正睡覺的郭以青報告，郭夫人在辦公樓樓下滑倒，有些昏迷，讓他趕快去。郭慌忙穿衣服走出樓外，不料，被埋伏在左右的兩個人蒙上雙眼，塞進一輛吉普車開走了。

“郭以青失蹤了”，無疑是個驚人消息。這次，找我談話的是滕辦主任和秘書，我堅決否認與此事有關，也難提供任何線索，只答應有消息立即報告。三天後，夜色朦朧中，郭以青狼狽地走進新城賓館大門。在高錦明、李德臣追問下，郭說，被一位不認得的內大學生叫出家門，塞進吉普車後在市內轉了很長時間，即關進一間房。窗戶從外面封死，室內一張桌、一張床。每天兩頓飯均為燴菜、饅頭，由一位不說話的蒙面人送來。幾天後仍被蒙住雙眼，用吉普車送回。下車時，一個學生口氣的人說：“記住，郭以青，別再張狂，這次叫閉門思過。”²

核心小組很惱火，認為這是綁架，下令嚴厲查辦。支持郭的挖肅派也加入調查，但始終一頭霧水。郭以青經歷此事後，不再似往日狂熱、張揚，氣勢收斂了許多。

幾個回合下來，我與核心小組的心理距離更遠，隔閡越大了。當時，像

² 在十分激烈的“敵情”和“派性”纏鬥之中，經過三天綁架和禁閉之後，不用多說，就這麼短短一句話，便可以起到讓郭清醒頭腦的作用。因為言外之意十分清楚，那就等於說：“如果你不知收斂，繼續張狂，挑鬥派性，那麼下一次就不僅僅是閉門思過了。皮肉之苦自不必說，要你的狗命也易如反掌！”

我們這樣的常委（人稱“小常委”沒實權）是難以靠近決策層的。尤其我，他們始終沒有解除對我的懷疑。那一段，只有郝廣德能以政法委副主任參與挖肅大事。1968年5月，正搞挖肅的“揪黑手”、“揪叛”、“揪哈”等聯絡站突然宣佈解散，一時引起人們疑惑。李德臣、郝廣德召見各聯絡站的頭面人物，公開宣佈這些聯絡站是跨行業組織，不符合中央精神，應歸口回單位，聯絡站所有材料轉內蒙專案辦公室。直到三年後，在唐山學習班的大字報上方知，聯絡站解散的真正原因是，它們調查王再天在東北軍的歷史時，發現了高錦明地下活動的一些情報。王再天專案越深入，涉及高錦明的問題也越多，核心小組立即決定解散這些聯絡站。

二，紅衛兵的感慨

1968年的夏天十分炎熱。我心情鬱悶，難從四月常委擴大會議的陰影中走出來。到處聽到公安局軍管會要求“內人團”成員自動登記的廣播，空氣中瀰漫著恐怖氣氛。第三次全委擴大會議，通過了全面圍剿內人黨的決議。那時，我只盯著本派利益，關心將畢業離校的紅衛兵的命運，並未全心關注挖內人黨提案。回想起來，自己曾是三全會錯誤決議的舉手者之一。³

1966年的畢業生在1967年底已離校，1967年畢業生將在68年夏末分配完，秋、冬後，原一、二年級學生也將走完。1968年7月28日，毛領袖和林副統帥對北京五大學生領袖的談話⁴傳來，紅衛兵心裏都蒙上一層陰影，感到

³ 如果再深挖自己靈魂，恐怕也有隨波逐流的心理作怪。雖然我內心深處，對於已經失控的挖肅運動十分反感，但也深知人微言輕，孤掌難鳴，無力回天。如果真的不自量力，拍案而起，堅決抵制，那我肯定會被挖肅狂瀾所吞沒，因為我與烏蘭夫家族的關係，始終是他們的疑點。在此壓力下，還談什麼思想境界？也不可能有那樣的魄力和勇氣。

⁴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林彪及其他中央領導，接見北京紅代會核心組五個組長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號稱五大學生領袖）。毛澤東說：“今天是我找你們來商量制止大學武鬥的問題，看看怎麼辦。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是在搞武鬥。”毛澤東講了制止武鬥的四個辦法，其中之一是“實行軍管”。參見原內蒙黨委紅旗聯合總部《紅旗內參》1968年8月2日，第235期。

紅衛兵的路已走到頭。

一天，我如約來到師院文史樓一層南側樓梯間。這本是放工具物品的斗室。工作組時期，被打成反動學生的漢四學生李福生被關在這裏，後來便成為師院“老造反”的聚會地。文史樓已是人去樓空，十來個人擠在這小房間內，心照不宣此次談話的意味。主持會的是化一學生王愛學。他說：“大家聚在這裏，要像過去那樣說說心裏話。我相信中間不會有告密者，話說到哪兒就算，走出這間屋後，全當沒這回事。”話題很快集中在一點上，紅衛兵是不是充當了改朝換代的工具。有人說，也許情況更壞，紅衛兵只不過像已經擦髒了的抹布，用完就該扔掉了⁵。

8月26日，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發表。許多紅衛兵讀過此文後，對我說：“看來紅衛兵的歷史該結束了，工宣隊該當頂門棍了。”呼三司、工總司、小教司等造反派歸口建立了紅代會、工代會、職代會、教代會等，由各級黨組織領導，一切又回到了文革前的格局。

青年紅衛兵，經過文革的歷練和沉浮後，清醒者及時退出歷史舞台，無奈者隨波逐流，迷失者繼續瘋狂。臨畢業的同學之間忙於告別。有的收拾行裝，準備面對新生活的挑戰；有的忙於戀愛，把友誼轉化為愛情。總之，短暫的紅衛兵運動真正消亡了。

反思造反派勇於反抗和缺乏建設的雙重人格，或許發現，對於熟知農民史的人來說，這並不陌生。到文革被全盤否定後，“造反性格”成了貶義詞，而劉少奇欣賞的“馴服論”，重新受到當局肯定。人格剛性沒有了，正義人道不見了，實用主義和市儈哲學被無限放大。難道這就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

⁵ 在文革進行兩年多，而號稱“紅色權力機構”的革命委員會剛剛建立一年之後，師院的部分造反派，就能對全國形勢有這樣透徹的認識力，並且敢於在小會上公開討論，可見這些同學肯動腦筋，且有勇氣。要知道，在當時十分複雜的鬥爭形勢下，萬一討論內容走漏風聲，很有可能被對立派或者專政機關上綱上線為“現行反革命”行為，進而成為鎮壓目標。在全國其他地區，都不乏一些類似的案例，許多敢想敢言的造反派頭頭，因為參與這樣的討論會，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遭到逮捕判刑，甚至被處以極刑。例如湖南“省無聯”遭到取締，其年輕理論家楊小凱（筆名楊曦光）被判重刑，也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參見“楊小凱自述：我的一生”，刊於《中國向何處去？追思楊小凱》，陳一諮主編，明鏡出版社，2004年，香港，第39頁。

三，再訪科爾沁人

1968年7月底，內蒙核心小組決定把常委分成幾個小組，到各盟市協助解決三結合後的難題，鞏固三結合和挖肅成果。我與核心小組成員李樹德一個組，負責哲盟。

哲盟的變化未出我意料。挖肅以來，霍鳳林和哲一司組成了“大批判指揮部”（簡稱“大批指”），把矛頭指向哲盟軍分區司令員趙玉溫。大批指被滕海清點名，霍鳳林一夥損兵折將，宣佈解散。哲盟革委會副主任顧傑，雖沒參與霍鳳林的行動，仍被趙玉溫懷疑是一隻“黑手”。我領幾個人去通遼糖廠蹲點，在各處調查。不難發現，哲盟的文革一片冷清，人們除了關心自身安危，連回答問題的願望也很低。慶祝八一建軍節那天，哲盟軍分區在離通遼不遠的莫立廟水庫組織游泳比賽，我們調查組應邀參加。我和幾個青年，在清涼的湖水中游泳、泛舟，在沙地、草叢中嬉戲，或躺在沙灘上曬太陽。極目碧藍的天宇，輕柔的白雲靜靜飄過，心中積聚的鬱悶，隨雲朵一起飄去。是的，人不需要殘酷爭鬥，湖水、陽光、藍天、白雲、沙灘、綠草才是最美好的。

九月，我們結束哲盟之行。臨別時，尚未全面鋪開挖內人黨之戰。但是，原哲盟副盟長色音巴雅爾的處境讓我意外。1967年10月，我和王志曾和他長談。這人有智者風範，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我們推薦他進入三結合。這次得知他已被隔離，懷疑為內人黨重要人物。我們離開不久，趙玉溫開始大挖內人黨，製造了最大冤案。僅盟公署幹部，就有80%被打成內人黨。為此，鄧大人後來親自在趙玉溫的案卷上批字，要求嚴肅處理。

在哲盟出差期間，內蒙發生了另一重大事件——郭以青突然被中共核心小組停職審查。

四，郭以青政治生命終結

郭以青，河南人，曾任河南地下黨負責人。延安中共七大時，代表資格審查中，受到質疑。後經袁寶華⁶等人證明，才重新恢復工作。文革前，郭受烏蘭夫重用，為內蒙黨委代常委，宣傳部長，兼任內大黨委副書記（書記由烏蘭夫兼任）。北京前門飯店會議上，郭以青成為反烏左派。

挖肅以來，郭以青表現十分活躍：在師院，他支持郝廣德等人打壓高派；在工學院，他暗中支持針對權星垣和高樹華的專案組；支持烏蘭巴幹搞內人黨專案。……內大革委會成立之後，他派內大的親信，分別進入對立派系，時刻匯集各方資訊。到1968年七月，內大對立各方，才漸漸悟出其中奧妙，遂把視線共同對準了背後的郭以青。1968年7月19日上午，滕海清接見內大革委會負責人時，礙於高錦明的派系利益，曾經講過下面一段話：“……在揭蓋子中如果涉及郭以青同志的問題，群眾要講就讓他們講嘛，根本不讓講，那就不好了。……好人打不倒，壞人跑不了，真金不怕火煉，真正革命的你怕什麼？”⁷

此時，全國各地正揪叛徒，河南省通過北京軍區轉到滕辦的材料中，涉及郭以青幾大嫌疑問題。1968年8月，核心小組提出對郭以青處理的五條意見，停止其革委會常委、政治部主任等職務，送學習班審查，但不交給群眾組織。

郭以青突遭襲擊，高錦明像被斬斷一條臂膀，他曾說：“揪郭以青就是揪我。”郭的倒台在師院引起的直接效應，是高派從壓抑中站起來。兩派勢力開始翻轉，利用“七人黑信”打壓高派的專案組自行消亡，姜振華又回到學校，七人黑信再無人問津。

從哲盟回呼市後，我曾參加過一次革委會政治部工作人員批鬥郭以青的會議。郭以青以往的神態蹤影全無，只有呆滯的眼神、蒼白的面孔，像完全

⁶ 袁寶華為中共老幹部，文革之前，曾任物資部部長、計委主任等要職。文革當中，被列入劉鄧黑幫，受到迫害。文革之後，隨同鄧小平等老幹部復出，繼續擔任黨國要職，直至退休。

⁷ 滕海清此處所講的意思，好像完全照搬了郭以青“不怕冤枉好人”的思想，不知道是滕海清有意“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是郭以青物極必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論哪種情況，我們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報應。

換了一個人。批判會上忙上忙下的活躍人物，正是以往跟郭以青最緊的那些人。我並未坐在主席台上（以我的身份應坐在台上），雖然他們極力讓我講話，我堅決回絕。

整個批判會上，我一直在台下呆想，記起革委會政治部成立不久，一次辦公會議開始前的郭以青。當時郭以青大談如何判斷棘手的問題。郭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權星垣、康修民聽得津津有味。康修民極為感慨地說：“老郭啊，你要是個敵人，一定是很狡猾的。”郭以青邊點頭，邊說：“對，對，我是夠狡猾的。”聽了兩人對話，權星垣先笑起來，之後，四個人哈哈大笑。

回到現實，眼前的郭以青被人押走了，康修民正在石家莊接受群眾審查，權星垣的日子過得也不舒暢，原來的政治部班子，已被軍人所代替。除了我穿便服，其他幾位均戎裝在身。

從此，郭以青走進了漫長的審查期，直到生命的盡頭。1970年，內蒙軍管後，對郭以青繼續審查，雖然他也曾在家裏渡過一段閒暇時光，但在粉碎“四人幫”後，郭以青終被逮捕判刑。當他從獄中被保釋出來後，開始變得癡呆。20世紀90年代，一個掃街臨時工的月工資300元，而政府給郭以青的生活費僅每月100元。保外就醫的假釋身份陪伴他臨終。

我至今不解，像郭以青這麼聰明絕頂，為什麼如此不安分，難道他真不明白：處處插手意味著處處樹敵，自己能活舒服？也許他認為自己確實最聰明，別人卻愚蠢，所以才把他人的生命當兒戲，豈料最終結果，是自己把自己送進了墳墓⁸。

對郭以青的處理，使核心小組產生不可彌合的裂痕，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事件加速了內蒙高層領導的分化。

⁸ 我們感到非常遺憾，未能在郭以青健在時對他好好採訪一番，甚至為他寫一本傳記。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完全奉獻給了共產黨的革命事業。論及郭老的脾氣，也並非全無人性。許多與他相識的人，都會覺得他和藹可親，待人熱情。但在所謂階級鬥爭的“大是大非”上，他似乎又聰明過分，激進得令人可疑。他的人生悲劇，歸根結底，還是由於共產鬥爭哲學的禍害。在他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應該說他自己受迫害的時間，可能長於他迫害別人的時間。或者說，在他迫害別人的同時，自己也在不停地受到來自上層的迫害。這種循環往復的迫害和受迫害，正好驗證了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至理名言：“共產革命是絞肉機”，不但絞碎敵人，也絞碎自己。

五，五四大隊拒挖內人黨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報導了黑龍江省組織大批機關幹部在柳河農場下放勞動的經驗，並為此加了編者按。該文發表了毛領袖的最新指示：

“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於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為貫徹這一精神，核心小組決定由三名常委帶隊，從革委會機關抽調部分幹部下鄉勞動，地點在巴彥淖爾盟（簡稱巴盟）的杭錦後旗。辦公室一組由郝廣德率隊，生建部一組由那順巴雅爾任組長，政治部一組由我負責。我和郝分到沙海公社，他在紅旗大隊，我去五四大隊。按核心小組要求，我們不當工作組，只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同搞文革，一起學毛著，所有人必須挨家挨戶吃派飯。

“黃河百害，唯富一套。”這裏，自古以來就是富庶的地域，人稱“小江南”。河套平原到處溝溝岔岔，五級灌溉網成形，只是由於疏懶，大塊土地不分畦，不打堰，大水漫灌。當地人沒有節水概念，結果土地嚴重鹽鹼化，小麥畝產不過三、四百斤。整個河套平原，一律是低矮的土坯房，週邊圈著破落的土院牆，有的乾脆沒院牆。道路坑坑窪窪，廁所簡陋異常，無法插腳。正如當地人所言：“人屎豬吃了，豬屎雞刨了，雞屎風揚了。”

到達第二天，我們便跟農民下地勞動。十月的河套樹葉仍掛在枝頭，中午要穿薄薄的背心。我喜歡熱鬧的勞動場面，十幾天後，我便成了熟練的農工。開始幾天農民叫我高主任，後來叫我老高，當活兒幹完時，長輩人見到我，只叫“這個好後生⁹”。

每天晚上的政治夜校¹⁰由大隊黨、團支部安排活動，我建議不要每天都枯燥地讀報紙和文章，也可以融入一些文娛活動，組織青年打籃球。全村人很

⁹ “後生”是西北地方流行的用語，是對年輕小夥子的一種愛稱或者戲稱。其派生詞語還有“後生家”、“後生娃”等等。

¹⁰ 集體化年代農村晚間的一種政治活動形式，多數情況下動員黨團員、幹部、青年民兵和積極分子參加。除了學習文件，也搞些文藝宣傳活動。

歡迎這種改變，尤其是青年人。他們原以為我們只會板著面孔訓人，聽了建議後，全村人松了口氣。

進入冬天，挖內人黨的風聲越來越緊，盟裏抓旗縣，旗縣抓公社，一直壓到生產隊，讓調查有多少內人黨，有多少傅作義的“偽兵”¹¹，多少地富反壞右。祖祖輩輩生活在一個村子裏的人，誰家如何，哪個人過去幹過什麼，全裝在心中。公社書記雷喜喜來村裏和我研究，討教作法。這位面帶微笑的幹部，心裏很有主意，連續問我幾個問題：如果一個村子裏確實找不到內人黨，還挖不挖？如果一個公社 50 歲以上的男人幾乎都有被抓兵的歷史，算不算當過偽兵？……

我均實事求是作答。我說：“據我調查，五四大隊沒人知道內人黨是個什麼，我在一天，決不會在村裏挖內人黨。被迫抓去當兵，算什麼偽兵！”我的回答正合他心意，但他又擔心頂不住壓力，便問：“過幾天，旗裏挖肅指揮部到沙海公社要內人黨指標，該咋辦？”我反問他怎麼打算，他說：“到時候，我想借你當一回頂門棍，你去公社坐鎮，怎麼樣？”我答應了。

我們政治部的下鄉幹部與村黨支部認識一致，沒有內人黨就不挖，一個偽兵不抓。爲了應付門面，僅對村裏一個地主、一個富農開了兩次批判會。下鄉幹部中有兩名曾是揪黑手聯絡站的人，有些異議。我在全體隊員會上警示他們，他倆沒敢蠻幹。

一天，旗裏果然來人檢查。旗挖肅指揮部的人剛進公社會議室，便大罵沙海公社右傾，包庇壞人，要把公社書記雷喜喜帶走，嚇得公社幹部不敢說話。我站起來，指著他們問：“想幹什麼，你們怎麼和土匪一樣。”他們一聽我罵他們是土匪，問我是誰。我自報家門後，氣憤地說：“不調查，不瞭

¹¹ 此時的中共地方幹部，居然把傅作義的軍隊稱作“偽兵”（或偽軍），這固然能表達他們的政治偏好欲，但卻暴露他們對歷史的無知。稍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所謂偽軍，是指抗戰時期汪偽政權，或者偽滿洲國的軍隊而言，倘若加在國民革命軍抗日武裝的頭上，便是張冠李戴，不倫不類，滑天下之大稽。傅作義的軍隊，起義之前是抗日武裝，國共內戰時期是反共武裝，起義之後便成為解放軍，韓戰期間還赴朝參戰，成為志願軍的主力部隊之一。無論怎麼說，可以把曾經給傅作義和董其武當過兵的人稱為“友軍”（抗日）或者“敵軍”（內戰），但無論如何不應該稱他們是“偽軍”，因為他們從來也不曾給日本人幹過事。

解，就這樣瞎指揮，瞎批評，事情都是你們這些人搞亂的，你們比土匪還壞。”

我越說越生氣，立即給旗革委會副主任卜雲秀和造反派頭頭廬山虎打電話。他倆在電話裏把來人訓了一頓。幾個人不得不向我認錯，向雷喜喜道歉。我告訴他們：“有多少內人黨就挖多少，沒有就不挖。你們別管。”我本打算不給他們飯吃，立即趕回旗裏。雷喜喜在一邊求情，我把面子給了公社書記。我和雷喜喜對這齣雙簧戲十分開心，公社幹部們更高興，說瘟神被趕走了，可以過安生日子了。整個冬天，旗裏再沒人來公社和大隊催要挖肅戰績，內人黨在沙海公社大和五四大隊，一直是個陌生名詞。

入冬後，我和大隊黨支部商量，農閒時是否抓緊積肥，爭取來年糧食豐收。我所在的小隊首先幹了起來。每天早飯後，積肥的隊伍套上大車，由大青馬拉著到山下挖蛤蟆葉子——一種富含氮元素的植物。中午返回時，裝滿蛤蟆葉子的大車份量過重，年老的大青馬體力不支，必須由人駕轅。我 27 歲，正當年齡，過去我也幹過這種活，自然義不容辭地替馬拉車。

第二年，五四大隊獲得大豐收。在他們的村史上從未積過那麼多農家草肥，更重要的是，通過冬季積肥改變了當地落後的農業經營模式，也改善了村裏的衛生狀況。

幾十年來，我與五四大隊的鄉親們不斷往來。有人到呼市辦事，會來看我，告訴我當地的變化。我曾把聽到的許多河套動人的傳說和人物故事記了一大本。可惜，在後來的清查中被抄走，永遠遺失了。

第三十五章

內蒙高層權力之爭

1968 年 11 月，內蒙革委會召開第四次全委擴大會議，主調是批判高錦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繼續挖肅。

滕海清與高錦明的矛盾，從兩人合作開始就存在。前一段主要是高錦明的原因，後來，則是滕海清太離譜。

一，兩個工作中心

1966 年上半年，北京前門飯店會議後，烏蘭夫被免去中共內蒙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中央任命中共華北局常務書記解學恭到內蒙任第一把手¹。因解一直沒到任，內蒙工作實際是高錦明主持。據高最信得過的人之一張魯後來說：“高錦明很想當內蒙一把手，他認為這個位置是他的。不想後來中央調來滕海清，吳濤同志也放在他之上，他對此是不高興的，常常以老內蒙的身份，難為剛剛到內蒙的滕海清。”張魯的一番話也許出於壓力，有水分²，但高想

¹ 解學恭為何沒到內蒙赴任，原因不詳。期間還有過調青海的楊植霖、或者天津的胡昭衡（原名李欣）去內蒙任一把手的說法，最後都沒有成為現實。結果卻是一個對民族問題毫無知識，對邊疆工作也不沾邊的滕海清，空降到了內蒙。許多內蒙老幹部都認為，假如當初解學恭、胡昭衡或者楊植霖能夠赴任，由於他們曾經在內蒙工作過，對民族地區的知識經驗比較豐富，或許有可能避免像滕海清那麼簡單和偏激，從而不至於像他在挖肅上栽那麼大跟頭。造成陰差陽錯的原因何在？究竟是中央高層偏要這麼幹，還是內蒙人命中有此劫難，想逃也逃不過？恐怕只有上帝知道。

² 說張魯的揭發有水份，是因為在唐山學習班期間，中央給每個人都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讓內蒙古幹部互相揭發，無限上綱。如果誰不這樣做，就會引火焚身，變成被別人重點批判的對象。因此，張魯對高錦明的揭發批判，必須放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考慮，才會接近事情的本來面目。

當然，反過來看，高錦明想當一把手，也沒有什麼罪過。以高的級別、資歷和對內蒙情

當第一把手的心態，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滕到內蒙後，對高錦明等老同志是尊重的。唐山學習班上，高錦明檢查中承認，“內蒙搞挖肅、挖內人黨的大局是按我的意見定下來的”。滕海清原本對內蒙毫無所知，也拿不出這樣完整的一套理論。滕海清說，他是睡到半夜被叫醒，說周總理命令他立即趕往人大會堂，才知道中央對自己的新任命³。

高錦明看到滕海清、吳濤對自己言聽計從，從挖肅以來便自立核心，把眾多愛將收在他的麾下，正像雷代夫所說，高想繼烏蘭夫之後當內蒙的“二代王爺”。郝廣德揭發高錦明說：“高就是想當內蒙正確路線代表。”郝、雷兩人是高錦明身邊的人，批高時，“二代王爺”的稱呼由此傳出。

內蒙三次全委會最終通過的是全區開展挖內人黨的決議。直到會議進入結尾階段時，會風一轉，全體與會人員都被拉到包頭參加包鋼二冶現場會，學習大批判經驗。三全會議顯然形成兩個工作中心，故，會議結束後，不少委員相互詢問，回去後是學包鋼二冶，還是搞內人黨登記。

從1968年春天起，蘇聯、蒙古加緊在中蒙邊境調動部隊，滕海清作為內蒙古部隊最高首長，急於到邊防看地形，視察邊境哨所，把家裏的一攤事全扔給了高錦明。只是間或回呼市一次，又很快去邊防了。九月底，滕海清、吳濤奉中央之命，將去參加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8月15日-16日，中共內蒙核心小組開會，統一對運動的認識。滕海清的觀點是：三次全委擴大會議決議正在落實之中，主要應集中在黨政機關及

況的熟悉，他當一把手，或許能避免“挖肅運動”走到後來無法收拾的地步。當時為什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非要把一個頭腦簡單、行為魯莽、不懂民族歷史和政策的將軍，空降到內蒙當一把手，或許出於政治謀略考慮，例如對少數民族幹部的不信任等。事情真相，恐怕只有等中共有關檔案資料解密之後，才有可能一窺端倪。

³ 從滕海清任命之草率和上任之倉促，亦可看出毛周等人，對內蒙問題的複雜性認識不足，起碼在邊疆民族地區治理上，有嚴重誤區。在他們眼裏，不懂民族，不懂歷史，只懂軍事，對於治理內蒙來說，似乎不是缺陷，反而是優點。除非毛周的著眼點，是很快要同蘇蒙打仗，那或許有些道理。如果是為了治理好一個邊疆大區，那末這種任命方式，簡直形同兒戲。另外，如果事先徵求一下滕本人的意見，多給他幾天準備時間，他也許會同解學恭商

量一下，問問他為什麼

公檢法內，並提出革委會內要警惕出現郭以青似的壞人。高錦明對滕說的“警惕郭以青似的壞人”十分敏感，把滕的話看作是弦外之音。高錦明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對郭以青的處理，讓高觸摸到臨及自身的危機。

十天後，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表，文章說：“當前的重大任務，就是不失時機地認真搞好鬥批改。”高錦明從中受到極大啓發，在常委們學習討論時，反復強調鬥、批、改的重要性、連貫性，並且突出改的核心意義。他說：“改就是鬥和批的結果和檢驗，改的任務更爲艱巨，應下更大功夫，現在我們就應著手準備。”

在座的人沒有高錦明腦子快，多數人還陷在挖肅的圈子裏不能自拔。況且，挖肅本身就是個怪圈，高這個主要發明人突然變調，更讓與會者不辨東西。也許他知道解開怪圈的“時機”和“機關”，他有脫身之計。⁴

常委會並沒有對改不改，怎麼改，何時改的問題做出決議。事後，人們發現對這次討論專門出了一份紀要。按常委會慣例，討論很少搞什麼紀要，爲什麼這次成了例外？紀要上卻白紙黑字地寫著，“全區要轉到以改字爲中心的任務上來”。顯然，高錦明爲他日後的 9.25 講話安排了鋪墊，他利用常務書記的地位，把一切組織手續搞得合法化。這才是真正的高錦明，滕海清再學十年，恐怕也不是對手。

二，簽字相左

滕和高直接衝突終於爆發了。1968 年 8 月，毛領袖派出工人宣傳隊，之後是貧下中農宣傳隊、人民解放軍宣傳隊，到各大專院校及中、小學去佔領上層建築陣地，這是毛領袖對中國幾千年教育的重大挑戰。他在中南海運籌帷幄，以爲這三支生力軍一到學校，被他稱之爲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

⁴ “內人黨”冤案的責任究竟由誰承擔，是個很大的研究課題。我們認為，在當時“突出階級鬥爭”的條件下，無論誰當領導，也無法抵制這場運動。或許動議出自下面，如烏蘭巴幹、高錦明、郭以青等，但根子肯定在上面。目前為止，起碼可以說罪在康生，但肯定還有江青、謝富治等人的責任，再往上，恐怕陳伯達、周恩來、林彪和毛澤東也難辭其咎。

識份子的大、中、小學生肯定屁滾尿流，服服貼貼。

內蒙日報緊跟毛領袖的指示，準備發一篇社論《工人宣傳隊首先要抓好挖肅鬥爭》。報社頭面人物先讓高錦明審大樣。按理，這篇文章正合高意。未料，高錦明一反常態，把文章槍斃了，指示要寫鬥、批、改。報社一頭霧水，弄不懂高錦明何時變得對挖肅二字深惡痛絕。他們正在破解其中之謎而無所措時，滕海清從邊防視察回來了。他們連夜約滕，送上大樣。滕根本不知個中底細，看了看，覺得無大錯，便簽發了。待到1968年8月31日《內蒙古日報》正式刊登此文時，滕又到了邊塞。

這一回該輪到高錦明一頭霧水了，明明被他置於死地的文章卻登上大雅之堂。高十分惱火，派人到報社追查。社會上一部分造反派組織寫大字報，散發傳單告廣大市民，“現在只講挖肅不講改是與中央精神唱對台戲”，“敵台⁵已廣播內蒙日報社論”云云。

在家的滕辦人員自然不是吃素的，很快發現了其中的蹊蹺。滕海清在外地知道家裏出事了，但他並不以為然，僅以誤會泰然處之，繼續辦理邊防，9月7日方返回呼和浩特。

讓滕吃驚的是，自己剛剛落腳，還沒來得及洗漱、吃飯，高錦明、權星垣便急匆匆闖進來，要求第二天召開中共內蒙核心小組會議，繼之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一定要揪出內蒙日報社內的黑手。高、權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矜持和寬容，似乎有些氣勢洶洶。為什麼這麼急切地“逼宮”？沉澱在滕海清幾十年征戰中的警覺性猛然迸發。滕沉了沉，不動聲色地寒暄幾句，以自己累了，身體不舒服為由，把兩個人支走了。

滕海清答應了高、權的要求，先開核心小組會，後開常委會。高錦明在會上一連提出幾個問題：挖肅是基本勝利，還是全面勝利？我們與烏蘭夫叛國集團的矛盾是已經解決了，還是基本解決了？挖肅到底有沒有底兒？

高提出的問題，都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如果當時認真對這些問題作出

⁵ 所謂“敵臺”是指大陸官方電臺之外一切其他電臺的對華廣播，在內蒙比較容易收聽到的外台，有“莫斯科廣播電臺”、“蒙古廣播電臺”、“美國之音”、“BBC”，臺灣的“中央廣播電臺”、“自由中國之聲”等等。在那個年代，普通民眾收聽此類電臺，屬於犯法行為，輕則被批判鬥爭，重則判刑坐牢，甚至有殺身之禍。

科學回答，內蒙挖肅的冤案會少得多。然而，當時人們的注意力在高錦明的態度上，忽視了他所提問題的內容。高本人及其周圍也無意去尋求答案，而是急於形成一種態勢，讓滕和其他與會者跟著高的陀螺轉。

在常委會討論中，正是高錦明周圍的人，發言更直白。張魯說：“內蒙黨委原來的人就剩這麼幾個了，有人想要挖光就挖吧。我們都是烏蘭夫的老班底，把我們全挖光算了，讓奎壁、吉雅泰上台好了。”雷代夫質問：“內蒙還有多少兩面派可以搞。”

與會人員立即聽出，高錦明對挖肅做緊急剎車的真正意圖。滕海清這位軍爺，一向對許多事情放手不管，讓吳濤管內蒙軍區，讓高錦明管內蒙地方的常務。但對常委會上的這種反常勢態，他不能坐以待斃。

三，高錦明 9.25 講話引火焚身

1968年9月25日，高錦明在內蒙古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報告。他在報告中說：

“就全區絕大多數地區看，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已被徹底打垮。在他的卵翼下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揪出來了。”

“如果再挖就挖到自己人頭上”，“就是真正的反動路線了”。⁶

高錦明又以進攻的姿態說：“現在有人跟不上形勢，對鬥批改的高潮即將到來認識不足，得了政治傷風症。”

滕海清以爲，高錦明的講話公然指向自己，是一種分裂中共內蒙核心小組，分裂內蒙革委會的行爲。滕海清在唐山學習班有段自述：

⁶ 平心而論，高錦明、權星垣等人對繼續深挖“內人黨”開始警惕，甚至想做某種抵制，並非完全或者僅僅出於自保的目的，應該說，多少也和幾個月來殘酷鬥爭的驚人程度有關。此時此刻，經過多半年的實踐，“內人黨”徒的名單越來越長，鬥爭的波浪已經擴展到廣大農村牧區，挖肅手段也越來越離奇，到處都有私設公堂和牢房的現象。面對此情此景，凡有正常政治嗅覺和靈敏度的人，都應該感到過火了。他們有膽量出來降降溫，也是怕再挖下去，包括自己在內的整個領導層，要犯重大政治錯誤。

對高錦明的錯誤我早有發覺……最先引我注意的是 1968 年三、四月份，呼市地區搞了兩個包圍圈，應該向階級敵人進攻時，卻矛頭指向群眾和群眾組織，包圍了師院高派和內蒙黨委紅旗，這是高錦明不喜歡的兩部分群眾。……一查是郭以青在背後支持，郭的後面是高錦明在活動。……

我和吳政委 10 月 27 日給核心小組在家的同志寫信要準備整黨，高錦明不准傳達。高錦明把李德臣也拉在自己一邊。

李德臣是北京軍區幹部，儘管他從思想甚至情感上已貼近高錦明，他不能不執行滕將軍命令。滕與李德臣在 10 月 23 日和 25 日談了兩次，李作了檢查並揭發了高錦明。滕對李說：“我不是說高錦明是壞人，作了檢查就行了，誰也沒想打倒誰，只不過高錦明前一段的錯誤要清算。”

本是中共內蒙核心小組的事情，可是呼市街頭立即出現兩種反應。首先一批大標語是：“堅決支持高錦明同志，堅決捍衛紅八條！”“爲二月逆流翻案的人絕沒有好下場！”大標語署名單位爲內大井岡山縱隊、內蒙林學院紅旗紅衛兵、師院東縱。

這批大標語之後，另一批接續登場：“高錦明 9.25 講話是大毒草！”“打倒高錦明！”“打倒反革命兩面派郭以青及其後台高錦明！”署名爲師院東縱、內蒙黨委紅旗、呼三司、內大井岡山。以上署名出現兩個師院東縱和兩個內大井岡山已不足爲怪。前者是師院秦派、內大八.五派；後者是師院高派，內大七.三派。

這個勢頭可不妙，很快傳到了北京滕、吳那裏。

1968 年 11 月 7 日晨，滕海清秘書陳曉莊用電話傳達了一封信，摘錄如下：

錦明、星垣、樹德、李質同志：

……雖然近一時期內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缺點、錯誤，但這是支流，這個責任主要怪我們，不能全怪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績也是主要的。……聽說呼市街上貼

了些大字報，我們希望同志們不要在街上貼大字報，這會讓階級敵人利用。你們對我們有意見可寫小字報，送核心小組來。請同志們放心，我們的錯誤，我們會改正，能夠改正。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滕海清 吳濤 10月31日晚

這封信迅速傳達到群眾中，傳遍呼市，街頭平靜了許多，一些零星標語已不為人們關注。高錦明讀此信後，回了一封信。也摘錄如下：

滕、吳兩位同志：

因為直接通話有困難，請曉莊同志轉達：

一，內心深處感激你們兩位對我的批評，請放心，我決心改正錯誤；

二，我認識錯誤很遲，10月14日樹德同志返回，傳達了你們11日談話，並沒引起我的警惕。……29日，德臣同志返回，傳達了你們的談話，這回打動了，才開始認識到是犯了錯誤，而且越來越嚴重，感到羞愧。10月31日接到你們的來信，又深受感動，決心迅速改正錯誤；

三，信上不便作具體檢查，等你們回來後，當面檢討，聽取批評，然後向革命群眾作檢討。

高錦明 11月1日

到此，不論雙方的言詞包含多少作戲的成分，如果真正從內蒙大局出發，應是這場戲最佳的收場時刻。大家互相溝通，分辨是非，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會給百姓帶來多大痛苦。然而，後來的事態發展，說明事實並非如此。

四，滕海清批“右”，邁入深淵

如果前一段的滕、高矛盾，高有主要責任，後來的“戲”唱砸了，主要是滕海清心胸太窄，表現出一介武夫的魯莽和霸道。

1968年11月3日，滕海清、吳濤從北京回到呼和浩特市。在內蒙古革委會第四次全委擴大會議上，吳濤傳達了毛領袖的指示，滕海清傳達了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基本精神，把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書面決定及準備召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等事項傳至與會者。本次會並不涉及內蒙高錦明問題，預先為滕準備的講話稿中也無此類內容。

孰料，這位軍爺突然離開講稿，口無遮攔地開始批評高錦明，並發洩怨氣式地對高下結論為右傾機會主義，把準備在核心小組內，在內蒙革委會常委內解決的事情，一下子端到大會。滕將軍用突然襲擊戰術，把“批高錦明”變成內蒙四次全委擴大會議的中心。

這是高錦明及其支持者無法想通的事。半年後，內蒙批滕氣勢宏大，高錦明必置滕於死地，壓得滕海清喘不過氣來，這與滕對高採取的突然襲擊不無關係。

吳濤納悶：前幾天還說“誰也不想打倒誰”，現在一下子將對手推入右傾路線，觀其言行好像有打倒的意思。那麼，原來說的是真話，還是緩兵之計？這是吳濤等人難以猜透的事。

在滕、高之間的衝突中，不論吳濤內心積有多少難言之隱，吳公開是站在滕一邊的。10月31日的信是滕、吳雙具名。回來召開的大會上，滕未與任何人商量，信口點高錦明的名，吳濤必擔同謀者之名。吳濤熟讀史書，深知其中利害。儘管他在會後未與滕理論，也一味地跟著滕的調門跑，其心底與滕並不一致。半年後，在批判滕海清錯誤時，吳一下子與高站在一起批滕，絲毫不留溫情，指責滕海清一向霸道，搞突然襲擊，並說自己也是受害者。可見，吳濤將軍在政治舞台上，也並非僅有一張面孔。

批判高錦明，開始限於小會進行，後來開成核心小組擴大會議，擴大到各盟、市黨組織第一、二把手，直開到常委擴大會議。滕海清在1968年11月25日對華建講話中，答應把高錦明交給群眾去批判。

批判範圍逐漸擴大，調門節節升高。最初批 9.25 講話是三反主義代表作，後又涉及高錦明其他問題。原來圍繞高錦明轉的人也被迫反戈。雷代夫說高是“二代王爺”；郝廣德說高錦明是個野心家，一心想做內蒙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代表；張魯揭發高錦明想當內蒙第一把手，當不上才犯上作亂等等。

儘管滕海清在 11 月 18 日說過，對高錦明要一批二保，實際上只批不保，到了無限上綱的地步。

期間，內蒙古日報社那些曾被高錦明追查過的人，搞了個與高錦明“刺刀見紅”的批判會，我應邀參加。那是一間能容下幾十人的小會議室，會議發言中，內蒙黨委紅旗總部一位與會者，竟把高錦明歷史檔案中的有關章節抖落出來。會議結束後，高錦明拉著我說：“這真叫我無地自容。”

面對突然間變得滿頭白髮，十分老態的高錦明，耳邊迴響著剛才對他的凌辱之語，我無話可說。

批判郭以青、高錦明，我內心是高興的，我完全是站在一己一派的角度，帶著報復心情參加批高的。但像報社批判會那種撻伐有點出格，特別是原來高錦明周圍那些人的反戈一擊，更讓我吃驚。以往一個鼻孔出氣，說變臉就變臉，技法可謂嫻熟，幾乎招招到位。

我揭發不出郭以青、高錦明什麼機密的東西，也無意消化批判者的那些高見，更不願暴露自己的內心世界。說實話，我對無止境的爭與鬥早已厭煩。因此，四屆全委擴大會議剛完，我便藉故回到杭錦後旗農村。那時，我和師院高派被認為是高錦明受害者，沒人懷疑我會有異意，行動相對自由。

後來，唐山學習班有大字報揭示，在四全會議期間，高錦明幾次向滕、吳提出單獨談話，哪怕只給 15 分鐘，均被拒絕。吳答覆說：“要說就集體說，現在沒什麼可說的了！”可怕的內蒙政界，可悲的高錦明！

滕海清將軍的秘書，對內蒙這次事件有過一個總結：“揭批高錦明的錯誤，使滕海清自己更深地向錯誤滑了一大步，而且把內蒙問題帶到更深的深淵。”

說滕海清膽大包天，目無中央都不過份。他在內蒙發動的這場批高運動，

未向中央請示。須知，對高錦明這一級幹部的處理，僅在中央權力之內，內蒙一級無權自作主張。

滕海清在全區公開批高錦明“右傾機會主義”的直接後果是，各地原本存在著嚴重派性的地方，乘勢在基層跟著抓“小高錦明”，將其一一逐出當地革命委員會，破壞了當地的政治勢力平衡。例如，集寧鐵路辦事處下層各單位成立革委會時，結合的革命群眾代表（全部為火車頭造反總部的）共 65 人。打成“小高錦明”，吐出革委會的有 8 名，打成新內人黨的 34 名，列入懷疑名單，準備處理的 11 名，占總數的 81.5%。⁷

當然，比派性更嚴重的後果，是進一步擴大了內人黨冤案的打擊面，加大了迫害力度，導致更多的無辜者致死、致殘，給原本比較融洽的蒙漢民族關係，造成難以挽回的永久性內傷。

⁷ 以上例證及數字，引自《呼三司》小報，1969 年 8 月 28 日第二版。

第三十六章

挖“內人黨”冤案（上）

1968年11月下旬，我離開呼和浩特返回巴盟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市公安局軍管會”），發出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進行登記的第二號通告，把挖內人黨的運動推向新高潮。

一，挖聲陣陣響

公安和群專的宣傳車，不分晝夜，在大街小巷高聲廣播《通告》內容。《通告》以咄咄逼人之勢宣佈：“時至今日，仍有那麼一小撮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的頑固分子，對我黨政策置若罔聞，負隅頑抗，……”呼和浩特市群專組織，把大標語刷遍街頭巷尾，“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都是反革命組織！”“打一場圍殲內人黨的人民戰爭！”其緊張氣氛，讓人感到內人黨徒處處都有，似乎就在你身邊，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我的心難以平靜。回到杭錦後旗，我仍感到忐忑不安。

我向下鄉幹部和五四大隊黨支部，傳達了中共八屆十二次會議精神和內蒙第四次全委擴大會議情況，一種不祥瀰漫在我們中間，眾人無心討論，只有幾位與我關係較好的朋友留下來和我深談。我的房東，70歲的張大爺在炕頭抽著旱煙聽著，突然打斷了我們的話說：“你們念書人就是東猜西想，想得太多，天下每天發生的事多了，和我們有多大關係？我活了70歲，經見得多了，也沒像你們這麼愁得慌。”也許，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

每天，我們仍按計劃伴同大青馬去積肥。隨著地裏的草肥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五四大隊社員們對來年豐收的信心一天比一天高。在與社員共同的勞動中，我的心情慢慢好起來。這裏沒有批鬥，沒有紛爭，沒有高音喇叭。每星期政治夜校舉辦二、三次文體活動，學習與娛樂交織在一起，好似一處世

外桃源。

幾天後，我們隊去巴盟烏拉特中後聯合旗（簡稱中後旗）要帳的人回來了，神態怪異，滿臉驚慌。中後旗有個牧業大隊，每年從我們這裏買草作飼料，冬季結算，是多年形成的常例。今年派去的人沒有要回錢，他說：“那裏正在打內人黨，所有牧民集合起來辦學習班，白天念政策，讓挨著個揭發誰是內人黨。晚上，棚子裏邊打邊審，慘叫聲到天明。實在呆不下去，只能回來。”

我問誰在那裏打人，他說，是旗裏派來的軍宣隊和貧宣隊。我們的心又一次揪緊了。我們擔心，如果其他地方也像中後旗這麼幹，不知全區要製造多少冤魂。

1969年元旦在不清晰的感覺中匆匆渡過。

村裏農民們卻不理睬上面的你爭我奪，照樣過自己的日子。公社裏組織了體育比賽和賽詩會，附近幾個村的農民扶老攜幼趕過來看，笑得前仰後合。中國農民畢竟是很容易滿足的。

二，挖到家門口

一天夜晚，我剛從政治夜校回到房東家，大隊看門人跑過來交給我一封信。信是從呼和浩特市發出的，妻子熟悉的字體讓我有種預感，“家裏出事了”。她在信中說，學校裏打內人黨搞得挺厲害，特格舍、黃金貴、王淑媛、傅榮、大烏雲等老師已經被隔離，每天強行推在桌子下“坐飛機”（向前彎腰，向後舉雙手），或者拷打。她也被勒令進了內人黨學習班，每天遭訓斥，限時間交待誰是內人黨。信的最後告訴我，兒子放在姥姥家，還一一交待家中衣物的位置。

我看著信，怒火滿胸，邊看邊流淚。房東大爺感到不對勁，趕快叫來工作隊幾位好友。我把信扔給他們後，立即收拾東西。上月常委會的羞辱我忍了，“七人黑信”的誣陷也耐過去了，當妻子陷入困境時，男兒的血氣、丈夫的責任心讓我怒髮衝冠。我急忙給工作隊和大隊黨支書安排了幾句，便和

兩位陪伴的隊友連夜趕往幾公里外的公社，那裏與外界聯繫更方便些。第二天大早，我趕上了從蘭州開往北京的火車（途徑呼和浩特）。

下了火車，我直奔滕海清辦公室，我知道那些該死的軍宣隊、工宣隊到處作孽的後台在哪裏。滕海清本人不在，滕的幾個秘書正準備吃晚飯，看見我風風火火闖進去，感到很突然。其中一位問我：“啊，你怎麼回來了？”我的怒火立時噴發：

“我怎麼回來了，我再不回來就家破人亡了。我下去勞動，你們抄我的後路，把我老婆打成內人黨，憑什麼？天下還有沒有王法，我只問你們管不管，你們若不管，我自有解決辦法。”

滕辦秘書還是見過世面、有幾分修養的。他們如長兄般讓我坐下慢慢說。我把妻子的信交給他們，他們立即撥電話給 16 中工宣隊政委。

我妻子所在的學校原是內蒙師院附屬中學，與師院屬於一個單位。文革前搞教改，劃為市屬 16 中，多數人仍然習慣稱附中。文革中，16 中與師院根本無法分開，所以，又將兩者合二為一，16 中的運動派系，隨著師院的形勢劃分。當時進駐 16 中的是內蒙華建派出的工人宣傳隊，隊長原是個站錯隊的保守派，軍隊代表任工宣隊政委。他們一進校，就圍殲 16 中教職工中的造反派，先打現行反革命，又乘挖內人黨之風，把造反派負責人隔離在辦公樓的黑屋子裏，將一般人員圍在學習班逼供。

幾十分鐘後，姓劉的政委到了滕辦，證實了我妻子信中寫的內容。滕辦立即命令 16 中的內人黨學習班停下來，並答應我，第二天讓工宣隊派出單位——呼和浩特市工代會去調查。

夜晚回到家，妻子詳細述說了 16 中挖內人黨學習班的情況。被揪出的人中，有我的同學、多年鄰居，他們怎麼是內人黨徒？我至死不信。我只相信，這一切都是人為作亂，是有意的傷害，必須主動出擊，警示警示這類惡行。

我的反擊是無奈的，在強權之下，我太弱小，無法對誰發號施令，也不想站出來公開對抗，擔負與新生紅色政權對立的罪名。唯一可行的是老辦法，重訴呼一司書控。做此暗中的小動作，以解除明下危機，明知目下等，但迫

兩天後，滕辦通知我去一趟，那裏坐著呼市工代會的造反派頭頭。他們問我知道不知道，16 中工宣隊隊長晚上回家時，被人捆起來扔在路邊，並警告他不准再踏入 16 中一步，否則將嚴懲不貸一事。我佯裝不知，避而不答他們的問題。呼市工代會的幾個人也認為，工宣隊隊長作孽多端，活該挨捆。

“小兒科”手術暫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但對許許多多受苦受難的人們，我自知身單力薄，實在是愛莫能助¹。

一天晚飯後，我去看望 16 前排宿舍的董紹章老師。董和妻子曾祥瑩老師都是北京師大畢業的高材生，學問和人品極好。

文革中，夫妻倆均造反。這次打內人黨，關押的第二梯隊將挖到他們頭上。我和董、曾老師見面時，開始還可正常交談，說著說著，董老師便嚎啕大哭起來。他說：“要不是你回來及時干預，我也沒今天了。”

他講述，內人黨學習班開辦後，全校停課。在一間大教室裏，造反派教職工坐在南側受審，保守派教師坐北側，一個接一個地訓話，敦促南側的“嘍囉們”揭發樓上頭頭們的罪行，限期交待內人黨名單，過期將如何、如何。工宣隊還組織學生擔任看守，讓不諳世事的孩子對階級敵人逼供，行刑。16 中 100 多名教職工，加上已揪出的死老虎，挖出 30 多名內人黨。

年輕漢子的哭泣，讓我傷感。這位山東籍大學生，學生時期入黨的北師大又紅又專的畢業生，來內蒙不過僅僅幾年，怎麼會是階級敵人！曾祥瑩老

¹ 口述至此，不得不再次面對良心的責問。說心裡話，我不是沒有考慮過，再當一次反潮流的帶頭人。如果再造一次反，我當時有兩個可以選擇的方案：一個是繼續發揮我寫“6.3 大字報”的精神，另寫一篇反擊濫挖內人黨的大字報。其後果是我被立刻逮捕，並有可能導致全區造反派的大分裂和內戰武鬥，但這個動亂的局面是我所不願意見到的；另一個方案，是給周恩來寫信反映內蒙情況，希望中央派人調查，我有往上遞信的通暢管道。然而，鑒於我當官以來經受的種種坎坷，我也缺乏這個勇氣，因為我害怕被中央貼上右傾保守的標籤。我當時隱約感到，中央知道內蒙的情況，甚至還默認內蒙胡來。否則，為什麼連高錦明這樣的高官，都被批判了呢？

後來才知道，中央對內蒙挖內人黨的實際情況，還真的蒙在鼓裏，連高錦明被罷官批判，也是滕海清一手遮天的結果。周恩來最後搞清內蒙問題的嚴重性，是通過他在錫盟下鄉的侄女周秉高才知道的。如果反思歷史教訓，可以羅列許多許多。往輕裏說，是四面楚歌的危險處境，迷住了個人的雙眼，再也沒有當年造反時的膽識和魄力；往重裏說，是中共這架陳舊腐朽的官僚專制機器，阻擋了下情上達和自由表達意見的正常管道。在這樣的體制下，不出大亂子是幸運，出大亂子很正常。

師說，他們夫妻倆可以豁出去，可兩個年幼的孩子怎麼辦。

我的心緊緊地縮成一團，無言對答。

1973 年，董紹章夫婦在同學的幫助下，調到河北唐山礦冶學院任教。他倆在寫給我們的信中，高興地述說他們的美好境遇，幸福感充溢在字裏行間。

不幸的是，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毀掉了他們的家，僥倖餘生的只有董老師和他的大兒子。聰慧的曾老師、二個小兒子及其岳母，永遠埋在災難中。逃過內人黨一劫的董家，為什麼沒繞過這一劫？

我的東鄰是位優秀的數學老師，她的丈夫是蒙族，夫妻雙雙被隔離在師院和 16 中，家中孤零零留下兩個幼小的孩子。其夫因是“內人黨黨魁”被打，腿留下殘疾，她則因多日鑽在桌下受刑，背過早地駝了²。

三，處處聞泣聲

回鄉下前，我踏進內蒙師院校門，校園裏死一樣的靜，沒有一點兒活力。一些教師、職工正在軍宣隊、工宣隊支持下挖內人黨，聽說挖的指標是上百人。我質問是誰定的指標，工宣隊長對我的問話很不以為然，熟悉我的老師強行把我拉走。外語系已不似往日模樣。一些教師正在擦玻璃，打掃衛生。我與蹲在窗台上擦玻璃的鄭梅娟老師搭話。我當學生時，她由華東師範大學畢業來校當教師。她悄悄對我說：“王履安已被抓起來了，正在打內人黨，什麼時候再把你抓起來，外語系的任務可能就算完成了。”

我不能在普通教師面前表現怒色，便回身去辦公樓找師院軍宣隊隊長、實際的第一把手任政委尋問。他否認此事，還勸我不要聽人挑撥，追問是何人造謠。

事後兩個月，師院果然打了上百名內人黨，完成了內部預定的指標。在

² 師院附中挖內人黨的情況，與全區其他基層單位相比，應該算是比較幸運的地方，基本上沒發生打人致死的事件。而這段時間在其他地方，致死致殘的案例成千上萬，司空見慣。詳情參見圖們和祝東力合著：《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年，北京。另請參考阿拉騰德力海所編著的書稿：《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第 85—116 頁，1999 年 9 月印刷。其中既有數字，也有具體的案例分析。

軍、工宣隊的操縱下，外語系把王履安打得死去活來，逼問他外語系有幾個內人黨，他拒絕亂咬，拒絕回答“高樹華是內人黨”的問題。王履安一直被關押到1969年毛領袖5.22批示下達前，才獲准釋放。

我剛剛返回鄉下不久，核心小組成員，在內蒙主持工作的李樹德打電話說，中央讓各省市草擬一份中共新黨章，供九大籌備處審議選擇，籌備九大的事情也很多，滕、吳等人同意讓我參與。回到呼市，到處傳說挖內人黨的事，呼市第二毛紡廠造反派頭頭段建勳也被打成內人黨，已關押月餘。

一天晚間，原內蒙文藝革命辦公室一起工作的軍區文工團的董福華結婚，請我參加。八、九點鐘時，從遠處傳來淒慘的呼救聲，我很奇怪，內蒙軍區政治部大院內竟有此類聲音。董福華夫婦告訴我，正在打內人黨，主持這事的是內蒙軍區支左辦公室馬殿元等人³。我無心再聽下去，出董家門後直奔滕辦，滕辦不承認有武鬥的事。爭論不下，他們撥通了馬殿元的電話，讓我和馬對話，馬極力否認。

我說：“剛才在政治部大院親耳所聽，事實俱在，你無法否認。”馬承認有武鬥，他說：“對壞人打幾下沒什麼。”我問他：“你們沒有證據證明人家是壞人就動手，況且壞人也不能打，你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哪裏去了？”他譏諷我變了，右得差不多和敵人站在一起了。我反唇相譏說：“你很左，左得能當打手，下一步是不是還要殺人！”雙方的爭論以摔電話結束。

這是最後一次和馬殿元說話。1970年，內蒙軍管後，馬調到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在審查他打內人黨問題時，他思維陷入紊亂，繼而精神崩潰，跳樓自殺身亡⁴。

³ 馬殿元，原內蒙軍區政治部幹部，二月逆流期間是軍區紅色造反團的頭頭，曾經支持呼三司造反派。中央八條之後，進入權力機構，成為挖肅骨幹。

⁴ 對於馬殿元在石家莊步校的跳樓自殺事件，外界也有不同版本。一種說法認為，馬殿元被調離內蒙軍區，原本是要被軍方保護起來。但在調查內人黨問題過程中，馬殿元透露了太多內情，涉及到軍方上層與內蒙血案的關係。為了拋清上層領導人的法律責任，因此才製造了馬“畏罪自殺”事件，有“捨車保帥，殺人滅口”之嫌。無論馬的死亡屬於哪種情況，都再次驗證赫魯曉夫的“絞肉機”理論。

四，12月匯報提綱

高錦明被批判後，權星垣、李質自然受到牽連，名義上還保留著職務，實際與停職差不多。中共內蒙核心小組只剩下滕、吳、李樹德三位。李樹德主持工作，滕在北京的時間比在內蒙多，吳主持內蒙軍區工作。

滕海清在內蒙高層角逐中雖暫居上風，但他也因此被權力兩字蒙住了雙眼，完全無視高錦明在9.25講話中所提的問題。他把高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也把全區百姓拖入災難。

1968年十二月，李樹德在解釋毛領袖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時說，在內蒙古，則表現為“共產黨與內人黨鬥爭的繼續”。滕海清不僅同意，而且在內蒙古毛澤東思想大學校⁵連級以上幹部講話時，重複了這段“解釋”。幸虧滕辦秘書提出“此解釋不妥”，滕方停止在更大的範圍內宣揚，避免了更深更廣的思想混亂。

1968年12月，滕海清準備向中央匯報挖“內人黨”問題，即由滕辦主任李德臣執筆，寫出了一份《關於“內人黨”問題的匯報提綱》，這就是有名的12月匯報提綱。開篇前言這樣寫道：

……根據四盟、二市（欠呼、哲、巴三盟）的不完全統計，到12月10日已挖出內人黨徒10900名。從已揭露出來的情況看，這個集團不僅是一個分裂祖國，妄圖實現內外蒙合併的反革命集團，而且是一個與蘇、蒙修特務，美、蔣、日本特務有密切勾結，以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龐大的特務情報組織。……

前文提到過，李樹德、李德臣曾內定十大專案為突破口，最早突破的是

⁵ 《人民日報》1966年8月1日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中，發表了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如“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此後，此類大學校在全國各地應運而生，學校編制仿照部隊，與五七幹校和各種學習班大同小異。

軍隊內鮑音扎布和內大巴圖兩個專案。12月匯報提綱的所有論點和結論，主要來自鮑和巴兩人被逼出的“口供”。

然而事實上，內蒙大地上發生的情況，遠遠超出提綱所言。到1968年12月份，全區挖內人黨的人數根本不是幾萬人這個數字。全區當時到底挖出了多少人，辦了多少挖內人黨學習班，有多少人被致死、致殘，有多少仍在關押中，有多少人仍受著折磨，有多少人已被列為懷疑目標……這些問題滕海清、吳濤、李樹德都說不清楚。

據滕的秘書陳曉莊，後來在唐山學習班所寫大字報透露，滕在1968年12月20日到京後，聽到北京軍區一位部長反映內蒙的打人情況，於12月30日曾提出嚴禁逼、供、信等五條政策，交李樹德傳達。此時，滕感到對運動發展沒底，有些搖擺，但又不能放棄原定目標。

五，滕將軍不識號音

1969年1月25日至2月6日，滕海清在北京把內蒙各盟、市負責人召集到北京軍區所屬的解放飯店開會。會議研究三個問題：一是1969年的工作安排；二是內人黨問題；三是一元化領導問題。在各盟、市匯報時，滕海清的插話仍是繼續反右。

回憶至此，我很難選擇一個準確的辭匯來描繪滕海清當時的心理狀態。說他反右反昏了頭，神志有毛病都不準確，說他已經“瘋了”，可能差不多。參加過這次會議的內蒙革委會常委、呼倫貝爾盟革委會副主任李楓，會後曾說：“這次會上，滕司令員講了解放初三反運動時打‘老虎’，開始打了一大堆，最後落實僅幾個，我心裏感到放鬆了，我怕不好收攤子。”李楓畢竟知道一些下情，於是才動搖、猶豫。但，滕海清以三反打虎之例鼓動下屬的蠢舉，把一大批幹部也拖進了罪惡的泥潭⁶。

⁶ 這裡涉及到如何評價中共建國後所搞的其他政治鎮壓運動。從滕海清的講話來看，“三反五反”的擴大化也十分嚴重，那麼其他運動呢？近年來，有許多老幹部寫回憶錄，開始逐漸恢復被官方媒介所塵封的歷史真面目。我們逐漸看到，幾乎每次鎮壓運動，都充滿所謂

滕海清爲什麼不靜下心研究一下，或揣摩一下毛這時對清理階級隊伍是收還是放？這不是什麼複雜的事情，連一般的紅衛兵對這一套已爛熟於心，滕海清卻渾然不覺。這個疑問，我已無法向九泉之下的司令員追問了，如同歷史的許多謎團一樣，讓它永遠神秘下去吧！曾記否，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後，1968年12月26日，毛領袖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的《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了如下的話：

“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爲都是壞人。”

毛領袖這段話，與文革初期“把走資派定爲敵對分子，必置於死地而後快”的初衷，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毛的改變意味著什麼？打了半輩子仗的滕將軍，竟然連“停止進攻，退回原地”的號音也渾然不知；連起碼的察言觀色，聽聽上面有什麼動靜的世俗之道也不懂。只能說，可歎滕海清，天生就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

1968年12月以後，許多與滕同爲地方大吏的極善揣摩動向者，正是利用了毛領袖“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這個新概念，爲解放一大批打倒的人找到了依據。

1969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明顯降低了階級鬥爭的溫度。社論中轉達了毛領袖最新指示，“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要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這麼明確的政治鬥爭指向，滕海清硬是沒有警覺，沒有懸崖勒馬的意識，竟然在1969年1月，以內蒙革委會名義發出的第5號文件中，仍然堅持全區進一步深挖。

當毛領袖明顯地把落實政策定爲運動主調之後，滕海清和中共內蒙核心小組再剎車爲時已晚，已失去了回頭的機會。

的“擴大化”和冤假錯案，三反五反如此，整風反右如此，四清文革如此，反胡風、反彭德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四五鎮壓、六四鎮壓，等等，好像莫不如此。如果再往上追

雖然，1969年3月後，正在北京參加中共九大預備會議的滕海清、吳濤，以滕、吳首長名義三天一封電報，五天一次指示，要求全區立即停止挖肅，要求放人，要求落實政策，已為時晚矣。下邊各級軍宣隊、工宣隊、貧宣隊及群專組織已挖紅了眼，百米衝刺後想停下來，也有慣性的推動。而且，那些第一線的挖肅鬥士們，這次輪到他們犯糊塗了：“怎麼了，挖得好好的，又讓停下來！”當時有句順口溜“叫我挖來我就挖，你挖一個我挖仨；挖出錯來誰坐蠟？滕海清和李大麻【指李樹德——引者】⁷。”對愚鈍的滕將軍來說，如果他當時能聽到這個順口溜，難道不是一記發人深省的耳光嗎！

不久，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內蒙古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批判滕海清的狂潮，成千上萬的受害群眾，湧入呼和浩特市找滕海清算帳。1969年5月，滕海清終於在一片“打倒”聲中，低下了那顆倔強的頭。

⁷ 因李樹德臉上有麻子，故得此外號。必須承認，拿別人的生理缺陷起外號，什麼張癩子、李聾子、王瞎子、李麻子等等，是我們中國人的陋習之一，或者是中國文化中應該拋棄的糟粕成份。

第三十七章

挖“內人黨”冤案（下）

我手頭保存著當年的三份材料，均與挖內人黨有關。一份是發表在 1969 年 7 月 20 日《工人東方紅》¹小報上的“關於西蘇旗問題的反映”；一份是《內蒙古交通廳科學研究所調查報告》，是駐所工宣隊 1969 年 4 月 11 日上報的；再一份是昭盟巴林右旗上訪團所反映的白音汗公社深挖內人黨的情況。本章詳細介紹，以窺挖肅災情之全豹。

一，逼供出的“碩果”例一

錫林郭勒盟西蘇旗上訪團，1969 年 6 月 14 日寫給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的一份“情況報告”。

錫盟西蘇旗（正式名“蘇尼特右旗”）挖肅，是滕海清在全區挖內人黨推廣的一個典型，有過 1968 年 7 月 24 日的講話和 4 月 26 日的批示。西蘇旗挖肅經驗曾三次登上《內蒙古日報》。該旗面積二萬多平方公里，近乎於歐洲的阿爾巴尼亞，全旗人口十幾萬人，以牧業為主。1968 年 6 月 25 日，部隊介入西蘇，一個副政委、一個副參謀長為旗革委會負責人。

這份報告共分三部分：（一）挖肅概況；（二）我們為什麼第二次上訪；（三）我們的要求。這裏，我只介紹（一）中的部分內容。

1969 年 1 月，旗革委會宣佈，全旗挖出“內人黨”、“統一黨”、“莎窯子黨”、“新蒙青黨”、“黑虎廳”、“白虎廳”等反動組織 30 多種，“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成員，占全旗總人數的 13.45%，其

¹ 這是一份由內蒙《工人公社》、《決聯站》等造反派組織創辦的群眾報紙。

中蒙族占挖出總數的 87.4%。……，據我們初步調查，全旗共挖出 X 萬人，約占總人口的 25%。

全旗共產黨組織被打爲內人黨組織。共產黨員被打成內人黨的，占全旗黨員的 85%，85% 的國家幹部定爲階級敵人。旗委副部（副科）級以上幹部，全部被打；公社一級幹部中，只剩下 4 名不是“內人黨”；生產隊一級幹部，除 25 屬懷疑目標外，其餘全被打成“內人黨”成員。

旗內造反派組織成員，90% 以上未脫干係。造反派組織都定爲“內人黨”黑據點、黑窩子、黑勢力。全旗 150 多名戰鬥隊長以上頭頭，只剩下一名，還是懷疑對象。新民公社共有造反派 300 多人，全被打成新內人黨變種組織成員。

原旗直屬機關各單位革委會中，結合進的革命造反派全部因內人黨被掃地出門，頂替他們的是原保守派組織的人員。

在一些牧業基層單位，如賽漢勒吉公社、布士木吉公社等，原蒙族幹部均未倖免，生產隊第一把手都換成漢人擔任。其中相當一些身份不清的人員² 掌權後，任意揮霍集體財產，給廣大蒙古族百姓造成精神傷害，民族關係日趨緊張。敖幹希里大隊，14 歲以上的蒙族，幾乎全部登了記。貧下中牧說：“再挖連牛羊也挖進去了。”

全旗所有挖肅“學習班”均設有禁閉室、審訊室。使用的刑罰有 100 多種，如“壓杠子”、“過電”、“紮火罐”、“坐火爐”、“開水燙”、“插竹簽”、“鉗手指”、“吊頭髮”等。新民公社一位貧農社員，是 1938 年參加共產黨抗日的老同志，曾身負 27 處傷，是國家二等一級殘廢軍人。在刑訊中，他讓爐鉤子在原傷處燙了 27 處。至於刑訊中污辱人格，污辱婦女的惡行數不勝數，根本登不上統計表格。

² 此處指從內地農村流落到邊疆牧區來的所謂“盲流”人員。大部分在六十年代早期，由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的農村流出，跑到內蒙牧區來謀條生路。其中多數人未必是壞人，只是由於害怕被遣送原籍，許多人用假名字和假籍貫，因此被本地牧民視爲身份不清的外來人口。這裡也涉及民族、地域和文化等複雜的矛盾衝突。

西蘇旗挖內人黨帶來的是毀滅性災難，上百人致死，上千人致殘，許多家庭慘遭蹂躪，本不發達的工、農、牧業生產，均受到嚴重破壞。

二，逼供出的“碩果”例二

內蒙古交通廳是內蒙直屬的一個部門，其下屬的科學研究所在 1968 年 3 月曾進駐了一支工人宣傳隊，為呼市工代會所派遣。工宣隊共 7 人，進駐後與原來的軍宣隊代表，時任所革委會主任發生矛盾。作為情況反映，他們上報過一份材料轉到我手中，故保留至今。這份材料包括該所概況、科研所鬥爭史、革委會情況、群眾組織、專案組、敵情等問題。現摘錄如下：

一，概況：

全所由四個測量隊、一個鑽探隊、一個科研所、一個辦公室組成，共有職工 190 人，其中行政幹部 26 名，占 13.7%；工程技術人員 93 名，占 48.9%；工人 71 名，占 37.4%。共產黨員 20 名、共青團員 34 名、國民黨員 7 人，三青團員 7 人。……

地、富、資本家家庭出身的 48 人 占 25.2%

商人、小商、小手工業家庭出身的 6 人 占 3.2%

職員家庭出身的 5 人 占 2.7%

上中農家庭出身的 3 人 占 1.6%

中農家庭出身的 37 人 占 19.5%

自由職業者家庭出身的 3 人 占 1.6%

貧農、城市貧民、工人共 85 人 占 44.7%

出身不清的 3 人 占 1.6%

大學文化程度 35 人、中專 57 人、高中 14 人、初中以下的 84 人

原東方紅造反組織成員 94 人（其中工人 43 人、知識份子 51 人）

原井岡山造反組織成員 58 人（其中工人 24 人，知識份子 34 人）

未參加組織的 7 人。

其餘爲已揪出的或當權派等。

二，鬥爭史：

東方紅總部於 1967 年 3 月 18 日在師院東縱二樓成立，19 日回所時 23 人，社會上是三司觀點，掛在“市工交總部”屬下，受到工學院學生的支持。井岡山縱隊是（1967 年）3 月 26 日由無產者保守組織內退出的 13 人組成。它們向“市工交總部”掛鈎被拒，認爲是老保，後來跨行業歸屬市工總司。

東方紅、井岡山在 1967 年 9 月 27 日大聯合，成立“革聯”，但組織上聯合了，思想上始終未聯合。

三，革委會成立

革委會由 5 人組成，暫缺主任，……

1968 年 12 月，軍代表任主任以來，就把原東方紅觀點的副主任（革命幹部）、兩名委員（造反派頭頭）等三人下放到基層蹲點，同時整理材料準備吐出，並吸收原井岡山觀點的人掌權。……

工人宣傳隊進駐後，著重整頓領導班子……關於下放的三人，據我們現在掌握的情況，是有缺點錯誤，但不夠吐出的條件，……但我們說話不頂用。

四，群眾組織[略]

五，專案組[略]

六，敵情

編 號	姓名 (略)	家庭 出身	問題 摘要	處理 辦法
1		地主	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特嫌、階級異己分子	群眾審查
2			內人黨變種組織“農牧民前進會”骨幹分子	隔離審查

3	僞職員	三青團逃台未遂、國際宗教特務、統一黨	隔離審查
4	地主	CC 特務、國民黨、僞法院法官	群專
5	僞官僚	國民黨、日僞特務	群專
6	地主	三青團區隊副、力行社 ³ 成員	1957 年歷史反革命
7	地主	國民黨員、僞科長、中統潛伏特務	1968 年 4 月逮捕
8	官僚地主	三青團員、軍統特務、有潛伏嫌疑	群專
9	商人	國民黨中校、有組織軍統潛特	群專
10	資本家	國民黨員、英國從香港派遣特務	群專
11	資本家	右派集團成員	群眾審查
12	地主	對新社會不滿，階級復仇分子	群專
13	地主	壞分子、右派集團成員	群眾監督
14	貧農	對社會不滿，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	群專
15	貧農	叛徒、逃兵	群專
16	僞職員	台灣派遣特務分子	群專
24	貧農	僞造證件；貪汙，“統一黨”副書記	審查
25	地主	漏劃地主分子	審查

科研所特務嫌疑案件五起：

1 國際美蔣特務，待令潛伏分子案 未破；

³ “力行社”為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的公開名稱。

- | | |
|--------------------|-----|
| 2 香港照片案 | 未破； |
| 3 特務組織案 | 未破； |
| 4 內人黨變種組織“農牧民前進會”案 | 未破； |
| 5 “統一黨”案 | 已破。 |

在這份材料中還有一段“概括匯報”的說明文字：

原東方紅觀點的人最多時 94 個人，其中有 88 名在“統一黨”案。這 80 多名是怎樣在案的，我們初步掌握：1 有逼、供、信現象；2 逼供出來後，又拿到未交待人面前誘供，不承認再逼；3 只要有供詞就寫上，研究所咬出來的“統一黨”，幾乎全是原東方紅的頭頭和隊員。……

內蒙交通廳研究所是一個不大的單位，挖肅“成果”竟涉及 50%以上的人員，造反派成員從頭頭到一般隊員幾乎全軍覆沒。

三，逼供出的“碩果”例三

下邊是發表在內蒙革委會批滕聯絡總站編印的《5.22 通訊》第四期（1969 年 6 月 16 日）第五版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白音汗公社挖‘內人黨’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全文轉載了昭盟巴林右旗上訪團 1969 年 6 月 10 日遞交的反映材料，筆者擇其要者，摘錄如下：

白音汗公社有 11 個生產大隊（其中 6 個牧業大隊，42 個生產小隊，6000 多人，其中蒙族近 3000 人）。

白音汗公社革委會共由 14 人組成，8 名蒙族委員中有 7 名被打成內人黨。公社直屬機關 95 名職工幹部中，48 名被挖，占 52%；蒙族幹部則占 64%，共產黨員占 47%。全家被打成內人黨的有 10

戶，有兩個共產黨支部被打成內人黨支部。

全公社 6 個牧業大隊的 134 名黨員，98 名未逃厄運。全自治區有名的紅旗牧業大隊一位先進代表，被打成內人黨後，不顧他身患重病，強行拉進會場，輪番批鬥。

這樣多的“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究竟是怎樣挖出來的呢？一句話，就是私設公堂，酷刑拷打逼出來的。所用的刑罰是：上吊、毒打、壓杠子、綁小繩、蹲凳子等 40 來種。有的人晝夜不讓睡覺，逼迫兄弟、父子、夫妻、朋友之間互相亂咬。有個牧業大隊主任，在毒打之下，只好交出一份奶牛統計數字和飼料播種計劃，作為內人黨的“證據”。

“內人黨”家屬得了病不准醫，導致兩戶小孩，重病死亡。公社一女教師，被逼抱著不滿一歲的小孩彎腰，在脖子上壓杠子。

他們不讓我們說蒙語，教訓我們“要說中國話！”

如果說，進駐內蒙古交通廳科研院所的工宣隊，畢竟還保留了一點人道精神，那麼軍宣隊則幹得更加徹底，這和西蘇旗及許多地方的情況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後期，軍隊始終是毛領袖手中重要的“王牌”。鄧大人及其之後的執政者，拋卻真相，把本來該由軍隊擔負的責任，轉嫁給造反派，把紅衛兵做擋箭牌。更有甚者，還歪曲歷史，並通過各種傳媒，散佈到全世界。

文革初的造反派僅是毛領袖的衝殺工具，一、二年後便被打入冷宮，任意宰割。文革後，又被官方文革史貶為萬能垃圾桶，把一切壞事、髒事、醜事，統統扔進桶內，一了百了。

讀者不妨從幾個省留下的烙印，窺見內情。在河北省，38 軍支一派，省軍區支另一派；山西省，69 軍支持一派，65 軍支另一派，省軍區同樣袒護一方。內蒙古的二月逆流，是內蒙軍區幾個領導人一手炮製的；在挖肅、打內人黨運動中，又是軍隊領導人起支配作用，例如：全內蒙的滕海清、吳濤；呼和鐵路局軍管會主任夏一超；錫盟軍分區司令員趙德榮；哲盟軍分區司令員趙玉溫；烏盟京字 411 部隊政委周發言、騎五師師長武尙志、軍分區司令

員賀壽其；呼盟軍分區政委尙民等等。

這些人闖下大禍後，僅草草檢查，便紛紛調離原地，保職的保職，升遷的升遷，實在不能平民憤者，退役後進入軍隊在各地的幹休所養起來。

軍隊在中國是個特殊群體，一個封建專制的堡壘，享受著特殊待遇，有沿襲的法權保護。

四，指標、數字和名單

中國官方有個奇特嗜好，就是定指標，定數字。

1968 年初，挖肅開始不久，革委會負責人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等都向群眾算過這樣一筆賬：全區共 1800 萬人口，如果揪出三、五萬人，還不到百分之一。毛主席說過百分之九十五與百分之五的關係⁴，內蒙並沒超過這一範圍。按他們的邏輯，真正達到 5%，全區要預設一個 90 萬人的敵人圈子，涉及 90 萬個家庭，那麼，受牽連的人將是幾百萬。這一簡單的數學題內涵不簡單，聽起來駭人聽聞，但這確實是當權者的思維邏輯，而且風靡全國⁵。

滕海清於 1968 年 7 月 24 日對西蘇旗的講話中，曾說過“你們西蘇旗複雜，但還有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是好的吧”。滕本人對西蘇旗毫不知情，他一天也沒去那裏呆過，他何以如此定論？西蘇百姓說，“滕海清在胡說八道”，實在不過份。

1968 年 10 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滕與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在飯廳裏偶然相遇。私下交談中，滕得知江西已清出 40 萬，還將繼續清下去。

⁴ 按照毛領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各級政府和專政機構，定出了一套對人群的劃分比例，其中 95% 屬於人民內部矛盾，5% 則屬於敵我矛盾。

⁵ 這裡需要進一步說明，搞鎮壓、劃敵人、定指標，並非群眾的創造，更不是人們觀念上的一時誤會。它首先是上層領導人的指導思想和專政機關的政策基礎，推行久了，當然會誤導基層幹部和執法人員的思想，從而導致“寧左勿右”大行其道。始作俑者是毛領袖和他的專政機器，是他們首先破壞法制，並進而毒化全社會的觀念。上樑不正下樑歪，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滕招指一算，內蒙挖肅遠不夠這個數字⁶。

陳曉莊在唐山學習班的一張大字報《關於內人黨和其他問題的一些決斷》，對挖內人黨有一段淋漓盡致的描述：

我們滕辦幾個人，1969年3月底去烏盟瞭解集寧市挖內人黨問題時，在火車上遇到烏盟絨毛廠賈成元（盟革委會副主任、烏盟造反派主要負責人）。他人已變形，剛剛從嚴刑逼供中跑出來，到北京去上訪。賈說，挖內人黨是1968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的內人黨登記月開始的。開始無人登記，上面一級級要數字。1968年10月17日，根據集寧市裏的口供材料，先挖出絨毛廠原人事科長，在逼供下，該人咬了一大堆，就這樣，雞生蛋，蛋變雞，在1300多人的廠中挖出了90多人。……

當時的集寧市革委會主任叫陳明至，是北京軍區下屬一個師的作戰訓練科科長。在他指揮下，用這種不顧任何事實，只要名單、數字、指標的做法，逼市革委會機關100多名幹部在武鬥和刑訊下，打出90多名內人黨。”

上述對烏盟地區挖內人黨的描繪，形象地再現了可憎的思維形態。1951年“三反”“五反”要數字；1957年反右，為完成指標，不惜犧牲無辜；1958年糧食畝產放衛星⁷；1959年打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指標和數字，照樣層層下達……

⁶ 這個可憐的滕海清，他也不問問江西和內蒙人口總數的差別有多大！儘管江西省的面積只有內蒙的幾分之一，可它當時的人口總數，卻是內蒙的好幾倍。如果內蒙學習江西，挖同樣多的階級敵人，那麼按人口比例計算，內蒙豈不要比江西高出好幾倍！草莽治國，夫復何言！

⁷ 指大躍進中，對糧食畝產量無限誇大的形象比喻。當時蘇美兩國都放了人造衛星，中國的太空科學尚不夠發達，但是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求農民在產量上“大放衛星”，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於是層層加碼，吹噓糧食產量放了衛星，一直吹到棉花畝產幾千斤，小麥畝產幾萬斤，紅薯畝產幾十萬斤等等。不但無知的基層幹部吹，留美學者錢學森等中科院的權威們，也公開出來發表文章，論證小麥畝產幾萬斤的科學依據，貽笑大方。

令人可悲的是，1969年群眾批滕時提出“內蒙到底挖了多少人？”、“多少人傷？”、“多少人死？”等至關重要的數字，反而無人披露，連媒體避之唯恐不及⁸。

⁸ 老百姓如此關心的這些血淚數字，千呼萬喚之後，1980年11月份，終於披露在中共對康生、謝富治和林彪、四人幫的“起訴書”上。官方的數字說：“有34萬6千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萬6222人被迫害致死（見《康生與“內人黨”冤案》第2頁）。但是，受害者們普遍認為，這是個大大縮小的數字。真實數字是多少，有比較保守和比較誇張兩種。綜合而言，遭到挖肅的人員總數，有可能高達50萬左右，傷殘者8到10萬，迫害致死者3到5萬（詳見《南蒙古人權資訊網》）。

第三十八章

參加中共九大

1969年元旦在杭錦後旗鄉下渡過。身在杭後，但我始終擔心挖內人黨要引致災難性後果。周圍旗縣傳來的可怕消息越多，當地鄉親越感到自己慶幸。公社書記雷喜喜隔三岔五找我聊天，還請我們下鄉幹部在他家吃過一頓飯，他準備好好籌辦一下過春節的事。

一，九大見聞

我們仍每天拉車積肥，從未中止。房東張大爺看不過去，催促我歇幾天，“哪有你這麼幹工作的。你不歇，別人也不好意思歇。快過年了，每家總有些事情辦。”我聽出大爺話中的道理，便提議冬季出工暫停，我也趁閑和幹部討論一下春耕的安排。

這時，主持工作的李樹德讓秘書打來一個電話，讓我趕快回呼市，協助籌備中共九大事宜，下鄉幹部們也準備回家過春節。這時，我已知道，自己被推選為中共九大代表¹。

官場廝殺中，我漸漸領略到仕途兇險，也有了一些應對經驗²。在新城賓館七號樓，我對秀才們的工作只淡淡過問一下，便把修改後的黨章草稿交李

¹ 此處需要說明，“九大代表”的“推選”過程，並非所有黨員每人一票的無記名海選，而是由自治區核心小組指派幾個人，根據中央意圖擬定一個代表“推選名單”，再交給下面的黨組織走一下“徵求意見”的形式。在這種所謂“民主集中制”安排下，基層黨員一般既不敢、也不願表達任何疑義。

² 我為什麼被選中為“九大代表”，我自己也稀裏糊塗。按理說，我不被滕辦看好，他們理應選自己的紅人出席，畢竟九大代表並非無足輕重。但我又因為處境險惡而心生退意，因長期下鄉而逃避了鬥爭漩渦。或許是我的“裝傻充愣”和“韜光養晦”，讓他們恢復了對我的信任？或許是總理對我的幾次誇獎，讓他們不得不重視我？總之，究竟什麼原因起了決定性作用，我至今還是鬧不清楚。

樹德過目，然後報送中央。

1969年2月底，出席中共九大的內蒙代表在呼市集中，3月下旬，乘火車到北京，住進京西賓館，開始學習大會籌備處發下的各種材料。在京西賓館下榻的還有北京、河北、山西、天津及中央直屬機關的代表。在此我遇到聶元梓，我與她打招呼，她似乎忘了我是誰。清華女紅衛兵陳育延和她在一起，陳在清華的綽號叫陳常左，是蒯大富的得力助手。

大會強調紀律及保密，工作人員與代表一律不准外出，不許請假等。每天天黑前，服務員把走廊及房間厚厚的窗幔遮蓋得絲光不露。大會秘書處傳達中央指示說，世界人民關心我黨九大，可是帝修反³也時時窺測中國動向，在未公佈九大召開之前，每個人都要把保密放在首位。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

那天，除安排老弱病殘坐進大轎車，其他代表配戴統一標章，從賓館院內一個地道口進入地下，以三列縱隊沿地下長廊進發，不准說話，空氣中有股潮濕氣味。走了一個多小時，前面的路越來越寬，磚地換成水泥地。從一個地道口走出來時發現，已經進入人大會堂後院，直通九大會場⁴。

開幕式上，代表見到毛領袖都激動不已，毛每講一句話總被掌聲打斷。事後，康生在討論時說：“見到毛主席很激動可以理解，但激動不能代替革命。那天主席很高興，他是要講許多話的，但總被掌聲打斷，他講不下去了。

³ “帝修反”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縮略語。當時毛領袖和中共中央的對外政策，幾乎是全方位的自我孤立和自我封鎖，提出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北美、西歐、日本等），以蘇聯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蘇聯和東歐集團），以及其他一切反動派政權（包括臺灣、韓國、南越、南非、以色列等等）。真正被中國視為盟友的國家，只剩下越南、朝鮮、古巴、阿爾巴尼亞等幾個小夥伴。

⁴ 回過頭來看當時中共九大的籌備工作，好像令人感到既可憐又可笑。可憐的是，貴為全黨代表，居然要像部隊拉練一樣，排隊鑽地道，走遍半個北京城，還要像耗子一般從後門進人大會堂。可笑的是，如此高度保密，難道真能封鎖洋人嗎？只要翻翻當年的國外電訊，關於會議籌備情況早已開始大肆報導和分析。恐怕真正被封鎖的人，是中共的廣大黨員和非黨群眾。另外，一個處於完全絕對控制中的黨代會，為什麼要高度保密呢？恐怕和掌權者的心虛有關。按照中共黨章，代表大會應該每五年召開一次，但從八大（1956年）到九大，居然相隔13年，是毛澤東等人無視黨章和破壞憲法（也不召開人代大會）。因此，從違章、非法和心虛的角度，也許更容易理解這些奇怪的保密措施。

我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人，聽他講話的機會也不多，這麼好的機會被你們的激情打斷了，你們不覺得可惜嗎？……”⁵

在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領袖講話被打斷的次數少了。他講道，不要怕蘇修的烏龜殼，要發揚珍寶島戰役精神，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等等。在選舉新中央委員會時，我在台下看到毛領袖與身邊的董必武老人親切交談。

九大上傳達了鄧小平給毛主席的信。鄧小平檢查自己犯了嚴重錯誤，表示要對自己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對自己的問題永不翻案，並願意再為黨工作，哪怕當一名圖書管理員。毛在九大預備會上講到這個問題時說過，鄧小平與劉少奇有區別，鄧這個人還是能幹的，建議在汪東興手下當一名圖書館管理員⁶。

1975 年，我參加四屆人大時，從尤太忠、吳濤（當時內蒙領導人）那裏得知毛領袖對鄧小平的新評價，“小平同志人才難得”，囑咐他要“柔中富剛，棉裏藏針”⁷。但鄧復出後，該怎麼幹還怎麼幹，招致毛將他再次打倒⁸。

⁵ 眾所周知，聽眾的鼓掌和歡呼，只能提高演講者的激情和興致，絕對不會惹講話人不快。誠然，鼓掌太多，會佔用一點時間，那麼就延長一點開會時間好了，難道還有什麼人，敢斗膽限制毛領袖的講話時間嗎？康生這個人，大奸大惡，誰要敢於公開頂撞他，他立刻可以宣佈你是“階級敵人”。只因擁有如此顯赫的絕對權力，他才有膽量這樣無禮對待九大代表的擁毛熱情，像內蒙老鄉常說的：“把好心當成了驢肝肺”。

⁶ 這裡提到毛澤東、鄧小平和汪東興三人之間的一段關係，這是個非常有趣而且值得深究的課題。鄧小平為了早日復出，以便積蓄東山再起的實力，的確曾受“胯下之辱”，做過“永不翻案”的承諾。但屈就圖書管理員，而且在政敵汪東興手下服務，這些秘辛外界尚無人提及。以鄧小平的雄才大略，去當圖書管理員，豈非笑話！如果毛領袖的話當真，那就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一是毛領袖想繼續羞辱鄧小平，或者讓汪東興把他監視起來，言外之意是對鄧仍不放心；其二是鄧和汪已經有過私下溝通，在如何對付林彪、四人幫上有了共識，甚至已經結盟。由汪出面要求，讓毛同意鄧當一名中央檔案館（屬汪東興管轄）的資料員，以便把鄧保護起來，伺機東山再起。從後來的事態發展判斷，後一種可能性比較大。究竟真相如何，希望知情人士，能早日披露這段歷史公案。

⁷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對周恩來送審的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決定稿的批語”一文注釋「1」。

⁸ 我們不可能在此全面評價鄧小平一生的是非功過，但就鄧大膽修改毛的經濟方略，把中國帶向改革開放來說，他的確居功至偉。但也無可否認，在鄧小平於 1976 年春天被第二次打倒之前，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遠遠遜於毛周以及劉少奇等人。正由於他第二次被打倒，全國開展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才真正在老百姓心目中樹立了鄧的崇高威望，其道義地位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匹敵，這才為毛領袖去世之後的鄧小平復出，打下了堅實的

從九大簡報中，我還看到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陳毅、李先念等人的檢查。我記得，徐向前特別檢查了對內蒙支左的錯誤，證實了蒯大富所言。文革被否定後，老師們拒認以前的檢查，說他們的檢查是被迫的。

會議期間，我經常見到總理。一次在飯廳門口，總理認出我，和我握握手說：“走，一塊吃飯去。”總理一邊吃，一邊和代表交談，總理說：“這麼多工人、農民，沒有了過去的官僚習氣，特別是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參加黨的會議，這是創舉。”說到紅衛兵，他看著我，跟我微笑一下。

二，見到仰慕已久的老人

華北地區的京、津、河北、山西、內蒙與中直機關是一個大組，因此，我有幸見到許多中央領導、知名人物和革命元老。

迎送朱老總

那天，我正聚精會神聽大組發言，沒注意身邊坐著誰。突然從左身後椅子上掉下一份材料，上書“朱德”二字，我馬上撿起材料交過去，果然是朱老總。他正在打瞌睡，很疲乏的樣子，可能發言吸引不了這位老人。他機警地醒了，問我是什麼地方的，我回答是內蒙的。“很年輕噢，多大了？”“28歲。”“你現在做什麼？文革前做什麼？”我恭敬地一一回答。朱老總說：“你怎麼知道我？”我說：“您的像全國都有。解放時我九歲，認識的兩位偉人是毛主席和您，真的很榮幸。”老人慈祥的臉上全是笑意，說：“噢，可不是，好多人要打倒我呢。”

我說：“朱、毛是不可分的，打倒您，中共黨史就沒法寫了。”“噢，

民意基礎。正是有如此雄厚的民意支持，他才敢於解散公社，恢復單幹，帶領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道路。他“復辟資本主義”的膽略和能力，在當時的中國政治舞臺，沒有第二個人可以相比。當然，鄧小平有其歷史局限性。他搞一條腿的經濟改革開放，拒絕政治和社會改革，復辟封建主義，甚至垂簾聽政，對學生的和平請願大開殺戒，也導致中國世風日下，貧富分化，腐敗叢生，治安動盪，危機四伏，給未來的社會轉型和長治久安造成困難。這是另一方面的問題。

你這話說得好。”散會後，我看老總步履艱難，就扶著他走到會場外。大會有紀律，秘書不准進場。我們一出門，他的秘書迎上來道謝，我說：“不用謝，以後咱倆值班好了，凡大組會，你把老總送到門口，我接進去，出來我送，你在門口接。”以後，每逢大組開會，我便和朱老總坐在一起，自然兩人談的很多。能迎送老人，和他談話，我感到幸福。

與胡耀邦的共同話題

一次大組討論，我去拿水杯喝水，遇到胡耀邦，兩人便聊起來。我告訴他我何時入團、入黨，曾當過團小組長、團支書、黨支書、團總支書記。他說：“你所有基層幹部都擔任過了。那你怎麼評價團的工作？”我答：“文革前，共青團工作應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成績是主要的。”

他還問我怎麼看紅衛兵與共青團的關係，我說：“文化革命產生了紅衛兵新生事物。什麼是紅衛兵？紅衛兵就是黨、團組織教育下的共青團積極分子，我們紅衛兵很多是團幹部，許多戰鬥隊長就是當年的團支書，我們學校就是這樣。”胡耀邦平易近人，我們一起探討運動前共青團工作的成績。他說：“還有許多毛病，你再想想。”按會議規定，代表不准外出，所以，每當飯後在後院散步時，我和胡耀邦幾乎天天見面，兩人邊走邊談，我覺得他是一位對黨忠誠，胸懷坦蕩的人⁹。

一天，偶遇鄭維山，他們兩人親切地握手後，鄭與我打招呼，胡耀邦十分驚奇地問：“你怎麼認識他？”鄭維山說：“我怎麼不認識他，他是我們內蒙的，是前幾天認識的。”我問：“你們什麼關係？”他們哈哈大笑，一

⁹ 現在回憶當時同胡耀邦的這些談話，覺得有重新深入討論的必要。我對紅衛兵和共青團相互關係的說詞，無疑含有禮貌的成分。正如前文的分析所言，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大專院校，團組織在造反派中的作用，遠遠不如它在保守派中的作用大；相反，文革前一向受到黨團組織打擊和排斥的所謂落後學生、問題學生，差不多全部參加了造反派。胡耀邦身為團中央書記，雖然在文革中也受到衝擊，但他基本上不是劉鄧黑線人物，更不是毛江文革派所信賴的人。也正因為這一點，他能夠超越派性，冷靜觀察，並且較早地看清了中共黨團組織體制的弊病所在。他對我說“還有許多毛病，你再想想”，應該是意有所指，而不是客套寒暄。胡七十年代末期復出政壇之後，大抓落實政策，深得人心，接著想推動全面政改，可惜受阻於鄧小平和陳雲的杯葛，功虧一簣，含恨早逝，令人扼腕。

句句解釋：當年他們是搭檔，鄭維山當兵團司令時，胡耀邦是兵團政委。我說：“噢，你們一個司令，一個政委，太好了，太榮幸了！”從此，我對胡耀邦瞭解更多了，跟鄭維山更熟識起來¹⁰。

農民陳永貴

九大期間還有一位談得來的人，即山西代表陳永貴。他常常面帶笑容，和藹可親，頭上那塊白毛巾成了明顯標識。我主動向他打招呼，並說起 1966 年冬串聯去大寨的事。說到這裏，我倆找到了話題。他談大寨創業艱難，多虧有毛主席撐腰。說到昔陽縣，他坦誠地說，自己是個農民，去搞一個縣，感到擔子太重了。後來，又被“搬到山西省的位位上”（他的原話），更感力不從心。我問他，是想回大寨，還是留在省城，他毫不猶豫地說：“當然回大寨了。”說到內蒙，他說，內蒙許多地方自然條件比昔陽好，可惜內蒙人懶¹¹。陳喜歡蹲在太陽下，靠著牆根兒說話。抽煙時，右手伸進左邊的內口袋，抽出一根恒大煙放在嘴上，臉上的表情憨厚、樸實，與我見過的北方農民一樣。

慈祥的董老

在我接觸的人中還有董必武，一位慈祥的老人。毛領袖在九大籌備會的一次講話中，有一段講路線鬥爭，提到鄧、毛、謝、古四個人，當年跟毛路線走，被王明打成投降主義代表。這四人怎麼回事，我不清楚。大組會休息

¹⁰ 真沒想到，就是這麼簡短的萍水相逢，使胡耀邦對我有了些許印象。當我後來遭難之時，我的申訴材料還居然到了他的手中。恰好胡耀邦主管落實政策，及時給內蒙打招呼，關注我的命運，制止他們對我這樣的“無罪造反派”實施全面反攻倒算。正是由於胡的直接過問，我才被內蒙古“免於起訴”，因而少受幾年牢獄之災。

¹¹ 陳永貴說“內蒙人懶”，此處應該不含種族和地域歧視因素，只不過說了點現象。內蒙古的牧區以自然放養為主，當然沒有大寨人砸石頭修梯田那麼辛苦。就說內蒙的農區，特別是西部農區，由於地多人少，粗放經營，生長期又短，冬閒時間自然長。內蒙農民自己也承認：“比起口裏（指內地）農村人的苦重營生，俺們口外農民的勞動苦輕多啦。”“苦輕和苦重”，正是兩地勞動強度的巨大差別。

時我問董老，他說，四個人就是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¹²。我還問他毛選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糟的很”是針對誰說的，董老說是針對李維漢¹³的。我再問老人，主席重提鄧小平等人的功績，是否有所指，老人笑著說了兩聲“這個”，被一位工作人員打斷。

我猛覺自己唐突，讓老人爲難。這些老革命家黨性太強，公開發表的東西說，未發表的點滴不漏。我問董老，第一次革命戰爭時毛駁斥“紅旗能打多久”是駁誰，董老笑而不答。直到林彪事件後我方知答案。我回到座位，朱老總問我在做什麼，他有些耳背，我高聲重複了剛才的問題。他一臉正氣地說：“這四位當年是支持主席的嘛，主席自己也沒忘記嘛！”會後，我扶老總走出會議室，他還自言自語說：“那個人很能幹噢，是黨的棟樑之材嘛！”他指的是鄧小平。

風趣、睿智的李雪峰

與李雪峰相識是剛到北京第二天。晚飯後，李樹德招呼我一塊去看看李雪峰。李在華北很有影響，沒見過面，我對他有種神秘感，就是他主持了北京前門飯店會議，揭開了內蒙文革第一頁。

走進李的住房，還有一位老軍人和他坐在沙發上聊天。李介紹說：“這是北京軍區鄭司令，鄭維山同志。”李雪峰先把李樹德介紹給鄭維山，李樹德再把我向李、鄭兩位介紹。李雪峰握著我的手說：“啊，知道，知道，你就是前門飯店開會時，在內蒙師院帶頭造反的。運動初期打你反革命，我有一份責任，得罪了，得罪了！”他邊說邊笑，並微微點頭。他個子很高，清瘦，臉上有許多皺紋，說話很風趣。茶几上放著一塊消過毒的毛巾，他不時

¹² 鄧小平：1932年冬任中共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1932年3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毛澤覃：毛澤東胞弟，1931年6月任永（豐）、吉（安）、大（和）中心縣委書記，1933年任中央蘇區中央局秘書長。謝唯俊：1933年3月是江西省軍區第二軍分區獨立五師師長。古柏：1933年3月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和黨團書記。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對鄧小平來信的批語”一文注釋5。

¹³ 李維漢：文革前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1962年、1974年兩次受到毛的批判。1964年被撤銷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文革之後復出，1979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顧問。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第498頁注。

用毛巾擦擦嘴唇和下巴。從談話中看出他的幹練、機警和睿智，是官場上歷練有方、足智多謀的人。

接著他們三人談到內蒙挖肅。鄭維山問我對挖內人黨的看法。我說全局情況不太瞭解，個人所知可能有片面性，只感到很嚴重。他問我，你是革委會常委，怎麼不瞭解全局。我說：“內蒙挖肅開始不久，便把我打成烏蘭夫第五縱隊，幸虧周總理干預才沒把我打成反革命。從此，我便坐冷板凳，後下放到巴盟勞動。”李雪峰有些吃驚，說：“噢，竟有這種事，什麼是烏蘭夫第五縱隊？”我解釋後，李又問我是誰的發明，我說是高錦明講的。李說：“這個高錦明的點子就是多，他何苦要搞到你頭上，你不過是個年輕紅衛兵嘛！”

後來，我在飯廳，在樓外散步時，幾次碰見李雪峰，他總是熱情地和我說話，一點官架子也沒有。

三，大組發言，陳毅叫好

九大中，在胡耀邦能否當中央委員問題上，華北大組產生爭論。中直機關代表持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胡可以當中央委員；另一方不同意，認為胡耀邦對文革認識不正確，不能進中央。當天會上同意的人數居多，反對的少。不知為什麼，第二次會上，代表上台發言全部一邊倒，反對胡當中央委員，討論會成了討伐胡耀邦的會。我不理解，難道他們瞭解胡耀邦嗎？我隱隱感到有人串聯，不然發言不會這麼一致。我心中不平。

滕海清一再囑咐，不瞭解內情不要隨意發言。大會開到這份兒上，我感到可怕，認為有責任站出來說點公道話。於是稍作準備，遞條子要求發言。我簡單介紹了自己過去做團的工作，團的工作有不少問題，有的限制了青年的自由成長。我話鋒一轉：“但團的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也應一分為二，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共青團支持青年學毛著，學雷鋒，學解放軍。包括紅衛兵，多數都是團員，起碼聽了團課，吸收了團的營養，現在否定團的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既然團的工作不能否定，就不能否定耀邦同志，胡耀邦當然可

以當中央委員。”

我的發言引來熱烈的掌聲，特別是老同志。我回到座位後，朱老總對我伸出大拇指，說：“到底是年輕人，講得好啊，小夥子！”當我送朱老總到門口時，背後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原來是陳毅元帥。他用濃濃的四川口音稱讚道：“小夥子，不賴呀，說的好，真敢講啊！”

爭論引起大會注意，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等人，第二天都來聽會。反對派為挽回前一天的劣勢，重新組織火力指名道姓批駁我的發言。回到住地，我挨了滕、吳的批評，他們說：“你過頭了。”吳濤親切地說：“你知道為什麼不同意胡耀邦當中央委員嗎？是中央一些人不同意，你可能惹了禍。”我自以為做了一件該做的事，未把此話放在心上。後來，我終於因這個問題吃了苦頭。幾個月後，1969年8月12日中央首長接見時，我挨了江青一頓臭罵，起因是我支持胡耀邦當中央委員。

四，康生傳達毛領袖指示

九大後期，小組開始討論內蒙問題。康生出席內蒙組的小會，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內蒙已經擴大化了。”那天，康生進小組後坐在我身邊，邊講邊吸一種包裝平常的熊貓煙，煙霧撲面而來，柔和、香甜的味道沁人心脾¹⁴。

康生講到文革和挖內人黨時，說內人黨問題擴大化了，必須接受教訓，做好收尾工作。

滕海清在小組會上對一意孤行作了檢查，吳濤、李樹德也相繼檢查。他們又向中央作了長篇檢查。代表們對挖肅、挖內人黨的情況深有體會，紛紛利用“九大”，批判滕海清的嚴重錯誤。

¹⁴ 後來才知道，這種軟包裝的“熊貓煙”，是捲煙廠專門為中央領導製造的“特供煙”，品質高，價錢低，含尼古丁少，因產量非常少，只有夠級別的高層領導人，才能吸到。我以

內蒙組秘書李德臣，對滕的態度極不尋常，不是諷刺，就是挖苦。我對他的行為不甚欣賞，便在會上反詰他：“李主任，挖內人黨，挖肅烏蘭夫，你也是很積極的啊。”他說：“我早知道擴大化了。”我說：“你比毛主席知道的還早？”他說：“反正打高錦明右傾時，我和錦明認為擴大化了。”我說：“你如果能早站出來抵制擴大化，也算個英雄。”

據說，九大期間，李德臣通過李雪峰的關係，和周總理面談了內蒙擴大化問題，並揭發滕海清許多獨斷專行的事情。事後，周總理在接見北京軍區領導人時，囑咐李德臣這個人不可重用。一次，周總理接見內蒙常委時說，李德臣是滕辦主任，卻和高錦明湊在一起，後來高錦明不行了，又回到滕海清那裏，“這樣的人靠不住啊！”

毛領袖御批“內人黨擴大化”的消息，從九大迅速傳回內蒙，內蒙的形勢又激烈動盪起來。

第三十九章

九大後的內蒙政局

開完九大，我們回到內蒙後，各地群眾上訪呼和浩特的人越來越多。滕海清、吳濤、李樹德只參加了第一場全區直屬機關傳達九大和毛講話的大會，從第二場開始便成了我一個人的事，他們三人主要應付不斷擴大的上訪潮。

一，毛領袖的 5.22 批示

九大後的內蒙混亂局面驚動了中央¹。從 5 月 13 日到 5 月 19 日，中央領導四次接見內蒙十四人。5 月 16 日，中央兩次和內蒙人員談話，共談了十二個小時。5 月 16 日接見後，以內蒙核心小組滕、吳、高、權、李、李六人名義，由李德臣執筆，起草了一份《堅決貫徹中央關於內蒙當前工作指示的幾點意見》，於 5 月 19 日上報中央，5 月 22 日中央對該意見批示“同意”。中央批語前有五個大字：“**照辦。毛澤東**”，這就是當時喊得震天響的 5.22 批示²。批示以中央（69）24 號文發往全國。從此，毛領袖說的“在清理階級隊

¹ 中央對內蒙情況的震驚，說明他們對挖內人黨後果的慘烈程度，嚴重估計不足。這種情況說明兩方面問題：一方面，資訊回饋系統根本不存在，下情無法上達。不要說中央，就是內蒙領導層，當時也不知道全區打了多少內人黨，刑罰和傷亡情況多嚴重。等到受害者潮水般湧向呼和浩特和北京，才讓官老爺們如夢方醒；另一方面，挖內人黨不同於一般“清隊”，它深深觸動民族關係這根神經。對於死硬派大漢族沙文主義者來說，他們既難以理解，更無法預測，民族歧視和種族滅絕行為，所激發出來的反彈力究竟有多大。

² 此處似有必要對毛領袖的“批示”做一點說明。按理說，中央下發的“紅頭文件”（指套紅大字印刷），有極為嚴格的頒發程序，甚至往往打上加密數碼；再說，中央是在毛領袖絕對控制之下，那麼中央文件，應該就是毛意志的傳達。且不管內容如何，起碼文件的真假可信度，不應有所懷疑。但文革年代的一件怪事，就是在檔之前，必須加上毛的個人批語，或一兩句話，或“照辦”“圈閱”“已閱”等字樣，然後署名：毛澤東。沒有這套花樣，好像就不是中央文件，例如中央處理內蒙問題的八條決議等等。

伍中，內蒙已經擴大化了”這句話傳遍全國，內人黨冤案載入史冊。

中央四次接見的內容，我們只能找到一份綜合傳達稿，是吳濤回內蒙後傳達的《中央對內蒙當前工作的指示》。現摘要如下：

……內蒙有敵人，但總是少數，不能把烏蘭夫的黑線說得又粗又長。內人黨有老根子，它要搞陰謀活動，它是一個隱蔽的、秘密的組織，人數很少。我們覺得你們提“挖肅”這個口號，是混亂的。挖烏蘭夫黑線，面上就沒有辦法控制了，風一吹到下邊去了，一直刮到蒙古包裏。……

這裏，中央從根本上否定了“挖肅”這個提法。可是，挖黑線是江青 1967 年 11 月 12 日講的。中央非但絲毫沒有“罪己詔”的意思，反而倒打一耙，把罪責推到地方官頭上。文件接著說：

現在挖內人黨的問題，你們第一，要停止下來；第二，要給搞錯的平反；第三，要放人。³

這一有趣現象，起碼反映兩個問題：第一，毛領袖個人和中央的關係極不正常，甚至十分可笑。好像中央之上，還有個皇帝，必須由老皇爺御批，中央文件才能起聖旨作用。封建習氣之重，可見一斑。第二，中國人的天真，對符號象徵的拜物教，也登峰造極，無可救藥。人們不加思考：如果中央文件能假造，難道毛領袖的聖旨就不可假造嗎？記得毛死之後，華國鋒登基接班，到處展示“你辦事，我放心”的聖旨，以營造合法性。到華倒臺之後，又有張玉鳳等出來澄清，說毛的“六字真言”，並非毛的交班遺囑，而是別人的穿鑿附會，有偽造之嫌。毛另有交班安排，要江青、毛遠新、王洪文一夥上臺。我們當然無法搞清虛實真假，但似乎可從中吸取教訓，以打破對符號象徵的迷信崇拜。

³ 這種模稜兩可、自相矛盾的所謂“指示”，一方面顯示中央決策層，當時對內蒙問題的張惶失措，似乎感到大事不妙，要求下面立刻住手，生怕逼得蒙古人起義造反，動搖北部邊防。但另一方面，從骨子裏又不想痛改前非，徹底放棄極左路線。這種矛盾心理，必然再次埋下進一步失控的導火線。前面說“要停止下來，給搞錯的平反”，後面說“要放人”。“停下”和“放人”好像是對所有受害者，而“平反”又好像是僅僅針對“搞錯的”，那麼，又如何區別誰搞錯，誰沒搞錯呢？標準在哪里？由誰定標準？又由誰來執行標準？種種問題，經不起推敲，也沒辦法執行。在受害人潮水般湧來，而害人者即將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刻，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區別對待”。一風吹給所有人平反，恐怕是最實際而又唯一可行的辦法。然而，到唐山學習班秋後算帳的時候，我們又被批判為搞了第二個“擴大

……內蒙發生的這些錯誤，今天以前，主要責任在滕海清同志。……在滕檢查了錯誤以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轉到你們幾個同志了，你們要做好工作，團結一致，共同糾正錯誤。……滕海清同志的工作作風很不好，獨斷專行……搞秘書專政，只聽滕辦幾個小家伙的話。

滕海清在內蒙兩年多，他的秘書班子的名聲隨同他本人的權力同步增長。滕辦的意見和革委會意見，甚至核心小組的意見同樣有效，能使一些人立時登天，另一些人墜入深淵。1969年5月接見後，原滕辦幾位秘書，則留在北京軍區參加學習班，批鬥幾次，送入唐山學習班，唐山學習班後，下放到部隊基層。

“我們跟了滕司令員半輩子，在我們後來的工作安排上，他從來沒爲我們說過半句話。他就是這麼個人，即便回北京軍區任副司令時也如此。”這是2002年8月26日上午，在北京國防大學賦閑的前滕辦兩位秘書，親口對我發出的感歎。

在吳濤傳達的綜合稿還有如下內容：

……我們糾正這個錯誤的時候，就不能用擴大化的辦法，重複以前批判另一個傾向的教訓。現在糾正錯誤也不能擴大化，不要兩個過頭。……批滕是爲了糾正錯誤，如果上綱高了，就會複雜化了。……

內蒙的事，不幸又被中央的“提醒”言中。吳、高、權、李等人在批滕時，鼓動群眾起來轟炸滕海清，欲把滕一棍子打死。滕每在一地檢查後，幾個常委先上台炮轟一頓，再把常委的討論情況，在群眾中曝光，使糾正冤案走上歧途。七月份，中央忍無可忍，把1000多名內蒙各級領導和群眾組織頭頭調到北京，在空軍學院辦大學習班，給核心小組及領導幹部，在京西賓館辦小學習班。同時，中央針對蘇聯、蒙古調兵遣將的緊急戰況，終於對內蒙

進行全面分區軍管⁴，毛領袖又一次創造了專政模式。可惜，這個模式讓百姓反感。

在中央傳達稿中，批評最多的是滕海清，次之是馬伯岩，另一位軍頭。馬原為呼市警備區副參謀長，級別不高，資格老，為1938年抗日幹部，因屢次犯上，由總參一個部門降職到內蒙。

挖肅中，馬任呼市挖肅總指揮，親自批准關押許多人。內蒙一軍管，馬檢查了一段時間，即調太原警備區任副參謀長，病逝在崗位上。而馬的助手喬萬寶、郭日周代罪入獄，各判十年有期徒刑⁵。喬原是呼市公安局一般幹部，郭是呼市交通學校學生，中學紅衛兵頭頭，兩人均結合為市革委會委員。出獄後，失去工作，喬在舊城開一個小商店，郭到伊盟經營飯店，勉強餬口。

二，批滕金剛

5.22 批示後，內蒙反而更加混亂，上訪群眾越來越多。革委會機關內，到處掛著批滕站的牌子，一聽常委們開會，立即有成百、上千人圍上來，因此，常委會改在夜晚開，天亮前結束。

白天則是批滕“四大金剛”（當時群眾稱）霍道餘、郝廣德、王志有、那順巴雅爾的天下。他們幾乎每天在群眾集會上演講。

王志有和河西公司818，在挖肅中受到很大傷害。軍工宣隊公開支援新紅聯，壓制818，導致人心混亂，生產搞不上去。

那順對打內人黨持反對態度。1968年初，那順從錫盟回常委會反映，牧民被逼無奈，只好用蒙語“揭發”內人黨徒的名字，當把名字翻譯成漢語時，原意是星星、月亮、天空、白雲等。1968年末，那順本人也成了嫌疑對象。

⁴ 不過，這裡有一點需要提醒，那就是如何恰如其分地評價當時外交和內政的關係問題。從後來曝光的材料看，說蘇蒙調兵遣將，要對中國動武，並沒有事實根據。究竟是因為外部緊張，所以才對內蒙軍管，還是為了實施軍管，才製造了一個“外部緊張”的藉口？這個因果關係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⁵ 用法律術語說，這叫“主犯無罪，從犯有罪”。用內蒙當地老鄉的話來說，叫做“放跑了偷驢的，抓住了拔槓兒的”。

一天夜間常委會結束，我和他一道騎車回家途中，他坦率問我：“你認為我是內人黨嗎？”我真誠地回答：“別人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絕對不是。”他握著我的手問：“你能不能告訴我，大約什麼時候會把我抓起來，你是政治部副主任啊。”我毫不掩飾地說：“你的內人黨‘選票’已經不少。你的事，我已頂了兩三次。你也知道，我說話不算數。你最好開完會後，趕快回杭錦後旗鄉下，先不要回來，在那裏，要抓你，我能頂住。”

那順接受了我的建議，很快回到鄉下，躲過了挖內人黨的瘋狂期，但他的親友、同學被挖進不少。因而，他批滕說的話再過頭，我都能理解。我一直佩服那順的勇氣，在會上公開表示不同意挖內人黨的只有那順一人。和他比，我私心重多了，舉手同意挖內人黨提案，我應負一份責任。

霍道餘與那順不同，霍始終在本單位說了算。霍道餘儘管在挖肅初期對鼓吹小人物造反，老保翻天反感，但他沒受到任何傷害。霍道餘沒進中共核心小組，沒當選九大代表，認為是滕海清不信任他，因而參加批滕。

至於郝廣德，則是另一種情況。他主張挖肅、挖內人黨，尤其他操縱的“揪黑手”“揪叛”及“揪哈”在挖肅中的作用盡人皆知。他批滕，是因為高錦明被滕海整肅後，一度受挫所致。

不明真相者，誤認為批滕派反對挖肅，反對挖內人黨。反之，不罵滕的人，則是挖肅能手。這種簡單公式，幾乎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⁶。論個人關係，我和那順、王志有、霍道餘都很好。出於好意，三個人找我談過一次，動員我和他們站在一塊兒公開批滕。他們問我為什麼保滕海清？我說：“我批判滕的錯誤在九大上就開始了。我並不是保滕，我是不想去保高錦明。滕海清要負主要責任，難道吳、高、權、李就沒錯誤！當初挖肅這個口號是高錦明提的，現在把錯誤都推給滕一個人，只怕是內蒙不會有安寧之日了。”霍道餘、王志有說我太右，運動初期的造反精神沒有了。我並不理會別人怎麼看我。

⁶ 不明情況的群眾做這般簡單推理尚情有可原，但若深知內幕，而且著書立說的大人物，也推銷這種簡單邏輯，就可能誤導輿論，貽笑大方。恕我直言，圖們、祝東力合著的《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一書，便存在這個缺點。

三，漂泊動盪的常委會

常委會被迫轉入地下。會議時間和集合地由秘書們個別通知，常委們在指定地點鑽入等待的汽車內，先在市裏轉彎子，確知沒有盯梢跟蹤後，便或南或北地駛向郊外，在某處軍營下車。這次是通訊站，下次可能是訓練場或補給基地，借用那裏簡陋的會議室開會。常委會改由高錦明主持，開始，滕海清還發言，但屢屢遭到批滕金剛們反駁，滕便緘默不語。討論結束前，高錦明僅禮節式地問一句：“看看老滕還有什麼？”高對滕的稱呼戲劇性地從過去的“司令員”變作“老滕”。

滕海清夜晚參加常委會，白天被群眾揪去批鬥。他的頭頂更禿，四周長長的白髮無心梳理，模樣狼狽。李樹德邊檢查，邊工作，把主要責任推給滕。吳濤也半推半就地解釋，自己當年跟著滕挖內人黨是違心的，原本就不同意。高、權、李質隻字不提自己在挖肅中“三股勢力”、“兩套班子”不離口。他們有雷代夫、霍道餘、郝廣德、王志有、劉立堂、那順等人支持，完全控制了常委會。常委中的楊萬祥、王金保、郝夢枚三人一致反對高錦明。楊萬祥是呼市群專副總指揮，王金保支持烏蘭巴幹、孫玲玲等挖派先鋒。這三個人的鮮明色彩，當然是常委會上另一營壘。

王志有、霍道餘繼續勸我，希望我加盟批滕派，但有一件事改變了我們之間的情義。一次，常委會借用郊外一個駐軍連隊開會。那天夜裏格外冷，會開到半夜。小小連隊做不出什麼好飯菜，只有雞蛋炒菠菜、大米飯，外加簡單的蛋花湯。常委們失去往日的矜持，圍著火爐狼吞虎嚥，滕海清孤零零呆坐在乒乓球台前，無人理睬。我給他剩了多半碗飯，夾了點菜，把最後一碗蛋花湯端給他，高聲勸說：“司令員，該吃飯就吃飯，補充點熱量吧。”平時，是警衛員照料他，這天不知為什麼警衛員不在。老頭子友好地對我笑笑，吃起來。沒想到，王志有走到我身邊氣哼哼質問我，為什麼給滕海清端飯。我立時感到站在面前的不像是當年有見地的王志有，我不想為這件事和他吵，便用一句話頂了回去：“就是反革命也要給飯吃吧！”

繼續開會時，風向改變，王志有指名道姓指責我政治上模稜兩可，不敢亮明觀點。我回答說：“我們現在的常委會並不正常，有人夜晚開會，白天在群眾大會上把常委會情況全盤端出，借用批滕情緒要達到什麼目的？在這裏，我想問問參加過中央接見的老同志，中央是讓滕海清檢查錯誤，還是要打倒他？我們常委光領著群眾喊‘打倒滕海清’，政策落實不下去，大局難穩定。誰想當左派，我看他當不成，最後我們會連鍋端，大家同歸於盡。”

我的話引起王志有、郝廣德等人反駁。王金保、楊萬祥同意我的看法。我當時並未完全從與高錦明的對立中走出來，我寧可和王金保、楊萬祥靠近，也不願樹立高錦明是正確路線的代表。

記得剛從北京回來，我去吳濤家中匯報，高錦明在座。我正準備離去，高突然問我對形勢怎麼看。這一招兒我不曾料到，但有問必答：“現在應該把政策落實到受害人身上。挖內人黨搞成這種局面，只有落實好政策才能使局勢安定。我們是反修前線，不能再亂下去。”高錦明進而提出一個挑釁性問題：“你自己對此不負責任嗎？”當時的我年輕氣盛，加之與郭以青、高錦明的糾結並沒解開，便毫不相讓地應答：“我有什麼責任？只有舉手的責任。高錦明，你不要以為挨了整就一切正確，又成了內蒙正確路線代表。內蒙搞挖肅，開始提挖內人黨，你沒責任？你對烏蘭巴幹、郭以青的支持是眾所周知的，你以為大家都忘了！我承認你人很聰明，但也辦了不少蠢事，我並不怕你。像你現在這種態度和情緒，不以大局為重，只能走向反面。”這是我和高錦明最後一次面對面談話。之後，雖然多次在一個常委會上開會，高錦明對我不睬，我更無心與之交往。

此時的高錦明，被失而復得的權利和歡呼聲熏得暈暈乎乎，竟然與權、李、吳濤一起，在回內蒙的火車餐車內舉杯慶祝勝利。

這一切都沒逃過中央的眼睛，高錦明的政治生命像流星般迅急殞滅。聰明反被聰明誤，誰也躲不過二律背反的原則。

四，群眾組織重新洗牌

九大後的內蒙，圍繞滕海青和高錦明問題，群眾分爲兩大派——批滕派和 5.22 派，而不是按對挖肅的態度排隊。其中，批滕派要打倒滕海清，力扶高錦明爲內蒙一把手。有趣的是，批滕派以挖肅派爲主，揪黑手聯絡站的人基本上又成了批滕派的核心人物。如，當年揪特古斯的金永紅、師院的丁克明等。呼市群專挖內人黨擔綱主角，然而群專總指揮戈志盛等人，搖身一變，成爲呼市批滕派的核心。錫盟革委會副主任許名揚，一直參與挖內人黨，後又成爲錫盟批滕頭頭。傳聞一時的順口溜，“叫我挖來我就挖，你挖一個我挖仨；挖出錯來誰坐蠟？滕海清和李大麻”，即出自他口⁷。

與批滕派對立的稱之 5.22 派，在 5.22 批示之後組織起來。他們認爲滕犯了嚴重錯誤，但不能把滕一棍子打死。他們在挖肅中多爲各單位工宣隊、軍宣隊的依靠力量，參與了挖內人黨。但 5.22 派也有一部分人是打內人黨的受害者，只因本單位內的打人者，一下子成爲批滕站大小頭目，只好站在 5.22 派一面。挖肅初期被滕海清批爲右傾的內蒙黨委紅旗、呼三司各大院校，也站在 5.22 派一邊。細究起來，我的處境由許多特殊元素促成，按簡單邏輯推斷我應該是什麼派，代表不了我的全貌。那時的我，已不像文革初期般狂熱，我心灰意冷，又無可奈何。

我無奈地掛靠在楊萬祥、王金保的 5.22 派一邊，有不願屈就高錦明的潛意識，當然也受到師院高派利益制約。高派在挖肅前期受到壓制，郭以青被揪出後，壓力有所減輕。10 月，批判高錦明時，高派得到工宣隊、軍宣隊支持，壓倒了秦派。捫心自問，起碼在校內，高派在這一時期的確充當了不光彩角色。

九大後，師院秦派立即組織東縱批滕聯絡站，誓與滕海清血戰到底。5.22 批示下達後，原師院高派的部分人成立了師院東縱 5.22 戰團。兩派均打著原東縱旗號，實已分道揚鑣。

我曾受呼三司邀請，參加了工學院組織的一次 5.22 派串聯會。我本不是

⁷ 上文提及，此順口溜曾經在民間廣為流傳。究竟發明者是誰，是許名揚編出來傳給了大家，還是先有群眾自發創造，再經許名揚之口進一步發揚光大？已經無從考查。無論哪種情況，凡屬廣為流傳的口頭文學，總說明它有某種廣泛的群眾基礎。

挖肅的，現在坐在一起，我並不受歡迎，從此，我再沒與 5.22 派沾邊兒。據我所知，呼三司一些學校和師院 5.22 戰團，也不是那裏的常客，只在對抗批滕派上結成鬆散的聯盟。

五，臨危受命，涼城救“災”

內蒙革委會政治部也進駐了批滕站，落實政策工作受到干擾。我乾脆組織人員下基層調查，我個人帶政治部四人去了烏盟涼城縣。從一份材料中看到，那裏是挖內人黨重災區，卻無人負責落實政策，受害者困難重重，孤立無援，急需幫助。

我們趕到涼城，住進縣革委會招待所。當晚，就有很多被傷害的幹部上訪，第二天，男女老少來得更多。在涼城縣打內人黨的，是烏盟某駐軍兩名副營級幹部和幾名戰士組成的軍宣隊，又從農村抽來一些骨幹組成農宣隊。這夥人先把縣、公社、大隊三級革委會挖垮，把原縣、公社、大隊的幾百名幹部挖成內人黨。

到涼城的第二天下午，有三個孩子找到我，老大是女孩，只有 16 歲，弟妹僅六、七歲。父親是縣農業局局長，在嚴刑下死亡。母親是縣婦聯副主任，與丈夫同時被抓，聽到丈夫的死訊，跳井自殺，留下三個孩子無依無靠。這樣的事情，在涼城不少。

我讓招待所的人都搬出來，留給上訪群眾住，我們四人搬到一所小學的教室裏。涼城縣許多幹部受到傷害，能出來落實政策的人不多。我只好從中小學教師抽調二十多個有正義感的人，組成縣落實政策辦公室。此時，縣革委會只有一名叫汪宏的領導幹部（原縣委副書記、副縣長）沒被挖進去。汪宏個性較軟，每天陪上訪的人流眼淚，雙眼又紅又腫。

我和汪宏商定，他出面抓落實政策，我以內蒙革委會政治部名義發佈命令：一，全縣的群專隊立即解散，凡被抓的人一律放出，挖內人黨以外的問題交治保部門解決；二，各級軍宣隊、貧宣隊一律停止活動，把權力移交原革委會。軍、貧宣傳隊要在當地檢查後再撤離；三，凡被打成內人黨的一律

落實政策。先從生活上安置，縣醫院、公社衛生院提供免費醫療；四，各公社立即成立落實政策小組，人員不夠，從公社中學教師中抽調。⁸ 我派內蒙兩名幹部和旗革委一名常委，坐我帶去的吉普車，到每個公社檢查命令執行情況。汪宏也挺起腰桿，開始給打人者辦學習班，這對被傷害群眾，有很大的心理平衡作用。從此，有人管落實政策了，到縣城上訪的人逐漸減少。縣裏的工作也步入正軌。

十幾天後，吳濤親自打電話，讓我立即回政治部主持工作，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苦難的涼城。

1974年，在一次全區旗縣委書記會上我遇到過汪宏，此時汪已升武川縣委書記。我問起當年涼城的事情，他說：“你們打下了基礎，後來，全縣落實政策比較順利，當年年底被軍管，涼城縣沒發生過大起大落。”

我不放心三個孤兒，離開涼城時，特別囑咐在涼城中學任教的同學朱連元關照這三個孩子。1975年，我去涼城開水利現場會，通過辦公室主任朱暄，見到三個孩子中的姐姐，她已在縣婦聯工作，弟弟妹妹正在讀中學，費用由縣裏負擔。

當我從涼城回到內蒙革委會政治部，才發現，整個內蒙被派性攪得一團糟，根本無法正常工作。滕海清已經病倒，批滕金剛正組織新戰役。落實政策的事，除了發出幾個文件，沒做什麼實事。全區打砸搶事件不斷，社會治安一天比一天混亂。

⁸ 從我在涼城負責落實政策的經驗看，此時平反內人黨，根本不可能“區別對待”。中央文件上說的什麼“大方向正確，只不過擴大化了，對搞錯的要平反”，那都不過是官僚主義的表面文章。面對受害群眾的愁雲慘霧，鐵石心腸也不得不軟下來，快速並徹底落實政策。這不僅是民眾的強烈要求，也是我們唯一能做的工作。因此，平反一風吹（即後來被上頭批評的“第二個擴大化”），是必然結果。直到今天我也認為，無論讓誰去落實，也很難不出現“第二個擴大化”。

第四十章

空軍學院學習班

1969 年 6 月下旬，革委會常委得知，中央準備給內蒙辦學習班：核心小組老幹部和九屆中央委員是個小班；從自治區到旗縣抽 1000 多關鍵人物，辦一個大班。

一，將“魔鬼”收回潘朵拉盒子

進入七月，正式通知到達，盟市幹部統一組織前往，內蒙常委們必須於 7 月 3 日前在北京空軍學院報到。

一到空軍學院，批滕派與 5.22 派便開始分頭串聯。霍道餘、王志有、郝廣德日夜準備材料，等中央首長接見時呈送。我沒有誰可串聯，好似孤家寡人。

幾天後，周總理、康生、黃永勝接見群眾代表。王金保沒到。聽說，他坐著楊萬祥的車在空軍學院繞了一圈，又返回內蒙。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接見開始一一提問：“你們來幹什麼了？”霍、郝、王回答來批判滕海清，反映情況的，同時遞上很多材料。總理問我怎麼沒拿材料，我說，我是來認錯的。康生問：“你沒參與打內人黨，主要錯誤是什麼？”我說：“核心小組處於領導地位，核心小組決定後在革委會通過一下，我沒反對舉了手，舉手就有責任。”總理聽完我的匯報，笑著點了點頭，沒有說話。總理指出：“內蒙已非常亂了，是你們自己造成的，你們已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中央還會加大措施。”這是我第一次聽總理說“群龍無首”。中央首長還批評了王金保。康生生氣地說：“難道還讓我三顧茅廬？他王金保有什麼了不起，他為什麼來了又走了，他聽不聽中央的！”

空軍學院有個學習班領導小組，由空軍學院副院長白雪任組長，解汝與

習班的派性和“鬥私批修”¹，也負責安排生活瑣事。呼三司這個組，都是紅衛兵頭頭，誰也不肯聽誰。如今，批滕派與 5.22 派坐在一起，多為唇槍舌戰，怎麼也選不出組長來。

學習班份外安逸。上課時學員鬥嘴，不講真心話；課後，外出游泳，一直游到傍晚。加之空院伙食很好，大家漸漸肥胖起來。呼三司組直到學習班快結束時，才勉強選出一個組長。有人嘲弄：“終於選出一個組長，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這種狀態，中央領導十分清楚，但似乎無人過問²。批滕派希望中央肯定他們的大方向，幻想再產生一個“紅八條”那樣的奇跡。所以，霍、王、郝三人繼續忙著整理材料。王金保領著 5.22 派在郝夢枚房間開會，我遊離在外。

我恢復了大學教師時的生活。早晨起床後，沿著運河跑步，早飯後獨自躲在僻靜處讀《綱鑑易知錄》和《史記》。我從歷史角度，思索一年前清華大學老朋友的驚人之見，體味師院東縱紅衛兵離校時的感慨，仿佛在歷史的塵埃中窺見了自己的身影。我不知所措，更不敢預測文革將會怎樣結局。

平靜終於在 8 月 12 日被打破。接見由總理主持，康生、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中央首長參加。總理講話還是勸導，他說：“內蒙搞成這樣，你們是有責任的，核心小組主要領導負主要責任，但你們不是沒有責任。該考慮自己的責任，不能再亂下去了。”我覺得總理真心實意地想把國家搞好。

康生仍然是批評：“你們在這裏一個個養得胖胖的。這樣做對國家有利沒有。你們做了錯事，應該好好反思一下，總結一下。”他指著總理說：“你

¹ “鬥私批修”最早見於山西省革委會主任劉格平 1968 年 7 月 8 日講話中所引毛澤東的指示：“鬥私，就是用馬列主義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批修，就是用馬列主義去和修正主義鬥爭。只有很好地鬥私批修，才能使無產階級的江山永不變色。”引自原內蒙黨委紅旗聯合總部編印的《紅旗內參》1968 年 7 月 30 日第 231 期。

² 今天回憶當時情況，應該說，不是中央不想過問，而是顧不上過問，一是解決了劉鄧之後，毛林之間，已經開始新一輪權力鬥爭；二是還有其他一些省市，也在中央辦學習班，因此無暇顧及並儘快解決內蒙問題。另外，長達四個月的學習班，是否也有“引虎歸籠”的含義？這樣，可讓軍管人員，不受干擾地在內蒙行使權力。

們看，總理累成這個樣子，你們呢，該玩就玩，該吃就吃，對中央的話無動於衷。”康老批評得中肯³。黃永勝和其他領導也發了言。

二，江青斥罵，孫玲玲自焚

會議開至後段，江青突然走進會場。她留著過耳長髮，披了件深綠色大衣，身後跟著姚文元。江坐下後，姚像小廝一樣從背後接過江的大衣，交到秘書手中，一切安頓好，自己才坐下，讓人覺得姚文元像一個小跟班。江青剛坐一小會兒，便開始訓人，訓得很凶。然後拉開皮包，說：“我得到一個材料，說你們那兒有一個孫玲玲，到處煽風點火，假裝文藝革命戰士，我看她政治動機不好，品格也不好，是個壞女人。”

大罵孫玲玲後，再問：“誰叫王金保？”王金保站起來說：“我就是。”江青說：“聽說孫玲玲就住在你們那兒，你保護她，孫玲玲是什麼人？”王金保沒被江青嚇倒，說：“我認為孫玲玲不是壞人，她受了那麼多迫害，應該控訴資反路線。”江青冷笑一聲：“哈，這可出了一個孫玲玲的保護者，孫玲玲不是壞女人，難道說是好女人？我看你也不是好東西，倒像一個小政客。”

從此，王金保得了一個外號“小政客”。江青罵完，又說了幾句好好學習，不要給中央丟臉的話，即把手中黑包的拉鏈拉上，準備離開。這時內蒙師院丁克明把一份材料遞到江青手中，我意識到這是針對我的。江青略略看幾眼，再次把包拉開。當說話的吳法憲話音一落，江青立即插問：“誰叫高樹華？”我站起來說：“我就是。”江青舉著材料說：“我這兒接到一份材料，說你父親是日本特務，你知道不知道？”我說：“我第一次聽說，我入團，入黨，組織審幹都沒提過，家裏也不知道，父親在運動中也沒觸及。”

³ 我這裡沒有為康生塗脂抹粉的意思，只是感到他對我們苦口婆心，是為了讓我們儘快改正錯誤，穩住內蒙的形勢。但如果聯想到康生本人，在內人黨案所扮演的角色，我們也不難發現，他確實極端虛偽，這次接見中，竟然沒有絲毫自我懺悔的意思，更不要說表示對這一冤案承擔責任了。同樣，周恩來和江青，也沒有這方面的表示。

江青說：“當然了，你還很年輕，即便你父親是特務，你也不會知道，與你也沒關係。”

江青緊盯著我，像想起了什麼，改變口氣說：“噢，我認出你來了，你是九大在大組上發言的那位內蒙代表。哈，你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這是指九大期間我為胡耀邦辯解一事。胡耀邦最終還是落選了，原因是江青與中央文革反對。

對我來說，當時只是盡了我的責任，說說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江青卻記下了這筆帳，當場把我識別出來，繼續斥責：“我看你這個人是保滕當了九大代表，你到處保，你哪像個造反派！”看江青沒多少話了，周總理轉過頭問康老：“內蒙九大代表審查是康老負責，康老知道這件事嗎？”

康生一臉嚴肅，聽了江青的話顯然不愉快，高聲說：“高樹華的檔案審查了兩三次，九大審過，進常委會時也審過，沒有這個問題。他父親是日本特務早審查出來了。那個材料是不是派性呵，我起碼懷疑。”總理打圓場說：“核心小組可派人查一查，看怎麼樣。”江青一聽康老那樣說，匆匆站起來，順勢收場。姚文元趕緊把大衣給她披上，跟在江青後面往外走。

我和王金保情緒低落。王金保有一幫謀士，讓王金保寫檢查，還有人幫他策劃寫幾個問題。我要不要作檢查，我很猶豫，一時拿不定主意。為難之中，我想起一個人可以討教，那就是總理的秘書張作文。第二天，我終於下決心與他通了電話，請求和他見面三分鐘。他好像什麼都知道，一再推脫，說：“沒任務不能見你。”我說：“我作為私人朋友求你參謀一件事，不好明說，暗示一下也行，我實在拿不準主意。”在我反復哀求下，答應見三分鐘，地點在空院南門玉米地邊。

我問他該不該檢查，張給我打了個比喻：中央首長很忙，到處講話，第一個地方講完，又跑到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到晚上在第五個地方講話時，已經把前面第一個的內容忘了，更不會在意批評了什麼人。張說：“他只記得大事，像你們這樣的小人物，你說該不該檢查？”我說：“謝謝，明白了。”

八月下旬，學習班向我要檢查，說：“王金保檢查了，你為什麼不檢查？”

我說：“江青同志批評我，沒說讓我檢查。如調查說我父親是特務，再劃清界限也不遲；如果不是特務，現在劃清界限不是太早了嗎。”他覺得我的話有道理，就再沒追究。王金保的檢查遞上去，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又打回來，第三次遞上去石沉大海，把王金保折騰了二十多天。

之後王金保如夢方醒，問我：“你為什麼不檢查？”我問他：“中央沒說讓檢查，你為什麼檢查？”王說：“是啊，想想，就挨了頓批，沒人讓我檢查。這群臭參謀！”他指的是郝夢枚等人。對他的罵，大家哈哈大笑。

比我和王金保難受的是孫玲玲。孫是文革前從青島招來的小學員，與著名影星斯琴高娃同時進團。她丈夫也是歌舞團演員，有個可愛的女兒。當孫玲玲四處上訪時，小姑娘跟著她流浪，過早地失去了童年的快樂。江青批評王金保，罵“孫玲玲是壞女人”，無疑對孫是滅頂之災。從此，工學院不敢再收留她，丈夫也離開了她。孫玲玲無家可歸，捲起行李回到青島。爲了養家餬口，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得多的領導幹部。

粉碎四人幫後，孫玲玲回內蒙要求平反，理由是江青迫害她。當時的黨委和政府不理睬，於是，她到中央上訪，一直被拒。那時，我正蹲看守所，出監後，聽說孫玲玲的結局太慘，她在又一次上訪被拒後，毅然在中南海外面一座橋上⁴自焚而死。

三，滿盤皆輸，發配山溝

8月14日，中央單獨接見霍道餘、郝廣德、王志有及批滕派主要頭頭，半夜離開，天亮時才回來。他們一進門，個個蒙頭大睡。第二天，郝廣德一天沒起床。過了幾日，8月14日接見的內容慢慢透出：原來，他們指望能再現1967年4月13日的奇跡，結果幻想破滅。正如我先前的預料，誰也沒贏，大家都輸了。

9月中旬，在京西賓館樓上，周總理、李作鵬、李德生三人接見我們，都

⁴ 此處應為中南海北門外的一座橋，因為不大可能是中南海裏面的橋，而外面幾個大門附近，都沒有橋，只有北門例外。

是地方幹部。中央首長指出，戰備很緊，因為內蒙戰線太長，中央決定把東三盟劃出去，呼盟劃歸黑龍江省，哲盟劃吉林省，昭盟劃遼寧省。⁵

10月，我們在首都體育館參加大會時，方知，中央同時還給河北和南方幾個省辦學習班。會後，在體育館後面一個會議室裏，周總理單獨接見我們，鼓勵我們好好工作，把中央的決定帶回去。讓霍道餘、王志有仍回本單位，郝廣德回部隊，我和王金保繼續在農村勞動鍛煉。總理一手拿著一個包子，一邊握著我的手說：“高樹華，我希望你帶個頭，搞好團結，穩定內蒙局勢。”我趕忙答應。看來總理還沒吃飯，他就這樣為國家操勞。

回內蒙後，高、權、李為我和王金保選中烏蘭察布盟大南溝公社納日斯太大隊下鄉勞動。

去納日斯太大隊前，我先返回杭錦後旗五四大隊收拾東西。我同房東、朋友們告別，農民們說：“我們證明你沒挖內人黨。”我感到欣慰的是，1969年，當地獲得豐收。

我和王金保在烏盟報到時，盟革委主任趙軍（與我倆私交不錯）透露：“原來準備給你們選一個好一點的地方，是高錦明一再強調，要找一處偏遠，而且是挖內人黨的重災區‘教訓教訓這兩個小子’。”趙還說：“沒關係，我和旗、公社、大隊都打了招呼，好在烏雲其其格⁶同志你們很熟悉。”

納日斯太位於著名的蠻汗山灰騰梁，是夾在山溝裏的一個小村，百十戶蒙漢農牧民和諧地生活了幾百年。我雖被發配到山溝改造，但我喜歡納日斯太，常常在夢中縈懷那段快樂日子。

我和王金保到大隊後，以烏雲其其格為首的幹部社員開了一個小型歡迎會。支書姓孫，一位50多歲的老人，患有嚴重的哮喘。他咳嗽著說：“我們不管你們在別處犯了什麼錯誤，來我們這兒參加勞動，盡你們的能力，能幹

⁵ 與東三盟被瓜分的同時，還有另外兩個重要決策，後來才一一向內蒙民眾公佈出來。一是西部有三個旗縣（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額濟納旗），分別劃歸甘肅和寧夏；二是內蒙古軍區，由文革前的大軍區級，降格為省軍區級，劃歸北京軍區管轄。而內蒙劃出去的東西兩端，其邊疆防務則分別由瀋陽軍區和蘭州軍區管轄。對外來講，是為了準備同蒙古和蘇聯可能發生的戰爭。但對內來說，亦同防範民族衝突的升級有關。

⁶ 烏雲其其格，是內蒙革委會委員，我們曾多次在一起開會，故彼此熟識。

多少幹多少，想休息就休息。把你們安排在牧業隊長王三那兒，他是光棍，很方便，吃派飯。有什麼事找我也行，找烏雲其其格也行。”

在送我們去王三家的路上，烏雲其其格悄悄問：“咋啦⁷說你們是犯錯誤的幹部，你們犯甚錯誤啦？”這時我和王金保恍然大悟，高錦明是按犯錯誤的幹部發配我們的。我倆哭笑不得，和樸實的農民沒法說清複雜的政治，我們只能用行動證明自己。

納日斯太大隊窩在一個山溝裏，兩旁是陡峭的大山，早晨九點天才朦朦亮，下午不到五點，就完全黑下來。大山裏常有狼群出沒，所以家家養狗，半夜我們經常被陣陣犬吠聲驚醒。睡在炕頭的王三說：“進來狼了，起碼三隻，明天撿狼皮去吧。”說完又呼呼睡去。各家養的狗叫窩子狗，意指一窩生下的小狗分送給幾家人養，狗兄一叫，其他狗弟跟著叫。納日斯太糧食充裕，有小麥、蕎麥等，均屬短生長期品種，產量偏低。這裏肉類比較豐富，有牛肉、羊肉、駱駝肉等，打獵時節，還有各種野味。

第二天早上，我們參加打場。當地打冰場，即秋天割倒的蕎麥⁸和小麥，到冬天在冰面上碾壓，冰面光滑、乾淨，麥粒裏不會摻進沙子。我在巴盟勞動過一段時間，幹得最多的活計是揚場。納日斯太是農牧村，農業活遠不如巴盟人精細，尤其是打場很粗放。上場不久，我拿起工具揚起來，領場的把式是從巴盟來定居的，一看我幹活的架式，過來說：“老高，你這兩下子比他們強，看來你幹過，你乾脆就幹這活兒算了。”除了打場，我們還去山上挖戰備洞⁹，打眼，放炮，樣樣都難不倒我。

王三有隻大黑狗，我們很快成了朋友，天黑出去吃派飯時帶上它十分安

⁷ “咋拉”為內蒙西部人常用的口頭語，意思是“為什麼”或“怎麼回事”。

⁸ “蕎麥”亦稱裸燕麥，屬於燕麥科，適於高寒地區種植，是晉北、張北和內蒙中西部區的重要作物。其缺點是低產，優點是蛋白質含量高，味道好，富有營養價值。當地農民對它的評價是：“地裏產量低，肚裏產量高。”因此，在糧食定量供應年代，人們都願意用粗糧指標購買蕎麥面。

⁹ 196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講話說：“要準備打仗。”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另外，1973年元旦，《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元旦社論“新年獻詞”，傳達毛澤東“三字經”式的指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為此，全國廣泛開展戰備教育，處處挖掘戰備洞、防空洞。

回村的路上，我面朝藍天躺在運糧車上，和老鄉一同唱起烏盟小調，體會著普通人美好自由的生活。

納日斯太也有被打成內人黨的，內蒙革委會委員烏雲其其格曾被隔離，一些受牽連的人也遭到迫害。不過，農民很和善，軍代表把人關起來後，沒多少人動手。我們初到納日斯太時，傳說我們是打內人黨的兇手和頭頭，但沒人報復我們。當我們離開時，老鄉們還把這事當作笑話來談。

離開納日斯太前，我們與幹部社員已是親密無間。幹部開會找我們參加，讓我們出主意；民兵、團員活動約我們出席；村民家裏有什麼事找我們幫著拿主意。後來派飯，村幹部再不管了，年輕朋友輪流請我倆去家中做客。

納日斯太是蒙語，意為有松樹的地方。聽老人講，過去這裏滿山松樹。多少年沒有再回到納日斯太。從熟人得知，現在的大、小黃花溝成了旅遊區，灰騰梁上有了風力發電站，還成立了種樹隊，在山上栽滿松樹，讓那日斯太又成了有松的地方。

納日斯太，令人嚮往的地方！

第四十一章

唐山學習班

1969 年 12 月 19 日，毛領袖批准中央對內蒙實行軍管，成立了北京軍區內蒙前線指揮部，負責人是鄭維山¹和幾位副手。

1970 年元旦後，我和王金保接到返回通知。來接我們的是一輛嘎斯 69 吉普，司機姓鄭，內蒙革委會車隊的老師傅。路上他不斷講述內蒙的消息：軍管了，到處是軍人，內蒙的幹部要去唐山參加學習班，市裏去張家口和柴溝堡，各盟、市去山西的陽高。

一，鄭維山邀我當“嚮導”

“這回連窩端了，”他感歎道：“爭，爭，高錦明和滕海清，爭的結果誰也沒爭出好來。我當時說：‘你們到處跳吧，跳到哪天，中央會收拾你們的。’他們不聽我們工人的話。你們倆可倒好，躲到一邊看熱鬧。”我說：“我和王金保說了頂什麼用？形勢搞不清，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鄭師傅的牢騷代表了內蒙大部分幹部的心情。

回到呼市後，通知王金保十天後到唐山報到，通知我去新城賓館軍管辦公室找姓李的主任，他領我去見鄭維山。

鄭見到我很高興，說：“內蒙沒幾個熟人，除軍區外，想來想去地方幹部就你一個，你留下來陪我去下邊走走。”我們從呼市出發，去了土左旗、土右旗、包頭、固陽、烏拉特前旗，還準備去巴盟、伊盟，後來因有事改變了計劃。

¹ 鄭維山，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兼任北京軍區“內蒙前線指揮部”（簡稱前指）主任，類似於古代的總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但是，時間不長，到 1971 年秋天，陳伯達受毛整肅之後，中央開展“批陳整風運動”（實為批林整風運動的前奏），鄭維山、于洪信等前指領導人相繼受牽連。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奉調入主北京軍區，補充鄭維山的遺缺。

回村的路上，我面朝藍天躺在運糧車上，和老鄉一同唱起烏盟小調，體會著普通人美好自由的生活。

納日斯太也有被打成內人黨的，內蒙革委會委員烏雲其其格曾被隔離，一些受牽連的人也遭到迫害。不過，農民很和善，軍代表把人關起來後，沒多少人動手。我們初到納日斯太時，傳說我們是打內人黨的兇手和頭頭，但沒人報復我們。當我們離開時，老鄉們還把這事當作笑話來談。

離開納日斯太前，我們與幹部社員已是親密無間。幹部開會找我們參加，讓我們出主意；民兵、團員活動約我們出席；村民家裏有什麼事找我們幫著拿主意。後來派飯，村幹部更不管了，年輕朋友輪流請我倆去家裏吃。

第四十一章

唐山學習班

1969 年 12 月 19 日，毛領袖批准中央對內蒙實行軍管，成立了北京軍區內蒙前線指揮部，負責人是鄭維山¹和幾位副手。

1970 年元旦後，我和王金保接到返回通知。來接我們的是一輛嘎斯 69 吉普，司機姓鄭，內蒙革委會車隊的老師傅。路上他不斷講述內蒙的消息：軍管了，到處是軍人，內蒙的幹部要去唐山參加學習班，市裏去張家口和柴溝堡，各盟、市去山西的陽高。

一，鄭維山邀我當“嚮導”

“這回連窩端了，”他感歎道：“爭，爭，高錦明和滕海清，爭的結果誰也沒爭出好來。我當時說：‘你們到處跳吧，跳到哪天，中央會收拾你們的。’他們不聽我們工人的話。你們倆可倒好，躲到一邊看熱鬧。”我說：“我和王金保說了頂什麼用？形勢搞不清，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鄭師傅的牢騷代表了內蒙大部分幹部的心情。

回到呼市後，通知王金保十天後到唐山報到，通知我去新城賓館軍管辦公室找姓李的主任，他領我去見鄭維山。

鄭見到我很高興，說：“內蒙沒幾個熟人，除軍區外，想來想去地方幹部就你一個，你留下來陪我去下邊走走。”我們從呼市出發，去了土左旗、土右旗、包頭、固陽、烏拉特前旗，還準備去巴盟、伊盟，後來因有事改變了計劃。

¹ 鄭維山，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兼任北京軍區“內蒙前線指揮部”（簡稱前指）主任，類似於古代的總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但是，時間不長，到 1971 年秋天，陳伯達受毛整肅之後，中央開展“批陳整風運動”（實為批林整風運動的前奏），鄭維山、于洪信等前指領導人相繼受牽連。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奉調入主北京軍區，補充鄭維山的遺缺。

一路上，每到一地，鄭例行公事地詢問情況，包括軍備、打內人黨、落實政策和幹部狀況。鄭對內蒙幹部不滿意，當面還鼓勵幾句，在車裏卻不停地念叨：“內蒙幹部素質太差，太差！”鄭維山遇事就嫌麻煩，麻煩便急躁，挨剋的必定是警衛員。

鄭維山坐汽車極有特色：他通常坐在司機旁邊，警衛員把車門拉開，他一隻腳踏進車就要求司機發動，當另一隻腳踏進去，車門一關，車必須象箭一樣射出去。我摸清門道後，每次趕緊先鑽進車，而警衛員就有被車丟下的危險。幸運的是，警衛員腿腳利索，拉開前門，看著司令員往裏鑽，當老人的另隻腳進車的一剎那，警衛員轉身閃進後門，總能安然無恙。

鄭維山帶著一個高個子女軍醫，她從不和我們說話。吃飯時，她先進去，用酒精棉球把一付碗筷左擦右擦，再用一張白紙鋪在桌布上，把消過毒的碗筷扣在上面。好像是信號似的，鄭維山一進飯廳必朝白紙走去。一路我和他熟了，和女醫生也熟了，一次我玩笑地搶先坐在白紙處，鄭維山哈哈大笑，對女醫生說：“以後你消毒兩份，給這個小夥子一份，他大小也是紅衛兵司令，我是大司令，他是小司令。”

鄭維山靠軍隊命令方式，果斷處理問題。但地方工作需要細緻和耐心，用快刀砍來砍去，有時就行不通。

在軍人面前，我是個陌生人，雖然鄭維山多次讓我留下，“不要去唐山了，我已和總理打招呼了”，我思慮再三，自己的位置恐怕還在唐山，文革中有錯誤，留下來不合適。況且鄭能容我，其他軍隊幹部會不會給我冷眼。春節前，我給鄭維山打電話說：“這裏的工作你很快會熟悉起來，還有很多留下的幹部幫助你，我是有錯誤的，需要檢查。不過請你給我一個假，讓我和父母過個春節，這麼多年了，我還沒和他們過過春節。”他答應了。

1970年3月，我到了唐山，比別人晚去兩個多月。

二，八千人齊聚唐山

到了唐山後，我被分配在一大隊三連三排十三班。這個班的成員幾乎都

是內蒙革委會辦公室工作人員，郝廣德也在這個班。

連、排長是軍隊幹部。第二天，連、排長跟我談話，讓我和郝廣德結成一幫一、一對紅²的搭檔。我感到簡直是開玩笑，但不管怎麼樣，假戲也得真唱。郝廣德約我出來問：“高老師，你說咱們怎麼辦？”我們獨處時，他還是稱我老師。我認真地回答：“徹底解決咱們的分歧是不可能的，也沒必要，大家在對方心目中的位置都很清楚。就按學習班的紀律辦，不打內戰，不互相攻擊，友好相處。有問題想交換就交換，不想交換就迴避。儘量做本派人的工作，好不好？”他同意，我們達成默契。

回去匯報時，兩人說的是另一套話，如：“經常交換思想，經常溝通，要解除前嫌”。連、排長們不知個中的玄機，誤以為是他們思想工作的勝利。大隊也得知了這個“喜訊”，立刻在大會上表揚兩大派頭頭能真誠相見。內蒙幹部在下面偷偷直笑。我們班幾乎全是批滕派和保守派的人，我很孤立，一般發言只罵自己，不講別人。除此之外緘默不語，只看一本馬克思的書。

剛到時，有人含沙射影攻擊我，我不理睬，時間久了，對方就失去了興趣。眾人無話可說，班長就帶頭聊天，先聊社會新聞，再說各地風景，最後男人班就議論女人。我們班有兩個在賓館工作過的人，眉飛色舞說起賓館內的男女情事，大家聽得如醉如癡。

學習班按軍隊編制。洗漱、吃飯、看電影等都得排隊。除早點名、晚點名外，其餘活動都以班為單位進行。學習班規定“五不准”：不准串聯，不准打電話，不准寫信，不准探視，不准上街。“五不准”把幾千人的學習班活活變成一個集中營。其中最致命的是對通訊的限制：家中來信，要經幾道關口查看，待信交到本人手中，已天窗大開；對外寫的信一一審查後方可寄出。

我從入班以來從未外出過（除到煤礦勞動），直到學習班結束，我也不知道周圍是什麼樣子。

學習任務是以批烏蘭夫為綱，批判滕海清和高錦明。下發的材料是《滕

² “一幫一，一對紅”，是部隊用於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種方法，即由領導指派二人小組，目的是互相幫助，共同進步。此方法後來也被介紹到地方使用。

海清錯誤 100 例》、《高錦明罪行 100 條》，此外，還批判資反路線，解決派性問題，之後是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軍隊幹部是最終裁判員，他們手中提著小“棍子”，誰不聽話或不順眼，使用棍子敲一下，也有受青睞者，多是些有姿色的女學員。

時間一長，我終於給自己找到一件妙事——打籃球。我從高中起就愛打籃球，大學時是校隊，後又是師院教工隊的後衛。現在，我是連裏的主力之一，我們連在聯賽中不斷出成績，連、排長臉上有光，十分高興。借此，我提出修個籃球場，連長同意。於是，我指揮眾人在前面的空場上拉架子，壓場，並爭到了球場的管理權，從此，籃球成了我僅次於書籍的心愛之物。過去，我體重 170 斤，一個月後降至 155 斤，好像又回到了大學教書時代。

三，《學習計劃》一賞

1970 年 3 月，我剛入學習班時趕上“三查”課業，即查階級覺悟、查革命意志、查團結，主要通過講用會進行。要求高舉“九大”旗幟，講出效果，講出團結，反對脫離實際的空洞理論。

“三查”教育後是戰備教育，主要圍繞毛領袖講的“要準備打仗”，檢查自己的戰備觀念，國家觀念，反修前線觀念。

1970 年 3 月 27 日，一大隊韓政委傳達了中央批准的內蒙班學習計劃。第一部分為指導思想，現摘錄如下：

中央學習班內蒙班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親切關懷下，在億萬軍民加強戰備，準備打仗號召下舉辦的。……

根據中央對內蒙問題的一系列指示，根據內蒙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學員的思想狀況，進行戰備教育和整建黨教育，並準備在這一教育後進行清隊和整黨工作。……

學習班要自始至終抓鬥私批修，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徹底改造世界觀。要……理論聯繫實際，表裏一致，言行一致。堅決反對資產階

級兩面派作風。

……參加學習班的每個黨員、團員、革命幹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要站在黨的立場上，以毛主席指示和新黨章的各項規定，對照自己，嚴格要求自己，徹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這是總的指導思想。³

第一階段的戰備教育結束後，開始整建黨教育，主要內容是憶苦思甜，批劉少奇烏蘭夫，增強黨性，克服派性。這幾個月，學員們憶苦思甜飯⁴沒少吃，揭發和批判烏蘭夫罪行的大字報沒少寫，鬥私批修及克服派性的檢查無休止地做。重點是我這樣的派頭頭，郝廣德和我同樣忙活。

1970年3月31日上午，學習班三大隊朱大隊長找王金保、楊萬祥、高福瑞、郝夢枚和我談話。題目是對學習計劃有什麼想法，並讓我們帶頭“徹底揭開內蒙階級鬥爭蓋子”。

大隊長談完後，留下我一個人。他對我說：

“這次中央首長接見學習班臨時黨委成員時，先問高樹華來了沒有，中央首長對你很關心，讓你一定好好學習。在接見中，康老說，不要把內蒙造反派頭頭都當成壞人。高樹華是個好苗子，嫩了點，這幾年也成熟了些。愛學習，也正派，‘你們多幫幫他’。康老講後，周總理說：‘我同意康老的意見，你們多注意幫助高樹華，培養他。’所以，學習班黨委讓我向你轉達中央首長對你的關心，並要求你對自己一定要比一般同志更高些。”

朱大隊長的傳達對我震動很大，1970年4月2日，我給黨支部並大隊臨時黨委、學習班臨時黨委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³ 說起這種集中營式的思想改造運動，使人聯想到中國古人的“修身養性”和“閉門思過”。在毛思想統帥一切的年代，它或許真的解決一些問題，且不論功效是否長久。起碼，那些奉命改造別人思想的意識形態裁判官，大概相信這套東西管用。到了後毛澤東時代，隨著非意識形態化和官僚腐敗的病入膏肓，似乎已經沒人再相信“思想改造”這套東西了。取而代之的，是直接了當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

⁴ 憶苦思甜飯多以玉米麵蒸的麵食，加上水煮野菜、樹葉、草根、菠菜、白菜等清湯，代替普通伙食和正常菜譜，以便回憶舊社會生活的艱難。

……我感到自己辜負了中央首長的希望。作為一名九大代表，在九大之後當了資產階級派性頭頭，實際上給黨抹了黑，是有罪於黨的。現在，我只能給自己下這樣的結論。

幾天來，這種悔恨和不安使我睡不著覺，……我現在的想法只有一個：必須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同志，重新認識內蒙階級鬥爭的複雜性。……

在學習班一年多時間內，我和所有學員一樣，在變相集中營中過著檢查、批判、相互揭發和痛罵自己的變態生活，但對周總理和中央首長的期許我做到了，我從未與任何人串聯，我只管好自己，盡可能按學習班的安排渡過每一天。

四，內蒙“兩個擴大化”

1970年4月16日晚，學習班有一次大行動。全體人員被召到北京，參加中央領導的接見。下邊摘錄我4月18日的日記：

4月15日下午，突然把全大隊學員拉到大操場上。晚八時，從唐山乘火車到北京。我們暫歇在北京展覽館裏，在大廳呆了一整天，不讓外出。

4月16日晚，在白石橋首都體育館，總理、康老、陳伯達、張春橋、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先念、紀登奎、李德生等接見了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2萬1千多人，其中內蒙班人數8千多，還有山西班、貴州班、四川班、湖北班、新疆班。晚11時，中央首長和大家見面，總理集中講了國際國內形勢，康老講了“用”字上下工夫問題，陳伯達、黃永勝都講了話。一共接見了一個多小時。

接見後，當晚乘車回唐山，17日早回到學院，全天休息。

這次接見中，周總理說：“去年四月毛主席號召搞備戰已經一年多了。……內蒙是邊境，工作做得不好，搞了兩個擴大化，挖內人黨擴大化，糾偏又擴大化，所以才派解放軍進去。……現在內蒙形勢大好，你們說是不是？（大家答：是！）……”

周總理 4 月 16 日講的這段話，後來反復在學習班宣讀。

其他中央首長說：“內人黨有沒有？有。是有根子的，只是沒那麼多，有老的，有新的……內人黨是同外蒙接觸的，是反革命。反對這個東西，主觀願望是好的，但做法不好，打擊面大了，傷害人多了，擴大化了。”這是指第一個擴大化。後來中央首長又指出，1969 年中央 24 號檔後，內蒙沒有按照中央精神去落實政策，而是不分是非和敵我，把該平反的平了，把不該平反的也平了，放跑了敵人，搞了一風吹，又是一次擴大化，主要應由高錦明負責。開展對兩個擴大化⁵的認識成為這時期主要課題。

兩個擴大化的責任涵蓋了各派及各種觀點的人，誰也沒逃出如來佛的掌心。對於第一個清隊擴大化，這是有目共睹的，沒有什麼分歧，但對第二個擴大化，是批滕觀點的人無法接受的。我所在的 13 班，批滕觀點的人居多，其中不乏敢和軍代表叫板的人。我 4 月 23 日的日記有段記載：

少數幾人的談話方式很特別，或提出一些怪問題，讓別人回答後再抓他人辮子；或有意轉移話題，乘機指桑罵槐；有的暗裏煽動派性，有的假裝正義，有的隱晦曲折……絕大多數很想跟上中央指示，少數人卻在表演。誰想表演就去表演吧，我絕不走回頭路。

⁵ 進入 21 世紀之後，回過頭來看所謂“兩個擴大化”，我們應該有個更清醒的認識。我們認為，第一個擴大化，有輕描淡寫、文過飾非之嫌。明明是冤假錯案，就是死不認錯，非要說成是擴大化，以便拒絕徹底改正。就像當年反右鬥爭一樣，給幾十萬人平反，剩下林希翎等幾個人做樣板，以證明反右鬥爭“大方向正確”，只是由幾個人“擴大”到了幾十萬人（有說上百萬）而已。

至於第二個擴大化，更屬無稽之談。說什麼不應該“一風吹”，論其動機，仍然是不想對冤假錯案徹底認錯。在受害人數量如此之大，迫害如此之慘，而反彈又是如此之烈的情況下，具體負責落實政策的人，想不搞“一風吹”，恐怕受害老百姓也不答應。中央如此定調，不過是作作官樣文章，搞搞平衡，以求淡化自己的責任，並希望內蒙儘快穩定而已。

我們班對第一個擴大化擺出了十種表現與危害。例如：破壞了革命團結、民族團結和軍民團結；損害了工人階級和解放軍的威信；等等。接著又擺出了第二個擴大化的表現與危害。例如：批滕癱瘓了各級革命委員會；引起了無政府主義和經濟主義；破壞了革命大聯合，拉了兩個大山頭；等等。

在對兩個擴大化的認識基本統一後，各連、排、班又進一步挖兩個擴大化的歷史根源、階級根源、思想根源。

五，《學習總結》再賞

1970 年五一節後，內蒙學習班有個“書面總結”上報中央，算是對中央所定的調子，有了正式表態和明確回應。現摘錄如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宣判了劉少奇及其在內蒙古代理人烏蘭夫等一小撮人的死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內蒙古帶來了新生。毛主席思想的光芒照亮了內蒙古草原。……

紅色政權建立以後要幹什麼，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是停止不前，還是繼續革命，繼續革命又怎麼一個革法：

（一）內蒙古革委會主任滕海清同志，在繼續革命的問題上是堅定地緊跟毛主席戰略部署的。……。

但是，滕海清同志並不瞭解內蒙的實際，不瞭解內蒙的敵情如何，獨斷專行，脫離群眾和不善於調查研究，是他極大的缺點、錯誤。……

（二）在 5.22 批示下達後，如何解決內蒙問題，這是一個關鍵時刻。……高錦明在這個時期採取的辦法是自上而下地發動群眾的辦法。……各級革命委員會完全癱瘓；階級敵人乘機翻案，出現了一風吹；搞臭了工人階級和解放軍；使生產停頓，經濟倒退，市場緊張，社會秩序混亂等等。這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復辟現象在內蒙的重演。

（三）權星垣具體負責的北京 1969 年 7 月到 10 月的內蒙學習班（空

軍學院)，是高錦明對內蒙政策的繼續。……權星垣的辦法是一派壓一派的辦法，這不僅達不到他們的目的，反而暴露了他們的卑劣目的。……

1969年12月19日，毛主席親自批准的內蒙古實行分區全面軍管決定，徹底扭轉了內蒙古的形勢。

（四）……從1970年初到今天，五個月的內蒙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完全證明毛主席親自締造、領導，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人民解放軍是無敵於天下，戰無不勝的。

中央決定給內蒙辦一次大型學習班，……唐山的8千人學習班將正確解決內蒙大問題。

這個報告題目是《人間正道是滄桑》，帶有十分明顯的誇耀色彩。報告用文革的觀念，概括的筆調，總結了內蒙古文革前後近十年的歷史，概括了文革各個階段的主要問題，目的是突出人民解放軍的豐功偉績及中辦學習班的政策英明，顯然代表了當時黨中央的觀點。是耶非耶，留待歷史證明。

六，促、拉、幫小組

學習班的運行計劃無論進入哪個階段，我始終是排、班內的運動中心。我要定期檢查，不定期做思想匯報。最讓我頭疼的是突然襲擊的批鬥會，此類以排或連為單位召開的會，往往不通知我本人，搞得我措手不及。臨場核對問題時，我沒有任何考慮時間，我只有實事求是地應對，為此我與姓周的指導員產生了隔閡。

時間一久，大字報無米下鍋，即使拼湊一篇，半小時搞定。無事可做時，幾位開夜車的人無聊地談些趣話，不料被細作報告了上峰。第二天，指導員對我大發雷霆，呵斥我們講不健康的事。我說：“我們不過講了幾個山東話怎麼說，河南話怎麼說的笑話，怎麼不健康了！難道你生活中不講笑話！”

“啊，你態度不嚴肅！”

我忍無可忍，當場和指導員吵起來，且越吵越激烈。指導員嚷道：“我

關你禁閉！”我回敬說：“你敢關我禁閉，我犯了什麼錯誤，你不就是一個指導員，不過是個團副政委嗎，我見過的官比你大多了，你算什麼玩意兒！”內蒙幹部一直服服貼貼，像我這樣大吵大鬧、無所顧忌的從未見過。山西來的一排長姓王，與指導員關係不好。我扭頭一看，他正笑嘻嘻地朝我眨眼。我看有人支持我，更無所畏懼。

吵架驚動了班部，三大隊的大隊長，姓梅的政委找我談話。我說：“你們說過一律不搞批鬥會，他們把我拉到前頭鬥了兩次，你們知道不知道？”梅政委說：“還有這事！你是幹部，不是敵人，不允許站在前面批鬥。”我說：“這事確實有，我決不撒謊，你可以去問。”

調查組一查，確有此事，把姓周的指導員調走了。新來的指導員和梅政委對我都很有客氣，我輕鬆了許多。好多人說：“你小子骨頭很硬，敢和指導員吵架。”

我的鬥私批修幾易講稿。我比以往乖巧多了，領導要什麼，就送什麼，也不問對不對。根據連排幹部對我的“指導”，按照一定的程序我終於過關了。當我的鬥私批修稿接近十萬字時，當我誠懇地聲淚俱下的時候，我終於被“活捉”，無產階級取得了“偉大勝利”⁶。

七，變奏曲和結束曲

學習班的節奏照搬軍隊。一天中，人們唯一可自由的時間是午、晚飯後，或在院內散步，或到軍隊小賣部去，名曰“點貨”。

長期被禁錮中的男女，常常會發生一些情事，好似在枯燥的節奏中加了點兒變奏。二排附近有個倉庫，倉庫前是一片空場，倉庫好像是教室改的，玻璃上佈滿了塵土，看不清裏面放著什麼東西，像是一堆桌、椅、板凳和墊

⁶ 對於毛領袖和中共發明的這套思想改造方法，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學之父”費正清教授，曾有過精闢的論述。他說：“對於中國能把心理學方法發揮到這般極致，我們或許不應該大驚小怪，因為在中國，人際關係的應用藝術，自古以來就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為發達。這些東西當中，既有從孔夫子到王陽明的儒學經典，也有劉少奇的《修養》哲學。”引自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英文第四版），哈佛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380—381頁。

子。一天晚上，我和同排的王瑜在那兒賞月，突然後面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我有點緊張。王瑜悄聲說“有情況”，拉我在一旁觀察。一會兒從窗內爬出一男一女，女的是內蒙的幹部，男的是軍人。

地震也是一種變奏。七十年代，唐山是全國地震重災區。連、排長經常提醒大家要有地震意識，間或進行實際演練。每天夜間，各連還安排兩個男學員值班。有天午夜 12 點，我值完班後準備睡覺，這時頭頂上響起飛機的轟鳴聲和兩下極強的爆炸聲。樓內立即亂起來，有人驚呼“地震、地震”，慌亂中碰倒的暖水瓶發出的嘭嘭聲，增加了人們的恐懼感。一樓臨窗睡覺的人，一看門裏擠滿人，乾脆破窗跳出。

當我穿好衣服向外走時，多數人已逃到樓外，不少赤身露體者全然沒有知覺。各連軍代表趕來告訴大家，是軍事演習的飛機在天上打靶，人們才擠著回樓穿衣服。

爲此，學習班用兩天時間討論如何正確對待地震問題，讓跳窗逃命者檢查。十幾個跳窗人最倒楣，邊要忍受傷痛，邊要給自己扣上劉少奇“活命哲學”的帽子。

有一次真的發生了較小的地震，人們根本忘掉了預設程序和大量的“意識”教育，仍慌亂逃命，三大隊一位睡在上鋪的人，摔下來殉職而去。

幸運的是，學習班在唐山大地震之前早已結束，否則，不知要有多少內蒙古幹部死於非命。1976 年唐山大地震時，我們曾生活過幾個月的礦冶學院整個塌陷，我過去的附中鄰居，後調往唐山的董紹章老師一家遭遇厄運。

一年多的學習班，除例行的學習計劃之外，能讓人感到些許自由的是幾次下礦井勞動。學員們一聽說要下礦，欣喜若狂。挖煤雖然辛苦，但久被囚禁的人可以“放假”三天，指準備一天，勞動一天，休息一天。早出礦的學員可把預先貼好郵票未被檢查的信，偷偷投到郵筒裏；有的可以到商店搶購點東西，悄悄帶回去；凡有下井任務，全體都可享受一天休息日。

1971 年 4 月底，在全封閉中生活了一年多的學員們，敏感地捕捉到學習班即將結束的資訊。各連、排的軍隊幹部忙著找各自的出路，對學員的管理明顯放鬆，見到學員臉上也有了笑容。剛入五月，幹部內部傳達下一步的任

務是，每個學員先自我總結、自我鑒定，然後以班、排、連形式總結鑒定，最後分配工作。

幾天後，連裏通知我，我的鑒定和總結通過了，並給我佈置了新任務，讓我協助排長、副排長抓一下其他學員的鑒定和總結。當晚排長在全排大會上宣佈後，排內幾個關係較好的朋友戲稱我一下子從促、拉、幫目標，挨批鬥的派頭頭成了排裏第三把手，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學習班後期，滕海清和高錦明輪流到各大隊檢查，接受批判。兩位老人披著滿頭白髮，滿臉呆滯，沒有一點活氣，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氣度。氣勢恢宏的挖肅、你左我右的責難、慷慨激昂的演講、花樣翻新的口號和理論，通通煙消雲散，唯一留給後人永記的是：害人害己，同歸於盡！

學習班結束時，對幹部做了四種處理：一種是分配工作。我被分到文化局，後到教育局當普教組組長，那順巴雅爾和我一樣也進入革委會。第一類人中，還有一部分是學習班的黨小組長和班長等積極分子；第二種是進內蒙設在巴盟和烏盟土右旗的五七幹校⁷，繼續學習和改造；第三種是下放農村，是些查清歷史但不安排工作的人，其中有我岳父宗漢民。他是教授級的知識份子，下放到和林縣捨必崖公社捨必崖大隊；最後一種是沒查清問題的留下繼續審查。

1971年6月，唐山學習班結束，一個專列從唐山把我們送回呼和浩特，到車站迎接的有我的妻子、兒子，還有兄嫂、朋友們。

⁷ 1968年5月7日，發表了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70年，黑龍江省革委會組織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在柳河農場開辦“五七幹校”，受到毛的好評。從此，五七幹校風行全國。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573頁。

五七幹校理念，也同毛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思想有關，是毛試圖取消商品、貨幣、工資、甚至家庭等“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嘗試之一。紅色高棉掌權之後，波爾布特在毛的鼓勵下，曾用類似辦法把全國搞成這種“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最後導致幾百萬人死亡。

第四十二章

教育局普教組組長

從唐山回來幾天後，我到革委會報到。政治部副主任劉英傑，一位軍隊幹部與我和那順談話，派我到文化局辦事組當副組長，那順去教育局普教組當副組長。當我在文化局剛落腳，劉通知我分錯了，我應到教育局，那順到文化局，於是我們倆調換一下辦公室，反正都在同一個院內。至於爲什麼分錯了，是人爲的失誤還是藉口，我無心考究。

一，“闖”過 5.16 關口，抓入學率

1971 年，內蒙的一把手是尤太忠，下面依次是鄧存倫（原物資部部長）、徐信、趙紫陽、滕俊卿、寶日勒岱、沈新發等，其中軍隊幹部占重要地位。徐信管政治部，是政治部主任。他講話很凶，對內蒙幹部一臉蔑視。文化局、教育局同屬政治部管轄，政治部副主任、內蒙軍區副政委王弼臣是我的頂頭上司。

教育局和文化局同在一個清代古建築“將軍衙署”辦公，我們在前院。教育局屬下普教組與高教組各佔用東西廂房中一個大屋子。普教組名義上我是組長，但第一天開會，卻由姓孟的軍人掌握會場。他要求大家學政治，守紀律，講完軍隊那套教條後，問有什麼意見，“沒意見散會”。我和普教組副組長王福林納悶，爲什麼老孟主持會。我剛來不易多言，普教組的內蒙幹部德格吉胡（原黨校教員），走到我跟前說：“高頭，你是組長不主持會，怎麼老孟主持會？”我說：“不知道，你問老王吧。”王說：“不知道，過去老孟是軍代表。”老王曾是物資部一位老處長，跟著鄧存倫下放內蒙，在我下面委曲地當個副組長。他爲人謙和，對事業忠誠，不爭名利，大約比我長十幾歲，我尊敬他。我打哈哈說：“這回咱們應有黨代表了，我看，老王你

就像黨代表。”老王用北京話急說：“別瞎說，別瞎說。”

幾天後，教育局成立黨支部，老王果然被委任為支部書記。我到任時，正召開全區教育工作會議，主持人是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的教育局副局長姜仲原。會議主要議題是抓入學普及率，重點抓小學普及率。這個議題很好，是關係國民素質的大事。

我和老王分別向錫盟、巴盟、烏盟、包頭等地的幹部瞭解情況，準備抓些典型。鑲黃旗、達拉特旗都報來相關材料，我倆準備到當地親自調查一下。正待出發之時，政治部副主任王弼臣約我談話，地點在內蒙黨委主樓王的大辦公室內。我們閒聊了一段，即進入正題，王向我瞭解內蒙 5.16 反革命集團¹的事。我是從傳單上、報紙上知道 5.16 們把矛頭對準周總理和中央文革的，北京的 5.16 我不知道，內蒙的我更不知情。王讓我考慮考慮，有什麼問題可直接找他。憑我幾年的政治經驗，經過多次沉浮，我懂得這次談話的含義：考慮就是交待。看來疑點又一次落到我頭上，我想了一夜，決定打主動戰。

那年，我大兒子四歲左右，一直與岳父、岳母住在一起。唐山學習班後，岳父下放和林縣農村，岳母相隨遷居到離呼市約 50 公里的捨必崖村。家中留下幾個弟妹，一時要人關照。況且，從文革以來，我幾乎不顧家事，都是妻子一人操持。從唐山回來後，自感身體出現某些異常，醫生勸我休息些時日，因此我乖巧地提出請假。教育局第一把手嘎日迪回答很痛快，說：“可以，十天、半個月都行，有事打電話就可以。”

這真是一段輕鬆愉快的日子。我每天不是與兒子圍在火爐邊講故事，就是替妻子忙忙家務，更主要的是有閒暇讀書。那時運動重點走到批陳整風，我疑慮重重。在我心目中，陳伯達是位有作為的人，寫過《人民公敵蔣介石》、《竊國大盜袁世凱》等書，初中政治老師很推崇這幾本書。文革中，我見過幾次陳，他講一口很濃的閩南話，讓王力替他翻譯。

有了時間，我開始完整地思考文革：運動初，打倒了一批老幹部，接著

¹ “516 反革命集團”原本是一個名為“首都 516 紅衛兵團”的中學生組織，據說曾經搜集江青和周恩來的黑材料，被中央定為反革命組織。其活動很快被查清，為首人員被公安機關逮捕。不知何故，到 60 年代末期，中央再次成立清查“516”專案領導小組，在各地廣泛清查 516 份子，許多群眾因此被逮捕判刑。

是王、關、戚和楊、余、傅，不久是劉少奇，現在又批判陳伯達，不知還將怎樣更迭。空院學習班時，我讀了《綱鑑易知錄》，唐山學習班讀了不少魯迅的著作；這次休假，我借了一套《資治通鑑》，趁夜深人靜徹夜讀起來。讀書是我的興趣，更是我思考問題的手段。這些書籍讓我觸摸到歷史脈搏，我對文革中的許多不解，漸漸梳理出一些頭緒。

休息了一個多月，王弼臣托人叫我回去。王說：“你的休假該結束了吧，這回可休息好了，回來立即工作。”政治部黨委決定把我補進教育局黨的領導小組。

我清楚，一個月的休假期正是當局對我緊鑼密鼓的審查期，如今我又闖過了一個關口。我的人生似乎總在等待著一個個關口。

教育局黨的領導中大多是軍人和老幹部。我是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如此安排，算是共產黨對我的極大“信任”了。

上班後，我仍按休假前的思路，抓普及全區中小學教育，特別是小學教育和農村、牧區適齡兒童的入學問題。

我是從學校出來的，深知提高教師的水準是完成目標的關鍵。所以，我帶領普教組與各方協商，先整頓現有的教師隊伍，再調一批回鄉、下鄉知識青年補充到各中、小學校。當時，教師的工資很低，尤其是民辦老師的生活更無保障。他們是由公社和大隊自辦的學校教師，待遇自然由生產隊解決，和農民一樣掙工分，分口糧，農忙時要下田勞動。我們為此一直深入到生產隊，然後把解決辦法推廣開來，當年取得了一定成果。

爲了讓適齡兒童都有機會上學，我們的要求很具體：每個大村建一個初級小學，每個小村建一個兒童讀書點，公社必須完善高級小學和中學。牧區要建馬背學校，把蒙古包裏和牧民聚集地的孩子集中起來，老師背著黑板，騎在馬背上，輪流在各點教學。

各地政府對普及教育十分重視，農村對這件事更爲積極，因爲農民都想讓他們的子女讀書。與現在不同的是，當時教育成本低，家長花不了幾個錢，所以入學普及率一抓上升得很快。

1972 年底，我預計自己在教育局工作可能結束，便抓緊把兩件重要的事

提到日程上。一件是民族教育。內蒙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基於少數民族的特殊性，我們在烏盟達茂旗搞了一個民族教育典型，把摸到的經驗寫出推廣報告，計劃在下半年召開全區民族教育工作會。另一件事是在錫盟多倫縣召開了全區業餘教育工作會。當時，經過文革多年的衝擊，教育事業急需從癱瘓中恢復。從現在的角度看，這一切顯得微不足道，但那個年代的思維模式，不可能脫離文革鑄就的特殊環境。

幾十年後，我到赤峰村鎮辦事，順便問起 70 年代的讀書狀況，人們回憶說，那時念書的孩子確實多。

二，徐信和趙紫陽

內蒙高層領導人中，徐信這位軍隊幹部來內蒙時間不長，但霸道作風遠近聞名。後來他榮升副總參謀長，但他的作風烙在內蒙幹部心中。他曾公開貶斥內蒙幹部“沒教養”等，而犯了眾怒。

軍隊對社會秩序和派性抓得更緊，造反派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有些造反派不服氣，就用秘密傳單（俗稱黑帖子）對付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最早遭遇黑帖子的有尤太忠、滕俊卿、吳濤、鄧存論等，徐信當然首當其衝，第一張黑帖子上寫道：“徐信，你想幹什麼？”徐大怒：“傳單怎麼送進來的？”

尤太忠下令追查。第二張黑帖子遂送進他的辦公室，“尤太忠，你的回答不對”，堵住了尤的嘴。不得已，吳濤出面講話：“小字報是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的新生紅色政權，而且手法很卑鄙，缺乏道德，讓被攻擊者無法申辯。”隔幾天，又出現了第三張：“吳濤同志，你有道德嗎？”黑帖子事件，真真把內蒙黨委負責人攪得心不安，想處理，但不知從何處下手。

黨委為此加增崗哨，下班後封鎖大樓，閒人一律免進，但神秘的黑帖子依然不斷。人們雖然覺得黑帖子的行為不正，但總算為內蒙幹部出了口惡氣。黑帖子事件忙壞了政治部主任王弼臣，為偵破此案，他向造反派頭頭們瞭解，也曾詢問我黑帖子是誰寫的，我確實不知道，只能“無可奉告”。他讓我分

析，是否是身邊人所爲，我勸他考慮考慮，是否是他們身邊人所爲。王說不可能，因爲黑帖子神出鬼沒，始終不見送帖人的廬山真面目。

後來，在我被拘留期間，終於明白了來龍去脈。我好奇地問當事人董志：“你怎麼能進去？”經他一點，原來如此簡單。晚間下班時，黨委大院最亂，他準時在下班前，即封鎖最鬆的時刻，大模大樣地進去，先上一趟廁所，觀察一番，趁亂往預先偵察好的屋門下塞進傳單，一分鐘事畢，即刻下樓，隨下班的人流從容離開。待大樓封鎖時，傳單早已靜靜地躺在它該躺的地方，安然無恙。雖說此類手法不怎麼光明正大，但每個朝代的百姓都有自己反抗的方式，黑帖子真算是客氣的。細究傳單的內容，無非是讓高官多聽聽老百姓的意見，少一點壓制和軍人的霸道，也沒什麼大錯誤。

趙紫陽時任內蒙革委會副主任，住新城賓館六號樓。一次，趙紫陽召集人座談農村工作問題，我也在場。趙打算出台一個農村工作 20 條，點名讓我與他一塊調查。我早聽說，他是位工作能力很強的幹部，所以欣然答應。我隨他去了烏盟的托縣（後歸呼和浩特市）、錫盟的東蘇旗等農村、牧區，真正領略了他的求實風範。他獨具慧眼，對下層提的問題屢屢切中要害，證實了人們的傳說。

托縣位於黃河邊，這裏有個麻地豪揚水站，若通過四級揚水，可把黃河水直接引到地頭，灌溉幾萬畝田地。縣裏領導向趙紫陽匯報時，一味強調要錢，且越多越好。趙紫陽撂下投資話題，先和縣裏人一塊算賬：一級揚水多少錢，四級揚水多少錢，流程中水的滲透比例多少，到地頭一立方米水多少錢，用這個水澆地打下的糧食多少錢。真是一本精細的成本賬。計劃經濟時代很少有人算成本賬，我也是第一次聽說給工業、農業算成本，趙紫陽確是我的老師。當場縣長算不出來，趙和氣地說：“算好賬再要錢，如果一畝地從種到收花了幾百塊錢，只收回一多半，我看你這塊地不種要比種好。”

當時，高舉學大寨的旗幟，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細究起來，它到底是否符合中國國情，無人說清。中國農民日出集體出工，日落政治夜校。縱然每戶有少許自留地，養些家畜、家禽，也時時提防著當“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勉強維持越來越窮的生活，還談何資本主義？有的老農對我發

牢騷：“在地頭說個快板，唱段小曲，小麥玉米就能增產？”《岳村政治》中一段話極好：“政治性刺激不能為鄉村社會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²

趙紫陽的確不同一般，他從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出發，在自留地、自留畜等問題上，堅持三級所有，以隊為基礎的原則，計算集體分多少，向國家交多少，個人留多少，給農牧民一些自由，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以提高農牧業生產率。他領著我們一個組的人，和農牧民座談，瞭解他們歡迎什麼，反對什麼。在大政治允許範圍內，制定了發展農牧業 20 條，很受農牧民歡迎。

在和趙紫陽一同工作中，我學到了許多東西。他是一位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師長，是黨內最實際、最聰明的經濟學家。

可惜的是，趙紫陽辛辛苦苦搞出的“內蒙農業 20 條”建議，在自治區黨委的討論會上，被信奉極左思潮的領導成員予以全盤否定，並批評它是“反對農業學大寨”，“搞三自一包，復辟資本主義”。

趙紫陽的滿腔抱負，無法在內蒙施展，直到後來從內蒙調往四川擔任一把手，才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他與安徽的萬里相互配合，創造出舉世聞名的中國農村改革奇跡。此為後話³。

三，林彪事件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乘三叉戟飛機在蒙古國溫都爾汗墮落身亡。事發當時，普通百姓全然不知。

後來，在俄羅斯我遇到一個美國記者，他開玩笑地說：“中國的事中國人知道得最晚，知道的也最不真實。”對此，我無法評論，但我讚歎他的敏銳，說得十分到位。

² 摘自于建嶸所著：《岳村政治》，商務印書館 2001 年出版，第 310 頁。

³ 那已經是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抓，鄧小平復出之後，趙紫陽和萬里分別主掌四川和安徽兩個農業大省，率先認可並積極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人民公社的解體，進而實現全國範圍的農村改革，從而出現“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千古佳話。現在看來，他們的創舉好像沒有什麼稀奇，但在“誰反對人民公社誰就是反革命”的社會環境中，他們的改革勇氣，值得萬民敬仰。

1971年國慶，《人民畫報》專號上刊登了林副主席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特大照片，而且拍攝者是江青。這個信號告訴老百姓，中央高層是團結的、穩固的。而真實的林彪，其實早已魂飛溫都爾汗十多天了⁴。對如此重大事件的公佈，中央極其謹慎，事發幾天後，毛領袖於9月18日批准了“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的文件⁵，語氣沉重，還有幾分哀思。通知要求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直到1971年9月28日，中央通知，把林彪的事傳達到地、師級以上黨委（師是軍隊，地是地委、盟市一級）。這段時間，毛主席進行了一系列的改組：10月3日，撤銷了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等人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擴大會議；成立了中央專案組，有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十人。10月中旬，林彪叛逃經過傳達到地方黨的書記、副書記。10月24日，通知到全國。按級別我10月初應聽到傳達，但內蒙沒有如期執行，是否因內蒙離蘇、蒙兩國太近，不得已而爲之。

10月下旬，我到包頭開調查會，在火車上巧遇原師院東縱勤務員，現呼鐵局團委副書記郭是海。這天，他準備去包頭看望生病的岳父母。他已聽過傳達，急慌慌找一僻靜之處輕聲告訴我：“林彪出事了。”下車後，他沒回岳父家，直接隨我去了招待所，我倆就此事談到天亮。我們感到太突然，感到很震驚⁶。進而疑惑：一位副統帥、九大黨章肯定的毛領袖接班人，真是野

⁴ 在林彪出事二十多天之後，中央密不發喪，或許情有可原，但還要假惺惺地刊登他學習毛主席的照片，那就有誤導輿論、欺騙群眾之嫌。不知江青所攝照片是否標明時間，若故意不標，或者標個假時間，那就更有偽造歷史的罪責。

⁵ 摘自“對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自取滅亡通知稿的批語”，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269頁。

⁶ 林彪913出事的消息，屬於鐵道部系統的呼鐵局，到10月下旬才剛剛傳達。而內蒙黨員幹部知道此事，已經是幾十天之後的事情。不得不佩服毛領袖和中共領導人封鎖消息的高超技術，也可歎中國人民的知情權，被剝奪得如此乾淨徹底。

當時包頭還發生過更為離奇的故事：包頭電機廠有位年輕技術員，因為散佈過對林彪不滿的牢騷話而受到軍宣隊審查。後來通過收聽“美國之音”廣播，得知林彪出事，因為興奮過度，忘乎所以，而跑到大街上，當眾宣講林彪出事的消息，很快被公安人員拘留，經廠方出面擔保，才將他釋放回廠。幸虧沒過多久，關於林彪的正式檔傳達送到該廠，於是才免除了他的牢獄之災。

心膨脹，按捺不住地想當第一把手，搶班奪權嗎？我們想，副統帥的命都保不住，其他跟毛搞文革的人是什麼下場，實例已不勝枚舉。那麼，下一個該輪到誰呢？我們迷茫。

當時分析，林彪肯定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往國外跑，這是共產黨最大的忌諱。細細想來肯定是毛主席司令部出了問題，毛主席在確立接班人上出了偏差。由此，我們推斷出一個疑問：即，文革的大方向和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是真是假呢？兩人感覺，事情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和嚴重，我們不知所措，心亂如麻。我們苦於不瞭解上層的真象，僅能從紅衛兵的曲折經歷中去探索文革的種種謎團。我和郭所能做到的只限於此，沒有答案，沒有結論。一夜的交談，以互勉“謹慎”而別。

林彪出事後，討論抓得很緊，開始一周內業務全部停止，只由趙利源用電話向下催催，做個表面文章，實際下層也在討論。十天、半個月後，改為半天討論，半天工作，以後漸漸淡漠，每週討論兩天，工作四天。

四，周總理的殷殷囑託

在普教組的一段工作有了一定的效果，我感到欣慰，感到爲國家和民族做了點實事。但我心中依舊不平靜，不願在處長的位置上混日子，想到艱苦的地方去錘煉自己。

1972年下半年的一天，尤太忠向我瞭解黑帖子的事，我趁此機會向他提出辭去教育局的職務，下去當個縣委書記或公社書記，瞭解民情，歷練自己的請求。我說：“這不單單是我有這個想法，是一次總理接見時曾對我說過的，當好縣委書記是基本功，如果把一個縣治理好了，能治理好一個市，治理好一個省。”

非常巧，過了一個多月，尤太忠到北京開會，總理聽完匯報後問到我，問我在幹什麼，有什麼想法。尤回答：“高樹華學習班表現很好，教育局工作也很好，也沒搞派性，最近主動提出要下去當縣委書記鍛煉。”總理說：“那很好啊，請轉告高樹華，我支持他下去。你們也要支持他到下面紮紮實

實地搞好一個縣，讓他好好鍛煉，好好磨練自己。”

尤太忠從北京回內蒙第三天，向我傳達了周總理的意見，尤太忠說：“總理對你的印象特別好，認為你是個好苗子。”尤太忠說到這兒很興奮，要請我吃飯，讓我打開酒櫃自己挑酒。可惜我不會喝酒。在飯桌上，他獨自喝著酒問我，願意到哪兒去。他剛從土左旗解決哈素海事件回來，說那裏的民族問題非常嚴重，事情難辦，“我看你就去土左旗吧”。

我猶豫了一下，憶起 1968 年權星垣住院時說過的一番話。那天，權在病床上談到前門飯店會議，斷定他們與烏蘭夫那場鬥爭是早晚的事。他說：“那時，土左旗的一個農民只要與烏蘭夫沾親，個人的事情可以通天，烏蘭夫會在書記會上，為一個沾親帶故的社員的事大發脾氣，更不用說公社和隊幹部了。”權說話間，臉上的表情仍然沉浸在前門飯店會議上與“烏蘭夫集團”的角鬥中。

當場我問權：“你是省一級幹部，自治區的黨委書記難道管不了土左旗一個公社幹部的事？”

“管不了。”

“那麼，大、小隊這級農村幹部你也管不了？”

“管不了。哪怕一個能沾上親戚邊兒的土左旗社員的事，我們也管不了，都是烏蘭夫一夥直接負責。”

“那麼說，這種局面很不正常了。”我說。

“當然了，所以，烏蘭夫不代表共產黨的立場。”

權星垣毫不躲閃的坦言，我聽時不理解，還當面嘲笑他們，官做大了，為了保烏紗帽，竟不敢管一個社員的事。權為人厚道，不在乎我的嘲笑，他半開玩笑地說：“你日後有機會到土左旗管管事，看看那裏是怎麼回事。”

現在，尤太忠將我一軍，讓我去一個自治區書記管不了一個農民的地方，我豈能被嚇倒？一生不是一搏嗎，去試試又何妨。

1973 年到 1976 年我任中共土左旗旗委副書記時，1968 年權星垣的談話被我理解了。

1973 年 3 月 5 日，中共內蒙黨委下發了任命書，任我為土左旗旗委副書

記，革委會副主任。我去呼和浩特市委報到時（此時土左旗已屬呼市），市委書記蔡雲璞、王明清接待了我，說他們已聽到尤太忠傳達的總理講話的精神。

從 1973 年開始，我在土左旗一直工作到 1976 年 3 月，直到我調入呼和浩特市委工作，市委書記共有三屆人馬。蔡雲璞是人民解放軍 27 軍政治部主任。他返回部隊後，呼市第一書記換為劉玉柱，是國家經委下放來的一位司局級老幹部，不久，便打道回府。接替呼市第一書記的是郝秀山，文革前的烏盟盟委副書記，曾被打成烏蘭夫黑幫骨幹。幹部解放後，他先任內蒙水利廳廳長，後調入呼市任第一把手。在呼市任第二把手的是高萬寶扎布，文革前的錫盟盟委第一書記。

我調任半年後，原內蒙革委會常委中，那順巴雅爾去包頭市土右旗當旗委副書記，郝廣德去烏盟武川縣當縣委副書記，王金保去烏盟卓資縣任副書記。上行下效，各盟、市的原群眾組織頭頭，也陸續被派到縣及公社任職。

第四十三章

“天蒼蒼，野茫茫”——我的新任地

在春寒料峭中，我坐火車直奔自己的新任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旗辦公室主任王文緒、政治部副部長曹棟，帶著旗裏唯一一輛華沙車到車站接我。我們互不認識，可能在他們的印象中我不像旗委書記，故雙方擦肩而過。

一，走遍大青山下沖積平原

我獨自走出車站，沿著站前一條破舊的柏油路邊看邊行。走到盡頭往北拐，柏油路變成土路。我兩腳沾滿泥土，感歎這個半似農村，半似城鎮的地方，就叫察素齊鎮。街中心十字路口，有幢破舊的二層樓，是土左旗最大的商場，對角是旗文化館。這裏還算熱鬧，兩旁錯落地排列著一些小店鋪，理髮店、飯館、電影院等。向北跨過東西走向的呼包公路，在 45 公里的路牌附近有個大門，就是旗委所在地，我在這裏開始了人生的新旅程。

土默特左旗（土左旗）、土默特右旗（土右旗）原為一個土默特旗，位處土默川平原，呼市與包頭兩市之間，京包鐵路和公路橫貫東西，古稱“敕勒川”，古老的鮮卑民歌“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寫的就是這裏。這裏曾是水草豐美的天然牧場。北部是層巒疊嶂的大青山¹，占全旗面積 1/3，曾是革命根據地，綏蒙抗日政府設在烏蘭板溝，一批老幹部在這裏戰鬥過。

因為這種資格，幹部與家鄉的血緣關係，使土左旗成為一塊是非之地。長期任內蒙一把手的烏蘭夫，出生在土左旗塔布賽村，第二、三把手奎壁、

¹ 屬於陰山山脈的一段，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西南部，東西走向，綿延 250 公里，海拔 1800—2200 米。大青山一名出現在明朝嘉靖年間。

吉雅泰的老家也在這裏。當地人誇張地形容“東西 60 多公里² 的大青山 81 條溝裏，裝了多少年的的是是非非”。

我去土左旗報到後，旗委分派我負責文化、教育、知識青年、宣傳一攤工作。

交接工作完畢後，我向辦公室借了輛自行車，與組織部一位辦事員一起，開始下鄉走訪。我們先一路東行，順呼包公路沿線，先後去了此老、畢克齊、兵州亥、台閣牧幾個公社。正值春天，大青山下公路兩旁的桃花、杏花掛滿枝頭，粉紅的、白色的花霧漫漫一片，美輪美奐，令人癡迷。

畢克齊公社的糧食產量全旗最高。1973 年，農業上《綱要》的標準是畝產 400 斤，“過黃河” 500 斤，“過長江” 800 斤³。畢克齊一向精耕細作，有的大隊過了黃河和長江，上綱要的大隊更多。

畢克齊是個老鎮，古誌上有記載，毛選中也有“打綏遠要佔領畢克齊”的段落。這裏的確富庶，交通位置重要。畢克旗鎮的古廟——奶奶廟過去香火不斷，現在已被政府改爲學校。只有天主教堂和一些老店鋪，依稀存留著老鎮痕跡。

內蒙軍管後，於 1969 年 12 月，把著名的召廟拆了。我在畢克齊公社（現改爲鎮）親眼目睹了著名景點——喇嘛洞的慘狀。

喇嘛洞是明萬曆十年建的藏傳佛教寺廟，山青水秀，美景醉人。我戴紅領巾時代，多次來此郊遊。眼前，喇嘛洞四周，殘垣斷壁，了無香火。我問同行的旗宣傳部幹事劉懷玉，這位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生氣憤地說：“被軍管會拆了，公社用木料蓋了禮堂，察素齊蓋了文化館。現在只剩一個喇嘛。”

我們走訪的最東一站是台閣牧公社，距呼市只有十幾公里，是全旗比較窮困的地區。公社書記任四娃，正與副書記張元珍在指揮蓋禮堂。我不解，一個公社蓋禮堂幹什麼，張振振有詞地說：“開三幹會避風雨，平時當糧庫，

² 從呼市出發往西沿呼包公路算，18 公里始至 81 公里止，為土左旗從東往西的行政轄區。

³ 所謂上《綱要》，是指糧食產量達到“1956 到 1962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所提出的具體要求：黃河以北畝產 400 斤，黃河以南畝產 500 斤，長江以南畝產 800 斤。據新華網介紹：“1957 年 9 月，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農業發展綱要十四條（修正草案）》，這實際是農業‘大躍進’的綱領。”

修拖拉機。”公社辦公室還是 1958 年時的土坯房。廁所是新蓋的，裏外青磚牆，格外堂皇。

公社對面是農機廠，主要修農機具，是公社的骨幹企業，工人多為幹部親屬。除工分外，另可掙些現金，有點商品經濟味道。

爲了上綱要，硬指標把農業導向惡性循環，無人計算投入和產出是否合理，社會資源是否浪費，農民生活是否改善。凡我所到的鄉村，經濟運作大同小異。⁴

土默川是沖積平原，地下水位高，水井星羅棋佈，水質純淨甘甜，許多還是長流不息的自流井。

對於基層幹部來說，除糧食上綱要的硬任務外，還要辦好農村政治夜校。顧名思義，它是鄉村晚間的一種政治活動形式，除毛領袖最高指示，報刊社論、農村四清 23 條⁵ 等，都是學習內容。

二，大岱公社蹲點

1973 年末，呼市召開四級幹部會，議題是幹部下基層蹲點。會後，旗委決定派我到土左旗西南部的大岱公社蹲點。

土左旗 24 個公社，大岱公社距察素齊 26 公里，共一萬多人，12 個生產大隊，最大的是大岱大隊。人們說，大岱大隊一千多戶人家，幹部輪流吃派飯⁶，一圈下來要三年。大岱東西狹長，村子兩邊口音不一樣。若說：“我父親、我母親、我哥哥”，村東說“俺大、俺媽、俺哥哥”；村西則是“蒙大、蒙媽、蒙高高”。

⁴ 當年毛領袖強調所謂“工業以鋼為綱，農業以糧為綱”，而糧食則只管產量高低，不管品質、花色、口味、營養以及市場價格等人們習以為常的東西。因此，在經濟上，可以說毛非但不懂理論，亦不懂市場，甚至缺乏普通農民應有的常識。

⁵ 為了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毛澤東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的一些問題》。這一決定共有 23 項內容，故稱“二十三條”。

⁶ 吃派飯，指下放勞動的幹部輪流在農民家吃飯，每天交三角錢，一斤糧票。當時幹部月工資 30 元、40 元左右不等，老幹部稍多一些，每月 100 元上下，糧食定量每月 32 斤左右。

這裏人多，家族雜，當然問題也多。歷次運動，從整風、土改到四清遺留下許多事懸而未決。有的幹部被趕下台後，一掛就是幾年，十幾年。況且一個人的問題影響一家人，一個家族。由此產生的矛盾可想而知。

旗裏組成一個大岱公社工作團，我任團長，旗委常委李俊威任副團長，計委、旗機關抽調幹部爲工作人員。我自己又選了一個離大岱四、五公里的小村子陝西營子做爲典型。

陝西營子有2個小隊，100多戶人家，六、七百口人。據村裏老人說，他們是陝西人的後代，因屯兵、經商在這裏紮下根。陝西營子是“張家一大戶，王家一小戶，中間夾著些球毛⁷戶”。大隊書記張高保，委員王小高，是張、王兩族中的老黨員。

大岱公社還有一個大隊叫獨立壩，該大隊徐書記希望我去蹲點。爲慎重起見，我先後兩次去該隊調查。

徐沒把工作重點放在糧食上，而是在抓產量的同時，開辦了粉坊、豆腐坊、養豬場。粉坊用土豆做澱粉和粉條，經營得很紅火。該隊良種場占地面積大，實際是多留了些自留地。現在看來，徐確是搞市場經濟的能手，但當年是受批判的資本主義傾向。經過調查，我認爲這地方不適合我蹲點，幹三年也難上綱要。爲此，我得罪了他和他周圍的人。審查期間，拉我去土旗批鬥時，這位書記上台發言，控訴我對獨立壩的抵制，甚至迫害⁸。

大岱公社的土地，一多半在哈素海（旗內一片濕地）退水區之西，土發黃，較貧瘠；陝西營子地處哈素海退水區之東，屬黑河⁹流域，土發黑，較肥

⁷ “球”（或者毬）為內蒙西部農民罵人的口頭語，意指男性生殖器。“球毛”二字，除了字面含義外，也常常表示雞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這裡指少量其他雜姓戶。

⁸ 說心裏話，我並不完全認同“農業學大寨”那一套僵化的經濟政策。當時農村已經出現農民“增產不增收”的抱怨。對於有條件的地方，因地制宜發展工副業生產，提高經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我打心裏贊同。但我們當時下鄉工作的重點，是“農業學大寨，糧食上綱要”，我不可能脫離上級要求的工作重點，而去支援一個搞多種經營的生產隊，冒“反對學大寨”的政治風險。因而，對他們搞商品經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我當時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

⁹ 黑河位於呼和浩特城南二十華里處，昭君墓旁。現名大黑河，東南部還有一條支流叫小黑河。黑河早在南北朝即有記載，屬黃河支流，以其流域土質黝黑而得名，是呼市郊區、土默特左旗、托克托縣的主要灌溉河流，可灌溉耕地50餘萬畝。

沃。陝西營子怎麼上網要，工作團做了周密的策劃。我們首先測量每個地塊，計算出種高粱、玉米或小麥的產量。有一處叫“任三地”的地塊，位於最高處，水上不去，向來無人種。要想讓任三地長出莊稼，唯一的辦法是引水上去。

陝西營子缺地下水，沒打過一口像樣的井，當地農民都喝又苦又澀的井水，小孩生下沒拉過乾屎，他們認為屎就是稀的，倒沒有便秘問題。大岱公社原有一條灌渠，叫躍進渠，直通黃河包頭段附近的磴口揚水站。把黃河水揚到躍進渠，水可自流到大岱公社地邊。若再揚一次水，即可流遍全公社。可惜這條灌渠自1958年修成後，總共放過不到十次水，基本沒人管，灌溉問題始終沒解決。所以，我們一方面調整種植面積和結構，一方面研究水問題。大家推舉我去磴口揚水站要水，否則一切白費。

出發前，我和李俊威帶著工作隊，首先把管道狀況視察一遍，督促各大隊抓緊修護堤壩，並親自檢查了公社揚水站。年久失修的機器，經過重新配件安裝，終於趕上了放水。

一切妥當後，我去水利廳向廳長郝秀山要指標，並與上游土右旗疏通。春播前，黃河水通過躍進渠送到了大岱。來水那天，老鄉們齊聚渠邊，興高采烈地說：“多年盼的水終於來了”。由於沿途調配合理，大岱公社揚水站準時揚水，順利流入終點站——陝西營子和依肯板申，全公社春播用水有了保證。

停水前兩天，我們從地裏回到公社準備吃飯，炊事員高興地說：“大家辛苦了，吃麵條。”不料剛端起飯碗，有人來報，“鞏家圪旦跑水了”。我們立刻放下碗，騎車奔往出事地點，只見民兵已下渠堵水。水堵上了，我還是忍不住把大隊支書白文壽罵了一頓。事後，我們調整了鞏家圪旦大隊的班子，為後來的“鞏家圪旦事件”埋下了伏筆。

趕回公社已是半夜一點多，吃剩的麵條還擺在桌上，疲餓交加的我們正準備和鍋裏的麵條一塊熱熱，燈下一看，一隻耗子躺在鍋裏，大家呆在鍋前不知如何是好。我開玩笑地說：“耗子也是肉嘛，不想吃撈出去，裝做沒看見，麵煮開，消消毒，吃了它。”泡過耗子的麵條，竟讓我們這群餓漢吃了

個淨光。

第二天，外出檢查澆地情況，一切順利，連“任三地”那樣的“骨頭”都啃下來了。不苟言笑的張高保也滿臉笑容，高興地讓我到他家吃飯，我說：“水來了，到你家吃飯，有擺功的意思，我還是吃派飯吧。”他說：“今天就派到我家。”張高保是張家一族的長輩，因胃病很少參加勞動。但他處理張王兩家的事很公正，所以大部分人擁戴他。他臉色晦暗，常掛著清鼻涕，不時用手一擰抹在鞋底上。我常給他帶點藥去，我們成了朋友。

渠水把地澆透後，聰明的張高保把餘水存在一個事先挖好的大坑內，沉澱之後可飲用，口感發甜，十分好喝。但全村人開始便秘，都去找赤腳醫生看病，成為村莊的笑料。

第二年，內蒙農牧學院的家屬子女到陝西營子插隊，我向帶隊老師詢問，學院的水利專家可否來村測量測量。另外，我還專門請求我岳父的世交、農牧學院的院長幫忙，派來一名專家，在離村較遠的地方，測量出水井位置，打出了一口長流不息，水質甘甜的自流井，徹底解決了當地農民的吃水問題。

20世紀80年代，實行責任制後，陝西營子人開始用這口井的水做豆腐，成為遠近聞名的豆腐村。

抓完春耕，我和李俊威著手解決領導班子問題。能不能學好大寨，關鍵看領導班子。譬如陝西營子，領導班子雖然穩定，但還是挑選了一位回鄉知青王喇嘛，加強領導。儘管他屬王家一族，張高保很賞識他。大岱公社均按照陝西營子的經驗，從回鄉知青中選拔了一批先進分子當生產隊長，進大隊，再陸續進入黨支部。其中大岱大隊有一個回鄉知青叫李金蓮，在大岱中學教書。她學習積極，為人正直。她雖然是李家姓氏，當地梁家上下都擁護她。李金蓮經大隊推薦，工作組考核，公社討論，當選為大岱大隊支部副書記。李金蓮不負眾望，幹得很出色，贏得了一定聲譽。但是幾年後，我被審查時，她卻成了受我牽連的人之一。

上文提到的鞏家圪旦，卻頻生枝節，讓工作隊深感頭痛。我們按公社的意見調整了班子，郭豆小擔任支書，民兵連長關勝子當副支書，大隊會計任革委副主任，協助工作。他們一再保證把事情幹好，當我們離開後，會計開

始撂挑子，和另外兩個人對著幹，鞏家圪旦留下了後遺症。四年後我被拉到土旗批鬥時，前任書記曾上臺發言，說我迫害他，給他扣大帽子“多吃多占”。他說：“我沒拿 1000 斤，只拿了 700 斤”，會場一陣哄笑。那時，該人又升為書記，郭豆小、關勝子被攆出黨支部。郭豆小又做起了小生意。關勝子不得已，舉家遷到托縣。

三，合作醫療網和鄉村學校

在旗委班子中，我還主管文教、衛生。衛生工作的中心是落實毛領袖的 6.26 指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中央要求建立縣、公社、大隊三級合作醫療網，關鍵問題是醫生和赤腳醫生的培訓。旗裏先後舉辦過多次赤腳醫生培訓班。大隊赤腳醫生經過培訓，可處理頭疼、腦熱、感冒等普通病症，打針、開藥、輸液和接生也陸續由大隊赤腳醫生獨自操作，技術嫻熟的赤腳醫生可給婦女做節育手術。

合作醫療的另一問題是經費來源。那時，經費部分來自大隊公積金，加上社員每人每月攤收一元錢，基本解決了資金問題。據外地的“三土四自”經驗¹⁰，大隊劃出一塊地種藥材，赤腳醫生管理。這樣，農民有了小病和小傷，就可藥到病除。

公社衛生院的條件在逐漸好轉。衛生院初期只設內科、外科、婦產科和中醫科。隨著國家下撥部分簡單的醫療器械，衛生院有了 X 光機等設備後，醫療範圍逐漸擴大，可處理四肢、腰椎的治療和尿、血常規的化驗。公社衛生院還兼一項職責，就是負責傳染病的監測防治，做好計劃生育工作。

我在土左旗期間，有一支天津 6.26 工作隊¹¹，由三、四十位醫生組成。

¹⁰ 此處指建立農村醫療網和勤儉辦醫的經驗。“三土”：指土醫、土藥、土法；“四自”，是指中草藥的來源和經營模式：自種、自產、自製、自養。

¹¹ 根據毛的 6.26 指示精神，由城市派到農村的醫療隊。天津曾經派往內蒙古數以千計的工作隊員，均由有經驗的醫生和護士組成，充實公社衛生院的技術力量。他們在內蒙停留的時間長短不等，有的數月，有的數年，還有的拉家帶口，準備長期下放。但數年之後，政策變化，又全部被陸續調回天津市。被抽調到基層公社衛生院的衛生人員，不僅限於天津市，

他們少數人帶家眷，多數家人還留在天津，而且大部分是女大夫，有許多困難，所以工作不太安心。

旗衛生局長老魏很有同情心，提出一個辦法：分派這些醫生到各個公社培訓赤腳醫生，培訓完畢，讓他們返回天津。這既調動了外地醫生的積極性，又解決了當地的培訓大事。經過半年多，每個公社的赤腳醫生都輪訓了幾遍，天津人也愉快地返回故土，可謂兩全其美。

幾年時間，土左旗三級合作醫療網基本建成，有了一批穩固的、有技術的，能基本解決農民看病的醫生。他們一部分是經過培訓的土醫生；旗醫院大部分是解放後內蒙醫學院、包頭醫學院畢業的大學生，他們擔綱主要技術工作。

土左旗比較落後，歷來交通閉塞，是土匪出沒的地方。我在大岱公社聽到當地順口溜，“郭長清的隊伍哪裏住，十二犏頭、沙金兔（犏為當地小村莊）”。郭長清的國民黨部隊，解放後淪為土匪，在十二犏頭、沙金兔和共產黨打遊擊式地周旋了一、二年才被殲滅，地點正是在大岱公社一帶。解放軍到芷芨梁公社工作，上年紀的農民見了，還沿襲舊社會的稱呼叫“老總”。

在內蒙中西部偏僻農村，存在吸毒販毒情況。赤腳醫生對本村的吸毒情況知根知底，可以幫助政府防毒、戒毒。合作醫療網和赤腳醫生隊伍，不僅能保證農民身體健康，還能提高人們的心理和文化素質，起了移風易俗的作用。

《土默特左旗誌》¹² 中承認，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土左旗已經建立了三級醫療合作網，形成了三級防治醫療網，此外，有條件的廠、礦、學校口

也包括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包頭等城市醫院的技術人員。據《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披露，毛的御醫李志綏本人，也被下放到了南方的農村。全國被強制調往農村的衛生人員，數以十萬計，一時出現城市醫生短缺問題。為了應付局面，許多醫院不得不把護士升格為醫生，給病人開處方、做手術。當時報刊宣傳，居然還稱讚這種違反技術原則的胡來行為，美其名曰：“雞毛也能飛上天”。

¹² 《土默特左旗誌》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上級要求和規劃下，由地方政府組織編寫的旗縣地方誌，系統羅列中共建國以來主要成就。其中雖然不乏某些珍貴資料，但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例如大饑荒死亡人數、挖內人黨情況等，常有文過飾非，避重就輕的傾向。

建立了醫療室¹³。

教育的發展是落實毛領袖“五七指示”。從 1972 年起，在全區實行十年制教育，城鎮是小學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農村是小學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三年。那個年代抓入學率，要求普及小學，不允許孩子失學。過去，農村學校少，孩子上學路遠，適齡兒童入學率低，特別是女孩普遍在家看孩子，喂豬。計劃生育以後，孩子減少，村辦小學相對增加，孩子們不出村即可讀書，女孩子上學的機會也相對增加。

當時，土左旗全旗入學率 97% 以上，女童比例更高。不僅土旗，全自治區也是 70 年代長大的適齡兒童入學率最高。文革幾年，教學品質不高，但入學率較高。

土旗是民族雜居區，少數民族教育較受重視。在蒙族集中的村子，辦學條件更好一些，上級支持的力度大，老師待遇相對優越。土左旗雖以蒙族為主，但都不會說蒙語，更不識蒙文。烏蘭夫也不會說蒙語。旗委、革委會這兩個機關門口牌子上的蒙文，經語委檢查，無一正確。根據這一民情，土左旗加強民族教育的重點，放在民族教師的待遇和學生的入學率、升學率上。

鐵帽公社巴獨戶小學，曾是勤工儉學的一面旗幟。該校由回鄉知青劉贊斌（蒙族）創辦。他發動農民在村外鹽鹼地上蓋一排房，周圍種滿花草、樹木、草莓和沙柳，既改造了土壤，又成為學生的試驗田。他和妻子，一位呼市下鄉知青擔任教師，從一、二年級辦起，發展到五、六年級。之後，經自治區抓教育的書記王鐸¹⁴，市委書記雲治安和我的推薦，劉贊斌終於入了黨，提拔為大隊副書記。1976 年，土左旗決定在萬家溝果園辦農業大學，調劉贊斌擔任農大常務副校長。不料，粉碎四人幫後，因受我牽連，劉被審查，夫

¹³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經濟水準十分低下的情況下，毛領袖起碼想到了農村醫藥問題。三級醫療網的建立，無論如何原始和簡陋，對於農民缺醫少藥的情況，多少起到了緩解作用，因此，農民對它的好處依然念念不忘。但到鄧小平江澤民時代，醫療和教育事業受到商業化大潮衝擊，一切向錢看的結果，使三級醫療網迅速瓦解，除少數暴富者可以享受高昂的醫療服務外，大多數農村人口，甚至包括許多貧困的城市人口，“小病基本靠抗（抵抗力），大病回家等死”，重新回到缺醫少藥的狀況。

¹⁴ 在七十年代初期的落實老幹部政策的過程中，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王鐸，又被中央重新啟用，成為內蒙負責文教工作的書記。

妻倆不得不回呼市另謀生路。

四，形態各異的政治夜校

政治夜校是集體教育的一種形式，大寨經驗也有這一條。實際上，基層的夜校五花八門，內容非常龐雜¹⁵，值得略做介紹。

在杭錦後旗五四大隊勞動期間，我所在的生產小隊，政治夜校批鬥過一個叫李二仁的富農。批鬥歸批鬥，他仍有一個相好的貧農女人陪伴他，始終不受“階級觀念”的影響。李二仁每天比別人早出工一小時，多擔點糞肥作為對自己的懲罰。¹⁶

烏拉特中旗納日斯太大隊的政治夜校，又是另一種形態。晚上常有狼群出沒，所以政治夜校一星期或幾星期搞一次，只傳達傳達上級的精神，讀讀社論就散會。那裏的政治夜校，可比喻為資訊集散地，其政治性遠沒有五四大隊那麼強烈。

大岱大隊的政治夜校由老支書梁三佈置生產事宜，思想上的問題主要由新上任的副書記李金蓮隔三岔五講一次。

1975年初，我慕名到陶思浩公社妥妥岱大隊，考察那裏的農田基本建設。晚上，幾個年輕人在政治夜校審問一個男人，讓他交代歷史問題，問他女人¹⁷哪裏去了。男人始終沉默不語，氣氛尷尬。為了轉移話題，我講了形勢和今後任務，20分鐘後散會。

晚上，我住在那個男人的親戚家，主人說：“高書記你挺隨和，不審我親戚，感謝你。我親戚20來歲時到鐵帽去打工，那時還沒解放，和一個當地

¹⁵ 據當地村民說，政治夜校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解放初期的掃盲運動，那時候為了掃盲，推行漢語拼音方案，讓專門受過培訓的小學老師，在晚上給全體青年村民上課，叫做“識字班”。有時也用它召開村民會議，宣講婚姻法、新法接生、合作化等新的政策和法令。

¹⁶ 這個例子或許說明，普通百姓對待政治“賤民”的態度，與官方意識形態有很大區別。在民眾眼裏，官方那套政治劃分標準，只對懷有政治欲望者有吸引力，而對於僅憑苦力掙飯吃的他們，賤民不賤民，沒有什麼區別。

¹⁷ 此處的“女人”，相當於陝北話的“婆姨”，是老婆、妻子的別稱。

人成了好朋友，住在他家。那個人是光棍。我這個親戚突然得了重病，久治不好，就要求光棍朋友在他死後，把他的老婆、孩子養起來。朋友開始不接受，在他堅持下，朋友慢慢地接受了他的請求，和女人、孩子住在了一起。我的親戚在朋友細心的護理下，又慢慢地活過來了，一個女人只好伺候兩個男人。解放後，我的親戚回到家鄉妥妥當，把女人也帶了回來，女人總是這兒半年，那兒半年地來回跑。起初人們以為她是回娘家，後來漸漸知道了真相。”

第二天，我勸年輕人不要追問了，告訴他們，那是舊社會發生的悲劇，沒有階級鬥爭含義，不必刨根問底。一次，我到鐵帽公社辦事，專門去拜訪了那個光棍男人，他知道我干預了這件事，苦淒淒地說：“她前兩天剛走。”我曾見過兩位男人，但從未與操持兩個家的婦女謀過面¹⁸。

陝西營子政治夜校研究的問題中，動員婦女勞動這一條，具有當地特點。當地習俗是婦女不許拋頭露面，當地話就是“王家女人不能在張家面前現眼”。婦女人數占一少半，是不可多得的勞力資源。婦女們也願意出去勞動，這樣可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工作組通過政治夜校，鼓勵婦女出工，又挑選一個潑辣的媳婦擔任婦聯主任，成立了鐵姑娘隊和娘子軍（由媳婦組成）。果然，婦女勞動在陝西營子上綱要中起了重要作用。

雖然，階級鬥爭的政治文化，打破了傳統的宗族關係，但在窮鄉僻壤，家族組織時時影響，甚至頑固抵禦共產黨的集權統治。1974年到1975年，我到芷芟梁公社高泉營子大隊考察農田基本建設，據瞭解，是一位姓高的年輕人帶領群眾幹出來的成果。

高泉營子歷史上曾出過一位名人叫高理亭。抗戰時期，高任第八戰區縱隊副司令、騎兵第13旅旅長。1949年，參加9.19起義，任解放軍106師副師長、36軍副軍長。1951年鎮反中被槍決，罪名是參加了國民黨第13旅“地

¹⁸ 事實上的一妻多夫現象，在中國西北貧困山區零星存在了許多世紀，今天也不例外。電影《老井》作者鄭義先生，在其短篇小說《遠村》中，對此做過描繪。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貧困，一個男人的勞動收入，有時無法養活老婆孩子；另一方面，男女性別比失調，許多男人討不到老婆。於是就出現兩個事實丈夫，合養一個老婆；或者一個女人，同時操持兩個家庭的故事。

下武裝”¹⁹。他的墓地位於本村。外人稱他是土匪，高泉營子人稱他是英雄。我去時，正逢他女兒從海外回歸故里。當地人家奉她為上賓。

我的姓氏引起本村一位老者注意，他盤問我家祖宗的來歷。當我一提山東青州，老人一拍大腿說：“哈，咱們是一家人啊，我們也是最早從青州過來的。”第二天，關於“高書記和咱們一脈”的消息傳遍全村，我立刻被另眼相看。有什麼事，老少爺們就找我解決。雖然這事太具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但我十分理解。因此，凡合理的要求也給他們解決。當我被拉到公社批鬥時，高泉營子人拒絕上台發言，認為批判我是他們家族的恥辱。看來，共產黨的階級觀點，難以解析傳統的宗族關係。

至於小農意識，地域觀念等，則更難變革，北方農村過春節，習慣連吃三天餃子，還要吃油炸糕²⁰，正月十五也吃餃子。陰曆2月2日是龍抬頭的日子，為企盼下雨，早晨必須吃麵條，稱之“挑龍筋”。中午吃烙餅，是“揭龍皮”；晚上吃餃子，是“挑龍眼”。這些地域風俗，農村黨支部管不了，政治夜校更難以改變。

¹⁹ 這個所謂“地下武裝”的案子是否有水分，很值得懷疑。當年中共為了在鎮反運動中捕殺一批起義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不惜自毀諾言，有意編造藉口，誇大案情，無限上綱，造成許多冤假錯案，把不該抓的抓了，不該殺的殺了。當年領導起義的傅作義和董其武將軍，對中共撕毀起義協定，濫殺自己部下的情況十分不滿，多次向中央和毛本人反映，但毫無作用。直到八十年代胡耀邦負責落實政策，才給部分受害者及其家屬平反和道歉。

²⁰ 內蒙中西部地區的一種風味食品。把有粘性的黃米麵蒸熟，捏成小圓餅，再用胡麻油炸成金黃色，作為喜慶筵席和招待貴客的美食。

第四十四章

土旗的知識青年們

1968 年 12 月，毛領袖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以後，全國知青上山下鄉成爲一場偉大的政治運動¹。

土左旗的知識青年前後約有六千多人，呼市來的約三千，另一半是北京、天津、上海和本旗的回鄉青年。我上任時，大部分知青已離開農村，僅剩一千名仍分散在各大隊。

一，知青工作幾大問題

我在內蒙革委會工作時，曾接待過第一批北京知青，感覺他們很了不起，如果使用好，能提高農民的文化、教育和衛生水準，對農村的發展大有裨益。

既然土旗讓我主管知青工作，我責無旁貸。令人生奇的是，旗知青辦對知青的看法有偏頗，經常冷嘲熱諷。我在知青辦會議上說：“知青有什麼話向你們傾訴，有困難找你們幫助，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們遠道而來很不簡單，他們的父母親友爲他們擔心。知青辦就是他們的娘家，不應對他們冷嘲熱諷。”然而三年時間，在知青問題上，我始終沒和他們達成共識，實屬無奈。

1977 年，在全旗批鬥我的大會上，知青辦代表發言說，我把知青工作引上了歪路。我認爲，我沒做錯什麼，土旗的知識青年大有作爲，我永遠是他們

¹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的上海支邊運動，六十年代海南橡膠農場和雲南、新疆等建設兵團的組建等重大事件。也有六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城市青年下鄉等先進事蹟的宣傳，例如對邢燕子、侯雋等模範人物的表彰等等。但那時的下鄉運動規模較小，涉及的人數不過成百上千。只有到文革年代，其數量才以百萬千萬計，影響幾乎每個有中學生的城市家庭，和差不多所有的農村基層。內蒙地處邊疆，幾乎所有的農牧區都安置了知識青年，又臨時組建了規模龐大的生產建設兵團，戰士全部來自城市知青，因此，內蒙的知青問題比較集中，也比較典型。

的良師益友。

我主管知青工作期間，毛領袖在批復福建省莆田縣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的信時指示：“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²為落實毛領袖批示，內蒙知青辦明確提出要保護知青，特別是女知青，並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佈置。1974年的中央文件中，把保護女知青不被凌辱的問題提到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內蒙生產建設兵團大約發生上千起迫害女戰士案，是全國重災區之一。

為此，我細心觀察知青，發現知青工作存在下列幾大問題：

一是安置問題。知青下鄉後，國家按人頭撥資金，要求知青集體生活，與當地農民區分開來。一般生產隊給知青蓋的房子地基淺，屋頂和牆皮薄，多數沒達到標準。因此，冬天冷，夏天熱，經不住風吹雨淋。下鄉後的頭兩年，國家下發口糧，若參加勞動可與社員同等分紅。土左旗分紅水準很低，根本拿不到現錢，能分到口糧就算不錯，談不上生活品質。客觀講，就我這個旗委副書記也吃不好，每月吃粗糧的時候多，細糧（白麵、大米等）僅占每月標準（約30斤）的30%。

我每到一村，經常住知青點，以便隨時發現問題，儘快解決。我感到知青到農村，很難融進當地生活。如北京知青愛讀書，颶風時有戴風鏡的習慣，農民覺得新鮮。當地女人洗頭都在屋內，不能讓男人看見，女知青沒這種意識，尤其夏天，燒盆熱水，穿著襯衫，在院子裏洗，用風吹幹。農民看不慣，認為有悖風尚。千百年形成的不同習慣，融合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土左旗鄉下人沒廁所豬沒圈。解決問題的習慣是男東女西。早晨起床後，往東南西北的人都有。一般住家戶有便盆便桶，早晨隨意往外一潑。當地豬是放養，不像南方有豬圈。早晨，家家戶戶把豬、雞放出去覓食，亂啃一頓，傍

² 李慶霖老師因為自己有子女下鄉，生活困苦無法解決，冒險給毛領袖寫信反映。毛不但給他親自回信，還寄了三百元人民幣，寫道：“現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云云。此後，知青開始分批招工、招生、返城。按理說，李慶霖給全國知青及其家長們做了件大好事。但不幸的是，四人幫利用李慶霖為自己臉上貼金，提拔他出任福建省教育高官，從而把一個普通小學老師變成幫派成員。毛死四人幫倒臺，李慶霖也被逮捕判刑。據媒體報導，李慶霖八十年代末出獄後，已是老朽殘年，仍在福建莆田縣過著貧困不堪的日子。中國歷史的荒謬邏輯，由此又見一例。毛領袖給李慶霖的信，詳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349頁。

晚自己各進家門。也有走錯門的，鄰裏會主動交還主人。假如有豬走失，黃昏的街面上此起彼伏的嘯、嘯聲，便是主人在呼喚豬們回家。與河套平原一樣，當地也流傳“人屎豬吃了，豬屎雞刨了，雞屎風刮了”的順口溜。而男女青年集體住宿，就必須蓋廁所。當地人很好奇，曾發生過偷窺女廁所的事件。

二是工作使用問題。農村出於需要，在知青的使用問題上優劣不一，擔任民辦教師的較普遍。知青文化底蘊厚，做這項工作得心應手。大隊良種場也多為下鄉知青擔綱。赤腳醫生隊伍稍有不同。赤腳醫生有提留公積金待遇³，所以，起初有知青當赤腳醫生的先例，後來漸漸被本村回鄉青年或村幹部的親屬取代。

知青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出路何在。每年，招工招生指標一下達，大批的人情觸角跟著伸過來，哪路神仙都無法拒絕。坦率地說，我也不是清白的。我曾接到過一位大將的外甥女上學的條子，乖乖地把孩子送走。還幫過一個曾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女兒入學。至於對內蒙呼市領導的人情，更是指向哪裏，我們老老實實把他們子女送往哪裏。之後，留給無權、無背景的知青的指標所剩無幾，特別是一流學校。當地幹部主張首選自己的子女，反對把指標用在北京、上海知青身上。就這個問題，我和當地幹部有分歧，觸怒了很多人，他們自然抓住我不放。

“強龍難壓地頭蛇”。特別像土左旗這樣的少數民族地區，國家有特殊政策，許多外地知青，只能去不起眼的地方和學校。

當時還有“社來社去⁴”指標，推來推去沒有人要。只有沒辦法的人才敢趟一趟，歪打正著。1975年冬天，招生工作接近尾聲，我手裏還有一個北大生物系的“社來社去”指標。冬季農閒，大部分知青都走了，我到知青點檢查女知青狀況，發現南什軸大隊只剩鄭曉英孤零零留在知青點。我問她怎麼沒走，

³ 前文提到，當時的合作醫療經費來源，從各大隊公積金中按人均一元提成，另外，參加合作醫療的社員，每人每月攤款1元。這些經費，均由赤腳醫生支配管理，因此，赤腳醫生被當地幹部視為一種肥缺，一般不願意讓外人擔任。

⁴ 按教育部政策要求，社來社去大學生的“入學資金由推薦公社承擔一部分（實際上並未承擔），大學裏單獨編班，畢業後仍回原地”。但事實上，這條政策並未貫徹。數年後，這些社來社去的學生，也照樣分配了工作，轉變為正式國家幹部。

她委屈地哭了，說既沒錢，也沒地方去。北京好像有家，又有難言之隱。我勸她走社來社去這條路去上學，她有些猶豫。我說服她先走，把知識學到手，四年後還不知有什麼變化，她才勉強答應。我立即幫她辦妥手續，當晚在知青辦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了北京。北大畢業後，“社來社去”已無人提及，鄭被分配到中國農科院蔬菜研究所工作，有了一個安穩的歸宿。

這期間，還涉及到侯寶林女兒、胡風兒子等比較棘手的選調問題。我雖無力幫助，但我不同意誅滅九族，胡風有事，兒子無罪。我能辦的一件事，就是內蒙屢次調查不安分因素時，我把他的名字勾掉，所以在我當政期間，沒有政治運動觸及他。後來他也回了北京，聽說在中科院工作。

二，婚姻大事最為頭痛

最讓人頭疼的是知青的婚姻問題。知情辦對涉及威脅、利誘、欺辱、壓迫等類不合法的行為和婚姻，要設法干預。如南海流小村兩個女知青向我訴說，她們不是不想出工，是沒法出工。無論她們在屋裏或院裏，總受到眼睛盯視，非常卑鄙。出工時，男人扭頭就小解，還不停議論男女之事，讓人聽不進去，看不下去。我感到這是生存環境問題，涉及不到階級鬥爭，無法處理當事人。我爲了改變她們的處境，把其中一個送到上海讀書，另外一個招到水泥廠當工人，其他幾個也先後離開。假若知青在生活上、婚姻上出了什麼差錯，我這個分管知青的父母官，向誰也不好交待。

後善岱公社保同和大隊的女知青，幾乎都嫁給了當地一些上了年紀的光棍漢，幾乎是清一色的潑皮或戲子。這類蹊蹺的婚姻引起我們的注意，經調查後得知，問題出在婦聯主任身上。主任覺得這些人娶不上媳婦很可憐，便把知青介紹給她們。村婦聯充當了“人販子”，知青辦不得不干預。我們同意對婚姻不滿的女知青提出離婚，並把她們調往他處，以保安全。也有隨意的。記得一個姓李女知青，丈夫的年齡跟她父親一樣，她不但未提出離婚，當本人被招工到呼市，還把丈夫帶過去，據說過著貧苦生活。出於道義，還是無奈，我不得而知，更不宜干涉。

大批青年一下子湧進農村，既驚擾了農村的舊有格局，也帶進了許多矛盾，著實讓幹部們費周折。一次，沙爾沁大隊支書說，他們村知青偷雞的辦法很妙，從遠處看，一隻雞乖乖跟在知青後面走。支書走過去，他說：“我跟雞玩兒呢。”仔細察看方發現，原來少年把大頭針彎鉤做成誘餌，雞一啄被鉤住舌頭，尼龍絲很細，不易被發現。此外，打架，不服從管理，不參加勞動等現象，在知青中時有發生，不過與上述幾大問題相比，實屬個別。

台閣牧公社山溝口大、小瓦窯兩個大隊的知青名單上，集中了文革前內蒙一些老幹部子女。這些留在名單上並不真正下鄉的人，不斷地以下鄉知青的名義參軍、招工或招生，大隊爲此可以交換到化肥、鋼材或其他生產資料⁵。

鐵帽公社有一個姓李的男知青，與一個女知青同居。這種事基本是民不告，官不究，知青辦只管大事。此時恰好下達了一個中專指標，是西安不起眼的一所學校。知青點裏輪到大李走，而招生工作人員想要女生，大李就把指標讓給了女朋友。不久，大李接到對方的絕交信，感到很痛苦。他把我當成朋友向我訴說，我說：“你振作起來，不要失魂落魄，要像個男子漢。”當時想嫁他的當地姑娘不少，有個人一直偷偷愛著他，大李就與這位癡心姑娘結了婚，大回城浪潮⁶期間，雙雙回了北京。不過，就我所聞，此類婚姻模式，往往悲劇較多。

三，明星錄掠影

後善岱的優秀集體

每個知青點的生存狀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有一個領袖式人物。有了

⁵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此類生產資料極端匱乏，嚴格按計劃由物資部門統一調撥。但是主管官員，可憑藉手中權力，用批條子辦法通融，以便達到私人目的。如果說當今流行的是權錢交易，那麼當年那種，可以叫做“權物交易”。

⁶ 1977 年全國恢復高考後，讓知青看到了回城希望。加之，各省市紛紛出臺回城政策，大批知青遂以“病退”、“困退”、“傷殘”等名目，陸續返回城市。相比之下，在 1959 至 1961 年間，大約兩千多萬城市職工，連同家屬，被動員返回原籍農村，美其名曰“支援農業第一線”。政府曾向他們承諾，一旦經濟形勢好轉，擴大開工之時，他們將優先返回城市。但是，這些承諾從來沒有兌現。

這樣一個帶頭人，會增強內部凝聚力，讓集體保持朝氣蓬勃的人生態度。我每次去哈素公社，總要繞道後善岱大隊，拜訪這裏的知青點，從他們積極的生活態度中汲取力量。

這個知青點有十幾個年輕人，他們愛學習，肯鑽研。因此，具有獨特的境界。他們的領頭人馮同慶後來被選拔為旗委委員。1973年，北師大來招生，點名招收馮同慶入學，並成為北師大當屆學生會主席。馮畢業後分配到總工會，繼而到工運學院教書，現任北京工運學院副院長。

後善岱另一個知青代表是謝國力，他和馮同慶同為北京四中的學生，馮到北師大上學後，他成了後善岱知青點負責人。他很快入了黨，我們提拔年輕幹部時，提拔他成為哈素公社兼職副書記，留在村裏工作。我曾建議他出去讀讀書，他只對北大經濟系感興趣。1975年，我發現有一個北大經濟系的指標，遂連夜通知謝國力到旗。我倆談了半夜，最後他讓我拿主意。我說：“如果我作為旗委副書記和你談話，你不要去，留下來紮根。如果作為朋友，我告訴你，你應該學習。藝多不壓身，是造福社會的本錢。如北大畢業後，有必要再回來，位置給你留著。”謝被我點通，進了北大經濟系，畢業後入經貿大學讀研究生，學成返回北大教書，兼做團的工作。後來，成為農業部部長何康的秘書。他曾組織一批知青返回土左旗，看望鄉親，幫當地解決了一些問題。

朝號的精英

哈素公社朝號大隊下鄉知青蔣效愚是老高三的學生，有很強的組織和感召力。我們相識時，他已是旗烏蘭牧騎⁷隊的骨幹成員。烏蘭牧騎經常下鄉演出，是全旗唯一的專業文藝隊伍。

蔣效愚有上進心，忠於職守，我建議提拔他當了副隊長。他因家庭出身原因，入黨一直受阻，我多次與隊長拍桌子。可當地人認為北京知青自身優勢大，入了黨就等於插了翅膀，於是借知青的家庭問題設置障礙。蔣效愚在內蒙始終

⁷ 烏蘭牧騎，意為紅色宣傳隊，是六七十年代流動在草原牧區的專業文藝演出隊，各盟市旗縣都有。其特色是演員人數不多，但一專多能，唱歌跳舞樣樣精通，十來個人，可以演出一台不錯的節目。在沒有電視，文化落後的牧區，這種文藝形式曾受群眾歡迎，也獲得自治區和中央領導的支持與重視。

沒成爲黨員。這一理想入北師大後才實現。當我在北京申辦 2008 年奧運會的英雄中發現他的身影時，我嗟歎：這才是真正的蔣效愚，此事非他莫屬也！

朝號大隊有個小知青叫黃銳，跟著哥哥姐姐下鄉插隊時僅十四、五歲。知青們漸漸離去，他感到愈來愈無助。他喜歡畫畫，爲我畫了一張“列寧在拉茲里湖畔”的油畫，這張畫掛在我辦公室的顯眼處，與孤燈下夜讀的我相伴多年。

黃銳的父母在北京工藝美術商店爲他覓到一份工作。大約 80 年代，北京辦了一個以青年畫家爲主的先鋒派畫展，題目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我們發現了自己”。黃銳是主辦人之一。之後，他旅居日本。

塔布賽的車倌和良種迷

塔布賽知青張曉彤，是北京市副市長崔月犁的兒子。張曉彤下鄉時，他弟弟也相隨而來。他行事與眾不同，別有格調。當時的三套馬車，農民都得小心翼翼，張曉彤卻很快熟悉了趕大車的本領。尤其冬天，在車倌群中，長得又高又壯的他，說一口本地土話，戴頂皮帽，外穿白茬皮襖，和當地農民一模一樣。

他好主持正義，愛打抱不平，常爲是非與人爭吵，甚至動手，是個俠客式人物。當地幹部對他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爲小夥子不錯；更多人認爲他太毛刺，不是好材料。我看出，他是個正人君子，這樣的人再有毛病，也可以略去不計。他娶了一個當地女青年，和弟弟扎下根來，並當選爲大隊支部副書記，公社副書記。九十年代，大回城進入尾聲，弟兄倆帶著農村妻子回到北京。

李剛也是塔布賽知青，同樣是不一般的人物。他的父親是副部級高幹，母親是司級幹部。家庭環境優越，他卻獻身農村，喜歡培育良種，是公社良種場的副場長。他常常自掏腰包到山西買種子，就地搭個土房，親手繁育，像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中那位忠於革命的拉赫美托夫，執著而勇於獻身。

他入黨後，拒絕擔任任何職務，大回城時也沒有動搖，一直堅守在塔布賽，後來被畢克齊公社一個單位招爲幹部。21 世紀初，由於生活困難，不被重用，失去了自我價值，40 多歲的他才泱泱返回北京⁸。

⁸ 我們不知道返回北京的李剛命運如何。從規律來看，多數混得比較滿意的，都是通過進入大學受了專業培訓之後，由國家分配工作，再一步步往上熬，最後憑藉努力、機緣、關係

南什軸的白衣天使

龔玲是北什軸公社南什軸大隊的北京女知青，擅長醫術，常自費到北京學醫，在內蒙高校受過短期培訓。她對病人十分耐心，成為南什軸的赤腳醫生，有很好的緣。

龔玲成了一個人物，呼市日報還專門發過關於她的通訊《在金色的道路上》。龔玲一直想進醫學院，我和市裏的領導很支持，準備送她到內蒙醫學院學習。由於家庭問題，醫學院拒絕招收她。為此，我與當時的醫學院院長、黨委書記石琳（原內蒙文辦主任）通融，向文辦主任于北辰求助，均無濟於事，龔玲甚為沮喪。1975 年初，北京派人來內蒙，要從老知青中招收一批中、小學教師，我把龔玲推薦給他們。龔去了北京，不久，她終於如願以償，考取北京醫學院（後改稱北京醫科大學），現就職宣武區醫院。

海留圖的女革命家

1973 年，我剛到土左旗，便去察看知青點。北什軸公社海留圖大隊，分大小兩個村。大村有三個女知青，號稱“三大女革命家”。為首的叫林洵禾，另外兩個是賈誼和黃祖華。黃祖華下鄉當年，海留圖發洪水，正在月經期的她跳下水去搶險，得了重症，站立都很困難，大隊很同情她，讓她去學校教書。林洵禾是領頭人，性情急躁。這大隊還有六、七名男知青，都乖乖地聽從女知青的管教。男知青若偷老鄉的東西，三人決不輕饒，把犯事的男知青綁在院子大樹上用皮帶抽，讓他們向全體社員檢查。這件事傳得極廣。我拜訪了三位女知青和那幾個男的。男知青說：“我們心服口服，她們就是比我們有能力。”

林洵禾虔誠地要求入黨，但她的社會關係十分複雜。她的養父是被打入劉少奇集團的高幹，養母被打成叛徒。親生父母是上海一所大學的右派教授。我

等因素，慢慢佔據重要崗位。像李剛這種沒有機會進大學的人，40 來歲回到北京，恐怕難以再有好的機遇。除非通過特別硬的家庭關係進入政界，或者大膽經商一夕暴富，如果進入普通中小企業混碗飯吃，大概難免下崗命運。據說在新疆建設兵團，那些沒有回上海的知青，目前經濟狀況普遍好於回上海就業的知青，因為回上海的出路主要是里弄小廠，到改革年代紛紛下崗，經濟狀況自然悲慘。而繼續留在新疆的人，通過家庭承包，都小有積蓄，兵團仍給發一份養老補貼，如今可以回上海買房退休。這種不同結局，讓人感到意外。

爲林洵禾入黨造輿論，所有的旗委常委都保持沉默。我只好孤軍奮戰，帶著海留圖黨支部批准林入黨申請的決定，當面與公社黨委一起把林洵禾的表現同黨章對照。林洵禾終於入了黨，被提拔爲大隊黨支部副書記。

1977 年我被拉到土左旗批鬥，劉少奇還未平反，會議聲討我保護劉少奇後代，並拉入黨內。劉少奇平反後，上述詞語立即改爲“獨斷專行，迫使公社黨委批准林洵禾入黨”。九十年代，林洵禾離開土旗前要求把黨籍帶走（因我的原因黨籍已停），林的養父（已平反）也派人來請調，但土左旗掌權者不同意。林離開了土左旗，離開了上海，到了不要黨籍的美國。

和林洵禾同爲女革命家的黃祖華，在村小學當民辦教師，後與塔布賽北京知青鄧力揚結爲夫妻，在大回城時回到北京。八九年那場風波，使他們受到了鍛煉和教育。從此以後，變得更加成熟和穩重。黃祖華先在共汽車上當售票員，後調入公司搞人事；鄧力揚則效力於一家勞務輸出公司。

通緝犯流亡記

追查 1976 年天安門事件時，我邂逅一個北京知青。一天夜裏，他敲響我辦公室的窗戶，要與我談談，原來他上了呼市公安的通緝名單。他說：“我沒犯什麼事，只是對現狀不滿。找你談談，相信你不會叫公安局來抓我。”他是夜裏來的，又乘夜色離開，消失得無影無蹤。

1997 年，我擔任美國一家公司駐烏蘭巴托首席商務代表，與當地華人、華僑交往甚密，有些知名度。一天，有位從巴盟來蒙古做生意的華人領袖，向我介紹一個人，我大吃一驚，原來就是那個被通緝的知青小夥子。當年，他在追查緊迫時，學了些蒙語和俄語，先徒步越過邊境，上火車後，鑽在水箱裏凍了一夜，偷渡到蒙古。起初，他躲入一個小城貓著，很快和一個當地婦女同居，加入蒙古籍，險情才得以消除⁹。

⁹ 這位知青落戶蒙古國的例子，應該說十分罕見。以內蒙古發生的若干邊界偷渡案件看，蒙古國的移民政策非常嚴厲。中方如有非法越境者，大多數都被蒙古邊防軍遣送回中國，然後遭到中方的監禁，其中包括一些蒙古人，由於政治原因外逃蒙古，但成功的例子很少。由於這個原因，挖內人黨期間，被迫害的內蒙古蒙族鮮有出逃外蒙古者。這位北京知青的經歷，應屬奇跡，運氣特別，有佛祖保佑。

後來他回過北京，同伴們意外見到他，吃驚不小：大家以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北京女孩“果果”

沙爾沁小營子村有個叫商果的北京女孩，帶領十幾名北京知青幹得十分出色，當地婦女把這位大隊婦女主任昵稱為“果果”。如今，沙爾沁的果果已經成了遙遠的加拿大的果果。

我讚歎知青運動中出現的一批出類拔萃人物，我相信他們是未來社會的基柱。改革開放後，社會各個崗位上，企業家隊伍中，都有許多知識青年的身影。他們在農村經過艱苦，磨練了意志，也鍛煉出獨特的品格；他們更理解下層中國人的疾苦。未來中國的發展中，他們會更有作為，我真心祝福他們越走越好。

毛領袖讓知識青年到農村，顯然有緩解當時政治經濟困境的意圖，或許也希望知青在農村經風雨見世面，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既包含中國特色的胡鬧，也包含烏托邦的空想色彩。

第四十五章

批林批孔——權力再拚殺

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後，兩報一刊文章中提出要批判林彪，批林整風必須開展批孔子的運動。1974年初，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繼續吹風，說批孔是批林的組成部分，要對尊孔反法進行批判。比較靈敏的人感到，這又是一輪新政治運動，對批林批孔不能掉以輕心。

一，難上磨道

1974年1月24日，江青在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傳達了中央文件。1月25日，國務院直屬機關召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在大會上，周總理一句講話讓我萬般疑惑，至今想起來難以平靜。周總理說：“關於批林批孔大會問題，我是剛剛才知道的。”證明周也沒心理準備，可見其中隱含的內容很微妙。

此時，內蒙黨委、呼市市委轉發了中央文件，要開展批林批孔，要求開辦尊法、反孔、批儒的講座。旗委研究了幾次，決定由我擔任主講，表示土左旗的運動已動員起來了。

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¹的講話稿就在案頭，呼市市委有關書籍業已下發，我稍作準備，把歷代法家、儒家的鬥爭史和唐、宋、元、明、清各代如何表現等，講解一番。十幾場講座完畢，我們都認為批林批孔搞得差不多了，旗

¹ 楊榮國時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因出版關於“儒法鬥爭史”的著作而聲名大噪，其作品被四人幫廣為推薦，要求各級黨政官員像學經典著作那樣學習楊榮國文章，把一個原本十分學術性的儒法之爭，上升為高度政治性的兩條路線鬥爭問題。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所謂批林批孔、評法批儒、批周公等等，不過是毛江施放的煙幕，其真正目的，就是揪出並打倒“當代大儒”周恩來。

縣的農業生產是有節令的，一刻耽誤不得。但歷史發展，並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

1974年春夏之交，漸入正規的社會秩序，再一次被批林批孔的洪流衝破，已建立的規章制度被拋到了九霄雲外。呼和浩特又出現了動亂，街頭上大字報、大標語林立，醒目地寫著要揪每個行業、每個地方的孔老二，揪林彪的代言人等字樣。我繼續在大岱蹲點，奢望遠離洪流，躲開陷阱。地裏的禾苗開始破土，漫出片片嫩綠，社員們指望今年有個好收成。

但奢望不可企及。政治的物換星移，又把我強行推入權力拼殺的圓形磨道，讓我進退維穀，難以脫身。

那天剛下過一場雨，滿地泥濘。旗革委能開動的兩輛車突然來到大岱，從吉普車裏走下來郝朝棟、雲雨霖、方塞、郝振民幾位委正副書記，來意是讓我回去主持批林批孔運動。我很不高興，據理力爭：“既然我蹲點是旗委決定，又是呼市市委領導點頭的，爲什麼稍遇變故，就讓我回去。批林批孔和其他運動一樣，你們該怎麼幹，就怎麼幹，沒什麼了不起的。你們就是在家管事的，找我幹什麼。”爭論從早晨持續到中午，沒有任何結果。

旗裏還有很多事等著他們，萬般無奈之下，我先妥協一步，回到旗裏再說。當晚，旗委連夜研究成立批林批孔辦公室的問題。休息期間，郝朝棟、雲雨霖懇切地對我說，發動群眾的問題，他們出面有很多不方便，要求我承擔這個責任和義務。我不是不願承擔責任義務，我的不解和思慮無法對他們直言。

批林批孔到底批什麼，是我的不解。我思慮，批判林彪還聯繫孔夫子，有的文章甚至批當代的孔老二，當代的孔老二是誰？聯想周總理在批林批孔大會上那段讓我心酸的講話，一種不詳的感覺擊打著我的心扉。

說實話，從思想感情上，從觀點上，我反對任何人動周總理。周總理是國家的頂樑柱，是我最敬仰的人。如出現我不願看到的局面，我會挺身捨死保衛他的。讓我更爲不解的是，基層的批林批孔怎麼搞？怎麼理論聯繫實際？

另外，還有一點我沒法直言的，是對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的思慮。空軍學院學習班、唐山學習班上鬥私批修、批派性的痛苦經歷，給我的只是清醒：

發動群眾時把紅衛兵、工人階級推到前面，拋棄時，就用“派性”這個辮子清算。這次會不會如法炮製？

除此之外，來土左旗一年多了，我發現這裏的矛盾更爲複雜，稍不慎重，不僅百姓遭殃，自己也會被拖進泥潭。土旗的民族矛盾中，還滲透著許多盤根錯節的其他矛盾，如舊綏遠派和外來派，延安派和河北、山西派，東部（原屬東北三省）蒙族和西部蒙族（以土旗爲主）等矛盾。

文化大革命中，土旗的蒙漢關係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衝突，圍繞前門飯店會議，圍繞烏蘭夫問題，土旗分解出三大群眾組織——紅聯、聯總和紅司，加上一個另類——土旗聯社，四者觀點不同，互爲交叉，形成環環漩渦，排排巨浪。

我該如何應對眼前的僵局呢？我明知，往前邁出半步，即會重蹈覆轍，可能捲入土旗矛盾的黑洞。但我的人性弱點，驅使我再次作出讓步，從而把自己再次送上審判台。

二，旗委閉門遊說

內蒙、呼市批林批孔的動靜，立刻在土旗引起連鎖反應。旗委被迫站出來，成立了批林批孔辦公室，試圖主動領導這場運動，問題是誰當頭。

旗委常委會開至半夜，在郝政委、雲雨霖書記近於哀求下，我不忍心把這個難題再推給他們，只好妥協。爲了防止禍患，我爲自己上了幾道保險，提出幾個條件：一，我可以擔任批林批孔辦公室主任，但副主任要考慮周全，宣傳部長鄭榮貴必須參加，還要吸收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否則撒在外面難以掌握；二，我對運動的發展看不清，要集體拿主意，一旦出了差錯，別讓我一個人兜著。另外，大家口徑必須一致，可以保持沉默，但不允許背後搞小動作，旗委班子共同定的意見必須共同維護。而且，對以上幾條光口頭表態不算數，與會者必須人人簽字畫押。自常委會開始，大家通過的事我都囑咐記錄員一一記好，一句也不許漏掉。

當場，擔任記錄的張、安兩人按要求記妥，我說：“大家必須在記錄上

簽字。”在場很多人不同意簽字，意味著不準備承擔責任，“那就散會。”我邊說邊向大門走去。郭真堵在門口說：“不能散，今天必須定了這事。”

郭真是武裝部副部長，旗委常委。他正直、正派，和哪一派都友好。今天如此反常，我沒料到，個中緣由始終不明。最終，願意的和不願意的總算都簽了字。我隨即提出了一個短平快的辦法：乾脆開大會，讓群眾講兩天話，講三天都可。群眾講完後，再召集各派頭頭，把問題梳理出來，有些問題當場解釋，有些交常委會研究，天不會塌下來。大家同意了。

第二天，批林批孔辦公室成立並下通知召集大會，允許群眾利用民主的方式，在旗委召開的會上發表意見，規定發言人對所講的內容要負責任。此後，上午工作，下午開會。起初，旗委禮堂裏擠滿了人，很多是看熱鬧的，上台發言的有各派的人，會議由我主持，偶爾由張銀魁主持。沒多久，人減少了許多，從百十來人到幾十人。我看火候到了，立即宣佈，下一步進行總結。

孰料，我設法防範的事態發生了。市面上出現各種流言蜚語，說我和張銀魁聯手，通過批林批孔要把旗裏搞亂，搶班奪權。郝朝棟和其他領導沒有人站出來說明和批駁。我在常委會上公開提出非議，郝朝棟、雲雨霖才被迫在幹部會上支支吾吾地解釋，“這是旗委決定的，讓高書記去做”，實際上，輿論已成了事實，老百姓不相信官員們的解釋和圓場。從此，幹部見我繞道走，好像我一夜之間變成了魔鬼。“一個外地人到一方土地當書記，不和原來的派系沾邊，孤零零去主持正義，收穫的決不會是甜果。”這是一位老資格領導對我的告誡，如今，我總算體會到了。

三，難道有分身術嗎？

1974年春發生的呼和浩特市日報事件，揭開了呼市批林批孔的序幕。

《呼和浩特日報》主編，以報社的名義召開了一次呼市各界參加的批林批孔形勢座談會。座談會開起來後，一批人控制了會議局面，一連開了幾天。這批人就是1968年初內蒙挖肅的先鋒，揪黑手聯絡站的骨幹，1969年各批滕

聯絡站的主角。如今，他們搖身一變，占了內蒙批林批孔運動之先。呼市日報從形勢座談會開始，每天在頭版發一篇記實報導，主要內容是揭露內蒙、呼市地區回潮和復辟現象，指責內蒙古黨委和呼和浩特市市委是內蒙搞復辟的根源。自然，兩級黨委不能容忍，決定改組呼和浩特日報社的領導班子，撤銷報社社長職務。

市委撤銷報社社長的決定下達後，批林批孔聯絡站下設的各聯絡點毫不示弱，立馬動員全市追隨者，到內蒙黨委與領導人尤太忠、鄧存倫辯論，圍住市委第一把手劉玉柱，讓他改變撤銷報社社長職務的決定。聯絡站還特意派我的學生來說服我忘記前嫌，共同戰鬥。當時，我在鄉下，聽到此番動靜，立即吩咐旗工作人員，回絕了幾個學生的拜訪。

我自己連觀戰也不想觀，聽都覺得心煩。這時，旗裏有人回來告訴我說，呼市大字報上也出現了我的簽名，排在最前面，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高樹華”這三個字。我暗想，不知道是哪位自詡為同夥的敢越俎代庖²。我詼諧道：“你相信分身術嗎？我可是有一個多月沒回呼市了。”

1974年3月底，呼市市委通知我，參加在體育場召開的批林批孔大會，通知中特別強調，會議是由內蒙黨委組織的，鄧存倫書記主持會議，我必須以內蒙革委會常委名義在大會上發言，發言稿自擬。第二天開會，頭天下午才通知，其中必有文章，我設想了幾種可能性，終不得要領，只好趕夜路回呼市，準備了一個表態式的腹稿。

呼市大馬路體育場的主席台上，坐滿原造反派人士，雖然有許多人和我打招呼，但我感覺我和他們之間如隔深壑。主持大會的的確是鄧存倫書記，一把手尤太忠懶懶地坐在一個座位上，面帶晦色，我有意過去向他問候了一下。

劉立堂、郝廣德等人陸續發言。待王金保發完言時間已近正午，我開始發言。這時，主席台上的貴賓紛紛撤出會場，台下群眾誤以為散會了，跟著

² 冒名簽字的事情，在西方法制比較健全的社會，會被認為是嚴重的侵權違法行為，可以引起法律訴訟。但在中國人集堆的地方，很少有人嚴肅對待。家庭成員之間，同事好友之間，經常有替人簽字的情況。在不涉及法律責任的情況下，當然也無人在乎。但在涉及到權益時，便常常會引起糾紛，甚至導致關係破裂。

騷動起來。我勉強講了幾分鐘就草草結束。這場釜底抽薪之計，僅讓我難堪了片刻，幾年後卻因禍得福。

毛死之後的清查運動中，這次大會是審查重點，專案組連珠炮地問了許多問題，如誰通知的，稿子誰寫的，講了些什麼，我的回答是查錄音。無巧不成書，恰恰我發言時大會亂了，錄音帶一片空白，沒有我發言的任何證據。

這次大會後，呼市市委和市革委會召開了聯席會議，人們稱之兩聯會。就我的身份實難推脫，還必須發言。會議由劉玉柱、王西、蘇和主持，我發現很多人避之不及。

開會那天，劉玉柱剛剛講了幾句話，即被呼市革委會委員金永紅打斷。金要求全體與會者去新城賓館找尤太忠辯論，把鄧存倫揪回呼市做解釋，講清市報事件。多數人不同意，會議陷入僵局。這時，呼市革委會常委全成國走上台。他原是動力機廠的工人，正直且有勇氣。他說：“我不明白，一級黨組織去揪上級黨組織的負責人，不可理解，也從來沒有。我認為這樣做很不正常，我不同意金永紅的提議。”

我站起來帶頭鼓掌，這是我唯一能做的表示。那一刻，我的處境異常尷尬，兩頭為難。實際，從批林批孔一開始，我便不由自主地被捲入一個怪圈，找不到方向路徑，更找不到脫身之計。躲避之處只有陝西營子，面對鄉親十分快樂，面對莊稼我很輕鬆。

大會要求我發言，我只引用了毛主席著作中一段話“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意思是人民創造的歷史還是讓人民創造。沒想到這次發言闖下大禍。宣揚“歷史顛倒論”的問題一直陪伴我近六年，並正式寫到判決書中。

兩次會議後，我回到旗裏，在和旗委一把手郝朝棟政委研究後，他同意我仍回大岱蹲點，到陝西營子勞動。

我每天和社員一塊高高興興地出工，早出晚歸。地裏的小麥長得又齊又壯，支書張高保預計會有好的產量。六、七月間，正是莊稼長勢關鍵時刻，大岱公社旱情嚴重，社員稱之為“卡脖子旱”。沒想到，老天爺連下兩場大雨，旱情排除。雨後那天晚上，社員們十分高興，許多青年找我聊天，一起談笑，農民的真摯和樸實驅走了我心頭的陰霾。

四，夜讀《三國誌》，袁木不快

八月下旬，中央針對內蒙再起的混亂，決定在北京國務院第一招待所（原建工部招待所），召開內蒙批林批孔匯報會，又稱批林批孔學習班。呼市通知我參加，我再次被推上審判台，暗呼冤枉。除我之外，招待所大樓還集中了呼市、內蒙直屬機關、呼和浩特鐵路局、包頭、巴盟、烏盟、伊盟等地的造反派、保守派及各級革委會中結合的群眾組織代表兩千多人。

主持匯報會的中央領導是李先念、吳德、紀登奎、陳錫聯等，由他們的秘書³ 具體管理我們，內蒙黨委由王德山負責。袁木⁴是大班班主任，開班第一天他講話說：“你們那兒批林批孔搞亂了，叫你們來就是解決思想認識問題。”他並沒說清批林批孔批什麼，什麼叫亂，什麼叫不亂。

我居住的 11 層是大樓的頂層，那裏有一個大會議室，桌上鋪著雪白的台布，擺放著乾淨的茶杯，服務員周到地隨時供應茶水。旁門外有個涼台，可一覽北京的萬家燈火。讓我著迷的是，閃閃燈火與天宇中的星雲連成一片，人站在此處，好似和宇宙融匯在一起，那一刻，人世間的是非恩怨是那麼遙遠和陌生。我喜歡獨自在涼台上遐思。

北京的暑氣仍未退盡，每當上午會快結束時，我偷偷揣好游泳褲，吃完午飯立刻趕往紫竹院游泳，回來沖完涼不誤下午會上打瞌睡。晚飯後散步至

³ 中央領導人的秘書一般分為文字和生活兩種，地方領導也多有仿效。文字秘書負責起草報告，而生活秘書則主要負責聯絡和安排活動日程。文革中興起兩種不正常做法，一是讓家人當自己的秘書，例如林彪任用葉群，康生任用曹軼歐，毛澤東任用毛遠新等等；二是讓秘書代替自己，行使超過秘書責任範圍的重大權力。例如這個批林批孔學習班，讓幾個秘書代管，就屬於這種情況。後來被周恩來等人嚴厲批評的“秘書專政”現象，就來自這種越權行為。當然有些秘書做久了，還真被提拔到領導崗位，成了更嚴重的“秘書接班”問題，例如陳希同（原彭真秘書）出任北京市長等。此類現象不少，值得文革研究者給予重視。

⁴ 袁木原為中辦中層幹部，後因 1989 六四期間宣佈戒嚴消息，對外發佈官方新聞，又同學生領袖對話等動作而名聞天下。此人 40 年代末在復旦大學參加過左派學運，後任國務院發言人、國務院政研室主任、八屆政協常委、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會長、中共國史學會會長等職，1999 年出版《袁木文集》（8 卷）。

八點，我便在會議室雪白的台布上夜讀《三國誌》，自感幾分愜意。

但好日子不長，一天晚上，我讀意正濃，突然門被打開，原來是班長袁木推門進來，後面跟著王、高兩人。姓王的是李先念的秘書，南方人，說話比較客氣。姓高的不知是哪位首長的秘書，東北人，一副趾高氣揚的派頭。我站起來，向他們問好，他們讓我坐下後，順勢坐在我身邊。

袁木笑嘻嘻地問：“看什麼呢？”

我答：“《三國誌》。”

“噢，歷史書。”

我說：“袁木同志你別誤會，這書是毛主席推薦的，讓年輕人讀一讀。”

“噢，還有這樣的指示！”

我說：“毛主席說過，二十四史⁵中《三國誌》寫得比較好，裴松之的注比作者陳壽撰寫的還詳細。”

袁木說：“我真不知道這段話，你有什麼心得呀？”

我說：“毛主席讓青年通歷史，增見識，批林批孔不是通過批孔進一步批林彪嘛，這個思路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從表情上，我看出了他們的不快，我試圖以此爲自己辯解。

早已不耐煩的高火了，站起來說：“你還找根據，看來你還有理了！你不學習別的，看《三國誌》！”

我何能消受這般呵斥，隨之站起來與他理論：“《三國誌》就不能讀了！毛主席讓讀，你爲什麼不讓讀，你敢對抗毛主席指示。”他給我扣帽子，我也給他扣帽子。

袁木先批評了姓高的，說：“坐下說，聽聽他怎麼說。”袁木說：“你還是應該好好檢查，你是有錯誤的。”

我說：“我有什麼錯誤，我不知道錯在什麼地方，批林批孔我錯在哪兒？”我把大概情況講述一遍。

⁵ 二十四史是我國歷代正史的統稱，皆為傳記體。明史之前，共有歷朝正史二十一部。清乾隆年間，《明史》定稿，詔刊二十二史，將《明史》列入正史之中。不久，又詔增《舊唐書》及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的《舊五代史》，合稱二十四史。

“七月大字報有你簽名呵！”我說：“那是別人替我簽的，這大家都知道，你們可以調查。”

高指責我有派性，我一點也不服氣。袁木堅持要我檢查，“大家都檢查了，就是做一次鬥私批修也要做的。”言外之意，我不做過不了關。從此，我始終拭目以待，看看這些人怎麼收拾我。

郝廣德和王金保都做了鬥私批修，我在小組做了一般性發言，檢查有什麼錯誤。小組內有些工農兵委員，有我們旗裏的，還有農民，他們都很和氣，並不以勢壓人。

胳膊終於扭不過大腿，我可以不單獨檢查，但在王金保的檢查中插了一段，否則過不了關。回內蒙後，包括那順，我們四人又把檢查重複一遍。1974年，群眾很討厭文革，對派性更厭惡，我們的檢查如同小丑演的滑稽劇，引來不少笑聲。尤其是對我們“四大名旦”的戲稱，包含著辛辣的嘲諷，在我個人看來，簡直是奇恥大辱。

中央辦的批林批孔匯報會，開至1974年11月底。結束那天，華國鋒、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召集我們開會。會上他們批評高錦明是低級趣味的人。從此，這位老人難圓重新出山的舊夢，下放到河南洛陽拖拉機廠當一名車間主任，不久退休。二十一世紀初，他在海口市兒子家中去世。期間，看望過他的人回來說，他很想再回內蒙好好工作幾年。

多少年過去了，中央辦的批林批孔學習班，給我留下的只有這部《三國誌》仍伴隨在我身邊。

五，陝西營子的喜訊

回到土旗後，我重新找回了自我，因為，我蹲點的陝西營子上了綱要，畝產達到了400多斤。儘管有人懷疑，派遣第二個工作組去核算，終沒有錯，我的心踏實了許多，並為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標——幹好1975年。

1974年底，蹲點工作團撤回旗裏，旗委讓我協助郝朝棟抓全旗工作。

這一段工作經歷，讓我感到了這裏任務的複雜性，看到旗委班子力量比

較薄弱，難以凝聚起來把工作做好。我想，何嘗不借助上級黨委之勢，派工作組來推動旗裏的工作呢。

我把邀請內蒙工作組的動意，與有威望的老書記雲雨霖商榷，他和我有同感。這期間，我感興趣的工作組成員，已從呼市街頭的大字報中發現，是在工業企業蹲點的，很主持公平的內蒙黨委政研室主任趙旭和副主任王鎮。

想法歸想法，操作起來難度很大，必經自治區黨委書記認可和批准。經過批林批孔，我和尤太忠的關係比較密切了。他感到我辦事老實，雖當面頂撞他，但我說實話，不在背後搞小動作，他把我當成一個可以信賴的朋友。當尤聽我道出兩個人的名字，開玩笑地說：“你真會要人，這兩個人在黨委起大作用了，是我們政研室的正、副主任。”我說：“他們先在城市蹲點，再去農村，對政策研究就更全面了嘛。”

不久，趙旭、王鎮到了土左旗，為1975年順利開展工作打下了基礎。趙旭、王鎮和工作組的同志是幹實事的共產黨員，是對黨負責的共產黨員。後來他們的遭遇不盡相同。

第四十六章

周總理逝世

1975年1月13至18日，我到北京參加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唯一願望是想看看周總理。周總理在開幕式上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顯地消瘦了，他重病纏身。看來，外界傳言不虛：因日理萬機和處境險惡，總理健康正每況愈下。正如他親口對我說過的那樣，他們的政治生活我們是很難瞭解的¹。

一，周總理重病纏身

那是1967年秋，我解決完昭盟問題後路經北京發生的事情。

那一天，我試著給總理的秘書張作文打了一個電話，想把赤峰紅山水庫的事當面談談。電話通了，正是張接的，剛提到紅山水庫，他打斷我說：“這件事總理前幾天問到了，你還有什麼要匯報？”我繼續介紹解決平莊武鬥，十天恢復生產的情況。他說：“這麼快，好，你先等著，把你的電話號碼留給我，回頭打給你。”他似乎對這個通報極感興趣。一個多小時後，張回了話：“你下午三點前可以活動，三點後哪兒也不要去，在電話機旁等著，我和你聯繫，好，再見。”

¹ 由於總理隨口談到他們的政治生活，我當時也不便多問。但縱觀總理逝世前後的一些怪異現象，以及後來陸續披露的上層權力鬥爭情況，我猜想總理這句話應該包含兩層意思。表層的意思是“候門深似海”，由於安全保密等原因，中央領導人的政治生活狀況是一般老百姓所無法知道的。但更深一層的意思，則是中共官方宣傳和政治鬥爭現實之間，隔著一道巨大的鴻溝。後來的歷史發展證實，毛周之間的個人恩怨十分複雜，一般人通過表面現象，都以為毛對周非常信賴，但實際遠非如此。毛越到晚年，越對周不放心。在四人幫的策動下，毛居然發動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所謂“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最終把周逼向早日死亡的絕境。詳情參閱高文謙所著，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晚年周恩來》一書。

他的聯繫方式我略知一二，估計今天可能見到總理。當晚，我五點左右到達京西賓館，張作文叮嚀：“十分鐘匯報完，總理只有30分鐘空餘，還要接見別人，儘量縮短匯報時間。”總理接見完客人後，一邊吃飯一邊問：“高樹華，吃過飯沒有？”

我把紅山水庫、平莊武鬥和解決辦法講完，總理問起發工資的事，“讓工人上班，這與經濟主義不同……”“讓他們有所作為，做得很好，很有道理。”匯報完後，我頭腦發熱，開始闡述自己的觀點，諸如從旗縣看，文革情況很不一致，不能簡單按一個杠杠辦；文革的時間不能拉得太長，應儘快恢復黨組織；群眾運動應當是有秩序的等等。

總理耐心地說：“運動的發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怎麼定我們怎麼執行。”我話鋒一轉，問道：“我想問一問，有懷仁堂事件嗎？”總理剛才還笑著，聽到此話，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黑瘦的臉上閃著青光，說：“外面的傳說不怎麼清楚，咱倆沒必要在這裏談這個問題。”“我們的政治生活你們是不瞭解的，傳說是傳說，不能分析猜測。”

痛憶十年前，我那麼冒失，那麼鋒芒畢露，我的問題觸動了他內心的痛苦，我一定讓他老人家傷心了。

此刻，總理站在講壇上，講話沒氣力，未把整個報告做完。主持會議的張春橋特別說明，由於周總理身體不好，只能讀某些段落，全文大會還是要討論的。我真為總理擔心，心裏痛苦地想：是該死的政治環境摧毀了總理的健康²。

會議期間碰到烏蘭夫的大女兒雲曙碧，她代表吉林省出席大會。我向她詢問烏傑，即烏蘭夫的三兒子力沙克。不久，老友久別重逢，自然有許多話

² 在普通人心目中，周恩來以日理萬機的鐵面宰相著稱，他為人厚道，寬容慈祥，對毛澤東絕對忠誠。但從近年來海內外陸續發表的文獻資料分析，周恩來的內心世界，其實遠比普通人想像得要複雜。從這次談話中我的失口發問，到他突然變色的面部表情，讓我回想起來，百感交集。一方面，我對自己的放言無忌後悔，覺得有失分寸；但另一方面，我隱約感到一絲慶幸，總算能從近距離觀察到周的一些細微感情。可以看出，周總理內心確有難言之隱，以他的地位和處境，他根本不可能像江青，甚至像康生那樣，口無遮攔。如今我們才明白：在毛的心目中，周恩來並非自己人。但無論如何，從那次談話以後，我開始用更加成熟的眼光看待文革，開始擔憂文革的未來前景。

要談。我們在我的住處——北京市革委第一招待所、原北京市黨校徹夜長談。當時他極力主張鄧小平出山，對江青怨恨很多。我們交換了很多看法，他和我一樣，對文革發展無法預測。這是我和力克沙最後一次長談，從此，再未謀面。兩年後，我這個四屆人大代表成了階下囚，他上任包頭市市長，據說口碑相當好。

二，千條線，一根針

1975 年，中央一號通知下達，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代替總理），同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這一年，毛主席有三句話，“以安定團結爲好”，“要把團結搞上去”，“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鄧小平進行全面整頓，核心是領導班子，解決懶、散、軟問題，同時，建立各項規章制度。1975 年 8 月，發表毛主席批《水滸》宋江投降派的問題和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每篇文章都下發到地方，基層均要照辦。

土左旗在內蒙工作組推動下，主要抓農業學大寨，上面的千條線，都得穿進一根針。農業豐收了，對領導，對社員，對自己都好交代，誰也不願意餓著肚子幹革命。然而，學大寨，大幹社會主義，農民並未得到實惠，恰恰生活越來越貧困³。

我們辦了“總體戰快報”，加快了田、水、林、渠、路的建設速度，統一組織車輛去外地換高粱、土豆、玉米的良種。總之，我們努力爭取 1975 年獲得豐收。與此同時，我們著手整頓領導班子。

1975 年，原旗委書記、旗武裝部政委郝朝棟轉業回到他的老家——河北邢台市任市農機局局長，雲雨霖升任旗委書記⁴。

³ 從幼年到青年的我，對人民生活的觀察，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人階級，特別是鐵路工人，因此才有“新舊社會兩重天”的印象。等到成熟之後，特別是對農民生活有了更多觀察之後，才慢慢體會到，毛澤東的農業集體化道路，或稱“社會主義集體農業”，其實造成農村生產力的停滯和倒退，農民在豐收年景也不過半饑半飽，在歉收的時候則忍饑挨餓，甚至凍餓而死。例如從 1959 年到 1961 年的大饑荒，全國有數千萬農民餓死。

⁴ 讓各級革委會結合的軍方代表轉業到地方，也是鄧小平 1975 年復出之後“治理整頓”的內

旗常委班子 15 人中，蒙族占 7 名。蒙族幹部明顯分爲兩派：書記雲雨霖的老家在台閣牧公社霍字大隊，這是大青山溝口的一個小山村。文革前，他被烏蘭夫點名批判，而常委之一的雲瑞，被烏蘭夫肯定爲蒙族中的優秀幹部代表。1966 年，北京前門會議中，雲雨霖翻了身，雲瑞等被打成烏蘭夫黑幫分子。20 世紀 80 年代，雲雨霖逝世了，一個派別不復存在，但其靈魂仍縈繞在田間、炕頭⁵上，至今不散。

基於旗委班子的特殊性，我們先從公社一級做起。公社一級幹部身上…有很濃的小農習氣，懶散不說，總按個人的經驗和家鄉親屬利益辦事。他們一面應付上級，暗中自行其事。只不過那時的幹部不敢太造次，惟恐再次被打倒。回望歷史，中國封建割據的陰魂始終未散，各自爲政，政令不統一的現象相當嚴重。皇帝老子沒解決，共產黨也難以解決。

回憶這兩年，無論旗裏還是市裏都爲此開展過整風，在“四大”取消之前，還進行過“開門整風”。但無論什麼花樣，多是走走過場。整風過後，該什麼樣依然什麼樣，看不到明顯效果。顯而易見，共產黨幹部的狀況，實難邁向共產主義門檻⁶，也難遂毛領袖和鄧大人的心願。他們在黨內貢獻了幾十年，多因歷史的、工作的、運動的變遷、幹部升降等諸多因素，演變出不同的派系，形成各種恩恩怨怨，“一損俱損，一榮皆榮”。所以他們拼命維護“自己人”的利益、小團體利益、地方利益、民族利益。

容之一。其目的有兩個，一是逐步減少軍人對各級政權的操縱程度，以便恢復文革之前的黨政運作機制；二是弱化軍方左傾思潮對落實政策的干擾，以便恢復傳統黨政技術官僚對權力的壟斷。從中共安邦治國的必要性看，這當然無可非議，但鄧的所作所爲，卻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復辟”行爲，忤逆了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和文革極左派的權力地位，從而成爲周恩來逝世之後，鄧小平再次被打倒的重要原因。

⁵ 炕，又稱火炕，是北方農村常見的居家設施，用土坯或磚頭砌成，內有煙道，與爐灶和屋頂的煙囪相連，冬天可取暖，用於睡覺、吃飯、待客等。

⁶ “共產主義門檻”觀念，仍然停留在我早年對馬列主義和共產烏托邦的信仰上。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所發生的變化，特別是柏林牆倒塌之後的歷史現實來反思，恐怕所謂的“共產主義門檻”，究竟是否存在，都值得重新檢討。如果有的話，恐怕也像茫茫草原上的地平線，永遠可望而不可及。如今人們思想解放，西方的種種學術流派再度進入中國。經濟學家當中，依然相信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者，已經微乎其微；其他社會科學家當中，甚至多數黨員和民眾，還有誰相信共產主義嗎？希望讀者自己回答。

不僅如此，他們還要將既得利益世襲下去，讓他們的子女繼承和享用，不被“外來人”侵佔。

大青山腹地有條山溝，居住著百戶人家，叫小井溝，是中共的根據地，對大青山的幹部有特殊感情。上山下鄉運動中，老幹部把子女送到小井溝下鄉，實際，只辦一個空手續，或經過一番“蜻蜓點水”，老鄉稱“揭皮飛”，便入黨，招工，參軍，上大學。外國學者通稱這類子女為“太子黨”⁷。

1975 年是特殊的一年，因為有內蒙工作組支援，我的工作勁頭十足，且有成效。我走遍全旗各個角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鄉親們過上好日子。我走到一處，要和農民一塊勞動，一塊聊天，從他們身上汲取豐富的營養。終於，我全年的勞動日 101 天，超過了中央對這一級幹部的要求。

毛主席說過，勞動是考察幹部的標準。中央要求村、大隊幹部勞動 300 天，公社幹部 200 天，縣級幹部 100 天，我可能是自治區旗縣級第一個達到標準的，我感到活得很充實，身體也結實。

三，追悼敬愛的總理

1976 年初，發生了令人痛心的事，敬愛的周總理去世了。1 月 8 日晨，我們從廣播中聽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周總理是位偉大的革命家，他的去世是國家和民族的重大損失。總理對我多次關懷，耐心教育，他的離世讓我痛不欲生。他邊吃包子邊工作的情景，他循循善誘勸導年輕人的長者風範，一切的一切在我眼前閃現，我止不住眼淚，抑不住痛苦。我當時最強烈的願望，

⁷ 對於“中共太子黨”如何定義，據說有寬嚴兩種說法。比較寬泛的定義，是指那些中共高級幹部的孩子。而高級幹部，在文革之前，一般指行政 13 級以上，即所謂“地師級”以上，也就是地委書記和軍隊的師級幹部以上。這種比較寬泛的“太子黨”定義，比較符合省市自治區（包括內蒙古）的情況。但是，還有一種比較嚴格或者狹小的定義，是指文革之前省部級和軍級以上幹部的子女，有人甚至認為，主要指那些中央委員以上的，中共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相比之下，民主黨派和其他統戰人士，論級別可能也夠格，但因不是中共自己人，因此他們的子女不能算太子黨，除非他們和黨內高級幹部的子女聯姻。按照後一種嚴格定義，只有中央一級和少量在中央兼職的地方大員，才具備這種資格。對此問題的詳細分析，請參見高新、何頻所著《中共太子黨》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就是去北京與他老人家告別，但尤太忠不同意，讓我待在崗位上。至今我追悔莫及，我太聽話了。

回旗後，接到內蒙、呼市電文，不准旗縣自設靈堂悼念周總理，不准搞紀念活動等，總之，什麼都不允許。我未聽什麼傳真和電報，讓旗委辦公室刨地澆水，凍起一根旗桿，降半旗以示哀悼；在旗委設靈堂供大家弔唁。我請法院趙副院長的夫人給我做了一個黑紗率先戴在臂上，旗裏很多人也跟著戴上了黑紗。

北京因悼念周總理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有幾個旗內的北京知青參加了，上面通知要追查，孩子們有點慌。2000年擔任北京市市委常委，現任奧組委副主席的蔣效愚，當時是旗烏蘭牧騎副隊長，他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回來後，來我辦公室公開說他是參與者。我勸他們小心，關於去天安門的事，不能再與任何人講，追問到時一定要堅決否認，上面的事有我關照著。

旗公安局副局長李鋼向我請示追查時，我說：“李鋼，你注意，可以查，只是一般地查查，如果落實到某個人頭上你通知我，我沒批准之前你不准動任何人。”李說：“呼市公安局來人了，要一塊查。”我說：“可以啊，查嘛！但不管誰來，我是書記，是我主持土左旗的事，沒有我的同意誰也不能抓人。”

這年的清明節，我親自寫了份通知，要求全旗幹部去祭掃烈士陵園。這裏埋葬著大青山抗日烈士，抗日的國際友人，和共產黨歷次革命的志士。這次掃墓由我主持，旗裏幾千名幹部、學生、社員都參加了。我即席演講，共同為那些死難的烈士，為文革中故去的偉人陳毅、李富春同志悼念，特別為周總理悼念。我介紹了周總理的偉大品格和精神，號召大家向烈士們學習。事後，尤太忠說：“有人反映土旗搞了個小天安門事件。”我說：“是啊，通知是我發的，會是我主持的，演講是我作的，這與我的心意是一致的，要抓你們就抓我吧。”尤笑著說：“沒人抓你，我知道你和總理的關係和感情。只是到此為止，不要宣傳什麼，我們裝不知道。”就此我和尤達成默契，堵住了多事者的嘴巴。

超越時空，影響來者，他的偉大與中華民族共存。

四，哈素海救洪災

1976年3月，內蒙黨委下文，調我爲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與我同時被任命的還有那順巴雅爾赴任錫盟，郝廣德赴任烏盟，王金保赴任包頭，職務與我相同。

9月，呼市地區洪水氾濫，土左旗大岱、善岱及臨界的托縣都變成一片澤國。市委讓我擔任前線救援總指揮。我趕到了水患中心——哈素海。

哈素海是土左旗界內一片較大的水域，每年春、秋兩季由黃河供水。湖內生長著魚群和蘆葦，是全旗主要經濟來源。乾旱時還起灌溉作用，能享受水益的公社有五、六個，上萬頃良田。

由於連降暴雨，大青山土左旗段八十一條溝的水，都集中到哈素海，導致湖水驟漲，水面高出善岱等幾個公社的居住地數米⁸。如果決堤，不是幾萬人，而是十幾萬人生命的問題，托縣也不能倖免。唯一的辦法，是動用退水渠，把水退到黑河，再退入黃河。但退水渠多年沒有用過，裏面建有豬場、良種場和一些低矮建築。我們連夜動員拆除，軟硬兼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疏通了河道。按說，河道建築是違法的，可在法盲年代，誰肯輕易丟掉私利？爲此，我又得罪了一部分人。

水終於退到安全線以下。由內蒙黨委向中央申請，調來幾架直升機，爲大水圍住的村子實施空投。我坐在一輛破舊的機動船上，向飛機發信號，空投下各種救援物資。

一天，市委通知我回去匯報。土左旗派人從水中把我接出來時天色已暗。有人告訴我今天是陰曆八月十五中秋節。幾個朋友把準備好的一包羊肉塞在我手裏，說：“快回家過個節吧。”我到台閣牧公社接上妻子和兩個孩子⁹，

⁸ 大青山因缺乏植被，幾乎沒有水土保持的能力，晴天常常乾旱缺水，一遇大雨便山洪傾瀉，迅速給下游的河流和湖泊造成氾濫災害。

⁹ 1973年，妻子攜兩兒隨我調任土左旗，在離呼和浩特市區較近的台閣牧公社擔任婦聯主任。

路上給兒子講月餅的故事，講著講著，他們睡著了，回到呼市已經半夜。第二天是八月十六，全家高高興興吃了頓羊肉餃子。

由於救災期間過於勞累，我的感冒總不好，當時沒去檢查，也沒當回事，以為是普通感冒，吃點藥就會好。一位傳染病院的大夫說這不是感冒，可能是肝炎，我住進了傳染病醫院。1977 年末，我喝了母親為我熬的最後一次中藥，即被隔離和拘留了 5 年零 8 個月。期間，無人過問我的病，只是手頭有什麼藥吃點什麼藥。1983 年釋放後，肝炎不治而愈。傳染病院給我看過病的醫生認為，這純屬奇跡。難道奇跡會賜予一個犯人嗎？可能是上蒼想要保佑一個冤屈者吧！

1976 年 8 月，我去湖南桃源參加全國水利工作會議，路經北京時，得知朱老總去世的消息。當天靈柩路過天安門，我約市水利局副局長小陳毅（與陳毅元帥同名），同去天安門與老總告別。隨著靈車移動，我憶起九大期間迎送他開會的情景，不由得潸然淚下，他老人家征戰一輩子，也沒逃脫如來佛的掌心。

唐山發生大地震，9 月，毛領袖緊隨周朱之後，撒手人寰，連環災難讓世人備嘗辛酸。1976 年 10 月，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被逮捕並起訴。

我正式到市委上任後，多是夜晚值班，抓些小事，如路燈、早點問題和醬油、醋、糖果的供應等¹⁰，並無什麼建樹。

1976 年底，我的人生翻到下一頁。

¹⁰ 路燈不亮，家庭基本用品供應不足，無早點攤位等，曾是當時困擾城市百姓生活的幾個重大問題。究其原因，既有文革動亂造成的生產下降和流通堵塞，也有無政府主義導致的政府功能癱瘓等問題。根本原因，還是市場不發達。

第四十七章

造反派的末日——清查運動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後，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運動。輕者留在本單位“講清楚”，重者由單位負責隔離；身份高的，押入各級隔離審查學習班。已被認定敵我矛盾者，要組成專案組，並移交公檢法拘押。

一，清算臨頭

1976年底，郝廣德、那順相繼被隔離。我身為內蒙農業學大寨會議呼市代表團團長，仍坐在台上，他倆被押在台下批鬥。

我注意聽了十幾人的發言，仿佛概述了內蒙的文革歷史，只不過角度已經截然不同。60年代，文革是“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創造”。十年後，討伐造反派緊跟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只有偉大的黨永遠正確，永遠不犯錯誤。

內蒙清查運動11月12日正式拉開序幕。學習班從呼鐵局開始，迅速波及全區。運動初期的造反派個個成了甕中之蠶。劉立堂在呼鐵局，李楓在黑龍江，王志有在南京，霍道餘在湖北先後進入隔離室或監獄。我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雖然未越雷池一步，但也難脫干係。我周圍懷疑的眼光和不屑的神色，使我難以工作。當時郝秀山鼓勵我：“別想那麼多，黨是實事求是的，誰不知道你在運動中被打成烏蘭夫黑幫分子，有什麼說法有我頂著。”尤太忠也替我打保票，三次對我說：“沒材料和證據，不該審查你，你要堅持工作，相信黨的政策。”前兩次是當面講，最後一次是電話中，離宣佈對我隔離審查僅僅七天。

1977年12月份，我突然被停職隔離，直接原因是後來得知的，因有人

揭發，批林批孔中我與江青特派員有來往。

現在審查過去 20 多年了，老朋友見面總提這個問題：“你對審查怎麼看？”我坦言相告：打倒四人幫並沒有多少人同情。江青的人格，尤其整周總理這一條，為廣大群眾所不齒。我冒險保護天安門事件的知青，原因即此。胡耀邦曾說過，解放戰爭我們打蔣介石也不過 800 萬，現在抓的紅衛兵已有上千萬了，這個數量非常可怕。胡耀邦講：“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娃娃，緊跟有什麼不對。”為此，《紅旗》雜誌 1980 年發了評論文章。

據說胡耀邦的話引起鄧小平、陳雲不滿，因而失去信任，總書記終被普通黨員罷黜。鄧不擔任黨的職務，華國鋒、趙紫陽、胡耀邦三位總書記，連連在他手下折翅。這種情況正常嗎？鄧小平如果多一點丈夫氣，少一些小家子氣，在糾錯上適可而止，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更順利些，社會氣氛也會更和諧。

1976 年的清查一陣緊似一陣，我的朋友大部分失去自由。1977 年夏末秋初，我和董玉華在體育場一個角落（其他地方有人監視），甩掉尾巴，談了一夜，對老幹部的基本心態分析如下：他們會把文革失去的東西找回來，而且變本加厲；他們不會放過一個人，直接整過他的人要抓，沒直接整的都要抓，要趕盡殺絕；他們會毫不猶豫，先抓起來審查，不會講政策，即便沒問題，幾年後放了，也殺殺你的威風，讓你受受罪。

我約董玉華見面的意圖是解放大家。我讓董想盡辦法通知被隔離的人揭發我，儘快解放自己。他急問：“你怎麼辦？”我說：“我把一切都攬在身上，先把朋友們解脫了，然後我再翻供。大家都出去，過安定的日子，犧牲我一個，代價還小一些。這場審查不犧牲一兩個人是過不去的。”董玉華很猶豫，我們爭了二個小時，他感到也無它策可想，只好同意了。

1982 年，我在獄中與內蒙古運動辦的胡牧群有一段對話：

問：這次坐監獄，你覺得冤枉嗎？

答：那看怎麼說，如果造反派頭頭非要入獄不可，我應是第一個。

上天安門的是我，和毛主席、林彪握手的是我，和周總理一起吃飯的

是我，參加九大、四屆人大的也是我。造反派中數我官最大，如此顯赫角色不入獄誰入獄。監獄是人蓋的就要人坐，既然輪到我，在獄內呆幾天也算人生一景，就是時間長了點。【日記摘抄】

近六年的監禁和審查，純淨了我的靈魂，懲罰了我政治上的幼稚、遲鈍和太多的愚忠，也證實了我的人格和誠實。我可以在餘下的後半生，堂堂正正地活在人群中，不被恥罵。

我的黨籍被市委書記手一揮開除了（未履行任何手續），我無怨無悔，我恥於同那些貪官汙吏爲伍。

二，痛別老母，走進囚室

1977年12月上旬的一天，早晨八時許，市農業學大寨辦公室副主任郭志孝和市委辦公室秘書周恩鐵，到家裏傳喚我，說市委兩個書記要找我談話。郭、周均屬我的下級，以往對我滿臉陪笑，今天臉色鐵青¹。

市委書記蘇和、王明清儼然是黨和正義的化身，先對我宣佈自治區黨委對我的停職檢查決定，後傳達中共呼市市委對我的兩條警告：1，老老實實交代問題，爭取寬大處理；2，不允許與外界聯繫，由市委指定的專案組全權負責查清問題。

訓話之後，把我交給已成立的專案組人員任和工和馬明正。我提出不能完全剝奪我的自由，停職不應隔離的抗議，兩位書記對我的申辯用“至今你的態度不老實”的棍子打回來。我要求回家取生活用品，他倆對視了一下，還是同意了。

任、馬兩“專案”（統稱審查者爲某專案），寸步不離把我押回家。當時，我年邁的父母與我一起生活，我老母親正在屋內灶上蒸玉米麵發糕。

在任、馬一再催促下，我在家停了五、六分鐘，邊找東西邊安慰父母。

¹ 事發當時，我尚不知道郭志孝已任市清查辦公室副主任。後因清查有功，升任中共土左旗旗委副書記，幾年後任呼市公安局局長。

走出家門，我回頭望去，母親倚著門框那淒然的目光讓我心碎，我快速轉過身，怕她老人家發現我的滿臉淚花。文革十年動盪，除了擔心害怕，我沒給父母任何東西。

中午一過，隔離我的房門被推開，走進 17 條漢子，爲首是專案組長叢敬之，副組長任和工、周恩鐵，後面是馬明正等人，外加兩名上了年紀的“保鏢”張大泉和張世義。說是和我談談，雙方身份並不平等。主講者是叢組長，自稱老幹部，我過去在呼鋼見過。他是一個車間主任，與造反派首領郭日周私交好。

文革以來，我一直扮演宣講人，現在成了被審查目標，聽他人口若懸河，自然不對味道，需要慢慢適應。在我之前，絕大多數造反派頭頭已被拘捕或隔離，我是隱藏最深的大魚，待遇自然優厚，鎖入呼市招待所一個套間內（帶衛生間），有 17 位戰士日夜相伴。他們說了兩個多小時，最後讓我表態。我說了必須說的幾句話：“服從組織決定，接受組織審查，按黨的政策辦。”最後，叢組長留在桌上一還紙，出門時命令：“給你三天時間。”

隔離室內有兩張床，另一張床留給看管我的張世義和張大泉，他倆不參加專案組批判會，只負責 24 小時監護。

隔離第二天，我身上的香煙吸沒了。值班的張世義請示後說：“你好好檢查，檢查好了就有煙抽，現在不給買。”

在煙癮難忍時，專案組的專斷給我帶來極大的啓示：吸煙不是與生俱來的，不吸煙可省去許多麻煩，不必求人買煙，還能節約幾個“革命的銅板”。²睡覺時，我已下決心不再吸煙。

戒煙前，我每日吸 30 餘支，至今 20 餘年不再吸煙，無論如何，應感謝專案組，古語說：吃水不忘挖井人。

一個星期後，我妻子被批准來給我送食品衣物，我唯獨把一條煙退回，反讓家人驚奇不已。

被關押後吃不飽。上級規定，全體專案組（招待所還有另外兩個組）享

² “革命的銅板”在此帶有戲謔和自嘲味道。原話出自毛領袖的“最高指示”：“為了革命事業，節約每一個銅板。”

受會議伙食標準，每十人一桌，六菜一湯。受審人不能進出飯廳，但有每桌十分之一的飯菜量，用飯盒由專案人員遞送。我無法享用會議伙食，但我不能餓肚子，給我帶回的飯盒內主食不夠，菜更少。第二天，專案組長親自送飯，他皮笑肉不笑地說：“這回你夠了。”把飯盒放在桌上退出。打開飯盒，觀感很好，滿滿一盒。剛吃兩口，往盒底一翻，原來有“乾貨”：半條魚的魚刺和啃完肉的一塊骨頭。我無奈吃下一個魚頭。

我有每天早晨體育鍛煉的習慣。失去自由後，每早只能在打開的窗前活動，這又驚動了專案組。一天上午，專案組三位組長說，我仍然不老實，借早晨開窗鍛煉向外張望，宣佈要釘死窗戶，再在玻璃上糊兩層報紙。另外，今後在屋內走動要離開門一米，否則算違規，要受罰。煙和飯的事情我做了讓步，但，新鮮空氣和光亮（我的房是陰面，陽光進不來）是造物主賜給每個生命的，須臾不可少。

文革後期，專案人員和我一樣並不懂人權兩字，也沒有這個概念，但人的同情心並沒有泯滅。可在共產黨的教義中，同情心始終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是立場問題³。

作為一個能喘氣的人，我不能對專案組這個決定無動於衷。我挺身面對組長大人宣佈了一條個人決定：你們如果敢給我封窗戶，我必將破窗跳樓，以示抗議，我說話同樣算數。

我當時一臉正義，一付視死如歸氣慨，把三個人嚇住了，叢組長帶頭撤退，周副組長緊隨其後，任副組長一顛一顛最後掩護（任有腿疾），臨關門時留下三個字：“你等著！”

³ 人性的喪失、同情心的泯滅，乃是共產文化帶給中國社會最深刻的危機之一。這方面的貢獻，不但有毛領袖的份，也有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其他中共領導人的份。在中共的官方哲學中，只有資產階級才講人性，才講溫情，共產黨只講黨性和階級性。正是共產黨的這種長期說教，加上他們六親不認的殘酷鬥爭哲學，才培養了幾代青年人的麻木、冷酷和玩世不恭的處事之道。這和共產黨人崇尚無神論，反對宗教信仰也有一定關係。無論什麼宗教，凡有信仰的人，都相信人無完人，只有神才是完美的，在人之上，還有一個超人的力量（神）在主宰一切。如果一個人做了壞事，即使他不怕在今世的懲罰和報應，他也會恐懼來世的懲罰和報應。因此，有宗教信仰的人，做壞事總會有某種恐懼感和約束力。惟有無神論者，做起事來才無拘無束，完全徹底，毫無顧忌。這也是當今中國世風日下、物欲橫流、假貨充斥、怪案叢生的原因之一。

我以爲肯定闖了大禍，17條漢子會殺我一個回馬槍。我沒感到恐懼，反而是勝利的欣喜。我站在窗前，外面正飄灑雪花。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敞開窗戶，讓新鮮、冰涼的空氣驅走汗濁。一個人不能失去最起碼的人格尊嚴。從前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我對著漫天飛舞的雪花，哼起一首熟悉的老歌。

令人生奇的是，回馬槍不見，報復也沒有。難道專案人想殺雞取卵？事後張世義道破了天機，我才得知真相。

三，侯永原來是左派

我因侯永而隔離，必從侯永問題開審。專案組指定我要交待的第一個題目，是與江青特派員的關係。

1974年春，批林批孔在內蒙卷起的狂潮稍稍平息，便傳出江青派一名特派員到內蒙地區調查。對此，我雖有耳聞，但我吃過江青的虧，於是靜中待變，不想湊熱鬧。

夏初，我從土左旗回呼市開會，住在家中。和我同住一院的張有（北師大畢業分到內蒙教育廳）神秘地對我說，江青的特派員以《紅旗》雜誌記者身份到內蒙，原是北師大教育系老師，名叫侯永。侯已找到你的住處，來過幾次，想找你談談，希望你今晚去，他專門給你空了時間，可以帶兩個人同去。黑臉膛、大個子的張有傳達完侯的話，匆匆離去。

當晚，我按約定時間在內蒙軍區小招待所見到侯永。他穿帶領章帽徽的軍衣，戴一付深度眼鏡，中等偏高的個頭兒，皮膚微黑。他說已來內蒙月餘，找他反映情況的人很多，常常排隊等候，“唯獨你這個人，還要我登門尋找”，話中明顯帶有高官的驕矜。我本無興趣見這一面，只是不見不行，怕節外生枝才登門。況且，我見過的特派員及兩報一刊記者中，名望大的不少，見侯永並不發慌，便直言相告：“我有公務在身，春天地裏種不下去，40萬人的生計不敢耽誤，忙於下鄉便不知曉內蒙的事。”

接著，他詢問了有關批林批孔的問題，無非是對呼市日報3.11事件，對內蒙黨委靜坐，對內蒙體育場批林批孔大會的看法等等。對這些問題，瞭解

情況的董玉華和雷善元講得多些。

侯永說：“你在批林批孔中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不積極，起碼不積極參與具體活動。”我承認。

他問我原因，我說：“能否提一個無證據、無把握，只是感覺到的問題？”他讓我儘管提。我說，批林可以理解，不存在問題，批孔也對。但把兩者結合，說林彪是當代孔老二，起碼從歷史角度難把兩人湊在一起。“是否還對第三個人有所指？”

侯永自然明白，第三個人是周總理。但他卻說：“我不知道你說的第三個人是誰，我理解，批林批孔就是批林批孔，是一場深入批林，又剷除其思想根源的運動。”

當我把與侯永一個多小時的談話內容如實寫成材料上交後，專案組人大發雷霆，掄起“避重就輕”、“不講江青對你有什麼秘密指示”的大棒子，對我一頓窮追猛打，巴不得立馬發現江青的核心秘密。他們認為好不容易發現了與江青有直接關係的陰謀，已經揪住了狐狸尾巴，還能讓狐狸溜掉不成。

事實上，侯永不是江青，侯永何許人也，我也不清楚，因為我不是江青或中央的什麼人，侯永不是我派來內蒙的，我只是一個被邀請上門的被詢問者而已。那些天，專案組拿不到乾貨急得火燒火燎，對我頻頻出擊。

突然間，侯永的事戛然而止，專案組再不提侯永及我與江青的政治關係等問題，真可謂撲朔迷離。這個疑團在我出獄後，從原內蒙軍區幹部孫崇穆處解開。孫那時已從部隊轉業，在呼市一家外貿公司任支部書記。1974年，侯永到內蒙時，孫是軍區政治部宣傳幹部，負責侯的安全、工作和生活。

孫對我說：“那件事真扯淡，侯是以《紅旗》雜誌記者身份來的，外邊傳說他是江青特派員，人家自己從沒說過，有人問過，侯從不置可否。1977年清查時，也問過我與侯永關係。當時，因侯永與內蒙的清查關聯太深，內蒙黨委派出幾個人到《紅旗》雜誌專訪。北京那裏由組織出面解釋說，侯永是反“四人幫”、反江青的左派，從沒擔任過江青特派員，侯永去內蒙是《紅旗》雜誌社派出的，問題非常清楚，不必懷疑。”

“可是，內蒙去的幾位不甘心這個讓專案人失望的結論。他們原以為可

把侯永拿回內蒙，並和內蒙公安廳打了招呼。他們纏住《紅旗》雜誌社不放，甚至懷疑那位解釋人與暗藏的‘四人幫’都在包庇侯永。他們的無理糾纏，惹惱了這家御用雜誌，內蒙黨委挨了批，這幾個人被‘限時離京，否則不客氣’”。

孫的話並非編造，另一名消息靈通人士所言也基本如此，其實，此類棒打冤鬼的笑話，何止侯永一件呢！

四，罪條加碼

在隔離後的七天內，我實事求是地向黨組織檢查我在文革中的錯誤，抓緊時間寫出了近萬字的書面材料。

但是，專案組嫌我寫的材料“避重就輕”，“只說皮毛不交待實質”。我又用七天時間寫了數萬字材料，狠批自己“貫徹了‘四人幫’形左實右的路線”，“客觀上支持了‘四人幫’篡黨奪權”，“思想上與‘四人幫’製造的輿論產生共鳴”等等。這是我檢查的最高限度，無論黨滿意不滿意，專案組能否儘快結束，我不能再向前走了，那樣我就等於承認自己真是個反革命分子。

我多少次捫心自問：如果違心地承認是反革命分子，我怎能對得起教育我長大的工人爺爺、叔伯，我年邁的雙親？怎樣向長大的兒子解釋？我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只有在夜裏，我才肯放任自己的感情奔流，淚水多少次打濕枕巾和被頭。

我上繳的材料讓專案組大失所望。他們連續三天批判我的態度和材料：“態度越來越惡劣，材料越寫越糟糕”。有的專案親切地告誡我，“你一條腿已站在對抗黨和人民的反革命一方”，言外之意，只要另條腿一動，就吹燈拔蠟了。叢組長最後總結：“爲了貫徹黨的治病救人政策，給你最後機會，現在讓老任對你宣佈幾條具體提示。”

我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誠惶誠恐地用筆記下任組長的每句金口玉言。至今 20 多年了，這張紙片我還保存著。現摘錄如下：

1，在第十一次路線鬥爭⁴中犯的嚴重錯誤一件件、一條條清清楚楚檢查交待。你接受了王洪文、江青什麼黑指示、黑講話，你傳播了哪些……；

2，與你的幫派骨幹成員搞了哪些陰謀詭計，訂了什麼樣攻守同盟……對抗揭批清運動⁵；

3，蔣榮峰、陳世玖、郭是海北京之行，什麼時間去的，到了哪些地方，搞了哪些活動……；

4，“顛倒論”，你是怎麼顛倒的，目的是什麼，起了什麼作用；

5，吳濤、郝廣德、那順、王金保、劉立堂等幫派體系的掛帥人物……，你與他們有哪些勾結和串聯……。

以上這些兩天寫完，不得拖延。

會後通知我，第二天中午吃過飯不要午休，有事。

第二天，一輛舊北京吉普車，載著我出城向西行，駛往我任副書記的土默特左旗。我心中一算，此時正是旗、縣召開三幹會時節。以往，這條路我跑過幾百趟。這次是在揭批“四人幫”大會上當一次反面教員，能為全旗人民再服務一次，也是安慰。

在一片“打倒‘四人幫’幫幫派骨幹分子”的口號聲中，我被押至台下，在台邊一個椅子上落座。主席台上坐著市委秘書長王德義，其餘基本上是我在旗委時的原班人馬。忙上忙下的工作人員中，許多是我從基層提拔上來的，今天他們忙著把我批倒批臭。

台下人頭攢動，大部分是熟悉的面孔。有的驚呆盯著我，像在打量一個

⁴ 按照官方說辭，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指劉鄧反文革派，同文革派之間的路線鬥爭，而失敗的一方，自然是毛江文革派。不過，若按照毛澤東的黨內路線鬥爭說，前面的十次路線鬥爭，都是以毛澤東的最後勝利而告終。

⁵ 所謂揭批清運動，指“揭發批判清查‘四人幫’殘黨餘孽分子運動”。這是“四人幫”被抓之後，重新恢復權力的當權派，對文革造反派頭頭的一次大清算。據後來負責落實政策的胡耀邦透露，有上千萬文革中的造反派領袖和骨幹人物，在這一運動中被隔離審查。

陌生人；有的則躲開我投去的目光；有的迎著我微笑；也有的把手伸到耳下撓動三指，算打招呼。

在旗裏工作時我常下鄉，除了和農民一起勞動，也愛和一些諸葛亮式的人物交談。他們對社會、人生的見地，與史家大相徑庭。“落架鳳凰不如雞”，“茶沒顏色不如水”之類的民間諧語，常掛嘴邊，說來一套一套。他們正在旗裏開三幹會，今天特意搶佔離我最近的座位，明目張膽向我致注目禮⁶。

批判會開始，發言人上上下下，口號聲響天震地，革命氣氛十分濃烈。我抓緊記下發言的要點。第二天，專案組三位組長找我談話，讓我交待在土左旗所犯罪行，突出兩個問題，讓我首先考慮：

1，你在土左旗怎樣為劉少奇反黨集團服務的，把林洵禾拉入黨內，你的政治目的是什麼？

2，1975年，鄧小平大搞復辟資本主義時，你在土左旗提出留少數自留地等主張，是怎樣與鄧小平一唱一和，妄圖開資本主義倒車的？⁷

這兩個問題不是專案組長杜撰而成，是前一天旗裏批判大會涉及的重要政治問題。眼看著我的罪條越碼越多，出頭之日算是遙遙無期了。

⁶ 正是這些受共產黨教義影響相對較淺，保留傳統文化較多的所謂民間草莽人士，往往能秉持某種程度的義氣和公道，不大隨政治氣候的飄忽不定而喪失自我。通過我自己的身世沉浮和富貴榮辱，我還真結識了一批這樣的朋友，從而提升了我對事態炎涼的觀察識別能力。

⁷ 此時，鄧大人尚未獲得第二次解放，劉少奇尚未平反。他們依然被作為階級敵人對待。我這個清查對象，自然就要聯繫自己，順便批判他們。一旦上頭風向改變，專案組會立刻改變措詞，絲毫不覺得說辭前後矛盾，轉彎尷尬困難。

第四十八章

專案人物寫真

從 1978 年 1 月始，向我要外調材料的事逐漸增多。張世義告知，叢組長因攻不下我這座堡壘，被市委領導批評。叢請示上級說，高不能因寫證言材料而耽誤專案進度，但上級未准。

一，實事求是與態度惡劣

當叢組長遇到難題時，我同樣感到為難。

寫證言材料與寫檢查交待不同，後者是針對自己，故寫多寫少，上綱上線，或把自己罵成烏龜王八旦均屬自己的事，專案組說寫得不好，可以再寫。證言材料是寫他人的，這不僅涉及自己，更要緊的是關係他人政治命運。可是從外調人提問題的傾向看，非要把原本極為普通的交往，寫成嚴重的政治事件或陰謀。這時，我不得不慎之又慎，實事求是，一一寫明。

被隔離審查一個多月，我深知專案組最討厭“實事求是”，大批特批我“態度不老實”，“繞彎子編故事”。次數多了，他們便更換新詞：狡猾、頑固、死不悔改，要我好好學習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書》¹。

我母親秦秀雲是不識字的農村婦女，祖籍山東兗州新驛鎮秦村，與孔子籍地曲阜相鄰。我自幼受母親教誨，在極樸實的道理中成人。如這個東西不是你的，絕對不要拿，拿了就是小偷毛賊；是怎麼個事就怎麼說，怎麼辦。當我長到十七、八歲時，老人家諄諄教導我：“你就要長成大男人了，記住，不是你老婆就別在心裏留人家，你只能惦記一個女人，就是你將娶回家的那

¹ “敦促杜聿明投降書”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的一篇文章，源自毛澤東在國共內戰中寫給國軍將領杜聿明的一封勸降電報，表示杜所指揮的國軍，已經處在共軍的層層包圍之中，繼續抵抗已經徒勞無益，還是及早投降為妙。文革當中，毛的這篇文章，經常被相互對立的群眾組織廣泛引用，作為輿論攻勢，迫使對方轉變立場。

個。”

多少年來，不論順境、逆境，母訓沒有離開過我。當一個人被剝奪得沒有基本自由，從政治人還原回生存人的最初狀態，我沒忘記自己還是個人。於是，我實事求是地一份份寫出證言材料，不管別人喜歡不喜歡。

春節後，專案組再次爲我召開端正態度會。還是這間斗室，還是那十幾個專案人，叢組長還是那麼慷慨激昂：“姓高的，你聽清楚，今天的會不是我們專案組要開，是我們代表市委和市清查辦給你開，就是針對你頑固不化的惡劣態度而召開的。現在，各專案組差不多都有反映，說你寫的證言材料已經成爲干擾，鬧得人家不找你調查不行，找你調查也不行，是不是沒有你這顆臭雞蛋就做不成槽子糕²了？！”

周組長大名周恩鐵，是土左旗鐵帽公社人，至今一口土旗腔：“哎，高樹華，我也不和你說那麼多，就問你一句話——咱們還鬧不鬧啦？你馬上回答！”

按漢語詞典，“鬧”字有“吵”、“幹”、“搞”等幾種意思。在土旗詞典中，“鬧”的意思更豐富，甚至可轉指“貪圖”、“搶佔”、“性關係”等多種含義。此刻，屋內靜悄悄，全體與會人員均望著我，等我回答。我只能說：“主動權在你們手裏，你們是審查者，鬧不鬧，鬧什麼由你們定，問我算什麼？”

沒想到平時一副病態的周組長，火冒三丈地站起來，胳膊伸得長長的，指著我的鼻子問：“我問你，你倒推過來，反問我們，你太猖狂了！”與此同時，馬明正按捺不住火氣，沖到我跟前瞪大眼、張大嘴質问我，一副要大打出手的樣子。

我感到氣憤又可笑。此時用“氣急敗壞”可形象描繪出全景。我哈哈一笑，對幾個站起來用手指向我的人說：“你們別拿出威虎山那一套，我既不是小爐匠，也不是楊子榮。”

² 槽子糕，是中國北方常見的一種糕點。做法是將普通蛋糕麵糊，倒入圓形的鐵皮槽子當中，用烤箱或烤爐烤至黃褐色而成，類似於西式糕點中的“紙杯蛋糕”。因使用鐵槽子烤製，故稱槽子糕。

叢組長到底身經百戰，揮手讓部下落坐，反復重複“你太放肆了，太放肆”，會議草草收場。當晚，張世義值夜班，多日相處已很熟。他不無擔心地說：“你今天太不冷靜，和他們吵什麼。會一散，三個組長去市裏匯報去了。”

經一事，長一智。數月隔離生活，著實把我歷練了一番。眼下，我正從一個新的、陌生的角度在看，在想。我可以被剝奪得一無所有，但不能不守護人格尊嚴這條最後防線，我無愧無懼。我至今感謝張世義的人性關切。那天晚上，照例睡了個好覺。

二，讓大人們冒火的材料

1978年4月，與專案組爭吵後，讓我寫外調材料的事幾乎沒有了，我並不遺憾什麼。後來翻檢故紙堆時，發現一份被隔離時寫的關於賈廣裕的證言底稿。這曾是讓專案人員火冒三丈的一份，細讀下來，會反襯當年專案人的思維隱疾。

賈廣裕文革時任新城區革委會辦公室副主任。我和賈是運動中期認識的，一段時期，私人交往較多，對內蒙文革有相同看法。賈待人熱情、厚道，我只是賈的朋友之一，不少人知道我與賈廣裕關係不錯。正因如此，在清查中，他受我的牽連，被投入學習班審查。找我寫賈的材料是必然的。現將草稿摘抄如下：

關於賈廣裕的情況

一九六九年九月前後，中央給內蒙辦學習班，……賈廣裕也參加了這次學習班，是呼市幹部。當時沒說過話。

一九七三年……，賈廣裕去土左旗委找我，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面談話。賈告訴我，他女兒賈俊秀到畢克齊公社水磨大隊插隊鍛煉。賈說，他是土右旗人，土旗的親戚朋友較多，姑娘去水磨，是他親戚給聯繫的。從此，賈廣裕開始到我呼市家中，去的目的和說的內容，主要仍是他姑

娘在水磨勞動和表現問題，讓我多注意。其實，賈俊秀在鍛煉期間，表現一直較好，擔任婦女隊長，後來入了黨。一九七五年抽調到工學院工廠³。我有一兩次去紅領巾水庫時，路過水磨⁴，曾和隊長、支書問過賈俊秀情況，隊長支書都說賈表現好。

批林批孔中，賈廣裕聯繫過王永富和于振峰談呼市面上情況⁵，我沒參加，可能董玉華聽過⁶。

1974年7月份前後，賈廣裕領我找呼市輕化局長李盛奎同志，地點在李家裏⁷。我當時去的目的，是聯繫土左旗利用蘆葦搞紙漿，以籌備農業機械化的資金問題⁸。……那時，我不認識李，我讓賈領我找李匯報了造紙漿的打算，求得支持。談完此事後，可能扯到內蒙情況，現在回憶，我好像向李談過是高錦明把內蒙文革搞亂了這個問題。……1974年7月前後，我曾去賈廣裕辦公室一次，取一套列寧選集（四卷本）。……當時，我的小孩正得病，需要輸液，醫生讓我找京津製的葡萄糖靜脈注射液，而醫院沒有⁹，需自己去找，還要找其他幾種藥。我求賈幫我買……主要談了買藥問題¹⁰。

1974年8月下旬，我去參加內蒙在京召開的批林批孔匯報會，賈給過我一份材料，讓我有機會向中央反映。材料有十幾頁，是反映張鵬林

³工廠招工要通過市、縣知青辦，從下鄉知青中選工人，大隊則按公社分配的名額推薦。在許多地方，所謂群眾推薦都不過走個過場而已，真正的決定權，還在大隊支部書記手上。

⁴紅領巾水庫建於五十年代，是土左旗內重要水利工程，能澆灌數千畝土地，地處烏蘭板溝內，與水磨村為鄰。

⁵王永富、于振峰當時是呼市革委會宣傳組長、副組長，在市級一般幹部中有影響。

⁶此處按外調提綱要求書寫。

⁷當時辦事先私下拜會負責人，討口風，才能定奪下一步，但拜會無需送禮，更忌諱送錢，只要態度謙恭，有熟人引見即可。這種過程在當時也屬於走後門的一種，但同如今盛行的權錢交易，不可同日而語。

⁸哈素海位於土左旗西部，是一個大人工湖，主要靠引入黃河水，生長著茂盛的蘆葦。如今已經開闢為旅遊景點。

⁹文革時，在醫院治病，病方自己托人，尋找購買匱乏藥品是經常事。

¹⁰外調材料必須按照提綱的要求，寫清楚幹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多長時間等等。

問題的¹¹。……在會議期間，我一直沒露出過，又帶回來，後來可能燒掉了。……

這份材料，確實平淡無奇，沒有波瀾起伏，沒有武裝割據之類的乾貨，自然被專案定為不合格，態度自然是惡劣中最惡劣的。百姓之間交往，多為雞毛瑣事。在失去常態的專案人眼中，來往必是串聯，瑣事必有陰謀，連放屁也要化驗化驗，看是否包含核彈成份。

三，道破天機

看著我寫的材料，叢組長每每都要急赤白臉地訓斥：“沒有人要你寫這麼多，幾頁紙、幾件事，乾淨利索一交待，我們專案組馬上撤。”我若真如他所說，稀裏糊塗往圈套裏鑽，專案組是撤了，可公安局會給我戴手銬，上腳鐐。

經過專案組數月錘煉，我的“覺悟”大大提高，應對策略更得體。隔離之初，我急切想說清楚自己，願把一切心理活動對黨交待，虔誠地拜叩在黨之前，罵自己對不起人民。但，詛咒、發誓全沒用。合不合格不在事實，領導早有了一個尺度，像我這種文革知名人士，必須交待出反黨陰謀，否則休想過關。

幾位專案組長也曾和我進行過“軟談話”，儘管此時此刻他們的笑並不自然，畢竟十分難得。他們告訴我，他們也有壓力，別的專案組都有進展，唯獨這裏沒成績，他們不好向上級交待。幾張笑臉道破天機，果然如張世義向我透露的，組長大人們曾得到上級的暗示：只要把專案幹好，整倒高樹華，必然升調。專案組急切盼望在我身上出成績，像運動員期盼拿金牌一樣。

一次，叢組長和我個別談話，義正辭嚴中露出破綻。他抱怨說：“你才從大學畢業幾天就當上了自治區政治部副主任，這可是副省級幹部，還當過縣委、市委書記。我革命幾十年辛辛苦苦，也不過是個副處級，你憑什麼？

¹¹ 張鵬林在文革前為呼和浩特市市委負責人之一，1974年後結合進呼市革委會任常委。

你要把狼子野心全端出來，洗心革命¹²，重新做人。”

我深知，即便我有 18 張嘴，也不可能按他們的標準說清楚在文革中的所爲。我只能安慰火氣沖天的叢組長：“老叢，你想過沒有，我這個副省級位置，還有市委書記位置丟了，空下的位子也輪不到你，你還不是——我本想說‘爲他人做嫁衣裳’，又怕當作把柄，只好臨時借用農民的話——光棍看別人娶媳婦，窮高興一場。”叢並不領會我好言相勸，反把我大罵一頓。

當我漸漸悟出對手先定調，後審查，再湊材料的偉大策略之後，當我漸漸得知專案人把我當踏腳石，急於升官發財之後，我不猶豫，也不痛苦了，毅然選擇一條自己應該選擇的路。任憑如山重壓，海嘯般狂潮，能奈我何！

四，“保鏢”二張

張世義、張大泉每日負責監管我，與我同居一屋另一張床上，24 小時輪換一次。二張均爲市政公司工作人員，任和工副組長是該公司副主任。張大泉是個築路工，自言“舊社會苦大仇深”，“窮到討吃要飯地步”。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共產黨像爹娘，毛主席是太陽”。“組織上說的哪能有錯”，這是他衡量是非的基本尺度。他認爲某領導就是黨組織化身，領導的話就是組織上說的，當然不會有錯。

張大泉和我見面第一個晚上，借和我聊天，對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讓我不要忘本，錯了就認錯。他還不斷把我會外的表現一一描述給專案組長，諸如，去了幾次廁所，夜間說了什麼夢話等等。我並不在乎此類小兒科，在乎的是專案組對我進行的兩次大搜剿。我在大學學過兩個專業：中文和俄語。畢業後，留校也教這兩門課。文革前，我開始學英語，達大學一年程度。隔離前又撿了起來，隨身總帶著英語卡片或幾頁抄錄的範文。

隔離後，我最美好的時光是蹲廁所。坐在便桶上，可以自由自在地背英語單詞，默誦範文。但好景不長，讓張大泉發現，報告了上司。一天，我正把自己關在衛生間，享受自由時光，叢組長帶人破門而入，命令我起身提褲。

¹² 原本漢語成語爲“洗心革面”。

四條漢子把我的床、書桌翻個底朝天，大部分英語卡片從床墊子下被截獲。叢組長得意十分，除大罵一通，還命令我主動交出未搜出部分。

我憤怒目視著叢。兩次突襲搜查，他們並未發現我藏在馬桶後斑駁處和張大泉床墊下的卡片。環境逼迫我必須背熟所有範文，記牢盡多的單詞。於是，我利用不寫材料的時間，坐在書桌前背寫英語單詞，按東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夜的中文順序，自編一本英語單詞表。當我再坐馬桶時，便毫無顧忌地大聲說英語、說俄語，任誰去報告，還能把我的舌頭割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久，專案組給我增加一條紀律：進衛生間不准關門，蹲馬桶不准大聲喧嘩，尤其不准說外語。

我明知這是張大泉給我引來的麻煩，我並不記恨他。這位半百老人，說起他老家托縣的窮，尤其說到他那身體不好、一目失明的妻子時，那種真摯感情，表明他是心地並不壞的人。他說，他 30 多歲時，窮得娶不上媳婦。那時，他每年被評為先進生產者、模範工人，領導可憐他，給他介紹了現在的老婆。領導說：“她是個寡婦，但沒生養過，還是個一隻眼，半瞎子，你要不要？”他說：“唉，只要是個女人，願意和我過日子就行。”就這樣，他才有了家。“要不是領導幫助，說不定現在還打著光棍兒。”說到“領導”兩字，他總是格外親切。

我見過張大泉的兒子，一個可愛的男孩兒。張很親自己正讀初中的兒子，只是不滿意兒子的學習成績，尤其是英語學得不好。一個星期日中午，張大膽地把他兒子領進隔離室，求我為他兒子輔導輔導。說實話，我自知不過二把刀水準，根本無資格教別人，但在老張一臉真誠，孩子純真的目光前，我不能推辭。糾正發音，講語法，分析課文並告知中國人學英語的方法，足足忙了一個多小時，男孩子帶著滿意的微笑走了。

過了幾天，張大泉說：“我兒子說你講得比他們老師強多了。你為他改過的英語作文得了全班第一名，他高興極了。別看輔導了一次，可以肯定你是個有本事、有學問的人。”

孩子不會說謊，能得到小男孩兒的誇獎，我由衷高興。我婉言拒絕了張要給我帶一飯盒餃子的好意。餃子是中國人的美食，對我的誘惑尤其大。但

我不願意與張大泉有這樣的來往，儘管他情真意切。對於他這樣的人，冒違反紀律的風險是極不值得的，我領情了。爲了不傷他，我提示：“你的情我領了，別因爲一盒餃子讓任拐子他們知道，對你可不好，算了吧。”

我的提示極有效，張大泉再沒提送餃子的事。從此，張大泉對我不再滿臉陰雲，常帶微笑。有幾次，他把兒子的英語作業、作文拿來讓我修改，我總是極盡所能，不讓孩子失望。

張世義是專案組資格最老的。他說：“日本投降後我就參加了正規部隊，老叢不過是 1948 年的民兵，他當民兵時，我已經是班長了。”每逢說到此處，張世義臉上綻開一朵花。

二張屬一個單位，互相知根知底，張大泉卻不這樣看張世義：“他就會吃老資格，混到快退休了，才是個副科級。這兩年還能讀下報紙，前幾年，他連自己名字也不會寫，領工資時就摳個手印，我那時已經會寫‘張大泉’三個字了。哼！”

可是，張世義就是張世義。我坐在隔離室裏，常聽到對面屋內張世義在大聲罵著什麼，罵聲穿過走廊，透過門縫流進。這時，張大泉總會推門進來，自言自語地說幾句：“哼，那個沒水準的又罵叢組長了，和領導對抗，肯定沒好下場，沒好下場。”說完，他又一股風地鑽出去，繼續品味對面屋的好戲。對於枯燥的專案工作，這也算添點佐料吧。

晚上，躺在床上的張世義會唉聲歎氣地來回翻身。

“怎麼了，老張，哪兒不舒服了？”這一問準能引出張世義的話匣子。我願意和張世義聊天。我品出這個人，從不把倆人的話拿去打小報告。對被審查者，小報告往往是致命的。

張世義是個孤兒，先在解放軍部隊幫助喂馬、燒飯，後參加戰鬥班。他自述道：

那一年我們打旗下營¹³。仗打勝了，我和排長兩人騎在馬上，大

¹³ 旗下營是京包鐵路上的一個小車站，位於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境內，但距呼和浩特很近。張所講的旗下營戰鬥，發生在國共內戰的後期，解放軍和傅作義的軍隊，曾經在集寧、大同、

家正在清點東西。不知從哪裏飛出一顆子彈從排長胸前穿過去了。唉，那個慘像，別提了。我抱著排長哭啊，喊啊，也沒用。剛才還好好的，轉眼間沒氣了。他媽的，我真想把那些俘虜用機槍突突了，副排長按住了我。

那可是個好排長，河北人，說話和氣，事事帶頭，全排人沒有不服的。後來，副排長升了排長，把我提拔成副排長，可排長死後留下的老婆怎麼辦？開始，我們排到哪兒，讓她也跟著，時間長了怕說閒話。新排長有老婆，就問我：“小張，要不你把排長老婆收留了吧，那個女人挺好的。”我說：“我才 19 歲，不夠部隊規定的條件，不能娶，而且她比我大。”排長說：“大幾歲更懂得疼人。你別推了，我問問，她要是願意，就這麼定了。”

就這樣，我和大我四歲的女人結了婚。爲了不違反規定，我退出部隊，留在一個鄉裏當助理員。那陣子地方上缺幹部，我把家也安在了那兒。過去老排長活著的時候，大家起哄問他，怎麼結婚兩年抱不上兒子，排長說他老婆是天生的騾子，不會生養。

可是，這個女人跟上了我，第二年就懷孕了，不但會生而且能生，一股勁兒給我生下五個孩子，弄得我這多半輩子就爲養家餬口忙了，拉了我的後腿。壞在咱沒文化不識字。剛解放進掃盲班，我也沒好好掃自己的盲，你剛坐下說念書吧，我老婆那兒又生下一個，心安生不了。

事情就這樣，耽誤幾年，提拔不上去，工資長不了，就得過窮日子。解放十幾年，鄉變公社，頭頭派下一茬又一茬，沒人問過我怎麼回事，爲什麼總當助理，40 多塊工資掙了這麼多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真不知道我在哪塊兒鑽著呢。

直到 1968 年公社進駐軍宣隊，才發現還有我這麼個人，待遇這麼低，像挖了出土文物，引得這個調查，那個問。反正我也是個當

兵的，見了官兒，我就向他日粗（意爲罵街）。我的事報告到內蒙軍區，政治部一個頭頭一見我的名字，一問我的情況，坐上小汽車來找我。我和他見面一說，一問，他原來是我們班戰士。我女人記性好，還記著他當年的模樣。

他挺奇怪，“人家對解放前後支援地方的幹部落實好幾次政策了，怎麼這地方就沒人管你？不行，你趕快調走。”我這才沾了戰友的光，提了二級，調到市政公司，給安排了個狗屁副科長。

有一天，張世義對我說：“我在這裏不會呆長了，我沒文化，脾氣不好，組長不喜歡我這種愛頂撞的。我雖然不參加研究案情的會，我能鬧清楚，你在運動中沒什麼大錯誤，專案上也不掌握你什麼材料。有時從其他組轉過來揭發你的材料，他們自己看了都不信。從來這樣，運動一來上綱上線。你抹一把黑，他潑一盤墨，把人說得越壞越革命，運動一過，什麼名堂也沒有了。解放後，從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傾，四清到文革，我見多了。你還得實事求是，別聽他們咋唬你。什麼時候，實事求是也沒錯兒，這是毛主席講的話。”

1978年7月，張世義不見了，只剩張大泉一人值班。張大泉說：“張世義回單位了，總和老叢吵架，讓專案組開革了，他到哪兒也團結不了人。”他以極權威的口吻，給張世義做了鑒定。

我卻難忘張世義這個人和他並不幸運的人生。我常常想起他那不苟言笑的面容，他脾氣不好，可從沒對我拉過一次臉。經常是進了屋就往床上一躺，然後自言自語：“唉，腰疼！”

第四十九章

呼市地區批鬥會

我喜歡批鬥會。一個人被拉到台上，面對數千觀眾，讓發言人從頭罵到腳，與數月關在陰暗、潮濕的屋內比，起碼能在陽光下享受空氣的鮮美。除此之外，在批鬥會上，還可以觀察群眾表情，體味人生百態，從會議的氣氛、聲調和遣詞用語中，揣摩案情進展，預測運動風向和政治氣候的變化等等。

一，疲懶的黨委批鬥會

凡我過去足跡所到之處，必開批鬥會，以肅清我的流毒，大到全區有線廣播批鬥會，小到公社的遊鬥會，共約四五十場。雖然場面不一，但各俱特色。其中在內蒙黨委召開的批鬥會，級別最高，場面宏偉，但聲勢低，令人疲懶，效果不遂人意。

那天，被押上台示眾的僅僅是我、郝廣德、那順巴雅爾、王金保、劉立堂五個內蒙革委會小常委，而核心小組成員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等，卻沒有一位到場。不論大會成員，還是會外的百姓，幾乎人人皆知，在內蒙，決定大小事的，不是我們這類造反派頭頭、被稱爲“群眾代表”的貨色，而是“三結合”中的另外兩方：軍代表和領導幹部。

全區有線廣播大會，七盟兩市均有分會場。這種級別的大會，應該把老虎、大象拉出來遛遛，結果僅拉上幾個蹦蹦跳跳的小毛猴，讓舉拳頭呼口號的人提不起精神。我們五個人也有同感，互致注目禮後，坐在拆疊椅上沉思。我做了兩圈氣功後假寐，心裏注意著什麼事上點了自己名字，刺激一下神經。結果讓我失望，只有幾個腦筋靈活，善察言觀色的發言人，在結尾處，把我們五個人捎帶一筆。我一聽便知，這是臨時加上去的。批鬥會在氣力不足的口號聲中結束，只有最後一句“把高、郝、劉、王、那五人押下去”，還算

鏗鏘有力。順著熟悉的聲音望去，原來此人曾是我們戰友，多次主持批鬥會，不過那時鬥的是走資派。

到 80 年代末，該人升至自治區副主席。他雖在運動中鬥過不少人，但也死保了幾個省、廳級老幹部。老幹部官復原職後，四處爲保自己的人擔保，並提拔重用。這類事並不少見。儘管黨國高官異口同聲，政治鬥爭不以人劃線，然而事實勝於雄辯。

二，只抓教學，不抓階級鬥爭

教育系統批判大會，在原人委禮堂召開。禮堂回音大，口號聲響亮。在一片“打倒”聲中，我先被押上台示眾幾分鐘，再押下台站在指定的一角，對於很久沒登過主席台的我，著實過了一把“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¹的乾癮。

主席台正襟危坐的一排我全認識，只缺兩位副局長，姜仲原和耿真。耿真是已被撤職的內蒙軍區政委、核心小組副組長吳濤的夫人。耿真在內蒙教育界口碑極好，被昵稱“我們的老太太”。她辦事公平、認真，丁是丁，卯是卯。另外，不論是局內福利品，還是下屬單位進貢的年貨，耿真一概拒收。實在推不出去，就分給局內最困難的人。誰家有生老病死，哪個申請困難補助，耿真不動用一分教育經費，常把自己工資分給大家。她騎一輛解放初的舊自行車，從城北到城南，從不遲到早退。用九十年代的眼光衡量，這樣的幹部，早已進了博物館。此時的吳濤已泥牛入海，作爲妻子的耿真，黨性再強，必株連無疑。後證實，耿真從此被解除職務，永沒再用。借口述史再稱呼一次：“我們的老太太！”

教育局選了一位我離任後的年輕面孔上台發言。他大批我任普教組組長時不抓大事；只抓升學率，不抓階級鬥爭；只抓教師業務進修，不抓批資本

¹ 此句引自杜甫詠泰山的五言古詩《望嶽》：“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雲層，決眴入歸鳥。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

主義復辟。會後，專案組讓我交待，在教育局是怎麼復辟資本主義的。記得叢組長說：“你淨抓什麼課堂教學呀，老師業務呀，升學率呀這些雞毛蒜皮，你這不明擺著是搞修正主義嗎。你死不認罪，這還不是罪嗎？”

給我認定的許多“罪行”，絕大部分因政治風向改變，自動由“罪行”變為功勞，可是，我的罪條永遠不變。

旗下營中學校長李玉寶上台發言，這是我極熟悉的一個人。因為這個典型是我最早發現，並極力樹立起來的。

旗下營中學座落在鎮西北的山坡下，校外有道小水渠潺潺流過，不遠處聳立著神秘的斗金山。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這個學校裏聚著一批名牌大學畢業生，不少想調回呼市，苦於沒有門路。李玉寶便大開綠燈，把他們收在自己麾下，委以重任，提供每月幾次回家團聚的條件。教師平均學歷全區最高，學生的成績迅速上升，文體也名列前茅。李玉寶辦起校內工廠和家兔養殖，用所得收入添置教學設備。旗下營中學終被樹為全區教育革命旗幟，李玉寶從此也大紅大紫，小有名氣。

李玉寶在台上批我，只抓教學，不抓階級鬥爭，說我和沒改造好的知識份子臭氣相投等等。我猜測，此時的李玉寶必須上台批我，否則，極有可能在台下和我一起低頭認罪。我理解這種表演式批判，絲毫不怪怨他。多年後，李玉寶官至內蒙教材儀器供應站一把手，原副教導主任王殿，升任教育學院副院長²。

三，技術處理過的發言

印象最深的，是土默特旗小學的發言。這所有名的古老學校，人們簡稱“土小”，是烏蘭夫的母校，奎壁、吉雅泰等就是從這裏造反起家的。1963年-1964年，全區城鄉四清期間，烏蘭夫的家鄉土左旗，是階級鬥爭主戰場。

² 文革前為大專性質的“教育行政幹部學校”，簡稱教幹校，專門培訓學校的行政幹部。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年代，在教幹校基礎上組建了教育學院，仍然培養教育行政人員。後來，逐漸增設教學骨幹班，也招收高考生，開始向普通高校建制靠近。現已併入內蒙師範大學。

第一批四清工作團進駐，反大漢族主義；第二批四清工作組進駐，以糾偏爲名，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內蒙文革對於土小已是第三個回合。被打成民族分裂主義和烏蘭夫黑幫的教職工，造四清工作團的反，與內蒙師院串聯。我當時是被打成烏蘭夫黑幫分子的人，土小教職工自然向我講他們的遭遇。本次批鬥會上發言的，就是這部分人的代表。

發言人在講述他們的遭遇時，提到師院一個叫扈啓曙的人，控訴此人在土小把他們關押逼供，用木棍抽打。扈恰恰是外語系俄三學生，自然，話鋒一轉，這一切均是高某人在背後指使。

血淚控訴引起極大憤慨，會場內“打倒”的口號聲尤爲響亮。我同情他們的遭遇。但發言畢竟是發言，是誰的責任應該不難認定。批判會後，專案組抓住這一線索，追問我在土小所犯的“滔天罪行”。叢組長與我的對話是這樣開始的：

的作用，我左耳進，右耳出。

多少年後得知，專案組曾向土小那位發言人調查，發言者說，稿子不是他寫的，他只負責上台讀一遍，事實如何需找寫稿人。寫稿人說，去土小鬧事的不僅扈啓曙，還有其他人，原稿是這麼寫的。審查發言稿時，負責批判會的人說讓刪掉其他人，把事情都集中在扈一個人頭上，最後掛上高樹華。

於是，通過技術處理，我成了黑後台。雖然我是被臨時勾掛一下，但我至今難忘那次血淚斑斑的控訴。隨著年代漸漸遠逝，我對文革的事卻瞭解得越來越多，認識也越來越深。既然生命對人只有一次，為什麼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傷害，互相殺戮？

扈啓曙於 1978 年考入中山大學經濟系讀研究生³，畢業後在鄭州大學任教，後調天津財經學院當副教授。廿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我問起“土小”一事，年已 50 歲的扈啓曙誠懇地談起往事。

“運動初期我去過土小，但我沒打過人，我也不敢打人。我自己背著地主家庭的包袱，不被別人喊作狗崽子算幸運了。我可以指天發誓沒打過任何人。”

談話後幾年，扈啓曙已升為教授，邊教學，邊完成國務院的經濟課題。在街頭巷尾相遇熟人，許多人沒忘記扈啓曙。

四，橡機廠批鬥會實錄

在任市委書記的一年內，我主要分管農業，到郊區的時間多。因此，市內工廠的批鬥會，名義上是鬥我，實際我被冷落一旁。

呼市製藥廠、機床附件廠等廠級批鬥會開得十分平淡，唯獨橡機廠的批鬥會有據可查。1978 年 8 月 11 日下午，我們被押上台前，工人糾察隊的兩個

³ 1978 年是文革之後中國首次恢復和大力發展研究生教育，凡是那一年考上研究生者，被人們戲稱為“黃埔一期”，因為這批研究生當中，出了不少各學科領域的尖子人才。師院外語系畢業生中，那年除了俄三扈啓曙考上中山大學經濟系之外，還有俄三羅見今考上本校數學系，英四高志華和英三程鐵軍考上中國社科院，俄四任光宣考上北大俄語系，英三畢武卿考上北大法律系，英二尹懷庭考上北師大地理系等等。

年輕人，對我們看管頗嚴，不准抬頭，而且塞給每人兩張紙，一支筆，讓認真聽取批判。於是，我有機會留下記錄紙片。下文所涉及的發言，以當時記錄為根據。

當主持人宣佈“把呼市地區的四人幫骨幹分子押上台”後，在“打倒”聲中，我為首，之後是呼市革委會副主任戈志盛、劉文研、董志被押上台。以王春標為首的四、五個人押在台下，我們坐在凳子上，他們站在台下。會議進行一半時，搬來幾個凳子讓他們坐下，讓我們站起來，顯得公平有層次。

劉文研——從研究生到養雞專家

第一個上台發言者是呼市鑄鍛廠代表，題目是“批倒批臭劉文研販賣的顛倒論”。戴著帽子端坐台上等待批判的劉文研站起來，摘下帽子，90度彎腰鞠了三個躬。平時留頭髮的劉文研，今日亮出光頭，台下一陣哄笑，其虔誠行禮，很是動人。

劉在運動初期十分活躍，與院內工作組鬥爭時，他曾出謀劃策，屢試皆中，當時我曾多次慕名求教。劉以點子多出名，尤其在呼市、伊盟等地文革中，他直接或間接插手，贏得部分支持者，也受到另一派群眾反對。文革的頭面人物，有褒有貶，蓋莫能外。

聽人批劉，自然聯繫到自己。我與劉在造反派內屬於兩個派系，若論官位，我比他爬得高；若論今日被審，他惹的麻煩遠比我多。劉卻因認罪態度好，感動了專案組，走上坦白從寬之路。我被拘捕法辦前，劉已回家團聚。

清查後，劉被開除黨籍，回到老家呼市郊區府興營村。此時，市區大發展，劉文研反串養雞專業戶，由小變大，是原來造反派中最先致富的弄潮兒。劉趁生意火爆，成立了一家公司，專門經營與雞有關的業務，60年代的政治學研究生，改革開放後成了養雞專家。可謂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也⁴！

⁴ 不少造反派頭頭，政壇失意之後，被迫轉往商界發展，有些人也確實相當成功。其中原因或許很多，但吃苦肯幹，又有相當深厚的人脈資源，應該是比較重要的因素。當然，其中

董志——未圓律師夢

第二個發言人是呼市機床大修廠副廠長，題目是“徹底砸爛幫派體系，董志的罪行必須清算”。話音剛落，董志便站起來向與會者鞠三次躬，站立著邊聽邊記。主持人到他身後耳語，按他肩膀落座，董志不從，一直站著聽完批判。

文革初，董志在市公安局工作，與喬萬寶等數公安幹警一起，死保當時的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馬伯岩。六十年代初，馬由中央下放內蒙，與市局的老班底無牽掛。文革開始，他們乘勢把老班底打了個人仰馬翻。1967年，呼和浩特市革委會成立，前三把手是高增貴，楊鴻文（女），馬伯岩⁵。後來，領導班子產生分歧，馬與董的關係受到影響。七十年代初，董志便脫下警服調到機床大修廠，當一名行政幹部。

發言人揭露董志一系列言行，其中特別提到，他是1972年發黑帖子的元兇。1969年內蒙軍管後，軍管人員扶植利用與造反派對立的派別，加之不瞭解內蒙的歷史現狀，工作必有失誤，被董志等人抓住了不少把柄。神秘的黑帖子正是他所為。

在隔離審查中，儘管董志態度極好，但他沒有劉文研幸運，還是被捕送入看守所。1979年12月，我被羈押到呼市看守所內，經所長王成的介紹，見到了董志。

董志喜歡過問號子裏的事，愛背讀新發表的法律，常幫別人寫庭上辯詞和上訴書。他對我說，他出去後要考律師，通過法律途徑抱打人間不平。1981年，董志被釋放，回到大修廠勞動一段時間。市裏對董志作出結論，但董拒絕簽字，不承認這個結論。他的理由是：“我是廠裏管的幹部，一個沒有官職的百姓，要市委出面處理我，我不接受如此高抬。”

當社會允許公開報考律師時，董志報了名，市領導公開表態：“即便董志考了第一名，也不給他發律師證。”儘管董志四下告狀，想討回公道，但

⁵ 高增貴、楊鴻文在粉碎四人幫後被立案。經一番審查後，高重新分配到伊盟當副書記，後通過關係調到貴州省，離開了內蒙這塊是非之地。楊鴻文平級調回河北老家，仍任廳級幹部直至退休。馬伯岩軍管後入山西陽高學習班，後平級調到太原警備區任副參謀長，終病逝於太原。

處處權比法大。董志連自己的公道也討不回來，爲民請命的抱負隨之化爲泡影。

近 50 歲的董志經人幫助，調到內蒙二輕學校教書，在課堂上找到樂趣，課餘也在民辦學堂加班，掙點外快，養家餬口。

王春標——錯失良機

第三個發言的是呼市橡機廠代表，題目是“揭發批判幫派骨幹分子王春標”，說王春標是“鬧而優則仕”。個子瘦小的王春標和董志一樣，也是站著聽完批判。

文革初期，王正在軍中服役。1967 年 4 月 13 日，中央對內蒙問題的決定下達時，王是軍內外鬧得凶，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並不隱瞞自己的軍人身份（當時中央明文，軍人不得個人介入地方文革）和姓名。從此“王春標”三個字開始叫響。

以王的表現，他本可鐵下心，呆在保守派一邊，與師院原抗大兵團頭頭陳鳳霞、魏金光、于金煥、劉漢明等人爲伍，易如反掌地得到一官半職。王的才幹不在他們之下。

中央八條下達後，王脫下軍裝分到工廠。不知何故，他轉變了立場，與造反派混到一起，在 1974 年的批林批孔中大鬧了一把，黨票未到手，反惹一身騷。“四人幫”倒台後，他被隔離。幸好各級專案組成員，多爲文革中保守派，熟悉王春標這個名字，批歸批，放要放，董志拘捕後，王春標自由了。

改革開放始，王春標幾個人辦起了公司。公司幾經周折，幾易名稱，王從內蒙殺到南方，最終立足京城，風風光光十幾年。王春標還是王春標，幹什麼，像什麼。

陳吉濤——帶頭造反的廠長

最後發言的是呼市電機廠代表，題目爲“幫派骨幹陳吉濤，要老實交待罪行”。陳吉濤不是造反的學生、工人、農民，而是一廠之長。文革初，廠長領頭造反的可謂鳳毛麟角，因此，又黑又粗壯的陳廠長，或稱“大老陳”

很有些名聲。發言記錄如下：

“陳吉濤配合‘四人幫’及其餘黨，興風作浪遠揚呼市地區。他說，呼市地區只有一個半革委會沒有復辟，這一個就是電機廠。陳在電機廠一手遮天，陳即黨委，黨委即陳，他說這就叫一元化。1974年，陳作為黨委書記爬上218山頭，進了外貿大樓，和郝廣德一起開串聯會，成為218山頭一支主力軍。陳還召集呼市新城東門外三廠領導聯席會議，要召開東片工人大會，公開支持到內蒙黨委靜坐，鼓吹‘二次站隊論’，‘不為錯誤路線生產論’。”

四人幫倒台後，陳抵制揭批‘四人幫’，攻擊華主席，說華主席的講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陳還說，對華主席的領導能力要看一看，考驗考驗，這實際上是反對華主席，也是反對毛主席。”

五，師院的笑聲

1978年9月，我第一次被押回內蒙師院批鬥。新學年伊始，通過大批判，掀起革命與學習新高潮，這是我熟悉的套路。

學院北門巨大的煙囪上，清楚地殘留著運動初期“打倒黑幫分子高樹華”幾個大字，風吹雨打十餘年，“烏蘭夫黑幫分子”一晃變為“幫派骨幹分子”。

我站在學生第二食堂門外，等待批鬥會開始。路兩旁的槭樹如今已婆婆娑娑，綠滿枝頭。師院教工很少有不認識我的，大部分人匆匆投給我一個問候的眼神，微笑離去；也有那麼幾十人慢慢攏過來，站在我周圍。司機班小張和後勤另一個人先笑了笑，立時滿臉嚴肅地問我：“哎，姓高的，看來你身體還好，精神也不壞，沒什麼壓力，好！我問你，你不挨鬥，誰挨鬥？十幾年前，邢台地震，你第一個給災區寄20塊錢。是不是別人都沒你有錢，就跳出你一個人了？還有，那年師院南鍋爐房爆炸，你最先衝進去救人，是不是就顯你最勇敢了？你第一個給人家紀之寫大字報，是不是就你會寫字？你總當第一個，你說，不鬥你鬥誰？”

他的話引得周圍人會心地大笑。笑聲驚動了被人群堵在外面的專案人，我被急急慌慌地拽走了。

事後，專案組追問此事，問我說話人是誰，是師院哪個部門的，圍觀大笑的有誰。我一律回答不認識。專案組見我不予奉告，便到師院調查，也毫無結果。那麼多人大笑，結果沒有一個承認，沒有一個揭發，像撞見了一群鬼。

相比之下，師院開的批鬥會最爲平淡。在稀稀拉拉的口號聲中，宣佈開會，十幾個人上台草草讀一遍發言稿，又在稀稀拉拉的口號聲中，宣佈散會。

六，最後一次見吳政委

內蒙和呼市的批鬥會共五十餘場，幾乎場場我是主角。唯有一次全自治區的批鬥大會，吳濤官職比我高，爲主批者，我是陪鬥之一。吳是偽滿東北建國大學的學生，出身富裕。革命初期，吳濤在京東堅持地下鬥爭，後加入東北抗日武裝。抗戰後，進入四野蕭華部下。1953年授銜少將，任總參直屬機關黨委書記。之後，被烏蘭夫看中，動員他到內蒙軍區工作，任內蒙第一副政委。

吳濤屬東部區蒙族，烏蘭夫等是西部區蒙族，東西部之間從內蒙古自治區起，就產生誰掌權的矛盾。1965年，在整頓黨和軍隊中，吳濤成了靶子。第二年，前門飯店會議期間，吳濤被撤銷禁令，順理成章成爲左派人士，決定了他在內蒙文革中的位置。

前門飯店會議後，吳濤回內蒙軍區主持工作時，受軍區常委黃厚（副司令員）、劉昌（副政委）、張德貴（政治部副主任）、王良太（軍區參謀長）懷疑。這些人未請示軍委和中央，把吳濤打成三反分子。直到1967年2月，內蒙四方去京會談，中央才發現吳濤的遭遇。

按中央八條決定，吳濤爲革委會籌備小組副組長，一直居黨、政、軍二把手。現在，他木然地坐在內蒙體育館的被告席上，前面有張小桌，放著半杯水和一個小瓶，我知道，瓶裏有吳政委吃的藥，他的身體和精神都不好。

第五十章

專案射出“隱私彈”

經過半年多的角鬥，專案組頭頭對我已失去耐心。他們無數次敲打我的態度，逼要事實材料，急切地把我向有罪方向誘供。當審查處於有罪無罪邊緣時，私人信件中的隻言片語，男女關係的蛛絲馬跡，便成為構人入罪的有力證據。

一，有罪、無罪之爭

有一段時間，我努力讓專案人員明白，1966年6月我們造反時，只有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哪能預料到幾年後會成立什麼革委會，當上常委之類？！半年下來，如同對牛彈琴，白費唇舌，不但無人聽，反而加速厄運的來臨。

一天，叢組長一人進屋，一屁股坐在張大泉那張床上，我會意叢有話要說。叢組長先示以一個微笑，再開口：“老高，你打算怎麼辦呀？”

“我能有什麼打算，你們讓我向東，我能向西嗎？”

“我們可沒動過你一手指，可不是紅衛兵那樣，打人，罵人，無法無天。”

“我沒往這方面想過，我實在不清楚你們還要我承認什麼。”

“你是口頭承認有錯誤，一到具體事實，你哪有錯誤，你材料上寫自己和你那一夥人都對。”我從沒說過自己沒錯，但我不承認自己有罪，這是我們之間的落差。

有天晚上，叢組長下班前，突然推開我的房門，他和我辯論的題目仍是“我是否有罪”。他問我：“你有運動中喊過喊過打倒白蔭士？”

這是不是罪？”

“文革中喊打倒他們的不是幾個人，是幾百萬人，按你的邏輯幾百萬人都要定罪。難道你沒喊過？”¹

“別說幾百萬人，就說你。我？我就沒喊過。怎麼樣！你不承認自己有罪嗎？”

我不承認有罪，因為這是政治審查，不同於信教，中國人沒有原罪觀念，在罪與非罪的界限上，容不得半點含糊²。

二，私拆個人信件

1978 年春節過後，專案工作明顯抓緊，批鬥會多了，讓寫的材料多了，專案組也是每隔幾天要敲打我一次。現將我手中僅有的幾份專案組“幫助”時的記錄摘抄如下：

時間：1978 年 4 月 17 日 上午 8：40 - 9：30

任和工：你寫的材料很不像樣子，你打算怎麼辦呀？你不但把過去承認的否了，而且把眼前的東西否了。比如，在小白樓和郝見面就那麼簡單，就那幾句話，那裏還有幾個人，就按你點出的人說，你就這麼種態度呀，還是怎麼辦？

馬明正：上級提醒你檢查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有關實質問題，如北京有你的信，你有北京的信，你採取了什麼態度？這不是一般的來信，起碼是幫派範圍內的，不交待就是死路一條。

¹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審訊人員的無知、蠻不講理和缺乏邏輯，簡直可以說是司空見慣。就以反對烏蘭夫或者劉少奇來說，人們是否反對過他，而反對是否構成錯誤或者犯罪，如果離開特定的歷史條件，他們的提問本身，就顯得十分可笑。如果當時從上到下，各級黨政領導都異口同聲要打倒烏蘭夫和劉少奇，下面群眾難道可以有別的選擇嗎？

² 宗教中的罪孽或者原罪，同法律上的犯罪或者有罪，其意義有很大區別。宗教上的所謂罪，更加接近於我們所說的“過”，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並非有過，就可量刑定罪。只有在世俗世界，在法定的條款下違法之人，才可以依法治罪。這是我後來的思想昇華，當時還不可能向專案組人員講解清楚。即使能講清楚，也是對牛彈琴。

周恩鐵：你是很聰明的，經過談話做工作，你講了些問題，有進步。從最近材料看，確實有些問題。很簡單的事你不能不說，如和郝廣德談話的事。再一個是，春節以後讓你寫材料，你也寫了，從材料上看，寫的不全面，不徹底，你再考慮一下。

馬明正：你儘快交待三個問題：

- 1、 在批林批孔中和以後與郝廣德的接觸；
- 2、 北京的信件；
- 3、 批林批孔以來與包頭等地城市、農村的往來。

要反映事情本來面貌，儘快交待。

1973年3月，我調到土左旗後，在旗委大院最後一排（帶北走廊）分給我一間辦公室兼宿舍。1976年3月，調到呼市後，配有一間小辦公室。當時，我有意把土左旗辦公室三架書搬回家，那是我最重要的財富。市委第一書記郝秀山不同意，他說，今後你還要常在土左旗，那裏的工作主要由你代表市委去管，辦公室先不要動，以後要搬，派個大車，替你搬回。結果，我兩處辦公室的東西，包括許多私人物品原封未動。我是在接到通知後立即被隔離的，專案組未辦法律手續，沒有我的親屬在場，抄查了兩間辦公室，近三千冊書全部丟失，我的工作筆記、私人日記和信件統統落入專案組手中³。

我心中無鬼，自知全部文字光明正大，並無把柄。專案組卻自鳴得意，以為可以通過逼供、誘供讓我出賣靈魂和人格。

文革中，與我來往的北京朋友很多，通過信的有兩位：陳世武和智效和。陳在呼市一中畢業後，因打一手好籃球，被軍隊相中入伍，由內蒙軍區體工隊調入八一體工隊。我認識他時，他已改行為體工隊宣傳幹事。陳世武是內

³ 口述至此，我十分驚訝我當時的粗心大意和幼稚可笑，並為所有因我而受到牽連的朋友們，表示深深的歉意。從公開批鬥其他造反派頭頭的那一天起，我應該有足夠的警惕性，並從容處理我手頭的一切私人信件，無論它們對我有多麼珍貴的保存價值。我應該那麼做，也確實有足夠的時間去做。因為那些信件，不但給我帶來麻煩，更給相關的朋友們造成不必要的危險。但當時為什麼沒有做？可能是尤太忠對我的表面安慰，讓我存有一絲僥倖心理。但歸根結底，還是由於我的愚昧。我太相信自己對共產黨和毛領袖的赤膽忠心，太相信所謂“共產黨不會冤枉好人”的虛假宣傳了。

蒙人，全家生活在呼市。1968年，回家休假的陳世武對內蒙文革有興趣，自然要找人探討。

我嗜書如命，所交朋友多為愛書人士。陳世武也博覽群書，尤喜古典詩詞。初次交往，兩人由運動說到讀書，內容寬泛無邊，越談越興濃，對書的共同嗜好，成為相互瞭解的重要通道。

1974年後，陳世武曾寫信提醒我，今後的文革不會那麼順當結束，後期問題尤多，造反派會不會再被整一下也難說。我回信也談自己看法，評論內蒙、呼市當政者的施政水準等。

上述行為並不違個人通信原則，話語稍有偏頗，即便在中國，只要不涉及根本政策，不褒貶中央領袖，也無可厚非⁴。

專案組繳獲了陳世武給我的信後，赴京聯絡陳世武所在單位，逼陳交出我的回信。他們以為抓到了我“篡黨奪權”的鐵證，不時引出信中某段疑有弦外之音的文字，讓我交待深層內涵。

陳世武正在參與新組建的軍隊後勤學院，很快要破格提升。而我正被專案組逼迫交待兩人的“反黨”聯繫。

另一個北京朋友智效和，是土左旗沙爾營公社人。文革初大串聯中，智效和和許多外地紅衛兵一樣，來支援內蒙師生。智那時就讀北大經濟系四年級，靠淵博的知識和分析，贏得人們好評。

1973年，我到智的家鄉當父母官，智與我聯繫多起來。不久，智畢業分配到北京市勞動局。粉碎“四人幫”後，聶元梓退位，智效和回校執教，並派送出國到莫斯科大学進修⁵。

⁴ 這裡，我必須再次對我的幼稚和麻痺做自我解剖。所謂“私人通信自由”的觀念和實踐，在中國共產黨治下，應該說從來都沒有存在過。中國不像美國，未經法官批准，警方無權拆看私人信件和私人日記。即使從私人信件和日記中發現犯罪證據，也不具有法律效力等等。中國私拆信件和審查日記的事情，不但警方可以做，每個單位的保衛處和政工幹部也可以做。別說信和日記中議論黨政領導人，就是對本單位負責人有怨言，也可以上綱上線，置人於死地。回想師範學院外語系，在1965年社教運動中，整所謂反動學生時，就曾經有過這種事情。工作組進院後，也如法炮製。但當我被別人專政之後，好像完全忘記那些教訓，真是可悲可歎。

⁵ 幸虧這兩個受我牽連的人，在本單位處境很好，因此沒給他們造成太大的麻煩。假若情況相反，他們也正在遭受政治審查，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不知要害多少人。

對這樣的人，專案組也不放過，誓有不探出反革命聯繫，決不甘休之慨。十天後，專案組對我加倍“關懷”。請看以下摘錄。

1978年5月24日 上午9：30 - 10：40

任和工：材料看了，寫得太不像樣子，這樣拖下去恐怕沒啥好處。你寫的三個問題，從哪一個問題上講，與原來的情況出入很大，你談的和檢舉、揭發的不合攏，不沾邊兒。

周恩鐵：九大時，華北大組是怎麼個情況，當時很多人講，講這話【指九大傳達稿稱朱老總、陳毅是老右——作者】是一股風，問題確實存在，你認也好，不認也好。

任和工：陳世武的信，白紙黑字你怎麼說，你們在信中把尤太忠郝秀山兩級領導人說成是運動阻力。

你不要擺出正確的架子，你現在不是在檢查錯誤。有錯就要認，不認錯不行。

馬明正：凡是你正確的都講了，對錯誤的東西你離得較遠，如與陳世武、智效和的關係，你們來往信件中不是涉及所有的都錯，但錯的東西你不提，如怎麼議論郝秀山同志的。

郭XX：你現在不願意走戈志盛等人走的道路，不肯竹筒倒豆子，你的思想在想什麼？我們是在核實材料，提醒你，給你創造條件。

周恩鐵：叫你寫的問題沒沾邊，四平八穩，滴水不漏。你一定不講也沒辦法，有材料在，時間長短以查清問題為主，你逃不掉。

尤太忠、郝秀山兩位，一位是省級大幹部；另一位是市委第一書記，是專案組最直接的頂頭上司，我背後議論，想要幹什麼？

可惜，文革的時髦，是百姓可任意抨擊各級當權派。像我這種被文革寵過頭的人，在評論尤太忠、郝秀山時，肯定出言不遜，很忌口。我心中有數，議論一個省級、廳級幹部，哪怕他握有生死權力，能定什麼烏罪！還沒等我從謾罵攻擊尤太忠、郝秀山的反革命罪行中覺悟過來，專案組突襲了三

個要儘快檢查的問題。現按記錄摘抄如下。

1978年6月1日 下午3：30-3：40

任和工：

1、1967年造反派衝擊內蒙古軍區的起因、經過和結果。有哪些人參與了策劃，怎麼策劃的？

2、1967年5月13日河西公司南店武鬥你瞭解的情況；

3、1968年元月，以清查戶口爲名，搞了打、砸、搶、抄、抓，起因、結果怎麼回事？【指呼市群專1月17日行動——作者】

叢敬之：高樹華你聽清楚，凡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你都要說清楚，你能說清楚屬於是你交待的問題，時間已經很緊，你自己爭取主動吧！

隔離以來，從未問過內蒙軍區事件，我天真地認爲，中央有關內蒙文革的4.13決定，是毛欽定的案子，沒人能動。現在讓交待此事，肯定也已推翻。

按黨的原則，下屆黨代會無權否定上屆黨代會決議。可是，中共黨史在這點上與封建社會無大差別。新上台的領導人（或皇帝），以否定前代來殺遺臣威風，以顯新君的權威。

日子久了，我躺在床上能想清楚，站立起來又犯糊塗。我懷疑專案組不讓我聽廣播，看報紙，對我封鎖一切消息的策略是，讓我變成活死人。我豈能逃脫專案組的羅網？想到此，我心中有一種強烈的外出願望，半年了，外面的世界到底怎麼樣了？我不能按半年前的老經，跟著專案組瞎念。

三，夜行記

我被隔離在市委的南馬路招待所內。專案組有市委和內蒙黨委的硬牌子，故不准招待所服務員進入隔離室。頭半個月，換被單等事務由張大泉代勞。

中國人經不住時間耗磨，可能張大泉也不願動這種手。一個多月後，允許服務員進屋換被單，張大泉在一邊監視。再過一段時間，張大泉的監視也流於形式。有時，專案人打撲克六缺一，催促聲不斷，他巴不得一走了之。

進室內打掃房間的服務員有兩位，白面皮、大眼睛、本地口音、微瘦者姓王；黑面皮、小眼睛、北京腔、微胖者姓魏。兩人進屋儘快做完份內事，立即退出。不久兩位變一位，每週換兩次。

一天，輪到魏打掃房間，她突然低聲問我：“高書記，你不認識我了？”

“啊，真對不起，一時記不起來了。”

“我是北什軸的北京知青。前年，父母先後去世，找您幫忙上調工作，養活弟妹，您三天就幫我辦成了，您忘了？”

我在任時辦此類事不少，辦了就辦了，誰還記得。“啊，真記不清了，好像有這麼回事。”

以後，逢魏進門搞衛生，總告訴我一些專案組的事：過去每天夜間必有兩人值班，春節後常常沒人，招待所晚 12 點鎖門，她們一星期兩次夜班等等。

夏初，魏進門後告訴我一件事：前天，你母親領著你四歲小兒子來看你，老人還給你帶來飯，怎麼求專案組的人，他們就是不准。我和小王實在看不過，出面求他們，他們還是把老人和孩子攆走了。專案組沒幾個好人，心挺狠。聽到此，我的心像被重重扎了一刀，五內俱焚，我感到的不僅是屈辱和不安，我 70 歲的老母親和四歲的兒子被這幫人如此不當人待，我的憤怒膨脹再膨脹，甚至想殺人。

我不知道那幾天是怎麼過去的。幾天後，魏再進到我室內時，我問她，我什麼時候能出去一趟。她說後天是她的班，她能為我打開通往後院的小門，從後柵欄門翻出去，就是一條大路。

深夜一點鐘我逃出隔離室，心中充滿希望、激動和不安。我終於看見年邁的父母，看見正熟睡的兩個兒子。妻子告訴我許多許多外界發生的事，全國、內蒙、呼市清查運動的情況。兩個多小時後，當我再回到令人詛咒的囚

行，不僅拜見了父母，看望了妻兒，更重要的是我不再迷離。無論專案組設什麼圈套，我不會被他們推進反革命黑坑。

四，激烈交火

1978年夏天，我與專案組發生了兩次激烈衝突。

秘密夜行後，我方知新中央已經否定了前中央對內蒙文革的八條決定，但對文革的外殼未加否定，仍維持著一個總調門，其內核已把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由走資派轉換為造反派。善此技者，是中共當政者及其輿論工具⁶。他們懷揣多種版本，對剛剛發生過的事件任意塗鴉。我從心底不願意根據大形勢的改變，胡亂製造白紙黑字，更不想為逃避嚴罰而出賣自己。我和專案組的衝突是必然的。

這天上午突然而至的批鬥會上，專案組出席的人比以往多了幾人，個個臉拉得挺長，呈顯出鐵青色。叢組長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一開口便反問我：“高樹華，你自己說說你的材料寫得怎麼樣？”

“不錯啊！”我迎面答之。

“你有臉說不錯，這就是你的態度！你到底想幹什麼？”

專案人一個接一個發言，個個激昂不已，任和工、馬明正剛在全市專案會上受到表揚，發言的聲調更響亮，措詞更尖刻。

依往常慣例，專案人發言一圈，會議進入尾聲。這天，叢組長可能感到意猶未盡，就我的態度即席演講，且越說越激動，突然站起來，拿起桌上一迭材料，伸過胳膊，指著我鼻子說：

“你要是用這種材料來搪塞我們，今後就什麼也別寫了！”說完，甩手把材料摔到我胸前。

⁶ 這種手法，說好聽點，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如果說難聽點，就是偷樑換柱，瞞天過海。細細想來，這套看似高明，實則愚蠢的手法，估計不大可能出自愚忠而有幾分木納的華國鋒，倒像出自老謀深算的鄧小平或者陳雲之手。目前國內外研究文革史的著作，尚沒有人披露這段秘辛。希望將來有一天，有關這些事件的歷史檔案能夠解禁，好讓我們老百姓明白明白。

平時，我儘管不服他們教化，情緒上卻儘量克制自己，不願與他們發生衝突，深知這樣對自己不利。

這天，叢把材料摔到我臉前，我不能不表個態，以免讓專案組的人太失望。我把散落在桌上、地上的材料拾在手，同樣指向叢說：“這可是你說的，今後可以不寫了。這份材料你不要，我自己處理。”我在他們十幾個人面前，把材料撕碎，揉成一團。

這一舉動，激怒了在座的專案人，他們像瘋了一樣站起來，逼近我。我坐下來說：“怎麼，你們想打人還是想幹什麼，我承認，我一個人打不過你們一夥，但真理不在人多少。”

我聽到馬明正扯著嗓子喊：“把他捆起來，他太猖狂了，把他捆起來！”

我把雙手擁在胸前，一動不動，任憑幾個人在我周圍伸拳動胳膊。可能，叢給了部下什麼手勢，大家重新落座。

周恩鐵氣急敗壞地說：“高樹華，你已經惡劣到家了，我們管不了你，有市委能管你，你別以為不能把你怎麼樣，哼！”

周恩鐵雖然只是一個小秘書，但身份上離市委書記最近，手眼通天，他自以為高人一等，專案人對周的動態、眼色也較為重視。因此，周“哼”了一聲出了門，其他人也跟著走了。屋內只留下死樣的寂靜陪伴著我。

我轉身站在窗前，近午的太陽正燒得火燙，熱浪從窗口徐徐湧進，我寒冷的心感到了暖意。我吟起宋代詩人蘇東坡的一首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十多天過去了，像什麼也沒發生，或許是激戰前的沉默。我盡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緒，生活依舊：背英語單詞，早晨在窗前做操，打太極，任由窗下人去指劃和議論。每晚，只要有熱水必泡一澡。我知道，住招待所只是一時，不知什麼花樣正等待著我。

當然，我的心並不平靜，我思念年邁的雙親、年幼的稚子和身負重壓的妻子，還有和我同樣處境的朋友們。

此時此刻，幾個怪異的問號舔噬著我的意識：黨是誰？黨是什麼樣的？

把黨比母親，可內蒙黨委、市委、清查辦和專案組是母親嗎？哪有母親把兒子往死裏整的！俄羅斯社會學家亞·尼·雅可夫列夫在他的回憶錄《一杯苦酒——俄羅斯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中這樣說過：“當權者肆無忌憚地使用了暴力之劍，革命吞噬了自己的親生兒女。”⁷

五，人格侮辱

十多天在悄然無聲中過去。一天，魏趁擦走廊地板時推開我的門，小聲告訴，“都去市清查辦開會去了”。

終於聽到對門有了大響動，像在擺弄一台錄放機，並傳出播音聲。正在播放的是《內蒙古日報》上一長篇文章，一個與我身份相同又十分熟悉的名字連連灌入我的耳中。文章涉及內容廣而雜，我難辨真假，有些肯定有過分渲染之嫌。

第二天上午，錄放機擺進我的屋，還是昨天那篇文章，只不過掐頭去尾，僅播放此公在縣裏與幾個異性發生性關係一段，“道德敗壞”，“生活腐爛”，等字眼不斷從音箱送出。當錄放機播至第三遍時，我已從叢組長眼神中判斷出，他們今天上演的不是武松大鬧“飛雲浦”，而是西門慶和潘金蓮。

叢以極為自信的口氣問：“高樹華，你聽了三遍錄音，有什麼感想？”
“沒什麼感想，聽了而已。”

“你知道錄音裏講的是誰吧？” “知道。”

“那好，你就交待交待自己的生活問題。”

“我在生活上沒問題。”我十分強硬地回答，“我任三年旗委書記，沒

⁷ 當時我尚未讀過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更不知道中共掌權前後的歷次所謂“路線鬥爭”中，已經有過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當我恢復自由，並讀了更多名人回憶錄之後，才覺得雅可夫列夫“革命吞噬自己兒女”的說法，遠不如赫魯曉夫的“無產階級專政絞肉機”比喻更加深刻和形象。斯大林的大清洗，可以處決二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員。中國的反右鬥爭，可以把近百萬知識精英及其家屬打成階級敵人和危險分子，其中多少人被殺、被關、被勞改和下放？多少人含冤而死，病痛而死，貧困而死？同他們的命運相比，我所經受的苦難，真不算什麼。

向公社、大、小隊和社員家要過一次烙餅炒雞蛋。我經常下鄉，由生產隊派飯，按規定交錢。你們去土左旗 24 個公社、二百多個大隊、五百多個自然村去問問，我從來如此。”

周恩鐵打斷我的話，突發冷箭：“別吹牛了，上次旗裏批判會上，哈素海養水站揭發你，經常從那裏不付錢拉魚，你咋說？”

“我可以回答你，那是他胡說八道。他以水管組副組長身份，到生產隊白吃白拿，調戲婦女被人檢舉，我撤了他的職。他現在以受害者身份控訴我，你們和這樣的人站在一個戰壕裏，覺得榮耀？我是從哈素海買過魚，共三次，每次按斤數交款，按規定價每斤 3 角 4 分（1973 年價）算。只不過我每次都讓開發票，有經手人蓋章，就怕以後有人反咬，又請旁證簽了字，發票就在我手裏，你們想看看嗎？旗裏是有書記拿魚不給錢，而且是指哪條要哪條，人稱‘魚霸王’，你們怎麼不向他討教什麼是生活問題！”

周恩鐵是土左旗人，非常清楚我說的話是真是假。他臉色通紅，不能開口回答我。叢組長似乎冷靜些，擺擺手說：“你別轉移大方向，你老實交待你當旗委書記時搞過幾個女人？”

我寸步不讓，立即回擊：“老叢，你這是對我人格的侮辱。你不覺得專案組搞這種審訊太可卑、是在糟蹋黨的政策嗎？”

專案組又一哄而上，訓斥我“太猖狂”，“越來越不像話”。

叢像是已拿到鐵證，說：“我們沒有檢舉、揭發就不找你談了。你自己交待算是主動的，何必被動。你 32 歲去當旗委書記，說是副職，誰不知道你在旗委說話算數。那麼多男男女女圍著你，捧你的台，你不動心？你不會不知道土左旗流傳的一句話，‘畢克齊的蔥、土城子的蒜、北什軸的姑娘不用看’。北什軸那個地方可是出美女的，你一年去多少次，能什麼事情不發生？”

“老叢，按你的說法，32 歲當縣委書記必是慾火燒身，非當西門慶不可，有的老前輩 22 歲當縣長，按你的邏輯，那方天地還能安寧？你這個邏輯也太可笑了吧！既然你手裏有檢舉、揭發，那好，你就去定案吧。我可以立下這份供詞：在我工作過的地方、單位，如果有哪個女人站出來說我曾欺負過她，

你們不要問我，儘管去定案，算我一項罪行，這行了吧。”

儘管如此，專案組還是不肯收攤，非要我交待男女關係問題。已過午飯時間，其他專案人員已饑腸轆轆，惟恐時間拖太久，招待所飯廳關門，只有老叢一人咬住不放。我以沉默對抗。

沒想到，老叢竟以討價還價口吻對我說：“這樣吧，你就交待兩個婦女的名字，我們就散會。”

我耐著性子對叢說：“即便是我想順從你，我說誰的名字，我都不負責，對女同志可是奇恥大辱，這怎麼是討價還價的事？”

叢仍腆著臉，對我伸著兩個指頭。我順口說：“姓叢的，你若欺人太甚，我只能從你們家、你的親屬中選了，那可太難聽了。”

此話一出，專案組其他人抿著嘴笑，突然忍不住變為一哄而笑。笑聲刺激了叢，他十分狼狽，跳起來指著我大罵：“你這是流氓行為！”

我笑著站起來，同樣用手指著他說：“本來開的就是流氓會，你是自食其果，上天報應。”我提高聲調說：“散會！”

我本想開個玩笑。沒想到，老叢的部下聽到“散會”，立即擠出門，奔向飯廳。屋內只留下老叢和我，他的手仍指著我，邊後退，邊說：“你，你等著！”

鬧劇收場了。多少年來每想起這件事，我起碼為呼市市委，及其領導的專案組感到可悲。共產黨還有什麼本事？整人的本事用盡，最後的王牌是男女關係，手法比斯塔爾翻騰克林頓和萊溫斯基還低下，連表面的調查也不做，專門靠誘供和指供。

此事一個多月後，任和工、周恩鐵向我宣佈：任和工升任專案組組長，周為副職，兩個人負責專案組工作。

“老叢嘛，這個人自作聰明，你也知道，他水準不高，原諒他吧。”任和工大大方方地解釋。

我聽後倒有點為叢打抱不平，任和工、周恩鐵的水準比叢能高幾分？黨組織的決定總是英明偉大的，我不敢出口冒犯。

第五十一章

再“巡”大青山下沖積平原

1978 年整個冬天，我被一輛敞蓬運貨卡車拉著，在土左旗的公社和大隊，輪流批鬥了幾十場。我蜷縮在車槽裏，一面抵禦寒風侵襲，一面體味再“巡”這方土地的痛苦與歡樂。

1978 年 9 月初，新上任的任組長通知我，做好轉移關押地點的準備，並允許我轉移前和家人見一面，時間不超出一小時。

一，短暫浪漫的“做客”

我永遠感謝當局給我這一滿足人性需要的機會¹。

9 月 6 日下午，我被領到走廊對面另一間房，父母、兄嫂及妻子、兒子正等著我。全家人把思念、擔心壓在心底，強顏歡笑地安慰我，囑咐我注意身體。我抑制住激動，咽下湧上的眼淚，扮出“一切都好”的樣子回答親人安慰，專案組的人坐在屋內四角，眼睛緊緊盯著我們，只差沒搜查全家是否帶了武器。

在匆忙的囑咐中，我與親人分手。第二天早晨，三輛汽車向西開上泥濘路，把我押往土左旗。十餘人爲押送一個赤手空拳的書生，還煞費苦心，抽調三名武功不錯的武警。

途經鐵帽公社供銷社，汽車陷在泥濘中，我隨專案組人進供銷社內“點

¹ 當時我尚未被正式列入司法程序，按法律原則說，我還應該有行動自由，更有同家人團聚的權利。即使我被刑事拘留，也還有可能“取保候審”。然而，在權大於法的年代，我被非法剝奪自由多年，無人向我道歉。僅僅給我一小時同家人團聚的時間，我還要感謝黨和政府！公理何在？正義何在？當然，我出獄後才慢慢知道，甚至進入 21 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然看到沒有法律依據的剝奪人身自由現象，例如以“三講”“雙規”等名義進行的“隔離審查”，以及不經審判程序的“勞動教養”制度等等。

貨”，驚奇地發現貨架上有本《創業史》，這是我大學工作時喜歡讀的小說，作者爲陝西作家柳青²。我買這本小說時，任組長未加阻攔，寬容地說了一句“這是本好書”。

當天，我被羈押在土左旗舊看守所一個小院的辦公室內，絲毫沒感到身份落差，反爲燦爛陽光和滿天星斗而驚喜不已。

陽光對我太珍貴了，我已經有近 10 個月沒讓創造萬物的陽光曬曬了。在陽光下，我又得到活力。我把一盆冷水和自己放在陽光下曝曬，待曬得通身大汗，再用溫水刷洗全身，之後在院內跑步、打拳。當然，這一切都在暗中監視之下。

我自幼喜歡看日出日落、霞光白雲，喜歡仰臥在草地上看滿天星斗。每當一顆流星在天宇滑過，我會高興地大叫、大嚷、大跳。這裏沒有草地，我就地鋪張報紙仰臥在上，望著院內殘缺不全的小塊夜空，雖然只有幾顆星星閃亮，我已經滿足了。寂靜、幽黑的夜晚，眼前沒有專案組的凶光，耳鼓聽不到嚴厲的斥責，我的心漸漸融入神秘的天堂。

“你做甚呢？躺在地上！”聲音從上面傳來。崗樓上值班的武警正俯視我。星光下，我看見他肩頭發亮的槍口。幾天後，我認識了這個武警中隊的一班長，內蒙商都人。來自農村的義務兵，大多吃苦耐勞、認真行事，目的是入黨提幹，擺脫貧窮。

一次在廁所前相遇，他左右顧盼無人時，小聲對我說：“我們知道你是個好書記，有什麼事要辦的，告訴我。”我感謝他之後，警示他說：“你不能靠近我，更不要幫我，我現在不是共產黨的書記。你不能因爲我誤了自己的前程。”班長很理解我的心意，和我不再打招呼，只是嘴角上掛著一絲笑意。那時，一絲微笑對我足夠了。儘管他在訓練，站崗，體育比賽總有出眾表現，還是在超期服役一年後，返回貧困的農村老家，我爲他惋惜不已。

沒有批鬥，沒有審訊，白天曬著太陽讀《創業史》，夜晚躺在地上看星空，如此悠哉的日子只過了三天。第四天大早，專案組李永清要和我進行一次嚴肅談話。

² 陝西作家柳青，同內蒙軍區事件中殺害韓桐的兇手柳青，同名同姓，特此說明。

我第一次見到李永清是 1973 年春剛剛到土左旗任職時。一次，到兵州亥公社調研，晚上在籃球場與他邂逅。李自我介紹後，感歎自己受排擠：“在公安廳呆不住，回到家鄉把我下放到公社打雜。”之後不久，旗公檢法要充實力量，我提議把李永清調回來。常委們決定，先調回來試用三個月，合格就留下，否則再送回公社。李專門找我表示感謝，說：“還是造反派戰友理解我，你原本是我們的紅衛兵司令，現在我更要擁戴你。”我截住他的話說：“老李，你要搞清楚，一，調你來旗裏是旗委決定的，不是我個人對你的恩賜，你要好自爲之，把酒戒掉；二，我來旗委是內蒙黨委任命的，可不是造反派司令。你今後少提這派那派，弄明白這點再找我，好了，沒事你走吧。”當時旗內有三大群眾組織，李永清到處傳播我的話，恰恰幫了我大忙。幾個月後，李正式調到旗公安局任股長。

這天大早找我談話的李永清，是以專案組重要成員的身份。

“你這兩天過得咋樣？”李從一般性尋問開始。

“過得挺好。”我籠統答之。

“你白天曬太陽，夜晚看星星，好自在呀！”

“你忘了，我曬太陽時還在看小說《創業史》。”

“市委領導都知道你每天曬太陽，看小說，這太不像話了，你爲什麼不好好考慮問題，寫材料交代？”

李永清語速加快，語氣加重時，我提高聲音說：“叢組長再也不要我寫的材料了，任組長上任並未解除禁令。《創業史》是革命的小說，革命的書籍爲什麼不能讀？”

“高樹華，我一個人說不過你，我今天可是代表專案組，代表組織提醒你的，你不是曾對我說過好自爲之嗎，現在輪到你好自爲之了。”說到此處，他看一眼窗外，把頭伸向我低聲說：

“我是看在過去情份上告訴你，形勢對你可不利。呼市地區揭批查目標都在給自己上綱上線，爭取寬大，你還硬頂什麼，你一個人能頂得過這麼大的運動？到時候非把你嚴辦了不可！”

我同意他的分析，但從他飛速轉動的眼珠後面，似乎閃動著什麼，我不

敢輕易接受他的好意。我打斷他的話，也放低音調說：“嚴又怎麼樣，無非是逮捕，判刑，到頭了吧！我已經被剝奪得一無所有了，我決不會丟掉人格，編造置人於死地的材料。”

不知爲什麼，這次談話後，再沒見過李永清。

幾天後，給我換了新住所——察素齊北山坡即將竣工的新看守所。兩年前一場大雨把舊看守所沖塌了，我帶著旗委的緊急報告，向呼市、內蒙申請到款項，並和當時公檢法的幾個頭頭一塊選址。如今，看守所建成，我成了第一位囚徒。

住入自己建的看守所，不論多有諷刺意味，我很快喜歡上這個地方。高牆大院，房前幾畝大的開闊地，讓我心曠神怡。我每天清晨在門前平地上跑步、打太極，隨時可以曬太陽，看夜空。

二，與硬漢銀魁的特殊會面

入住新居後幾天，“做客”生涯結束，批鬥開始。

第一場自然從旗裏開始。全旗召開了萬人有線廣播大會，陪鬥的是土左旗革委常委，察素齊高中紅衛兵頭頭張銀魁。

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兩個紅衛兵在旗委禮堂門口相遇，銀魁雙手的鐵銬，表明他已被捕。他削瘦了很多，雙眼閃爍著不屈。在公安人員簇擁下，我伸手向他打招呼，他用微笑回答。他走在前面，上了台階，伸出左腿踹開禮堂的自動木門直衝會場，他抬腿瞬間的堅毅、果敢，永遠印入我的腦海。

主席台上除市委秘書長、負責清查的王德義和專案組負責人，多是曾共事幾年的熟悉面孔，我迎上去一一與之對視，多數目光逃避，幾位示之微笑，幾位示之冷漠。主席團一側帶領呼口號的，和過去一樣，由烏蘭牧騎的兩位小夥和兩個姑娘擔當。他們與我極熟。當我的目光從主席台巡視到他們那裏時，他們毫不迴避地給我一個燦爛的微笑。

批判大會按準備好的程序發言，一個下去一個上來，中間插入“打倒”、“鬥爭到底”之類口號，與文革時的批鬥會沒有任何區別，只是沒掛牌子坐

噴氣式，體現出領袖華國鋒的英明。

大會在口號聲中結束，會場主持人一聲令下“把四人幫骨幹分子高樹華及其同夥張銀魁押下去！”我和銀魁被推搡出會場。在禮堂門口，我高喊了一聲：“銀魁，要保重，一定要活下去！”銀魁聽到我的話，用力抗擊員警的推搡，使勁回頭看了我一眼，很快被塞入一輛北京吉普³內。

當晚，我再次受到專案組特殊照顧。昏暗的燈光下，副組長周恩鐵對我怒目而視，讓我老實回答：“爲什麼不脫帽，不向人民低頭認罪？爲什麼違反隔離紀律？你對張銀魁喊‘要保重’，‘要活下去’是什麼意思？是否聯絡暗號？”

我本想不回答無中生有的問題，爲了早恢復室內安靜，我平靜地解釋說：“我感冒了，才不摘帽，這與低頭認罪無關。如果摘帽子就等於認罪，我從今天開始，永遠不戴帽子，可以嗎？”

“和張銀魁打招呼，很自然，我們在一起共過事，打個招呼是人之常情，我有打招呼的權利。‘要保重，要活下去’，這話的意思很清楚，沒有隱含第二或第三層意思，更不是什麼暗號。怎麼猜測是你們的事情。”說到此，我真擔心，這件事會給銀魁帶來麻煩。十年後得知，當晚，公安局專審銀魁，銀魁照實回答，抗拒誘供，結果給銀魁戴上八斤重的腳鐐⁴，一戴就是半年！

三，難以交差的發言

運貨卡車遊鬥隨之開始。第一站是我蹲過點的大岱公社。

卡車沿著我熟悉的砂石路飛奔，這條路拓寬路基，鋪平路面工程我指揮過，路上有我勞動灑下的汗水。汽車過了公佈村，眼前便是我無數次騎車出

³ 再見到銀魁，已是十年後了，他正在北京貴友大廈旁的秀水街給連襟看服裝攤。銀魁不愧是條漢子，不久，他擁有了自己的攤位。他不僅有服裝生意，還開過飯店和文物店。我們在他的服裝門面內交談時，他不時地操著不熟練的英語、義大利語與老外做生意。

⁴ 即使按照中共自己制定的監獄規章，如此重量的鐵鐐，不是給政治思想犯準備的，只對死刑犯和十分危險的刑事犯，才偶爾使用。可是土左旗的拘留所，不但以態度為藉口，非法給銀魁使用，而且一用就是半年。

入的大岱。遊鬥隊伍進村後，近千人站在路兩旁，人群中閃現著許許多多熟悉的面孔，有的一起勞動、學習過，有的一起吃過飯。上次到大岱是1976年夏。土左旗遭遇幾十年未遇的洪災。水，一眼望不到邊，玉米頂端的葉子在水中飄搖。當時，我在抗洪第一線任總指揮。一天下午，我在大岱村西的防洪堤上岸，剛剛空投過的直升機把全村人驚動了，村西人湧如潮。大隊支書梁三老漢又黑又瘦，兩眼熬得通紅。他緊拉著我的手，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當時，我不僅受到救星般的擁待，還看到許多人流下了對黨和政府感激的淚水。

時隔一年多，我不再是防洪總指揮，而是反黨罪人，在同一個地方，面對同一群人，接受全體社員的批鬥。進村後，每個口號極有針對性，“打倒四人幫骨幹分子高樹華！”“高樹華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批鬥會上，第一個上台發言的是大隊支書梁三。我深信，他此時批判我和一年前在洪水堤壩邊迎接我一樣，感情真摯，只不過一年前的激動、喜悅變為眼前的憤怒、嚴肅。

因我曾在大岱公社蹲點，這裏被劃為四人幫重災區。陝西營子大隊，是我的試驗點，自然是重中之重。陝西營子大隊黨支書王喇嘛，代表黨支部和貧下中農發言。

這個發言實在難以交差，開頭和結尾給我扣了幾個大帽子，幾句打倒，幾句聲討，幾句清算流毒。中間大段引述《內蒙古日報》社論、《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及《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指示，勉強湊夠規定的發言時間，王喇嘛對著話筒呼了幾句“打倒四人幫”之類口號，急匆匆跑下了台。

這樣的發言自然逃不過清查辦的眼睛。會後，兩級官員到村內調查發言稿是怎麼寫出來的。陝西營子黨支書張高寶是土改時的老黨員，他對調查人說：“稿子是我審的，我是一把手，有什麼事衝我來，王喇嘛年輕，他只是上台念念，與他無關。”

王喇嘛卻另有答案：“稿子我一個人寫，一個人代表黨支部去發言，沒和支書、支委研究，責任我一人承擔。”

其他支部委員，又是另一番話：“這個稿子是支部開會審定的，你們說，

我們的稿子淨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這有什麼不對，那是黨中央的聲音，難道讓我們抄台灣、美國的報紙！”未調查出子丑寅卯，但陝西營成爲揭批查的反面典型。

八十年代末，王喇嘛響應改革之風，單槍匹馬到包頭參加建築隊一年多，回村組織陝西營子建築工程隊，參與包頭、呼市、巴盟等地的施工建設。王喇嘛最早成爲村中首富。

四，冒充幹部闖禁室

批鬥會結束，專案組人員，在公社領導陪同下去吃飯，我被押回公社大院會議室。膽大的公社幹部進屋和我打聲招呼，膽小的趴在玻璃窗外向我擠眉弄眼。這時，突然有個人推門進來，大聲對專案人說：“我姓劉，也是這公社的，你快去吃飯，我來看管，他跑不了。”可能專案人餓極了，也可能被來人的“合法身份”降服，放心離了屋。

來者原來是陝西營大隊會計劉興勝。他平時愛讀《三國演義》，方圓數十里，許多人佩服劉興勝有韜略，點子多。我和興勝子先對視大笑，之後他得意地說：“我只動個小拇指頭，一個調虎離山計，他就乖乖走了。專案組人盡傻瓜。”

之後，他嚴肅地說：“我來是老支書要告訴你，咱們村可沒有說你壞話的，你放心。不知你有沒有讓我們幫助的事情。”

“我最惦記村裏那口井，不能讓水總是自流，地下水是有限的。去年，我捎話，讓你們學新疆的辦法，這井水可是全村人的命根子啊！”

“你快悄悄兒吧⁵！去年你捎回話後，我們就封閉了，井水不自流了。唉，你這個人，自己挨著鬥，還想著村裏那口井。”

“我不在乎批鬥，反正我身不由己，總有落實的時候，不是事實，我怕什麼，我又沒做虧心事。”

⁵ “悄悄兒”爲當地方言，在不同話語環境中，可有不同意思，例如“廢話”、“住嘴”等等。此處的意思是“不要說了”。

“這就對了，你要想開。”

公社伙房師傅三娃子，端了大碗燴菜和烙餅走進來，看見興勝子說：“原來是個你啊！市裏、旗裏來的人正問公社書記，有沒有個姓劉的幹部，你真膽大！”

“我怕什麼，我他媽的不過是個農民，誰還能開除我地球的球籍！”⁶

“你不怕，還連著人家高書記呢，你快快走，那些人快吃完飯了，好漢不吃眼前虧，虧你還熟讀《三國》！”

興勝子走了，三娃又從衣服大襟前掏出一堆大蒜、辣椒，直往我衣兜裏塞，讓我回到住地慢慢吃。

吃過飯，大卡車載我離開大岱。汽車剛起動，圍在汽車周圍的孩子，從身後取出各種各樣小包往車上扔。車上監管我的專案組人沒攔住，急問我，這些是誰家的孩子。我回答說：“我哪能認住，孩子長得快，一年一變。”

1978年冬，批鬥結束了，看管人員不見了，身邊少了監視的眼睛，我感到自在輕鬆。十二月初一段時間，土左旗老鄉打聽到我被關在這裏，幾乎每天來送東西。由於專案組一再告誡我，不能走出大門，不能到門口打招呼，因此，我至今不知來關照我的鄉親的姓氏。開始，看守所人員把送來的東西收下交給我，不久，被旗裏發現，明令看守所不准收東西，並驅趕來探望我的人。

我的房間靠近看守所東牆。一天上午，我正在院內讀書曬太陽，突然一塊石頭從牆外飛進，接著傳來擊打牆面的聲音。我走過去和牆外一問一答，方知又是陝西營子劉興勝。他說牆外十分安全，沒有人，這是他再三偵察後確定的最佳方案。雖然我們隔著三米高的牆，在寂靜中，無需高音可交談。從此，我能看到報紙，能讀到自己要的書。在鄉親的關照下，我的物質生活比當書記時要好很多。他們送來的都是自己節省下的好吃的。

興勝開關的通話方式終究不妥，我怕把他牽連進這場是非中。很快，我

⁶ 農民經常把種地戲稱“修理地球”。“開除球籍”是指連地也不讓種的意思。由於中國戶口制度的人為分割，農民處於二等公民地位。這種類似印度“賤民”的社會身份，使他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去，除了身上的鎖鏈。這或許可以解釋，同城市職工和幹部相比，何以農民講話更為大膽，維權行動中更少有顧忌。

們找到更方便、更妥當的辦法。

五，受我牽連的人們

時間會淹沒記憶。大小批判會的發言，我大多已忘記。但對有些人的發言，我是很在意的，而且永志不忘。

土左旗宣傳部的杜存義，因長相面少，大家均稱他“小杜”。去幾次宣傳部，小杜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套舊黑色外衣，總在忙，鼻頭汗珠漣漣。漸漸聽說，小杜家庭出身地主，且只有高中學歷，他只能馬不停蹄地工作以彌補“先天不足”。

1975年，旗宣傳部辦了一份“總體戰快報”，我選小杜為常任主編。這張不定期的內部小報，果然在小杜手裏辦得有聲有色。我們的聯繫由此多起來。對他的入黨問題，我詢問過他們的部長，表示過自己的看法：不能因為一個同志家庭出身是地主，就拒絕人家的政治要求。我成了反面角色後，能推測出小杜的處境，我後悔當初用小杜辦報。

在一次全旗批鬥會上，小杜上台揭發批判我，我心裏高興。他能洗清自己，我就滿足。小杜的發言並沒使他獲救，他被趕出宣傳部，分到旗誌辦。直到退休，仍沒有入黨。

大岱公社批鬥會上，上台發言的有大岱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李金蓮，是位20歲剛出頭的姑娘。1974年，我和旗委幾個人在大岱公社蹲點時，大岱大隊正調整領導班子。工作組徵求黨內外幹部背對背意見之後，人選相對集中在李金蓮名下。公社閭副主任帶領我們前往公社中學，當面考察在此教書的李金蓮。徵求李金蓮意見時，她直率地表白了憂慮和擔心：“這個大村子從來是幾大戶說了算，我們家屬於外來戶，不好辦事，工作肯定難做。”黨員大會上，多數黨員選李金蓮任支書，老支書梁三反對，同意讓李當副支書。李金蓮憑著不怕吃苦、處事公道，很快在大岱黨員和村民中站住了腳，受到普遍肯定和讚譽。

對許多批鬥發言，我基本能分辨出，是出於表現，還是為洗刷。我為李

金蓮能獲得洗刷的機會慶幸，並希望她不要受我牽連。真正的不幸還是發生了。當我從看守所出來後，從鄉親口中得知，大岱的李金蓮、鞏家圪旦的鞏官收、小沙金兔的丁稱心，還有陝西營子王喇嘛均遭厄運。

六十歲那年一個夏日，我清晨照例在博物館門前小花園鍛煉，一位中年裝扮的婦女站在我面前，叫了聲“高書記”，正是李金蓮。她說，昨天早上騎車路過這裏看見我，怕辨認不準，今天又拉來她的丈夫，一塊兒分辨。她丈夫是土左旗芷芨梁人，是在批鬥會上認準我相貌的。當年秋天，他參了軍。

三人坐在公園的石板椅上說到中午。開始，金蓮還能抑制住眼圈內滾動的淚花，後來，淚流不斷。對於她講述的那麼多人間不幸，我只有同情，別無他法。下邊是李金蓮的遭遇。

李金蓮雖然揭發、批判了我，旗委根據“除惡務盡”精神，撤銷了李金蓮的大隊副支書，並停了她的黨籍。經半年多反省後，李提出再回大岱中學教書的要求，回答是“不允許”。後來，李準備報名參加全國高考，鄉裏說她“沒資格”。李要外出打工，鄉裏“不批准”。李金蓮說：“在被逼得走投無路時，我想死的心都有。這時，他（指丈夫）正好從軍隊復員，派人說親要娶我。好在他人品不錯，我已經失去活下去的信心，嫁誰不行，只要能跳出這個受管制的地方。臨嫁前幾天，一個鄉幹部悄悄向我解釋：不是鄉裏人跟你過不去，是旗裏不放過你。你到了芷芨梁後，最好儘快離開土左旗，走得越遠越好。結婚後不久，我們一起到呼市打工，有了原始積累，現在開著一家小商店。”

李金蓮十分感歎地說：“我女兒去年考到北京一所大學。一轉眼，我老了，一場運動能葬送人一生。我剛到呼市時，白天打工，晚上讀自考課程，終於有了一張大專畢業證。其實，對我這種年齡的人沒多大用處，我只想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價值。”

“我的黨籍，從那時一直停到現在，我沒找過，也沒人向我解釋過是怎麼回事。”

第五十二章

選擇“寧折不曲”之路

1978年漫漫冬夜，我反復咀嚼批鬥會上提示我所犯的“罪行”。如果說，以華國鋒爲首的黨中央，表面上還承認文革是偉大正確的，那麼，三中全會設定的鄧式版本，爲我預備的則是叮噹作響的鐐銬。

一，《公報》定終身

與看守所大牆外的對話中，我談起看報紙的願望，對方急中生智，想出一個妙法：說服察素齊第二中學（離旗看守所僅有兩公里）管廣播的老師，把高音喇叭變一下方向，廣播聲音順著西北風，清晰地送到看守所院內。從此，每天晚七點半，我能聽到中央台的晚間新聞。恰在這時，從廣播中聽到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全文。

那是個天高風急的夜晚，北風吹來的鏗鏘播音，撞擊著我的心靈。我站在空曠的大院裏留意每句話、每個字。新聞聯播結束，大院又恢復了死樣的寂靜，我趁著記憶仍然清晰，把重要內容記錄下來。那一夜我無法入睡，反復思索。

《公報》最令我震撼的是鄧大人的魄力。毛領袖去世二年多，他先把紅衛兵、造反派送上審判台。之後，通過黨的合法手續，把文革一筆勾銷。我不由想起“九大”上，毛領袖說到鄧小平給他寫了一封信，做出“永不翻案”的保證。鄧被毛打翻後，寫信給華“願意爲黨工作，追隨華主席廿年”。鄧再次上台後，使用兩個“凡是”¹，將華斬落馬下，登上最高寶座。

¹ “兩個凡是”是華國鋒在毛去世後，代表中央發表的兩條意見：“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被後人簡稱為“兩個凡是”，而堅持上述主張的人，則被稱為“凡是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凡是派被改革派鬥垮，華國鋒黯然下臺，鄧小平第三次東山再起，開始改革開放時代。

情緒平靜後，覺得公報也有令人讚歎的精髓。全會更明確了國家改革開放，走現代化道路的堅定信念，公報說出了億萬人民的心裏話，也讓我對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充滿希望。

1983 年夏，我從看守所釋放出來，雖然仍受到公安人員的監視，但同當年文革挨整的人相比，我的日子要好過得多，我終究沾了鄧大人改朝換代的光。

20 世紀 90 年代，我曾有過幾年國外之旅。當時，休克療法使俄國經濟步入深淵²。相比之下，中國經濟起飛令俄國人羨慕不已。溢美之詞在波蘭、匈牙利、捷克等地也不斷聽到³，自豪感油然而生。鄧具有一般政治家無法比擬的手腕，他創造了奇跡，也不停地輪迴在怪圈內，走不出封建王朝遺傳的軌跡⁴。這是中國文化基因使然，還是需要尋找其他原因？值得思索。

二，小小生靈 鏢鏑聲聲

² 對於俄羅斯經濟困境的嚴重程度，我們要公正評估。本書開頭，曾描寫過俄國普通居民的物質生活，那還是經濟困難時的情況。近年來，聽說俄國經濟大有起色，盧布的大幅貶值已經停止，並有所回升。物資的匱乏已明顯緩和。以購買力計算，俄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接近四千美元，而中國是一兩千美元。另外，俄國土地廣袤，能源充足，全民（包括農民）基本享受公費醫療和免費教育，城鄉居民基本享受免費住房和免費供暖，這些都是中國無法比擬的。

³ 關於中國和蘇東改革模式的成敗優劣比較，其實遠非人們想像得那麼簡單。也許在八十年代看來，上述簡單邏輯似乎成立，但進入九十年代，特別進入新世紀之後，俄國東歐改革的後勁開始顯現，而中國改革的攻堅戰，則越來越進入最困難階段。起碼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看不到中國有深化改革的任何跡象。因此，有美國學者形象比喻，說改革開放的最困難之處，是如何跨越私有制和民主化的門檻，跨越這道門檻，就好像跳越一道壕溝，你不可能分兩次跳越。本書不想全面評價兩種改革模式的優劣，但可以這麼說，從改革的前期看，中國的緩進改革，平穩而高效，但腐敗叢生，隱患積累，副作用明顯；改革的後期會是什麼結果，是否有可能被俄國東歐超越，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⁴ 同樣，我們也無意在這裡全面評價鄧大人的歷史功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如同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大人物一樣，有其獨特的貢獻，也有其難以超越的歷史局限。此處僅舉三條：第一，他心胸不夠開闊，缺乏大政治家的氣度；第二，他注重實用，糾纏細節，缺乏哲學思維和理論涵養，無論“貓論”還是“摸石頭”，都是只看樹木，未見森林，對於中國的長遠發展，難有指導性意義；第三，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罔顧黨紀國法，運用非常手段，逼迫兩任總書記下臺，為制度化的權力轉移，開了壞頭，樹了壞先例。

那年冬天與我作伴的僅有一對小生靈。一天上午，我踏雪散步，偶然在南牆根下一個小石縫中，發現了一隻正在曬太陽的蟋蟀。一定是大雪把它趕到這裏避寒。從此，我每天從伙房撿菜葉和土豆條，供它食用。我們幾乎每天上午 10 點會面，凡有陽光的天氣，它肯定蹲在縫口，等待我送的美味。不久，我發現牆縫裏還有另外一隻與它相依爲命，我爲它們慶幸。多麼可愛的小生靈啊，可是，在這個看守所內，它們聽到的只是鐐銬聲聲。

1979 年，看守所幾乎天天有新的“客人投宿”，開始僅是夜間，搞得大鐵門響個不停。後來，白天也從押解的汽車內走出帶手銬的人，其中不乏熟悉的面孔。爲了趕建看守所工程，看守所組織嫌犯出工。能在陽光下勞動，呼吸到新鮮空氣是一種享受。當然，這種特殊待遇，需要家裏人打通關節才能得到。我知道他們出工不易，相互只能用隱蔽的眼神打招呼。

管理幹活的人叫陳傑，是土左旗善岱公社人，因在外包工，以搞資本主義罪名被關押進來（半年後，他被無罪釋放）。陳傑是我初中同學，可以到我屋裏喝水，短暫交談。這樣我才知道，土左旗清查運動，已經抓捕了近二百名人犯。

“號子裏擠得滿滿的，都是一色政治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有的是，局長、科長，號子外邊還有你這個旗委書記，全了，能組成一個旗委領導班子。”陳傑還告訴我：“抓進來的人中，年齡最大的是沙爾沁公社小營子大隊支書雲二旦，已經 70 多歲了。資格最老的是旗工業局副局長李旭起，解放綏遠時，從河北來的小八路。”這批政治犯中，雲二旦不能不多談幾句。論血緣，雲二旦是烏蘭夫夫人雲麗文的長輩，是苦大仇深的貧農領袖。

雲麗文的一個至親，由於行爲不軌，被雲二旦爲首的村黨支部戴上壞分子帽子。1964 年，四清運動時，進駐小營子村的工作隊，首先瞄準雲二旦，勒令檢查。1966 年初，烏蘭夫遭到批判，雲二旦自然成了反烏左派，並被請到北京與烏蘭夫面對面鬥爭。樸實的雲二旦哪裏知道，那其實是另一種被利用。

打倒四人幫後，他的對手不再“心慈手軟”，乾脆把他投入大獄。70 多

的雲二旦，雖拄著拐杖坐監獄，但一如既往地硬，不屈服任何權勢，最終被判重刑，背著囚徒的名份離開人世。

三，十足的政客

土左旗的大肆抓捕，到 1979 年初突然放緩一陣，原因不得其解。2002 年 3 月，我親耳聽到熟悉情況的人敘述之後，才知一二，馬上寫在當天的日記中。特摘抄一段以饗讀者。

2002 年 3 月 9 日，氣溫-5℃—-8℃

下午三時，去內蒙政府大院 23 號樓拜見王鎮，我們已經 20 多年未見面了。王鎮於 1975 年和內蒙黨委政研室主任趙旭，一塊兒去土左旗蹲點。1977 年底，工作隊撤離，王回政研室任副主任。王鎮說：“1978 年初，尤太忠找我們研究全區清查運動情況時，我們說逮捕審查的已經超過了一萬人，不能再抓了，否則就只好放了。”

“1978 年下半年，周惠到內蒙……。” “1979 年 1 月，周惠主持召開黨委工作會議。出現一種傾向是揪尤太忠幫派人員，共點了二、三十個廳、局長的人名，我自然在其中。接著又要揪‘二王’（王鋒、王逸倫）線上的人。”

“由於我們不同意周對內蒙的敵情估計，不同意他的極左觀點，結果他變相整人，把黨委政研室降一級，歸入辦公廳管。”

“周惠這個人當年被打成右傾分子，但他自己又是搞階級鬥爭，搞極左的高手。”

與周惠打了多次交道的王鎮，終被趕出黨委政策研究室。我問王鎮：周為什麼在內蒙拿清查開第一刀？他認為，其實，周惠也清楚，清查運動搞了一萬餘人，應該差不多了。但他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讓別人服他這個第一

書記，才不惜違背黨的清查政策。“十足的政客”，這是我聽到清查情況後，對隨意玩弄政策之人發出的由衷感歎。

四，如何申訴

在“唯恐不左”的大氣氛下，專案組對我的審查結論如何，可想而知。不久之後，一份經過精心拼湊的《審查報告》終於出籠。下面，節選審查報告中部分內容，並做粗淺評論：

在最重要的第一節中，《審查報告》共列舉了5條主要罪狀。

第一條，“高樹華第一張大字報，把矛頭對準師院黨委並大反工作組。”這些均是事實，但對這些事實的認定和定性，如果拋開歷史條件，便毫無意義。當時毛澤東固然是在利用我們，但他還有起碼的自信心，敢於讓青年人運用四大，向當權派發起挑戰。今天的新權貴們，還有哪怕一丁點的自信心嗎？⁵

第二條，“一月風暴”“報社奪權”等事實。這些更屬於毛領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偉大戰略部署”，如果有錯，首先錯在中央決策，我等草民，無非充當了毛澤東和四人幫的馬前卒而已。至於後來被捧上權力寶座，接著又被打入囚籠，那都不過是上層政客玩的花樣，與我們草民的主觀意願毫無關係。

第三條，軍區靜坐，韓桐被殺，攻擊解放軍等。這些罪名可以隨便寫，隨便定，但改變不了歷史的本來面貌：不是小人們活得不耐煩，編著法子造反，而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來龍去脈，情節起伏，本書已經著墨很多，讀者可做自己獨立的判斷。

第四條，“四.一三以後，把黨、政、軍老幹部打成“二月逆流”急先鋒、

⁵ 說來奇怪，當年毛澤東一手遮天，指鹿為馬，甚至冒黨內多數派的強烈反對，發動不得人心的政治運動，但他信心十足，敢於發動基層群眾，讓他們有某種說話的權利。自從鄧小平掌權以來，搞的是改革開放，甚得民心，也確實給老百姓帶來許多實惠，但各級官員，卻越來越缺乏自信。大字報禁了，連網上交談，也要受到網警干涉。這究竟是因為領導權威日益遞減？還是因為人們的思想已經衝破禁錮？對此現象，文革研究者應該深入探討。

黑幹將，把廣大群眾打成“老保”。首先，我們的所作所爲，基本是落實中央八條；其次，我個人所發揮的有限作用，應該說建設性爲主。硬要說我們想把事情搞糟，邏輯不通。

第五條，大搞挖肅，兜售江青的“文藝黑線專政論”，誣陷烏蘭夫，迫害幹部群眾。這一條更不值一駁。給烏蘭夫定調，挖文藝黑線也好，都是從上到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等，都難辭其咎。再說，從本口述史的字裏行間，不難發現我曾經持有保留意見，也盡力保護了一些小人物。

新任的李組長，在馬明正引領下向我宣讀《審查報告》。馬因對我敢打敢拼，現已升任副組長。

宣讀畢，馬說：“簽字，簽字，簽字！你有什麼意見，限三天寫上來。”說著，他拿著材料和一枝筆走到我面前，我伸手讓馬停步。我面對李說：“材料僅僅給我讀了一遍就讓我畫押，這是不可能的。要讓我簽字，我必須把材料認真讀一下，讓我把要點記下來，我肯定要寫申訴材料，否則，我不會簽字。”說完，我出了屋門，從身後傳來馬明正暴躁的怒吼：“你們看！軟硬不吃，猖狂得很，他根本不把專案組放在眼裏。”我在屋外踱步，聽到屋內爭論，新來的女同志說：“老馬，你也太急了點，那麼快念一遍，就讓他簽字，他能簽嘛！這對他一生都算一件大事。況且，我們應該聽聽他怎麼說，也好回去交待……”

約十幾分鐘後，一位年輕男士把我叫回屋內。馬左派一臉怒氣。恍惚間，文革前及文革中，熟讀毛著作的我，活躍於政治中的我，此刻似乎移栽給了馬明正。我厭惡他的面孔，也厭惡從前的我自己⁶。李組長操著內蒙普通話說：“老高，你可以過目審查結論，可以寫申訴材料，你需要多長時間？”

我平靜回答：“這關係我的政治命運，我的後半生，專案組有半年多沒來過人，我想也不會在乎那麼幾天吧。審查結論，我要抄下來。我最快也得

⁶ 俗話說“將心比心，不用問人”，我通過體驗別人的嘴臉，終於看清了自己曾經有過的那副嘴臉。我擔任黨團幹部期間，文革造反期間，儘管沒做過虧心事，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念，對敵鬥爭立場分明的態度，以我紅五類的家庭背景，個人經歷，整人的機會多，被整的機會少。我想借此書出版，對所有直接還是間接被我整過的同學和同事，深深道個歉，說一聲“對不起”，並表示由衷懺悔。

廿天交申訴材料。”

沒等我話音全落，馬明正搶先回答：“不能讓他抄錄，更不能答應他廿天時間，他不同意就拉倒，算他拒絕簽字。”

我瞟一眼其他專案人員，他們以吃驚的目光打量著馬明正。這也是我最後聽到馬左派說話。負責看管我的小劉事後告訴我，在回呼市路上，老馬與其他人一路爭吵“左”“右”問題。其他人拒絕與馬明正共事，馬離開了專案組。李組長同意我的要求，於是我開始寫申訴材料。

在最後的申訴上，態度當然又成了核心問題。在蟲聲啾鳴的夜晚，在滿天星斗的天穹下，我讓自己平靜下來，在理性思考和詞語之間編織一座獨木橋。如果我承認自己十惡不赦，那麼和此人一起幹事的人豈能脫得了干係。他們有的已經回家，有的即將自由。若由我挑起新事端，再給他們帶來不測，我必然成爲千夫所指⁷。但是，如果我選擇“寧折不曲”，拒絕認罪。那麼，我極可能被判刑勞改。當我以一個勞改釋放犯的身份重返人間時，可能已垂垂老矣……。我年邁的父母怎麼辦，特別是多病的母親。妻子的肩負最重，她每時每刻忍著世人的冷眼工作，回家又要照顧老人、孩子。兩個幼子不到十歲已失去父愛，只靠月薪 49.5 元的母親怎麼養大？十多年來，妻子一直擔心，我的赤誠和執著會惹來麻煩。如今，她的擔心成爲事實，她怎麼能扛得住呢！想到此，我雙腿一軟，跪在草地上，對著滿天星斗，對著無語蒼天，不由地失聲痛哭⁸……

五，未曾申訴，罪名已定

⁷ 決不連累同志和朋友，是我決定“寧折不曲”的最重要因素。為什麼下此決心？我認為是道義責任心使然。水滸英雄為朋友兩肋插刀，變法英雄譚嗣同慷慨就義，這些都是我的崇拜偶像。雖然我為家人所蒙受的苦難而揪心，但在“忠義”二字面前，親情只好退居次要。古人所說“忠孝不能兩全”，正是我當時的心境。

⁸ 處於困境之中，我曾經反復掂量過自己，檢視前半生的經歷。從個性上說，我比較注重義氣和感情，對於孝道和兒女親情也十分看重，缺乏無毒不丈夫的曹孟德氣概。這樣的個性，其實不適合於搞政治，特別是中國政治。我的真正愛好和特長，是文學和文藝創作。但陰差陽錯，稀里糊塗投身政治漩渦，且難以自拔。如果總結經驗，這恐怕是我最應該記取的教訓之一。

9月，我向李組長交申訴材料那天，李像走過場似的，給我做了最後一次思想工作，無非是端正態度，認罪爲好，並詳細介紹了戈志盛在審查中的表現。時到中午，專案組走了，看管我的青年工人小曹去吃飯。我回到房間，發現桌子上有一個打開的筆記本。筆記本是誰的？我拿起一看，不由被上面記錄的內容吸引。

筆記本原來是李組長的，上面記錄了三次會議的內容，主要是以什麼名義對高樹華逮捕法辦：反革命分子、反黨分子、還是幫派骨幹分子……我明白了，“敬愛的黨”還未看到我的申訴，早已定了我的罪名，既然如此，我的申訴又有什麼用呢！

下午，我將筆記本交給小曹時，告訴他，我已經拜讀過了。小曹翻了一下筆記本，趕忙和我建立攻守同盟：“如果有人問你看沒看過這，你絕對不能承認。我交筆記本時說，是我回來在自己床上發現的，高沒看過。”看到他乞求的眼神，我知道這與小曹的政治前途有關，我痛快地答應了。

實際上，沒人再過問筆記本一事。1979年10月中旬的一天，專案人員把我塞進一輛舊北京吉普車，急急駛入土左旗旗委大院。上任不久的呼市市委書記布赫，要和我談一次話，以示黨的最後挽救。政策攻心之後，布赫手拿我寫的申訴材料說：“現在不是你認罪不認罪的問題，你對專案組的審查報告逐條逐句地駁斥，連標點符號也沒放過，以一種嘲弄的口吻對待這個結論。專案組是代表黨組織的，這是你對黨的態度！我實話對你說，如果戈志盛的問題算一個巴掌，你的問題連這點也沒有。”他說著用左手掐著右手小姆指中間。

“可是，對審查的態度，全自治區相比，數你惡劣，惡劣到無法形容的地步。”說著，布赫從手邊皮包裏找出一份材料扔給我說：“你自己看看，戈志盛是怎麼對待組織審查的。”

我翻到材料的最後一頁，戈志盛用鋼筆寫的幾行字像芒刺紮眼：“我是個罪惡極大的人，對黨，對人民深感羞愧。我決心洗心革命（戈也將“面”字誤寫成“命”字——作者）重新做人。我完全同意專案組的審查結論。”

我能說什麼呢？我只能說，我不是戈志盛。布赫伸手把我寫的申訴遞給我說：“你現在可以收回這份不像樣的東西，重寫一份認罪報告，要揭發自己和他人怎樣反黨亂軍，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樣你有希望得到和戈志盛一樣的對待。”

我謝絕了。布赫很生氣，他邊站起來邊說：“像你這種與黨和人民頑抗到底的人，誰也沒辦法，只有死路一條。”

對他的話我並不意外，我對他說：“謝謝你的好意。我相信，監獄是人蓋的，就要有人去坐，無非如此吧！”⁹

六，“態度惡劣”，鎗銀入獄

一周後，呼市市委在工人文化宮召開清查四人幫骨幹分子的寬嚴大會。我和戈志盛被押在主席台的兩角，他坐在西側，我站在東側。相繼有人上台發言：先批林彪、四人幫，再聯繫我們兩個人，最後支持戈繼續反戈一擊，指出我只有死路一條。

大會最後宣佈：戈志盛當場解除隔離審查，回家團聚；對高樹華將進一步嚴查到底。在一片打倒聲中，我被押出會場。

1979年11月2日下午，我正在隔離的屋前散步，呼市公安局楊、徐兩位預審員，拿著市檢察院下達的逮捕證，在土左旗看守所新來的所長引導下，對我宣佈逮捕。預料的一天終於來臨。

他們叫我進屋，讓我在逮捕證上簽字，我斷然拒絕。所長十分憤怒，從腰裏拿出一副老式黃色手銬，粗暴地給我卡在雙手，我的手腕被卡破，鮮血流出。他邊卡邊罵：“就你這號的，還拒捕，你拒捕，我就開槍打死你。”說著又從腰間掏手槍，被楊、徐攔住。我先被帶到看守所辦公室，審問姓氏名誰之類，我一律拒答，緘口不語。血繼續從手腕滴在我的褲子上。我管過

⁹ 若干年後，布赫榮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期間，我在北京內蒙賓館的電梯口與之巧遇。或許他們一家人還追念舊情，或者認為我已經恢復公民權利，不會影響他們的名譽和仕途，曾經表示他們兄弟要和我聚一聚，重修舊好，被我婉拒。

政法，審問非殺人重大案犯，不應戴刑具，我自然有權不語。

楊、徐讓所長把手銬打開說：“我們過去和你不相識，你有什麼話現在都可以說。如果你什麼也不講，我們很爲難。你可以講自己沒罪和沒罪的理由，我們有言必錄，看這樣好不好。”

我當然無法拒絕他們正常的工作和比較理性的態度。

我被關押在土左旗一間又暗又濕的監號裏，四個囚犯負責監視我。在土左旗看守所外院，我曾目睹一個年輕看守員，用腰帶打一個囚犯，囚犯邊滾動邊求饒，直喊“爺爺”，此人打累了才罷手。

這次，我落在這幫人手裏，必定會傳下“嚴加看管”的命令。我唯一的對策是不說一句話，不授人以柄，讓他們找不到藉口。

在土左旗關押十四天後，徐和呼市一位員警，把我從察素齊押往呼市看守所。上路前，我提出要回自己腰帶和書籍的要求，土左旗看守員不給，指著我說：“你在看守所期間沒少搞鬼，這次沒來得及整你，算你走運。你還要褲帶！”

我對他怒目而視，擺出一副不繫上腰帶不走的架式，我不想事後留給這幫人一個奚落我的笑話，“他是提著褲子走的”。呼市員警著了急，過來干涉，“你們快把褲帶給人家，別搞得大家都不愉快”，說著他打開一個櫃門，讓我辨認。腰帶繫上，書沒找到。上車時，兩位員警沒給我戴手銬。事後，土左旗看守所上告，說呼市民警同情高某人。開車師傅後來提起此事。他說：“按理，不戴刑具的人犯我不能拉，路上跑了，我也有責任。可那天我拉了，我是看那天逮捕你時，你毫無懼色，倒把員警們鬧得沒脾氣，我從心眼裏佩服你，是條漢子。那天回來路上，員警也很敬佩你。多數人一見逮捕證就草雞（軟）了，這種人讓人看不起。”

聞聽此言，心中一陣悲涼。腦海中頓時劃過幾個名字：王實味、陳光、彭德懷、胡風——從無數“右派”到文革中的林昭、張志新、李九蓮，哪個不是對國家人民萬般忠誠，結果卻被視如妖魔。

第五十三章

走進牢獄大門

走進呼和浩特看守所，院內人很多。入冬前第一次寒潮，把囚犯過冬吃的廉價圓白菜（甘藍）凍了。指揮轉移白菜的人是盧林元，我認識的農民造反派頭頭，我們相互點頭致意。

呼市看守所是一座圓筒形建築，值班人員坐在圓筒中心位置的房間內，輻射狀的一、二、三、四號四個通道，一覽無餘。每個筒內有若干囚號，可羈押二、三百名未決嫌犯。

一，滿眼政治犯

這天，所長王成特意自己值班，接受我這名“重要”囚徒。他讓我坐下，兩人略嫌擁擠地面對面，開始了我到呼市看守所的第一場談話。王所長：“你到這裏來一定要守這裏的規定，不管你過去當過市委書記，現在你是人犯。這是第一點。”

“只要你守規定，你有什麼事情、要求，可通過管你號子的所員講明，直接找我也可以。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這裏關押了不少你過去的戰友。我已派人找他們去了，你們可以在這裏見個面。我只希望你們之間來往要放在明面上，我不喜歡在眼皮子下面做暗事，不管事情大小。”

我看見了呼市革委會委員喬萬寶、郭日周，呼市公安局原領導成員董志，呼市郊區革委會副主任盧林元和一些郊區公社大隊領導班子成員及工宣隊、軍宣隊的一些人員。王成，這位滿面鬍子的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說話口氣毫不留情，但我喜歡平等的、不含糊的坦誠對話。我當即表態：

“我會遵守這裏的一切規定，請你讓管號子所員，把可以做什麼或不能做

什麼的規定告訴我，這是第一。”

“第二，我只有一個要求，允許我讀書。習慣的原因，我讀書要作眉批和摘錄，請允許我有筆和紙。如果可能，不難爲你，能否讓我妻子送些白糖和奶粉，我隔離前已患肝炎。”

他讓我開列書單，我開列出《魯迅全集》、《唐宋詩詞選》、《古文觀止》、《資本論》、黑格爾的《美學》及康德的《判斷力批判》。這些書及大批書刊，成了我在看守所三年多時間最寶貴的東西。

儘管監號裏一樣的潮濕、擁擠，與土左旗看守所相比，這裏能讀書，能夠讀到《人民日報》，比我隔離時的待遇還強。

我剛開始是被監押在 3 筒 5 號監室，12 名未決人犯中，除我一人（當時被稱之爲運動犯）均屬刑事犯罪。我沒發現有人找藉口整我，我可以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讓自己靜下心來讀書，等待命運的判決。

同號未決犯中多是年輕人，有的才十七、八歲。他們接受我的勸說，白天學文化，識字，背誦唐宋詩詞，讀魯迅和其他哲學書籍。每天晚飯後，由於號內燈光太暗，留作我給他們講故事。

我給他們講愛因斯坦、愛迪生、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也講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他們對拿破崙、庫圖佐夫尤其感興趣。從此，號內再沒人打架，爭吵。這些年輕人犯有搶劫、偷盜等罪行，他們也有嚮往真、善、美的一面。他們稱呼我“高老師”，我喜歡。

負責管理 3 筒 5 號的方所員，原是看守所醫務室大夫，由於醫療事故改任所員。他對人犯從不動粗，很快和我交爲朋友。1978 年時，看守所關押人中一半是運動犯，經常流動，處理一批，再進一批，保持在 100 多人，這幾年少了，只有幾十名左右。

在員警眼裏，運動犯是在文革中犯了罪的一批人，政治上怎麼判定是黨和國家的事情。在道德、人品上，這些人與各類刑事犯人完全不同。因此，犯人廚房、鍋爐房，包括管理菜窖¹的，差不多都是運動犯。董志當時是伙房的頭，

¹ 北方冬天儲存白菜、土豆、蘿蔔等蔬菜的土窖。在溫室農業不發達的時代，菜窖對北方人的生活十分重要。如今在城市的菜市場，一年四季都可以買到新鮮蔬菜，因此，繼續用菜

喬萬寶等協助值班所員管理監號。每天放風時，他們會站在所員一邊吆喝，有時會在送洗臉水，延長放風時間上給點方便。

看守所是個“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小天地，所員們上班之餘，可以經常從運動犯種的菜地裏，入冬後開辦的粉絲房裏，養豬場等處，得些實惠。如未決犯中有手藝高超的裁縫，就會單獨爲其在監號內放台舊縫紉機，支張簡陋的裁剪台，所員全家及其七大姑八大姨的衣服，就從這裏製作出來，工錢無需自掏一分。我的獄友寇振山有位同案犯，外號“廖瘋子”，在裁縫室工作了近三年²。

1980年冬，進入我們號內一位內蒙地質局的李姓人士，40餘歲，原是位廚師。白天他被提審，晚間忙“業務”。最早是一位所員，問他黃燜雞怎麼做，他站在小窗口，對門外的所員詳細講述如何配料及操作。進入農曆臘月，老李每天早上“出工”，天黑後，帶著一身油煙味回號子睡覺。據李說，現在只做口頭解答不行了，所員們乾脆找一間屋子，從犯人伙房借來用具，由老李現場操作，把所員們從看守所豬圈分到的肉細細加工，按吩咐一一切成絲、片、丁等，再烹調成各式菜肴的半成品。於是乎，老李給甲所員做完，再做乙所員的，直做到年根底。所員們樂呵呵地過了一個有口福的春節³。

春節後，老李判刑離開看守所，押往一處勞改監獄服刑。

窖儲藏冬菜的人，已大為減少。

² 那個歲月，我們尚不知道在押者還有所謂“人權”問題。當時只要獄方給我們點好臉色，能在勞動中感受到些許自由，我們這些階下囚都會樂得幹活，誰還會考慮給不給工錢？出獄之後，見中國簽署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才知道，原來在國際社會，還有不許使用“奴工”的道德規範和法律條文。按照國際公約，勞改工廠的產品不得出口，勞改犯的工作環境、工時、勞保、同工同酬等等，均需符合其他工廠的一般規則。如果按照這些規定，我們作為未決犯，肯定不應該無償勞動，更不應該給獄方提供奴工服務。

³ 中國有句俗話，叫“靠山吃山”，即在自己權力所及範圍內，盡可能牟取好處。正由於這種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最後才導致無所不在的腐敗。今天人們所詬病的司法腐敗，最初就是從涉案人身上，賺取一點物質利益開始，主要形式是侵佔人犯利益，無償佔有人犯勞動，拿點菜，分點肉，做件衣裳等等。直接向人犯索要現金的事情，還不曾聽說。全面市場化後，一切向錢看，實物利益已經不被看重，變成以種種手段，剋扣人犯的金錢和貴重物品，收取賄賂，為犯人購買方便、設法減刑等等，這方面例證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二，上帝賜予的檢察官

被押解到呼市看守所第三天後，呼市公安局的兩名預審員，開始對我提審，他們讓我老實交待在文革中犯下的罪行。我鄭重聲明自己無罪後，便不再開口。三、四天後，他們改變了策略，以平等的身份、和藹的態度和我交談，並讓我的妻子給我送來所需物品。他們的軟招兒果然奏效，在“閒談”中，我申辯自己無罪的理由，也講自己不是什麼錯誤也沒有，不是完人，列舉出自己的錯誤一、二、三。

幾次提審後，他們竟然利用我的虔誠，把我坦率的自我批評，當作罪行“自供狀”上報呼市檢察院，公安機關預審勝利結束。當然，這一招，我是 1980 年春天，案件升級到呼市檢察院後，方才知曉⁴，誠實和輕信又一次戲弄了我。

呼市檢察院承辦我案子的，是當時的起訴科科長鞠貴冠，記錄員叫金鋒，一個 20 多歲的小夥子。

第一次提審，鞠做了自我介紹後，把呼市公安的預審終結送到我面前，問我讀過沒有。身陷囹圄的我，對辦案的隨意性已不再吃驚。我說：“既然《人民日報》的社論中說，在反對或追隨‘四人幫’問題上，1976 年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就是一塊試金石，你們為什麼不用黨中央認定的試金石來檢驗我呢？1976 年清明節，我曾在土左旗烈士陵園，主持紀念會，以悼念周總理為主要內容，全旗有近萬人參加。事後，有人告到內蒙黨委，說我在搞小天安門廣場事件，要求追查。”

第一次提審，我只談了這件事，並堅持讓他們去調查。

檢察院的前幾次提審，我接受了教訓，只談在文革中的正確，免談錯誤，更不承認有罪。回憶起來，我不得不佩服鞠檢察官的坦蕩胸懷。他的不同一般之處在於，重視核對事實，允許被審者提出舉證，並當面與你核實他手中的證

⁴ 嚴格說來，公安局預審員對付我的這一手，屬於“誘供”和“騙供”行為，其本身就是違法的。如果按照今天的司法程序，我拒絕簽字，所謂的“自供狀”便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然而在當時，混亂的司法系統，再加上以權代法，運用各種手段，羅織“證據”，陷人以罪，輕而易舉，司空見慣。

據，允許反駁解釋。

至今，我感謝上帝賜予我這樣一位檢察官，他恪盡職守，費盡辛苦地對我的問題進行了實地調查。提審——調查核對——再提審——再調查核對，案件一直延續到秋天。

1980 年初秋一次提審中，鞠因腸胃有疾，多次往返廁所，鞠的助手金鋒說：“不要把鞠視為對手，他上上下下核實你的問題，非常負責。這次我們去了土左旗陝西營子，座談會上，老鄉們說你是模範黨員，我們也很感動。你有話好好說，鞠檢察官毫無私心，只尊重事實，他會對你的案件負責的。”

鞠貴冠對我的案件進行了近一年查證落實後，向市檢察院黨組提出報告，認為高沒有觸犯刑律，不夠起訴資格，應該撤銷。

鞠的結論與當時市委的調子反差太大，市委主持的清查案件討論會上，要求將高樹華轉入法院審查程序。鞠在一次會上說：“本著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的原則，高樹華不夠起訴這個格，應該撤銷此案。我無法接受市委的指示，違法辦案。”

經過一段僵持，鞠在精神壓力下病倒了，我的案件也由此擱置下來。直到 1982 年春，內蒙黨委在中央再三催促下，由自治區紀檢書記石生榮主持，要求各盟市匯報清查中的重點案件，我的案件屬於其中之一。鞠貴冠匯報了案情後，提出“不予起訴”的意見，得到石生榮支持。石把鞠拉在一邊，悄聲告之，對於高樹華這樣的頭面人物，只能按“免予起訴”判定，否則會有麻煩。

三，案件轉到運動辦

為儘快結束持續七年的內蒙清查運動，我的案件轉到內蒙黨委運動辦公室。

1982 年 3 月，內蒙運動辦曾來呼市看守所辦案，消息是與寇振山同案的李悅告訴我的。李按他得到的資訊認定，凡是提交運動辦的案件都不會判刑，最多給個行政處分，“不管什麼結果，只要能離開這裏就行，關押這麼多年，人快瘋了！”

李悅說這話時，已經在呼市看守所關押了六年左右。

1982年4月29日上午九時，內蒙運動辦公室六人，對我提審了整整一天。除中午一小時外，直到晚六點才結束。

對我主審的叫胡牧群。他說：“今後，你有什麼事與我們聯繫。過去的審查及怎樣對你審查的，先放在一邊，今天算是一個新的開始。你對文革以來自己的所作所爲，可以重新交待，也可以推翻，也可補充，但一定要實事求是。”

“現在是查你的錯誤，不要胡思亂想。爲了節省時間，我們提出如下九個問題，你針對每個問題來談。”

在胡牧群翻動一份材料，向我提出問題後，我要求審核一下自己的記錄，以便準確回答。他把手中的材料推給我，但見材料封面寫著：“關於高樹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嚴重錯誤的處理意見”。

五一節，在押人犯可以在號內打打撲克，下下象棋，吃兩頓有肉的菜。1982年的五一節，對於我最大的欣喜，是看到案件有了新的頭緒。

四，平衡術與“事實定論”

1983年春，我再次疾病纏身。1981年春天，因爲母親去世，內心十分悲痛，曾高燒昏迷20多天，多虧一大杯水煮黃連⁵，便出一大攤黑色汙物而降溫。這次高燒轉低燒，個把月不退。多虧號內人照料，漸漸能起床，能站起來曬太陽。

我雖與死神兩次擦肩，但因燒後中風，號內又潮濕，雙膝關節出現紫癍，之後轉爲風濕性關節炎，成爲困擾我後半生的痼疾。

爲了保護我的身體，妻子從北京買來巧克力，輾轉送進牢房。不巧在一次搜查中，幾塊巧克力被發現，看守所上下盤查，似乎巧克力是重磅炸彈⁶。我

⁵ 黃連是一味清火解毒的中草藥，以根入藥，味道極苦。其中又以四川出產的雞爪黃連，品質最好。

⁶ 當時流行的理論是，犯人的主要任務是接受改造，而任何營養食品都不利於思想改造，因此受到禁止。隨著法制的逐步健全，也隨著人權（也包括犯人人權）觀念的逐步普及，聽說如今的在押人員，在接受家屬送來的食品方面，已經沒有太大限制。如果犯人有足夠的

死咬一句，是放出去的某某送來的，因已放走的人不會再去追究。監內鬧騰了幾天，才快快甘休。

1983 年夏，號子內熱得格外早，剛進六月，人已汗流浹背。我在病中寫信給內蒙運動辦公室，要求在看守所院內曬曬太陽，但十幾封信石沉大海。在四下無助的境況中，我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沒想到，我的案件在他的過問下，最終轉危爲安。

我大學一位同學，1983 年負責呼盟清查工作，他曾多次參加內蒙高層研究案情的會議，後來向我透露了一些內幕，梗概如下：

你們內蒙幾個全區級的造反派頭頭，都要拿到內蒙黨委常委會上去評定。……關鍵是你的事兒不多，也抓不住什麼，放過你，只判郝廣德一個人，好像不大好辦。幾次研究就這麼擱下了，內蒙第一書記周惠一直沒表態。

事後，耀邦同志身邊一位工作人員告知，耀邦看你的信時，可能信中寫的“我就是在黨的九大會議期間，常常和您、鄭維山司令員一起散步的那個紅衛兵，就是那個在九大的大組會議上，參與胡耀邦當選中央委員辯論的那個基層團幹部”這些話勾起他的記憶，他拍了一下桌子後，當即讓撥通內蒙第一書記周惠的電話。電話中，周惠說了你的情況，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這個人名聲大，沒什麼觸犯刑法的事實”。耀邦同志指示，一定要按事實定論，沒犯罪事實就放人，可以按黨內或行政方法處理。

放下電話，耀邦同志有點感歎地說：“這個紅衛兵代表我記得，很年輕嘛，我忘記了他是華北哪個省區的。你們記住，要再問問內蒙是怎麼處理這件事的。”

那時的胡耀邦，畢竟是全黨總書記，又負責全國清查和落實政策，威望極

高，一言九鼎⁷。1983年6月25日，內蒙常委會再次討論清查對象的處理方案時，周惠講話，要按事實定論，不按所謂名氣大小；講影響要具體化，不能搞平衡，誰觸犯刑律就判誰，其他以黨紀、行政處罰判定。這次會議決定對我免於刑事起訴，開除黨籍，行政上開除留用，勞動一年以觀後效。

郝廣德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王金保開除黨籍，保留公職，分配工作（分到固陽縣農機廠）；那順巴雅爾給留黨查看處分，後分配到錫盟正藍旗工作。

判刑後，郝廣德在離呼市不遠的牛連溝內蒙監獄服刑，王金保去固陽農機廠報到。幾個月後，王請病假回到家裏。退休前，調到內蒙冶金廳下屬的一個公司。那順巴雅爾對我說：“他們讓我到正藍旗工作，我一次也沒去過，旗裏還得按正科級把工資給我送到呼市家裏。”

可能，有那麼多人保那順，那順也不在乎這次處理，才招來以後對他的致命一擊（後述）。

1983年7月25日下午，呼市檢察院三名檢察官，在呼市看守所灰色大門外的辦公室裏，對我宣讀了免於起訴書。

這個判決書是鞠貴冠按自治區、市兩級領導定的框框起草的。因為他本人對此案有保留，判決書後面的具名是市副檢察長沱夫，沒有書記員簽名。無論手續是否齊全，總算履行了一個法律過程。此案的書記員金鋒，因為屢屢發表對高樹華有利的意見，不但被調離本案，而且離開了公檢法。當時小金才30歲左右，主持公正對他後半生會有怎樣的影響，可想而知。

⁷ 胡耀邦心胸開闊，作風民主，深得鄧小平等元老的器重和賞識。經他親自過問而落實政策的冤假錯案，成千上萬，包括許多錯殺錯關的黨國重臣。可以說，像胡耀邦這樣開明而寬厚的領導人，在當今中國政治舞臺上，已經成為稀有文物。可惜的是，這樣一個好人，居然因為講實話，而被無情整肅，含冤病逝，並因此而觸發另一場學生運動。看來，冥冥之中，似乎總有一個無邊法力，對天上人間都起著支配作用。它時時提醒世人：好人終有好報，公道自在人心。

第五十四章

獄室畫像

在看守所中，我結識了許多獄友。他們來自社會底層，有的真犯了罪；有的根本無罪，僅僅是一個替罪羊。他們的案情並不複雜，但受到的懲罰令人咋舌。

口述史想為幾位獄友畫個素描，希望讀者關注社會這一角落，聆聽他們痛苦的呻吟。

一，替罪羊邁沙（化名）

3筒5號的邁沙，被捕前為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日報社記者，蒙族，曾是內蒙古大學的在職學生¹。

內大辦了個落實政策班，招收學生為內人黨案受迫害的家屬子女，免考入學，區外的、軍隊的、蒙、漢各族學生均有。

星期六晚，校內照例要演電影。落實政策班的學員在入場時，班長和團支書抓了兩個擠來擠去的十幾歲孩子，認為是小偷，便把他們反鎖在自己宿舍裏，等看完電影再審問。

被抓的兩個少年，其中一個從窗戶逃出去報信，另一個叫李新（化名），因腿腳不靈而無法逃走。電影散後，學員一看跑了一個，就把怨怒集中對準了李新。李遭到毒打，待李的母親姐姐趕到，李已奄奄奄一息，送到醫院時死亡。

巨大的悲痛讓李家人不顧一切地四處告狀。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呼市公安局受理了此案，要到內大抓捕兇手，被內大校長巴圖拒絕。這個班多數學員

¹ 內蒙古是以蒙古族為主體的自治區。除了內蒙之外，中國境內還有其他一些省市和自治區，有相當數量的蒙古族居住。比較多的地方，有東北三省的西部，河北北部，以及青海、新疆、雲南、甘肅等地。據說分佈在新疆的蒙古人，數量有十幾萬之眾。雖然在挖肅運動中，內蒙以外的蒙古族聚居區，沒有受到內蒙那麼嚴重的傷害，但間接受到牽連的家人和親屬，還有不少。對這一部分蒙古人及其子女，落實政策確有必要。

的親屬在內人黨冤案中受牽連，致死、致殘者不少，他們對抗情緒很大。他們在大字報中寫道：“我們蒙古人被打死成千上萬，現在又有人借李新一案來整我們了。要搞清案件，先把內人黨的事情搞清楚。”²

第一書記尤太忠親自找巴圖做工作，指揮市公安局抓捕犯罪嫌疑人。邁沙是抓捕的十餘人之一，在呼市看守所關押三個月後釋放回校，繼續上學，直至畢業。據邁沙說，正式被公安局批捕的是三個人。前兩人是組織者、肇事者，又多次擊打過李。

邁沙畢業後，回新疆家鄉一家報社工作，並結婚生子。他沒想到的是，一年多後，再次被公安局捕回呼市。原批捕的三人中有兩人為軍幹子弟，家中有高官，一直在上下活動。案件移至檢察院後，三人經過串供，開始翻案。案情發生出人意料的變化，重新認定李新致死的原因，是邁沙的一腳踢在李的致命處。結果，邁沙坐上主犯的位置，被判處無期徒刑，原定的三名主犯被先後釋放，消失在億萬人群之中。

在3筒5號，邁沙常常睡不著覺，用不流利的漢語對我訴說案情，請我為他想辦法。兩個被關在監號內失去自由的人，難有“回天”之術。我能做的，只有耐心安慰他，代他寫過上百封申訴信，上至鄧小平，胡耀邦，華國鋒，下至周惠，王鐸等，全無回音。終有一天，我送走了這個痛苦的蒙族青年，他深知自己不過是替罪羊而已。

我出監後聽到些不確切的消息：他被押送到大西北服刑。我天真地為邁沙設想，他也許回了新疆，他是那麼熱愛自己的家鄉。

二，農村青年銀碩

² 從這個小小事例，不難看出兩個問題：一是挖肅運動，給蒙古人心理造成的創傷有多深。從此之後，幾乎事無大小，都可往民族矛盾的線上掛；二是帶上民族關係的有色眼鏡看問題，可以令案情扭曲，性質改變。本來是一件普通的打人致死案件，和民族矛盾沒什麼關係，但是，一旦扯到民族恩怨，立刻引起共鳴。面對如此形勢，當政者往往還真的難辦。硬要制裁，怕激化民族矛盾；如果不依法制裁，那就可能面臨法律喪失權威，造成社會治安的全面惡化。曾經擔任過內蒙一把手的河北省饒陽縣老幹部張曙光，退休後曾經多次表示，在內蒙當官很難，稍不小心，就會栽在民族關係的陷阱之中。

呼市郊區西把柵公社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銀碩，30 多歲，是回鄉知識青年。作為公社培養的可靠接班人，銀碩的先進事蹟，曾登在《內蒙古日報》上。

當公社恢復黨組織後，銀碩被選為公社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這是他這輩子當的最大的官。

銀碩是以“打人兇手”的罪名被逮捕的，原告為銀碩所在大隊黨支部書記。他在“四清”前是村支部書記，是“四清”的鬥爭對象，而銀碩是四清中培養出的積極分子，矛盾由此開始。文革期間，書記被打成新內人黨徒。文革後，書記平反，恢復了大隊一把手職務，隨之狀告銀碩，指控他在打內人黨中，不僅是指揮者，還動手打人。

儘管在審理中，銀碩一直否認自己動過手，但仍被郊區人民法院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象銀碩這類運動犯，服刑一段時間後，可批准減刑或接受人犯“保外就醫”的申請，提前釋放。銀碩也走了這條路。

釋放後，銀碩到外地經商。有了一定積累後，便買汽車經營運輸，車隊幾年內擴大到五、六輛，成為村裏最殷實的富戶。他先把村內舊宅改造為新房，後在市郊另建一處新式宅院，舉家搬遷。銀碩 50 歲時說，全家搬離是防止書記報復，村裏留下的大院是讓書記看的。此時該書記已 60 多歲，仍是村裏的掌門人。

三，參加了一天一夜運動的小軍官

邢剛（化名），45 歲，是一位壯實的中年漢子，後被部隊送入步兵學院讀書，成為一名有能力的軍官。在監號裏，邢剛對每個入監的人總熱情幫助。和邢同號的犯人都說，到了半夜能聽到他悶頭哭泣的聲音。

陳興泉年齡稍大，自小無父母，隨解放軍土改工作隊的李隊長當勤務員，15 歲正式參軍。他一生最感激兩個人，一是帶他長大的李叔；另一位要感激

的是老團長寶榮（化名）。陳參軍後，寶是陳的連長，從基本訓練開始到送陳興泉進軍校。寶升任團長後，陳爲團內營級作戰參謀。

陳說：“整個文革期間，我一直在邊境前線，沒參加過軍宣隊，也沒支過‘左’，當然也不理解學生爲什麼要造反。1968年冬天，被師部叫去，參加了一天一夜文化大革命，就捅了個大漏子，落了個終生殘疾（指心理）。 ”

以下是陳興泉所講述的主要案情：

按師部命令，邢、陳、隋三名下級軍官，在晚飯時趕到師部報到。師部幹事說，你們先去食堂吃飯，吃完飯，師首長親自佈置任務。

三個人可能都餓了，一頭栽在飯碗裏沒來得及說話。吃飽了，我才問，“師部讓咱們來幹什麼？”老邢說不知道。老隋是機關協理員，只說了一句：“肯定沒好事，好事從來輪不到我。”

師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佈置任務時，先講文革大好形勢，再講有個“新內人黨”，是反革命組織，專門搞破壞，已經把黑手插進軍隊，在本師也有，他們是階級敵人，必須堅決鬥爭等等。

師首長講了偉大意義後，才告訴我們具體任務，要在師黨委直接領導下，審訊一個內人黨重要分子，讓他老實交待，承認自己的罪行。

我問了幾遍，這個人到底是誰，首長含而不露，先讓我們每個人表態。表態後才告訴我們，這個“內人黨”分子是寶榮。

我們三個人，只有我與寶榮最熟，我的情緒變化自然瞞不過師首長眼睛，他們讓我丟下私情，站在黨性立場看問題。後來師首長態度變嚴厲了，狠勁批我。我只好硬著頭皮答應去完成任務。此時已是夜間十點了。

我們進屋時，老團長正坐在床上，他可能一下子認出了我，以爲我是來搭救他出去的。當邢剛讓他老實交待罪行時，老團長以冷漠的眼光，橫掃了我們三個人後低下頭，再沒正眼看過我們一下。

這眼神一輩子留在我腦子裏，無法忘記。

隋再次政策攻心，老團長始終一言不答。邢剛從師部出來路過一排平房時，揀了一根小姆指粗的柳條棍拿在手裏。此時，寶不卑不亢的態度惹惱了邢剛，邢用柳條棍抽了寶三下。三人又對寶榮申斥一番後離去。

回到師部休息的房間，已近半夜 12 時，便抓緊時間睡覺。下半夜四時許，值班士兵來報告，寶榮自殺，已送醫院搶救。當我們趕到醫院時，寶已死亡。之後，師部黨委做出決定，開除寶榮黨籍、軍籍，根本沒涉及我們三人。

1969 年，毛主席 5.22 批示後，內蒙軍區黨委、師黨委爲寶榮平反，責任由師黨委承擔，首長表示不追究個人責任。

1975 年，由於寶榮的愛人到內蒙軍區、中央軍委不斷告狀，訴寶榮是遭受毒打致死，要求重審。內蒙軍區認爲寶榮自殺是運動中問題，應由師黨委負主要責任。爲了平息家屬的憤怒，決定讓參與此案的我們三人轉業離開部隊。

於是，邢剛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河北，分配到石家莊工作。隋在黑龍江家鄉齊齊哈爾市工作。我分配到呼和浩特市電動工具廠任政工科長。

1976 年，全國清查運動後，寶榮的妻子再次向公檢法機關控告，堅決要求嚴懲打人兇手。1978 年，邢、陳、隋三人先後被押入呼市看守所，並於 1982 年判決。邢、陳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

1983 年 8 月，我釋放後一個星期，在允許探視的日子，我趕往看望，只見到了陳。陳對我說：“老團長是帶著滿腔怒火和怨恨自殺的，其中也有一份是對我的失望，我肯定傷透了他的心。一想到老團長，別說讓我坐 14 年監獄，坐 24 年也認了。可是，這是運動啊，我就參加了一天一夜運動……”

關押期間，還看到一些以刑事案件名義處理的運動案件。

劉大夫原是呼市郊區攸攸板公社（現改爲鄉）衛生院的醫生。劉本爲河套人，十三、四歲時被傳作義部隊抓兵，跟著部隊軍醫打雜，由此從醫。

由於自身有一段“國軍”經歷，儘管當時年齡幼小，劉自識時務，從不在運動中出頭露面。文革中，攸攸板公社書記被打成“走資派”。大多數群眾站在了打倒一邊。劉別無其他選擇。

“專案組內查外調，整了他許多材料沒處放，就找到衛生院，放在我們婦科診室的一個大櫃子裏。只是誰來找材料時，開櫃子方便，我從來沒打開過那把鎖頭。”劉親口對我說。

被鬥的書記是蒙族幹部，1974 年以後，恢復了公社書記職務，繼之提升爲呼市郊區法院院長，郊區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原來在運動中批鬥他最狠的人，有的開始倒楣，有的立即投靠，用各種方法表示忠誠。公社衛生院中醫趙超（化名）屬後一類。

趙此時向書記檢舉，公社衛生院最危險的人是劉大夫，材料全放在他屋的櫃子裏。書記本不認識劉大夫，當查了劉的人事檔案後，覺得單憑“當過僞兵”一條整不倒劉，讓趙幫助搜集材料。

不久，趙爲書記搞到一份材料，由此，劉大夫的厄運開了頭。

劉說：“1974 年 3 月，趙大夫找到我，說他的外甥在武川下鄉，和一位北京女知青發生關係，女方懷孕，怕當地人知道，名聲不好，想到咱們衛生院做人工流產，只好請劉大夫幫忙。這是趙第一次這麼求我，我雖然不讚賞趙的爲人，但也不能得罪他，我就答應了趙。手術幾天後，女方恢復健康，就回武川了。”

1978 年 11 月 4 日，郊區公安局突然以“姦汙女知青”罪名將劉大夫逮捕，並在 1980 年被郊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4 年³。

³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是大張旗鼓落實政策的時期，其中包括落實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當時凡有知青控告被人姦汙過，被告人便會受到“從重從嚴”的法律制裁。辦案過程往往草率匆忙，缺乏足夠證據也在所不惜。這種為了修改舊冤假錯案，不惜製造新冤假錯案的做法，或者叫“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在中共歷史上，屢見不鮮。迄今為止，

劉明知陷害，卻無力抗拒。已回北京的那位女知青，怕自己的事情暴露出來，影響個人處境和家庭，就按調查人設定的供詞寫了“揭發”材料。

劉沒承認所謂罪行，刑滿後繼續告狀數年，直到趙臨死前良心發現，向有關司法單位寫出證明材料，經劉的律師錄下影像，劉的案件才得糾正。

劉大夫得到“清白”時，已是近 70 歲的老人，不久去世。而設計陷害劉的幕後推手，則平安無事，官運繼續亨通。

五，伊斯蘭聖徒夏忠魁

夏忠魁，30 歲，自稱宗教主義者。他虔誠地說：“只有古蘭經是真理，世間一切真理全包收在古蘭經內”。

夏主張對人忠誠，不欺騙，要對弱者憐憫和施捨，要團結一切教友。夏忠魁因翻印販賣古蘭經，以投機倒把罪名被逮捕。

夏講自己的案情起因：

許多人建議印王靜齋⁴ 注釋的《古蘭經》，王的注釋詳細、準確。爲了真主，爲了傳播古蘭經，我每天下班後刻蠟版印經，把妻子趕到丈母娘家，用毯子蒙住窗戶，連夜印裝，秘密散發。

這位王靜齋當年（民國卅七年——1948 年）爲了印經，左跑右跑，到了白崇禧⁵ 那裏，才給了印 3 千冊的錢。我們算是直接接王

好像還沒有找到一個防止政策大搖大擺的有效機制和方法。

⁴ 王靜齋（1879—1948）：中國近代四大阿訇之一。回族，天津人，名文清，字靜齋。15 歲前在家習經，後在天津、北京、宣化、滄州等地的清真寺接受經堂教育，20 歲時兼學漢文和英文，26 歲畢業，旋即受聘擔任大興縣白塔村清真寺阿訇。1922 年赴埃及愛資哈大學進修，受到近代伊斯蘭改革思潮影響。1923 年赴麥加朝覲，次年攜帶 600 多部阿拉伯文經籍回國。先後在河北、北京、天津、東北、山東、臺北等地任清真寺教長。1940 年開始從事譯經事業，先後編譯多部經書和中阿辭書。後致力於《古蘭經》翻譯，曾三易其稿，以三種版本刊行。

⁵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回族，民國高級將領。1937 年抗戰爆發後，任國軍副參謀總長。1938 年任桂林行營主任，1939 年底指揮桂南戰役，在昆侖關會戰中，取得抗戰以來首次攻堅戰勝利。1946 年 5 月，任國防部長。當年 12 月，由海

靜齋的手，一下子印了一萬冊。

爲了真主，我們爲全國穆斯林解決了讀經的大問題。我們兩冊書賣六元人民幣，外地有人賺我們的錢，賣 20 多元一部，這是對真主的褻瀆。

我們有了兩萬多元餘額，但一分錢也沒裝自己口袋，我們用這筆錢要蓋一座自己的清真寺——呼和浩特北寺。

逮捕我們後，雲南有 23 個清真寺上書，聯合簽名保我們兩個人。中央民族事務局喬局長，來呼市檢查工作時說過，這件事本來不大，能處理得好些，結果鬧得國外都知道了。

我爲了印經坐監獄沒覺得冤枉，即便丟了工作也沒什麼，爲了真主，我什麼也不怕。我相信，他們怎麼抓了我，還得怎麼放我。

齋月到了，忠魁和我商量，想在監號內自己封齋。我說：“這事你不要出面，我來安排。”我先和難友張玉純通氣，讓他支持我。然後，我在號內讓其他五個人犯聽從我的安排。我特別向出工的運動犯借了一個暖壺（號內是不允許有暖壺的），向每晚送開水的（運動犯）多要一些開水，這樣，每天天未亮前，可保證忠魁吃上窩頭喝上開水，以便他堅持到當天天黑再入食。

齋月始，天未亮，忠魁頭頂白色小帽，向著克爾白⁶的方向跪拜。那模糊的暗影，嚴肅的面容，誠摯的身姿令人不能不敬佩。人在這種惡劣環境中，能做到這份兒上，他就是聖徒。

1983 年 7 月 22 日下午，號子門突然打開，開門所員面色威嚴地喊道：“夏忠魁，搬行李！”忠魁正蹲在我面前幫我整理裁剪下的報紙，聽到喊聲，他雙手木然地抓著報紙，呆愕了。

“快點，放你哪！”又是一聲威嚴的吼叫。

南島撤往臺灣。

⁶ 克爾白，是阿拉伯語音譯，意為“方形屋”，也稱“白依同拉赫”（安拉的房屋）。中國穆斯林稱克爾白為天房。它位於麥加清真寺的中央，是全世界穆斯林每天做禮拜的方向，也是每年朝覲的聖地。《古蘭經》說：“為世人而創設的最古的清真寺，確是麥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嚮導。”

忠魁臉色憋得通紅，雙手不住地顫抖，收攏東西，互相問候，臨別簡短贈言……

很快，從視窗飄進一陣鞭炮聲，我猜測是忠魁的教友，朵斯提⁷ 們在迎接他。

夏忠魁兄弟三人均是堅定的伊斯蘭教徒，他們終於建成了自己的清真寺——北寺。他們在呼市，乃至西北穆斯林中很有名氣。

六，“重犯”張喜貴

1983 年 6 月初，我關注的一個案件判決了。主犯張喜貴被判無期徒刑，同案犯海福、李木（兩人均為化名——作者）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和四年。

這三個人是土左旗沙爾沁公社（現在稱鄉）老龍不浪大隊（現在稱村）人。沙爾沁在全旗算貧困區，土地貧瘠，常年缺水，只能廣種薄收，基本是“吃糧靠返銷⁸，花錢靠貸款”。而且，越是這種窮村子裏，怪事尤其多，治安狀況不好，打、搶、偷、賭成風，吸毒、販毒屢禁不絕。

張喜貴是當地長大的回鄉知青。廿世紀七十年代，張喜貴進入大隊領導班子，擔任民兵連長。他在公社黨委支持下，首先在村內糾正邪風、惡氣，禁毒、禁賭，扶揚正氣。

老龍不浪有一個村民，生性刁劣，是村內賭博、吸毒、販毒的中心人物。他本人是個光棍，長期霸佔村裏一老實村民之妻。

張喜貴掌權後，首先清算該村民欺壓百姓，開賭局，販毒品的罪行，經旗公安局批准，準備把他解押到公社。途中，他借小解機會，乘人不備去奪民兵

⁷ 朵斯提，波斯語，意思是朋友、夥伴。在穆斯林日常用語中，泛指教門內的朋友，類似於基督教所說的“兄弟姐妹”。當兩個互不相識的穆斯林相遇，一旦知道對方是穆斯林後，就會親熱地說：“我們都是朵斯提。”意即“我們都是有共同信仰的教友。”

⁸ 指國家從農村收購糧食之後，對確實缺糧的村莊，再調撥一定數量，賣給村民充作口糧，渡過饑荒。在多數情況下，從農村收購的，是好糧和新糧，而返銷給農民的，則是陳糧和次糧。以作者程鐵軍家鄉河北省饒陽縣為例，每年夏秋兩季徵購，國家收走的都是小麥和玉米，而到農民缺糧時，返銷的常常是難吃（有時甚至發黴）的高粱和紅薯乾。

連長海福手中的步槍。在兩人搶奪中，不慎碰到扳機，一槍打中押犯的腿部。公安局和法院對該刁民數罪並罰，判處他無期徒刑。

之後，村內風氣好轉，老龍不浪名聲也逐漸好起來。1975年冬，經公社推薦，張喜貴擔任了公社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清查運動開始後，張喜貴被貶為清查目標，屬重罰之人。被判刑的那位刁民，提前出獄，反而控告張喜貴蓄謀殺人。1979年，張喜貴等三人被捕，1983年6月判刑。

張被捕後，新上任的沙爾沁公社領導，向張喜貴父親施加壓力，讓其揭發兒子。張父為保護兒子自殺身亡，張喜貴的家產被沒收拍賣，喜貴妻子為了保護兒女，無奈與村內另一男人同居。

張喜貴拒不認罪，辦案人員給同案犯海福、李木遞小話，讓他們按設定的口供咬死張喜貴是有意謀害，路上開槍是張事先指示海幹的。兩人如屈從可輕判，若不從，則施重刑。海、李兩人屈從，於是，對張的定罪有了人證。

1983年6月，海福通過所員找我，為他寫上訴材料，我與海福有一段對話：

我說：“海福子，我可以幫忙寫，但我必須明白真相。你老實對我說，張喜貴是不是預先佈置了，讓你半路開槍打人。”

一番猶豫後，海福說：“你想想，如果是喜貴子讓我半路打死人，當時押解，他和我距離頂多一米多，我再笨也不會僅僅打在他腿上。實際上就沒這事，是辦案的讓我非這麼說不可，要不就重判我，我也沒辦法。”

張喜貴堅持申訴，於1995年提前釋放。回村後，住在其姐家中。第二年，與其妻同居的人病故，在鄉親勸說下，張與妻重歸舊好。

第五十五章

生存新軌跡

1983年10月20日，市委辦公室通知我去談問題。副秘書長王林開門見山：“市委決定讓你到工廠勞動一年，一年後看你的表現，再另分配工作。市委給你選定一家工廠，是新城東門外的內蒙電子儀器廠，離你家不遠，工資待遇每月40元，你同不同意？”我立即回答：“同意，什麼時候上班？”

一，工人幫我渡險灘

五分鐘後，我走出市委大門。一位朋友告訴我：“專案組認為你肯定不會順順當當接受市委決定，便找了10位談判高手，說不服就壓服。沒想到，你那麼痛快地答應了。”我說：“這些人太誇大敵情了。只要分到市內，能盡供養老父的孝道，育子的人道，我不計較其他。”

1983年11月15日，我去電子儀器廠報到。一個牛皮紙袋內，只有一張兩指寬的字條，是市委副秘書長王林手書的決定：“高樹華到你廠勞動，不屬幹部，不是工人，不定職，不定性，不是處罰。一年後，由市委安排。”

從此，這個字條成了我去儀器廠的唯一依據，是我43歲以後的人生檔案。一年後，雖然撤銷行政處分，卻未兌現字條上的承諾，我在原地滯留18年，直到60歲退休。

廠長姓王，書記姓楊，例行和我談話。“儘管你當過市委書記，現在的身份是到廠裏勞動。我們把你分配到二車間準備組，具體工作由車間曾主任告訴你。希望你好好改造，向工人階級學習。”幾分鐘後，廠部秘書把我交給車間主任，主任再把我交給組長劉師傅，劉師傅給我指定了一個工作位置：“車間裏多是技術活兒，你沒幹過，就幫助打打水，掃掃地，沒事你就看書。”

和藹誠懇的曾主任是我的主管。我有了具體工作，有了合法讀書權。車

間裏有幾個人認識我，一個是我學生的妹妹，一個是我中學老師的女兒。兩人過來打招呼，好心勸我少說話。“前幾天就知道你要來，保衛科還做了佈置，你除了打水，掃地，就看書，其他全別管。”在此言指導下，我安全渡過了以觀後效期。相識的人稱呼我“高老師”，廠內工人、幹部也跟著以此稱呼。

隨我到廠裏報到的是市公安局一科¹的公安人員，他們與廠保衛科確定了監控方案。從我坐到車間起，不斷有保衛科的人探頭探腦。我並不看作一回事，反引起車間工人不平。

三天後，幾個工人一咬耳朵，把在門口探頭的人拉進車間，圍起來追問他來監視誰，“你怎麼敢對我們工人階級專政”。保衛科的人無法招架，又不能公開說是監視高某人。車間越來越亂，活兒停了下來。廠長書記為安撫工人，當眾批評保衛科“亂來”，宣佈扣除保衛科長當月獎金，工人才罷手。

一天早晨，樓頂漏水，車間安裝的示波器泡在水裏，只有兩個車間主任在水中撈。我立即下水幫忙，工人師傅在外配合。幾十台示波器轉到安全地方後，我接著用桶把水排乾淨。事後工人玩笑地說，車間“救災”是兩個黨員和一個黨的敵人共同完成的，創造了階級合作的範例。

1983年春節前，廠部通知車間10名工人，參加由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主持人自我介紹，是市政法辦和公安局的，會議內容是瞭解高樹華在車間的表現，有沒有不軌行爲。

參加會議的有位馬師傅，屬廠內元老。馬師傅是個仗義執言的人，常為工人打抱不平，在工人中很有威信。聽到會議內容後，馬師傅第一個發言，他說：“高樹華這個人，過去不認識。來廠幾個月，他的表現大家都看到了。不說別的，就那天從水裏搶撈示波器。高老師腿有風濕，是坐監獄落下的，人家可以不管，可是人家在水裏幹到最後。主任走了，他又把水弄盡。我不懂法律，就當初沒判他，沒槍斃他，只讓他來勞動，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吧。

¹ 公安局一科，又叫政保科（政治保衛科），其上級對應部門，為公安部一局，公安廳一處，即負責國內政治案件的部門。而負責國際政治案件的部門，叫國家安全科，後來劃歸新成立的國家安全部（廳、局、處等）系統管轄，內外分工比較清楚。

既然是人民內部矛盾，你們打也打了，罰也罰了，從書記位子上也拉下來了，還要幹什麼？事先不知道這個會是幹這個的，要知道，我肯定不來。保衛科人見天兒²跑去監視，現在又開什麼座談會。我是個工人，和高樹華沒牽連，我只會直來直去說話。如果你們討厭我的話，可以把我抓起來。我只想說，做人要公道，請主持人原諒，我的話說完了。我還有活兒要幹，不奉陪了。”

說完，馬師傅起身出了門。

留下 9 個人，多是女工，膽小沒敢走，也只皮皮毛毛說幾句，都是肯定我的話。座談會草草結束。

我感謝電子儀器廠的工人師傅、幹部和領導。能呆在一個公平待人的環境中，是人的極大幸運。

1984 年 8 月，處分一年後，再審我的問題。時任市委書記讓一個朋友轉告我：“再審後，除了黨籍不給，幹部待遇恢復了，但只能到此為止。你們的案翻不過來，也不要冒這樣的風險。”

二，人間棄兒

上級發了通知，給知識份子發放報刊費和支邊費，凡符合條件的人員把中專、大專和大學畢業證書交到廠部審查，同組的師傅催我，我便把自己的畢業證書繳上。不久，廠長、書記與我談話。廠長把我的證書從桌對面推給我，無奈地說：“我們也沒有什麼辦法，是電子局黨組正式告訴我們，你不算知識份子，不能享受國家給知識份子的待遇。”

我問：“我能不能提個問題，說幾句話？”

“可以，我們也覺得這樣決定對你不公，你有什麼話儘管講，也可以直接找市電子局。”

“我大學本科生不算知識份子，我算什麼？請今天給我立個名分。我不會抱怨廠裏，我誰也不抱怨，只要求給個身份。”

三人商定，我算病號。我說：“我既然是病號，就可以不來上班了。”

² 馬師傅是北京人，他講的是北京方言，意思是“每天如此”。

廠長說：“可以，但你要開病假條，最好開傳染病的假條，我們好對上面交待。”第二天，我送來市傳染病醫院開的肝炎休假證明，從此，我爭取到了一個自由人的身份。

1996 年冬，我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巧遇原廠黨委書記。此時，他已提前退休，在蒙古幫親戚經商。兩個身份已經平等的人，又遠處國外，便開誠佈公交談：

“你離開了廠，我們也輕鬆。不管哪級領導，問詢你在廠裏的表現，我們一直用一句話回答：‘正患傳染性肝炎，在家養病。’十多年來，就這麼例行公事。你有個自由身，憑本事可以得到廠裏多少倍的收穫。”

其實，我並不在乎一個人掙多少錢，只求能公正對待³。

2001 年初，我到了退休年齡。電子儀器廠此時瀕臨破產，留守的幹部科科長小趙，打電話到北京，催我回廠辦退休手續。

趙科長一再解釋說：“你離開廠十幾年，大家調了多次工資，上面從來沒有給你下發過指標，因此，你的工資始終沒提，未按 1962 年大學本科畢業生待遇給你。按現如今你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資算，你每月退休金只有 253 元。你原是市委幹部，要不你再回去找市委領導。但要快點，這批人正等你一個。”

我找了一位熟人，給市委秘書長打電話詢問。他很快回覆說：“當年下放到廠裏是內蒙黨委批的，要回市委退休，也要內蒙黨委批。我們沒有理由去報，只能個人去找。”

我自知幾斤幾兩，不願和官僚打交道，更不願向他們低眉屈膝。我和妻子商定：“誰也不找，愛給多少給多少，253 就 253！”

2002 年 7 月，我離開了這家有 18 年緣分的地方。入廠時，廠內有幾百名訓練有素的工人，是贏利企業。離廠時，早已停產，一塊地皮已經出售，正在拍賣原有的兩座臨街大樓。

³ 回憶起此時的我，真有幾分迂腐和執著。迂腐的是，已經經歷如此多磨難，本來也該清醒了，可竟然還有要求“公正對待”的奢望？我當時還沒有完全看透：在那樣一種意識形態和體制約束下，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公正”可言。我的執著說明，我對共產黨的依賴心理（或者眷戀心理）還非常深重，即使她已經把我無情拋棄，但我還是“一往情深”，就像白樺的電影《苦戀》裏所說的，“你愛這個國家，可她愛你嗎？”

18 年的人生，猶如面前兩座毫無生氣的廠房，一個人間棄兒，沒有知識份子身份，沒有提工資的資格，考評職稱，竟要長官恩准！人權被剝奪得一無所有，惠顧我的只是盯梢和追查。

三，追查越過 21 世紀

雖然廠長書記賜我一個自由身，但我並未獲得真正自由。

請病假後，經好友推薦，找了幾份教課的差使，以維持生計。老師的收入雖然微薄，我已相當滿足，全家人憧憬一台小黑白電視機。這時，從工廠傳來上面“不准他教書”的禁令。廠方幾次以“生病請假，沒出去教書”的託詞，替我遮掩過去。

1983 年後，我陸續翻譯和編寫了幾本書，出版後反映良好，為出版社贏得了利潤。

1995 年，內蒙人大常委會上，一位委員提出質疑：“為什麼給‘四人幫’殘黨餘孽出書，你們的立場在什麼地方？”

出版社領導立即檢查，命令不准再出高樹華的書。我為該委員感到汗顏，如此猥瑣胸懷，怎能為百姓做大事？⁴

1994 年冬，我從歐洲回來，大兒子告訴我：“全市換了新戶口簿，派出所傳話，讓您親自去領咱們家的。”我分析，可能是我出國的事引起懷疑。

第二天，我懷揣護照去派出所，片警問我：“你是不是出過國，你的護照是誰給你辦的，怎麼辦的？”

按規定，我這種人不能出國，要辦護照必經派出所、公安局、公安廳各關審查。派出所納悶，怎麼會把這條大魚放出國門。

⁴ 我如今才如夢方醒，當時又一次犯了觀念和邏輯錯誤。所謂的“人大代表”或某某委員，其實同老百姓的認同與授權毫無關係，他們只不過是從權貴位子上退下來之後，再換另一種謀權方式，或者充當更高權貴的一個玩偶而已。既然沒有百姓授權，他們當然也不會受到百姓的監督和制約，豈能逃出“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敗”的歷史宿命！如果我們的人大代表，也需要通過競選，通過拉票，通過討好選民而當選，他們還敢如此尸位素餐、胡作非為嗎？

我簡單說明事情過程，讓他們問內蒙公安廳廳長。大為光火的廳長讓派出所少管我的事。挨了上司罵的所長，不情願地把戶口簿交給我，我出門前只說了一句話：“出了幾次國又回來了，我不會外逃的，請放心。”

這年冬天，四川一個造反派頭頭發了財，邀過去的文革朋友喝酒。酒喝多了，開始胡言亂語，“要重新造反”，“再來一次文革”等等。此事匯報到羅幹和江澤民。江批示要嚴查，如屬實，要讓造反派頭頭“傾家蕩產”。內蒙亦照此辦理，召開了專門會議，研究了高樹華、郝廣德、王金保等人動向，並向中央做了“內蒙平安無事”的報告。類似調查 1999 年又重複過。

2001 年、2002 年，轄區的警官兩次上門“查戶口”，盤問再三。我知道他是在例行公事，但離開監獄 20 年了，陰霾仍籠罩著我的身心⁵。

四，走出國門

凡病假超過半年仍不能上班的國家工作人員，按政策規定，要納入“吃勞保”⁶範疇，勞保標準為全工資的 60%。

我請病假半年後，實領工資僅 100 元左右。爲了生存，我用我的看家本事——文學和外語，接了四、五家教課單子，有高中語文課、大學寫作課、俄語課、美學課、文藝理論課等等。無論風雪寒暑，我的自行車輪子，在大街小道上留下深深轍印。

當然，對於我這樣的另類，要走出國門比登天還難，政治標籤讓你連一張通行證都得不到。

90 年代初，正值全國各行各業經商熱，許多國家機關也辦了公司，做起進出口生意。我在此類公司朋友的幫助下，使用假名，才從公安機關拿到護照，於 1993 年夏天順利走出國門。

⁵ 此時的心情，可謂百味雜陳。我雖然走出了一個小監獄，但時時感到還關在一個大監獄中，真是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哪怕我在國外工作和生活期間，這種感覺也十分強烈。

⁶ 是國家對病休職工的一項勞動保障政策，類似於現在常說的“低保政策”，但不包括工傷事故者，他們另有其他保障措施。

我去俄羅斯的目的與其說是經商，不如說是去追夢。蘇聯的解體，共產黨的消失，都強烈地吸引我去實地考察和思索，希望從中悟出真諦，以解答文革這段歷史帶給我的疑團。

我在蒙古國滯留一周，辦理赴俄簽證，然後於8月11日搭機飛往伊爾庫茨克，再轉機到莫斯科，與一家公司合作尋找國內急需的特種鋼貨源。

我在這家公司見到兩位儀表堂堂、極有教養的俄國人，一打聽都是退役的高級將領，爲了餬口，屈尊下來打工。幸好，他們有些硬關係，找貨源還算便當。我觀察許久，發現他們十分坦蕩。我與他們交談中得知，他們都分到了一片森林或一塊土地，連公司的會計師也有一份地產⁷。

我親眼目睹一位老婦，哆哆嗦嗦地掏出一戈比硬幣（已廢除）買土豆，售貨員極不耐煩。我買了土豆送給她，她忙不迭地劃十字祈求上帝保佑我。俄羅斯人在貧窮、物資極度匱乏的境遇中，仍保持著文明、禮貌和高教養的氣質，表現得出奇的冷靜。正是這種內在的韌力，戰勝了不可一世的拿破崙和希特勒，我想，他們也會安然渡過改革之痛的⁸。

1993年10月4日這一天，我與夥伴去維登哈展覽館，考察中國人賣貨情況。就是這一天，我發現天上有數架米格戰鬥機穿梭不停，滿天都是機尾噴出的霧花，煞是一種景觀。下午四時多，我們一進公寓，立刻遭到管理員的大聲呵斥，命令我們15分鐘內搬離。據說出了什麼大事。

我匆匆打點，暫時躲進公司辦公室，方知一起爆炸性新聞：發生了所謂“白宮事件”⁹，電視畫面上白宮戰火旺燒，基輔車站槍聲正緊。

早晨，陽光燦爛，秋高氣爽，我移居出來，新住地恰恰與白宮相鄰。我懷著好奇心，信步走上白宮對面的鐵橋。我遙望過去，白宮上半部，被硝煙

⁷ 無論俄國的“震盪療法”多麼具有爭議性，但保障每個人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特別是土地所有權，這同中國的做法，有極大不同。要知道，那塊不大的土地，除了能保障基本生存條件，還可顯示他作為所有者的權利和尊嚴。

⁸ 90年代末，我因健康原因結束了國外旅行，在北京繼續經商。此時獲知，俄羅斯改革開始渡過最困難的階段，盧布與美元的兌換率大幅攀升，惡性通漲初步遏止，雖非完全“柳暗花明”，但開始漸入佳境。總之，此時的俄羅斯，已非彼時的俄羅斯。

⁹ 莫斯科的白宮，同美國的總統官邸同名，是指俄羅斯議會大廈，因外牆呈白色，故而得名。而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其正式名稱為“國會山”（Capital Hill）。

和戰火熏烤得漆黑斑斑，窗口的黑洞像在訴說著什麼。

我曾多次造訪基輔。在那裏，我總租住在捷列姆卡科學院區內的伊戈爾夫婦家，他們很歡迎我這個學者型的中國房客。

烏克蘭的貨幣庫磅和俄羅斯的盧布一樣節節貶值，有的人家一輩子的存款瞬間變作廢紙，只能買一盒火柴。伊家搶先在郊區買下一幢舊別墅，外帶一塊田地。伊的母親收入微薄，我稱呼她“媽媽沙”。每逢她來兒子家探望時，我必款待她，她欣喜外溢，昵稱我“孩子”。我離開烏克蘭時，媽媽沙無可相送，把珍藏許久的二戰時期的一枚德國硬幣送給我。

清晨，科學院區有個早市，我晨練完必去轉一圈，買些東西，發現兩位院士在自家的拉達車旁忙著賣白菜，我們成了朋友。我揣測，他們的處境可能比伊戈爾家還窘迫。

這個民族的價值觀，難以用語言準確描繪，他們有著深深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底蘊¹⁰。

據我觀察，前社會主義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商品的互補性十分強，只要雙方都遵守一定的遊戲規則，建立起牢固的誠信基礎，生意便可順暢地做下去¹¹。

然而不幸的是，事態發展表明，“誠信基礎”並非那麼容易建立，雙方

¹⁰ 後來再深思這個問題，覺得單是文化底蘊，似乎還難以服人。要說文化底蘊，中國人的儒家傳統應該更為深遠。恐怕宗教信仰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漢族）基本上是個不信教的民族，而儒法道三家傳統，除了少量精華之外，越來越顯示出其落伍的一面，與世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的一面。儒家所說的仁政或者仁學，與西方宗教所說的“愛”和“博愛”，其實並非同一個意思。“仁”更多注重維護皇權的合法性和統治技巧，而博愛才體現“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記住這一區別，才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國文化缺少寬厚容忍，總是充滿仇恨和怨怨相報，永無休止。以上只是我們的淺薄思考，並非深入系統的研究分析。這方面的知識，或許要請教美國哈佛大學新儒學代表人物杜維明教授。

¹¹ 我在俄國做生意的時候，屬於中俄易貨貿易發展的鼎盛時期。可惜中國商品品質太差，假冒偽劣太多。許多小販拉幫結夥，內外勾結，欺詐消費者，賺取非法暴利，導致俄國人不願意同中國人進行實物交換，而堅持現金交易。甚至蒙古國也開始警惕中國的小商小販，寧可花高點價錢，去買日本、韓國和臺灣產品。近來，中俄兩國更在石油天然氣方面出現貿易障礙，當然，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商業誠信問題，而涉及到戰略利益和政治互信的更高層次。看來，中俄兩國之間，如果沒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互信，貿易關係的發展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的生意摩擦時有發生。固然俄羅斯方面有其保守封閉和自高自大的缺陷，但我們同胞的假貨充斥，不講信譽，在俄國人心目中業已根深蒂固。

1996年，受一家美國公司委託，我去蒙古國赴任，擔任駐蒙商務處代表。

五，佛祖與上帝

1994年7月，我專門去拜謁了基輔著名的金門和索菲亞大教堂。金門是成吉思汗攻破基輔王國後，唯一沒有燒毀的建築。

我一路步行尋找金門，因不識路，走過了頭，被一位高個子、白頭髮、西服筆挺的人領到目的地。他自我介紹是歷史教授，我們談得很投機。交談很快從成吉思汗轉到紅衛兵。他問我：“紅衛兵什麼樣子，你能描繪一下嗎？你是紅衛兵嗎？”

1993年10月，在遠東最大的城市伊爾庫茨克，有個印度外交官，邀我參加一個沙龍。聚集在沙龍中的印度人、丹麥人等，均對“紅衛兵”表現了濃厚的興趣。一位法國歷史學教授，把我拉到一邊問：“你肯定參加過文化大革命？”我坦誠地告訴他：“我不僅參加了，而且是紅衛兵地方首領。我曾上過天安門，和毛澤東、林彪握過手，和周恩來一起吃過飯。”

他驚呆了，笑著說：“我見過不少中國人，他們都說自己僅僅是受害者，沒直接參加過文化革命¹²。你是第一個自稱紅衛兵領袖的人。”我說：“這有什麼，我從不認為青年不做錯事，可我沒幹過打家劫舍的壞事，沒有不可坦承的隱私。”他說：“我想在法國里昂大學開設文革這門課，可惜資料不足，你和我一塊去法國就好了。美國人也要開這門課。”

我清醒地知道，至今像我這樣的人，還無權按自己的意志和話語去評說

¹² 這位法國歷史教授沒有胡說，許多美國大學的東亞研究教授，包括專門從事文革研究的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專家們，也有同樣的困惑：為什麼中國學者異口同聲說，文革發動了億萬群眾，幾乎人人都被捲入其中，但問到他們本人，都說自己只是受害者，不是參加者。那麼都是誰參加了文革呢？如果人人都是受害者，那麼害人者又是誰呢？他們都從人間蒸發了嗎？唉！我的同胞，你們得了什麼病？是犬儒、健忘、近視、還是色盲？你們還有講真話的勇氣和能力嗎？

那段歷史，因此，我婉言謝絕了他的盛情。但我開始突破思索局限，對解惑的巨大能量深深迷戀。

中共是代表先進生產力，還是代表封建專制？文革是黨內矛盾的總爆發，還是百姓對壓抑的一次衝擊，抑或是毛領袖理想王國的殘酷嘗試？鄧大人是務實地扭轉了乾坤呢，還是把歷史的車輪撥向右方，以保護既得利益集團？……

對於這些問題的探索，一度佔據我的心靈。以我目前的條件和理論修養，決難單獨完成此項重任。但我相信，任何巨大工程，都從破土奠基開始，哪怕僅僅砌上一塊磚頭，加上一鏟土，也算沒有枉活今生今世，對得起為理想而犧牲的志士仁人，包括永遠活在我心中的韓桐和歐陽儒忱同學。

我的人生經歷多舛而豐滿，對上面的一些問題已經勾勒出模糊線條。我應永遠感謝佛祖和上帝。是至高無上的佛，在關鍵時刻救我於水火；現在上帝又賜我良機，助我完成人生的又一個年輪。

第五十六章

形形色色的人生（上）

下邊敘述幾位與我有“緣份”的人物。本來想把更多這類人士口述下來，以便從他們生命的紛繁中，擷取人生精華。可惜因健康原因，願望恐難實現。僅挑選幾位最熟識者，奉獻給讀者。

一，愧對趙克明老師

1964 年，我參加工作的第三年，系資料室周老師病倒，領導讓我兼管資料室。系裏專管打字的趙克明老師，也天天在這裏工作，他敲擊鍵盤的嗒嗒聲從早到晚，從資料室傳到走廊。

趙是以摘帽右派身份，調入剛組建的內蒙師院外語系的。按理講，帽子既然摘了，表明該人已回到人民之列。然而在現實中，“摘帽右派”又成為另一種政治身份，從黑色變灰色，仍然被排除在普通人群之外。趙一年四季總穿套黑藍色服裝，低著頭走路，無言無語；上班時，悶頭打字或校對。當時全系英、俄兩語種資料，均出自他的雙手。趙英語功底厚，俄語一字不通，但他很快能打俄語資料，流暢、連貫。可見能力之強。

他是天津人，一口地道天津腔。我祖籍靜海¹，算是老鄉，因此，屋內只剩下我們倆時，他會以老鄉稱呼我，小心問我一些院系內的事情。在他眼裏，我這個年輕黨員算是消息靈通人士。

平時系內只要有什麼額外活，趙肯定會被呼來喚去，沒人理會他正忙得四腳朝天。忙完額外事，他趕緊坐下來打字。

¹ 靜海，位於天津市西南 40 公里處，素有“津南門戶”之稱。史料記載，三千多年前這裡尚為海面，後經渤海逐年淤積，而變為陸地。原歸河北省天津專區管轄，1973 年 8 月 1 日改屬天津市。

1965年，是階級鬥爭天天講年代，我們系唯一的俄籍女教師阿拉回國不久，不知哪裏冒出“阿拉是蘇修特務”的傳言。趙經常被人指派，給這位俄籍教師送東西，是與之接觸較多者之一。對趙的調查從我開始，因為我倆同在資料室辦公。

系領導找我談話，我反問這位領導：“趙克明連半句俄語也不會，而阿拉也不懂中文英文，他怎麼與蘇修特務溝通？況且，全系誰不知道，趙克明去蘇修女老師那裏，沒有一次不是受人驅使，絕非他自己想去。”系領導無言以對。

一天，資料室只剩我和趙時，趙囁嚅地問我：“組織上……我又怎麼了？”他的眼神充溢痛苦、驚懼和不安。

我避開他那雙備受煎熬的眼睛，說：“你心裏別嘀咕，有人亂懷疑，沒什麼，很快就過去了。你該幹什麼幹什麼。”

1966年春天，全院學習毛的老三篇。外語系教工每星期三、六下午在電化教室學習討論。趙在公開場合從不發言。我至今弄不明白，趙這天第一個搶著發言，而且講了廿多分鐘。他前半段發言圍繞學毛選，後半段明顯地發起了牢騷，講自己生活多麼困難，有時到了斷炊地步，得不到什麼幫助，感到活得沒多大意思。同處資料室，不只一次聽過趙的這類情緒反應，我也安慰過他，知道他渲泄之後，心理會輕鬆些。可是，政治學習不是這種場合。他的話一打住，立時有幾位要求入黨的青年教師，群起攻之，斥趙“反黨本性難改”。趙象換了一個人，不再唯唯諾諾，脖子梗得直直的，時而不服氣地蹦出一兩句反駁²。我儘管理解趙的苦衷，但對黨的“忠誠”，不允許我退卻，或觀望。

我的發言扭轉了會場局面。我批評趙在這種場合，以這種方式訴苦是不適

² 如今回憶趙老師為什麼突然敢於講話，甚至敢於頂撞，其中原因讓人不寒而慄。聯想他當時家中的困難，加上心愛的幼女有病而無醫，很可能趙老師已經心生絕望，想自我了斷。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往往在萌生“一了百了”的念頭之後，一個人才容易突然改變行為方式，變得毫無顧忌。當然這只是我的分析和猜測。至於趙老師當時是否真如他說的那樣，對活著已經沒有興趣，後來又改變主意，堅持活下來，繼續忍辱負重，種種疑問，現在都已沒機會向他當面討教了。

宜的，不嚴肅的。我至今記得，對趙傷害最重的話是，“你若是發牢騷，那是在公開搞自由主義，你若是控訴，請問你在控訴誰？誰該你的，欠你的？”趙在我的發言後軟下來，我的話似乎擊中了他的要害，當然令入黨積極分子歡欣鼓舞。

事後，黨總支表揚了我，認為我立場堅定，嗅覺敏銳，我並沒有興奮。以別人的痛苦換取自己的快樂，與我的做人原則不容。

從此，見到趙老師更加佝僂的身影，聽到他更加急速的打字聲。半個多月後，是個大風天，我在操場邊遇到趙。他低著頭從我身邊擦肩而過，我叫住了他，他客氣地叫了我一聲“高老師”，我的心為之一縮。

他滿臉淒然，手從衣服口袋伸出，向我展開攥著的一個小孩用過的奶嘴，“三天前，我的小女兒死了。”啊，就是去年趙嫂抱到資料室的那個小女孩兒，一逗就笑，正牙牙學語的小女孩，漂亮聰穎，怎麼說沒就沒了！我的心涼了半截，呼嘯的大風提示我應說點什麼。“趙老師，你要節哀，那天會上……”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提起那天的會。他立即打斷我的話：“別說了，我已習慣了。”說完，他轉身向牆外走去，大風捲著他的衣角向後扯動。佝僂、蒼老的身影，在沙塵中漸漸模糊。我和趙之間失去了往日情義，他肯定認為離我這種黨員遠點兒好。

在忙碌的文革歲月，沒時間回憶這段往事。1977年至1983年，我被關押的一天，突然想起了趙，想起他在大風中那聲讓我心寒的“高老師”的稱呼。以我如今被人岐視的角度，打心裏厭惡以往那種折磨心靈的政治學習，尤其討厭我這類黨員或積極分子氣勢洶洶的可卑面孔。我不明白，這個世界，本可更人性一些，為什麼非要充滿仇恨、猜忌、殘忍和冷漠？

獄中的回憶和反思讓我明白，我那天的發言傷害了趙老師。在他心目中，我原是一個尚有點人性的黨員。但從那天起，顯然封殺了他一息尚存的美好期待，讓他極為傷心。加之，貧病交迫中，他又失去了可愛的小女兒，這一切，對他太不公平了……

出獄後，我曾帶著負疚心情找過他。得知趙老師平反後調走了，他不想再和這個讓他傷心的單位打交道。我想，我慢慢總會知道他的所在，並當面向

他致歉。

1995 年，我在大青山公墓安置了父母的遺骨，順便看了看周圍的墓碑，無意中在右後方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上，發現刻著“趙克明”三個字。莫非是重名？當我讀完碑文，推斷出這就是我曾經傷害過，總想找機會向他道歉的那位趙老師。

我欲哭無淚，對著這塊碑石，對這位在人世間受盡苦難的人，深深地三鞠躬，以表達我對他的歉疚與悔恨。

從此之後，每年祭奠父母，我總在趙老師的碑前停留片刻，和他說說話。

二，烏蘭夫的“三公子”力沙克³

1963 年春，外語系分來一名黨員教師，他自我介紹叫力沙克。沒幾天，消息傳遍全院：力是自治區主席烏蘭夫的三兒子。

力沙克形似其父，身材頎長，高 1.80 米以上，騎一輛灰色的外國自行車，車座提得高高的。那時候的人感到他的自行車和名字一樣怪，讓人感到好奇而神秘。

入夏前，力沙克向系裏申請一個鋪位，以備夏天午休用。孫秘書把力沙克分到我的屋內。我和力沙克的共同話題從文學開始。力沙克有一定文學造詣，漸漸兩人談得廣，且談得深。有幾次他給我帶來只有高幹才讀得到的內部作品（如蘇聯作家愛倫堡的回憶錄等）。兩人的關係逐漸密切，談論的話題，也從文學轉入政治領域。我從未出過學校大門，對社會，對政治的瞭解，幾乎全部來自報刊和黨的教誨。與自幼隨母到延安，後在蘇聯留過學的力沙克相比，我沒什麼發言權。那時，力沙克很關注內蒙政壇。其長兄布赫任內蒙文化局長，其姐雲曙碧及姐夫石光華任哲盟盟委書記。他瞭解的內蒙政局，我聞所未聞。比我年長七歲的老力，自然常以成熟的兄長自居，我甘拜下風。

³ 這是烏傑在內蒙師院工作時的名字。稱力沙克為“三太子”或者“三公子”，是文革時流

力沙克到內蒙師院，院領導自然很重視，想方設法與力接觸，力並不把院領導放在眼裏。但對系內老師卻平等相處。

1963 年春，原師院黨委書記特木爾巴根因“民族問題”被批判。宣傳部副部長潮洛蒙到師院當工作組組長，協助黨委書記紀之工作。潮是土旗蒙古族幹部中年輕有為的政治新星，力沙克與潮關係密切。力在課後去師院辦公樓找潮，不論潮正在辦什麼重大事情，只要力進門，接待力便成為第一要事，其他人全要退出。

一直到工作組撤出師院，我和潮也只不過是他在台上講話，我在台下聆聽這樣的關係。沒想到，文革初期，卻被一些人演繹為潮洛蒙是我的黑後台，我是烏蘭夫黑幫分子。

其實，力沙克從沒把心思放在教學上，對於一個在蘇聯留學的人，教這點俄語根本算不了什麼。他正在創作一部長篇小說，同時準備隨時踏入政界。1964 年，四清運動開始，力沙克離開外語系，參加了四清工作團，從此，他再沒回到師院工作。

力每月的工資仍在外語系發。平時給力沙克送工資的系秘書，正身懷六甲，領導發話，把送工資的事交予我辦。對此小事，於公於私我無法推託，一來二去，竟成常例，直到文革開始。

力沙克已婚，妻子楊珍雲是北京煤礦文工團舞蹈演員，後借調到上海歌舞劇院。力在外語系時，和母親雲婷同住布赫家。我除送力的工資，還常送系裏分的福利品。開始，我把工資交給雲婷老媽媽便走。一次，看見雲媽媽吃力地劈木柴，我便拿起斧頭幫老人劈了一大堆。後來，送工資時，我總幫雲媽媽幹點老人難應付的家務。雲媽媽每次都留我吃飯，我總找藉口婉拒，幹完活即回校。時間長了，雲媽媽對我印象極好。

去布赫家多了，有時會碰到布赫、布的妻子珠嵐及布家的客人（如文辦副主任趙戈銳等）。慢慢我與布赫家的人熟了。

1966 年 6 月 3 日，我和劉樸、樓基立、劉真貼出大字報後，正在二毛的力沙克打電話問我，大字報是否我所為。第二天他來校看了大字報後，對我說：“這張大字報沒問題，你不要怕人圍攻，真正對你的磨難可能開始了。”

1966年7、8月份，在“破四舊”風暴中，內蒙師院揪出100多名批鬥目標，力沙克也被揪回，通通關進北門外原教師俱樂部。白天批鬥或強迫勞動；晚間不准回家。由當時的工作組、工作隊和新成立的院文革籌委會負責看押。1966年11月，全國大串聯，師院兩派紅衛兵走了很多。“文革籌委會”無聲瓦解。接替“籌委會”管“黑幫隊”的，是造反派的外語系英四學生姜振華，他對力沙克比較關照。

一天下午，姜振華找到我，低聲說：“力沙克想和你見一面。”“他有什麼事？”我問。

“他想離開這裏，回上海。”姜振華又說：“我和梅老師商量，讓力沙克在那裏等著，你去和他談談吧，已經要求幾次了。”

梅青田是我大學老師，為人正直。文革中和我一起參與造反，他的妻子是系秘書。當晚，我在梅老師家見到力沙克。

力滿臉鬍鬚，很削瘦，穿件破舊的棉軍衣，一雙舊皮鞋，身上的傲氣少了許多。在整個家族遭到滅頂之災時，他不流淚，沒抱怨，只是平靜地講述自己的要求：“我只想回家看看，不知楊珍雲怎麼樣了，我很牽掛她。現在只能求助你了。”

我和力沙克是同事，倆人之間存在著友情義，古典小說裏的“俠肝義膽”，在我身上立刻發酵，政治風險被拋到腦後。他遭遇大難，我不能不管。這是上午姜振華找過我後，我思前想後打定的主意。我知道，力沙克每天關押在黑幫隊，沒多少人理會，他若跑掉了，必會引起大的反響，後果可想而知。因此，我整個下午在屋內反復思慮，確定了一個方案。我對力說：“希望你挺得住，這也是六月份你對我說過的。我會幫你。雲媽媽那裏我也會幫助。我已找到她，她很安全，你放心好了。”之後，我把整個“逃上海”的方案告訴他，包括一些細節。我把他工作證上的照片揭下來，約定第二天晚六時，在教師俱樂部北高粱地裏見面，我爲他準備好一切。

我說：“不是不相信梅老師和姜振華，爲了安全必須謹慎。一會兒，我要高聲申斥你，你也要向姜、梅抱怨我不肯幫忙。記住，明天下午六點，刮了鬍子，皮鞋擦淨，我爲你準備一副手套。”

第二天下午六時，天色暗下來。在高粱地裏，我給力沙克罩上件藍單衣，嘴上捂個大口罩，左臂戴一幅紅衛兵袖章，同時將一個偽造的紅衛兵證交給他，並掏出身上僅有的 20 多元錢讓他零用。一切齊備後，他坐在我自行車的後架上，兩人直奔火車站。

火車上的硬臥臨時當硬座用。我安排力沙克睡在一個上面的鋪位。我囑咐他三件事，並要求他一定照辦。第一，明早到京，不要出站，直接換去上海的車，如沒有，去南京、濟南的車都行，千萬不要在北京停。離內蒙越遠越不容易被認出；第二，切記紅衛兵證上的名字是王平，不是力沙克。要裝成天不怕，地不怕；第三，“千萬別回來，什麼時候回來，我會派可靠人找到你。今後事情怎麼發展，難料。”力沙克當時很激動，答應按我的話辦。

兩天後，“力沙克跑了”的消息傳遍全院，東縱總部貼出通緝令。梅老師悄悄問我力沙克去向，我假裝一無所知。冬天，很少有人再提起力沙克。我估計他安全了。這期間，楊珍雲懷孕，生下他倆唯一的兒子。1975 年冬，我曾見過這孩子，聰明、淘氣。

1967 年秋冬，我正為昭盟大聯合焦頭爛額，梅老師找到我說：“力沙克夏天就回來了，回來即被抓住，勞教隊（黑幫隊改名）已解散，把他交給外語系學生監管。他給你寫了封信，我找你好幾個月，真難找。”力在信中再次要求幫他回上海。說實話，我對力不聽招呼，自己跑回來挨整，可惜又可氣。現在，他又提出再走，此時非彼時，條件已完全不允許了，他想得太簡單了。師院正在軍訓後期，有軍隊幹部在管理，怎能逃得出去？我裝好信，對梅說：“現在不可能，讓他先呆著，以後再說吧。”

後來，梅老師告訴我，力對我挺生氣。可能力沙克以為，此時的高某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完全錯估我的能量，更對險惡的政治形勢懵懂無知。內蒙革委會成立後，開展“挖肅”運動，有人要利用“七人黑信”和力沙克，以圖打垮高樹華。

1968 年春，師院揪烏聯隊等挖派組織，在內蒙農業學校設了一個 318 專案組，把烏蘭夫家族的小字輩親屬抓來，關押在這裏，其中也有力沙克的妻子楊珍雲。一天晚飯後，力沙克從衛生間出來時，一個非外語系學生對力說：

“力老師，外面有人找你。”力毫無戒備，隨該人走出樓外，立即被埋伏的人綁架，塞進一輛吉普車內。待外語系學生追出來，人車已不見蹤影。出面幹這件事的，是師院物理系學生丁克明和市體委金永紅等。

力沙克先被拉到市體委刑訊逼供，後轉到一些工廠藏匿。一天傍晚，又把力沙克轉移到新建的內蒙醫院高層樓上。後半夜，力趁人睡熟，跑下樓，翻過牆，逃入師院，叫開外語系負責人劉樸的門，劉立即通知總部郭是海、董玉華。當董輾轉找到我時已快天亮，師院被重重包圍，轉移力沙克爲時已晚。

秦維憲、戈志盛，及郝廣德等人，動員一些外單位的造反派來包圍師院，說師院東縱出事了，請求支援。有幾百人是金永紅特意組織來的打手，個個手持兇器。師院幾百名學生攔在大門口，不准進入。大規模武鬥一觸即發。天剛亮，預感事態嚴重的滕海清、吳濤、高錦明等，緊急將師院兩派負責人叫到新城賓館，高樹華、郝廣德、劉文研也分別到場。核心小組當場決定，兩派人馬立即撤回，力沙克交給核心小組。從此，力沙克在呼市看守所被“保護”起來，長達五年之久。

1973年冬，我在呼鋼招待所開會，姜振華領著剛從看守所出來的力沙克來找我。晚飯後，我和力在我的房間裏一直談到後半夜。我問他，有沒有需要幫忙的事，他說，他自由了，但公安局一直要收他的飯錢。因爲當年把他放在看守所，只是“保護性寄放”，力沙克出來補發了全部工資，該收飯費。力說：“又不是我自願選擇到那種地方，那麼多關押的人都不交飯費，爲什麼單收我的？”第二天，我跑了一趟公安局，解決了他的問題。

第二年春，開始批林批孔。一天下午，按雲婷媽媽的口信，我去了給布赫新分的寓所，內蒙黨委一套三居室樓房。我進屋時，布赫、珠嵐、烏賓（力沙克二哥，後改名烏克力）和力沙克都在，桌上擺了許多美食。雲媽媽說：“沒別的意思，讓你們哥四個聚會聚會。”我很高興，這個家庭大難不死，應感謝上蒼。雲媽媽提起受難時，我派人送來米麵。珠嵐提起一次送藥的事。我說：“應該辦的事很多，我當時也得偷偷做。事情過去了，不提它了。”話題很快轉到文革會如何，幾個人認識一致：沒後勁了，文革不過如此。烏

賓插話，要找人組織批林批孔聯絡站，在內蒙大幹一場。我極力勸阻：“誰能說清楚江青一夥人要幹什麼，萬萬不可莽撞。休養生息是最佳策略。”雲媽媽、布赫、珠嵐都同意我的看法。

力沙克歷經磨難後，調到中科院，楊珍雲已到民族歌舞團，團內給了一套住房。沒多久，雲媽媽去世，我事後聽人告之。未能為這位慈祥敦厚的老人送別，我甚為遺憾。

1975 年春，在京參加四屆人大期間，遇到雲曙碧大姐，我問她能不能見到烏傑（力沙克到京後又恢復過去原名）。力沙克很快來了，還有他的妻子楊珍雲和他們的兒子。在僻靜處，很快轉入最敏感的話題——鄧小平出山。他興奮地說：“鄧出來就好了，他不會放過江青一夥。總理病很重，主席身體也不行了，今後是鄧小平主事，到那時一切會好起來。”

我半開玩笑地問他：“我可能被劃到江青這邊，到時候你會不會拉老弟一把？”他毫不猶豫地說：“你不會有事的，我們都知道你的觀點，你不會有什麼事的。”

1977 年 12 月，我被隔離後，妻子記起我與力沙克 1975 年的談話，趁去京出差，給力沙克撥通電話，希望見他一面。力沙克答覆得很勉強，妻子毅然斷絕與力沙克見面的念頭⁴，決定自己的事自己辦，哪怕再難。1983 年 7 月，我恢復自由，到處傳說是力沙克在北京找了什麼人，才放了我云云。有人和我核對，我反問：“你信嗎？”1989 年，我和朋友成立了一個兒童智力開發研究諮詢所，免費給家長講座和諮詢，但場地費用要自掏腰包。為難之時，擔任內蒙兒童基金會會長的雲曙碧大姐幫了一忙，使諮詢工作得以持續。烏傑後留學美國，回國不久，先後任赤峰市副市長、包頭市長、山西省副省長，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等職。

⁴ 我這裡不想猜測，到底是力不念舊情，還是另有苦衷。總之，在我落難的五年多時間裏，烏蘭夫及其家族一個個官復原職，更上層樓，他們如果願意，完全有能力說句公道話，或打個招呼，證明我沒有害過他們，這並非他們的份外之事。但是，我既沒有奢望力能這麼做，他也從沒有過問過我的事情。他落難時求我幫忙，好像應當應份，如今我妻子要見他一面，好像很不應該。據其他朋友講，這種“不對稱邏輯”，並非力的個性決定，乃是許多太子黨的共同特徵。當然，我在土左旗的所作所為，也不被其家族認同。

1995 年秋，我從歐洲回到京城，住進美術館後街的內蒙賓館。一天晚飯後，我正要上樓，只見一位穿警服的人站在電梯前阻攔人群，不讓靠近，並大聲喊：“大家等等，有首長下來。”我開玩笑地說：“你別急，沒人暗害他，所有人的命都值錢。”

話畢，電梯內走出一人，正是布赫，他立即認出了我，邊說邊拉我往人群外走：“在裏面聽話音猜出是個你，怎麼樣，聽說老弟幹得不錯嘛。”布赫很友善，對友善是不能拒絕的⁵。在大廳椅子上，他問我現在幹什麼，順利不順利等，此時，他正在人大副委員長任上。我看保鏢焦急上火，希望首長趕快離開，我也沒心思和首長深談。他說：“我們多少次談到你，烏傑總想見見你，怎麼樣，約個時間好嗎，我能查到你的房間號。”布赫說罷，被保鏢們簇擁而去。

這年我已 54 歲，早該“知天命”了⁶，我不再似當年那般幼稚，深知“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斷續相識多年，我不沾烏蘭夫這個圈子的邊，主觀客觀皆然。文革中，我是烏蘭夫黑幫分子、第五縱隊；清查中，又成了反烏蘭夫的罪人。當權者兩次進攻，都找錯了對象，其實我什麼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領教夠了。肥皂泡早已破滅，故事何不趕快結束。

當晚，我斷然搬出內蒙賓館，中止了這場夢一般的來往。

⁵ 據一位朋友分析：像布赫這樣身居高位的人，未能完全忘卻舊情，尚能在電梯口主動同我這樣的人搭訕，且坐下來聊上三五句話，已經屬於高官中較有人性者。假裝沒看見我，完全正常，看見了點個頭，亦算不錯。如果再有更高奢望，例如所謂“平等交往”之類，只能是我自己的頭腦有問題。

⁶ 中國古語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意為思維漸趨成熟，經驗老道，在大是大非上，不再輕易受騙上當了。

第五十七章

形形色色的人生（下）

文革前，那順巴雅爾是教育廳的一般黨員幹部，錫盟蒙族。妻子哈森是師院數學系秘書。文革開始後，我被打成烏蘭夫黑幫分子，造反派和工作組針鋒相對，引人注目。那順是支持我們的，他每天都來看大字報，把消息傳送給很多人。

一，反對打內人黨的那順巴雅爾

1967 年北京四方談判時，那順也成了代表團成員，除了參加接見外，他主要負責接待工作，接待各盟市到北京上訪沒地方吃、住，因而向我們求助的人。這件工作既繁雜，又勞累，一天 24 小時不停。我們自身的壓力已很大，未來禍福難料，解決這些人的問題便是額外負擔。這個時候，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態度和人品。

那順從不叫苦，也不上火，自始至終熱情接待上訪的人。

革委會成立後，設立了一個農村牧區文化革命小組，那順任組長。他在阿巴嘎旗調查後，總結出如何大聯合、三結合的一套好經驗。挖肅開始，他在常委會上頂風冒險，反映下情，當場講了一個真實笑話：當問牧民“誰是內人黨”時，牧民說了幾個蒙語詞：土地、藍天、白雲，挖的人聽不懂，待搞懂後方知受騙¹。

批滕時，那順情緒激烈，因為他的許多親戚朋友被打成內人黨，感受很深，我同情他的遭遇，理解他的立場。

¹ 類似故事還有許多，詳見圖們，祝東力合著的《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一書，第 200—205 頁。1995 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另請參考阿拉騰德力海所編著的書稿：《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第 85—116 頁，1999 年 9 月印刷。其中既有數字，也有具體案例。

1976年，那順任錫盟革委會副主任、黨委書記。清查中，他是最早被審查的人之一，關押在一個水庫辦公室內。純樸的牧民成群去看他，給他送奶食品。審查結束，那順保住了黨籍，分到錫盟一個縣工作。1983年我從監獄放出，他來看我，爲我開脫，胸襟十分寬闊。1983年秋，我從工廠回家，路遇那順。那興致很高，說他辦了一個公司，掛靠在民委下面²，生意做得很好。隨之問我掙多少錢，我說我是勞動改造，每月給生活費40元。他吃驚道：“算了，到我那兒去，每月給你200元，400元也行，你的才幹當個經理沒問題。”我說：“我不能和你比，讓你掛靠一個單位名下，說明你有支撐點，我可沒有。”我感謝他的好意，希望他謹慎。他自信地說：“鄧小平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嗎，那我想先富起來。”我提醒他，先富起來是不是包括我們這些人，腦子還是想清楚。他似乎不明玄機，仍興致勃勃經營公司，還拉了戈志盛等人入夥，終於引起當局注意。不久那順出事，因“投機倒把罪”被判刑。

那順服刑期間，不幸得了肝癌，准予保外就醫。我帶去“安慰”口信，他雖是肝癌晚期，仍十分興奮：“病好出來後，與樹華大搞一場，要火一把。”可惜病魔不給他“火”的機會，反而奪去了他的生命。那順熱情、爽快，對人坦誠，雖很多觀點與我不同，但我們私交不錯，夠朋友。

那順因公開反對挖烏蘭夫黑線，反對挖內人黨而被批判。滕海清等人若能聽聽那順的意見，內人黨也不會打得那麼慘，成爲著名冤案。那順暗中保護了一部分少數民族幹部，這多少幫他減輕了後來的政治懲罰。

二，段祺瑞之孫段建勳

段建勳，河北人，文革期間，爲呼市著名造反派，曾任內蒙古第二毛紡廠（內蒙最大毛紡企業）革委會副主任。

²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真正的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還很少。鄧小平允許甚至鼓勵黨政軍機關辦公司，頓時掀起黨政軍民齊經商的浪潮。由於大部分業務都是運用權力經營，賺取壟斷差價，因此很難與政府脫鉤，也不允許脫鉤，於是才出現了“掛靠”。意思是說，一個經營性公司，必要歸口或者從屬於某一政府部門，那時有個順口溜：“資金上面給，人員上面派，賠錢是國家的，賺錢是小金庫的，撈到好處大家分，出了問題上面兜。”

文革初期，孫儉科首先在二毛貼大字報造反，驅趕壓制工人群眾的四清工作隊。段支持孫，兩個人曾志同道合。

中央八條下達後，軍宣隊進廠，一方面解決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關係，又解決造反派內段派與孫派關係，終於達到大聯合，成立了廠革委會，孫和段均為副主任。1968年，二毛保守派在廠內重新聚集，以挖內人黨之由，把段建勳打成內人黨。段的妻子楊秀蘭給我捎來段的口信：“你這次不救，我必死無疑。”我迅速讓人去瞭解二毛情況，直接找滕辦。我觀點明確：“二毛不是打內人黨，是以此為名，把不同觀點的造反派置於死地。”滕辦人員怒斥二毛軍宣隊胡鬧，並讓他們立即放人。

1969年7月，中央給內蒙各派在北京空軍學院辦學習班，我和段都參加了。在8月12日的接見中，江青當眾訓斥了我和王金保。那時，段建勳常陪伴我。一天，兩人在頤和園登上萬壽山北側。我倆躺在藍天下，段建勳講述中國歷史君昏臣變的故事。他講一段，我插話一段，聯繫現實，共同作出否定江青的結論，最後相視而笑。段的聰明來自讀書，以中外歷史最厚實。

段協助二毛革委會的一位老幹部，分管二毛後勤，有批賣毛紡品零頭或殘次品³的權利。段對我說：“你那些朋友能交往的不多，有幾位認識我很高興，是因為我能給他們毛料零頭實惠。在我的朋友中，只有一個人從不開口找我辦這類事，就是你。”

我笑笑說：“我是不需要，如果需要會找你。那些朋友的需求強些，你靈活掌握，看著辦，不必犯難。”兩人會意。

清查運動中，二毛段建勳、孫儉科及其主要夥伴均在清查之列。段說清楚了廠內及社會的問題後，立即提出自己被打成新內人黨的問題，要求解決。段很快解除隔離，回廠落實內人黨政策。兩年多後，在一些老幹部扶持下，段建勳被任命為市紡織機械廠廠長，後兼任書記，很快把該廠打造為段氏天下。

段曾因經濟犯罪被捕，判處10年徒刑。據說，段很快“保外就醫”回家，

³ 在當時，物資供應仍然短缺，買布還需要布票。而能買到不要布票而且物美價廉的毛料處理品，在當時應該算是很大的幸運和特權。不但親戚朋友高興，許多領導幹部也很看重這種小實惠。

躲去牢獄之苦。我從監獄出來後，以自己的灰色身份，不願給走上仕途的段，造成任何不利影響，時至今日，我再未見過段。不知段琪瑞的後代，如今可好。

三，祭奠葉融

知道葉融及其妻秦屏倆人的名字，是在 1966 年文革初期。1966 年 6 月，有人夜裏把大字報貼在中山路消防隊大門，披露內蒙黨委一位書記，在天津嫖妓被抓。這張大字報只貼出一個多小時，即被幾個坐小汽車的人撕掉了。大字報署名是一人戰鬥小組。

10 月的一天，師院東縱總部漢三學生郭是海悄悄問我：“你知道一人戰鬥小組是誰嗎？”他說：“這個人叫葉融，是個很有思想的人，解放初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幾天後，我隨郭是海在新城南街一個雜亂的小院裏，找到葉融的家。乾隆四年，歸綏建城駐軍。城中央有座堂皇的將軍衙署，四周建了許多土坯混磚房，組合成一個個大院，供隨軍人員住。葉融住在這樣一個大雜院的西房。全家五口人把一間西房開成裏外間（滿式房特點是屋內地面比屋外低），各有一個土炕，地上有幾張破桌舊椅。

葉融身高 1 米 60 多，一臉濃濃的絡腮胡，一雙銳利的小眼睛，從黑框鏡片後打量著我。他正在一個自製繪圖架上畫著什麼。

郭是海向葉融介紹了我，交給他想要的師院各戰鬥隊傳單和大字報。葉融像得到了寶貝，臉上笑容真實自然。

“你們是純真的年輕人，我要能和你們交往下去，必須真實地介紹一下自己，你們拿主意。”

我注意他用的“純真”一詞，他的目光和表情不包含卑微和媚俗。以下是他的敘述：

解放前，我在清華大學建築系讀書，參加了青年團的學生組織。當時，我父親在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工作，我從他那裏得到什麼情報便告訴組織。由於表現突出，解放前，我加入了青年團（後改名共青

團)。組織信任成了我生活的動力。

剛解放，我提供線索，協助公安機關抓到藏匿的父親和他的漏網同夥。黨組織對我很欣賞，大學畢業時，把我留在北京建築設計院工作。這是我一生最輝煌的時期。

1953年，鎮壓反革命運動結束。復查時，黨組織得到舉報，說我父親藏了一把手槍。當時，他正在獄中服刑，找他核實，我父親一口否認，黨組織又找我瞭解。

那時，我與黨是心貼心的，我向組織保證，沒聽說過槍的事。出於忠心，我詳細報告了我父親曾換過幾處住所，哪條街，哪間房，並繪製了圖。我把能想到的，毫無保留地獻給黨。

事情似乎應該了結，但組織上沒依沒饒。北京公安三番五次追問我槍的事。他們只差一句沒說，“槍的事你知道，是你藏起來的。”我感到委屈，我對他們真誠表白：“連反革命的父親我都不吝惜，我幹什麼要藏一把槍？”

葉融說得很激動，從製圖架後的椅子上站起來，雙手上下左右劃動。椅子歪歪扭扭，幾乎要散架。我注意，外屋有個老人正在捅火，我搞不清老人是微胖，還是浮腫，舉動緩慢而遲鈍。

葉融很快抑制了自己的情緒，接著說：

我這人脾氣不好，易激動，暴躁起來常忘後果。

槍的事出現後不久，院領導明顯遠離我，不再信任我。這種無聲的壓力讓我忍受不了。我審視自己，為什麼選擇這樣一條人生路。葉家是大財主，叔叔們已跑到香港、台灣，多次動員我們過去，我父親是因為我才留下的。我痛恨國民黨腐敗，決心站在人民一邊，我的赤膽忠心被人懷疑，我受不了。

一年後，北京建築設計院以支援邊疆，充實基層名義，把我們全家下放到內蒙建築設計院。幾個要好同學為我送行，把打聽到的消息

告訴我，槍的事還沒完，要小心行事，並對我“約法三章”：不發脾氣，不和領導衝突，學會低頭做人。

葉融按住話頭，兩眼炯炯有神，仰天大笑幾聲後繼續說。

唉，老友的忠告出於愛護，可我實在做不到，我這口氣咽不下去，頭低不下來。我敢肯定，我的政治鑒定⁴屬“不可靠”之類，去內蒙必然過著被人懷疑，受人岐視的日子。

說忍，我真是忍了幾年。儘量不說話，只幹活兒。上下承認，我的業務水準最好。我心裏只有一個願望，平平安安把孩子帶大，相信槍的事情總會搞清楚的。

可是，我終於沒逃過 1957 年打右派這一關。其他右派有反黨言論，有大字報或發言，我沒寫過大字報，逢開會必須表態時，總說共產黨好話，給領導燒高香。他們仍沒放過我，說“別看不說不寫，從葉融的表情、眼光可論斷，葉融骨子裏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許多年後，單位同事向我透露，反右一開始，組織內定的第一個右派就是葉融。

初冬的陽光射入低矮的平房，給屋內增添了幾分暖意，葉融臉上掠過一絲冷笑。他平靜地象在講另一個無關人的事情。

那時，沒有人爲我辯白，人到這份兒上，我不能不爲自己辯白，既然怎麼都沒活路，爲什麼不據理力爭？

我明知，爭到的可能是更爲嚴峻的現實，但我爭了，我說了我該

⁴ “政治鑒定”，是對單位成員定期或不定期進行的政治表現總結，一般由單位領導起草，負責政治審查的部門討論決定，交給本人過目之後，裝入人事檔案中。無論個人調動到什麼地方和單位，人事檔案都會作為機密材料，隨之轉移到新單位。實際操作中，處罰性的鑒定，常常不經本人過目，甚至本人毫不知情，就裝進檔案中，讓當事人一輩子背著包袱。在中共歷史上，利用政治鑒定和人事檔案整人、害人甚至殺人的事情，屢見不鮮。

說的話，我不後悔。我對領導說，我儘管社會關係複雜，選擇走革命的路是我自願的，我不反對共產黨，我不是反黨分子。爲這次辯白，我被下放到農村改造。半年後，公安機關對我專政，判我勞教三年。我終於沉入社會最底層。

失去自由的日子就別說了。好在妻子秦屏在內蒙歌劇團有份工資，單位分了這間平房足以安身。我當臨時工或外出挖土方，砌牆或繪製圖紙，對我都一樣，養家餬口而已。

葉融的事讓我陷入矛盾中，我既不能支持他，同情他，又不相信他在撒謊，在惡意攻擊黨組織。我無法形容內心的巨大震撼⁵。

就在這天，我和郭是海問他寫的大字報內容有多少真實性。

葉說，他愛人秦屏在內蒙歌劇團當會計，認識很多演藝界的人。內蒙黨委這位書記，常在女演員中選妃子，這在文藝界算不上秘密。前兩年，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這位書記，週末到天津，在工廠宿舍與一個身份特殊、和外國使館有染的年輕女人通姦，被該廠保衛科抓住。中央黨校派人領出，交給內蒙。因爲他是省委書記，只內部“處理”了事。文革中，黨委造反派先後抄了書記的家和辦公室，從桌內搜出四張照片，其中有兩張是書記給這個女人親自拍的裸照與半裸照。顯然，葉融沒有誣陷書記大人。

1966年11月，我去北京串聯，住在什錦花園的內蒙駐京辦事處。一天晚飯前，遇見呼市公安局幾名幹部，我認識其中的喬萬寶。喬對我說：“住在辦事處的人員太雜，對造反派名聲不好。像葉融這樣有反革命嫌疑的人，也住在這裏，還是個小頭頭。”我試探地問：“葉融的反革命嫌疑指什麼，是哪年的事兒？”他神秘地說：“解放初鎮反時，葉融藏了他老子的手槍，至今無下落。他本人是右派，被勞教過。這都是公安上記錄在案的。”

⁵ 回首往事，值得感慨的頗多。也許正是由於我當年的思想過於單純（葉融叫做純真），對毛領袖和中共體制絕對信仰，才有可能寫出那張“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字報。假如我的親屬中有類似葉融的人，或者我早幾年就熟知了他那些可怕的經歷，我也許會少一些衝動，多幾分成熟。當我本人對政治的殘酷性有了切身體會之後，才對葉融案件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大的同情。

“槍的事情”吸引了我，顯然，這和葉融自己說的一致。我不由地想起槍的“疑案”或神話，給葉融這十多年帶來的厄運。對葉融而言，打也打了，罰也罰了，組織上查不清的問題，難道讓葉融背一輩子，直到進入墳墓？我不寒而慄，陡然生出一種與職業公安格格不入的情緒。

我對葉融夫婦的印象，那是一對患難夫妻，清清爽爽的人。與喬等人分手後，我從一間瀰漫著煙草味的大屋裏找到葉融。和葉融在一起的是家居呼市的合同工、臨時工。葉融是這群人中學歷最高、見識最多的人。他們組建了一個名為“臨時工合同工造反司令部”的組織，有數千人，葉融是總部成員之一。

突然會面，葉融很興奮。我邀他出來，沿胡同走到美術館，再向南折，邊走邊談。我告訴他，中央不允許成立全國性組織，已經成立的紅旗軍已宣佈取締。我勸他立即停止北京活動，“回內蒙去，那裏的事情足夠我們做的。”他同意了⁶。

我們穿過長安街，走到台基廠。正是吃晚飯時刻，我指著一家街角的飯館說：“周總理曾光顧這家小飯鋪，裏面的牛肉餅和紅豆粥很好。”葉融走進飯鋪時臉上溢滿孩子般的興奮。

三個厚厚的肉餅和兩碗甜粥落肚，葉融自言自語說：“我們每天每人只吃兩個火燒，今晚是我多年來吃的最舒服的一頓飯。”當時我在大學的工資僅有49.5元，我知道身上缺錢對離家奔忙的人意味著什麼。我掏給他5元錢，對他說：“收下吧，這可買30碗麵條或50多個北京火燒，人不能餓著。”

剎那猶豫後，他收下了5塊錢，我感到兩人的交往是真誠的。返回的路上，我們的交談比來時輕鬆，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一起哼唱蘇聯歌曲《山楂樹》和《卡秋莎》。快到辦事處大門口了，他把腳步放慢，喃喃地說：“真難得有這麼愉快的夜晚！”

我說：“葉融，我們是朋友，你今後有什麼事儘管來找我，你和秦屏活得太難了。”他抓住我的手說：“不，我不能打擾你。能交上你這樣的朋友我很

⁶ 這次傳話不久，中央文革果然宣佈取締八個跨地區、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其中包括：臨時工、復員轉業軍人、上山下鄉青年等等。如果葉融當時沒有激流勇退，撤出其活動，很可能在北京被抓捕判刑，但不大會處以極刑。

滿足了。現在，我原單位有人想用我的所謂歷史問題來打你，我必須在公眾場合遠離你，你要理解。”

分手時，我竟有些癡呆：“天啊，葉融難得這樣仗義！”

1967年4月下旬，每天有成百輛汽車在街上遊行，抗議中央的4.13決定。全市的造反派骨幹，只能日夜躲在內蒙師院各個樓內，有家回不得。一天，我在辦公樓樓梯口碰上葉融。他想順樓道拐彎躲開我，我還是叫住了他。再三追問下，他才告訴我，他的孩子和秦屏都在師院教學大樓內，每天睡水泥地面。

我把他們全家領到我在教工二樓的宿舍。秦屏說，他們身無分文，已斷炊多天，靠避難的造反派戰友周濟，才沒餓肚子。

1967年冬，內蒙革委會成立，全區挖肅，新一輪階級鬥爭開始。一天早晨，我在革委會大門口碰見面色驚慌的秦屏，她急忙告訴我，葉融讓保衛人員抓進大院內了。在一樓的警衛室裏，我見葉融正與三個人爭辯：“我雙手擁護內蒙革委會成立，可我自己連吃飯也難。我多次正面反映，只求一份工作，給我機會養家餬口，可沒人幫我解決，我相信新生紅色政權，才來這裏找你們，爲什麼要抓我？”我把葉融領到信訪室，那裏的頭頭和我熟，我和他們一起找到管經濟的常委雷代夫，幫葉融解決了冬天的取暖吃飯問題。我當時沒認真考慮葉融的個人生計，那時，我本可幫他找一份較穩當的臨時工作，讓他在幾年內不必爲生存奔波⁷。

那個時代，包括我在內，都是靠微薄工資養活老人孩子。秦屏起碼有份工資，爲什麼葉融家總沒飯吃？這個疑問肯定在我表情中帶出了幾分。以他那極強的自尊，我的表情肯定傷害了他。那天，我們的分手是客氣的，淡淡的。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葉融。他仍穿那套破舊的勞動布工裝，那雙已裂了口的皮鞋。

1969年冬，內蒙軍管，全體幹部端往唐山、陽高等地辦學習班。就是這年冬天，還是在這個大門口，過冬困難的葉融，穿著用牛皮紙糊的衣服，手舉要

⁷ 至今回想起來，我依然十分悔恨。按理說，儘管我不在權力核心，但起碼，找找私人關係，給他解決一個臨時工的職業，然後再慢慢轉正，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沒把它當嚴重問題過問，應該說對不住朋友。當然，以葉融的個性，或許他要抗爭的，並非是一碗飯，而是還他歷史清白，並恢復他勞教前的職務。在那個年代，我個人來說，恐難辦到。當然，那段時間軍管會鎮壓之狠，量刑之重，草菅人命，恐怕也創了歷史記錄。

求工作的紙牌，被軍管會抓走。不久，他被軍管會判處死刑，罪名是對抗中央，醜化軍管。爲穩定內蒙軍管後的形勢，葉融被迫“貢獻”了自己的生命。

多少年來，每想起葉融，我的心不能不震顫。他曾是清華大學高材生。他說，中國樓房多是蘇聯四、五十年代的模式，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傳統，爲什麼照搬洋人。可惜，一個有才華有理想的人，一生坎坷，死於非命。想起葉融，我每每自責。最後一次見面，我爲什麼顯出不耐煩，我無權這樣對待朋友！1967年，我若幫他找到臨時工作，怎麼能有1969年冬天！

從唐山學習班回內蒙後，秦屏讓我把她寫的申訴材料，遞到說話算數的人手裏。面對一個40多歲卻滿頭白髮的女子，和兩個未長大的孩子，我不能拒絕。爲此事，我找過當年的黨政軍一把手尤太忠。尤看過材料後，只表示愛莫能助。他說：“這種冤案肯定不是幾件，只能暫時冤下去。這樣的事一旦開了頭兒，會衝擊我的主要工作。”尤在內蒙是受命而來，並沒長期打算，他是緊跟形勢的人，不會當包公、海瑞。我無法把真實情況告訴秦屏，只是說，尤司令看過材料，也認爲葉融的案子很冤，已批交到下邊去辦。美好的期待，給命運苦難的人能帶來些許愉快。我實在想不出別的回答，以免再次傷害她。

之後，我自己成爲審查對象，被關入牢獄。出獄後聽說，葉融的案子平反了，但只“平”到“不應該受極刑”的層面⁸。

1996年秋，我出差去葉融的出生地南京。那天，我站在燕子磯上，面對長江水，默默祭奠葉融。此時此刻，我多麼希望葉融的冤魂，能隨滔滔江水，來此與我相會，讓我真誠地寬慰他那被輾碎的心靈。

文革之後，據說秦屏帶著孩子調回這裏。人生的磨難，讓我和她失去聯繫。不知她現在怎樣？葉融的孩子怎樣？山崖下，長江水，無語東流，若隱若現的漣漪漩渦，在江面留下串串問號。

⁸ 對葉融的平反，只“平”到“罪不該殺”，即僅僅承認有“錯殺”問題，而沒有錯抓、錯關問題。對於所有這些迫害的總源頭，即所謂“手槍問題”，當局更沒勇氣去碰，因為他們害怕，如果平反“到底”的話，不僅需要清算毛年代的錯誤，還有可能鼓勵更多受害人及其家屬，採取進一步行動，向當局要說法，討公道，極大損害中共執政的合法性。

後 記

英雄何須論成敗，自古公道在人心

在本書稿準備交付出版的時候，我懷著極為複雜的心情，寫下這篇艱難的文字，既為悼念高樹華老師，也為向讀者做必要的補充說明。

2003 年 6 月下旬，突聞高老師病逝的噩耗，震驚悲痛。不久，收到高老師臨終前託朋友輾轉寄來的一大包手稿、日記，及許多隨手書寫的碎紙片，其中包括對我的最後託付。大部分字跡潦草，甚至雜亂無章。面對這些遺物，我心情極端沉重，時常淚流滿面，夜不能寐。

記得 2001 年夏天見面，高老師誠懇邀我同他合作，共同撰寫一本有關內

作為本書的合作者，我擔心未能盡到最大努力，無法使本書達到它本應達到的水準和深度。雖然我從事社會學專業的教學和科研，讀過不少中外口述史，自己也發表過若干口述史短篇，但我的主要研究和寫作領域，偏重社會結構和鄉村調查，駕馭如此宏偉的口述史巨著，還是生平第一次。加上自己課業繁重，難於全力以赴，只能利用業餘時間加班加點。爲了趕在文革40周年出版，時間安排稍嫌倉促，生怕因此而影響作品的品質。

另外，本書的時間跨度較大，涉及的人物和情節眾多，除內蒙師院一些人物我比較熟悉外，高樹華在校外結識的造反領袖、黨政軍高層、獄中難友等，我大多並無交往。所以，對於許多人物和情節的過程描述，我只能忠於高樹華提供的原始資料，難以一一核實，更無法做出準確與否的獨立判斷。

好在社會學所要求的口述史寫作，不同於司法官審案對證據的要求，不必要也不可能件件核實，或者一一徵求當事人認可。由於我當年也是師院外語系學生，是支持高樹華的造反派成員，有幸上過工作組（隊）的“黑名單”，雖沒有成爲造反派頭頭，但立場一向堅定，從來沒有向黨委和工作組寫過什麼“悔過書”。後來在《內蒙古日報》任記者期間，也同滕海清、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王再天、郭以青等高官打過交道，甚至有過直接衝突。以我對書中重要人物和事件情節的記憶，高樹華的描寫恰如其分，沒有刻意誇大或縮小，基本遵守了口述史的真實、客觀和平衡原則。

以此類推，對於那些我不熟悉的人和事，我也相信，高樹華能夠秉持實事求是原則。即使對那些他不喜歡，甚至厭惡的人，他也能做到就事論事，不記個人恩怨，不摻雜主觀價值判斷。本書力求客觀公正，避免感情用語，以便經受公眾和歷史的雙重考驗。這是我們當初商量全書大綱時，共同制定的寫作原則。

就我熟悉的某些大人物和大事件看，高的初稿較好遵守了上述原則。當然，口述史也是一種歷史，必須評價人物事件，其中難免褒貶臧否。凡屬公眾人物，應該接受也必須接受口述史的點評，無論對點評的個人好惡如何。

正如高樹華在本書前言所說，只在極少數幾個人名上，考慮到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利益和隱私，避免給他們增添不必要的麻煩，我們略去姓名，或者使

用化名替代。這種技術性處理，完全不損害口述史的學術價值，也是社會學研究的道德規範之一。

第二，遙記當年，英雄安在？

作為高樹華早年的學生和後來的朋友，我一直把他作為師長對待，更把他當作英雄看待，不管他在造反初期泰山壓頂，仰或短暫“勝利”之後榮升高位，還是文革之後又遭清算、罷官入獄，再到後來忍辱負重，為謀生而漂泊，我從不以觀點和成敗論英雄，更不以身份地位論英雄，只以人格、學識、和眼光論英雄。

我雖然沒有直接上過他的課，但從 1963 年考入外語系起，便知道他是俄語公共課老師，同時兼任高年級的文藝理論課。還沒輪到我班上他的課，文革就發生了。他同時又是系裏的黨團幹部，而我作為被黨團組織排斥打擊的對象，對黨團幹部一向敬而遠之。更確切說，不是我不想靠近“組織”，而是那個組織把我打入另類，不許我靠近它。記得文革之前的高校社教中，外語系和全院一樣，先批判前書記特木爾巴根的地方民族主義，接著在班級內重點批判反動學生，我有幸成為班內的批判重點。高樹華和劉樸兩位老師，曾經代表系黨團組織，到我班坐鎮，指揮對我的批判。由於年代久遠，我對他們當時的講話內容，記憶已經模糊。總的印象，他們只不過代表組織來完成一項任務，與其他官員的黨八股沒有什麼不同，也不會有什麼不同。

然而，文化革命“一聲炮響”，改變了我對高樹華的印象。以他為首的四人大字報，開始讓我刮目相看。那張大字報，無論 40 年後看它多麼奇特，但當時可代表了我們這批挨整同學的靈魂吶喊，反映了我們的內心衝動。因此，我也和許多師生一樣，打著毛思想的抽象旗號，向資反路線發起具體進攻。

古往今來的所有造反者，行為動機其實並不複雜，也談不上崇高，僅僅出於人類生存的本能而已。同樣面臨壓迫和殺戮，有的人任人宰割，逆來順受，毫不掙紮；有的人則奮起抗爭，拼死一搏，不計成敗。前者為奴隸，後者則為英雄。

以高樹華當時在體制內的處境，應該說比我們這批反動學生要好得多，他若計算個人功利，無論站在保守一邊，或者逍遙一邊，都會穩妥保險，絕對不至於影響到他日後的升官發財。可他卻選擇了當造反派的頭。從本書揭示的心路歷程看，他一方面確實迷信了毛的所謂“反修防修”那套說教；但另一方面，他又耳聞目睹並切身體會到嚴酷的社會不公，自覺站在了弱勢群體一邊。而且，敢於登高一呼，揭竿而起，並在隨後翻雲覆雨的浪潮中，始終不低頭，所以，才被全院師生，擁戴為英雄式的領袖。

高樹華的高風亮節和英雄氣慨，不僅表現在他文革浪潮中力挽狂瀾和身世沉浮，更表現在他文革之後所處的清查歲月、鐵窗生涯、以及在“不予起訴”掩蓋下的長期生活逆境中。面對政治版圖和生存環境的天翻地覆，他沒有軟化、沒有沉淪，沒有喪失自我。在充斥犬儒哲學的污泥濁水中，他嚴於律己、探求真理、勤奮好學，憂國憂民的文人風骨，始終如一，歷久彌新。

可惜，他未能在 60 出頭的“人生關口”，對自己的健康隱患給予足夠重視。上次在呼和見面，我提醒他要注意身體。他一再說，健康無大礙，只是心臟“有點小毛病”。沒想到，時隔不久，小毛病頃刻變成大殺手，過早結束了他的輝煌人生，給尚在人世的我們，留下無限惋惜與惆悵。

高樹華的一位好友，曾經代表造反派同仁，用下列挽辭來總結他英雄而悲壯的一生：“高樹華一生雄才大略，經天緯地，運籌帷幄，廣結善緣。他是鳥中之鷹隼，人中之俊傑。他曾以早慧、先知、敏銳、果決的品格，對他的朋友、學生，以及他聲譽所及之處，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他的價值是歷史性的，他的魅力將永存於同代人的心裏。他的名字就是一個符號，如聖手天書鐫刻於蒼穹之上，劃不去，抹不掉。”

第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作為生死與共的造反派戰友，我至今仍然認為高樹華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動，有其合理性和正義性，他代表了當年一大批弱勢群體，對中共荒謬制度（包括階級鬥爭論）的反叛與抗爭。

如今許多論者，包括一些研究文革的人，往往抽掉導致文革浪潮的社會悲劇，孤立地貶低毛澤東的錯誤路線和紅衛兵的無理取鬧。本口述史的出版，將有助於澄清此類誤解和盲點。讀者不難看到，早在文革之前的數年間，甚至十數年間，學校裏的政治氣氛和人際關係，已經非常緊張和怪異。大規模群體抗爭的乾柴早已佈滿，所缺少的只是一個火星而已。毛澤東的文革“陽謀”給乾柴澆上油，聶元梓和高樹華們的大字報，只不過撒下一顆火星，便立刻燒起衝天烈焰。

從 1966 年 6 月 2 日的高樹華四人大字報那天起，我便確定了自己的造反派立場。即使遭遇保守派的攻擊圍剿，受到工作組（隊）的威逼利誘，我也始終沒有改變過觀點。因為，儘管我當時尚看不透毛的專制本性，但我直覺感到：如果文革前那套舊體制不變，我輩只有被開除和勞教的命運。而按照毛的文革路線反一反，說不定還有改變處境的可能，無論希望多麼微弱和渺茫。

沒想到，在毛領袖的號召下，僅僅跟了一下北大聶元梓的腳步，不過給本單位領導貼了大字報，竟然為此闖下彌天大禍。正是那些對五七年反右記憶猶新的權勢人物，加上他們培養和信任的黨團骨幹，再次使用反右手法，殘酷鎮壓“右派造反”，才釀成全社會的派性分裂和幾乎失控的文爭武鬥。當然，毛這一次“陽謀”的矛頭所向，不是 1957 年的“資產階級右派”，而是他的政敵劉鄧走資派們。他要動員和利用紅衛兵小將，因此才有後來的批資反、一月奪權、成立革委會等等。

當然，毛領袖一旦將劉鄧打倒，實現他權力重組的專制目標，通過中共九大把極左派親信拉入決策層之後，便開始收拾那些不大馴服的造反領袖，把他們逐個打入冷宮。再通過軍管軍訓和上山下鄉，把喜歡鬧事的青年學生掃地出門，膽敢反抗者鎖進牢籠。到林彪事件之後，毛已經預感到情況不妙，轉而向官僚體制讓步，起用鄧小平，由“三結合”的所謂新生權力機構，逐步向舊的黨委體制回歸。1976 年周恩來去世和四五運動爆發，標誌著人民群眾向毛領袖及其文革親信的公開挑戰。雖然毛勉強將四五運動鎮壓下去，並把鄧小平第二次打倒，但已屬強弩之末，力不從心，難以挽救文革被徹底否

定的最終結局。

我本人同意高樹華的觀點，即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文革應該否定，但無法同意鄧小平和中共高層，對文革真相的肆意歪曲和片面解讀，更反感他們不做具體分析，不分青紅皂白，“凡造反派皆壞人，凡保守派皆好人”的反攻倒算心理。這種陰暗心理，在內蒙古二王（王鐸、王逸倫）等高官回朝復職以後，表現得特別明目張膽，絲毫不加掩飾。看看多少保過他們的庸才蠢材獲得提拔重用，而又有多少反對過他們的能人好人受到壓制迫害，便一目了然。

其中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當數高樹華本人。既然關押審查逮捕六年之久，最後仍然不得不在胡耀邦親自過問下予以釋放，就應該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既然如此，那為什麼還要繼續迫害他，拒絕給他一條養家餬口的謀生之路呢？難道還要繼續積累社會仇恨，把中國引向另一場文化革命，或者其他形式的內戰和殺戮嗎？

如此處理文革遺留的恩怨情仇，固然解氣，能逞一時之快，但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對於重建社會和諧，它絕對不是一副靈丹妙藥。其後遺症，將長久腐蝕社會肌體，為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種下怨怨相報的禍根，因此，絕對不是國家和民族之福。

上下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血腥和仇殺的悲慘史。遠的不說，就在中共治下相對和平無戰爭的幾十年間，就已經有過太多的鬥爭、仇恨、迫害與殺戮。中國不是常常批評日本有歪曲教科書的問題嗎？最近，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撰文提醒國人：我們也有教科書問題。按照他的說法，中國現行教科書，在鴉片戰爭以來的許多重大歷史問題上，存在歪曲、掩蓋、誇大等問題，也需要做自我反省。我感到，起碼在我們記憶猶新的文革史上，目前的官方文本謬誤嚴重，根本經不住時間考驗。中華民族已經失血太多，我們衷心希望各族同胞停止鬥爭，慰平仇恨，捐棄前嫌，共同構建一個真正和解與和諧的社會。

然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正視歷史，分辨是非，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而不是迴避歷史，混淆是非，歪曲經驗，忘卻教訓。這，便是我們編寫

本口述史的終極目的。

第四，千秋功過，任由評說

作為高樹華案件的局外觀察者，我想就高樹華在文革中的歷史功過說幾句話。不錯，籠統說來，我也不反對文革是一場“浩劫”的簡單概括。但要當心：簡單概括任何複雜歷史事件，都難免片面之嫌，更何況用過分簡單的標籤隨便亂套，刻意誤導。

既然高樹華貼了內蒙第一張大字報，領頭和院黨委、工作組（隊），內蒙黨委、軍區等權威機構鬧過對立，最後經中央和毛的欽定，成為內蒙文革的代表人物之一，並且一度掌了權，當了官，成了中共九大和四屆人大代表，受到周恩來多次表揚和肯定，那麼，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垮台、文革被徹底否定之後，高樹華必然要從正面人物變成反面人物，過去的功勞也自然成了他的罪過。官方對他的馬拉松拘押審查，專案組對他的逼供誘供，所套用的正是上述邏輯。

然而，這個非黑即白的邏輯，看似有理，實則荒謬。首先，必須承認，這麼大一場運動，作為群眾領袖，高樹華不可能沒有錯誤。高的錯誤，充其量是過失，而非罪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凡參加過運動的人，無論保守、造反還是逍遙，有任何人敢說自己沒錯誤嗎？高樹華之過，主要表現在運動初期，例如：對毛的迷信盲從；未能及早金盆洗手，激流勇退；在挖內人黨過程中，隨波逐流，跟著舉手表決，不得不承擔一份責任，等等。

其次，我們也得深究，或者反問一句：造成這些過失的根源何在？認真說來，他那些過失，對毛的迷信也好，盲目服從中央也好，不都是毛領袖和共產黨多年教育的結果嗎？既然共產黨刻意塑造這樣的模子，又怎能要求他去超越那個體制的局限呢？在那個歷史條件下，他怎麼可能做得到金盆洗手，激流勇退呢？

第三，高樹華即使有過，也不能抹煞他在運動中的功勞，他的工作成績，以及為百姓辦的好事。中共不是常用三七開、四六開標準嗎，高樹華的功勞

和成績，足可補償他所犯的過失，將功補過，應該富富有餘。

例如，他協助烏蘭夫之子力沙克逃離牛棚，儘管意氣用事，並無政治動機，但爲此背上烏蘭夫“別動隊”嫌疑，多年難以洗刷；他教訓挖肅先鋒郭以青，相對減輕內人黨受難者的壓力；主管文藝革命辦公室，消極抵制挖肅，被扣上右傾帽子；在九大發言，肯定胡耀邦的共青團工作，支援胡當中央委員，因此得罪江青，受到江的當面斥責；巡視伊盟，盡力保護成陵；處理昭盟武鬥，恢復煤礦生產，化解水庫危機，受到周恩來表揚；蹲點五四大隊，拒絕在當地挖內人黨；下放農村勞動，受到農民好評；抓教育改革，恢復農村和民族教育；主政土左旗，解決知青出路，促進農業生產，抵制清查聯動，變相舉辦周恩來追悼會，等等。這些事例，無一不是後毛時期新權貴們所喜聞樂見的政績亮點。這麼多成績和功勞，竟然不能抵償他寫一張大字報的所謂“過失”，豈非咄咄怪事？

箇中秘密，恐怕不能單用內蒙高官的器量狹小解釋，更需要用後毛年代過分極端和愚蠢的“清查政策”來說明。因爲高所遭遇的種種磨難，在全國其他造反派頭頭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可見偏激是全局性的。換句話說，當政者所要打擊的，並非高樹華個人，而是敢於反迫害的那種造反精神。當年主管政策落實的總書記胡耀邦，曾經試圖抵制這種“趕盡殺絕”，“不給出路”的極端報復政策，可惜他勢單力薄，終於頂不住陳雲、鄧小平等人的一意孤行，無法阻擋新一輪冤假錯案的發生。

第五，撥亂反正，留待後人

最後，作爲研究文革史的社會學工作者，我想對所謂“撥亂反正”再發幾句感慨。自文革之後的八十年代始，媒體充斥“撥亂反正”、“百廢俱興”、“中華騰飛”等令人眼花繚亂的美麗詞藻，好像隨著GDP快速增長，中國的體制性痼疾已經自動消失，問題不復存在，前途一片光明。

更有樂觀者認爲，中共新權貴已從文革吸取教訓，並採取有效措施，改變產生文革的土壤和社會條件，因此，毛澤東式文革在中國決無再次發生的可

能。如今大陸御用學者，多數持以上觀點。但就我所知，許多民間學者和海外學者的看法則大相逕庭。

2006年5月16日，即“五一六”通知四十周年，我應邀前往紐約市立大學，參加關於文革的國際研討會。許多與會學者認為，若從制度腐敗、權力異化、社會失序、人性扭曲、矛盾積累等角度觀察，中國的文化革命非但沒有結束，而且今天仍在持續進行中。當然，今天沒有四大自由，沒有合法群眾組織，沒有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聶元梓的大字報等等，這些無疑都是歷史難以簡單重複的重要原因。

然而，只要遍地乾柴，比方貧富分化和腐敗濫權已達極限；只要社會利益的碰撞火花層出不窮，例如司空見慣的群體性突發事件等，那麼，熊熊大火成片燃燒，只不過時間早晚而已。

因此我認為，文革“撥亂反正”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導致社會動亂的根源還遠遠沒有消除，有些新因素還在繼續產生和積累之中。為造反派反抗政治迫害而正名的歷史任務，還有待秉筆直書的文革史家們，共襄盛舉。即使我們這一代無法完成，相信我們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也一定能夠完成。

本文結尾，想引用文革史家劉國凱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過的話，該文題為：“‘造反派’公案未了，楊曦光，你不能走！”。楊曦光是我的好友楊小凱的別名，原湖南造反派組織“省無聯”青年理論家，曾因發表《中國向何處去》而被判10年徒刑。後負笈美國，獲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在澳洲莫納什大學任教，被視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有希望的人選之一。可惜他身患肺癌，55歲便英年早逝。我之所以引用該文，不僅因為我熟悉劉、楊二人，更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就是為文革造反派正名，以恢復其在中國歷史上應該擁有的真實地位。

劉國凱寫道：“悲痛使人傷感，但擦去淚水後還須面對現實。楊曦光，你為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運動正名的工作，我會堅持做下去。儘管我身單勢薄、力不從心，但誓效精衛，願為蠶蠟。你說過，相信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運動終將在歷史上恢復名譽。我確信，你的預言一定能成為實事。”

這段話，不僅表達了我的心聲，相信它也代表高樹華的臨終遺願。我想，有這些朋友鍥而不捨地探索追求，高樹華應可含笑於九泉了。

願高老師安息。

作者 程鐵軍

完稿於韓桐遇害四十周年

2007年2月5日，澳門大學

高樹華年譜

1941年1月19日：出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鐵路工人家庭

1946年—1952年：呼和浩特鐵路小學讀書

1952年—1958年：呼和浩特市二中讀書

1958年9月：考入內蒙師院中文系

1960年9月—1961年7月：師院外語系讀書（相當於現在的第二學位）

1961年9月：留校教俄語，同時繼續攻讀中文和俄語兩專業，取得本科大學畢業資格

1966年6月：文革前，任外語系教師，同時兼做外語系團總支工作，協助黨支部學生思想工作

1966年6月3日：寫第一張大字報，後被內蒙黨工作組打成“烏蘭夫黑幫分子”，關押近兩個月

1966年10月：參加內蒙師院東方紅縱隊並成為主要負責人之一

1966年11月：獲內蒙黨委宣佈平反

1966年12月：組成“紅色燎原革命造反團”，在山西太行山串聯

1967年1月：返回內蒙參加批資反路線

1967年2月：參加中央舉辦的四方會談

1967年6月：內蒙古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兼辦事組組長

1967年11月1日：參加內蒙古革命委員會，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內蒙文藝革命辦公室主任

1968年10月：下放內蒙杭錦後旗五四大隊勞動

1969年1月—4月：參加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

1969年7月—10月：北京空軍學院學習班

1969年11月：下放烏盟察右中旗大南溝公社那日斯太大隊

1970年3月—1971年5月：唐山學習班

1972年6月：內蒙古教育局普教組組長

1973年3月：中共土左旗旗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1975 年 12 月：參加全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

1976 年 3 月：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1977 年 12 月：被隔離審查

1979 年 12 月：以幫派骨幹分子名義被逮捕

1983 年 7 月 25 日：以“不予起訴”獲釋

1983 年—1993 年：在各省市教書、經商、當編輯

1993 年—1998 年：在蒙古、俄國、歐洲等地經商，自由撰稿

1998 年—2001 年：回國經商，謀生之餘，抱病秘密撰寫口述史提綱

2003 年 6 月 12 日：心臟病突發，在呼和浩特逝世，終年 62 歲

《真相》系列(41)

書 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

作 者：高樹華 程鐵軍

發行人：何 頻

責任編輯：費 彰

封面設計：一 劃

校 對：林小貴

出 版：明鏡出版社

網 址：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SA.

電話：(516)338-6976 傳真：(516)338-6982

國際統一書號：1-932138-56-0

定 價：HK\$ 125

版 次：2007年7月第一版

明鏡出版社 書目

(一) 中國局勢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鹿死誰手	何頻 高新	80	15	18
2.	解放軍武器裝備	林長盛	110	19	22
3.	解放軍攻打台灣	何頻	120	19	22
4.	解除中國危機	陳子明 王軍濤	111	19	22
5.	中共“太子黨”(上下冊)	何頻 高新	168	27	30
6.	中國第一家族	高新 何頻	99	17	20
7.	江澤民面臨的挑戰	王紹光 何頻 吳國光 高新	105	17	21
8.	鄧小平之後的中國	何頻	110	19	22
9.	江澤民的幕僚	高新	96	17	20
10.	致中南海密札	何新	128	21	24
11.	中國復興的動力	楊雪野	105	17	21
12.	中國導彈及其戰略	趙雲山	128	22	25
13.	北京地下「萬言書」(售完)	石柳子	95	17	20
14.	中國跨世紀大方略	陳子明 王軍濤	83	16	19
15.	新三國演義：中港台政局	吳國光	75	14	17
16.	趙紫陽最後的機會	袁會章	98	18	21
17.	關鍵問題	唐逸鴻	96	18	21
18.	中國的陷阱	何清漣	107	18	21
19.	鄧小平的遺產 江澤民的困境	麥杰思(著) 袁希正(譯)	98	18	21
20.	中國下一步怎樣走	黎萍	87	16	19
21.	靜悄悄的革命 —— 中國當代市民社會	李凡	107	18	21
22.	憲政中國	諸葛慕群	65	13	16
23.	江澤民的權謀	石沙	99	18	21
24.	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	王力雄	93	17	20
25.	降伏「廣東幫」	高新	99	18	21
26.	中國老百姓的權利	諸葛慕群	98	18	21
27.	中國需要什麼權的政府	諸葛慕群	118	19	22
28.	中國二等公民—當代農民考察報告	白沙洲	108	18	21
29.	朱鎔基在1999	宗海仁	88	16	19
30.	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	鄭義	129	21	24
31.	角力十六大—中國未來控制權	吳稼祥	88	16	19
32.	中共「第四代」權力部署	伊銘	98	20	23
33.	中南海日記	吳稼祥	95	18	21
34.	曖昧的權力交接	宗海仁	95	18	21
35.	胡溫新政	伊 銘	110	19	22
36.	聯邦化：中華第三共和國之路	吳稼祥	88	16	19
37.	俞梅葆與中國新民權運動 ——中南海秘書為何成了民間代言人	張耀傑	98	19	21
38.	趙紫陽與中國改革	陳一諮等	98	19	21
39.	中國上訪村	廖亦武／高氏兄弟	108	18	21
40.	達賴喇嘛的處境—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	Melvyn C. Goldstein 著 楊和晉 譯	90	17	20
41.	中國工人階級狀況	于建嶸	125	19	22
42.	中國貪官在海外	洪 雷	96	17	20
43.	中共十七大幕前戲	陳曉銘 楊韻 謝冠平	98	19	22
44.	我們向誰控訴？——鍾祥航運公司維權紀實	華梁興	88	16	19
45.	胡溫之劍——打賈打黃誰是最後贏家？	歐陽詮 白曉雲	118	18	21
46.	中共十七大佈局	陳曉銘 楊 韻方延鴻 謝冠平	118	18	21
47.	中國軍事決策機制及台灣衝突	約翰·劉易斯 薛理泰 著 薛理泰 譯	120	20	23

(二) 掌權者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中國新諸侯	何頻	98	17	20
2.	中國政府領導者	何頻	115	19	22
3.	解放軍現役將領名錄	何頻	89	16	19
4.	中共最高決策層	何頻	95	17	20
5.	江澤民的權力之路	高新	105	20	23
6.	跨世紀接班人胡錦濤	任知初	97	17	20
7.	中共最高決策層(修訂版)	中國局勢分析中心	98	18	21
8.	中南海七巨頭	伊銘	99	18	21
9.	誰領導中國	高新 何頻	125	21	24

10.	朱鎔基的內閣	寧鄉漢 文思詠	108	20	23
11.	鐵面宰相朱鎔基大傳	高新 何頻	106	20	23
12.	中國情報系統	艾夫提麥爾德(著) 李豔(譯)	77	15	18
13.	江澤民傳	杜林(著) 楊鳴鏑(譯)	105	20	23
14.	中國黨政軍中央領導層	高新	95	17	20
15.	第四代	宗海仁	125	21	24
16.	胡錦濤傳	文思詠 任知初	118	19	22
17.	領導中國的新人物	高新	158	39	42
18.	溫家寶傳	高新	88	17	20
19.	胡錦濤傳(修訂版)	文思詠 任知初	128	22	25
20.	胡錦濤團隊(原名：團徽照耀中國 ——中共政壇的明星和黑馬)	艾仰樺 陳曉銘	98	18	21

(三)真相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真假毛澤東	趙無眠	100	17	20
2.	文革大字報精選	譚放 趙無眠	145	23	26
3.	紅衛兵與嬉皮士	任知初	83	15	18
4.	文革大年表	趙無眠	113	19	22
5.	中國大逆轉	華民	125	21	24
6.	天安門	卡瑪 高富貴	100	17	20
7.	胡耀邦下台的背景	王若水	115	20	23
8.	真假周恩來	趙無眠	96	17	20
9.	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	胡績偉	99	17	20
10.	天葬：西藏的命運	王力雄	123	21	24
11.	天安門之爭	封從德	107	19	22
12.	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	許家屯	100	18	21
13.	789集中營	曉函 米雅	101	18	21
14.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109	19	22
15.	中國勞改營紀實(新鬼，舊鬼)	司馬晉 安徒生(著) 梁至正 奚 蒙(譯)	93	17	20
16.	美國間諜在中國	余茂春(著) 李豔波(譯)	105	19	22
17.	百年功罪	趙無眠	99	17	20
18.	毛澤東與康生：鬥爭哲學大師與整人專家	巴彥泰	75	14	17
19.	毛澤東執政春秋	單少傑	135	22	26
20.	中國「六四」真相	張良	180	42	45
21.	「遠華案」黑幕	盛雪	111	19	22
22.	張學良世紀傳奇	王書君	188	43	46
23.	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共抗日真相	謝幼田	98	17	21
24.	晚年周恩來	高文謙	129	22	25
25.	證詞	廖亦武	115	19	22
26.	民權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	張耀傑	88	17	20
27.	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	陳子華等	125	21	24
28.	「六四」參加者回憶錄	《“六四”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	90	17	20
29.	重審林彪罪案	丁凱文主編	180	40	43
30.	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	司馬璐	125	21	24
31.	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	賈斯柏·貝克 著 姜和平 譯	118	20	23
32.	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行為及心理分析(上下)	陳小雅	168	36	39
33.	人民心中的胡耀邦	蘇紹智 陳一諮 高文謙 主編	125	21	24
34.	林彪與文化大革命	吳潤生	96	17	20
35.	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	陳小雅	95	17	20
36.	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	張永年	125	21	24
37.	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下冊)	舒雲	172	37	40
38.	歷史塵埃——袁世凱、汪精衛、林彪後人訪談錄	高伐林	116	20	23
39.	極端十年	柯雲路	110	19	22
40.	林彪畫傳	舒 雲	168	27	30
41.	內蒙文革風雷	高樹華 程鐵軍	125	21	24

(四)世界觀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中國如何面對西方	蕭 旁	79	15	18
2.	日本如何面對中國	夏 冰	95	17	20
3.	日本新陰謀	天 元	107	19	22
4.	美國重新發現的中國	謝 翔	80	15	18
5.	江澤民西遊記	時鑒 胡楠	95	17	20
6.	菲德爾·卡斯特羅：二十世紀最後的革命家	程映虹	109	19	22
7.	俄國新總統普京傳—從克格勃到葉利欽的接班人	何亮亮	80	15	18
8.	世界憲政潮流—中外憲法比較	曹思源	90	17	20

(五)浮華世界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推動美國二十五雙手	柳食野 季思聰	80	15	18
2.	糊塗學	李夢悟	92	17	20
3.	美國商務法律引導	張辛欣(譯)	88	17	20
4.	情義無價	劉丹紅	105	20	23
5.	中國怪狀	伊銘	85	17	20
6.	古玩談舊聞	陳重遠	129	21	24
7.	文物話春秋	陳重遠	125	21	24
8.	不朽的謊言	賈鴻彬	109	20	23
9.	摧毀亞洲：索羅斯風暴	季思聰 丁中柱	88	17	20
10.	美加簽證移民引導	奚蒙	96	18	21
11.	「鐵達尼號」的漂浮與沈沒	季思聰 季思亮	77	15	18
12.	中國當代民謠	陸非琅	76	15	18
13.	總統情色報告	理察德·泰格	77	15	18
14.	婦女解放的神話	安·休利特(著) 馬莉 張昌耀(譯)	99	17	20
15.	葛林斯潘傳	季思聰 季思亮	84	16	19
16.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評傳	張微晴 喬公	95	17	20
17.	投資理財高招	林平	98	18	21
18.	偷渡美國	陳國霖 著 李艷波 譯	89	17	20
19.	網上股票之喜悅	趙璽德 湯詩墨	88	17	20
20.	西藏是我家—扎西次仁自傳	楊和晉(譯)	95	17	20
21.	911人性輝煌	施雨等	91	17	20
22.	離開商學院—MBA離巨富有多遠	楊鳴鏑	95	18	21

(六)超級女人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白宮武則天希拉蕊	史敏 梁芬	69	13	16
2.	黛安娜走出童話	陳越	75	14	17
3.	黃金時段的無冕女王	季思聰	78	15	18
4.	尋找梅娘	張泉	113	19	22

(七) 金牌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NBA十大好漢	王游宇	70	13	16
2.	世界網壇十大風流	王游宇	78	14	17
3.	拳王·拳王—從阿里到泰森	王游宇	78	14	17

(八) 大家小說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白雪紅塵	閻真	108	18	21
2.	黃禍(修訂版)	保密	140	23	26
3.	務虛筆記	史鐵生	115	19	22
4.	上海小姐	張翎	96	17	20
5.	天誅	利蘭錦	79	14	17
6.	塵埃落定	阿來	105	18	21
7.	嫁得西風	李彥	97	17	20
8.	中南海最後的鬥爭	李劫	99	17	20
9.	公元二〇二〇：兩岸大統一	北方劍	98	17	20
10.	遺囑	沙土	88	17	20
11.	中國地圖	汪建輝	108	18	21
12.	紅色漩渦	余良	108	19	22

(九) 文化情理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沉默的大多數	王小波	109	18	21
2.	公平報復	馬悲鳴 賀文	94	17	20
3.	廢話的力量	趙無眠	94	17	20
4.	一面之詞	胡平	55	11	14
5.	鋼絲上的中國	鄢烈山	96	17	20
6.	中國當代學者散文選	周國平	108	18	21
7.	黃翔禁毀詩選	黃翔	65	13	16
8.	中國人看中國人	高伐林	84	15	18
9.	王丹獄中家書	王丹	76	14	17

10.	王丹觀點	王丹	80	15	18
11.	中國西部孤旅	鄒藍	94	17	20
12.	網上筆戰	不平	75	14	17
13.	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	劉國凱	75	14	17
14.	高行健評說	伊沙	90	17	20
15.	科學·民主·理性	許良英	99	18	21
16.	王若望紀念文集	羊子 黃河清 鄭義等	84	15	18
17.	中國向何處去？—追思楊小凱	陳一諮	98	18	21
18.	和解的智慧	馮崇義 丘岳首	88	17	20
19.	太陽的開關在我枕邊	漢人漢語			
20.	文革詩詞鉤沈	梅振才	98	17	20
21.	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趙世緒	48	8	11
22.	劉賓雁紀念文集	黃河清、一平、北明	138	23	26
23.	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	陳為人	138	23	26

(十) 發現香港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董建華的特別顧問	李曉莊	78	14	17
2.	北京如何控制香港	何頻 高新	97	17	20
3.	危城	馮木清 魏開星 關毅	88	17	20

(十一)新聞背景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北京政治突圍	中國局勢分析中心	60	12	15
2.	放逐魏京生	中國局勢分析中心	60	12	15
3.	朱鎔基面臨的風險	中國局勢分析中心	60	12	15
4.	北京早春的交鋒	中國局勢分析中心	60	12	15
5.	朱鎔基化解危機之道	季思聰 季思亮	60	12	15
6.	測試江澤民	中國局勢分析中心	80	14	17
7.	審判陳希同	季偉	60	12	15
8.	中國能否守住最後的堤壩？	中國局勢分析中心	60	12	15
9.	重返西藏	時鑒 縱月森	60	12	15
10.	江澤民變法	白沙洲	89	16	19

(十二)新鮮人類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美國頂尖大學	高歌	98	18	21
2.	東邊日出西邊雨—美國讀書紀實	高歌	100	18	22

(十三) 特別推薦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亞特蘭大百年奧運	王遊宇	85	14	17
2.	NBA十大好漢	王遊宇	70	16	19
3.	世界網壇十大風流	王遊宇	78	17	20
4.	拳王，拳王—從阿里到泰森	王遊宇	78	17	20

(十四) 多維系列

序號	書 名	作者 /編者	香港平郵 HKD	海外平郵 USD	海外空郵 USD
1.	我在美國當老板	多維媒體公司	98	18	21

網上信用卡訂購：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香港平郵價，付港幣支票，抬頭請寫：明鏡有限公司，寄：G.P.O.Box 5281Hong Kong

其它地區郵購計海外空郵價、海外平郵價，不另收郵費，請付美元支票，支票抬頭請寫Mirror Books,

寄：P.O.Box 366, Carle Place, NY 11514, USA .



作者 程鐵軍

1943年6月16日，出生在河北饒陽縣

1967年：內蒙師院東縱成員，英語本科畢業

1982年：中國社科院世經所經濟學碩士

1988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碩士

1991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

1967-1971年：《內蒙古日報》記者，編輯

1971-1978年：內蒙、河北英語教師

1981-1982年：河北經貿大學教師

1991-1997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研究員，助理教授

1997-1999年：NGO組織RFA編譯研究

2000-2003年：澳門大學助理教授

2003-2007年：澳門大學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著作

《中國戶口制度研究》，《澳門青年指標體系研究》，《新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等專著，另有《內蒙古奇談》等中英論文數十篇，發表於海內外雜誌報刊。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 Oral History of A Rebel Leader

By Gao Shuhua & Cheng Tiejun

悲壯歷史！雄偉畫卷！

人性哀歌！心靈震撼！

內蒙古第一張大字報，同聶元梓和蒯大富串聯，軍區靜坐
全國第一聲槍響，赴北京談判，十多次謁見周恩來
同毛澤東朱德林彪握手，中共九大和四屆人大代表
得罪江青，挖「內人黨」冤案
文革之後被清查，由書記到囚徒，從隔離審查到正式逮捕
胡耀邦親自過問，從小監獄入大牢籠
上帝棄兒，艱難謀生，含冤辭世

這本橫空出世的書，必將對中國史學界、社會學界乃至文學界產生深遠的巨大影響。

它不單是文革史書，還是人性之剖析、人格之昇華、人道之覺悟的巨卷。

—— 旅美文革史專家 劉國凱

ISBN 978-1-932138-56-6



9 781932 138566

HK\$125